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十一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中共中央颁布“七七”十周年纪念口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日发布对时局口号如下：

（一）全解放区人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

（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向蒋介石要和平！惩办一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屠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庭审判，没收他们的财产赔偿被蹂躏的人民！

（四）反对蒋介石的饥饿政策，向蒋介石要饭吃！实行抗丁、抗粮、抗款，没收万恶的官僚资本，没收贪官污吏的财产，救济饥饿的人民，救济饥饿的学生和公教人员，救济抗日有功的失业军人和烈士遗族，救济灾民，难民，保护民族工商业！

（五）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向蒋介石要自由！反对恐怖暴行，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背叛政协路线的伪国大、伪宪法，抵制蒋介石的伪选举！

（六）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反对蒋介石借外债打内战，反对蒋介石用美国军火杀害同胞，取消卖国的中美商约及一切卖国条约，否认蒋介石政府在内战时期所借的外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美国政府供给蒋介石军火助长中国内战；要求一切美国海陆空军和美国顾问团全部退出中国！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平等互助原则下和外国（不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通商友好关系！

（七）惩办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惩办“九一八”以来一切日本侵华罪犯及汉奸卖国贼，制止日本侵略势力复活，实现日本民主化！日本赔偿中国的物资必须交给人民分配，反对蒋介石利用赔偿打内战！

（八）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向民兵游击队致敬！向战斗英雄人民功臣致敬！向爱国自卫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敬！向爱国自卫战争中受伤和残废的荣誉军人致敬！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们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学习阵地战，学习迂回战术，勇敢的围歼敌人，不让一个敌人逃跑，全部消灭进犯军，夺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一切为人民服务，严守纪律保护人民！

（九）向伟大的解放区人民致敬！向劳动英雄、模范干部致敬！加强群众工作，干

部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护群众利益，执行群众路线，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帮助军队作战，军民团结消灭万恶的反动派！

（十）坚决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务使一切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获得足够的土地及生产工具，保护中农，保护民主分子，惩办地主恶霸！

（十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务使解放区有足够的粮食、军需品、民需品，处处从全面与长期着想，支持爱国自卫战争！

（十二）国民党军队官兵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不要丢下你们的父母妻儿替卖国贼、独裁者送命！蒋介石的崩溃已不可免，举行起义，反战罢战，放下武器的将受优待，停止作恶的将得宽恕，继续作恶的将受惩罚！国民党员们回到孙中山的革命立场上来，只有脱离反动阵线，停止反动罪行，转到人民方面才有出路！

（十三）向蒋管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反卖国的人民及其领袖们致敬！向在蒋介石恐怖下被监禁、被杀害的民主战士们致敬！一切民主党派、一切民主团体、一切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的胜利！

（十四）向争自由的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致敬！团结起来，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

（十五）全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十六）人民解放军万岁！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万岁！民主的联合政府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转自《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军事文集》第三集）

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新华社社论

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内线作战、大量歼灭敌人之后，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了。

正当美国帝国主义者血腥屠夫魏德迈，以侮辱中国人民的姿态来华“调查”、鼓励蒋介石强盗集团放弃“可鄙的失败主义”、加强屠杀中国人民的内战的时候，正当蒋介石发布所谓“总动员令”、自吹自擂、企图发动他的所谓“九月攻势”的时候，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却用大举反攻答复了他们。七月间我们冀鲁豫及山东人民解放军开始出击，在鲁中、鲁南各地取得胜利，特别是在鲁西南连续歼灭敌人九个半旅，获得空前的大胜利。八月十一日我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越过陇海路，接着渡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如入无人之境。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大别山地区，威震长江南北。八月十二日我苏北人民解放军大捷，于盐城歼灭蒋伪军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八月二十日我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人民解放军，在米脂以北歼灭胡宗南之整编第卅六师，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八月二十三日我陈赓、谢富治、韩钧、孔从周、秦基伟诸将军所部，在洛阳、陕县间南渡黄河，进入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广大地区。九月八日我陈毅、粟裕、陈士渠、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人民解放军进入鲁西南，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灭蒋军五十七师全部。我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上，东起苏北，西至陕西，南抵长江，已经转入反攻。长江以北诸省的伟大解放战争已经揭幕了，我们已经打到蒋介石的后方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的攻势，加上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在进行的对平汉北段的攻势，以及我东北、热河、冀东人民解放军早已于五月间就开始了的伟大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总形势。

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情势的根本改变。蒋介石的全面攻势已被打得粉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所吹嘘的“九月攻势”换了个方向，变为人民解放军的全面的战略攻势了。蒋介石则转到被动地位，并且因为人民反对、兵力削弱与后方空虚，而处在极其危殆的地位。

在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不到两年的过程中，特别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的一年又两个月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祸国殃民的罪行，已被全国人民所清楚认识。蒋介石所制造出来的经济崩溃与战争灾难，使蒋管区人民求生无路。此次魏德迈来华，执行美国帝国主义扶助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和更进一步助蒋内战、“监督”蒋政府、把中

国彻底变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卖国贼蒋介石竟不惜把八年抗战中全国军民牺牲奋斗的果实完全出卖，顺从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旨，同意与日本立即通商，让日本反动派再来侵略中国，把台湾、琼崖、青岛、成都、西安、兰州、天水等地，或者已经送给、或者准备送给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军事基地。蒋介石匪帮的无耻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人民不但已分清了内战中谁是谁非，而且也看清了内战中谁胜谁败的前途，因而认识了这一真理，即是要求得自己的解放，必须推翻蒋介石匪帮的万恶统治。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

蒋介石匪帮的兵力，其正规军被歼的，到八月底止已达一百十四个旅九十万人，伪军、地方军和特种部队被歼的卅五万三千人。这就是说，蒋介石的正规军已有一半曾被歼灭、或受过歼灭性打击，其伪军、地方军和特种部队已被歼灭三分之一，因而大大的削弱了蒋匪的军事地位。匪军中不但士气低落，而且在一切高级文武官员中，在整个反动派阵营中，都充满了失败情绪。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气，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愈陷愈深，互相埋怨见死不救，这就是整个匪军营垒的现状。再打一年、两年，蒋介石匪帮就离全军复灭不远了。

至于蒋介石的后方，则是空虚到了极点。至八月底止，蒋介石的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中用于前线作战的已达二百二十七个旅，留在后方的仅有二十一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肃西部八个旅，川康七个旅，云南两个旅，广东两个旅，台湾两个旅，如此而已。湘、桂、黔、闽、浙、赣六省，无一个正规军。蒋介石完全没有第二线部队，蒋介石必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北诸省大举反攻，出现于蒋军后方，就把蒋介石这个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我人民解放军向敌人后方前进如入无人之境，而且逼着蒋介石不得不手忙脚乱，从第一线调兵向后方增援。蒋介石后方有许多城市和战略要点从前是不要防守的，现在却必须派兵防守，这就使蒋介石的兵力大大分散，战略机动兵力大大减少，不得不在战略上全国转入防御，剩下的只有某些局部的地方性攻势。这就给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内外大量歼灭敌人、收复失地和解放新地区人民大众，造成必要的前提。总起来说，人民反对，兵力削弱，后方空虚，这就是蒋介石的三个致命弱点。这些弱点是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的结果。蒋介石在已往还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还能以进攻一地来鼓励他的士气，但是从今以后，战略攻势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蒋介石的崩溃必然加速。由于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进行了内线作战，大量歼灭了敌人，大大加强和锻炼了自己；解放区因为实行土地改革而更加巩固，一时被他占领的地方，匪军一跑，仍然是我们的。这些条件又造成了反攻的有利形势，奠定了今后彻底消灭蒋介石全部匪军的基础。蒋介石匪帮的复没的前途是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也不能挽救蒋匪的这个命运。

毫无疑问，在解放长江以北各省的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并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艰苦奋斗，大量歼灭蒋军，才能达到解放广大被压迫人民群众的目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与必须克服的。

我人民解放军出征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必须明了自己所担负的任务是何等光荣，何

等伟大！必须英勇善战，服从命令，不怕牺牲，不怕劳苦，大量歼灭敌人，必须和当地人民群众亲密结合，整饬群众纪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奋斗！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最光荣的位置，是到长江以北各省中去工作，实行正确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摧毁蒋介石反动统治，组织广大人民，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权，进行土地改革，武装人民，并与各阶层的一切爱国的民主分子合作！

解放区的军民同胞们！继续在解放区内外歼灭匪军，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深入土地改革，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前线。只有把蒋匪彻底的全部的消灭了，解放区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

蒋管区同胞们！一致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战胜匪军！这个胜利将使你们永远脱离蒋介石匪帮万恶统治下的痛苦生活，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解放！

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长江以北各省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争取这个大反攻的胜利和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中华民族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附〕人民解放军全国性反攻已开始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今已开始；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从此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解放军在南线实行全线出击的结果。紧接着东北、热河、冀东、津浦北段、正太、晋南、豫北等地解放军，举行战略性反攻之后，正当中国的全面内战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南线开始了全线出击。解放军的南线出击，至目前为止，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一）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淮河，已进至豫东南、鄂东、皖西的大别山地区。该军系于六月三十日在山东西部渡过黄河，七月在鲁西南连歼蒋军九个半旅，八月七日向南进军，十一日越过陇海路，先后收复与解放宁陵、睢县、柘城、亳县、淮阳、沈邱、新蔡、项城、上蔡、临泉、息县等城，同月下旬渡过淮河，又先后收复与解放固始、光山、经扶、潢川、商城、麻城、立煌、六安、罗田、霍山、舒城等城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

（二）陈赓、谢富治、韩钧、秦基伟、孔从周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已进至豫西地区。该军在四月初至六月初解放晋西南以后，即撤回太岳地区休整准备，于八月廿三日起在晋南垣曲附近南渡黄河，先后解放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

（三）陈毅、粟裕、陈士渠、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野战军，西出津浦路、运

河，已继刘邓部进至鲁西南地区。该军于八月下旬在城武地区打击了伪吴化文部以后，于本月八日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敌整五十七师段霖茂全部。

（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野战军，由陕北反攻。该军于八月中旬在榆林外围歼敌一个旅，然后南下，于同月廿日在米脂以北沙家店地区歼敌整卅六师锺松部，又于同月下旬向南急进，现已达延川、永坪之线：而刘戡、董钊等部敌军，则落在后面，尚在清涧附近，饥疲恐慌，畏我如虎。此外，在苏北、在豫皖苏边区、在豫北、在晋南，人民解放军亦积极出击。苏北解放军并于八月十二日歼灭了伪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收复叶挺城（盐城）。由此在内战第二年的开始，东起苏北、西迄陕甘宁的整个南线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与北线同样转入日益扩大的反攻。从去年七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蒋军进攻的重点始终是在南线。去年七月间蒋军正规军使用于南线者计为苏皖边区三十一个旅；中原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山东（不包括鲁西南）廿七个旅；晋冀鲁豫（包括鲁西南和晋西南）廿八个旅；陕甘宁十九个旅，共一百三十个旅，占当时蒋军进攻解放区总兵力一百九十三个旅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后南线蒋军虽连遭痛击，在内战第一年内，仅营以上正规军即被歼六十七个旅以上（内三十九个整旅，外九个师部）；但蒋军仍继续增加和补充兵力，在今年一月至八月期间始终保持一百五十几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进攻华东解放区（山东津浦路东和苏北）者，曾达八十几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者，则达三十几个旅。因此，南线的两翼成为全国蒋军兵力最集中的两个战场。在李先念将军所部中原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牵制蒋军的战略任务，并分别胜利撤往苏皖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以后，蒋介石就一直企图用所谓重点攻势，把南线解放军的两翼逼过黄河；但是蒋介石一直没有能实现他的企图。在南线解放军全线反攻以后，这个企图已被粉碎。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已把战线以巨大规模推到战争第一年开始的地方——长江流域，并使蒋军后方的信阳、武汉、安庆、合肥、洛阳、西安等重要城市迅速变为受威胁的前线。南线解放军的大举出击，已证明完全出于骄傲的蒋介石及其各指挥部和美国顾问的意料之外，他们愚蠢地解释刘伯承军的行动是所谓："北渡不成而南窜"，是企图"越平汉路西窜"；说陈赓军南下为："接应刘伯承"，又说山东只剩下了"绥靖作战"，"陕北共匪业已肃清"，一派胡言乱语，实则慌作一堆，仓惶失措。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迫由山东津浦路以东调出十几个旅，由陕甘宁调出三、四个旅，另由豫北、晋南和长江守备部队中调出十几个旅，试图拦阻向中原和长江疾进的解放军；但是绝大部份都落在解放军之后。深陷陕北葭县、米脂地区的蒋军，在发觉西北解放军已由南面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处于危险的境地，深陷山东津浦路以东的蒋军，甚至直到现在还在向胶东（胶济路北）滨海（胶济路南）沿海地区作盲目的冒险。据军方报告，各路南下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从分散各地的薄弱敌人手中得到代价极小的大量俘获。他们由于为人民驱除了称霸一方的各个地方性的"小蒋介石"，而受到各地城乡群众的热烈欢迎；久处蒋军、蒋政、蒋党黑暗地狱中的人民，普遍称颂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为自己的"救星"！

（新华社陕北1947年9月12日电）

关于解答时局与任务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野战军直属队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

邓 小 平

一、反攻时机究竟到来了没有

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时机到来了"。为什么？这是有根据的。

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二百二十多个旅，后备非常空虚，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不但打不出名堂来，而且还被我逐渐歼灭，其他几个战场上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蒋介石在山东集中了八十个旅，六十几万人，六个主力师（原军），摆在山东就有五军、十一师、八师、七十四师共四个师（新一军新六军在东北），结果他被歼六个半师（原军），鲁南战役被歼六个旅，莱芜战役被歼七个旅，泰安战役被歼三个旅，孟良岗战役也同样是三个旅；这使蒋介石在山东开始被动，虽然他在那里还能做战役性的进攻，但我们现在想打那里就能打那里，在山东主动权已经开始转到我军手里。

陕北战场上，蒋介石集中了三十一个旅，共二十多万人，他是毫无办法，不但被我歼灭了三个半旅，同时解放区还扩大了十多万人口，我军也已经逐渐得到主动权，举行了部份反攻。昨天陕北电台广播中说：又收复了环县等四个县城，并且打进关中，逼近三原。大家知道陕北是解放区人口和兵力最少的地区，这样胜利更说明了蒋介石的军事危机。

此外，蒋介石至少有三个战场的战线已经支离破碎而采取了重点防御。

豫北战场，安阳、新乡、黄河铁桥已表现出支离破碎，重点防御的窘态。

同蒲线战场，我们占领了二十三个县城，蒋介石仅只夺回一个去，临汾、夏县、运城仍然孤零零的摆在那里。

东北战场，（包括热河）我军反攻更有力量，已经歼灭了蒋军十一个师，蒋介石只能在四平街、长春、沈阳进行支离破碎的重点防御。不久沈阳的联系将完全被切断。昨天消息，继赤峰收复之后，我军收复了蓟县、遵化、平谷、香河等地和叶柏寿据点，承德与锦州的联系已被我切断了。

蒋介石，线、不能保持住，点、也不能保持住，所以不能不来一个重点防御。

我们歼灭蒋军九十个旅以上，战局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事实上已经变化了。有同志说："蒋介石被歼九十多个旅，他还有一百多个旅啊！？"其实蒋介石有的不是一百

多个旅，而还是二百多个旅，问题在于：我们歼灭蒋军九十多个旅，七十多万人，都是蒋军的精华，现在被歼的部队尽管保存番号，一次完了又补充了一次，可是极不充实，新兵多，质量坏老弱多。战斗力比前大大减低。刘汝明除一五三旅外，其余两个旅都被歼灭过，有的已经被歼了两道。西台集，蒋军集中三个团，一下子被我们歼灭光了。所以说，蒋介石即使拚命补充被歼队伍，也没有理由不使战局不发生变化，而且已经发生变化了。

有的同志怀疑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反攻时机已经成熟，是不是估计得不准确？他觉得过去说两年胜利但到了两年又八个月才胜利；去年说和平但又打起来了；说歼灭三个二十五个旅战局一定发生变化，后朱总司令又说还要歼灭四十五个旅，再来四十五个旅。

是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估计时局上发生了毛病呢？肯定的说：对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错误的是具有这种想法的同志。

关于两年胜利问题，需认清两点：

一、当时国际上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第二战场可能即时开辟，条件是具备了的。当时国内，蒋介石对抗战发生动摇，敌后战争的残酷和艰苦（四二年的反扫荡左参谋长的牺牲）。全国人民都在想：能不能胜利？毛主席说：能，要争取两年胜利。

二、两年胜利是争取实现的目标。国际上，争取早日开辟第二战场。国内，争取克服蒋介石的动摇妥协，提高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这是争取胜利，而不是坐待胜利。

实际上，差不多是两年胜利。相差仅八个月。如果第二战场适时开辟，还不到两年就能胜利，那再也没人说："估计得不准确了"。显然，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估计是准确的，他们并没有说：三百七十天胜利。仅仅多了二百来天，这又有什么错误？

争取两年胜利的口号，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使全国人心大定，相信抗战前途是光明的，是有希望的。假如毛主席当时说：抗战胜利是长期的。试问：全国人民及敌占区人民将怎么样？这个口号，是说明了毛主席对问题看得非常准确的，适时的，并且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仅仅相差二百四十多天，就怪这怪那、很清楚的这是我们自己思想上的毛病。实际上是一种认为抗战太久了不能再忍耐下去了的情绪的反映。

有的同志怀疑到：党中央及毛主席提出争取和平，对不对？

抗战一结束，如果毛主席就提出要战争，那末全国人民会反对共产党，如果不提和平全国人民会跟蒋介石走，如果不提和平有些同志在思想上也会跟蒋介石走。毛主席在一中全会上说：和平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党内同志的要求。当时如果提出战争，或者不要战斗也不要和平，都是要脱离人民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同志在认识上确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头子，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们提出和平是要争取全国人心准备与蒋介石斗争，那末争取和平有什么坏处？但是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性估计不足，来了和平幻想，李自成思想，丧失斗志，结果发生了许多不良现象，因此错误的不是中央而是这些同志自己。

争取和平的作用也是很大的：（一）使美蒋孤立起来，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二）蒋介石打内战，共产党要和平，人民反内战是反对蒋介石。（三）蒋介石挑动内战，我

们要自卫，全解放区军民毫不犹疑的干起来。如果我们党当时没有争取和平的方针，是不是能使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站在自卫立场上，积极消灭蒋介石军队？

蒋介石为了消灭我们，挑动起内战，有的同志就说："我早就不相信和平，这一下子我是看对了，上级看错了。"好象他很正确，但如果在日本投降后不提出和平而提出"打"，结果只能是这个同志他孤家寡人同蒋介石打，而脱离人民。实际上，他是怕战争，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和平。和平幻想渗透到他的骨头里边，他认为毛主席不高明，是因为仅仅争取几个月的暂时和平，没有给他争得彻底的和平，给他更多的和平时间来享福，他不懂得要战争不要和平的不是我们，而是蒋介石，不懂得内战迫不得已已经要我们接受，我们就不得不起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站在自卫立场上来反击敌人。

三个月总结中，党中央说：消灭了三个二十五个旅，敌我军事形势就要发生基本的变化，半年总结中党中央说，消灭蒋军两个四十五个旅，战局就要发生基本的变化。有的同志数学高明，发见了七十五同九十之间相差十五，因而想到："是不是还要增加更多更多的旅，才算是基本的变化呢？"

这种想法，意思就是想快点，其实七十五个旅同九十个旅相差并不多，现在已经歼灭了蒋军九十多个旅，战局就已经发生了基本的变化，一点也没有错，既然起了基本的变化，为什么不能反攻？

三个月总结、六个月总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估计都是非常准确的，从总的方向来说，那一点没有估计准确？仅仅计较天数、人数是不对的。

在思想上，我们要提倡两个"主观主义"——这是形容词，加重语。

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我们现在还得翻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在井岗山时代所规定的三大任务至今还是正确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跟毛主席方向走，一定可以发展胜利，与毛主席思想背道而驶，必然要失败。我们党，什么时候有过象今天这样顺利的形势？这就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因此，遇到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思想相抵触的时候，首先承认自己错了，这是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觉悟及学习毛主席思想的起点。这样做，也是完全符合于党章规定的。

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

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

不反攻行不行呢？不行的。

今天我们不是怕什么冒险主义，而是怕对形势估计不足，怕我们的认识赶不上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不会再犯冒险主义了。历史上我们经历了并克服了秋收暴动、李立三路线、新立三路线，对左倾机会主义戒备得很严，往往是怕左。抗战中投降主义的影响，要清除。今天形势好得很，怕产生机会主义，就应该是怕右倾机会主义和尾巴主义。

党中央二月一日指示中写道："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

段，即是全国性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高潮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

蒋管区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变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民跑在我们前面去了，这与解放区的军事胜利，是打败蒋介石的两大力量，而解放区是领导力量。新的高潮，很快到来，我们要领导这一高潮走向彻底胜利。如果我们不支持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成为群众的尾巴，高潮就可能逐渐下降，就会影响革命的失败。

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那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的摆着。蒋介石到处被动，好象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

保守主义的危险性就在这里。

反攻出去，打不打大城市？

有的同志说：既然安阳没有打下，能打那里呢？

我们不是先打大城市。刘司令员讲：蒋介石信奉耶苏教，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你们看，长春是十字架，四平街、沈阳、北平、天津、开封、郑州、新乡都成了十字架，将来这些地方困久了，只靠飞机就得饿饭，安阳还不是十字架，而是丁字架。

安阳如果真正打，还是能打开的。为什么没打下，主要是时间不允许，如果时间允许，再多几个伤亡，安阳是能打下的，但这犯不着。

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你采取重点防御，我就占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力量对比又要起新变化。道理就在这里。

反攻出去很好，有的同志问：能不能站住脚？

能，一定能够站住脚。但有一条，看我们三大任务做得好不好。客观条件是具备了的。我们首先在思想上下决心不向后看（回头看着晋冀鲁豫）讲战法，讲政策，把三大任务做好，蒋管区人民那样好，有什么理由站不住脚呢？如果三大任务，有任何一条做不好，都是站不住脚的；三条任务做好了，不要多久就站住脚了，新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

困难有没有？

一定有的。不能设想能象在解放区内线作战那样方便，要设想更多的困难，餐把饭吃不上嘴等等都会有的，思想上必须充分准备。即使有困难，只要充分做好三大任务，这也是暂时的困难，而且影响不了站不站得住脚。

当然，我们是要历尽辛苦，你们想一想：象我们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要革命成功，不花辛苦是不行的。我们这一代的确是幸福的，光荣的，我们将要造成子子孙孙的幸福，即令牺牲，也是值得的。

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拚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一定可以干成功的。

二、假若美国出兵怎么办

一、我们要提倡一个思想建设：要提倡一个中国人民能打败帝国主义而得到解放的思想，在今天就是要把美国帝国主义打败的思想。中国人民的敌人是美蒋，今天革命对象是美蒋，革命任务是把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打出中国去！今天反帝，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封建。是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二、一指示教导我们对美蒋要有高度的仇恨心，中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我们应该敢于鄙视美帝国主义。

试问：不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怎么能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不反帝又怎能反对封建呢？一定下决心：或者用武力赶走美帝国主义，或者把美帝国主义反出去。如果我们人民先锋队中有人没有这种觉悟，就得考虑一下自己的革命坚决性到底有几分之几。

美帝国主义的强大，要承认：是不是强大到不能打倒呢？不是的。不要看他装得那样凶恶，其实他是外强中干，我们一定能战胜他的。既然德意日法西斯都能被我们打倒，美帝国主义也是能被打倒的。要知道他是帝国主义的最后支柱，比起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强不了多少，但世界人民力量比过去大大发展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是吓不倒人的。

抗战中，美军观察组长巴瑟德向毛主席要求派一千个人的武装在解放区设立航空站，要我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并以如果不接受这两个要求，美军将更多的援蒋，当时毛主席拍桌发怒，表示决不接受这种无理要求，你们要援助蒋介石有你们的自由，中国人民也有他反抗压迫的自由，我们不害怕。美国人看到共产党不好惹，也就不敢再提了。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硬骨头，我们无产阶级的骨头是硬的，谁也吓不倒的。不久前，烟台联总人员压死中国人，祸首依解放区法律审判，美国人也得披麻带孝（带黑纱），抚恤被害的同胞家属，登报认错，这才是中国人的气魄，蒋介石怕外国人，要女人和美军去敦睦邦交，鲁迅骂的洋奴才就是指的这一伙人。怕外国人是奴才思想，要清算这种思想。我们中华民族是从来不怕外国人的，能把帝国主义赶跑的。

敢于鄙视美蒋，把美蒋赶出去，这一思想要明确建立起来。

美国为什么是外强中干呢？

因为美国是与世界为敌，这里还包括了英国在内。美国给英国的损害最大，英反美是必然的趋势。

世界的进步，主要是法英人民的进步。英国邱吉尔是最坏的也是最有能力的反动派，他虽然领导了英国抗战，当他公开反动，人民把他赶跑了。法国反动势力表面上嚣张，人民与法共的力量更加发展和强大。英法是一定要与苏联站在一块的，英法反动派是阻挡不了这种趋势的。

美国在全世界（除了苏联）驻军，反对美帝国主义，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要求，也不仅是全世界人民的要求，而且还是美国人民的要求，连其资产阶级内部也分化出华莱士这一派的力量来。

这为什么不能说美国是外强中干？既然美国是外强中干，为什么不能被打倒呢？

同志们不怕美一般援蒋，思想上有了进步，但有的同志耽心：打的当中，美军是不是出兵援蒋？

美出兵援蒋的可能性，确实是有的，但今天形势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因为美与世界为敌。当然，美水兵出来配合蒋军，美军官指挥指挥蒋军炮兵、技术兵种，说不定弄什么“志愿兵”，美航空员驾驶飞机帮助打内战等是可能的。但如果要象日本那样规模的出动大兵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形势今天还看不出来，大家知道这是与世界问题牵扯起来的。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准备好了没有？没有。这也是大问题。

美样子凶，其实不行。最近在山东和东北的胜利，美感到青岛受威胁，靠不住，改靠台湾为基地，琼崖为供应站，西沙群岛为据点，他要干，惹起了祸怎么办？如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空子会更多，法、土、伊、德等驻军就要发生困难。美压迫下的其它国家人民就要起来干。

美出兵助蒋，今天还不是现实问题，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

照毛主席思想方法来说，应该从最困难着想。退一百步说，美要这样做，你怕，又有什么用？你愿不愿做亡国奴？只有打走美蒋才有出路，中国要过两座桥，打败蒋是过第一座桥，打走美是过第二座桥，过了第一个桥，第二个桥就好办了。

我们不怕美帮助蒋，即令出兵，全民族动员起来参加反侵略战争，劲儿更大了，那时蒋也会成为公开的汪精卫，抗美战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蒋内部要起分化，双方旗帜更加鲜明，汉奸分子一律伏法，我们的营垒更加强大了，敌人内部要有一部份分化到抗美营垒来；那时，世界上受美帝国主义欺压的国家和人民，会站在我们一起共同反美。我国反英（大革命）反日（七七），都是经过了长期准备的，但是，在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全国人民反美热潮竟如此迅速的掀起来了，这说明了我国人民觉悟程度是多末地快啊！

美现在二十个手指足趾到处扯起，千疮百孔，漏洞太多，经济危机明年可能来到，官方已经发出信号了。即使美冒大险出兵侵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进步会更快的。这不可怕，怕只能表示怯懦，同时怕也没用。人民不怕蒋介石的逮捕暗杀，反美反蒋的劲儿愈来愈大，不要做尾巴，要同人民在一起，把美蒋反跑，一定能反跑的。

三、是不是还有和谈的可能

是不是还有和平谈判的可能呢？

现在根本谈不上和平。那末，从形势发展上有没有可能呢？理论上说也许有可能。即在这种条件下：就是双方都需要和平一下，休息一下准备再打，是建筑在准备再打的基础上的。但今天不能有和平，要全心全意打败蒋介石。

前些时，蒋发动“和平攻势”是他精疲力竭的表现，需要休息三个月再打。国民党参政会的用意在动员地主资产阶级，帮助蒋征兵、征粮、征款。蒋以此欺骗一下人，其

实蒋丝毫也不希望和平的。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和平，但和平不下来，如打败蒋介石就一定可以和平。

假若我们现在进行和平谈判，就要犯严重错误。人民反对蒋介石挑动内战，我们军事上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蒋管区人民的斗争热潮，如果我们这时要讲和，就等于给参加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工人、农民、学生、教授及中间势力等泼冷水，使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烟消云散。

第一次大革命，陈独秀机会主义给工人农民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抗战中农民要求土地，也泼了冷水。怕左，给自己泼冷水，松懈斗志，帮助反革命、断送革命的和平是错误的。让敌人换好了气来打自己，那里会有这样蠢笨的政治家？

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打败蒋介石，结束他的统治。

四、土地改革问题

今天听不到有人抖起精神喊，“土地改革不好”，没有这样的“英雄”敢公开直接反对土地改革。但是所有反对土地改革的人，都是说农民斗争的方式方法过火了，以此来掩饰自己反对土地改革的实质。

农民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好？地主压迫农民的时间有几千年，农民大翻身出气一年还不应该？地主欺压农民几十代、几百辈，其手段又多么毒辣呢！农民斗争了地主还留给他房地，使他还能过活，这有什么过火？地主被斗后，如不肯低头，就得继续斗下去，一直要斗得地主服服贴贴，农民才能把准备了的一份房地给他，历史上能找到地主有这样照顾农民生活？斗争中打死的地主毕竟是极少数，这些人都是不肯低头的死顽固。地主蛮横无理，为什么不能斗？地主对农民的那种残酷压迫，凡是参加过农民诉苦的，没有那一个不流泪的。

如果没有土地改革，能不能支持战争？是不能的。直到五月底止，全解放区已有六十万农民参军，参战的六千万也不止，在冀鲁豫作战时。每天就得有三百万个民力，人民负担重；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农民会愿意？

反对土地改革主要是军队中的一些人。

地主参军为了报复，据调查两个县有三百多个地主混入军中来了，他们企图假借军队力量来躲避斗争，并破坏斗争。

有些干部家里被斗，说：“我的父亲并不那样坏，需要调查。”其实，他从幼念书，不知道内幕，如果他父亲不是压迫穷人，不然又怎么能成为地主呢？最多他的方法要巧妙些，压迫穷人是一样的。军属照顾得很好，保持富裕中农的生活还不满足，非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生活水准不可，这怎么能行呢？他们普遍的口号是“过火了”。即令有一两件，或者有十件、八件、一百件做得不恰当，但在土地改革几千万件中这算不了一回事。即令有一千个干部不好，那也有九十九万九千个干部是好的啊，这又算得什么？

讨地主女儿当老婆的干部，往往忘了阶级立场，不知道地主女儿找军队是为了准备向群众复仇。她有两大任务，是腐蚀共产党干部，整天在她男人耳边嘘嘘嘘；回过头来

她又在群众中夸耀自己男人当官，你们还敢斗争我？

有个别内战干部，过去自己是穷得没饭吃，确实也得过土地，但是思想上翻成地主了，或者结个地主女儿做老婆，受了嘘嘘嘘的影响，居然也出来反对土地改革了。

还有一个叫做“军队帮”，遇到有什么事情，不是从阶级立场上考虑问题，而是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把自己站在“军队帮”上，去干涉群众运动或地方。

这些是军队中反对土地改革的几个来源，如果他不克服这种思想，自己是要变质的，有个把人已经腐蚀、蜕化了。要警觉起来，不要失掉阶级立场。

有人不拥护土地改革这个最低纲领，他要拥护共产主义最高纲领，这岂不是笑话？

六纵最近在查地主思想，这很好。这不是不相信干部，党对同志毫无歧视，反对的是地主思想，凡是自己沾染了地主思想的人，就应该努力克服。战士查阶级，干部查思想，这包括了工农出身的同志。这是党的好意，使大家都为劳动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做得好，可以多挽救几个人，有的还得从水里拉起来。

凡是参加共产党的，都叫无产阶级先锋队，党批准他入党，就是相信他，不怀疑他，现在的问题是：自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思想上掉了队？如不清算，是要犯大错误的。在自卫战争中，我们对翻身运动的教育做得差，以后要加强，不能过分责备这些同志。

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要求同志们一心一德跟毛主席走，我们的反攻是有把握的、光荣的、正确的，我们一定能完成党给我们的任务，争取反攻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解放军口号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政首长同志们：现在我们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六十七条。你们接到后，应即发给全军指挥员、战斗员，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同时，在你们所到之处，你们应当将这些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的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

（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二）打倒背叛政协决议的蒋介石！

（三）打倒破坏停战协定的蒋介石！

（四）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

（五）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六）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

（七）打倒屠杀人民的蒋介石！

（八）打倒欺骗人民的蒋介石！

（九）打倒摧残人权的蒋介石！

（十）打倒横征暴敛的蒋介石！

（十一）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

（十二）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

（十三）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

（十四）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

（十五）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

（十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进犯军！

（十七）审判战争罪犯，赔偿人民损失！

（十八）解散特务机关，拿办杀人凶手！

（十九）打倒四大家族，没收官僚资本！

（二十）打倒贪官污吏！

（廿一）打倒土豪劣绅！

（廿二）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织反蒋统一战线！

（廿三）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廿四）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
（廿五）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廿六）取消苛捐杂税！
（廿七）保护民族工商业！
（廿八）改善职工生活！
（廿九）开仓济贫！
（三十）农民分土地，耕者有其田！
（卅一）平分土地，废除旧债！
（卅二）国民党士兵分田废债！
（卅三）人人有地种！（或：人人有田耕！）
（卅四）人人有饭吃！
（卅五）人人有衣穿！
（卅六）人人有屋住！
（卅七）人人有工作！
（卅八）人人有书读！
（卅九）男女平等！
（四十）民族平等！
（四一）宗教自由！
（四二）保护华侨！
（四三）保护外侨！
（四四）美军退出中国去！
（四五）否认卖国外交，废除中美商约！
（四六）不许日本侵略势力复活！
（四七）中美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四八）东方各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
（四九）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五十）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
（五一）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蒋介石代表贪污土劣！
（五二）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五三）穷人要翻身，加入解放军！
（五四）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五五）不拿人民一针一线！
（五六）爱护解放军伤兵，优待解放军家属！
（五七）解放区是全国人民的总后方！
（五八）解放区贯彻土地改革，厉行生产节约，支援前线！
（五九）蒋区人民武装起来，抗丁抗粮，分田废债！

（六十）国民党党员们，脱离孙中山叛徒蒋介石！

（六一）蒋军官兵们，不要替贪污土劣打仗！

（六二）欢迎蒋军官兵加入解放军！

（六三）坏人悔过自新，准许将功赎罪！

（六四）蒋介石必亡，共产党必兴！

（六五）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六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六七）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转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三集）

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
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

周　恩　来

全国各个战场都胜利，我们这个战场也要前进，因此想把全国发展情形和一些材料讲一讲。

（一）革命战争已转为新的进攻及新的胜利

我们从几个特点上来看，革命战争已在第一个年头时我们就说明（即去年二月指示）我们这个战争部分的已经转入主动，若干的地区已经进入反攻。从去年的七月起也就是革命战争第二年的开始，逐渐的在全国战场无例外的都进入了反攻，也就是全国新的进攻。我们可以从各战场看出是这样，南线：刘邓大军七月渡黄河八月过陇海。陈粟大军转入鲁西、黄河南岸。同一个八月陈谢大军也过黄河。九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陈粟消灭了五七师取得了胜利。再看北线，东北从去年春季攻势以后即进入反攻，经过夏季攻势及秋季攻势，展开了更大的胜利。晋察冀第一个年头打的不大好，大家埋怨批评。第二个年头打的不错，首先是大清河北的胜利，接着是清风店、石家庄的胜利。九月至十一月三个月也转入了进攻。最后敌人在山东、陕北作最后挣扎进攻。八月敌人到了葭县大会坪。沙家店消灭了卅六师后，也转入了反攻。山东敌人于九月到了胶东的东海边，他的心就死了，也转入了反攻。完成全国进攻的局势。全国各战略区的配合，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指挥的非常正确。第二个年头开始，无例外的外线进入全国新的进攻，从各个地区可以看出。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全国新进攻，而且已经站稳脚。可以肯定，表现出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处于被动，敌人防御我们的进攻。可以看出他是处于被动，六月以后（即四平战斗以后）敌人总想从南面调到北面，这个企图完全被我们华东野战军打破了。如企图调廿五师过海，又因我刘邓陈粟大军在南面展开进攻，反而不得不把廿五师由胶东调到陇海路南，又如傅作义之暂三军调至东北不久我清风店战斗胜利后又把暂三军调回关内。北线敌人处被动，南线更是被动。最近看得更清楚，由于刘邓陈粟陈谢大军的南下，敌人主力师之一的十一师向南向西调来调去，忽而向南对付刘邓，忽而向西对付陈粟陈谢。十师原在平汉线调到大别山，现又调回平汉路。最近（十二月）敌人回剿大别山，这是一个防御性的战役进攻，白崇禧集合卅八个旅（现在只有十五个旅），第一线廿三个旅的进攻，被我们粉碎了。这说明不管敌人什么防御，我们

只要有积极行动，战略战役配合好，就可打破敌人的计划。这半年来可以肯定的说，我们掌握了主动，敌人处于被动，所以过去半年的胜利主要是外线胜利，第一个年头的胜利在内线，第二个年头的胜利主要在外线，可以从各个方面看。

去年七月到十二月消灭敌人十二个师部五十四个旅，平均每月九个旅（前年每月平均八个旅共九十七个旅）其中被消灭的整旅廿八个，把非正规军算上消灭二百五十七个团，七十五万多人，第一年消灭九个师部、九十七个半旅、四十六整旅、四百廿个团，一百一十二万人，无论从那一点看，战绩超过了第一年的一半战绩。其中除西北野战军和胶东野战军在内线作战，其他均在外线。这半年来消灭了十二个师部，其中九个是在外线消灭的，消灭的五十四个旅中有卅四个旅是在外线消灭的。消灭的七十一万人中有四十一万是外线消灭的。在外线一样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实际战绩证明，到今年的六月一定可以超过第一年，这是可以断言。继续这样胜利下去，每年增加，蒋的部队就差不多了。蒋介石在前年有二百四十八个旅，现在有二百七十六个旅，每月消灭九个旅一年消灭一百多个旅，三年就消灭完了。从人数上看，去年夏季是二百五十多万，现在增加到二百六十多万，每半年消灭七十五万，每年消灭一百五十来万人，有三年也消灭完了。不论从编制数目上看连续三年战争把他的队伍可以搞光。再打三年，自然他就论到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广大的农村中小城市都是我们的。被歼敌人的比例一般的是正规军占三分之二，非正规军占三分之一，第一年是这样，这半年也是这样。第一年消灭的一百一十二万中正规军七十八万，非正规军卅四万，第二前半年消灭的七十五万中，正规军 四 十 八万，非正规军廿七万。

从俘虏与杀伤敌军来看，第一年毙伤敌占十分之四，俘虏占十分之六，这样半年消灭七十五万人中，毙伤敌二十八万二千，俘敌四十五万九千，占消灭敌人总数百分之六十三强。

再从敌我伤亡减员对比来看，第一年我们损失一个人，敌人损失三个多人，最近半年，我们损失一个人，敌人损失两个多。第一年我们伤亡一个，敌人伤亡一点二六个。这半年我们伤亡一个，敌人伤亡仍为一个多，原因是我们初到外线减员较大。假如我们训练的更好，会伤亡的更少。同志们出到外线作战一定会迂到减员问题，应引起很大的注意。九一指示，我们要把战争引到蒋管区去，破坏国民党把战争引到解放区的计划，这个计划我们是实现了。发展新解放区要反复多次的争才能站住，如刘邓九月反复争夺直至这次粉碎大别山“围剿”始巩固起来。陈粟也是如此。

从解放区的面积上来看，在停战协定时有二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去年七月总结战绩时二百一十九万平方公里，这半年我们恢复十三万平方公里，共二百卅二万平方公里（江汉、桐柏军区不在内）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假如把新疆西藏除去，就占三分之一。

从人口上看，停战协定时解放区为一万万四千九百万，去年七月总结时是一万万三千一百万，这半年我们扩大了二千一百万，共一万万五千二百万，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

从城市得失上看，停战协定时解放区有五百零六个县城，去年总结时只有四百廿二个，失掉了八十四个，去年七月至十月四个月中间的统计是四百七十二个，夺 得 五 十

座，我们相信十一月十二月直到第二年总结时一定不止五百零六个，新解放区不说它，就是老解放区的，山东豫北、陕北、苏北，均在拔钉子。现城市最多的是太行，有一百卅七座，东北四省只占有廿座。所以城市也在发展，我们要有敢于拿城市的信心。这次出击我们要拿，拿了小城市拿中等城市包围大城市。今天虽然得而又失，可是最后还是我们的，要执行城市政策不要破坏。全国二千左右的县城，我们是占四分之一，我们要把四分之三拿过来。从整个战绩来看，把战争引到国民党区域，人口是他的，城市是他的，我们的一切补给要取之于敌（过去只是武器取之于敌）今后要一切取之于敌。西北野战军是最后打出外线，其他都能站住，我们还有什么站不住？以上军事上的胜利主要标志着全国革命的高潮。

再看蒋管区的人民是不是欢迎我们呢？在蒋政权的残酷压迫下，蒋管区的人民起来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征借抽丁，他想把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压下去，但是压不下去。在城市的斗争主要是工人和学生。在蒋管区的物价比战前高十四万倍（粮食布尺），但工人工资只增加六万八千倍，职员薪金增加的更少，只五万八千倍，这样就普遍造成生活斗争，学生斗争也成为全国性的，过去一年中有大的三次运动，前年十二月为美军强奸沈崇案的反美斗争，有十几万学生参加。去年五月蒋介石开伪参政会时，学生为反蒋暴行，到参政会门口游行，要求改善生活，反对蒋介石的暴政，罢课学生更多，将近廿万。去年十月十二日浙大学生领袖于之山被杀，大家明知他是共产党员，各地学生硬是援助他，进行罢课。从这三次学生运动即可看得清楚第一步是反美；第二步是反蒋；第三步是援助共产党。这些大学生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劳苦群众的子弟是极少数的，但是在援助共产党上很积极的。所以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他与他们的家庭还有一个距离。他们反美反蒋上是革命的，一般的说，他是向我们革命的对象作斗争的。就是三青团中也不全是坏的（对大头子是要办的）故党决定政策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对他们要有区别，因为他们反美反蒋是援助我们的。

再看工人运动，去年上海天津的工人为生活斗争的很凶，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从印刷厂里搜出传单来硬说是共产党，上海工人很懂得策略，知道国民党要大肆镇压了，采取了攻势防御，一部分罢工，一部分怠工，一部分请愿，结果敌人未敢镇压，工人们斗争胜利了。我们现在还不能希望城市的工人学生来个暴动，这个还不存在，不宜暴露过早，一定要等我们的大军打到的时候才行，要来个里应外合。蒋介石的前线愈失败，他对后方的控制愈厉害，历史说明了这点，南昌广州的两次暴动都没有胜利，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成功还有其他的特殊条件，就是前线战争的失败，军队的溃退，工人拿起武器暴动成功的。但我国与其不同，一般的必须里应外合，我们的大军接近了大城市包围了大城市，那时再暴动很需要的。把城市的力量组织起来，我们就便利于控制这个城市，这样作用更大，而不是单独暴动。如果这样做城市工作会失败的，把我们的力量搞掉，对我们不利。

蒋管区的农村也不是低潮，我们可以看一看许多地区发展着武装斗争，除四川工作较弱外，如琼崖有四座县城及五指山区完全被我控制，有数千武装，广东亦在发展，广东自东江纵队撤退后游击队发展起来现有两万多人枪，主要以十万大山为根据地，粤闽边、粤

北均有活动，湖南、江西、福建的一部分也在发展，曾镜冰同志在那边领导苏南皖南浙江也比较发展，去年曾一度占了茂林镇，现在京沪路上敌人很恐慌。在我主力未到前是不可能发展大的根据地的，部队不宜过度集中，不宜过早暴露力量，免得为敌人集中力量击破，只有在我军南下时，他们起配合作用。在西南农村斗争较差，西南的城市工作还是有的，如昆明重庆，从蒋区城市和乡村来看一般的是有利于我，除上述外，中产阶级有很多不满蒋的情绪，而同情于我。过去民主运动证明：假如说日本投降后有政协道路和平谈判，中国的中产阶级尚幻想有个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这一年多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了，说明中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国民党的道路。民盟当跟我们走的时候，不参加国大，群众拥护，但他们当蒋介石压迫的时候就自动宣布解散，很快的失掉群众的同情，中央关于反对刘航深阴谋 的 指 示（ 去 年 西感）是党的策略方针，说明第三条道路不存在，但并不等于说就没有这个企图了，如香港国民党的左派李济深等人搞什么“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在香港的活动，中产阶级也有这种企图，将来你们到关中亦可能迂到这种人和这种事情，我们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此其一，第二、第三条道路走不通，并不等于说中国没有小党派了，在战争中间是共产党国民党，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反革命的，第三者在香港搞小党派，待蒋介石一失败，小党派就会起来，在各大城市亦会有秘密的小党派，那时亦会出现的。为什么说他小？他不作群众工作，加上现在是战争环境，在战争以外回旋的地方很小，他的党派总是小，解放军所到之处无小党派，我们对小党派的政策是争取他分化他，争取同我们反美反蒋，为什么要分化它？因为小党派的成分很复杂，他不是代表一种情绪、一种立场、一个阶级的。其中的右派是跟蒋介石走的，左派是跟我们走的，而他们又常常混在一起，我们共产党内还不纯，何况他们呢？李济深组织革命委员会，冯玉祥讲反美反蒋的话，我们都只能 采 保 留态度，不在群众中扩大他们的影响，但亦不必在群众中骂他们，他们在蒋介石快要失败时会搞鬼把戏的，企图来个缓兵之计，如宋子文白崇禧等，宋子文请蔡廷楷出任广东剿匪司令他要是接受了这个职务，无疑的就是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对他揭露他。如果不接受，我们就不骂他。民盟亦是一样，如黄炎培柳亚子比较接近我们，对任何一个小党派，要加以分析是拥护我们还是反对我们，当他们愿意与我们一道走的时候，就联络他，否则就批评他，他要反对我们就斗争他，在组织上分化并在思想上分化，所以在蒋管区的民主运动很复杂，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蒋管区发展革命对我们有利，只要我们掌握好政策，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去作，一定能够胜利，我们可以这样看，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打到外线去要大打仗，要掌握毛主席的十条军事原则，我们一定能在蒋管区取得胜利。

（二）蒋敌军事上的材料

首先美国给蒋介石做了一个计划，他要蒋介石暂时撤退一些地方，将来再 卷 土 重来。其计划：

北纬四十度（即安东至甘肃安西线）以北暂时放弃。

北纬卅五度（即陇海线）以北要力争。

北纬卅度（即长江线）以北要坚守。

北纬卅度以南（即华南）进行经营。

美国当权派马歇尔等企图在卅度以南及沿海各海口如青岛、台湾经营一下，并进行练兵及给蒋介石装备新的部队，在政治上不要共产党在南方闹，要宋子文到广东去，这里要说明刘航深的阴谋，刘过去是刘湘下的财政厅长，大学生，很会投机，后投宋，这次被派到香港活动，要李济深、蔡廷楷等，参加独立政府，民盟、共产党都可以参加，由宋子文领导，刘航深去后，宋子文亦去香港与李蔡谈判，另外还有个全国的阴谋，到一定时候即蒋介石要垮台的时候，来一个和平会议，什么冯玉祥、何应钦等人都请去，并要李济深、毛主席为正副主席，政治上如此而求得军事上的缓兵之计，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

美国这种计划蒋介石不能完全接受，蒋介石是不能退的，一退就要垮的，遂将该计划修改了一下：陈诚派到东北，尽可能坚守，华北力量除阎锡山外，以傅作义统一指挥，将孙连仲撤职，中原以顾祝同、胡宗南、白崇禧三人指挥，计划是追剿我军，不许生根，白崇禧说："共产党南下不怕，怕的是生根"。在长江以南是抽了十二个后调旅到江南去守备，并在台湾进行经营，铁路不在华北修了，因为修好就被破了，现在都在江南经营，如修浙赣路成渝路等，在经济上实行控制政策，一切物品统制起来，现在上海要实行配给制度，我们把乡村一占，把城市包围起来他便没有物资。配给亦是行不通的。

另外敌人还有个整军计划，白崇禧提出要组织第二线兵团，去年它有（248）B，用在前线的（231）B，留在后方的只（17）B，其摆在新疆、甘西即（8）B，这八个旅是不能抽出来的，他被我们的同盟军——少数民族的人民武装钳制住了。西南有七个旅，亦很难抽出来，台湾有（2）B，另外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根本没有正规军，所以白提出组织第二线兵团，另外敌将其整编旅两个团制者恢复三个团制这结果是增加了一些兵力，约十五万余人。在第一年结束时（四七年六月）共233万（正规军153万，非正规军及特种100万）到四七年底为265万人（正规军181万，非正规及特种84万人），另外后勤机关及海空军约一百万人总数是365万人。敌人兵力的来源有三种：1.大鱼吃小鱼的办法编并提升非正规军，2.动员后方机关人员到前方，其后方由120万减到100万。3.由抓新兵扩编一部。这是半年来在被消灭75万之后，反而尚多了一些的原因。

再他的编制也变动了一下，过去（93）D、现在（104）D、过去（248）B现在（276）B，其中（204）B为三个团制，共（624）R，（72）B，情况不明或二团制者（144）R，共（756）R，另非正规军（462）R，特种部队（147）R合计为（1365）R，265万人。敌人兵力虽增加了一些但战力不强，因其非正规军的升格，后方人员动员到部队中，特别是抓来的新兵，使其战力更减弱了。

敌军全国的布署（十二月底止）

北　线：（28）D（A）（89）B（D）（267）R553.000人

东　北：（14）D（47）B　（141）R　320.000人

晋察冀：	（9）D	（26）B	（78）R	155.000人
晋　绥：	（5）D	（16）B	（48）R	78.000人
南　线：	（67）D	（158）B	（417）R	1061.000人
西　北：	（18）D	（29）B	（79）R	170.000人
陈　谢：	（7）D	（14）B	（41）R	106.000人
刘　邓：	（16）D	（37）B	（95）R	303.000人
陈　粟：	（11）D	（26）B	（60）R	120.000人
山东苏北：	（20）D	（45）B	（120）R	305.000人
豫　北：	（5）D	（7）B	（22）R	57.000人
蒋后方：	（9）D	（29）B	（72）R	196.000人

敌军作战方法：第一年是战略进攻，战术上防御（顾祝同说只要不被消灭就是胜利），战役上有时采取进攻，在进入第二年战略战术上都是防御的，战役上尚有时采取进攻。这种战役进攻在后来采取重点的办法，把兵力堆在一块进攻，如对大别山的进攻，集中了卅七个旅。如最近东北敌共集结沈阳以西约十五个师想打我们一下，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战术，大胆的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另以主力包围其突出之部予以歼灭。再敌人兵力一集结，其他地方就空了，我就可以收复地方大搞土改。

敌人补充的困难“一天天增多，地区缩小，影响扩兵”去年下半年扩兵60万，今年更困难，最多亦不过如此，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等五省出兵最多，现豫、皖、鄂我已占大半，在粮食方面亦发生困难，军费方面，占全国总支出百分之八十，军饷约16万亿，军费每天600亿，一年共21万亿，据蒋方报告去年一年共用41万亿是不对的，实际在50万亿以上，合美金约六万万元。军火困难，美国虽给他帮助但亦不是那么方便的，其生产还赶不上丢的，如步枪每月产一万五千支，年产十八万支，第二年我们就缴了卅八万支，两年造的不够一年丢。轻机枪月产八百挺，年产九千六百挺，第一年我缴了二万七千挺，三年产的才够一年丢。重机枪月产三百挺，年产三千六百挺，第一年我缴了三千九百挺，一年产的不够一年丢。

再看美国能帮助多少？起多大作用？过去美国帮助了四十万万美金，其中包括日降后的24万万剩余物资，但都用光了。最近美国通过援华一千八百万，马歇尔又主张援华三万万，我们给他加倍算为六万万元吧，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美国帮助是一定的，但亦不是那么如意的，美国对援蒋有三派，一派是新孤立派，主张不帮助，一派是冒险派，主张无条件的帮助，一派是马歇尔范登堡康纳利等人现在的当权派，主张实行象对希腊的政策，帮助可以但要加强对蒋的控制，故蒋美亦有矛盾，美国要公开的控制全国通商口岸，蒋介石又不愿，虽然他们中间有矛盾，但无论如何是要帮助的，这种帮助常常动摇，拖来拖去，犹疑不决。我们要利用这种矛盾，办法有三，第一是努力打蒋，打蒋打的愈痛，美援蒋愈动摇。第二骂美骂蒋，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美蒋运动，这法引起美国的顾虑。第三打美国人，美国怕死人，安平事件即是证明，又打宁河美飞机场，他就撤退了，胶东打了一次，柯克中将亲自道歉，最近在青岛附近又打了一次，杀了一个，捕了四个，他不敢吭气，因此你们到外线去，如迂到美国人就要坚决彻底干净消灭之，有这样

三个办法可以使美国援蒋发生动摇，至少拖延时间对我们是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将来美国可能出兵，即令出兵廿万吧，也不过占领与控制几个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等城，我们的对策是他一出来就打，他不出来我们就围起来搞土改，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就攻城，到那时看他撤不撤，如不撤就坚决消灭之。这在历史上有之，如苏联革命成功后，美国占据海参威，最后红军把城围起来，美国兵还不是自动撤退了。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又轻敌，又不轻敌，对于整体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有信心敢于胜利，对于一个具体的敌人，我们不能丝毫轻视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夺取，过去的经验，往往是打了几个胜仗就要碰一个钉子，原因就是因胜利对具体敌人轻视，这一个问题应该掌握好，这中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打好仗、一个是要掌握好政策。

要想打好仗，就要坚决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到外线，要在全军动员说明在边区内部把敌人消灭了很多，配合了全国反攻，十个月来你们负担的任务很重，敌人比任何地方要多，我们能够把敌人消灭，并且能够到外线消灭敌人，这是指挥的正确，大家的努力得来的。我们打出去时会迂到在内线所没有迂到的困难问题，如减员等，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要在外线生根，我们不但发展大西北，还要向西南发展，在这点上我们西北野战军当仁不让，后来居上，因为我们参战最晚，而打出去又是最后。要在西北展开局面克服困难，壮大自己。这一点大家有成绩的，从相当小的部队变成大的部队又能打仗。全国的部队亦扩大了，全国部队在外线作战发展了卅万，现在正规军与非正规军共二百廿万人，原来估计三年时间与国民党兵力相等，现在不到两年就已经差不太远。发展超过了我们的预料。现在军队正在扩大中，我们相信将来会更加扩大，经过土改三查运动大家做的有成绩，作得很好，清查出很多坏分子，异己分子，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今后回去更加认真的动员必会有更好的成绩。在这里我提出三点意见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大家讨论讨论。

（1）部队里今后不动员地主富农参军，已经有了地主富农士兵怎么办？干部好解决，战士怎么解决？

（2）选举干部也可以研究研究？

（3）民主运动有时超过连级干部去发动群众（？）

如何掌握政策问题，提出几个原则来：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打击消灭当前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在乡村中把最坏的恶霸拿出来斗争，次要的中小地主屈服了，就是胜利了，就不一定要斗他，比如在战场上敌人已经缴了枪，你说缴枪不行非打不可，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在土改斗争也是这样。消灭封建的目的，是消灭地主阶级并非消灭一个分子，在战场上放下武器的就优待，这个工作大家会作，为什么乡村的地主已经缴了枪（拿出土地浮财）就不知道这样做呢？我们一定要争取他们为我们所用。乡村中的敌人是恶霸，将来很大一部分地主富农向我们屈服，我们就欢迎他，不要有组织的打人，不要用刑，不要多杀人，杀人要经过公审公布其罪恶，光明正大。城市政策更重要，不要毁坏，在韩城搞的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的钢琴亦没收了，真是乱弹琴，古田会议的决定早就写明了不能破坏城市的政策，大家都忘了，这要常常的讲给各级指战员。毛主席说：斗地主的地财是斗到牛角尖里去了，先分

土地及浮财。地财先不忙，将来繁荣经济他会投资的，否则埋在地那里还不是国家的财富吗？城市里要注意党外人士，只要帮助我们，跟我们一道走，我们就欢迎他，所谓一道走就是承认和执行我们的政策，这次出到关中会迁到一些民主派反胡分子，要联合他们，他们虽接受我们的纲领，实行我们的政策，也要预料他们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也许还有些人是部分的接受或口上接受不准备实行的，都可以要他们，待他们过来后再教育他们。如他们不跟我们走时，再让他们自己走，他们反对我们时我们就斗争他，如不反对我们，仅有某些错误，我们要善意的批评，这样才能将最大多数的人联合起来反蒋，但亦不要束手束脚，这样会变成右倾。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就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你脱离了群众一个人革命，敌人还不欢迎吗？在土改中有些连中农亦不要了，很容易孤立，他不和你反对敌人，你的力量就小，我们一方面防止敌人的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

关于中央十二月会议基本精神的传达报告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陈　毅

现在我来传达中央指示，这次我们的自我检讨及反军阀主义倾向及团结问题。这个总结因无时间讲，只好放在散会以后。中央指示传达后，希望在政策上加以讨论，问题的中心在于今后如何办？联系今后出击时如何纠正过去的事，主要联系讨论政策本身，如何执行自我批评也可联系，作一检讨。土地政策如何掌握，确定几个观点，怎样做？分几个县怎样做？过去我们的城市政策的主要错误是什么，为什么？应着重讲清道理，说明道理。成立士兵委员会，这组织如何运用搞法，这是自然又要联系到自我批评，指战员均可以检讨。这组织要联系到如何加强团结，开展自我批评，军阀主义若存在，这组织便成立不起来。这是否会引起别人另外的估计呢？是否还存在有什么大的秘密呢？恐怕有些人会这样想，这次准会有人被打，其实告诉同志们，不必担心，不是这样。我们准备将军阀主义做出一个总结，这是总结的问题。过去我们也常做总结，但他们仍然如故。总结一千次，他干一万次，还有一个特殊情况，等粟司令从中央开会回来后再总结，现在我传达中央指示，这个会开得好，主要是大家的力量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已经解决了。

现在传达中央关于政策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中央去年十二月会议的召开，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同毛主席、周恩来、少奇同志在一起。另外还要提一提新区政策问题，执行主要在你们。可以作十二天的讨论，展开争论，找出根据，否则乱谈一通是不好的。因此，应弄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研究分析，如讨论中有不同的宝贵意见提出，可直接打电报给中央，这在帮助中央的领导上是有好处的。我们首先要求总部、各兵团先把这东西弄通，如你不同意，可以提出你个人的意见，或加以修正及补充均可，如赞成也好。因此应该找些文件参考，否则文件不通，乱说一通不好，十二天中至少半部时间需要看文件。讨论政策，第一是必须先要领会，我有此经验。即第一次不懂，第二次渐懂，第三次全明白了，中央的政策是经过讨论的，这可以增加我们的了解力，也可以防止自出心裁的主观的看法。这内容是：

第一、关于中央十二月廿五日的会议决议。

第二、毛主席指示。

第三、新区政策。

这次会议的基本要点基本精神向同志们传达，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对目前时局问题（形势发展）与我们的任务这样说，第一，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到1947年底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基本的变化。特别在日本投降后，便估计到48年会更大些的。这变化是中国将发生更大的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的转折点。我在陕北时毛主席经常谈此。当我到陕北时，大会已结束了三天。这个中国革命廿年来解决的问题——胜利问题——现在完全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条件，则是更有把握了。全体与会同志都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廿年来国民党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则处于劣势，我们廿年来是否有过胜利呢？有的，但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如苏维埃革命时期即是，抗日八年中，我们在敌后也有很大的胜利，但不完全，那只表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而国民党则依然相当强大。这一次毛主席说，这个时期则是在全中国范围内将得到全部胜利的时候了。"失败"这句话简直可以取消掉。历来我党对时局的提法，都是说形势有利于我们和人民，从未提过肯定"胜利"的话，常说我们要警惕失败和危险的地方等等，但今天这"失败"是解除了，胜利是确定了的。毛主席曾亲对我讲，在日本投降时，他曾一喜一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则是国民党仍然强大的存在着。七次代表大会上，毛主席说，是否可以作出这一个估计呢？——打倒国民党——但经考虑不敢说出，因此当时联合政府小册子中，指出的胜利，仍为对日本帝国主义而言，并非其他什么。在目前则不同了。我们的胜利，不再向过去的大革命时期，只胜利了一半，不是，也不是"平分秋色"，而是已经确确实实解决了的问题，我在延安时也曾数度询问而答复则是"肯定的"。根据毛主席的分析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上，主要是"人心向背"转而向我，蒋介石搞成了"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之势，失掉了人民，人民希望他愈垮得快愈好，他所剩下的只是反动机构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们和蒋介石争夺人民、朋友，廿年来到今天才算得到成功。过去由于我们政策上的错误，使工农及广大人民脱离了我们。在内战时，大城市没有打，白区工作同志只有坐监房的权利，在苏区虽然好，则也只有一千万人口，质量好，则量太少，不是占大多数的，特别是苏维埃，后期在执行政策上犯了过左错误，乱打一气，如打AB团，破坏城市工商业等。因此只好上山打埋伏，或者长征。因此北伐内战两次均未搞掉蒋，反而孤立了我们自己。在（抗）战时期中，我们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有系统的策略，提出统一战线，对地主及其他各阶层改善了关系，将内战时的对立形势缓和下来。我们提出到敌后去打鬼子，纠正了苏维埃末期的偏向，人民和朋友又都走来了。我们提出"抗战与民主"与大量发动群众的方针，大批的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都来了。资产阶级内部起了分化（在态度及各方面），地主也争取了一部（如三三制），国民党则采取了积极的反共办法，不打日本，保存实力，依靠英美打日本，他保存力量后再来打共产党，正因如此，他对抗战失去了领导权，部队因为战斗不力，减低了战斗力，因而他是第一消极抗战失去了领导权，第二反共溶共丧失了人心，使人民认识到反共必投降的真理，共产党提出的"抗战与民主"口号是响亮的，主动的，进攻的。但他的口号则是模糊的，被动的，防御的。共产党历来在政治上是没有防御过的，因此国民党在政治上造成自己的孤立。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很清醒，他知道在开始抗战及其过程中来解决共产党问题，其方针是非常明确的，但方法错误了。由于不民主，人愈搞愈少。我党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亦在开始时认识得非常明确，在抗日中硬是要搞出一个名堂抬出

"民主与抗战"来削弱和孤立国民党，在抗日后来解决国民党问题是具有明确方针的。需要合作时诚心诚意的拥护你，但程度上是有分寸的，因此我们愈搞愈大，蒋愈搞愈小，这好有一比，即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了（笑）。蒋有方针有策略路线，不愧为一个反动领袖（笑）。当时王明同志等在武汉太相信国民党了，他们相信国民党，胜于相信群众。国民党也可以相信一点，但党应当相信群众，否则八年抗战是不可想象的。如毛主席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抗日时期我党反对了象这种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思想，向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让步……与违背马列主义的思想作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全党同志都要牢记"（以上引用毛主席报告全文）。内战时期我们失败了，抗日时期在"抗战与民主"两大原则下我们胜利了。抗战后国民党又来这么一次假和平。反共内容，因此证明他就非失败不可。

二、在经济上看，我们也有很大办法。毛主席对此问题谈得少，蒋介石主要靠美国吃饭，美国讨论半年，才只借给蒋四万万五千万元，只够几个月用。蒋区法币跌价，各种人员罢工罢市，教员学生罢教罢课，法官也不升堂问案子了。我们在土改后，力量更增大，许多解放区联系成一起，假若华北几个据点搞干净后，将在经济上有更好的发展，现在主要的是我们内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各种军工的生产是继续增加的。

三、在军事上，蒋主要守孤立据点，防止我们过长江，有时调几个军向我局部进攻一下，再无别的办法了。今年东北在形势上将有更大的变化（不多讲，从略）。

这是我们大举转入进攻，国民党则转入防御的时候了。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消灭了蒋军120万人，如果再过一个时候，消灭更会大的多了。

四、整党与土改，这是保证蒋介石最后失败的很重要的一环。他不会整党，也不会土改，我们则是能够的。我们同志们一般都能分析。因此整党与土改就是保证蒋介石失败的因素之一。这次我从北边归来，许多人痛哭流涕，地主富农给整得哭了，告诉你们这哭是不对的，就因为这样整法，中国革命就会整胜利了（大笑）。国民党则是整不好的，蒋介石之所以弄垮，正是因为他不整的原因（笑），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整党整军，正是提高部队，提高党，将右倾思想给打下去，将阶级异己分子及蜕化分子整下去。我们则充满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血液，这生命力和血液非常丰满而充沛，好象我们洗一下脸面目一新，感觉轻松愉快，又向前进了。这是积极的好的现象，收获是基本的、大的，至于个别偏向（成分：犯罪部分幼稚、工农骄傲、逼死人、硬追死追等），则是有的，别的地方比我们闹得还更凶，因此我们还是嫌得有些过右了的（笑）。因此整党和土改具有特别伟大的意义，几千万人起来了，前进向前朝气勃勃，这是胜利进军的前夜，所不可缺少的气概，开始时的过左是有些痛苦，有些人是被戴上了高帽子，还有的受了伤，不管是谁，小资产阶级也拉来打一顿，不管人家几年的革命历史……这是错了的，现在可以赔一个不是，行一个脱帽礼，道一下歉就是了（大笑）。不必再要求什么历来运动说共产党都是搞知识分子，整风是他，三查也是他，这是不好的，现在的帽子脱了，团结对敌，大家共同前进。三查的目的，主要是对阶级异己分子及犯错误重大的人，这种运动还要继续的搞下去，作为胜利的保证，经济破产我也有办法，这五个条件是决定胜利属于我们的，廿年来未解决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毛主席说，这次会开得很

好，他很愉快，并说，他从未这样愉快过，过左了的，道个歉就是了，不必再要求什么，打的主要是其错误，并非其本人。

土地改革就是蒋管区青年学生也是赞成我们的，蒋介石虽然吓他，也不为所动，在土改时期，上海、南京、平津各地的学生运动，从未停止过，他们还在向蒋介石假造谣言而拥护我们。

1948年的变化将更大，在蒋区的各种运动，如工运学运等。已接近大革命的高潮时期。现在我们还未取得几个大的城市，但不宜看大城市过重，他应当是大革命胜利的成果，现在则是依靠解放军歼敌的胜利，将来他们可以由起义等方式自然落于我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是由美军打到近郊起义而拿来的，上海也是工人自动内应的。大城市应是反复争夺的成果，往往须要取夺多次才能到手，也有可能在一星期内完全落于我手。蒋介石准备再和我们打两年到一九四九年准备让位，他在干部会上训话：你们应当努力，否则我会当俘虏的。各党派也希望我军打出去，结束蒋介石专政，现在是我党、我们的群众，国民党的内部都解决了这一认识问题，只是他的反动集团还未知道。现在胜利有五年即可。目前已经过去快两年了。蒋的对策：1保护江南，2进入四川，但进川是困难的，而且也不易跑过去。两年至三年可以消灭蒋政权，摧毁他的威力，他还可以要些阴谋花样来搞些人登台扮演一场，如让李济琛、冯玉祥的取而代之的阴谋是很可能的。他可以下野去海上当强盗，或到南方打游击或者出洋去。也即是具体的蒋介石打倒了，而无数的抽象的蒋介石却出现了，即使胜利后困难也还是很多的，蒋必然至死不屈，最后拚命争扎，以高度的勇气残存的办法来支持长期战斗。我们也不使战争间断，蒋若完了蛋美国也会出些花样来的，如搞出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向我们讲话，如说蒋已下野了，可以和平了，群众太受痛苦了，共产党可怜可怜群众吧！稍一休息后，他必将大张旗鼓、养精蓄锐，卷土重来搞我们的。因此应当坚决的把它打下去。因此必须警惕自卫，警惕美国的阴谋。

美国人将来是否会出兵呢？如出几百万根本不可能，他的国际环境与其自身力量都不可能允许。我们解放军其实也并不怕这个，如几国联军共同来搞也不可能，是否他可以扩大一些占领区呢？沿海多摆放一些船只或者假造谣言说我们进攻他，都有可能。但我们不能主动的对美国采取挑衅态度，而要采取严正的坚决的自卫立场，抗战八年中打倒了日本鬼子，中华民族是不再怕帝国主义了。这是一个民族的经验，因此要吸收这一经验。现在我们竟有些干部落在群众的后面，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硬是迫逼美大使馆退出中国，向他们示威运动。虽手无寸铁却一点也不怕。相反的在我们部队中（如陈、谢及我们部队）竟有害怕美国兵的，真是笑话。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以前黄色炸药居第一位（TNT）现在原子弹居第一位，目前因苏联也有了，美国便不再吹牛了，以前常吹，现在苏联有了，反而害怕人家撒到自己国民头上来。

这战争若搞下去是否会有困难呢？七代大会召开时，当时曾估计将会发生几十种困难，如党内可能发生策略路线的分歧，解放区可能缩小一半，解放区可能发生重大灾荒，美国可能出兵，大规模的内战将爆发，延安可能发生刺杀要人案件等等。

在七代大会上这些估计是对的，现在整个国际条件和整个党的条件都有了新的变

化，胜利的保证即可有了把握。整党与土改后党的与建军的问题解决了。最后毛主席指示不要靠外援，（并不是要，如苏联在道义与精神上的援助，是需要的，它是中国革命的最好援助，美国之不敢乱动也就在此。最近西欧及东方各小国家的响应我们也是一例）蒋介石因靠外援至不堪的地步。我们不要学蒋介石。南方诸省靠我们自己才有发展，如广东发展了四万人，闽南、北、西及浙东浙西也发展着。任何时候要靠自己。最后毛主席谈现在是一切应为迎接胜利而准备，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都要有准备，准备干部、准备政策、准备发展、否则会手慌脚乱、坐不稳金銮殿的。毛主席十二月廿五的报告是我们的建国指针和大纲。农村中各阶层的分析则是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法规，以此根据来执政建国，这两本书要好好的研究，再联系到新的情势和业务，如办铁路、邮政、电报、银行、党校、如何搞城市、如何搞土改，这要我们好好计划，不要混乱，去年渡黄河后无衣无食，纪律当然差些，今后要集中统一，走向正规化，这是总的趋势，统一全中国，使具备国家的规模，但统一也不必忙，华北应先开始，区党委合并，专署取消，银行统一，干部抽下来支援新区，今后中央权力应扩大，地方权力应缩小，过去有许多事，事先既不请示，事后亦不通报，这是不好的，分散的游击时代行将过去，新的统一正规化的时代开始了。

第二部分　关于统一战线政策

统一战线的基本目的是认清和划分阶级敌人，使其孤立，并非是孤立自己，其基本的全部内容都是如此。敌我分不清便不要谈什么统一战线，不能乱打一气，打击面不宜过宽，不要树敌过多，北伐时期的统一战线对自己人乱打，不要工农是不对的，城市中不分大中小资本家，在农村中也过左得很，和侵犯中农现象，对大资本家统统反对，没有与之合作的。这正确的说应当是——发展进步势力（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小有产者）争取中间势力（开明士绅中小资本家）孤立顽固势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如果八年中没有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和力量均准备不及，必致失败，因此抗战后有人对三三制认为是基本错误的，这便是敌我不分，不对的看法。抗战七八年来有许多地主资本家有当我之参议长的，现在也弄到扫地出门，他们感到共产党太不讲朋友，你们都聪明得很，人家是蠢才，力量小时很虚心，很会宣传，稍微一大，便翻脸无情了，留他应得的地有何不可以呢？二斤半小米让他吃罢，以前叫人家是开明士绅，用人家搞枪枝，现在叫土豪劣绅，这是不好的，有人基本上批评减租减息是不正确的，这亦不好。有些人说："××有方向（是）恶霸方面"还有一个审判官过去说是好的，现在说是恶霸审判官，劳动英雄说是恶霸英雄，这种左倾看法用目前眼光去批判过去是不对的。毛主席坚决批评过这一点，有人说国共合作亦是过右，这亦不对，不合作不行，又合又斗。合就与我们有利，有人将合作了解错了，有人站在地富立场看国共合作，亦错了。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积极启发自己。现在则不必再说国共合作了，三三制不要提了，亦不公开提倡，但亦不宣布取消。城市的官僚资本（蒋、宋、孔、陈带垄断性的大资本家）要取消，中小资本家则保护他们，地主阶级因已无用，理应取消。中小资本家在今后新民主主义的发展中可以发展生产，经营运输，如西安纱厂（二千万以上资本）天津久大盐精厂（二千万以上资本）均不能在没收之列。对此则应采取严格态度，消灭的（地主阶级

封建制度、官僚资本）坚决消灭，而保护的（中小资本家商店等），则坚决予以保护。所谓政策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主张和办法，应当划分明确界线，现在则有混淆不清的现象。不能以解决本军的需要和个人需要而搞乱，不能象吃鸡和破坏教堂而乱搞一气，有某个教堂被破坏了，成了冷水洗鸡巴净光了（笑）不是从大的革命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现在谈到中央权力增加，地方权限缩小以后，我们军队亦要权限缩小，比如玻璃窗你弄坏他干什么？他是反动性吗？过去共产党失败就是这样给搞坏了的。又比如铁路的破坏则是有利于军事作战，我们应当成为伟大的破坏主义者，但对不应当破坏的应当加强建设，我们又应当成为伟大的建设主义者，这次我来德州等地的福音堂及医院都给弄坏了，五台山的石刻象都被挖心了，据说里面有金子的缘故。几千年的古物应当有伟大的气慨，给以保存，我们应当好好保存他们，莱芜战役时，我讲过有许多破坏专家，他们以胜利者自居，并有自私自利发财心理，对建设置之脑后，希望干个痛快满足，不讲政策等，这都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团以上干部今后应当好好考虑这一问题，如何保护，如何消灭，打过莱芜时大矿地有几盏电灯，硬被打坏，洗澡盆洗几次后亦给弄烂，马夫将马拴在洋房内，均在沙发上拉屎拉尿……他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愤恨，这种破坏与反革命的破坏作用是分不清的。我们廿年来一直小天下，眼光不大，搞完就走了，现在弄坏了将来岂不还要用老百姓的钱来建设吗？长征到南宁县时，抓到两个外国人，我与他谈了话，房子被搞坏了，有一个小鬼拿竹杠乱敲，问其何故，他说这是帝国主义的，不打不行，我还要烧呢？（笑）这种破坏是不对的。

统一战线先打主要的集中火力。

假若战争中打过我们的坚决反共的，现在动摇亦应争取。

罪大恶极的追到海角天涯，第二反共将功赎罪，第三是有功的，第四是允许的，这也即是主凶必办、胁从不问，有功的必赏，中立的可以允许。毛主席的论文，现在在上海、南京到处被欢迎阅读研究，还想翻印。资产阶级安心了，地主拚命将土地财产向工商业上投资。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参阅十二月文告他们有些功劳给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准备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他是支持内战的主要命脉，我们应当接受过来归国家，一点不要损失。因此不能将有国民党的官员入股的商店没收，这是一般的不没收，必须看其罪恶大小，采取罚款或没收的办法，经过政治机关讨论始能封闭或发卖，作为我们经济的一部分。如果他值两万万元，则我们可扣除少领经费两万万元，关于反动分子的商店，可以没收罚款，仍照常营业，等经讨论后处理。各级政治人员要爱护，党的政治军事人员均要稍管这些闲事，如住不长时，不要管他，麻痹他一下，等以后来时再搞亦不晚。商业可以起运销作用，工业则可以起生产工作，他又不象地主坐吃山空，毫无用处。应当有计划有系统的去处理，一般不没收，这与官僚资本应当分开来看。

统一战线问题，应当反右，不要将美帝蒋估计过高，对自已估计过低，这是右倾表现。现在不敢到新地区去，有些人认为反攻是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第一年强调自卫性质蒋介石进攻）现在则是整个革命问题，去年出击时有些人怕出来这不好。

中间力量常常发生动摇，中间派民族自由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是可以争取的，他受

美蒋及大资本家的压迫，他受美蒋影响很深，动摇的应当警惕，我们与他合作，应在他赞成民主，赞成共产党领导，彻底打垮美蒋这点上，否则不应麻痹自己。

有些同志很喜欢看见他们的报纸，寄以很大希望，他虽然赞成民主，但内部具有很大反动性的，应当对他毫不放松。

对他们的政治上的打击与经济上的消灭，要分开来看，政治上要给以批评。但不应将进一步的批评变为经济上的消灭。

消灭封建制度应与地主本人家属分开来看，相反的地主分田参加劳动，几年后改变成分。共产党若多杀人则表示自己的无能，应作为阶级而消灭之，作为本人而保存之，这主要是站在人民利益上，全解放区地主有八百万，全中国有三千万，若不杀便应给以饭吃，若要不给吃成为流浪乞丐也是不好的。农民对土地是有要求的，但若分到地后硬是都杀掉，农民是有良心的，不忍心，否则会脱离群众的，现在是要他们参加生产后可以改造成分。右倾则是表现在怕美蒋不敢土地改革，对进攻地主没决心，怕到新地区去出击等。土地会议后又过左，如对地富过左，对知识分子不相信，破坏工商业。

在总的方面，我们要威风一下，不要轻敌，不要怕美国。在对敌斗争上要谨慎，有些人怕美国，但美国远隔太平洋，同时原子弹也未看见过，为什么怕呢？主要是应当正视近前的敌人，谁都可以口头谈谈革命，但实际动手做起来则颇不简单。所谓作一件具体的革命工作则不是容易的事，如搞一个商店，如一不小心动手便会搞错的。

土地改革主要不能侵犯中农，他是农村中巩固的同盟者，他是我们身上的一块肉。若犯错误则是战略上的。这事是最容易使人看模糊，他是介乎两者之间，正如小资产阶级介于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一样，务使中农不被侵犯，并满足贫雇要求，土改后应大量发展生产，在分浮财上，不要以兴趣寄在这里，主要搞土地。城市中对小资产阶级采取冒险政策是不行的，工会有两个任务，他是解放区的主人翁，另外还有一个任务是……不要过高的宣传增加工资和缩小工作时间，对中小资……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能采取冒险政策，他不应与地主富农混合看，他是革命动力之一。工农是革命的主要领导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将他看作为地主、富农、中间派。另外，他是地富出身与不是地富出身的，还应区分开来看，他没有直接参加剥削应另外看。这又分三等：（1）封建知识分子，多为地主、富农的代表；（2）新知识分子，上过洋学堂的，是资本主义教育出来的，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来的一种产物，帝资没有好处但这确是一个，他是主力之一，但不是属于领导上的，他是受了洋化又与封建联系一些的，他反对封建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喜欢用钢笔，不喜欢用毛笔，喜欢握手，不喜欢脱帽的，他有博爱思想，资本主义化的，但到社会上以后感到失业的压迫，便逐渐和无产阶级靠拢。讨厌封建的制度与文化。他好的一面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所必须，坏的地方则是带来洋化思想，最讨厌纪律，喜欢自由主义，聪明善感，我们应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分开来看，抗战初期有一批小资产阶级到党内来，还想保持自己的个性，蒋管区题材很多，到根据地没有了，他想讽刺暴露这是不好的。党对这种人研究不够，要不搞左，要不便搞右了，他了解问题快，记忆力强，认识问题快，不了解其基本缺点，他最容易做尾巴主义，对土改认为太残忍，好文明，进步快，其中一部分好的已马列主义化了。有

些人很喜欢这些人，有些人则采取无条件的愤恨，胡乱打击；（3）解放区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亦非地富，他将是新兴的知识分子，他没参加剥削，也未受到压迫，未见过战争。上述第一种是逐渐衰弱，没法行动，中间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有贡献应很好的注意培养，注意改造从思想上帮助改造，不应加以压力，这种人有几百万，将来会涌进来参加工作，他是财产，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搞多年来便留下这批财产，要很好争取他，搞到解放区。三查三整后要他参加工作，有系统的研究掌握他如律师、工程师、大中小学教员，如不好好掌握，将来会犯错误，千万不要犯右倾错误。

关于杀人问题，愈杀少愈好，反革命的坚决分子、斗争分子、组织者、主犯者，应杀掉，一般的不杀，否则会造成革命失败，这不是群众的观点，毛主席曾为陕北的杀人发了好几次脾气，他说谁杀谁要抵命的，这是坏风气。

关于领导权问题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间，参加者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权可能属于无产阶级，也可能属于资产阶级。领导权如果属于资产阶级，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资产阶级就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建设国家。领导权如果属于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无产阶级则按照无产阶级利益建立国家。领导权不属于资产阶级即属于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必须要争夺领导权。

在苏德战争中，英、美、苏三国争夺领导权，英国争不过美国，于是苏联和美国争夺领导权，现在苏联与美国仍在争世界领导权。如果苏联争得领导权，苏联力量强大，则世界和平。如果美国争得领导权，美国需要战争，则破坏世界和平。中国要打倒蒋介石，同时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因此在这个斗争中间，也发生领导权问题。民主同盟、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左翼李济琛、冯玉祥等都要与我党争夺领导权，国家主义派已成了蒋介石的走狗，已不能与我党争领导权了。今天反对美蒋的斗争任务主要由我党担负起来，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也有人与我党争领导权，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希望蒋介石下台；交给他干，他与中共讲和，再下停战令，他当联合政府主席，他来帮助蒋介石阻止革命前进，李济琛、冯玉祥等就是有这种野心的，他们一边举手赞成土地改革，一边进行反对人民。毛主席说这些人将使革命阵营混淆不清。

中央指示：要公开宣布领导权问题，公开提出凡是要参加今天中国革命阵营的必须有三个条件：

第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第二，赞成并实行共产党土地政策；第三坚决打倒美蒋反动派。不合这三个条件者就是反革命。

毛主席说：公开解释领导权问题是有好处的，使人民知道革命胜利以后，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不公开解释也有好处，可以使地主麻痹。但不公开解释坏处多，容易使群众模糊，群众不明白我党企图，群众容易动摇，中间分子也会动摇。

抗日战争初期，领导权不公开讲，不过早刺激国民党，不使国民党左派警觉，但党内进行解释，对外却“心照不宣”，有时含糊其辞强调共同发展，有时也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对领导权问题公开讲了，公开讲对应付行将到来的历史的大转变，是有好处的。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要坚决消灭美蒋，没收官僚资本，平分土地，建立民主中国，愿

合作者来，不愿 合作者去。因此在毛主席去年十二月廿五日的报告发表以后，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皆开会讨论，考虑领导权问题。

美苏争夺世界领导权问题，过去双方都不讲，美国讲了些也怕讲多了刺激苏联。三国会议时英美苏都在争，即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世界领导权，争当指挥者，争当司令，争当世界首长。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时把这个问题公开了，公开骂英美，苏联也把这个问题公开了。公开号召全世界人民跟共产党走，不要跟英美走。我们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引起警惕就好了，假如看了这个问题，不加警惕那就是木头。

以上是讲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

有人说：抗日时期要统一战线，现在反对英美，要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统一战线我们过去要，现在要，将来新民主主义胜利以后也还要，统一战线主要是规定在斗争中打击谁，联合谁，以及决定方针、政策，只要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有统一战线。过去强调“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是不对的，这是把我党的领导权压低了，即是要我党为统一战线而牺牲我党自己的利益。皖南新四军领导人为要与国民党合作，就不要领导权，结果遭受失败。我党毛主席则不同，要与国民党合作就越要有我党的领导权，现在在新的全国革命高潮的形势下，人民看到蒋介石灭亡不远，把希望寄托在我党的胜利上，这是必然的事情。中国需要有一个包括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但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统一战线思想就是共产党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包括更多的人才能成为我们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与党的领导是一个东西，愈要扩大统一战线愈要坚强我党自己本身，我们三查土改整党整军即是为了统一战线的扩大。比如我们整军首先把军阀主义整掉了，群众便跟我们走，群众知道跟我们，我们是不会成为军阀队伍的。

取得领导权有两个条件：

第一、领导者要领导被领导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坚持到底，取得胜利。同时在事实上证明能取得胜利，不动摇。否则如果自己动摇则不能领导被领导者。

第二、领导者要使被领导者得到利益，并不断给被领导者以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教育。

这两个条件缺一条就谈不到领导权。

我党在与蒋美斗争中，不断获得重大胜利。说明我们自己有力量有信心，就有了第一条。我党领导雇贫农，团结中农，平分土地，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民族工商业家反对蒋美，保护民族工商业，使他们跟我们走，就有了第二条。争取领导权的两个条件，我党都有了，我党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全国胜利。

关于国际形势

毛主席指示：国际问题主要是英美苏的关系问题，我们对国际问题应有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英美苏三国关系是要从妥协和破裂来看。但三国关系不是妥协和破裂问题，而是早妥协或迟妥协的问题。这是肯定的。英美苏三国迟早会妥协的，肯定的。讲破裂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们同志过去只看到战争的危险，看到战争的宣传，剑拔弩张，认

为要发生第三次大战，认为三国要破裂。但有时三国关系缓和，都有认为要和平下去，我们同志的思想是摇摆的，我们只看到战争的危险性存在，没有看到消灭战争的危险性更存在。十年之内没有战争的可能，廿年以后可能有战争，现在战争的危险性充分存在，消灭战争的可能性更充分存在。战争打不起来，不战即和，不能僵持多久，最后是要妥协的，而且战争将来是可能消灭的。

第二、不是一切问题都迟早妥协，而是若干问题要迟早妥协。即是说妥协包括若干重大问题，但不是一切，妥协是巩固的，妥协下来是有一个长时期的和平的。将来大国间双方贸易问题是妥协的，但殖民地问题是妥协不了的，国内革命是妥协不了的。妥协主要是民主势力与帝国主义反民主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

第三、不是大国间三大强国五大强国的妥协，其他国家就不革命，也不是其他国家破裂影响其他国家也同时破裂，而是相反各国愈革命其他大国间妥协得愈快。

毛主席讲这三点对第三次大战指出远景，同时也指出战争可能消灭。同志们根据这三个基本观点，自己去掌握和分析国际形势。

国际上主要是法国、意大利、中国三个问题，意大利在法国与中国的中间地带，如果意大利问题解决了，英、美、苏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了。

毛主席说主要从民主力量强大方面去看问题

现在国际问题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美国不但有庞大的物质力量，而且有精神力量。美国战后以反法西斯胜利者的资格，用救济之名，进行侵略。最初用调解人的地位，到处干涉，反共反人民，中国他要调解，印尼他要调解，右手牛奶，左手香烟，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受了骗，法国、意大利都被糊住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铁托没有上当，希腊也没有被糊住。最初很多人对美国面貌认识不清，有些人害怕美国，可是现在世界人民清楚了，纸老虎拆穿了，人民不怕美国了。苏联最近领导人民反对美国，苏联受战争破坏，在复兴中反对悲观失望，表现了苏联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人民力量。苏联有些人看到美国东西好，穿得好，吃得好，音乐好，歌子好……就羡慕美国。这是受了伤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苏联有些知识分子不表扬苏联人民的伟大力量，不发扬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相信苏联人民力量，实际上是投降美国。现在苏联正在开展对美国的斗争，从报纸、文学、哲学、思想等方面清算美国思想，反对美欧资产阶级思想，东欧各国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反对美国，中国也是如此。一年以前美国马元帅来搞“和平”，使我们军队中、地方上对美国有和平幻想，但我们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问题没有犯错误，远在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间我党中央就公开发表声明，揭发美国的真面目，积极领导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我党在反美斗争上有很高的地位，世界各国非常佩服中国共产党，佩服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非常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八月，毛主席与斯特朗谈话中，公开号召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当时还有怀疑，是否过左？是否会破裂？破裂了能否对付？两年来的事变，证明美国是侵略的，美国没有什么可怕的，美国是能够打败的，这些是肯定的鼓舞了世界人民。因此，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威信，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第二人民领袖。世界人民都学习我党的理论。一九四六年初，饶漱石同志传达中央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及一九四七年

一月陆定一同志发表“目前国际形势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文章。都明确指出世界斗争形势及前途，英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将要闭幕的一天，接到陆定一同志的文章，发现陆定一分析国际形势的观点与英美不同，特延期闭幕，继续开会，根据中共文件制定与通过反对美国的决议，苏联高级军事学校研究中国两本书：一是“孙武子兵法”，一是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战争”两本都是必修的课程。因此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成了世界理论，这是我党多少年英勇牺牲的结果。中国党多少年没有理论到外国求理论变成了教条，现在中国党有了理论了，中国党不仅英勇牺牲，而且有高度的理论水准，这与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反对美蒋斗争的胜利是分不开的。我们斗争的胜利事实，使世界上更相信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正确。

同志们：我们应该更好的学习我们党的理论，毛主席著作，更好的领导人民作战。

第二部分土地改革中的反左反右问题

去年九月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在平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规定了土改的方针以及整党整军的方针。会议上发现党内思想和成分的不纯，障碍了土地改革，许多村干部、区干部、县干部以至区党委干部破坏土改，压迫人民，使人民怨气冲天，干部罪大恶极，拿着共产党的招牌做坏事。这有几类人，第一类是抗日时期用鬼子面目出现，自称暗八路”，帮八路做事，鬼子投降他便成为人民的统治者，作威作福，第二类是北伐以来的功臣，做过多少年地下党工作，资格老。第三类是领导人民翻身的减租斗争反奸斗争有功的骑在人民头上。第四类是荣誉军人。这四类人叫做“四大家族”。另外还有五大巨头，即是村长、民兵队长、支部书记、武委会主任、治安委员，这些“四大家族”、“五大巨头”把持包办一切，封锁消息，欺下蒙上，上下勾搭，通风报信，互相包庇无所不为，成为国民党在解放区的代理人，这些在土地会议上彻底揭发了，中央决定大力整顿党的队伍，不整不象共产党，各地在整党中曾遭到抵抗，某地一个坏分子被撤职时，全体罢工示威欢送，某地枪决一个坏人，坏分子发动几个县去公祭。各地无一例外。太行山召开两千多人的干部会议，砸石头开除二百多个，扣押六个，其中有老红军干部，有八年抗日战争干部，山东黎玉也在这个运动暴露出来。因此我党要反对右倾，整党运动很猛，必然会左一些，此次整党开除约十万，各地成绩很大，毛主席说整党是保证胜利的，整党去年底搞得最猛烈，许多区、县政府解散，被老百姓打垮了，毛主席说：“整得好”。

我们军队里面有地主富农分子，有小资产阶级分子，有工农忘本分子，思想作风也不纯。因此军队里也要整军。军队今年一二月开始整，现在才结束，军队里打击对象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意识坏的分子，主要是对外破坏纪律，做官压迫战士，对战士拳打脚踢的坏分子要整。这叫做整军，整军也有些过左的，我们同志就大叫过左过左！但从没有一个干部代表士兵讲过话的，从来没有一个团政治委员或者是知识分子向我们报告士兵痛苦的，总是代表干部讲话。我们军队在前方打仗，英勇牺牲，证明军队比地方党好。但军队不是没有缺点的。整军主要是解决士兵问题，两三百万士兵提高了觉悟，就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我们同志叫苦，其实有什么叫苦！士兵当中的痛苦你为什么不讲？我们同志对苏中老百姓提了许多意见，但没有一个同志讲过苏中老百姓的苦处的。我们

同志脱离老百姓到了什么严重的地步！

我们军队是比地方党纯洁，但官兵关系仍然是个问题，我们不要拿军队纯洁来安慰自己，必须认真整。苏中党没有整，但整党风潮就要卷过去，苏中是躲不过去的，苏中在对日寇斗争中间有两面派，有老干部，有荣誉军人，苏中党内也是不纯的。去年九月土地会议以后是反右开展猛烈的运动。今年二月以后是反左，因此发表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整党是黄河的主流，一直向东，达到大海，是一个大的运动，是谁也挡不住的。地方整党，军队整军都是黄河主流，使我们革命达到大海。这个运动非常好，必须保持下去，可是黄河主流风浪大，有几个浪花：一是侵犯中农，二是侵犯工商业，三是对三三制不相信，四是大批打杀村干部，过去干部在战争环境中，因急于完成任务，强迫命令情有可原，但贪污腐化，强奸妇女，破坏土改等等则是有罪的。因此整党整军要贯彻下去，问题不在左不左，而在整军是否彻底？在三查中有的不参加会，有的参加不敢讲，打埋伏、怕打仗，怕死鬼、保命传种，这些人有没有黄河主流是否流过这里？不要急于制止左，如果把中心放在制止左，则是不对的。

同志们提的意见精神不错，但同志们不同意"雇贫农当家，认为雇贫农当家，降低了无产阶级思想，但在土改教育中，提出"雇贫农当家"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工人的思想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我们队伍中工人数量少，雇贫农占绝大多数，提出"雇贫农当家"有什么不对呢？此次三查所以有成绩，就是雇贫农当家的结果。不满"雇贫农当家"实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压制雇贫农的思想。关于土改学习，去年前委八月廿九日的指示下边没有一个人反映，十一日又发一个指示，仍无回响，去年十二月间平汉、陇海战役之后才搞起来，这是因为雇贫农当家，个别地主富农成分的同志，一向表现好，此次三查中吃了亏，没有关系，党会帮助你弄清楚的。"在此次大运动中，必须离开自己说话才会现实，有些人不满意雇贫农当家说："当什么家，统治阶级立场！"是的，就是要雇贫农成为我们军队的统治者，不要雇贫农当家，难道还要地主富农当家？我们军队此次搞得不错，没有什么左。为什么我们搞得比较正当？是因为我们搞得晚，我们不强调打击那些人，开除那些人，而是查地主富农思想，提意见过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家拥护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黄河主流必须反对右，同时要防止左。几十个干部被打死，几百个干部受侮辱，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干部听了我的报告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最要紧的要整好几十万军队，整军与地方上土改相结合一定会搞得好，我们干部自我批评会议一定是有成绩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大的改革，最初只怕运动不起来，规模不大。但运动要结束时，要细致，要昭雪个别受冤屈的同志，现在运动只进入第二阶段，学习政策，重新发动士兵，过去同志们有些受冤屈的，还要做出组织上的结论。

前委土改学习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土改学习的口号和办法是有些过左的，我代表前委向同志们承认，因为我们过去自己对运动也不很清楚，这是老实话，同志们每个人都应该说老实话。

毛主席指示要继续三查运动，学习政策，发动士兵，成立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巩固民主，肃清军阀残余，与领导上学习政策相结合。但还要反对右反对怕死鬼，反对

"报销思想"，"报销"是对的,不"报销"是不对的。"报销"是光荣的，每个人都应该准备报销，黄河主流是主要的，浪花是次要的，我们还要继续防止右，这是毛主席指示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自我批评问题

毛主席与其他同志讲自我批评问题，我是从旁听来的,不是讲我的,也不是讲你们,可是讲的很合乎我们情况，问题谈得很通俗，很平淡无奇，但是道理很深刻。

第一，毛主席说党内有许多坏现象需要提出批评。但同志们不提出则已，一提却提坏了，又有一些同志有顾虑，就不提意见，就缺少自我批评，不自我批评就闹不团结，这主要是方法问题。毛主席说：批评要站稳团结与拥护对方的立场，才能取得批评对方的有利的地位,因此团结才无问题。例如批评粟司令，首先表示拥护他，拥护他百分之八十，批评他百分之二十，粟司令是会接受批评的。不采取团结与拥护对方的方针，任意发言，任意提出批评，就是疯子。因此闹纠纷，闹宗派，闹不团结。毛主席这种批评同志的方法是正确的，是辩证法的方法，对同志提意见首先表示拥护对方，先取得有利的地位，即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要取得地位不是小广播。

第二，毛主席说：对人的看法，一般人是把人看成黑漆一团，或者看成十全十美，这是不对的。我们党内看人应该主要看同志们好的方面，但我们同志看人往往带宗派情绪，往往觉得人家不行，在党内思想斗争进到深入阶段，细致对待思想问题时，我们必须主要看同志们的好处，但思想斗争初展开时不能这样看法。

第三，毛主席说：我们同志选择前方选择后方，要调动，要改行，这是挑六十斤与八十斤的问题，挑八十斤是光荣的，挑六十斤也是光荣的，如果挑八十斤的摆下来去挑六十斤，便是不光荣的，工作困难，自己不推诿，挑起担子不怕困难，挑八十斤是光荣的，前方艰苦，在前方工作，挑重担子是光荣的。

第四，毛主席说共产党要破除迷信，工作得好的人，是迷信自己能力，做领导工作的人自己迷信领导正确，别人也说他领导正确，就是助长迷信。毛主席说别人写本书，把毛泽东和马恩列斯并列叫"马恩列斯毛"也是助长迷信。共产党人不要盲目的相信自己，很多人昏昏颠颠头脑不清楚，必须破除迷信。马恩列斯是头脑清楚的，是随时反省自己,深刻分析和批评自己。共产党反对迷信,却有了新的迷信,这道理是深刻的，我们打仗相信自己能打胜,如果自己迷信就会吃亏。山东对待敌人重点进攻轻敌,过早分兵,也多少有点不清醒，等于乌云把晴空遮住不如早起时的清楚。同志们要打破对自己的迷信。

第五，不要性急，不要急于革命成功，土地改革过去有些性急，去年进军黄河南，没有准备也是性急，张国焘反革命，但他有一个长处即是性子不急，天塌下来也不问。但是不要性急，打仗指挥军队不能适用这一点。

以上是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的指示。

真理是具体的真理，也是很平常的真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过去有些错误就出在这里。

毛主席有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勇气特别高，从旧的原则、旧的理论中创造新的理论。是世界上革命理

论家，也不受旧的束缚，他有理论的勇气，例如：他说我们总的方面要轻敌，具体问题上不要轻敌，他的理论勇气值得学习。

第二，政治上勇气高，他敢于大声疾呼把地主富农反掉，大胆与美蒋和平，要签字就签字，要打我就打，你打我，我就取得了自由，大胆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一直留在陕北，他有反潮流的勇气，不屈服，他有决心整党，十几万人要整掉，他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勇气，整军也有决心，也有勇气，去年我军过黄河准备不足，而他决心要我们过黄河，他竟有这样的勇气。

简单的道理毛主席反复讲三次，他说真理需要反复说明，才能说得明白，他举照相为例，只有技术好的几个人可以对一次光，有很多人必须仔细对几次光的。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勇气，但打仗问题上勇气必须加战术。

同志们讨论问题，除讨论政策问题外，还要讨论具体政策、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美国问题、领导权问题、胜利形势问题、黄河主流与浪花、自我批评问题，此次自我批评把我们提高了一步，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更加提高，讨论具体政策的文件有以下几个：

（1）毛主席“目前形势与任务”；

（2）土地改革中阶级的划分和待遇的规定；

（3）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4）西北解放军扩大会议关于新区政策的决议；

（5）我这一次的报告。

主要根据“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这也就是我这个报告的根据，大家反复讨论，讨论以后我再做一次报告。

讨论政策时，去年九月转入进攻关于历史上的纠纷尽量少讲。

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如下：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解放区的职工，拿更多更好的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品供给前线！解放区的后方工作人员，更好地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

（七）向解放区努力生产军火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恢复工矿交通的职工致敬！向解放区努力改进技术的工程师、技师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努力后方勤务工作和后方机关工作的人员致敬！向解放区一切工业部门和后方勤务部门的劳动英雄、人民功臣、模范工作者致敬！

（八）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

（九）解放区的职工，为增加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工业品的质量、减低工业品的成本而奋斗！拿更多更好的人民必需品供给市场！

（十）解放区的职工，发扬新的劳动态度，爱护工具，节省原料，遵守劳动纪律，反对一切怠惰、浪费和破坏行为，学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十一）解放区的职工，加强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工人与技术人员的团结，建立尊师爱徒的师徒关系！

（十二）解放区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为共同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

（十三）解放区的职工会与民主政府合作，保障职工适当的生活水平，举办职工福利事业，克服职工的生活困难。

（十四）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

（十五）向蒋管区为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奋斗的职工致敬！欢迎蒋管区的职工到解放区来参加工业建设！

（十六）蒋管区的职工，用行动来援助解放军，不要替蒋介石匪徒制造和运输军用品！在解放军占领城市的时候，自动维持城市秩序，保护公私企业，不许蒋介石匪徒破坏！

（十七）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十八）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

（十九）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压迫亚洲、欧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职工运动！

（二十）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援助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拒运拒卸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援蒋物资的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并肩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致敬！

（二十一）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团结万岁！

（二十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万岁！

（二十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爱国运动的新高涨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

新华社社论

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反动派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长久愤怒，在最近上海和北平的学生大示威中，在蒋管区其他大城市的学生运动中，大规模地爆发出来了。与此同时，上海、北平、香港等地工商文化教育界名流，接连地发出对于美国扶日政策的抗议，不但一切民主分子，而且许多素来倾向保守的舆论机关和政治人物，甚至包括某些属于国民党的舆论机关和政治人物在内，对于美国反动派明目张胆的扶日政策，也不得不表示异议——至少是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异议。在相反的方面，则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书面声明，搬出法西斯的“防共”理论，来辩护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并威吓中国人民的抗议运动说：“倘仍继续进行，可能招致不幸结果。”蒋介石的军警宪特机关，立即驯服地执行了司徒的凶恶号令，疯狂地压迫逮捕，并打伤了爱国的学生。蒋介石的宣传机关中央日报，也竭力证明它们是美国侵略者和日本侵略者的孝子忠臣，它们除了背诵美国大使馆所颁发的宣传提纲以外，还提出了更凶恶而直截了当的口号，鼓吹对爱国运动“操刀一割，斩草除根”。但是不顾这一切，大无畏的蒋管区学生和人民的爱国运动，还是继续前进。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和卖国贼站在一起，原形毕露，既凶恶而又孤立；另一方面，是全中国一切有爱国心的人民站在一起，义愤填膺，受着迫害，但是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胜利。——这就是这次斗争中的基本形势。

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两年来所受的迫害是惊人的；但更惊人的是人民并没有被压服，而是更坚强了，学生运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谁都知道：今天蒋管区学生处境之险恶，远甚于过去的“五四“、“五卅”、“一二九”时期，然而他们的奋斗，就其觉悟性、组织性、勇敢、机智和坚持性来看，却在在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个事实，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的压迫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逼得中国人民除开团结起来奋斗而外，就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而蒋管区的学生，则在历次的反抗运动中，都是站在蒋管区人民的最前列，他们的革命要求，经过长时期的熬煎和锻炼，已经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成熟而日趋成熟。另一方面，又因为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的胜利，和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致命的失败，极大的鼓励了蒋管区人民，首先是蒋管区学生的斗争的勇气。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黑暗时期，那时不但中层人民，而且下层人民，也暂时屈服于某些暴君的淫威之下。但是那不是今天。在今天的中国，不但下层人民因为胜利在望而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和自我牺牲，而且颇为广大的中间阶层，也表现了类似的信心和勇气。当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时，他们在面前是看到了一个温饱和自由的未

来；同样地当他们控诉美国反动派的扶日侵华时，他们知道这个控诉也不是徒然的，这个控诉将要加速一个独立的新中国的诞生。因此，他们不但极端地仇视压迫者、侵略者及其走狗的种种凶恶无耻，而且极端地藐视他们。因为无论这些反动派怎样猖狂于一时一地，他们究竟是即将灭亡的反动派。这个普遍的信心证明：革命高潮不独是在解放区存在，即在蒋管区人民中也同时存在，这正是革命临近胜利的象征。

在这一次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反动政策的严正抗议中，司徒雷登和蒋介石政府都竭力露出他们的凶相，企图把学生和人民吓退，但是他们收获了什么呢？他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反应，并不是战栗、恐惧和后退，而是更大的愤怒，更辛辣的嘲笑，和运动的更加深入与扩大。司徒雷登企图在中国人民面前，辩护无法辩护的美国对日政策，表示他不但反动并且愚蠢，正因为这样，这个金元大使，受了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唾骂。司徒长期认为政治资本的燕京大学的师生，这次面对面地驳斥了他的谬论。甚至正在标榜司徒式“自由主义”的大公报，也不得不对司徒这个荒谬的行动发出怨言。至于蒋介石集团，也跟着出来替美国辩护，则表示他们是更加反动和更加愚蠢。当国民党反动派忙于禁止“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时候，居然忘记了不多几天以前，他们为了与华盛顿讨价还价，为了敷衍全国人民的公愤，自己也曾在某些场合，装腔作势地“反对”美国扶助日本。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南京合众社电：“代表政府的权威人士告合众社记者称：中国政府竭力反对美国复兴日本工业与经济的计划，……美国扶植日本的行动，显然已危害中美妥协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认为欲使日本强大后而不从事侵略，乃绝对不可能之事。”尽管国民党在外交上随后就“转变”了，但是国民党的“舆论”却还来不及同样“转变”。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南京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所谓“全国总工会”，就还“对麦克阿瑟扶助日本政策提出严重之抗议”；而直至六月一日，国民党的所谓“立法委员”，也还在要求“政府迅速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一切助长日本军事及经济力量之行动”；但是到了第二天，即六月二日的早上，一切“美国扶助日本”的宣传，就忽然被宣布为“共匪军事间谍职业学生策动反美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宣传上的这种混乱矛盾，证明这伙卖国贼在伟大的完全正义的人民运动面前，是何等地慌张，何等地手足无措。

国民党反动派很得意地创造了一个“共匪军事间谍职业学生”的名词，用来污蔑和恫吓爱国的学生运动。但是反动派在这里又露了马脚，正如美联社上海五日电所说的：爱国的学生诉诸理智，而反动派所指挥的“反对派学生——其中包括右派‘职业家’，常常佩带武器——则以拳斗来回答”。尽人皆知，只有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反动派，才豢养一群不读书的“职业学生”，专门从事于“佩带武器”和“拳斗”，以破坏人民的反抗运动。真的，如果他们不及时悔悟，他们不但会堕落为蒋介石的“军事间谍”，而且还会堕落为美国侵略者的“军事间谍”。跟国民党反动派一模一样，司徒雷登这个美国大使，也用“阴谋”来污蔑英勇的中国爱国者，但是尽人皆知，正是那些法西斯的“防共”门徒，正是那些直接以行动来干涉中国学生校内活动的外国殖民主义者，正是那些中国特务机关、“军事间谍”的外国指挥官，才是卑鄙的野蛮的阴谋分子。说到广大的爱国学生，那么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和司徒雷登之流怎样污蔑和恫吓，公道自在人心。上海中间分子的刊物“观察”写道：“学生已经成为了人民利益的发言人，……他们所争取的

内容，已不仅仅限于他们自身的权利，他们的呼喊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他们在现实的分析、理想的追求、办事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上，均已表现出惊人的成就，他们已俨然成为一个推动时代的巨轮。”这个事实，这个舆论，不是任何反动派的任何污蔑恫吓所能够抹煞和改变的。事实上，中美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每实行一次压迫，就增加一次自己的孤立，这已经成为规律了。跟以前一样，在这一次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爱国运动中，司徒雷登和蒋介石又一次地威信扫地。而爱国的学生和人民，则将更加坚决地团结前进，直到他们的奋斗胜利为止。光明是属于学生、属于人民的。

〔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的综合报导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日）

综合报道：规模宏大的中国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现已持续一个月以上，这是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涨。过去三年中美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结合，努力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结果，已造成了对于中国的严重威胁，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与独立，爱国的学生遂不能不起而大声疾呼，展开反抗。

这次运动首先发动于上海，继即扩展到南京、北平、天津、唐山、厦门、福州、广州等地。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扶日运动，系于“五四”纪念万人大会上决议发动，接着组成“上海学生反对美国援日政策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并发起反对美国扶日的十万人签名运动，在联合会领导下，上海学生先后于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三日及五日举行三次大规模示威集会，据外国通讯社报导，每次集会人数皆在万人以上，其中六月三日集会即为三万人。南京中大、金陵两大学学生于五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连续举行反侵略反压迫示威。平、津、唐学生数千人于五月三十日在北平举行联合示威，致电美国务院及麦克阿瑟，抗议美国扶日侵华政策，并致电国际学联，要求各国人民协助反对美国扶日政策，会后组成包括平、津、唐十二大学及专科学校学生的“反对美国援日学生联合会”。厦门学生于五月二十八日（一说为二十九日）举行爱国示威。沪、平等地学生皆以标语、展览会、活报剧形式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并举行校内演讲会、讨论会以及“美国对日政策”问题测验。上海圣约翰大学九百四十人的测验中，八百六十人的答案认为“日本法西斯复活，将引起日本再度侵华”。北平北大测验中，绝大多数学生认为“中国将首先遭受日本复活之害”，爱国学生痛斥蒋介石积极支持美国扶日政策的卖国罪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行的油印《学生报》，严斥蒋政府“与美日帝国主义合作，妄图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上海法学院学生主办的“时事漫画展览会”中，有一幅漫画描绘人民公敌伪总统蒋介石身披龙袍，跪在山姆大叔面前，接受新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丑态，蒋介石卖国独裁的毁灭命运，已为广大学生认识得清清楚楚。南京学生五月二十一日（即

蒋介石就任伪总统的第二天）示威中，曾公演窃国大盗袁世凯做皇帝，但不久即被人民推翻的活报剧。

这次学生爱国运动是代表着广大人民意志，它是在各界爱国人士直接间接支持和声援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早在四月京、沪、平、津等地，文化、教育、实业、金融各界一百二十四人即曾联名发表“对日问题主张”，指出“在美国保护与扶植下，刚才金杀羽（意即羽毛擦落不能飞翔——编者）的日本帝国主义有羽毛重丰之势。”继称：“必须集中全国各界爱国人士迅速展开一个纠正美国对日错误政策，制止日本法西斯残余抬头，保卫中华民族的爱国运动”。六月初上海、北平、南京、广州与厦门的教授、作家、剧人、经济学家、报纸编辑与工业家二百余人及香港工商文化界七十余人又相继发表声明，表明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之严正态度。另据合众社上海七日电称，上海“各国一切报纸”都承认日本在美国“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的计划下，其“下一步骤就是恢复到侵略政策”。

蒋介石卖国罪行和美国帝国主义用尽各种卑劣办法，企图破坏和压迫此一爱国运动。中央日报一再狂呼对爱国学生要“操刀一割”、“斩草除根”，以“制止”学生爱国运动，蒋党中宣部青年部更公开下令禁止各地报纸通讯社发表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五月上海学生示威中，蒋匪出动数千警宪骑兵及装甲车，当场捕去学生五十余名。北平九日示威中，学生十五人被殴伤。上海蒋记市长吴国桢且曾于五日下令各校当局立即开除示威学生，蒋介石政府并命令其在各地的职业特务“学生”，用尽各种无耻手段破坏学生爱国运动。在上海各校以少数的特务分子成立了所谓“剿匪建国会”，特务“学生”均佩带手枪威吓爱国者。上海法学院的国民党特务，曾撕毁时事漫画展览会，并殴伤及逮捕学生多人，一个学生且被特务从三楼推下，致头部腰部均受重伤。在南京中大蒋匪特务“学生”，曾破坏“五二零”惨案纪念大会。为强大的学生爱国运动所震惊的美帝国主义者，迫得撕破假面具，亲自出马干涉中国爱国运动，美大使馆和美上海总领事馆官员亲到圣约翰大学，向该校当局指示镇压学生办法。司徒雷登更于四日发表声明，为美国扶日政策作无耻辩护，诬蔑中国学生爱国运动为“阴谋”为“错误”，并以所谓“不幸后果”威胁中国学生。

但是这一切都丝毫不能阻止学生坚决爱国行动，司徒极端侮辱中国人民的声明，更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同时也引起美国国内正义人士的义愤；司徒声明四日发表，上海学生五日清晨即以在上海美海军总部门前的万人大示威来回答他，示威学生突破军警重重包围，殴捕中高呼“打倒美国复活日本侵略的政策”、“美军回美国去”、“打倒美国的援助（指援蒋）”、“中华民族独立万岁”。平津十一个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司徒曾任校长多年的燕京大学领衔，于六日发表声明，向司徒提出严重抗议，斥其干涉中国内政，指出任何外力干涉和压迫都“决不能停止此一运动”。此外，北平二百一十名教授及文化界名流、上海十家刊物编辑、上海一部分教授和香港华侨报界等相继发表声明，驳斥司徒。南京中大、金陵、金陵女大亦发起抗议签名运动，美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亦致电司徒提出抗议，斥司徒威胁中国学生的行动，“与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钳制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是一模一样的”。要求美国务院撤销司徒声明。据美联社上海六日

电，上海美国密勒士评论报编辑鲍威尔亦认为“中国人有权害怕日本的经济复兴，因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之前的第一步行动”。

不顾美蒋的迫害恫吓，中国人民新的爱国浪潮，正继续高涨。北平学生继五月三十日示威集会后，又于六月九日举行数千人爱国示威游行，各校学生在示威后，并举行联合总罢课两天。福州学生已发动抵制日货。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二千八百余人亦签名抗议美国扶日政策，香港工业界也在筹备反对美国复兴日本工业运动；这一运动的广大规模与雄厚力量已迫使蒋政府在外表上对爱国运动不敢再强调所谓“操刀一割”，而宣传所谓“若纯系出诸学生本意极表同情”云云，阴谋一面挑拨离间，一面施行暗害，这正是蒋介石统治更加脆弱和接近崩溃的象征。

(1948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附〕司徒雷登就反美扶日运动的反动声明

(一九四八年六月四日)

本人兹被迫以真挚沉重之心情，公开承认一种日益增长之危险局面，此种局面不仅影响美国利益，本人确信亦且影响中国之切身利益。本人所言者，自系指反美国对日政策之运动。余知诸君当了解余之必须出此，实有莫大之隐痛，盖余一生之大部时间系消磨于中国学术界中，而余一生工作之主要目的，向系为协助增进中国学生之幸福及其对自身与国家成熟之责任于万一。

故余被迫承认对于日本问题之反美运动其中心来自中国学生团体一点，颇感困难。

余不佯作知悉何人发起此项运动及其目的何在。余曾获有关于此种来源及用意之各种不同报告，所有之报告或属一部实在，余所确知者，即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尤令人遗憾者，乃此举动竟与美国现在正着手于广泛而郑重之计划以协助陷于悲惨环境中之中国时发生，亦即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复兴全球被毁区域之际。且本人有可申述者，即此举亦美国人民之所乐为者，而彼等对于此项努力，竟报以无理及不负责之攻击美国政策，殊属不解。

本人雅不欲相信各发起及附和反美运动之大学确信其所用以反对本国之理由，本国被指为扶植日本恢复其军阀与经济帝国主义。此种指摘显属错误。查于胜利结束对日战争后，美国旋即代表摧毁日本武力之盟国着手解除日本陆海空军及参谋之机构。余以为无任何人能提出日本军力之任何部分现正予以恢复之证据，亦无任何人能提出美国有使日本武力永不再起以外任何用意之证据。查日本侵略之基础，系其本土以外之帝国统治地，现日本既失去其帝国统治地，非有军力无法重行建立，美国人民及政府决不使其能有所为，诸君尽可安心。

至于日本之经济及工业能力，美国亦曾代表各盟国着手破坏或拆除其战时工业。吾人现遭遇一种形势，而必须恢复日本之经济至日人能以自矜之程度。盖无人能期望美国赋税之担负者无限期继续支付日人之用费也。必须予日本以自给之机会，否则日本不仅对美国即对中国亦将为一种延续之担负 按 不 能自存之国家乃维持安全与和平之威胁。不能自存之国民，将永不能成为爱好和平与有民主思想之国民。倘谓工业能改造以克战时之用，余承认此说之真理，按近代战争中任何生产均可克作战之用，粮食即为一种战时产品，纺织品亦为一种战时产品，任何消费在近代战争中均属必要。务使此项产品供平时之用，此乃吾人责任。倘吾人于此一方面合作，则此项工作自属简易得多，倘吾人于此一方面有所争讼，则困难重重矣。

如指摘日本之经济复兴将为中国经济之威胁，则余否认之。查世界人民对于物质及服务之要求，远较全球各国在可以预料之将来所能希望满足者为大，反之，如使日本无限期沦为一不能自存之国家，将继续减低全球之生活标准，世界将丧日本所能生产者，亦将丧日本之市场，日本亦将继续为吾人已经缺乏之资源消耗者，如使日人成为饥饿不安之人民，则日本亦将继续为和平之威胁。此种情形适为共产主义之所需。如吾人诚意为一般利益计，必须制止共产主义，则吾人必须消灭鼓励共产主义之因素。

鼓励或参加反美对日政策诸君，对余之所言如不同意，则诸君必须准备承受行动之结果。倘诸君内心深以余言为有理，而仍为其他阴谋继续诸君之运动，则余可告诸君此为反躬自省之时矣。倘诸君师法欺诈以企达成其阴谋，是诸君不仅损害美国，抑且损害诸君之祖国，且亦损害中国学生与知识分子之地位与名誉。诸君最佳及最忠实之努力，乃现为贵国所迫切需要者。诸君实处于中国明了真理最优秀分子之地位，倘诸君有负真理，亦即有负于自身，如对自身不忠，则对任何人任何事亦绝不能忠诚也。

余毋庸强调余对中国学生团体之情感，如余之生平不足以证明之，是即余毕生之完全失败。谅诸君将接受余本愿意之精神而不得不吐逆耳之言。余之最大愿望为全球人民之和平与幸福。非中美两国间能互以诚信相处，则将危及和平与幸福。余深信中国学生当不致明知而自愿被利用于歧途而有负其国家所赋予之信任。

同时本人愿向诸君保证，中国人民所遭日人之痛苦，以及中国如何英勇抵抗侵略均为余所深知，本人曾为日人之战俘，故深知其意义，余亦知美国人民详悉中国之重大牺牲，并深感于中国对击败吾人共同敌人大公无私之贡献。虽中国对于日本有足可谅解之痛恨，但余亦当有所说明，对惨剧重复发生之最佳保证为睿智沉着及目标之一致，在目前世界之烦恼局面中，吾人间之误会实绝对不能存在。

诸君与美国人民对日本之关切，实属相同，吾人不欲有一共产之日本，而防止此种灾难最妥善之方法，则为使日人能自谋生计。

（1948年6月5日《大公报》）

祝五路大捷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

新华社社论

在一连串兴奋人心的大捷声中，人民解放军迈着雄壮的步伐，胜利地跨进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在中原、华北和华东战场上，我军都打了大胜仗。

豫东开封、睢杞两次大捷，是最近时期我军在中原解放区内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胜利。这两个战役经过一个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近十万人，一度解放河南省会开封，活捉蒋匪兵团司令区寿年及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襄樊之捷，歼敌两万余人，活捉著名的特务匪首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及副司令郭勋祺，控制了汉水中段。这是中原我军最近又一辉煌的胜利。

晋中地区我华北人民解放军进攻太原区，一个多月来，歼灭阎锡山匪军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五个军司令部，九个多师，两个总队，解放了太原以外的一切地方，活捉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及许多师长。我军进展之速，有如秋风扫落叶。现阎匪残余，已缩守太原孤城，山西省会的解放，与阎锡山匪军的彻底消灭，已经不远了。

在平津保周围地区，我华北人民解放军另一兵团与冀察热辽人民解放军一部，五十天来进行了连续的作战，先在冀东地区，袭占丰润，破击平古线，攻克昌黎，歼敌交警第八总队第五总队等部一万三千人，然后我另一部又在北平保定之间作战，歼敌暂编三十一师，扫荡土匪王凤岗的巢穴，切断了北平与保定间的交通，使河北省会保定陷于孤立。

华东我军，从昌潍战役起，在胶济津浦两线及在苏北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歼敌十万以上，解放城市十八座。在攻克战略要地兖州之战中，活捉蒋匪整编第十二军军长霍守义，并在大汶口战斗中大部歼灭汉奸吴化文部整编八十四师，山东省会济南城已经完全孤立。蒋匪重要军事基地之一的徐州，则已变为最前线的城市之一。

这一连串的大胜利，无疑的，又给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极为严重的打击，使它的全盘战略更加陷于被动，并为人民解放军今后在一切战场上的胜利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这一连串的大胜利，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指导，是完全正确的，是唯一的胜利的战略方针。一切反动派，不论是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或“重点进攻”，也不论是他的“全面防御”或“重点防御”，不论是傅作义的“主力对主力”，“穿心战术”，不论是白崇禧的“攻势防御”，都是不可避免地要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受到多次的失败之后，赖以对付人民解放军最后一张王牌，就是依靠他们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以自保，他们以为人民解放军无论如何也不能攻克他们坚固的设防地带和城市。然而，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夺取了敌人成千门的大炮之后，就建立了具有强大威力的人民的炮兵，从此，人民解放军不独在运动的野战中是无敌的，就是在阵地战中也是无敌的了。一年来我们攻克了石家庄、运城、临汾、宝鸡、潍县、兖州、洛阳、开封、襄阳、辽阳、鞍山、四平街等坚固的设防地带与设防城市。这就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术，特别是攻坚战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这自然要使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匪帮震惊失色，因为他们最后赖以自保的一张王牌也完全无用了。然而，这只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供给了人民解放军大批大炮之后，才出现了这一新的情况的。现在，美帝国主义仍在大批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枪炮，可见它是愿意继续担任我军输送队的任务了。

我军不仅在军事上打了大胜仗，并且在政治上也继续地打了大胜仗，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真正在人民解放军中上下一致地贯彻执行了。此次我军在开封所表现的优良纪律与正确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例子。这说明了我军政治质量有更进一步的提高。我军深得民心，受到一切反美反蒋人民的衷心拥护，蒋匪失了民心，受到所有人民的痛恨，这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根本原因。正确地继续进行新式整军，时刻不懈地提高我军将士的政治觉悟，整饬纪律，贯彻政策教育，是有极重要意义的工作。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敌人在黄河以北，除了平绥、平锦两条铁路及在这两条铁路上的城镇外，只有沈阳、长春、承德、保定、太原、安阳、新乡、焦作等稀稀落落的几个据点了。在这个广大而富庶的地区内，干净彻底全部消灭国民党匪军的日子，已经不远。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四个大解放区之间完全打成一片的局面，将要实现了。黄河以南，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一年来有很大的生长。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超过了战前的规模；豫皖苏、豫西、陕南、桐柏、江汉、苏北、苏中各解放区，都在发展或恢复之中；江淮军区已经建立，大别山游击战争正在坚持。中原战场上的形势，早已不利于蒋介石了。此次豫东大战，蒋介石对伪立法院保证开封决不会丢，亲自到开封上空指挥作战，然而开封竟被我军解放。蒋匪军队赶到开封，喘息未定，我军又在睢县杞县地区活捉他的兵团司令，在东边打下兖州，在南边打下襄阳，现在，济南与徐州又在告急。蒋介石充当伪总统的前几天即四月九日，曾经对他的一群猪仔所谓国大代表发出诺言，说他一定可以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内肃清中原人民解放军。三个月早已过去了，我们看见被肃清的是蒋介石所宠爱的特务匪首康泽，是他的兵团司令区寿年等等。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

战争第三年开始时的巨大胜利及其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与美国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使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蒋介石这个奴才，再次直呼其名加以呵斥，并威吓着要他滚蛋，甚至不惜冒险地准备要蒋介石下野出洋，让其他伪装反蒋反内战反独裁的军人政客，来进行假和平的阴谋，以图能取得喘息机会，重整兵力，卷土重来。但人民解放军正在胜利前进，中国人民已经觉悟到不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不赶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是没有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可言的。凡不真正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就不会真正反蒋，反内战，反独裁，也不会有真民主，真和平。故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仍将不能挽救国民党反动统治垂危的命运。

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内部，好象一群海盗，在将要沉没的破船上，互相咒骂，互相厮打，穷凶极恶地抢夺他们认为可以救命的东西。豫东之战，蒋介石对他的主子和部下，伪造所谓“大捷”的消息，以图欺骗。蒋介石是向来讲究什么“连坐法”的，这次豫东作战，蒋介石亲自指挥，丧师十万，开封不保，并使兖州襄阳失陷，直接负责者就是蒋介石自己，所以他只能讲“胜利”，只能把被全部干净彻底歼灭的七十五师称为最有功劳的部队，不能讲连坐法了。蒋介石对其主子和部下，不能不采取这样的欺骗手段，这就表示，蒋介石的万恶统治，已经到了最后崩溃的边缘了。

人民解放军以伟大的胜利，揭开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序幕。我们热烈庆祝这些胜利，并预祝今后更大的胜利。一切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势力必定失败，人民的力量必定胜利。让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中国将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将永远不允许任何侵略者与反动派在这块土地上藏垢纳污，为非作歹。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新华社社论

一九四六年七月，为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发动反革命的全国规模的战争，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则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起来反抗这种反革命战争，举行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战争，到现在已经打了两个整年，进入第三年了。在战争的第二年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起了些什么新的变化，发生了些什么新的情况呢？在这种新的变化新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过去一年，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军事情况的基本特点，就是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则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过去一年中，在南线，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内先后渡过黄河、越过陇海路、进入中原以后，建立了北起陇海路、南抵长江、东抵大别山以东巢湖至徐州之线、西抵汉水以西沙市至安康之线、拥有人口三千万的中原解放区。在西线，西北解放军去年八月转入反攻，此后不但收复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绝大部分，而且解放了黄龙山区，与黄河东岸的解放区完全衔接，并一度解放了麟游山区。在东线，华东解放军去年十月转入反攻，接着收复了山东解放区的绝大部分，肃清了济南青岛之间的胶济线和济南徐州间的津浦线，与运河以西的冀鲁豫解放区衔接；陇海路南，也收复了苏北的六座县城，并重行建立了安徽东部的解放区（江淮解放区），而与中原解放区打通。在东北，经过过去一年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和热河方面的作战，东北和热河的百分之九十七的土地都已获得解放。在华北，除太原孤城正在围攻以外，敌人留在华北解放区中心的据点已经全部肃清，从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这两大解放区获得了合并的条件，并与山东和晋绥解放区完全衔接。

解放军在第二年作战中消灭敌人兵力共达一百五十二万余人，其中俘虏九十五万三千人，毙伤五十四万人，争取起义二万八千人；解放土地十五万五千方公里，人口三千七百万。截至今年六月底止，解放区的总面积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二十四点五，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十七。

人民解放战争在过去一年中的伟大胜利，首先是由于坚决执行了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一方面，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从而使解放区得以广泛地联成一片，并恢复相对的安定，以便完成土地改

革，发展生产建设，加强支援前线；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广了革命斗争的规模和影响，造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由于解放军的进攻，控制中国南部、西部以及北部少数点线的敌人，是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勇气和信心，是大大加强起来了。美国反动派所导演的所谓国民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和扩大政府基础这一项戏法在过去一年已经演完，但在中国革命人民的怒潮冲击之下是悲惨地失败了。其次，过去一年的伟大胜利，还由于解放军的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的提高。在战争的第二年中，我军收复和解放的城市，不但比第一年大为增多（两年得失相较，第一年我失四十五座，第二年我得一百六十四座），不但其中包括了大量有军事、政治、经济重要性的城市，而且其中的鞍山、四平、潍县、石家庄、运城、临汾、洛阳，以及一度解放的宝鸡、开封，和今年七月解放的兖州、襄阳等处，都是敌人强固设防的城市，在经过解放军的强攻之后才占领的。这些城市的占领，与解放军的转入进攻一样，大大地改变了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也大大地改变了全国和全世界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前途的认识。

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们，起先是不愿意承认解放军有什么全面进攻；而在不得不承认以后，即迅速地陷于混乱和绝望。他们曾经想过种种方法，作过种种计划，开过种种检讨和争辩的会议，骂过、办过、换过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以及前线的总司令在内。但是他们看不见任何能够抵抗解放军进攻的希望。蒋介石在这次内战的第一年曾经实行全面进攻及重点进攻；失败之后，在去年下半年则企图实行全面防御；到今年上半年，就大体上被迫采用所谓重点防御来企图保守少数要点，并减少兵力的损失。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达到目的，都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失败了。他实行了重点防御的城市，正是在过去半年内就有许多被解放军所连续地攻克。而他在第二年所损失的兵力，也比第一年的数字一百十二万人多了百分之三十六。蒋介石所最害怕的他的指挥机关和整个建制部队的损失也增加了：第一年他损失了九个整编师师部和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他却损失了三个整编军军部，二十个整编师师部和四十九个整旅（非正规军的十七个整旅尚未计入）。所有这些第二年的数字，都不包含今年七月各个战场的发展在内。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早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的防御，也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所最后赖以抵抗解放军保存自己的设防城市与设防地带，在解放军攻坚能力大大提高的条件下，又已证明并在以后还要不断证明其失败，那末，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又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抵抗解放军的进攻和阻止解放军的胜利呢？他们的彻底失败，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与过去一年的伟大军事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法大纲，按照这个土地法大纲，在大部分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领导了和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这不但为解放区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因为它符合于全国农民及其他广大人民的要求，又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二、解放军进入新区作战，并解放许多城市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在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训练了大批的干部，因而使得共产党

不独是对于农村，而且对于城市，对于工商业，也完全规定了正确的政策。而这些，乃是实现全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第三、广大的中间阶层迅速地失去了对于和平改良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转而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并且敢于把这种希望公开表示出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时局的基本主张，特别是在今年五月一日所提出的召开没有帝国主义走狗及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热烈拥护。

而在蒋介石方面，则一切恰恰与此相反。蒋介石在过去一年内曾经对人民实行疯狂的压迫和掠夺。但是在他的压迫之下，人民的反抗继续高涨；在他的掠夺之下，他的经济财政危机更加严重。蒋介石把手伸向美帝国主义。在过去一年内，他从美国领得了一九四七年十月的"救济贷款"二千七百七十万美元，同年十二月的"临时援助"一千八百万美元，和今年六月"援华计划贷款"四亿美元。虽然这个数目仅及抗战以来迄今美援总额（据不完全统计为六十六亿美元）的十五分之一，但蒋介石所支付的代价，举其大者，即有允许美国"共同开发"台湾、海南岛、整个广东以至整个华南，并取得长江航行权；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权力；扩大任用美国顾问到南京政府的一切部门，接受中美双边协定，使美国比中美商约进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经济，并使南京政府正式处于受监督的地位；在国际上听命于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听命于美国的对日政策等等。

除开这些以外，在实际上蒋介石还支付了更多的东西。蒋介石既然在卖国贼的身份上变为汪精卫第二，他在傀儡的身份上也就不能不变为汪精卫第二。蒋介石把中国的权益给美帝国主义送得愈多，他所受到的奚落、侮辱和责骂也就愈多。美国侵略者看到蒋介石只有能力给他们消耗和送掉东西，而没有能力给他们看守东西，因此就决定直接跟他的"部下"打交道。美国人现在除了直接栽培着台湾的孙立人，广东的宋子文以外，还直接栽培着南京的"副总统"李宗仁，"国防部长"何应钦，华北的傅作义、阎锡山，西北的马鸿逵、马步芳、乃至某些著名的蒋介石嫡系黄埔军阀，或者直接供给他们武器，或者领导他们进行各种政治策动，特别是一种所谓去掉蒋介石的"和平"运动。这样，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在美国的"援助"之下，就不但日益丧失人心，日益威信扫地，日益分崩离析，而且连蒋介石本人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看到：经过过去两年空前规模与空前激烈的战争，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御的了。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则已变得更加没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们的统治，已经走到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在强大人民力量继续的锤击之下，他们的最后死亡，已经是不很远了。毛泽东同志在半年前就说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复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

点。”半年来各方面形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同志这一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由于中国的面积如此广大，人民如此众多，二者差不多都等于整个欧洲，由于其社会的发展如此复杂和不平衡，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象蔓草一样盘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在一次或几次简单的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的，中国的反动势力是不会在一次或几次打击之下就能完全消灭的。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在广大的地区内，彻底消灭了反动势力，但是反动势力仍然在另外的广大地区内存在，而且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之下，仍然还有他们一定的力量，并继续压迫那里的人民，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敌人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被夺取，反动势力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在斗争过程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间歇和曲折，仍然还是可能有的。那些以为中国革命会在一次或几次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并在具体斗争中抱轻敌态度的人们，或者以为它会完全一帆风顺，不会有任何暂时的、局部的曲折，而在遇到这种曲折时就感觉迷乱的人们，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完全清醒地认识了并克服了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这些困难，中国人民才取得了过去两年的伟大胜利。同样，毫无疑问地，在战争的第三年中，中国人民将继续克服困难，取得更伟大的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为了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的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应该着重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呢？

为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首先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决克服一切困难，把革命战争继续扩大和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以便继续大量地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进一步摧毁反动集团的战争机构，解放更多的人民，进一步把反革命战争的人力物力变为革命战争的人力物力，并进一步统一和巩固革命战争的基本根据地。必须向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特别是担任外线作战的指战员，详细解释目前战争的形势及其前途，和继续发展这种进攻的重大战略意义；告诉他们在外线作战特别是有些时候在无后方作战中一切可能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和经验；告诉他们人民解放军的补给主要地必须来自前线来自敌人的基本方针；表扬过去一年中许多部队勇敢深入敌后，在各种艰苦条件下坚决完成任务的光荣范例，并克服在某些指战员中可能存在的害怕困难、夸大困难、不愿到敌区去作战的错误倾向。必须在部队中继续加强攻坚的战术教育，加强对于新区和城市的政策教育，加强在部队内部发展民主、巩固纪律以及迅速改造俘虏、节约使用民力等项教育，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关于这些，过去一年内各个部队都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良好经验，应该多多总结推广。

为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引起全党全军来认真研究和正确执行对于新区和新解放城市的政策。对于新区和新解放城市，应当首先区别其是否可以巩固地占领。凡在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地方，第一个要正确解决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必须坚决消灭一切反动武装力量（包括国民党军队、地主武装、土匪等），解散一切反革命组织，逮捕一切持枪抵抗的分子、真正的破坏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魁，没收真正的官僚资本和真正反革命罪魁的财产，以便建立人民的统治；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须

严格规定逮捕和没收只能限于上述的范围，并只能由指定的组织来执行，又必须切实保护除此以外的一切公私财产、一切守法的民间工商业者（无论其经营的规模如何）、守法的文化宗教团体和守法的外侨不受侵害，又必须尽量留用国民党经济教育机关中的守法人员及其他可以留用的人员，以便安定社会的秩序，避免过渡期间的混乱和脱节。只有在采取了上述措施以后，才能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逐步地进行必要的和有一定限界的社会改革的工作。新区的土地改革，除了在长期受解放区包围而具有分配土地的充分条件的地方以外，一般应当首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和合理负担政策，以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来完成新区最迫切的斗争任务——消灭反动武装力量和打击人人痛恨的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并使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能够逐步提高。城市中社会改革的任务和方法，与农村中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完全不同，其所应采取的步骤也应当更为慎重。城市中的革命对象今天一般地只限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和真正的官僚资本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不是革命，而是联合和改良。对于城市中的生产资料，除了确实被官僚资本所强占并可能发还的民间工商业财产，仍应发还，以利生产的发展以外，其他一律不得分散，并应尽一切力量保证其继续生产或恢复生产。在战争中的城市人民，和农村人民一样，可能遭受战时一定的生活上的困难，这种由反革命统治和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不可能希望在一个早上就得到解决，一切左倾冒险主义的办法只能造成更大更长久的困难；但是也和在农村中一样，这种困难可以而且必须由发展生产来解决。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也同样除开依靠领导上的计划性而外，必须依靠于发展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为达此目的，就需要在一切公私企业中实行必要的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需要适当地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并适当地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总之，依靠生产，依靠从事生产的群众，热情的团结他们并向他们虚心地学习，这是革命的共产党人与封建的买办的国民党官僚之间的原则区别；遵守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进步，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城市管理得跟农村一样好。并在城市中逐步地展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以上是说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地方。至于在暂时不能巩固地占领的地方，在游击区，社会改革的范围就更应当缩小到适合游击战争的程度；而在只能暂时经过的农村和暂时占领的城市，则不应企图实行社会改革，而应尽可能少逮捕，少没收，并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以免引起对当地人民和解放军都是有害无益的损失。

为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第三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解放区全力提高生产。在一切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农村，应当确定地权，调整和竭力减轻民负，给一切进行生产的农村人口以必要和可能的援助，使他们安心发展农业生产。在还需要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完成土地改革，并迅速地转入生产。在某些发生灾荒的县份，应当根据过去成功的救灾经验，使救灾与生产相结合，并撇开一切不急之务，以生产救灾为唯一的重要工作。对于工业生产，应当看得与农业生产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应当仔细保护一切已有的工厂、矿山、铁路、公路，使其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利用。一切后方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的利益，正如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于解放战争的利益一样；

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持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直到最后胜利。

为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第四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政治上继续提高全国人民的觉悟，在组织上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应当及时地揭露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集团正在积极筹划的所谓反蒋的“和平”阴谋。应当告诉人民：中国的内战不是任何别的东西造成的，这是由武装到牙齿的中国万恶反动派在美国侵略者大量援助之下所造成的；因此，为了得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彻底解除万恶反动派的全部武装，摧毁一切反对人民的反动统治机构，废除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侵略特权，广泛实现各民主阶级人民的民主权利；否则，任何口头上的“和平”计划事实上只能是为凶恶的战争计划作掩护和争取准备的时间。应当告诉人民：美帝国主义因为它依靠本国和各国反动派，它就不可避免地是孤立的，外强中干的，可以战胜而毫不可怕的；同样，中国反动派因为它依靠外国侵略者，也就不可避免地是孤立的，外强中干的，可以彻底消灭，应当彻底消灭，而决不应当功亏一篑，养虎贻患。我们愿意很快地结束战争，并很快地得到和平，但是中国的反动势力不完全消灭，美国的侵略势力不退出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完全实现，是不能有真正的和平的。除开揭露反动派“和平”阴谋外，随着解放战争的继续发展还应当积极准备于适当时机和适当地点，实现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帝国主义走狗及反动分子参加的完全革命的政治协商会议，以便进一步统一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

为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最后和最有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使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加成热，就是要使党的政策在全党更能统一贯彻，就是要克服党内的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政府无纪律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统一，乃是中国人民更加觉悟更加团结的集中表现和根本前提。如果缺少这个根本前提，如果不从这个根本方面作严肃的努力，那末，战争的胜利发展，新解放区的扩大，老解放区的巩固，广大人民的更加觉悟和更加团结，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已经有了三百万党员的大党，现在正处于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最伟大年代，担负着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最重要任务。把我们的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一步，使之从适应于地方性的比较分散、比较单纯、比较迟缓的农村的工作和比较小规模的战争，转变为适应于领导全国范围的、轰轰烈烈的、千头万绪的、日新月异的大革命和大战争，是再也没有比现在更迫切的了。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这个需要，而且我们已经在我党的坚固基础之上着手解决这个需要，那末，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毅力地坚持下去，我们就有了保证，足以在第三年战争中赢得更伟大的、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并且在未来几年的岁月中，赢得全国的胜利。

（转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四集）

给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复电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毛 泽 东

李济琛、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8年8月5日《东北日报》）

〔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来电

（一九四八年五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佩。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李济琛、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

〔附〕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告同胞书（摘要）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留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十月十日发表联合告海内外同胞书。署名者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及民社党革新派等九单位。原文要点如下：

（一）南京独裁政府的所谓“戡乱”，就是与全国人民为敌；而且同时是卖国自肥的一套手法。起初，是“军事戡乱”主要目的，是要戡平工农。许多住在未解放的大都市的同胞，不明真相，以为不过是国共两党的战争，和一般人民不相干。跟着是“思想戡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批遭受残酷迫害。这时，多数工商业家，还是坐视不救。有的，甚至认为学生们罪有应得。现在，南京独裁者又举行“经济戡乱”了，造成了“无商不奸”的局面。工商业者纷纷被捕，有的已被杀害。这时候，大家才完全明白，南京独裁政府的所谓“戡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南京独裁政府的残暴，实在超过了专制帝王。

（二）南京独裁政府在广大农村中实行“三征”的祸害，早已使农村破坏不堪。都市中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各业职工，大批被捕受刑，或被秘密处死，其遭遇比工商业家更为凄惨。在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大城市，例如开封，石家庄，济南等处则被美国供给的飞机所滥炸，伤亡数以万计，灾难之酷，又远超过了后方人民。由此证明，不问是外来的敌人，还是内部的敌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善良人民，总归是残酷的。

（三）著名亲日派首领张群跑到日本，进行所谓中日韩同盟，想把日本对我国的赔偿工厂，换成内战军火。甚至想把日本“皇军”再度引到中国内战战场上来。南京政府一方面极力挑拨美苏战争，想把中国变成国际战场；另一方面，想以全国人民生命财产的牺牲，作为苟延独裁政权的赌注。

（四）南京独裁政府的丧钟已经响了。全国各地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都应赶快起来，为打倒内外民族敌人，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而努力。中华民国的新政权，自将属于人民。可是对革命没有尽力的，势难取得发言权。时机稍纵即逝，人们对于革命贡献，不必再有迟延了。民主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我们伸出友谊的手，欢迎每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同胞参加这一反对内外敌人的共同的历史事业。

（1948年11月1日《东北日报》）

对“给晋绥同志的信”的批示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给晋绥同志的信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刘少奇

××、××、××同志转××同志：

从兴县到原平，沿途看了山地农民许多穷困及破产的现象，特别是他们没有衣服穿，如在贵州所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的情形，更加刺目，许多农民，多年未制过衣服，一家几口人，共穿一套烂衣服，但农民也常有偷运粮食到太原附近去换布匹的，不幸又常被我们的缉私队缉获没收。这一问题已成为宁武、静乐农民最迫切的问题，冀察晋本有大批土布要向晋西北输出，也因税收机关要收百分之二十的税，而不能进口。因此我已告诉地委同志，要他们向你们提议，取消冀察晋布匹的进口税，但是为了保护临县、兴县一带的纺织手工业，可限制布匹进口到一定的数量。农民要用粮食到太原去换布者，决不能没收，如果估计可以出口一部粮食去换布的话，应帮助农民有计划有限制的出口一部份。因为在某些地方完全禁止粮食出口，等于封死农民，而目前农民对布匹的要求，甚至比要求土地更为急迫。

在沿途稍许询问了一下群众运动的情况，虽然有些地方农民已分得若干土地，有些地主被斗争，有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工作，但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能彻底的。据六地委报告：五个县共一千五百多村，已发动者九百多村，农民已分得土地者二百多村。但这二百多村是分散在五个县，不成一片。因此，他们至今没有一个县甚至没有一个区是已经像样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地委也曾用强有力的工作团以一二月的时间去解决一个村子的土地问题，但不能用这个村子作为出发点，去推动附近村庄的运动，把附近的问题解决，并改造区政府、县政府及区县其他机构，以便依靠这个区县政府，由上而下的有步骤的发动全区全县的群众，解决全区全县的土地问题，并保障这个村子的群众的胜利。他们只作好一个村子，附近村子及县区机构都不动，这个村子即如海中孤岛，十分孤立。工作团一走，群众的胜利即无保障，工作又可能塌台。这种情形，即在兴县临县地区也有。比如郝家坡的群众胜利，如果不迅速推广，使附近村子的群众也胜利，如果不使区县政府确实掌握在群众代表的手中，郝家坡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

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目前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计划的去组织这样一个群众运动，并正确的把这个运动领导到底。要使这个群众运动有很好的开始，有很好的深入和推广，又有很好的结束和转变。在以前，你们有很多的开始是不好的，所以不得不停止重来。但也有些是开始得很好的，但又是分散的零碎的，没有把它推广和发展，甚至也把它停止下来，所以没有形

成广泛的运动。这点经验应该记取。

为了要有很好的开始，不能不依靠强有力的工作团。但仅仅依靠工作团，决不能普遍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有几万个村子，我们决不能组织这许多工作团去一一解决。所以土地问题的普遍解决，必需而且主要的是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在个别的村子的典型运动开始后，周围村子的群众就自动照样开始，使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不应害怕这样的自发运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自发运动，应加以鼓励促成，并尽可能给以组织性和纪律性。只要有真正广大的群众（而不是少数二流子及干部），只要这种运动的领导不是操在坏人手里，只要我们在这种运动起来之后，不是置之不管，而是及时派一些忠实而有能力的干部去掌握其领导，并从群众中培养教育成批的领导分子，这种运动是不会有危险的。

你们给一个工作团的任务，不应只给一个或几个村，而应给一个或几个县。虽然工作团可以亲自从一个或几个村开始工作，发动群众，但他们的任务是发动全县全区的群众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一待群众运动普遍到一县的许多地区以后，工作团的指挥位置即应以县委县政府为中心，在普遍到几县以后，即须以地委专署为中心。此时工作团应将原来一切机构拿到手中，发出各种号召和办法，给群众撑腰，鼓励群众，给地主及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以打击，批准群众在正义行动中所获得的一切。如此，全县全区的问题即可解决。

在我们经过崞县时，几百户、几千户的村庄甚多。这些地方的群众运动很易成为潮流，但必须有强的领导。你们应首先集中力量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首先选择人口最多的五六个县来加以解决，甚为必要。山沟老区问题可以留待后来解决。在运动中要注意培养全村全区全县人人熟悉的群众领袖，群众有事都能找这种领袖解决。这种领袖应该是毫不自私的，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并代表群众的，作风正确，信任群众，不强迫命令群众的。这种人不论是本地人外地人，老干部或新干部均可，但必须特别注意培养正派的本地干部为领袖。只要群众公认某人为他们的领袖，信任他，有事都找他解决，在群众选举下，这种人即应成为农会会长或政府的负责人。派在工作团的某些人员，也完全不应拒绝成为某些地方的领袖。只有这种领袖成批形成，原来不好的作风才能改造，群众对党的看法也才能改变。因为以前群众是把我们某些自私自利强迫命令群众的干部，看成是党的代表人物，所以培养一些这样的领袖使他们在群众中突出，是更有必要的。

沿途听到了许多我们干部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的自动性与运动的自发性的例子。在某些地方，群众要斗争某家地主或恶霸，而我们的政府或干部则以各种“理由”不许群众斗争，阻止群众行动；另一方面，当群众还没有起来向地主斗争时，我们的干部却硬要群众去斗争，由农会收回许多土地分给农民，但农民不要。所以有的土地至今未分。我们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份子或明或暗的有意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在六分区听到军民关系仍是很不好。人民以至县委的干部很怕军队及军队中的人员。而军队中的人员打骂人民及地方干部者，仍大有人在，据说最近还有些发展。这恐

怕与地主阶级反对土地改革有直接关系。军队中某些人员干涉地方工作，反对群众运动，打骂行为，有许多是受了地主的直接影响。这种事在群众运动更普遍深入时，还会要加多。望你们警惕！最好由政治部开个会议来检讨一下这问题。或者下个命令，叫军队必须帮助农民向地主斗争，不得有庇护地主及阻碍或破坏群众的行为。凡有个别军队人员直接去禁止群众反对地主者，准许群众捆送就近的军事机关给予处分。

六地委的同志，也不相信依靠现有的机构，能够普遍的很好的完成土地改革。因此，我把组织精选的工作团，及建立贫农小组与农会的补充方式告诉了他们，他们觉得这种补充方式是能够完成任务，并且是他们能够办到的。我还和他们讨论过，在开始时期，坏的二流子及与地主有勾结的贫农雇农份子，暂时不吸收加入贫农小组等问题。据他们说，采用这种方式，党政民机构中恐有相当大的一批干部要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抛弃。因此，我也和他们讨论过如何争取与教育改造这批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同志向我提出的问题，也是××同志曾反复考虑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原则的解决，应该是这样：一方面，我们任何干部，包括各级的负责人在内，均必须受群众的切实的、毫不敷衍的考察和鉴定。群众有完全的权力和自由批评与撤换我们任何干部，在各种会议上令他们报告工作及答覆群众所提出的质问，指出他们的缺点，揭发他们的错误，选举或不选举他们到领导机关。群众的这种权力，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使其不受侵犯。任何党政军机关，对于侵犯群众这些民主权力的任何行为，对于受到群众批评和反对的干部向群众施行任何报复的行为，应该认为是严重的犯罪，必须给以惩处。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毫不动摇的切实实行。我们不能姑息我们的干部，而稍稍阻止群众对我们任何干部任何错误缺点的揭发与批评。应该撤换我们这些干部。因为保卫群众的民主权力，保卫群众敢于批评、揭发与撤换村、区、县等各级负责干部——人民自己的勤务员——的积极性和勇气，比爱惜我们某些干部是更为重要的，是不可比拟的更为重要的。如果群众没有这种最低限度的勇气，群众就不能压服地主阶级。群众如果还怕我们的干部，害怕我们的干部不正义的报复行为，那群众将更怕地主和恶霸。也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政府内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才能肃清社会上几千年来的封建残余。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群众的自信力，鼓励群众这样做，鼓励群众来批评、考察、鉴定与自由调换我们的干部。对于我们干部的这种群众鉴定，应成为党对于干部鉴定的主要根据。由被领导的群众来考察与鉴定我们的干部，这在七大是已被承认了的原则。××同志如果在这一点上还有顾虑及不敢放手的想法的话，那就是不妥当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群众对于事情，对于我们干部的考察和看法，是从一个方面，即是说是从下面来观察的，所以也有一定的限制；正如我们也是从一个方面，即是说是从上面来看事情和干部，也有一定的限制一样。比如群众看到我们干部的强迫命令，但常常不能看到这个事实的全部情形。事实上我们有不少的干部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这样去作的，而这些任务，或者是为着革命战争的需要不得不要求群众负担，或者是直接满足群众要求，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但是许多干部违背群众路线，没有把这些任务的意义向群众解释，而用很恶劣的方法去执行，这就造成了错误。干部们所以

犯这种错误，有的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级的指导，有的也因为上级没有好的指导。此外还可能有些任务，其本身就有问题，就需要依照群众的意见加以修改。群众因为不明瞭全部的情形，他们对于我们干部的批评与鉴定，是免不了会有一些偏向的。所以我们必须综合这两方面的观察——群众的观察与我们领导方面的观察，才能有较正确的观察。这是斯大林在一个报告中说过的，我们也应该应用来解决你们那里的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的民主，让群众对我们的干部作自由的选择；但在另一方面，你们必须公开在群众中宣布这些干部的错误与缺点，绝大部份应由领导机关负其责任。领导机关应有足够的自我批评，号召干部改变作风，承认错误，以发动群众中的民主，才能使干部服气，并减少地主份子利用的机会。同时，对于被群众反对与撤换的干部，应该采取一律争取教育与改造的方针，调他们到训练班或党校进行改变作风的学习及人民立场的学习，在学习以后有进步者，可派他们到外县外村工作，给予重新取得群众信任的机会。如此，可免抛弃一些可改造教育的干部，也可减少坏份子鼓动的藉口。只对于那些犯了罪需要审判的人，及拒绝争取拒绝学习的人，才不应去可惜他们。我想，实行这两方面的办法，是不会有大的错误的。××同志与××同志所顾虑的问题，或可得到统一的解决。不知你们以为然否？

我在路上想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如此。特写给你们，作为你们的参考。

祝你们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二十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改革，已有巨大的成绩及丰富的经验。今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

第一条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第五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六条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第七条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第九条　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第十条　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己）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第十二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设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盗、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五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六条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第一次总结报告

（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

刘 少 奇

决议写失败了，要再写一个。没办法和大家商量，讲一讲再说。有些问题我也还没肯定，材料不够。决议不能长，类似五四指示，原则上明确，具体办法不肯定，给各地机动。

（一）估　计

一年来土地改革。所有各解放区农民都进行了土改运动，胜利也是空前的，但仍在继续，故此，还在开始。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内战时也没这样大，这样有计划有组织。但只是开始。有些地方比较彻底，如晋冀鲁豫、苏北。但也仅是部份比较彻底，又仅在“斗地主方面”，分配还不合理。其他大部地区则很不彻底。在全国还是小部，如蒋管区。如在全国进行一个彻底的土改，那这个工作还很大。

土改基本上讲，就是平分土地：地主地分了，富农分了一部，贫雇农得到了土地。结果就是“大体上的平分土地”。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完成了一个革命。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完成。

但是，就是在全国范围达到“土地大体平均”，也还只是“革命胜利的开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开始”。还有很多任务，即在土地问题上，也还有很多工作。土地国有，生产，直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场，才没有了土地问题。但农民问题的解决，那还远得很。故农民最后解放，只有到社会主义。只有到社会主义，贫苦农民问题才能解决。天灾、疾病、娶老婆、生儿子才都有保证，不再失掉土地，免于贫困。并且直到集体农庄，消灭了城乡的矛盾，才没有农民问题。拉闲时，可向农民讲。有土地买卖，农民即可失掉土地。

现在，土改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在基本问题上空前伟大的运动，胜利也是空前的，但仅在开始。

运动的性质，就是“农民运动”，农民解放。因此农民阵营的这个队伍，以贫雇农、乡村工人为基干，联合全体中农及一切反封建份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主和大部份（不是全部）带封建性的富农。第一部份人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猛烈进攻。第二部份人强烈反抗。这个运动逐渐走上深入和彻底的解决。也就是随着农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随着地主富农的反抗，随着自卫战争的胜利，达到土地所有大体平均，就大体告一段落。

少数地区比较彻底，就有很大不同。地主富农封建部份土地分了，政治上低了头。农民觉悟空前提高，欢天喜地，十分积极。拥护军队，踊入军队，并改造了我们军队。晋冀鲁豫互助组，一老战士，一俘虏兵，一翻身农民，即政治战士。同时要求改造政府，也要求“改造共产党”。农民得地后，即很关心“解放军、政府和共产党”，这是政治要求，没有高度觉悟不可能。绝大多数农民群众有这样要求，对我们党的条件，是空前有利的。我们要充分运用。这也叫做“土改的果实”！是政治的果实，比经济上的“土地、房屋、牲畜、生产工具”，还远远高贵。即所谓“政治果实、组织果实，军队果实”。——也要好好分配一番，每人一份。这和军队打胜仗直接有关。本区军事有缺点，并土改也不好。文化也有果实，可是我们文化同志不去要。农民觉悟不高，一方面是独占，一方面是不晓得要。如苏联十月革命，土改中富农多分，以后才由“贫农委员会”再分。彻底后，各方面出现了新面貌，全国土改完成，全国就都是这样子。但还可更彻底。

现在，可惜的是大部地区还不彻底。当然也要说也有成绩！即贫雇农没有很好组织起来，要求没有满足，因此觉悟程度也不高。甚至有些地区“他们还是农村最受压迫的阶级”，说他们是“穷顽固、二流子、死狗！”最不幸的，出自“共产党员之口”，这个共产党就成问题。这个阶层，还处在无权地位。因此他们说“没翻身，翻个半身、翻个空身！”

另一方面，地主阶级虽受一些打击，但还保留很多倍土地，并用各种办法，直接间接控制农民，甚至向农民报复，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就没有新气象，支战也不行。

（二）为什么不彻底

一年来，至少有这两种情况。现在问题是：比较彻底的，如何再彻底一些。政治果实、组织果实、文化果实都彻底一些。不彻底的，要彻底。这就是任务。

不彻底，怎样彻底？

先研究一下原因。有客观：时间太短（一年，明年就不能这样讲），领导上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不够。但是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在“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组织、团结起来”。即队伍没组织起，或是乱队伍，打仗即打败仗。关键在此。故“土改的一切，决定于农民的发动！”

再进一步问，农民没有很好发动、组织、团结，原因又何在？这就在于地主阶级及富农的阻碍和破坏。对地主阶级不能丝毫轻视。凡不彻底处，都轻视了地主，打了败仗。另一方面，即我们领导机关的动摇和官僚主义。再有，全国、全解放区都是如此，即“党内严重不纯洁的状态”。这就大大便利了地主反对农民；大大不便利农民组织，团结，反对地主。因此，在解放区地主还能破坏，阻碍农民，就是因为“领导上的动摇，官僚，与党内不纯洁状态”。因此这就是不彻底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

驳一下看？是不是这样？不能说领导人讲的话，就不能驳，驳了就要不得！真理就不怕驳！作工作少犯错误，这也是一个方法。即从正面考虑，也从反面考虑。

现在讲讲正面道理。

过后同志们更多说些：土改中各阶级动态，因为这个大革命没有不表示态度的，甚至，不参加也是态度。

据我看：

地主阶级：拚死反对！后来屈服状态，也不是不反对。

富农：一部份带封建性的，也坚决反对土改。由于地主打垮，给他分地，故可早一点屈服。即是“在农民胜利的条件下，阵线巩固以后，不和地主一道反对我们”。一部份劳动起家的，可以中立。但恐慌小心，一般不赞成土改。

中农：下中农可积极参加土改。富裕中农常常恐慌。在不侵犯他利益，分到东西，才安心下来，并表示高兴，一道反封建。但总有些不同，小心动摇。待后期知道政策，即“不满分果实少”。而且在雇贫农未斗倒地主前，大多数动摇，甚至勾结地主。下降富中农一般反对土改。还有新中农。

贫农：坚决拥护土改，坚决要求向地主与富农斗争。（包括下中农，实际是次贫农，过去统计表不大对，故意把中农搞多，以表示解放区工作好。）总数恐在50%左右。如毛主席湖南农运报告，分阶级办法，基本上也合乎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土地改革的主力，不仅是基本群众”。同时，土改也基本上就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他们任何土改胜利也不会有！又想彻底，又无雇贫，即取消土改。地主一切咒骂，也就是反对他们！领导机关动摇，与此有关。

再就是“党的问题”。党的组织以及思想上有“严重不纯洁状态”！有些地方更严重！

是否夸大？各解放区都可研究一下。有些地方，还不是纯洁问题。是地主党，富农党，变质、官僚主义化的党，破坏了的党。一不小心，就被人强奸、诱奸、篡了的党，要经常警惕。列宁提出：凡是“公开了的党”（不仅掌政权）每年要清一次党，作为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一九一九年清出廿五万人（七十万）。马克思、列宁对党的纯洁性，十分注意。

为什么不纯洁？有其历史原因。

方才讲：办党人对党的纯洁性不注意，警惕不高。

再就是：抗战建党，又是抗日统战，联合国民党，联合地主一部（开明士绅即赞成抗日及一部份民主），社会政策又是减租交租。

加以：发展党不注意成份。今天证明“不强调阶级成份，阶级教育是错误的”。反对阶级成份为“唯成份论”。那第一个“唯成份论”就是“列宁”！（说天性！）当然，“真的唯成份论，只要贫农就好，那当然不对”。但现在没有“唯成份论”。一发展就很多，没有考查。因此“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不纯洁”，“阶级的严肃性不够”，因此就接受了“很多的地主富农子女入党。中农很多，对贫农不注意。有的注意是少数！”贫农在我们党内没有优势，特别在领导机关！相反，县以上，地主富农子女接近一半，一半以上或绝大多数。区乡两级也有地主富农。也不少。政权中最多，职员一般在80%以上。故实际上非三三制，为地主富农所占据。加以干部内战时与家庭无联系，现在衣

锦还乡（秘密工作，二万五千里），也都有了“亲戚、老婆、朋友、经济联系”。因此区乡干部与地主办合作社。因此，党内的中农成份，必然接受地主富农影响。所以党不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地主；而是依靠中农，压制贫农，反对地主。而中农又受地主影响，因此，贫农孤立，在党内受压制、受排斥。因此，我党组织、领导机关，与地主富农有密切联系，受包围，甚至被篡夺。对贫雇农则很疏远。因此，他们的要求、意见，呼声、反映不到党的机关中来。而一土改，地主富农议论纷纷，马上反映上来。在此情况下，要领导机关不动摇很难。当然，只有特别坚定、明确的，可能不动摇。因此，土改中我们犯的有些错误，就是“类似陈独秀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撑农民腰，撑了地主腰。因此土改不彻底，这是我们党的社会阶级的基本根源。

领导机关长期被麻痹。十年抗日统战，使领导人这种政治上的警惕性被麻痹。对党内严重不纯洁状态熟视无睹。加上“官僚主义”！即下面不反映上来，那么上面到下面去考查一番吗？如毛湖南农运考查。而我们领导人“不了解情况，又不下去考查”。特别，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光看报告，（是被歪曲、夸大、缩小，或假的）不知注意，竟乃决定政策。因此，也易于“自满”（基本上完成了！）“被利用”！“被欺骗”！这个问题是严重的。这种状态继续不改变，土改不能彻底进行。但如冒失去“彻底”，就要造成混乱！如冀察晋。即“不改变党内不纯洁状态，冒冒失失去‘彻底’，即搞乱了，左也由此来。”

地主阶级怎样反对土改？大家也讲一讲。

公开正面反对——如国民党军队，还乡团之类。

朋友面貌劝告警告的——“三三制朋友”。

党内——而这则是主要的。

地主阶级和富农反对土改，非常狡猾，各种各样，但最主要方式是钻到内部来，用党内的方式，群众内部方式，来反对土改。用各种方法，分散土地，降低成份，以后，即隐藏到群众中，取得共产党员资格，躲在“机关”“干部”掩护下，逃避农民斗争锋芒。有些组织、机关成为地主的避难所。本来，自减租起，多年如此，而现在更多。对此，地主没责任，而共产党要向农民负责。即地主很快在党内、机关内找到很多同情者，鼓动很多人。在群众中他是“防御的姿态”，在党内是“进攻的”。太行打退三次进攻（如喊左了，破坏政策等）才彻底！我们很多同志，老党员，过土豪生活，即撑地主腰，为其同化。因此，地主把阶级斗争，带到党的内部来、群众内部来，如派别斗争、挑拨等。因此，即引起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群众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因此，所谓“内部斗争”又是又不是。是“党内斗争形式进行阶级斗争”。材料还要大家研究一下。

把地主富农社会成份与出身入党的，分为几部份：（1）抗战前入党，经过考验，忠实革命，与地主断了联系。一般是好的，是能执行党的任务的。（2）抗战时期入党，父亲是地主，富农，大城市学生，外省，（一二九）与家庭没什么联系，又经过很多锻炼。一般也是可靠的。（三）本地，地主富农出身入党，有的是其子弟（学生，懂点科学知识，受点科学教育的，也可分为一种是受父命派来的，一种是自己觉悟来的），除了为了投机，派来的求保护，少数国民党特务，其他大部份是可教育的，在正

确、强的领导下可做事，但他们的观点、感情很多是地主富农的。因此，在土改中，他们自然的（自觉或不自觉）同情地主，反对农民。特别在直接革到他的家庭时，或损害其本人利益时是这样。那些投机、求保护的，当然是坚决反对土改。因此，这些人，有些是思想教育问题，但不能负责土改。有些则要洗刷。当然，实际分清很不容易。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已进入“更深入阶段”，革命已经有一个很大转变，影响到我们领导者、思想、政策。

所谓革命更深入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因此，我们党的工作也要很多变。

如有同志问：到底是“阶级战或民族战”。中国今天在反帝反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说，没有变。土地改革有变的。以前社会政策是减租，过去不贯彻消灭封建。现在要贯彻土地改革。现在，全国、全世界除地主外，还没有反对土改的。蒋也讲这样话：“在占领解放区，地主不能收回土地”。美最反动的共和党，以及魏德迈都向蒋提议“要土改”。解放区也只反对“流氓痞子土改”。政协路线也要这一条。当然他们是口头上的，因他不敢反对，反对即孤立。民社党纲领也有这条。

那么，提出“为什么不早搞”？我个人看，可“早搞，没坏处，有益处。”那时，为取得“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停止贯彻土改，在三五年三六年有好处，对。没损失！已土地革命区也不退，只有陕甘宁；换得“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在全国进行抗日运动”，他不是限制群运，而是在全国范围发展群运。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国民党已反动，一万万多人的解放区可以考虑。当然减租减息，也发动了群众。但四二年后，一定又限制在减租，就化不来，换不来什么了！四三年四四年改一下没坏处，所以说，可以早一点搞。同时，事实上已搞。一加负担，土地即搞给农民一些，特别到五四指示时，如再不实行土改，则中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同陈独秀差不多。中国共产党中央错误还是有，没有像陈独秀那样大错。今天有的还不彻底，还不下决心。事实，今天贯彻土改已迟些。

决定五四指示时，当时想法：看到和平要破坏，还争取和平，但全力准备战争。即“争取和平，准备战争！”当时认识搞土改，绝不妨碍争取和平。反之，则他们反对与我破裂更快，即如民盟黄炎培之流。五四指示，“不怕中间人士动摇”，不搞土改，更动摇。那时看到大地主、大银行资本家完全反动，包括蒋（还不完全破裂），因此，影响中国地主阶级，无疑问的，也站在“蒋介石那一面”，包括解放区地主阶级，即使不搞土改，地主阶级也反对我们。五四指示时，地主已反动，不是“我们挑衅”。不管表面三三制那一套。因此，只有“在坚决贯彻土改，坚决反对地主阶级，才分化出一部份”，（如游击区）。故贯彻土改在政治上，才能支持这样残酷的战争。特别在敌后，在游击区，对蒋、不对日，无土改不可能！用以加强我军群众力量。在阶级上，坚决反对地主。在性质上，消灭封建！

再有，在阶级关系上，力量上，也有改组。

（一）敌人。帝国主义，日变美；汪变蒋，具体敌人变了。思想关系有，过去是“朋友”，十年朋友，一旦变为敌人。脑筋变不过来，总是想：对蒋“还是洗脸政策”。同时美灭亡中国手法与日本不同，日直接武装占领中国，那时蒋也反对；现在我们碰不

到美兵。同时，蒋不同汪，正统。因此有正统观点的人易跟蒋走。蒋社会基础 与 汪 不同。在共产党内也有其社会基础。

（二）在战争形式上，不是“国际战”，而是“国内战争形式”。也有两个可能，但这与过去都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国革命从联合美蒋；国共合作；国际战。变为：反对美蒋；国共分裂；国内战。

（三）社会阶级关系。主要是地主阶级变为敌人了，资产阶级还是动摇的。

因此，虽然基本方针没有转变，而这转变也是十年没有的大转变。一方面，党中央没有向全党讲清楚；一方面在党内发生某些思想混乱，动摇以至叛变。特别，党内地主富农成份党员，异己份子不纯洁，更易助长这种混乱。

如一九二七年失败的转变，总的方针也没变。党内那时才好看，一大部份跑掉，一部份抛到前边去，即所谓三部份：前（左）、中、后。

胜利转变。党的领导是坚定的正确的，就不是那样。但是若干现象要发生！也有些要脱离党，组织不脱，思想早脱。党内组织上不纯洁，思想不纯洁。领导机关动摇：即“革命转变不清楚！”和组织上不纯洁。故有的“过去能不动摇，完成任务”，今天不成。三个原因：（1）外部影响（三三制）；（2）内部不纯；（3）因此思 想 不 纯（战士也有说打内战死，值不得）。

故党内有两条路线，且普遍的，无情的进行斗争。一条是代表地主富农的；一条是中央的。如华中、冀鲁豫，邓与薄即代表贫雇农的。坚决反对农民，代表地主的，如冀东。

地主富农有分别，但今天没分别。因解放区，地主也只能接受富农土地改良政策。实质上是反对土改的。不行，即应付一下。如农民真起，他们即坚决反对。如不好正面反对，就侧面反对。侧面不行，即以两面派办法，小组织活动，以及一切可采 取 的 手段，一直到武装暴动。已发生过，如不防备，即犯错误。有些领导机关，没有看清这种“本质”，时被“假报告，阳奉阴违”所骗，甚至接收一部份，而采取了不可 允 许 的“调和态度”，束缚农民手脚，阻碍农民，地主富农乘机反攻。地主富农得到领导机关的调和帮助，也就是根据地90％农民，能为少数地主所压倒的原因，决定点在此。这即调和路线，即陈独秀的。在阶级斗争严重尖锐化时期，调和、投降地主的，常起决定作用，如山东。

华中、晋冀鲁豫，完全驳斥了地主富农路线，也拒绝了调和路线，并采取了许多组织办法，撤换一些干部，并提拔一些拥护农民要求的干部。因此，就达到了“基本上消灭封建的目的”。

有些地区，地主富农路线还占优势，即土改不彻底的基本原因。

因此，基本上是两条路线。主要是右的，因此要彻底肃清右倾、地主富农及调和路线。同时要严格防止左倾路线。如流氓路线，大吃大喝，乱杀人。因此，反对 右 、 调和，防止左。因此：分清界限，坚持正确路线，这是党内应采取的。——地主 富 农 破坏，党内思想、组织不纯洁，加上领导上的、组织方式、斗争方式上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方式——即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就是土改不彻底的基本原因。

如果是这样。办法：“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纪律制裁”，首先党的领导机关，求得“思想上组织上一致”，再到群众中间，求得思想组织一致，即整编部队，首先是司令部、参谋部搞好，然后就可打胜仗。因此许多干部要“重新教育”。

（三）任务、方针、政策

解放区农民有四大要求：土地（无地、少地、给农民以足够土地）、生产资本（牲畜、农具等）、公平负担（或减轻负担）。民主，即按民主政府纲领，切实保证农民民主权利，不受我干部行政人员等任何人非法侵犯。其中土地与民主是基本的。实现这四项要求，农民土改才能得到胜利，并巩固这一胜利。同时也就是国家民族的胜利，各阶层人民，除帝国主义走狗汉奸卖国贼外，全体人民的胜利。

共产党态度：坚决拥护这四项要求。不拥护，即反对党的基本方针，并尽一切努力，为实现这四项要求而斗争。

采取什么路线、办法？即“依靠贫农及乡村工人，联合全体中农及一切反封建份子，中立一部份富农（劳动起家富农中六分之一）向地主阶级及一部带封建性的富农斗争”。策略方面：在向地主，带封建性富农斗争时，要区别地主与富农，大中小地主，政治进步与反动的。以便集中力量，打垮“汉奸恶霸封建堡垒大地主”。也只有如此，才能最坚强（依靠贫雇），最广大（联合中农），组织农民战斗部队，也最易打垮地主阶级并取得胜利。

过去经验已证明这条路线是对的。

再有，根据这个路线，在全党干部中进行解释与清理，来实行这一路线。党的一致即这样取得：反对的，动摇的，从领导上撤下来，完全必要、合理。

政策：由农民代表会决定，我们提议：

（一）对地主：清楚：根据农民要求，要他们交出土地，耕具，及隐蔽财产，不准破坏，交给农会、管理委员会分配。地契，政府布告交出。

已完全交出，宣告屈服，不报复，不破坏条件之下（经济、政治二条之下），农民应给地主家庭分一份财产。分多少？大体与农民一样多（数量，质量，少一点，不能太少），因为其生活必需。不是消灭其肉体，而是消灭其封建剥削。宝塔式性质与过去不同，但总有点危险。地主一亩，雇农六亩是否短时可行，长久了生活不能维持，总要捣蛋。即收买他一下。

对抗日地主、军属、干部烈属：在不反对，服从农民条件下，在“交出其财产条件下”，不作破坏活动下，群众自愿给以照顾。对于反抗的，破坏的，在他未屈服前，暂时不分给地。屈服不待他宣告，看事实。否则严重镇压。不严格处分不能分化地主。

地主登记、监视起来是必要的。

地主出身的知识份子，不是不要。在他愿接受教育、工作，不作破坏活动，登记起来，给以教育，工作机会。破坏即整。

（二）富农

带封建性富农一定要搞，搞了好。

只要保留这一种劳动起家的，农民也赞成，大体上没有危险。否则劳动起家也没有前途了。因此，不是全部动，是“部份富农，部份动”。

奸霸：根据政治条件搞的，那不同。当然也不要太多。

（三）中农。全体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坚决不动。

保证中农利益，不受有意无意侵犯，才能联合中农。

分配地主财产时，中农应分一部份。佃中、佃富原则上拿出分，但给以照顾。足够代价换，调剂不算动。

中农犯错——作防空洞，那不行。走狗按普通法律办理。

（四）贫雇、工人、赤贫。

分地——有手艺，个人分一半，家一样分。二流子分，但一定要自己种。城市工人、职员、自由职业，干属，一样分地。

乡村工人过去没提，提好。因雇农在减少中，可为我们依靠基础（工、雇、贫）。

（五）工厂、商店。

乡村——由乡农会清算接收。

大城市，大市镇，由县农会决定，县政府可以不接收，也可以接收。领导机关去接收，不要清算。有的可分，有的不分（如药铺）（即对生产无妨碍，如工具、机器、原料不分好）。

地主逃避财产，转入工厂商店，不是清算，交出就是。

土地兼工商，一般经营工商不动，要作解释，只分地。

（六）斗争过程中禁止一切破坏，房子——猪、耕具、牛马、（五台山、书籍、艺术品）严格禁止。否则处分。浪费、大吃大喝即流氓意识。作为“生产资本”。不但农民，且告地主，不能破坏。保护森林、树木，砍一根，栽两根。书贴、字画、古董、艺术品必保存。农民不需要的或大批剩余的交公，交农民代表大会分配。有些政府也可作财政收入。

（七）阶级成份要重新审查一次。党内干部也要重新查阶级。写三代，做报告。如流氓，有地主流氓、农民流氓即很大不同。即“流氓路线”缺了基础。且“经过群众”，并分上、中、下变化等。

（四）整编队伍（即组织问题）

方针、政策确定后，如不注意组织问题，任何好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就是要建立能够彻底实现土改的组织，党、团体、政府、任何妨碍的去掉。否则，是空的！

整编队伍

（一）首先整顿党，即首先使领导部份、集团（即革命司令部、参谋部）不动摇，纯洁。现在，能够阻止土改的主要是党内。美帝、蒋、地主都不能阻碍。故从党内整

起，就决定了，保证了土改的完成。

实现农民四大要求，依靠雇贫农，团结乡村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反封建统一战线，这是路线。无此，党好也不成。故地主在外反对不怕，怕的是其代表、代理人在群众中、内部，来挑拨宗派斗争，这是最危险的。也就是在党内，在各级干部中。县、地、区党委，在政治上决定性的是中央局，故决定的是高级干部。因此，包括高级干部以至到村干部，需要彻底整顿一番。很有必要，为了作好一切工作，更密切联系群众，把官僚主义、贪污、脱离群众、自由主义整掉，很重要。否则，不仅土改，一切任务都不能完成。

因此，提议由上而下整起，首先由中央局整起。首先召集中央局会议，区党委书记，军队纵队中的只少一个负责的，检讨一番，实行自我批评。首先在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一致，以土地问题为中心。怎样一致？即在中央路线下的一致，在整编队伍上取得一致。要提高群众的，首先提高党的纯洁性。提出党的铁的纪律，谁敢违反一下，给他一个头破血流。同时要行动一致，不准自由主义。负责人点头哨气就有关系。否则，就有人钻空子，挑拨领导人的团结。违犯纪律。中央局总算纯洁，就是“动摇和官僚主义”。说不好，就是“对地主有些投降主义”，不同陈独秀那样系统的。有各种原因，外部影响、党内不纯、一个转变转糊涂了。故比较好纠正。同时，五四指示，几个中央局未贯彻，中央也负责。中央也有动摇，如“征购、留地”，就有很大影响。但中央与各中央局有些距离。中央局也与下边不同。故较易纠正。自己勇敢承认“投降”，坚决改正，也要下边改正。只要不是不老实、搞鬼，政治上犯点错误不要紧。

以后打通思想。思想打不通，组织纪律。首先，中央局也如此，不光整下。中央局、区党委书记，这一点打通，个把星期差不多。再以区党委为单位，包括军队负责人，包括区党委机关，详细解释中央路线，并对地主富农思想，调和态度，驳斥一番，进行思想打通工作。然后在干部中“思想上分清界限”,同时进行“组织上的整顿。”对反对土改干部，以及地主富农思想路线干部，给以批评。要他们表示态度，中央路线赞成不赞成。反对的，至少不派他去搞土改工作，从领导位置上撤下来。同时查阶级、查思想，登记下来。自己也应当清楚，是社会上什么人把自己养大的，教育大的。如有隐瞒，叫做欺骗党，开除党籍。就是所有干部在土改中表现、及阶级成份要查清。本地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并与本地地主富农有联系的干部，召集会议。告他即“消灭你们这个阶级。告以态度，不能反对，反对即反党。不能包庇亲朋。”如写信说：“财产要全部交出，不要隐藏，不要送到我这里来，不要反抗。而且农民是对的，同时，我也拥护农运。”否则，即非共产党员态度，而是地主儿子，“以前写了，不追问。再如此，即制裁。”（太行区党委干部决定看来，界限清楚）现在，我们党内阶级界限没有了呢！叫做“团结”，这是毫无原则的。这种团结不要。平常吃喝，一团和气，一谈土改，议论纷纷。查出来以前宽大，没讲，不算。以后一定算。根据成份，态度，以后分配他们工作。对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分别处理。有的还是可做负责工作或一般工作，也有很坏的要清洗。宽大，但是搞了很多坏事，犯了罪的，那就不是不处罚。以上仅指“政治上动摇，没有罪恶行为的”。包括县以上干部。同时，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干部，在土改时期

以回避本地工作为好，到外地去。贫雇以在本地好。回避本地是个原则，具体方法自己讨论。历史上有，如清之县长不在本县范围。县长、县〔委〕书〔记〕以出本省为好，否则麻烦多得很。故暂时与家庭关系斩断为好。不是负责工作的出县（科长、科员）。还有经济联系。机关干部与地主合伙搞合作社，一切没收，个人、公家。经济联系，断绝为好。以后也不准(合作、商店等)。以后区村两级干部中，不准有一个地主富农份子。乡村支部中间，有地主富农党员，洗刷出党。特别是根据地。不愿退党调出本省。多占果实干部，一律退出。（不仅区村干部，机关也有，所有一律退出，否则查出处分。）贪污款项要退还。现在退还就算，以后退了还要处分。还有退不出问题，大概处罚一下好。吃掉了，出抗勤吧！政治上动摇，宣布后不改，组织上都应给以处理。同时把能够执行土改，好的干部提拔起来。立场明确的团结起来，担负土改、党政负责工作。宣布纪律："包庇地主富农，反对、破坏农运，两面派活动，小组织活动、假报告、贪污、多占果实……给以严厉制裁，直至开除党籍；支部组织全部解散。我们党内有这样一种风气，即"两面派斗争"，当面不讲，背后活动。宣布严格禁止，党内严厉禁止。现在负担这样重，不贪污就是最大的节约。有同志说："多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贪污。这就是贪污份子在领导，是放弃领导。过去讨论来讨论去，贪污多少"枪毙"，现在不讲枪毙，而是罚苦工、登报、退出！否则，老实不起作用。这叫宽大政策吧！叫行政去处理。党要掌握行政机关，开党员大会，群众大会。贪污份子最怕群众会，枪毙是空话。小组织活动，看到很严重，几个人贪污，有贪污小组，欺骗小组。党员义务上有这一条："与一切违反党的群众利益的现象做斗争"，〔否则〕，就是"失掉共产党员起码条件"。我们党成了"小组织联合会"，派工作团下去，支部封锁消息。党员、支部最基本的是联系群众与反映真实情况。现在搞相反的，而且割断联系。这是致命伤，问，要这些支部、党员作什么？一律开除党籍。干部会要反省一下，以后不行。

特别讲村干部。如：上边负责，任务重，因而强迫命令等，有些是事实。但有许多上级不能负责，如贪污，阳奉阴违——这也要负责，即负责未执行纪律。现即执行纪律，这不能反对上级纠正错误吧！故凡为公，强迫命令，上级负责，爱护干部。凡为私，个人负责，则要追究。事实上，群众对为"公"的不提，谅解。提的就是"贪污、自私、霸占、不公"等。负责，即未整顿纪律。这样的只能撑群众的腰，不能撑干部的腰。否则即成为"官僚主义化的派别、小团体"，"官官相卫"的一伙子。就绝不能打倒蒋介石。当然为公为私搞不清楚，（如蛤蟆叫）好了，这一部份马虎一下，但明是为私的一部份，则应该追。

军队里干部调出一批参加会与做群众工作。

地主富农出身调出干部，在"服从党，服从群众"两个条件下，还是要。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因此，高级中级领导机关干部，思想打通，组织整顿，宣布纪律，起决定作用，具体开法，各地搞，县级开会也同，也是"查阶级查思想"，退果实，退贪污，调动。此后，区干、乡干以县为单位开会。总之从中央局到村，分这样几期，目的达到在中央路线下，得到思想、组织、纪律、行动上，明确、坚定的一致"。上边一搞，村干部不难。故主要问题，还在上面。如果不整上面，光整下面，是有点冤枉。这

就保证了党在领导上土地改革中的明确、正确与坚定。党内问题“自上而下”。纪律，指明知故犯。反对“两面态度”，提倡“老实作风”。一定要“贪污的倒霉”（多从行政处分，保留党籍），没有纪律，正派人抬不起头来。邪气十足，正气不伸。贪污、小组织、两面派、假报告人讨便宜。这样的党就“没有生命了”！不行！！

（二）党内部队伍整编了，再去整编群众队伍。

首先应该发动贫农，组织贫农小组。训练贫农及区乡干部。经验证明：不组织贫农，不组织农会，不行。贫雇农、乡村工人。最好成份是（1）常年劳动，（2）为人正派，（3）与地主富农没联系的。是中坚。联合起来，组成小组，从中了解情况。

怎样组织法？总的，不一定一致。全体雇农、无地少地农民、乡村工人有个会议会。冀鲁豫再由此选出“代表组”。即必须有其中坚的领导小组，核心。苏联叫“贫农委员会”，叫代表组、委员会、中心组，都成。要他们了解党的政策，然后成立农会。下中农请他入会，50%中农就来了，审查。地主拒绝，富农一般不加入，狗腿不要。若干党员，五大领袖，即群众所不喜欢的人，拒绝加入农会。这是对党最大帮助，帮助我们清洗。不但不制止，而且鼓励他们。改造政府与此相同。也只有这时，五大领袖才低头。农民也可公开宣布：现在不要你。这也是我们党帮助干部，教育、爱护干部的方法。农民帮我们做了大半，剩下小半，我们党内来做。现在有干部说：“向党、上级低头行，向群众承认错误为可耻。不来。”这就是“地主封建思想”。如可耻，则第一是毛泽东。小心谦恭问群众有什么错，派做什么事等。只有地主阶级、压迫阶级才认为可耻。农会拒绝人太多，不好。应成为乡村90%（十六岁以上一切不剥削别人的）反封建农民统一战线的组织。农会中间，也要纪律。不是党的，要他们自己讨论，自己制定，自己遵守。村干部中也相同。（不包庇地主富农，隐藏财产等）不要多，简单几条。

中心问题是中农与贫农团结问题。加一些反封建份子。说有斗争才能团结，（1）斗动摇，（2）分果实，（3）领导权，（4）负担。斗争不可避免，但必须很好说服，正确方式，不妨害团结才能有90%的统一战线。正因是决定环节，故地主村干部挑拨贫农中农团结；特别共产党员不能破坏，如团结中农与贫农对抗，则一律开除党籍。这是“最危险份子”，比贪污严重。故要贫农适当与中农斗争，但又要善于领导说服贫农向中农让步。党内开除，党外（联共党史结束语三、四条）坚决打击。故地主富农土地不够，有时，也多少对中农让步。“半个饼子，比没有好！”

原则：以贫农组为核心，团结全体贫农，全体中农及个别反封建份子，以农会为主要形式，（农民代表会、委员会），内部矛盾就不多，事情就好办。

贫农组。历史经验很多，存在多久，到将来再看。长期要农会、贫农，这个方针是长期的，不变的。即共产党在乡村只有依靠“乡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但怎样依靠法？什么样组织形式？看情形再说。本来乡村支部，就应是贫农组。（即无产，半无产的先进份子。）现在乡村支部成份复杂，不行。如支部一百人，全村贫雇才八十人，吸收二十人参加党也不占优势。这样支部无法领导贫农组。如何解决？大家讨论讨论。

（五）队伍编好，还有打仗问题，战略战术

（1）打那一个（地主富农），打到怎样（低头），（放下武器，一律不杀，即非肉体消灭）解决了。一般讲很容易，到村，都成了问题。具体斗争对象要农民讨论，且得中农赞成，集中火力打大地主大恶霸汉奸。中小地主，政府命令即服了，不一定再斗。当然也有要出气的，也可以。诉苦是好方式，可提高阶级觉悟。清算也好。两者主要作用在提高“群众觉悟”，还不在“向地主斗争！”现在，我看可以由政府出布告：“政府接受农民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不准保留财产等。”时机：在群众队伍准备好的时候，准备接收时，可规定几条，用布告撑农民腰：不准破坏、埋藏、分散、贪污、多占果实。

（2）土改宣传问题。五四指示说暂时不要在报纸上宣传是对的，免得刺激地主分散财产。各地误解，偷人一样，是机会主义的了解。“主要是自己队伍未准备好。”晋察冀：斗地主，整干部，报纸天天登，自己并未做。支部说，是否国民党。上面派的治安员，公开宣布“不负治安责任了”。这就是中央局放弃领导。不要九洲万国，几个党：中央局党，不负治安责任党、报纸党。要统一万国。这就是宣传，不要过早。因此，时机一到，一个口号，协同动作。

（3）人民法庭。杀人、捉、活埋、剐，好象也见不得人的，即不理直气壮。非刑，一定有一部份人不赞成。小资、宗教、亲友，没有好处。这与大汉奸不同。当然那样也不好，共产党员要解释。过去不怪群众，主要是政府、共产党不管。群众就自己搞，就可能产生很多毛病。因此，对地主反动的镇压，也就是没有力量的，分散的，也就是不厉害的。向人民解释：“人民法庭”更好。原因也是过去“法庭”无用。以后用他们作些技术工作。过去无有阶级路线，脱离群众，反群众。怎样组织法：由人民、农民大会选一个，上面政府派一个。三个最好。农民起来，每个村都要一个。来不及派，群众选就是。公开审判，收集罪状，布告，枪毙。上边多给几个干部“杀人权”就是。搞对几个，威信就有了。过去无威信，除地主外，贫农不告状。也可能搞错，要群众能控制的。也定几条“新的法律”。经过审判，错也少，宣传也好。望蒋台等，不要了，罚苦工就是。

斗争中也有纪律，要得。但要群众自己讨论规定。不是上边定，提议可以。

（4）群众斗争方式。要群众路线，不要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当然也不要尾巴主义。而且分配中间，具体工作中也要。同时，“封建秩序”，形式主义不要。如：强迫到会，不能离会，一定的会序，讲话，布置，举手表决，控制包办会场，威胁少数反对派等。现在要消灭封建秩序，应当创造新的、群众的、活泼的形式。现在，形式主义，命令主义，限制群众的不要；但对地主就要。法庭、命令都要。当然，完全不让被告辩护，也不要。总之，一切限制群众活泼的创造性的形式主义都取消。斗不起来，就斗不起来。要保障会议中少数人讲“反对意见”的权利（在农会），才不会有强迫命令。即在群众内部，要他服从决议可以，但不能限制他的基本权利。也不要尾巴主义，群众要怎样，就怎样。自己没主张、意见，领导也不行。不要强迫命令不是不要领导。而强迫

命令，包办代替，绝不是领导。群众路线即“领导路线”。即共产党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领导者走群众路线，不但不放弃，且要有系统的、坚强的领导。但领导权不是天生的与上级决定的，是靠群众拥护的。故自己放弃领导权要不得。但自己要领导，群众不给，也就没法。主要靠党员艰苦奋斗、作事公道，给群众作长工，得来群众拥护，否则就是篡夺来的与非法的。党的任何政策决议不能命令群众。党无命令群众之权，决定权、有提议权。依靠党的解释，宣传，群众赞成通过。如群众不接受，没办法。只有等待群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有办法。办法：坚持党的政策，说服群众，（如政策不对，修改政策）说明党的意见是对的，你们是错的。有时，共产党是少数，所以争取保护少数，也是保护自己。这就是“坚持原则”，但是“组织上也要服从”，少数服从多数。而且要执行。这就叫不脱离群众。不服从、不执行，即可以造成分裂。真正错了，事实证明，我们不断讲，群众就会回头，取得多数，又接受了我们提议。但仍保护少数。即十二条中“共产党的最高原则性与密切联系群众结合起来”。又都有括弧。联系群众（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原则性（与命令主义区别开来）。

政策与群众要求相矛盾，或修改政策或坚持政策。但一般修改政策，要制定政策机关，才有权修改。具体修改不同（如本村情况）。故修改政策，下面不能自由行动，那样就不可能有政策。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否则，叫闹独立性。

纠正偏向：有说“绝不纠偏”，讲错了的。恰相反，“偏一定要纠”，不论什么人、多少人、多久，“有偏必纠”。问题是群众过去是“正”，我们“偏”，纠错了，纠了老百姓。同时，纠的时候要对。斗争当前的偏，不纠不能前进，必纠。如党内严肃性，多年未纠，今天要纠。土改中群众命运观点！事实上，天天在纠，讲“绝不纠偏”，也在纠。故过去纠的不是“偏”，整了老百姓。纠的时候也不对。原则上这样讲一下。故命令主义问题决定权在群众，县农代会，真代表民意的，党提议，政权通过群众可下命令。即有系统、有组织的进行。不能问每一个村一条条都通过。故共产党无命令贫农农民代表会之权。但不是不要命令，如命令地主，少数反动份子等。故即是部份“服从全体”，“暂时服从长远基本利益”。群众路线，基本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说：“群众路线太麻烦”，是麻烦！毛主席说“革命就是麻烦”。

（5）分配问题。同志们讲了很多，很好。太行“缺啥补啥”，“先填穷再补齐”，“自报公议”，“三榜定案”，“以后还审查，是否妥当。”总之，不要怕麻烦，分得大家都高兴，彻底公平为原则。土地更是如此。除地主留多不好，贫农分太多也不好。以大体公道，合理公平为原则。可以有差额，不要太大。同时，不仅注意数量，还要注意产量。”先由贫农组，无地少地农民讨论，再由农民大会讨论好。果实“不准侵占，贪污、贱价收买。”交公都可规定。如“多村范围的大地主”，“穷村，富农”，领导上要先注意。首先，主要是县。如五台山，首先通过没收，区党委负责领导去调剂。农代会可讨论、通过。即“联合斗争，联合分配”。同时，也说服农民。土地多，超过全县总平均数，有义务给穷村。不足的，有权利要求帮助。县农代通过，问题不大。当然要有领导，否则，打架。两村不准打架，党员不准参加。否则，开除党籍。

（6）以后还要做以下工作：（四项必须，还有其他）

（一）巩固农民所有权（公道后，不要巩固太早了。）组织农民进行生产，帮助解决生产困难。

（二）要在农民群众觉悟性、组织性提高基础上面，来进行民主运动，改造政权，改造干部，加强教育。

（三）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加强前线，支援前线，先报好名，准备参军。

（四）改造公粮、抗勤、村财政、各种负担标准和制度。

才能使土改胜利巩固，扩大战果，满足农民政治经济要求。

（7）进行农民民主运动，规定几项：

（一）土改后，经过群众，由下而上再改造一道。党政干部，发扬民主，经过群众。从村农民群众大会，代表会，审查，根据土改中过去表现，有功者奖，有过者罚。（有功大过小，各半，功小过大，或只有过）要把我们干部摆到群众中审查。七大原则："要被领导者审查领导者"（史大林讲的）大会：干部职务一律取消。再审查、选举。午弊的送人民法庭。预选、讨论候选人等，慎重一点。正式开始时，党、政府可发表宣言，布告，保证这种自由，被审查、批评干部，有权利申诉，上诉，经过覆审。即一个坦白，一个辩护，一个上诉。即号召"人民起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靠干部、政府、党。"故民主，不是"向谁要的问题，而是承认保证问题，即保证人民权利。"不是向那个要，而是"自己有"，别人侵犯。蒋介石不承认，侵犯；我们不能侵犯，而要保证。对干部，我们不保证干部侵犯人权，而是保证人权，反对侵犯人权的干部。

（二）村共产党员公开问题。在巩固地区，支部以公开为好。中央早决定，好久未做。即所以保存"暗部"、"通神路的"。党员要提到贫农组讨论，宣布共产党员条件，审查、并可讨论，谁够条件提出意见。提出的意见，这是群众的，党的组织意见也要。（要指定那些人审查这个问题。要正派、有知识经验的。审查权掌握在谁手里，很重要。）群众意见合理即照办。请大家考虑：党员这样多，许多实际问题怎样办？这样党的纯洁性就有群众保证。（秘密党员一定要组织意见。）这样关系很大，即非联系群众不可。故有思想打不通等，这个制度即可保证。

（三）村整好再整区县。县以下农民代表会，县以上人民代表会好。因有城市及其他阶层人，但也以农会作中心。一直到边区，一年来一次。（有功者奖，有过者罚，有罪者送法庭。）选举，通过预决算，负担、抗勤等。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十，村搞完。一律解除职务，县以上两年一次。对好干部没有妨碍。一直到全国农民代表会，总会。农民告状，一直告到总会。

（四）党外应当经过许多组织、方式去联系群众（军、政、青、妇），而对地主联系则打断。现在组织包办了，不经支部告状就说是"超组织"，没有这一条。因此，农民代表会及工会代表，人民代表会是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利机关。选举、罢免、决议、修改，政府无条件执行，参议会死亡了。这和过去"苏维埃差不多"，政府，代表会的议长就是农会主席。即使将来三三制，也不一定像过去那样。村90％农民不要地主，中央一级不同些。

代表会，农会在斗争中即准备建立。最好干部、农会主任，推为第一等，第二等

党〔员〕。翻过来，将来派工作团即由农会派。

（五）土改后，民主运动中，代表会一年一次，中间组织各级人民代表会选出监查委员。老同志，又有资格，又公正、不贪污腐化的。专门找岔子，有问题就找去谈话。任务及职权即保证人民和党的路线正确执行。有错，送法庭，由政府处理。党的监查机关与人民监查委员同。只监查干部。接受人民控告，反对官僚主义。军、政府不能撤监查委员之职。受政府委员会之领导，又不完全接受领导，有自由权。本身犯法，也要处分。

（六）区村地主富农干部要撤职。贫雇干部要占三分之二。党内要进行斗争，反对那种“讥笑贫雇农的知识份子的观点风气。”

贫雇区村干部误不起工。从前叫唤，证明党成分还好，现在不叫，坏了。也规定制度，群众讨论，如少负些抗勤，干部计工，补工。不很饿肚，也不吃亏。但也不准发财。代耕、互助、津贴。村财政要有制度，什么该化不该化，也讨论一下。买兵，最大，要免。如出钱、吃酒也免。手巾等可不免。总之，上边制度要群众讨论，超过则监督。

（七）关于生产问题。生产负担，董老讲：从地主富农来一部，再有政府贷款，再有农民互助，合作社办好，可帮解决。第一第三是主要的，政府贷款不是主要的。合作社很多办不好，很多贪污，搞垮，要追问。政府要颁布一个（合作新法），有点资产阶级味道。只保证私人财产，不保证公共财产。无此，社会主义搞不成。违犯的，严格处分。一定要赔、罚苦工。首先保证合作社财产，国民经济关系重大。同时，合作社也要阶级路线，否则农民得到土地，合作社贪污，地主富农与城市商业资本结合，农民仍然不能翻身。贪污要追出一部份，财政要公开，财政负担要减轻（晋西北），为此，党员干部、小单位财产，退出、动员出来，毁家纾难，支援前线。否则，要脱离农民战士群众。不仅是财政问题，而且是群众问题。军队干部一样要注意。抗属优待要登记，审查。整理一番、统一通知、可减少一些。（有不要优待的，家庭过得去的）颁布法律，贫农负担，照顾三年。不负担不好，负几分之几。

（八）青年妇女问题。妇女地位一天天重要，要引导妇女参加很多工作（干部、抗勤、生产、卫生、教育）。有些地区女人比男人多，参加斗争对农会很重要。故不仅是妇女同志，且为整个党的任务。地位提高，参加农委会，派好干部。消灭封建，割封建尾巴（婚姻自由不提，提自主吧！），妇女割完，才差不多了。农民有封建思想。贫农赞成不花钱，花钱利于地主富农。如承认“一部份人可压迫另一部份人”，农民不会自由（封地主专政，群众内部就不利了。）许多缚束能打破就打破，有人反对，就是封建尾巴，地主富农思想。这也是贫雇农领导问题。妇女应加入农会，县以下在农会统一领导下工作。

青年——组织青年团，也在农会领导下统一工作。

此外，讲的没有包括新区、游击区、边区。那要“看着做”。游击区，有游击区方式。（也有人讲了）新区、东北，由上而下整党，和我们也不同些。有些还是“我们干部与满洲国人、伪员的问题”，干部少，但，也整顿，作风，贪污腐化，老的先整好。不忙建立党。而建立贫农组，即党。搞过两年，一个个审查吸收，一村廿人就可以。还

有进行两面斗争地区，新收复区党，要“审查改组”，再发展。

新区：建立地方武装，经验，把老的民兵代替地方武装，只要“关里，派有团营架子”，即不叛变。可利用“敌伪人员”，现在，又可用老区替训。不建党，建贫农组。也就是广大，“保证武装，干部、党的纯洁”。

在全国土地会议的结论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刘少奇

（一）对过去工作的检讨

一、会议将近两个月，各个解放区都作了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交换了经验，提出了今后土地改革的意见。在讨论中发扬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实事求是，不夸张，也不隐蔽。讨论的态度，一般是好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可以平心静气的发现真理、发现错误，便于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会议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的许多论点和观点，后来又修正了。从这里看出我们是可以发现真理与修正错误的，也说明我们有错误。过去，在领导上是力求完满，但事实发展的结果，证明不是那样完满，而是有错误，甚至有基本的错误。下面的同志对领导上的要求是不犯错误，一般的这样要求“还可以”；但是，全世界上下古今，就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只有蒋介石，皇帝，说他不犯错误，那是“猪鼻子插葱”。因此，我们的要求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寻找错误，发现错误与修正错误。

会开得好。我们的任务是要坚持下去，要坚持大会发现的真理、修正错误。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发现错误。大会是否错误，还待看将来的历史结论，因此，我只做大会结论。

二、五四指示以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一般的得到了成绩。但是，大部份不彻底，已彻底的地方，也是有若干毛病。原因有以下三个（上次的分析，有的要修正）：

（1）是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

（2）是党内不纯。

（3）是官僚主义的领导。

（1）先谈政策不澈底的问题：

我们党进行土地改革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自有党的历史即有土地政策。经过了陈独秀的动摇之后是更加确定了。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坚定的。到抗日时期改为减租政策，又经过了八年。这一个变化，在党的领导机关，是自觉的，是在坚定的自觉之下改为让步，而实行的减租政策。正因为如此，一旦环境与条件变了，我们又把土地政策马上恢复起来，即是发布了五四指示。为什么我们能马上改变呢？就是因为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领导上是不糊涂的。五四指示有很大的转变，基本上过渡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一年的经验证明是不错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政策的转变还不澈底。经过了一年另三个月的过渡，才转到平分土地。所谓澈底的土地改革，是要“澈底

消灭封建，澈底满足无地少地贫雇农的要求，澈底平分。”以今天的这个标准来看，五四决定是还不澈底。今天来看，是只有这样的澈底政策才能使土地改革搞澈底。

五四指示有那些不澈底呢？

第一、有人讲没有公开废除减租减息政策。看怎样讲。今天，中央对蒋管区的口号也还有减租减息（刘邓南下开始时期）；即对解放区也还有，比如对出租土地的抗属和鳏寡孤独还是减租减到租额不超过正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七.五。但是，怎样解释？这点不清楚。特别是有了十年双减的传统，即把这点误解为不消灭地主。

第二、取得土地的方式不澈底。比如第四条规定：“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战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的士绅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的应采用调解仲裁方式。一方面说服他们不应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另方面教育农民，念及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就不是爽快的，斩钉截铁的。

第三，保留地主的土地财产。后来中央征求对于征购土地的意见，给地主保留多于普通农民一倍到二倍的土地，保留富农，绝对不动中农，都是不澈底，同时，执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的政策，也不澈底。

第四、分配土地的方法也不澈底。只规定了一条，要“公平合理”。

第五、没提消灭封建，只是说“不要害怕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即：不是主动的号召动员，而是批准。

这种政策上的不澈底，就给地主富农一个机会来反抗土地改革；给动摇的人与机会主义者以藉口，便于他仍以执行五四指示的形式修改五四指示的实质。

五四指示是站在农民立场、群众一边的。当时且在群众里边鼓励他们这样做，但代表群众要求站在群众前面的精神不够。只撑了群众的腰；但代表群众不够，所以，群众起来，就讲五四指示不够了。撑群众的腰，是对的。马克思说过：当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发生争论时，共产党一定要站在工农方面。这是根本立场问题，不能站在中间，否则即动摇摇摆，实际上便利于地主富农。站在群众一边，也不是没有统一战线，而是站在群众立场的统一战线。站在超阶级中间立场的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统一战线。五四指示没有这个缺点，虽然有许多照顾，但是站在群众方面的照顾，而且是要群众照顾。因此，同是照顾，有两种立场。五四指示是要撑腰，但仅仅撑腰是不够的。共产党员还要站在群众前面代表群众的要求、利益、呼声，提出纲领，引导他们起来，组织他们起来，领导他们前进。五四指示有这种精神，但着重的是批准。今天，平分土地的政策的积极性是更为充足的。

因此，五四指示是减租减息过渡到平分土地的政策。故带暂时性，一年以后就完了。平均分地是一直要到全国都这样才完成。

今天决定的政策是澈底了。是否还不澈底呢？不会有了。明年再开土地会议也不会发生了。是否可以再进一步呢？就现在形势看，进到这里就打止了，再进一步就要犯冒险主义。土地政策，在整个历史上来讲，还可前进一步，即实行土地国有。但只有这

一步了。那时，只有农民问题（富农与贫农中农，城市与乡村的矛盾还有），土地问题没有了。但土地国有，只有在国家肯定是人民的（是工农商学兵的）时候提出，才有可能，即一定要有全国性政权，而且要在这个政权是巩固的时候。不到时候就提出，要犯冒险主义。因此，今天大会决定的政策是最澈底的政策，至少今年明年，也许三五年还多几年不能变。当然，我们不要对土地国有有什么害怕心理，特别农民是怕充公的，因此，今天不需要讲，明天再说还来得及。实际上，只要规定一条，不准买卖就完了，再也不分了。农民是否可能感到一点不方便？可能。可是，土地不能卖钱，要地也不花钱。但，对全国经济，就有极大推动，因为投资不能投到土地上去了，银行和市场即可大大繁荣。因此，有些资本家也赞成土地国有。列宁说：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的土地国有；国家是社会主义，土地国有的性质即社会主义的土地国有。有了全国政权之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土地国有。但在今天，还不能进到土地国有，今天，我们只能进到澈底平分土地。

今天，我们可以决定平分土地的政策。去年是否可以提出呢？我看是可以的，对群众运动是会有帮助的。假如五四指示即决定平分，今天看，也不会不得了，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但，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讲，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条件和环境，不能幻想中央那时就会这样；同时，也不能幻想，即五四指示决定澈底平分土地，今天的土地改革就会澈底。因为今天检查起来，即使有澈底的政策，但还因党内不纯而且要经过官僚主义化的机构去执行，也不会澈底。不但会不澈底，还可能出大乱子。因此，今天来看，幸而五四指示还不澈底。五四指示又放手又不放手，还稳一些。要是真放，如晋冀，政策是澈底了，但一下放就大乱，就又停止。所以晋察冀中央局接五四指示后，说要停一下，可能也有这一原因。晋绥，就有这一原因。我和黄敬谈过后，黄敬说："你这办法，好是好。作风恐要改一下，才行！"当然，当时都还不是这样明显。但，问题是有长期的感觉与酝酿的。否则，我也讲不出。故"停一停，怕出乱子"即作风要改改，组织要整理。

因此，五四指示是可以彻底的，但五四指示即使彻底，今天的土地改革也不会彻底。故不能要求或以此责备中央；因为当时是受形势限制的。如象董老讲的：老〔美〕国还要搞和平，我们就搞彻底的土地改革，打起来，群众会说是我们挑起来的。因此，我们的行动口号也还受当时的群众觉悟程度所限制。当时，群众还不觉得和平不可能，或美国不能真正帮助中国搞和平，只根据先锋队的觉悟决定战争政策，是反列宁主义的。要照顾全国形势，又要照顾满足解放区的群众要求，结果，就是五四指示。因此，五四指示是比较稳重，不算错误。

现在，形势比较成熟了。也是到今天，才喊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过去，长期打但不敢喊。倒不是怕蒋介石，而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问题。会议上，包括太行区党委和中央局在内，觉得对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认识，还是混乱的。党，提出口号，决定政策，执行政策，都要根据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来决定。

所谓过渡阶段，革命转变，抗战时即准备起。日本投降，毛主席到重庆去，直到今天，提出"打倒蒋介石！"二年零一个月，才转完。有的落伍者，是跳下去的，以前以

为去华盛顿，一看是去莫斯科，就跳了下去。过渡到完。政策，过渡到“彻底平分”。以后就一直走直路。故客观形势也成熟，经验也才成熟吧，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也才成熟。因此，彻底平分土地的提出，是及时的。不是过迟，也不是过早。有人说，可以早一年，但是，要有历史经验，才证明和平不可能（在政治上早决定打倒蒋。）本来，决定今年五四就召开土地会议，推迟两个月。当时的形势，还不能叫我们这样决定。到现在，才比较稳定。而且，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都是要经过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常常是搬大树。过去，苏联也是搞了一年之后，才组织贫农团，再彻底的，而且他们还有城市和全国政权；现在，我们也是经过五四指示后，到今天再彻底。这样，是否走了弯路，把运动推迟了呢？没有。我们是搞了一段，否则，这一段，今天也还要搞。同时，由于全党的经验不够，只有少数人参加过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始也必然要慢一些。今天，有许多干部学会了，今后就可以快一点。

因此，中央也不责备下边政策不彻底，不打屁股。还有，超出了五四指示的（如象晋冀鲁豫、华中），也不打屁股，而是批准他们。

但是，机会主义，还是要打屁股。站在中间立场倾听地主呼声，利用五四指示不彻底的方面，不利用它的彻底的方面，还是错误，还是要批评的，不能原谅。因为没有讲清楚，屁股可以不打，但是，以后就不行了。

（2）党内不纯的问题。

这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基本原因。不论政策彻底不彻底，他是带根本性质的。一年的经验，更加证明，更加暴露了！结论是：如果不作改变，即不能完成土地改革，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如不迅速整理，且可亡国亡头！党内不纯的问题，为什么更加暴露了？因为革命更加深入、群众斗争更加深入，加上激烈的战争，一切毛病，一切官僚主义，都暴露了原形。

现在是新形势（全国革命高潮）、新任务（争取全国反蒋反美自卫战争的胜利）、新政策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也就要有新的人物（是从革命的性质上讲，不是山头主义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组织与新作风。现在（在人物上有些新陈独秀）我们的人物、组织与作风都要转变。这点七大是一般的提到了（但要求具体提出是不可能的），今天，弯已经转完了；但我们还有很多旧的一套。这也说明：那时这些人物能完成任务，今天不行了的原因，好像苏联内战时代的戈尔洛夫，打德国就不行了。因此，不要犯保守主义，要自觉的转变（这点七大也提了）。

我们许多同志，不但不自觉，而且保守旧的观点、作风、干部与组织。现在，我们的政策，组织、思想作风都应该有新的一套，反对保守。

在时局的转变中，在执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党内有很大的动摇和混乱。现在应该终结了，应该迅速完成转变，以执行新任务。即要改造党。

我们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弥漫、很猖狂，而且很普遍。阶级观点模糊。这就是党内的不纯。因此，需要改造。因此，改造党，是从两方面来看的：第一是形势转变了需要改造；第二是党内不纯需要改造。

以后，不讲路线（争论路线、偏向、主义、因素等无味的争论），都称之为地主富

农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总而言之，你是王八蛋，我们不是文学家，避免那些无味的与咬文嚼字耽误我们时间的争论。总之，党内不纯这一条，是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基本原因。

（3）官僚主义的领导

党纲，也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承认党纲党章，这也是加入党条件的一条。官僚主义者，党籍就值得考虑。

从现象讲起，最严重的妨害群众最大的官僚主义是雷厉风行的官僚主义，即形式上很积极，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急性病所发生出来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另一种则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的没落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官僚主义。

这种官僚主义不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而是命令群众。在共产党员讲来是非法的。叫越权！但，这种官僚主义觉得他似乎可原谅，保险，因为他能够完成任务。“为完成任务而强迫命令”这一条要取消，不能批准，不能撑这一点的腰。因为这种官僚主义，要东西表面上是可以完成任务的，甚至什么任务都可以完成，这也就是蒋介石的基础。他之所以还能打仗，就因为有这条，还能要到东西。否则，他就垮台了。我们也可以用它要到东西，这是弱点，阶级群众的弱点。马克思列宁都讲过：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一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影响，二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觉悟程度不够，因此只好由它摆布。共产国际纲领，也讲过。

官僚主义怎么消灭呢？列宁说：官僚主义要反对；但几十年还难于消灭。消灭的办法即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程度。

因此，这种官僚主义是利用群众的弱点，整老百姓一下，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对群众采取这样态度的，不是人民之友，而是人民之敌、害群之马！因此，各级领导机关要很小心，不要看到完成任务就奖励，那就上了官僚主义的大当。特别如要东西，他可以完成任务，给东西，他不能完成任务；有此标帜，一定是官僚主义，如发农贷，给贫苦农民，他就不能完成任务，组织合作社亦同，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更不行。这与党内不纯是联系的，也可以亡党之头，也要改！如果庇护这种官僚主义干部，就叫亡党政策！否则，打倒一个蒋介石，还有千百个。粪缸不去，苍蝇总是多的。

因此，犯这种错误的干部，不管是否工农份子，但都是受了国民党的影响，有的，甚至是特务方式，要严格教育、批评、处分，发扬群众的民主，制定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是便利群众反官僚主义的制度，而不是便利于官僚主义钻空子的制度。如上次提了几样。这就叫民主制度。

我想，一年来的土地改革，证明了这三件事情。证明五四指示不彻底，现在决定了彻底的土改政策。证明党内不纯与官僚主义，不会发动群众，不能执行土地政策。

（二）今后的政策

主要的决定是土地法大纲，它代表我们政策的主要部份。大会基本上通过，还要经中央批准。今天先带回草案，正式的由中央通知。

这个政策是彻底的，没有什么怕。但是，依靠贫雇农，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全体中农的方针路线，依然不变，不可以对团结中农这件事情注意少了，虽然对一部份中农，要抽出一部份土地，但，大部份不抽，且得东西。就是对抽了的，也要想各种办法团结他们，不斗，给点代价。为的是使他们不受地主影响反对我们，对群众是合算的。但，群众一定要抽就要抽，他若与地主富农一起来反对，也还要斗争。

在政策上讲，一律平分，毛病最少。但，执行的时候是否可以区别一下大中地主与小地主与各种富农？在实际执行时，是需要而且可以区别的，即在基本上不损害与牺牲群众利益的条件下，实行若干区别照顾，对群众有好处。过去采用区别的原则也不错，但写上毛病就很多。因此，基本上是平分，可以采用不改变平分政策的区别照顾办法，但主要应根据群众的意见。这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争取胜利。”利用土地法大纲，分化敌人营垒是可以的，但是，有同志由此变质就不对。

打烂平分的问题。党，一般的照土地法大纲宣传，不去宣传其他的东西。打烂平分，一般讲，有他的好处；但是，阻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以抽补的办法为好。

地主。一定要使他低头屈服。不屈服，顽抗，可暂不分地；但不能利用这点，全不分地，肉体消灭地主，对我们不利；但，低头，分了地，又反革命的，一定判罪。不能动摇，不能藉口宽大政策。而且，只有对反革命地主，坚决镇压，其他地主才会屈服，否则，富农再起反对，杀人更要多。列宁说：“对反革命的慈悲，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富农，在这种政策下，要反对土地改革，他在某些方面要比地主更有能力。因此，在作法上，甚至在政策上要使地主富农有些区别；另一方面，他反革命，就更要注意。地主难以争取中农，富农是可能争取中农的。

各地区的高级政府可另搞土地法，但不能混淆这个土地法，只可加细则，如像边区政府可以加几条。颁布的时候，以在我们干部已到村子三五天才好。颁布布告，登报，要防止破坏，要在群众中已有些宣传组织工作，再颁布才好。因此，时间可能有些不一致。因此，大体的斗争过程是、布告一贴，地主暂时监视、登记、即开大会讨论，分那几家，那些决定没收，那些不没收。富农，也监视起来，通通不准动。然后决定分。凡是能这样做的地方，都要这样做。

搬东西，不要一伙人，没组织没秩序去乱搬，这样会打埋伏。以后要有秩序有纪律，要有人负责看守登记。由几十人负责，其他听候调动。有些，不要搬。

斗争，（诉苦，清算，对启发群众觉悟好。）但，不能妨碍群众斗争。分了以后再算也可以。地主，有的要斗态度，有的也不一定开大会。犯法，送人民法庭就是。方式，可爽快一点。问题是要把群众组织好，防止群众不懂得，不觉悟，干部党员包办，一分就算。因此，一定要组织队伍，不反党，而且主要是组织群众的队伍。否则，是不可以的。不组织群众队伍，不提高群众觉悟，不能巩固的。斗争，也不一定开大会，譬如，有的地主坦白得很好，底下反鼓掌，这样的会，就不要开。不要以为，好像不开大会，就不叫斗争、不能分地似的。

工业，肯定不动。工商业者兼地主，没收土地。地主兼营铺子，铺子尽可能不动。资财转移到了铺子里，退出就是；没有转移的，特别在城市，不去清算。工厂、商店，一般以不动为好。当然，如果是化形地主（不是正式作生意的），搞掉算了。这对工商业没有什么损失。

（三）如何贯彻

以前土地改革不彻底的三个原因，现在，政策不彻底这个原因没有了。剩下两个还要解决，即党内不纯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要求执行政策的党，群众组织纯洁，加上不是官僚主义的，而是群众路线的办法。

中心的环节是整编队伍。第一环，整顿党，再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是第二环，这是决定的环节。党的队伍是司令官，加上好的战斗队伍，就能打胜仗。这是普遍真理。联共党史六条道理即在此。

打仗要组织队伍，而且要训练好，兵要精、步伐要齐，不要一听枪响，就往回跑，并要在战斗中不断的锻炼这个队伍。政治上也是一样的，也有老战士，新战士，翻身农民，也有“解放战士”（觉悟了的地主子弟），有狗腿子，也要不断锻炼清洗。不要地主富农喊一声，就作了逃兵。提出五个不怕，就是为此。我们解决任何一个任务，都等于消灭一个敌人。生产斗争，也有敌人，政治斗争，更是如此。一定要有一个队伍，并要善于指挥使用，要懂得战略策略。我们也一样。整顿党等于选择与训练指挥官，整顿群众队伍即等于整顿战斗连。我们有许多同志打仗，不懂得要队伍，行政命令，官僚主义就是。

队伍怎样整法呢？上次已经报告，打通思想，展开思想斗争，反对右倾为主，防止左倾。

左倾例子有，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左倾基础。流氓意识、小资产阶级急性病，为地主所利用，与左比右好的投机心理，加上土地法造成了简单的环境，都是左倾思想的来源。

因此，主要是正面宣传。队伍应该怎样组织法等。在思想上极力宣传给穷小子做长工。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孺子很弱，牛很强，可以调皮，但不调皮。我们就要提出“为人民作长工，俯首甘为孺子牛。”共产党员就要这样！不愿这样的就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可以讨便宜的人，就不要。这样说，党就组织不起来，就不组织，谢天谢地。可以号召一下，不愿意给穷小子作长工的，可以退出。不退出，也要开除。这样，当然有许多干部党员会受打击，但是，站在人民头上怎能不受打击？受了打击，才证明共产党好。如果可以站在人民头上，胡作乱为，不给穷小子们低头，这样的党，危险。领导机关熟视无睹是错误的。我们整党，好的也要表扬。但要把表功运动与批评运动结合起来作，单表功即丑表功，单批评也不好。运动即大家去做，要有这种风气。

整党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由上而下。目的是去掉障碍物（不全是人），打通思

想，组织调换，严明纪律，以便保障顺利执行土地改革。第二步，准备由下而上，巩固党，扩大战果，把党按毛主席的思想，在雇农起来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使党的面貌一新，无论作风、制度、人物都是新的。真正做到新形势、新任务、新组织、新人物、新制度、与新作风。因此，各个负责同志，必须研究村政府、村支部怎样去工作，写个小册子。

实行这两个步骤，一定会有逃亡。因此，不要害怕有些干部党员出党，也不要害怕大批出党。村干部用他们不干，这样你们要不到粮食了，来威胁我们，也不怕。可能发生一些问题，方式不好，打了两个，上了个吊！以后，这样大动员，出毛病，也可能。我们要整顿村干部（薄一波说，这是最后一关），也要整顿几个高级干部。区党委、旅长庇护地主，硬是要承认错误。此外，还要再加上由下而上的整，几百个代表，批评一下。这一关要打破。不要怕。不要枪一响就往后跑。可能动摇，但不要动摇。党必须整，凡是稳不住的人，受些打击是免不了的。但是，对愿意学习、服从党、服从穷小子的人，领导机关、负责人一定要热情对待。这一条，一定要。因此，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严肃、不放任、不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对愿改正愿学习的，一定要热情，而不是冷酷无情。因此是争取教育的方针。不怕假的，辜负热情，不折本。这是严厉与热情的结合，放任与冷酷不要。同时，不要“不教而诛”，这样领导机关才算尽了责任。初次，可轻些，但必须严肃，否则，即无原则性，党内就从此无规矩了。同罪异罚，显有宗派，不对；但要讲以前犯和后犯，要有区别。异己份子、叛徒，清洗出党，有些还要受法律制裁。但，叛徒，不要随便讲，是思想上组织上都到敌人方面去了的，才叫叛徒；有些只是某一件事带叛变行为。

纪律，要定几条。

党内民主的问题。有同志要我讲，我想，不强调好；因为有各种了解法。就是实行党章。破坏党章的，没有民主。因此，不一般强调。就是讲：保证党内的合法斗争权利，反对党内的非法斗争。这样，民主也有了，也避免发生毛病（有些人讲民主就是要有破坏党章的自由）。但，保证党内合法斗争，要避免被“清谈”拖住。此外，干部犯错误，应促其坦白，但不能一定要他到群众大会，这也有自由。在党内，也要保证少数人的权利。否则，对群众的教育也不好。即“多数强迫少数”，原则上，也不对，毛病也很多。可促其认错，但不一强迫。当然，不坦白，也有办法，有罪，法庭可办。法庭上要他答覆，不答覆，也可判罪。缺席也可裁判。

同时，整党的过程中，要注意反革命。反革命不多，但一定有，因此，要组织人民法庭，因为反革命牵连广，所以，处理特务要慎重，反革命案与特务案不能在村里处理。县也不成。一定要解到上级保卫机关处理。也不准放，同时，我主张不在土地改革期中处理，关他半年也好。但这是指在党内的秘密组织，地主武装敌人武装组织除外。村政府不能判决特务，也不能随便戴帽子，可以规定要那一级才有权。地主兼特务，也不要杀，把牵连的党员干部搞清楚再说。杀恶霸，就不会这样牵连。

建立人民法庭的问题，现在提出来，还要学习，要大家创造，可以接受些现在司法机关的一些经验，如像诉讼手续等。可以训练，学一下。搞得不好，是他审你，历史上

也有经验。譬如，三侠五义包公案就是我们古时农村侦查学。创造经验依靠群众。

同时，政府、青年、妇女等组织，也都要整。明确其阶级性。

（四）群众路线问题

大会表现思想上比较混乱。有的完全混乱。

一般讲，有些同志有进步，考虑问题、执行问题、决定政策、执行政策都有进步、有成绩；但是，还不彻底。甚至还有同志感到群众路线麻烦。

但是即在理论上讲，群众路线也不简单，不容易。要求我们的同志具备彻底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就要同时具备许多东西。因为群众观点与对革命的立场对群众的感情有关。换句话说，是要精神上相信群众，相信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否则，不行。没有这些前提，是不可能搞清楚的。

此外，走群众路线，在方法上也是繁杂的。强调一下，有必要。因为许多同志轻视这点，以为一听就可以解决问题，要用心研究，用心学习。

所谓群众路线即领导路线，亦即领导机关去走群众路线。有许多同志理解的很庸俗很简单。其实，一切政治军事的正确的组织领导路线即群众路线，就是说要领导群众革命。所谓人民群众的利益决定一切，高于一切，亦即真理高于一切。把这点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对立起来看是不对的，而且要出毛病。毛主席说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就是真理的标准。因此，群众利益有最大、次大、最小之分，真理也就不一。要分得清楚。分清楚，小真理，部份利益就要服从最大与全部利益。不根据具体情况与最高理论，就搞不清楚了。因为真理是有物质基础的。马克思说过，没有抽象真理。要找出最高次高才能找出真理。连群众观点都没有，当然就找不到真理，与其大小，标准。

毛主席讲：我们的群众路线即阶级路线。而且，其他一切阶级就不可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不纯，就不可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过：群众路线也就是我们的根本路线。一切正确路线，一切真理，都只有走群众路线，才可以取得。政治军事对不对，组织路线对不对，也只有走群众路线才可以测量。最后和最高的标准亦即在于此。一切意见、争论离开群众路线搞不清楚，离开阶级，也一切搞不清。

因此，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全盘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而不是离开了村就没有群众路线。开会、练兵、与财经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

所谓根本，是贯彻一切的。大多数同志着重执行政策，只讲这一方面的群众路线。譬如决定政策，就要有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任何政策，都要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决定。否则，就是不对的。官僚主义，只能照顾到最少数人的利益。

举例来说，如像由土地改革转到减租减息，对不对？对。因为取消土地改革，我们并没有损失，陕北的土地也并不退，我们得到的则是国共合作，在全国作群众工作。是对革命有利的。如像西安事变，不杀蒋介石，国共合作成功，也对。

四三年，四四年，减租不变，在解放区已不够了；在蒋管区，又不可能换到什么，

故说："划不来了。"讲这一句话，也自群众观点来的。五四指示不提彻底平分，也有群众观点。今天平分，对蒋管区群众没坏处，对解放区则有利。

因此，一切真理都是走群众路线得到的。要发现真理发现错误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都只有用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才有可能。联共党史，从那一方面看，都是贯穿着群众路线。写法也是如此。结束语六条也是如此。布尔塞维克在，十二条，也是如此。

因此，群众观点是基本的。

"要干部？还是要群众？"一听这话，就是官僚主义而非马列主义。我们的干部政策就是为了群众吧？！干部可爱，但是压到群众头上即可恨，我们不是为爱干部而爱干部，教育干部，提高干部，都是为了群众。虽有直接间接的区别。

复杂，也复杂在此。片面考查，即形式逻辑，即得不到真理。

同时决定政策的方法，也只有"自群众中来"。同时，为了再拿到群众中去。不是为了决定本身好看。凡，对的，是真理，中都有群众。所以，脱离群众的政策，这一政策就有问题了。当然，也有群众暂时反对，因其觉悟程度不到，但最后还会赞成。

因此，一切决定、政策、办法，最后，都是为了群众。建政、组织军队、打敌人，都是为了群众。唯一的为了群众。说主要都不可，因说主要，好像还有次要可以为个人。所以，一切从此来考查。许多同志没讲这一点。多半，只讲执行政策的方法。

同时，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政策，要群众自己起来执行，群众执行，党是否在旁边看呢？当然不是。没有很好的司令部，群众是不能打胜仗的。有人觉得，要群众路线自己就没事了，是错误的了解。

我们不要包办代替，群众没起来，包办不对。但有群众，也不是不办事。提意见，鼓励好的意见，说服解释错误的意见。因此，不要尾巴主义，不要自发论，运动，没有群众的自发，不行，但群众的自发运动，要和党的自觉运动相结合。把群众自发变为自觉。反对自发论，见列宁著论：《做什么？》列宁、斯大林，讲的特别多，毛主席也讲很多。要用心研究一番。用心学习，好好宣传，创造模范（高级的，低级的），要作这一步工作。

这样，才可以讲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一切问题，考虑群众利益。一切错误路线、原则、偏向，都是离开群众路线的。故，这也是一切错误路线的根本路线。

复杂，在根本着眼点上与方法上，都是如此。而群众，也是复杂的，各国，各种，各业群众，工人，工农间，各样农民群众，很不同。例如军队同志，为了爱护他那士兵群众，外要民夫，浪费民力，叫做犯错误。故实在有些难搞。随便什么，都离不开这点。孔子说："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即要"不逾群众路线之矩"。

群众复杂，群众利益更复杂。有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要搞清群众利益，就更复杂。如土改，搞了廿年，今天，才知道，"平分最好"。

（五）其他问题

以上这个标准，是比较巩固的解放区的标准。要根据各种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去执

行。

在特殊地区，如游击区、边沿区、战区、新区，不能全部执行，要有若干修正。特别是游击区，比如整党，整是还要整，但方法要简单些，由下而上的办法就不行。干部的调动，也可能要少一些。在游击区，可以进行土地改革，但必须与武装斗争结合，打退地主的反攻，控制地主。但，打击面不要宽，分的要快。

青年团问题是个带原则性的问题，组织，可能有好处，就办就是；可能有毛病，发生了毛病再说。要训练青年干部。土改中，区村组织，即可搞起。中央局，区党委，可选些好干部作青年工作。要年青、虚心、有群众联系，公正的作青年团工作。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好作风。

妇女工作问题。要重视这个工作。各个解放区都要重视。妇女工作是整个党的工作，整个群众工作的一部份，要注意去做。经验证明单靠几个女同志不成。因此，要在群运工作中经常注意妇女的觉悟。

婚姻自由或自主的问题，共产党在这上面不让步。至于宣传，当然可看情形。一半数人的自由都可侵犯，整个自由就有危险。所以，妇女解放也是基本问题之一。自由了，买卖婚姻就会没有。这与贫雇农领导有关系。毛主席湖南农运报告，有“打倒夫权”。可能做的，都赞成做。

青年、妇女工作中的阶级路线，要坚持。

生产问题。赞成董老意见。在土改中，要把户籍调查清楚。负担分数，战勤制度，村财政，一下搞清楚。经过群众讨论、创造、上面研究、贫雇农领导，大大解放生产力，加上积极组织互助。

军队要参加土地改革，也才会有生气，这也是应得的果实。军属士兵觉悟就可提高，要好好用这些果实。有些官僚主义，军阀主义，打人骂人，即浪费这些果实，要撑农民腰。军队中也要整党。查阶级、查思想，以及调动。地方军、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一样办。枪杆子，不能交把地主手中。

军队参加土地改革的问题。必须参加。这是一个势力。当然也有些毛病，要学习。一般在地方党领导下。强迫命令，不会比地方少。今天，士兵掌权，恐怕还做不到，但，一年讨论一下连长，可能好。军队、地方彼此互相学习，这就是老实态度。地方必须欢迎，军队不能不欢迎（实际上，军队上许多好东西地方没学，坏的学不少）。军队，也必须利用土改，把军队与地方关系，增进一步。这也是力量。各负责任。出问题，军队负责处罚反对土改的人，并帮助土改。地方欢迎军队并对军属要注意，分地至少不能比干属坏，村干部分的最好，即挨打的机会。当然打地方干部，也不容许。地方错了，提出，告地方纠正。犯罪，要负责处理审判。军队反对土改，欺负地方，拉到地方审判；地方干部欺负军队，拉到军队中去审。军队才真正拥政爱民。政府也要替士兵办事，支援前线，解决后方问题，也是重要工作之一。互相审判，很有必要，但要维持秩序。处罚，不一定很重。罚得轻，审得多，关系就好，这也证明没山头吧！军队打人，交政治处办。军队看到错误，交地方办，写两封信，一封交县，一封交中央局，一定要热情，互相热情，不能冷淡相待。这叫感情，也是政治问题，有利团结，也是群众观

点。“爱民不拥政”，吃亏！政，管千百万人，你不拥他，他不拥你怎办！拥一下政，就可把政下群 众 搞 好，这也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当然间接又间接就是了。所谓：“最大利益”，就抽象，难懂，也就在此。互相热情招待，热情办事，不一定用嘴讲，用事实说服，行动说服。

（六）最后几句话

实行这样的政策，当前直接的目的是要把土地改革彻底完成。是一个直接关系几万万群众的问题，是代表农民的利益与要求，是群众的直接利益，也是全民族国家的最大与最长远的利益。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历史任务。只要彻底发动群众，贯彻土地改革，农民翻身，军队也翻身，落后（边区）也翻身，大家翻身，全国翻身，地主也翻身（翻下去了），党内官僚主义也翻身（不再站在人民头上屙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只要贯彻了，就一定能战胜蒋介石。否则，就会亡党亡头，亡国灭种！

现在，解放区只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蒋管区有三万万，单纯算数字是他胜了，问题就在于他那三万万没有翻身。我们搞彻底了，力量对比关系，就要起根本变化。晋冀鲁豫搞得彻底，就能够走了五个纵队，又起来五个纵队。再走，还可以再组织。负担能力也一样，由平均每人三斗加到了每人六斗。因此，农民翻身，力量无穷；一万万五千万加上彻底的土地改革，就能够战胜蒋介石，还有美国，但不顶大事。顶大事的还是老百姓。

过去苏区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只有两三个县彻底了，就抵住一个蒋介石若干年，加上后一个时期还犯了错误。上杭到现在还在搞，红军的干部出在兴国的最多。贺昌当了二年县书，到今天还得他的好处。效果之大，永垂不朽！福建的上杭永定（张鼎丞邓子恢搞的）和陕北的清涧。有了几百万几千万上万万的老百姓拚命，蒋介石还不倒？没有这回事情。

因此，怎样改变力量对比关系的问题，即如何贯彻土地改革的问题。蒋介 石 没 办 法，就向美国借债，我们只有向老百姓借债。但是，农民借债，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不站在我头上屙屎（要民主）；第二，帮我打倒地主。”我们是一个无底洞，借了又不还。这两个条件，应当答应。不答应，就不像共产党了。

因此，贯彻土地改革是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基本一环。有决定意义。我们有信心，半年完成一个大概，以后再过细，但不能只搞好几个县。每个县都要成兴国，每个干部都要学贺昌。这样的干部才可爱，才值得表功。机会是有的，人人可做；但要执行正确路线，体会毛主席的思想。相信有很多好干部，能够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的利益，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

一、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称大纲）第三条废除各项土地所有权之规定，系指实行土地改革以前之土地而言，其在土地改革后所取得之土地不在此例。

二、大纲第四条废除乡村债务之规定，系指在民国卅六年十一月以前农民对地主、富农等之一切债务而言，其贫农、雇农、中农之间的债务应由农民自己解决。而在民国卅五年七月以后，农村之间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买卖关系尚未清理者，不在此例。

三、大纲第六条之补充：各地在平分土地时，必须经过丈量，统一平分。其方法可采取或全部打烂彻底平分，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平分，由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及多数农民的意见决定。在全部打烂平分时，中农一般以自愿为原则。

四、民国卅六年所开之生荒地应属于开荒主所有，不在平分之列。所开之二荒地属于地主富农者，应在平分之列；属于雇农、贫农、中农者，不在平分之列。

五、城市工商业家自愿投资开垦荒地经营农业者，由政府给予方便指定大荒地开垦，第一年征收土地税公粮百分之五，第二年收百分之十，第三年以后按公粮征收比例。但土地所有权属于国有。政府保证农业经营之财产不受侵害。

六、大纲第八条征收富农多余部份之规定，系指一般富农的粮食、房屋，以该家庭留下种籽后、吃了有余、住了有余的，为多余部份；牲口、农具以超过该村农民所有的平均数，为多余部份；家底及其他财产全部交出后仍分给他一份。小富农（家庭主要人员全部参加劳动，剥削半个以上至一个劳动的。）除粮食、房屋、牲口、农具照上述办法处理外，家底及其他财产不动。

七、大纲第九条（甲）项之补充：山林、蚕场、水利、果园、苇塘、草甸子、荒地等由各地农民公议可分者平分，如平分不利于经营者，可采取合股经营办法。

（乙）项之补充：已开或准备开采之矿山地不分，已发现之矿山地暂时不开采者可分给农民耕种，俟需要开采时即行收回，由当地政府给农民另行调剂土地，并补偿其生产的损失。

八、以铁路中心为起点，两旁各留三十至五十米达之土地作为铁路用地，不得分配。

九、大纲第十条（乙）项之补充：铁路线路工人及其家属其工资不足维持生活者，可分给部份土地，由当地农会讨论决定之。

（丙）项之补充：在民国卅六年十一月以前参军战士，本人已分得土地者，在打烂平分时，不得少于已分得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跑腿子参军的战士分得之土地，由农会代

管出租。为革命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本人仍应与农民同等分得一份土地及财产，作为对其家属之抚恤。准备安置荣誉军人及退伍军人之土地，由县政府统一保留，不得分配。

十、在平分土地后，区村政府农会不得留公地，在有学校之村，可留三垧至五垧学田。在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以前地方部队及机关已留之土地，归当地贫雇农大会或农会处理。在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后有多余时，地方部队机关可留一部分生产地；如无多余时，则地方部队机关应另行开荒。

十一、大纲第十一条之补充：土地所有证之样式，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规定，由各省政府照式印制，交各县政府负责填发。

十二、大纲第十三条之补充：区村两级应组织人民法庭，其组织及办事细则，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颁布。

关于死刑的最后批准权，在基本解放区属于群众斗争对象者（如恶霸、汉奸、地主、富农、警察、土匪等），由县以上政府批准；属于干部及政治案件者（如地下军、国特等），须经省以上政府批准。在新收复区，属于群众斗争对象者，由等于县级之工作团批准；属于干部及政治案件者，由等于县级之工作团的上一级批准。

十三、在东北解放区境内各少数民族应与汉人同等分地，并享有所有权。

十四、本办法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施行，其解释及修改权属于东北行政委员会。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
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草案）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八日）

一、大纲第三条所称："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包括教堂的土地在内。

二、大纲第四条所称："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不包括商业买卖的债务关系。

三、大纲第六条所称："按乡村全部人口"系指该乡村实行平分土地期间现有人口而言。除按大纲第十条（甲）项之规定："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外，统按当时现有人口，平均分配。

四、大纲第六条之补充：

（甲）民国三十四年以来所开之生荒地，应属于开荒主所有，不在平分之列。

（乙）富裕中农的土地，得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下，酌予抽出，但不得动其浮财及房屋。

（丙）逃荒户、移民只能确定在一个地方分一份，不得两头重分。

（丁）逃荒户在外无音讯者，依法分给土地，不分浮财，该项分地由村农会保管，暂给雇农贫农及其他贫民耕种，不出租金，只纳负担。但留地以三年为期（从分地之日算起），逾期不归者，该项份地即另行分配。在期限内，归来分地者，如其现住地在解放区，须由该地农代会证明。

（戊）清真寺的土地，在各该乡村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下，由回民自行处理。

五、大纲第七条之补充：地少人多之地区，经平分后，雇农贫农仍不足维持生活，在自愿原则下，可采移民办法解决之。

六、大纲第八条之补充：

（甲）地主兼在城镇出租房屋者，其出租之房屋得一并没收分配之。一般以分给该城镇贫民为原则。分配办法由该城镇人民代表会（或其委员会）决定。如与乡村发生争议，可会同县农民代表会（或其委员会）解决之。如该项房屋系承租人用以经营工商业者，则没收分配后，其与承租人之关系，应依租佃房屋之习惯办法处理之，原则上，不影响工商业之经营。

（乙）自反奸清算以来，干部所多占的果实必须退出。

七、大纲第九条（甲）项之补充：山林、桑林、竹林、水利、苇地、果园、池塘、湖沼、莲池等，由各地农民公议，可分者平分；若平分不利于经营者，可采取合股办法经营之。

八、大纲第九条（乙）项之补充：

（甲）政府已开采或准备开采之矿山地不分；已发现之矿山，政府暂时不开采者，可分给农民经营，俟需要开采时，即行收回，由当地政府给农民另行调剂土地，并适当补偿其生产的损失。

（乙）旧有铁路沿线之附属公地、准备即时兴修铁路之用地、现有农场、公共建筑，公园、陵园以及指定的公路、河道等土地，概不得分配。此项用地，由有关之各级人民代表会（或其委员会）与政府共同确定之。任何人员不得借口擅自留地。

（丙）河滩地、沙地、义地等，由县区农民代表会（或其委员会）处理之。

九、大纲第十条（乙）项之补充：家居乡村的失业工人无法维持生活者，得经该工人现住地政府之证明，回原籍分地。

十、大纲第十条（丙）项所称“人民解放军”，包括解放战士在内。

十一、大纲第十条（丙）项之补充：

（甲）凡自抗战以来在前线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包括人民解放军军人、民兵，民工及其他人员），本人仍应与农民分得同样一份土地和财产。

（乙）准备安置荣誉军人及退伍军人之土地，由行署统筹保留，不得分配，但其数量不得超过该行署区土地总量千分之一。此项留地，暂由所属县农民代表会（或其委员会）交给贫苦农民及其他贫民耕种，不出租金，只纳负担。

十二、大纲第十一条之补充：土地所有证之样式，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统一规定，由各行署照式印制，交各县政府负责填发。

十三、大纲第十三条之补充：各级人民法庭的组织条例，由晋冀鲁豫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之。

十四、大纲第十六条之补充：

（甲）本条所称“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系指其分配情形符合于中国土地法大纲原则与精神的地区而言。如尚有非法多占，肥瘦不均，致贫苦农民不足维持生活情况者，仍须检举重分或加以调剂。

（乙）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地主富农如有虽劳动而仍不能维持生活者，得依法补给土地。

十五、本办法在必要时，得随时修改之。

十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194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
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任弼时

我想讲的是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是几个重要问题，但不是土地改革的全般问题。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获得有很大的成绩，在广大解放区内掀起了热烈的群众运动，已经或正在彻底消灭中国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使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翻了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运动，也是我们今天战争能够胜利发展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所最为惧怕的。去年9月土地会议，全般的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并作出许多重要决定。中央根据土地会议的结果，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建议各解放区政府施行。土地法大纲的公布，清楚而明确的在全国人民面前指出我党土地政策的方向和办法。对于这个方向和办法，我们应该坚决拥护。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土地改革工作是一项繁重复杂的工作，我们为了拥护土地改革，为了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目的，除了提出土地法大纲之外，还必须对于农民实际运动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给以正确的具体的解决。我现在根据中央最近的决定，讲讲在这一伟大运动中所发生的，必须引起全党注意的下列几个问题。

一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

中央最近重新发出了1933年的两个文件，“怎样分析阶级”和“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给各地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参考文件。这虽是1933年的文件，但今天一般还是适用的，其中关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央所以发出这两个文件，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份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份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份定错了，弄得敌我界限没分清楚。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划清界线，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了自己。如果许多人定错了成份，那就搞乱了自己的阵营，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很大的。我现在举一个晋绥的材料来说明这种危险性的严重。据晋绥分局上月讲到纠正兴县蔡家崖行政村定成份中的错误时说：全蔡家崖行政村（缺岔儿上自然村）共五百五十二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占总户数22.46%。据一般的估计，在旧政权下农村中平均地主占总户数约为3%，富农

约为5％，合计地主富农共约占8％的户数，百分之十的人数。老解放区内，很多地主及旧富农已经变化，变为其他成分，地主富农的户数应该少于8％，而蔡家崖地主富农的户数则比8％还要多出将近两倍。后来分局按照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的原则经过农民代表委员会重新评定的结果，认为一百二十四户中，可将破产及下坡地主十一户，生产富农二十户，共三十一户改订为富裕中农或中农。这样则地主富农可减为九十三户，占全户数16.84％。后又把时间的标准从1937年缩短到1940年来评定，则全蔡家崖（连岔儿上共有五百七十九户）地主富农可降为七十一户，还占总户数12.26％。如果按地主劳动五年，富农停止剥削三年者均以农民成份计算，则地主富农的户数应当还要少些。

兴县蔡家崖算是当地地主富农比较集中的地方。该县多数乡村地主富农没有蔡家崖这样多。可是蔡家崖的经验，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兴县蔡家崖从事土改工作的同志们怎样划错了成份呢？据称：三十一户下降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因其祖父父亲剥削过人，本人在1936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前一年，剥削已很少，或已不剥削者，错算了十五户。

（二）本人早年享受过地主富农生活，抗战以前（后半辈）自己劳动即未剥削人，或剥削很轻微者，错算了五户。

（三）本人勤苦劳动，只有轻微剥削，而“铺摊”大（财产多），这样算错者七户。

（四）本人早年很穷，过继或被卖给地主富农为儿子，自己劳动为主，剥削很少或不剥削人者，错算了三户。

（五）因孤儿寡妇无劳动力，中间一段雇过人，父亲是农民，本人长大也是农民，就是说因偶然丧失了劳动力而雇佣长工遂错算者一户。

（六）此外过去定成份中对经济状况剥削关系很难确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态度决定其成份的升降。

总起来看，在蔡家崖和晋绥其他许多地方，过去是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这样许多项目来作为定成份的标准的。除剥削一项以外，拿其他几项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这样只在一个蔡家崖行政村，就订错了五十多户，约有三百左右的人口，被我们算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这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队伍里面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是多么严重的错误！

农民对于这许多人定错成份表示什么态度呢？分局的同志说：农民代表委员会上讨论时，各委员均赞同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划分成份法，但他们怕纠正。有的说：早有贫雇农觉得把阶级敌人搞多了，但不敢说，怕别人说是包庇地主富农。多数委员说：有些所谓生产富农本来是中农，勉强定成富农，他们不当兵了，对咱们不利。又

说：剥削少的生产富农定成中农，可使中农大胆生产，对生产有好处。由此可见农民对大批人错定成地主富农，是不满意的。认为这就树敌太多，自己力量减弱，妨碍生产发展，这是很正确的看法。

这里必须指出，我提出兴县蔡家崖划错阶级成份的问题，只是当作一个例子来说，在晋绥其他乡村，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如象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份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的检查这个划成份的问题，公开的明确的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那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象蔡家崖那样定阶级成份的标准是错误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定成份的正确标准呢？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生产资料是什么？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工厂、机器、原料和其他资本。农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

根据上述这一标准，就很容易区别农村中的各种阶级成份。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份一般可划分如下：

（一）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

（二）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和出租一部分土地。他们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

（三）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

（四）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

（五）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

农村主要阶级成份，一般就应当是这样划分的。但出租土地或雇用长工的人是否一律按地主富农处理，而无例外？例外也是有的。如孤、寡、废、疾，丧失了劳动力，这些人的小块土地，是可以允许出租的。还有如医生、小学教员、工人，他们家里有少量土地，因自己从事其他职业，而不能兼顾耕种，虽出租其土地或雇人耕种，仅够维持其生活者，也不能算为地主或富农。此外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形，需要详细规定，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最标本的情形。

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最近决定采取比1933

年更宽大些的政策，即有轻微剥削（如雇人看牛或拦羊，请零工、月工，甚至个把长工，或有少数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债），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25%（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这比1933年规定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15%的限度，是更宽一些了。剥削部分超过25%而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新区在建立民主政权以前一年，地主富农即已破产下降为中农或贫农者，即应承认其为中农或贫农的成份。一年就决定改变成份，是因为他们是受国民党统治压榨而逼着下降的。但是由农民上升为地主或富农者，即原来长年贫苦勤劳积累致富者，就须上升三年以后，才算为地主或富农。

老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民主政权下因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清算斗争，或其他原因而下降，凡地主自己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人，连续有五年者，应改变其成份，评定为农民（按实际情况定为中农、贫农或雇农）。富农已连续三年取消其剥削者，亦应改为农民成份。但是这些地主富农仍保有许多封建财产者，则仍应交出其多余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地主富农改变了成份之后，是否可以加入农会、贫农团，则应由农会和贫农团加以审查，分别决定之。

在1933年的分析阶级中讲："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土地之权。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现，把地主富农出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这是1933年对于红军中的地主富农出身的指战员的处理。现在，被允许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少数地主和富农，在他们脱离家庭，受过革命教育，经过战斗考验，如果在战斗中坚决勇敢，又并无包庇地主富农，破坏土地改革的行为者，也应改变其成份，享受一般革命军人的待遇。因为他们是参加流血的斗争，其年限应比在地方上缩短些。在军队中，合乎上述条件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者入伍满两年，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入伍满一年者，即可改为革命军人的成份。这些人的本人及其家属分得的土地财产不能少于一般农民（也不要比农民多）。阵亡残废或退役者，均应按革命军人烈士，荣誉战士与退役军人看待。但在战争中表现动摇或犯有其他罪行者，在土改中表现反对或破坏者，那怕参军很久仍应坚决加以洗刷。

地主劳动五年，富农不剥削三年即可改变成份，是否有危险呢？我看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他们的土地财产（富农的是征收其多余财产，不是全部财产）已经平分了，又有这许多年的劳动，是可以把人加以改造的。在改变成份以前，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此深入土改斗争时期除个别被允许者外，一般以暂时停止其兵役权为妥。至于参加担架队与其他支援前线工作，则仍应分配给他们做。

二　应该坚固的团结全体中农

消灭封建阶级，是一个很残酷的斗争，我们必须依靠贫雇农为骨干，满足贫雇农要求，并坚固的团结全体中农，才能把事情做好。联共党八次代表大会上（1919年）特别

强调团结中农的重要，指出对中农要“细心体贴”，并且说把富农与中农混淆起来，“是违犯了共产主义的一切原则”。把问题提到这样严重，是因为侵犯中农利益，必使中农动摇，甚至可以被地主富农利用，而使贫雇农陷于孤立。如果这样，革命就会要失败。

中农在旧政权下，约占人口20%。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50%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只有少数人不是中农了。在过去打日本时，中农出力出钱不少。他们打日本是有功劳的。在现在打蒋介石时，也靠他们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粮食。现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30——40%是中农。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新老中农。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是值得贫雇农学习的。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完备，可以给贫雇农以帮助。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

但据我们知道，在许多土地改革运动发动起来的地方，在一切解放区，却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左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首先就是定错了一些中农的成份。比如前面说的蔡家崖一个行政村内，就有五十多家中农和富裕中农（甚至还有一些贫农）被错定为所谓生产富农或破产地主。许多地方被错定了成份的，其财产也被没收了，有些连人也被打过。

其次表现为办事不要中农参加。中农怀疑还要不要他们了。除已经平分的老区以外，贫雇农团结起来，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土改运动的骨干，那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走到贫雇农包办一切，那就错误了。例如选举农民代表会的代表或委员会的委员里面，只有贫雇农，没有中农参加。许多重要问题的决定，例如决定成份、分果实、分配负担等的会议，不让中农参加，那就使中农感觉自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贫雇农手里，表示非常不安。

再则在负担上不照顾中农，特别加重中农负担。有些地方发现了分派公粮时只由贫雇农小组商量决定，因为土改后地主富农无力负担，就把应分派给地主富农的公粮负担都派在中农的头上，甚至送公粮也多派在中农头上。这样做法，也是必然要引起中农反对的。

此外，在分配果实时，有完全不分给中农的。因此使中农感觉斗争时候要他们参加，误了很多工，而在分果实时就无中农的份。甚至连开分配果实的会，也不让中农参加。

上面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应该引起全党来注意，必须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

贫雇农与中农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这是可以解决的。中农在旧社会中一般是受剥削和压迫的。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消灭封建制度、要求政治民主等根本问题上，具备一切条件，与贫雇农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共同奋斗。他们之中的分歧，主要就在于贫雇农不满意中农在斗争地主富农时表示不够坚决，有时动摇犹豫。中

农的这种软弱性确是存在的，但只要实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原则，即坚决领导中农向封建阶级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同时不损害中农利益和给中农以政治教育，那就可以领导中农一致斗争的。其次在平分土地时，富裕中农可能不愿分出其一部分土地。平分土地是消灭封建制度的最彻底最好的办法。在平分土地中，中农的绝大部分是不分进也不分出，只有少数富裕中农可能要拿出一点土地（其浮财则一点也不能动），下中农还可分进一些土地，但在实行平分土地时，必须和中农商量取得其同意，如果在动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土地，而他们自己表示反对时，那就应当向他们让步，不动他们的土地。在分配果实时，应向贫雇农说明：拿出一部分分给中农，以照顾团结。总之，要在各种问题上注意团结全体中农，要懂得团结农村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我们消灭封建和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要团结全体中农，首先要作到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要定错中农的成份。已经定错的，必须重定。要向他们说明过去是因为没有学会分析阶级弄错了的。如果已经没收了东西的要尽可能退还。已经分用了的，则应在没收地主果实中抽一部补偿他们。若中农有多余的粮食而贫雇农迫切需要者，可算做借粮。如果出于中农自愿捐出一些粮食救济灾荒，那自然是好的。

其次，办事一定要吸收中农参加。在农民代表会的代表中，农会委员中，要有中农参加。使中农确实享受政治上的权利。在贫雇农占多数的地方，在农民代表及农会委员会中，中农大约可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数，贫雇农占三分之二。在中农占绝大多数的老解放区（其中许多是由贫雇农上升的新中农），中农所占的比例就应该增高。大约贫雇农占三分之一，中农占三分之二。各级政权机构中均应有中农参加。各种问题，如定成份，分配负担，分配土地财物等，雇农团（或贫农小组）可以先加讨论，但最后必须在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上通过才能施行。而且开会时要很好的尊重中农意见，中农的好的意见应当采纳，如果中农有不正确的意见，应作耐心的说服，或给以适当批评，但批评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必要的斗争，仍是为着团结全体中农这个根本方针的。

再次，负担必须做到公平合理，例如公粮负担，支援前线以及其他种种人力、财力的动员等，绝对不能因为地主富农不能负担就通通加在中农身上去。这是中农最害怕的，也是不正确的。对贫雇农在负担上适当照顾是必要的，但也不能与中农相差太远，而且一切负担的分配，最后应在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上讨论通过。

只要成份不定错，不侵犯中农利益，吸收中农参加工作，负担又公平，平日对中农又能加以体贴，经常给以教育，那一定能把全体中农很好的团结起来。这样，就是合乎共产主义的原则。领导机关要经常注意，时时刻刻加以检查，如发现有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的倾向，就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这种纠正必须是公开的纠正，必须使一切人都知道，应当在报纸上发表。

三　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

在经济上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一场恶战。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在经济上尽量设法保存力量，时时刻刻企图复辟。地主富农想尽办法钻到政府和党里面来，把自己女儿嫁给干部，收买狗腿子和坏干部、坏党员。你说要组织贫农团及农会进行土改，他们也可以组织一些假贫农团假农会，实行假没收，假分配，也开大会“斗地主富农”，用这些办法，达到保存土地财产的目的。所以，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要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把封建阶级消灭。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晋绥和陕甘宁两区，想在今年春耕前把全部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工作做好，这是不容易办到的。若能在两年至三年内把整个区域的土改工作做得彻底，而且把党和政府也改造好，建立起新的民主作风来，那就很好了。

消灭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不要在搞地财上耽误很多时间，不要将没收地主的浮财堆了很久不去分配，以致妨碍分配土地这一主要环节，如象现在有些地方做的那样。在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的地方，地主把现款投资于工商业比之埋在地下为有利。所以1933年时代江西等地搞土地革命，并没有把搞地财看得很重要。在交通不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地财可能要多些，若能用适当办法不搞死人命能搞出地财来，那在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籽困难上有很大好处。但不要钻在搞地财里面，而延搁了浮财与土地的分配，以致妨碍群众的生产。地财可以慢慢的去搞，同时也不能单靠搞地财来解决农民的困难。政府应举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分地后的困难。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着解放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使农业经济有大发展的机会，所以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公粮以利于战胜反动派，并求得日益增多的当作商品出卖的粮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与工业获得足够的农业产品。

现在许多地方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对富农和地主用一样的方法去斗，甚至要打死一些人，对地主甚至对富农一律用扫地出门的办法等。打下地主的威风是必要的，但并不要每个地主富农用一样的方法去斗。首先对富农与对地主的斗争应有区别。土地法大纲上规定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产及其他财产。对富农除土地一同平分外，只是征收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即征收其多于一般中农的财产，并非全部没收。把富农如同地主一样去斗，不但是混淆了上述区别，更重要的是可能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因为中农是介乎富农与贫农之间的阶层，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总想发展到富农的地位。如果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地主与富农分别开来。

以后对富农只能采取征收其多余财产的办法，不能没收其全部财产，房屋，更不应用扫地出门的办法去对付一般富农。搞富农地财也不能如搞地主地财一样，因富农自己是参加劳动的，他的积蓄的一部分是自己劳动的果实。

对地主斗争的方法也应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对大地主及恶霸斗得严厉些，借以警告其他地主，使其他地主懂得土改是大势所趋，不能拒抗而拿出他的土地财产，或是用谈判方式使他们将土地财产交出来。拿出土地财产来的就不一定要拿到大会上去斗，只要他屈服，低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

我们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采取消灭政策。对一切地主除少数汉奸及内战罪犯经法庭审判定罪者外，均应按土地法大纲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还因为如果我们不分给以必要的土地财产，他们就会去抢，去偷，去讨饭，弄得社会不安，农民反受损失。即使是犯罪分子，只要其犯罪程度未至经法庭判决枪毙者，亦必须分给一份必要的土地财产，社会秩序才能安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作，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若地主保有工商业而足够维持生活者，自然可以不分地给他。若工商业太小不足维持生活者，还需分给一部分土地。

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有些贫苦农民，在过去民主政权下劳动生产上升为新富农，在此平分土地时期，应照富裕中农待遇，其土地在平分时应取得本人同意，方能抽动其按照一般中农水平的多余部分，如果本人不同意，则不应抽动。因为这种新式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若现在又打击这种富农，就会引起中农动摇。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四　对工商业政策

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各地已发生有破坏工商业的现象。例如陕北神木地区的高家堡当被我军收复时，连小商贩也没收了。这是一种自杀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一般工商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就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同样是应当受到民主政府的保护。不要以为这些工商业是地主富农所投资而加以歧视，这是不对的，而应当看到这些工商业的存在，有益于今天的社会经济。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并且确定这些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不得停闭，更不得破坏和任意分散。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你们不久就要打出去，必须严格遵守这种政策，绝对不能重复如象高家堡一类的错误。那么地主在过去减租减息时期将土地变卖而投资工商业者，现在是否可以没收呢？不可以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保护和鼓励

这些工商业，因为这样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需要的。在斗地主地财时，必须规定不许地主破坏已有的工商业，否则要受处罚。

毛主席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着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把毛主席这篇道理，向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譬如地主开座煤窑，农民从目前局部利益出发，是可以举手拥护没收分配的，因为将煤窑的工具和物资大家分到一份可以暂时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批准这样做，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说服农民懂得煤窑完整存在的利益，分散了就会把煤窑弄垮，结果自己也会无煤烧。这就妨碍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说解放区经济要独立自主，我们不能作殖民地的殖民地。只有经济上不依靠别人，军事上政治上才会有力量。我们要经济上能独立自主，就要使公营的、私营的、人民合作经营的手工业，工业，以及农村的农业都有一个发展；生产人民与军队大量的必需品和粮食；使我们对外贸易能保持平衡，以至出超，不去买蒋区的货物和美国货。

有了工业农业生产品，就需要有商业，例如公私商店、消费合作社等作为桥梁，使生产者能卖出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使消费者能够得到这些商品，经过这样的流转，才能使工农业进行再生产与扩大的再生产。现在解放区内政府的贸易公司还没有力量普设商店（现在许多机关部队所设的公营商店，往往为着解决本单位困难，没有负起应有的任务，甚至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发生），合作社也发展得不普遍而且往往办得不好。因此，私商的存在是需要的。商人当然有剥削；商人的商业行为本身不生产任何价值，他们或者是分享资本家一部分利润，或者是直接对生产者消费者实行剥削。有时囤积居奇，作投机事业，为害更大。但问题不是要去破坏商业，而是要去领导商业。要能掌握整个商业的发展，要商人为我们所用，而不要我们为商人所用。这种政策对于人民固然是有利的，对于正当商人也是有利的。至于小商小贩，大部分是贫苦的，他们的生活只相当于贫农中农或富裕中农，更不应该去打击他们，如在陕北高家堡所发生的破坏商业的情形，是绝对错误的，那里的商业搞垮了，老百姓买卖东西就要到榆林、神木或镇川堡，那就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绝对不能破坏，破坏是一种自杀政策。对工商业必须收税，但必须订出恰当的税率，不要收得太重。这种税率，以不致影响他们的经营与发展为原则。否则，就会犯错误。

五　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

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我们应采取什么政策呢？

我们对于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知识分子如何看法？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

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并且应当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

这些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是有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一般都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谋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过着经济上很困难，政治上很不自由的生活，其中还有不少的失业者。至于在科学上创造发明的机会，更是少极了。他们中也有极小部分人，是坚决跟反动派跑的，但是极大部分人看到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种种腐败反动，而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帝国主义侵略表示不满，对于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抱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态度，这些人是可能争取的。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服务的。

至于学生，从国民党城市近几年的学生运动及我们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学生是不满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去年一年的三次大的学生运动，是我们正在农村中实行土改的时期爆发的。许多倾向革命的学生，包括若干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并不反对改革土地制度。积极地为民主而斗争，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土地改革是他们所要求的民主的一个基本部分。其他的许多学生，因为看到了革命发展，天下将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国建立的这种大势，也可能接受进步思想，逐渐转到民主方面来，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统治。在广大的学生群众中，反革命特务分子是有的，但他们只是绝对的少数。学校中的三青团员，也并不是个个都坚决反革命。其中只有一部分、或者只是一个极小的部分，是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专门反对革命破坏学生运动。因此我们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应帮助他们进步，吸引他们参加反帝争民主的斗争。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解放区内已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还在继续发展。三五年内，革命就可能在全国胜利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例如建立一个医院，要设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牙科等，就要有许多医生、医助、护士。这些人才，要经多年学习和实际工作锻炼，才能培养出来。例如要修一条铁路，必须有工程师和其他的技术专门家，还要有大批段长、站长等。又如被战争破坏了的铁路，将来要迅速建设，还要建设新的铁路（现在解放区后方就已经在建设），靠我们军队的工兵连当然是修建不起来的。又如土地改革后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我们就要许多农业专家，来改良种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们办兵工厂和其他工厂，就需要许多工程师、专门家。开商店、搞贸易，需要很多会计。办学校，要教员。这一大批技师、专门家、科学家、教员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养出来的，要有专门的学校来培养，多年才能毕业。我们目前还没有如此多的有知识的专家，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门家来替人民办事。我们一面使用这些知识分子，一面教育和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他们的大多数是有建设热情的，在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事业中，其中的大多数一定是会进步的。

现在农村中还有许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没事做，我们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服从民主政府法令，特别是土地法，不反对共产党的政

策，愿为人民服务，不进行破坏活动，如有违法行为甘受政府法律制裁，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可办各种训练班，训练技术和政治，慢慢改造他们，然后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但不要一下用在紧要的岗位上，而且要经常提高警惕性，防止他们中有些坏分子的破坏。经过长期考验过的，才可放在重要岗位上工作。

我们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这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同时，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要使翻身的工人农民得到知识，并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或他们的子弟培养成知识分子，培养他们负担建设任务。如果只能利用旧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那就会要犯错误。

在抗日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例如李鼎铭等，参加了政府和参议会，这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对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怀疑这种成功，是错误的。现在打倒蒋介石，实行土改，是否这些开明人士就不要了呢？不应该。他们过去同我们一道打日本，现在又和我们一道打蒋介石，他们和我们共过患难，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地是要分的，但不要去斗。他们有错误，可以给以批评，不要去打。只有那种错拉了进来，恶迹很多，真是为人民所痛恨的恶霸分子，才应交给人民法庭当作恶霸去处理。过去有功绩现在又赞成土改赞成打倒蒋介石的，还可以继续办事。李鼎铭死了，如果未死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工作。你们假如出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90％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的。

六　打人杀人问题

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资产阶级尚且提出这种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为什么把打人杀人的问题当作严重的问题提出来呢？就是因为在土改运动中，发生有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实，更由于党内不纯，地主富农投机分子和流氓分子利用机会捣乱，就造成了乱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现象。有些罪不该死的人，被打死杀死了。这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我们反对乱杀人，并不是说一个人也不能杀。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分子，国人皆曰可杀的这类分子，经过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经过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或更高的政府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执行枪决，并公布其罪状（杀人必须公布罪状，不得秘密杀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能建立革命秩序。但是不能随便加人罪名而去处人以死罪。须知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

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到暂时的失败。这是因为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地主富农在中国农村中占人口约10%，全体人数约在三千万以上，他们在封建半封建的中国旧社会中，是完全依靠或大部分依靠封建剥削过生活。当着这种封建剥削制度彻底废除之后，分给他们以如同农民一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劳动来生活，那他们就可以逐渐被改造为替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利益的力量。如果任意杀害许多并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地主富农，这不仅会失去群众同情，孤立自己，而且还损失了国家的劳动力，使社会上要少生产一部分财富。如果被杀害者的家属因为缺乏劳动力不能生活时，还要增加社会上的负担。

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群众运动中，出于群众的真正义愤，而去打了一下压迫他们为他们所极端痛恨的人，共产党人不应当禁止和拦阻，而应当对于群众的义愤表示同情，否则我们就会脱离群众。但是共产党人，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应当组织打人。我们必须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应有远见的去改造已经缴械投降了的地主和旧式富农；我们是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并不是要消灭地主个人。对于缴出了土地财产的地主，应当要他们劳动，把地主和旧式富农当作国家的劳动力看待。同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自己。只有把他们都改造成为劳动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阶级的遗迹也消灭了，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功。

农村中犯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由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加以审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审查时，有时也有挨打的事。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中很多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因此能够领导人民，坚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进行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民主改革。但其中也有不少人作了许多对不起群众的事。他们在作这些事时，有些是为急于完成上级给他们的任务，但是方法不好而发生的，例如催粮草，派担架，时间很紧，又没有学会民主作风，他们就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打骂了群众，得罪了群众。这样的事不能完全由下面地方工作干部负责，上面领导机关交给任务太多，时间规定的太急，平时对民主作风的教育太少，也有责任。但有些事，例如多分果实，假公济私，贪污腐化，横行霸道等，那是完全违背领导机关历次指示的，那是要干部本人负责的。上级如果也有责任，就是没有立即发觉、制止、处分、或根本撤消其工作。但这些区别群众并不容易常常分得清楚。在群众审查大会上，过去被打过被欺压过的群众，很容易走到用打的方法作为报复的情形。因此，我们要向群众解释清楚，或者在开审查大会之前，就先向积极分子说明白，对被审查的干部，准许群众放手批评指责，但不准动手打人。同时，也向被审查的干部说明，要向群众好好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许报复，违者由政府用法律制裁。在审查会上，要准许被审查者有充分说理之权，不准说理是不民主的。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

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除此以外，还要允许群众对被审干部有直接撤职或建议撤职之权。对其中最坏的有犯法行为的干部，群众有权向人民法庭控告。我们说服群众不能打人，但如不给群众这些权利，他们就不敢批评了。总之，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这样规定，群众敢于批评，被审查者也有申诉的机会，这样就可以达到建立民主作风的目的。

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

习　仲　勋

毛主席：

（一）寒晚回××，删铣两日开西北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央会议精神，求得领导上思想上一致，并按边区实际情况把中央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规定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免得多走弯路。筱日召开边区级干部大会（六百四十人）传达毛主席报告，继即召集边区一级参加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之九十名干部开检讨会三天，为的求得中央精神首先在这两区贯彻，再去推动警区其他各地。

（二）遵照九日电示，明芳去延属，文瑞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拟于日内动身。为更密切的指导各地土改与救灾，切实克服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特通知各分区和县负责同志经常分散下乡，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这种方法既可提高领导，又可加强工作，为真正的树立一种踏实朴素的领导作风而努力。

（三）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即不对的一股浪头），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的净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为狗腿子。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现在中央新的精神已经下达，各地正在转变，估计几日内就可全部走上轨道。

（四）我感到边区土改仍有下列问题值得注意：

甲、土地革命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但要改变成份那是很不容易的。此外，现在深入考查起来，边区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还不是目前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这分明的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了怀疑，如不从坚持贯彻正确政策中打破这一关，对党对人民都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

经过超一级批准。

乙、在土地革命地区，的确中农占优势，即减租地区也起了基本上的变化。如不看到这个情况，必犯重大错误。如延义两区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参加七年以上的劳动，其中有的还保留有多量底财或浮财，应该只将其保留的多量底财与浮财分配给农民，成份应按现在情形改变，既不脱离群众，又不过多树立敌人。

丙、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是地富成份还未转化的，有因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就出的乱子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群众中也同样发生此种现象。很多地区掌握不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之，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份贫农中。

丁、不应再算老账（特别是政治上的）。过去党的政策对这些坏人只要他诚心悔过，不究既往。十年以来他们的确改好了，如把旧账一齐翻起，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影响传播出去，更对我不利。故决定政治上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只对那些今天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或帮助胡匪作恶的应发动群众严厉镇压。这才是正确的维护党的政策，否则，会减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戊、死心踏地跟敌逃走作敌忠实走狗者为投敌份子，否则均采感化争取政策。

己、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真正霸占一方欺压群众者是恶霸。不能把在乡村说话好强的，或会砍倒别人一颗树或做过其他一二坏事，统按恶霸惩办，也不应该男人是恶霸，女人也当成恶霸，甚至连小孩也当成小恶霸去斗争，这都会造成许多恶果的。

庚、老区因土地早经平分，有的如绥德老区经过五次变革（分地、归地和去春土改），今天多数还是再加调剂问题。这些地区群众对民主与负担公平要求更迫切，往往一开始便要斗干部。

辛、边区土改务必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土改就无法进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不然，群众连开会都不积极参加，叫“穷开会”，“开穷会”，这种批评是很对的。诉苦斗争也不应准备一套形式进行，把诉苦教育贯串在土改的一切问题上，并把反对胡匪对边区人民利益的破坏和蹂躏密切结合起来，这更有其真实意义。

壬、救灾各地已真实重视，且均采取细密组织与切实负责。由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具体解决问题的方针，这已开始产生了新的作风，救灾不至成为难事。

（五）上述各项问题，连同以前报告，中央如无不同意见时，准备发一文字指示，把一些重大问题明确起来。

为纠正“左”的错误给各中央局的信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毛　泽　东

（上略）我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地老解放区如有同样情形者，必须密切注意改正。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领导机关千万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只要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就可以纠正过来的。但纠正时，必须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纠正左的错误而误认为不要动了。

关于老区贫农与中农领导地位问题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

李井泉

根据蔡家崖村中农积极份子的座谈，以及我们的研究，关于老解放区贫农与中农领导地位应占比例，有着如下的意见。在蔡家崖村，我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蔡家崖四八户农民中，贫雇农占一五户，新中农占一七户，老中农占一六户，三种成份，约各占三分之一。其中的老中农有几户是同情新中农及贫雇农的，也有好几户是同情富农的；但是新中农则极大部份是同情于贫雇农的，他们能体会他们同贫雇农之间，只是翻身的迟早不同，他们除开土地数量较贫雇农稍微多一点外，其他如生产工具、生产资本、副业及存粮存物等，均赶不上老中农，因此，他们仍有彻底翻身的要求。至于还不曾翻身的贫雇农，过去确因清算关系不多，且在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领导下未加照顾，部份的老中农，又看这些贫雇不起，因此贫农小组的组织，他们感觉到迫切需要。但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新中农要求参加贫雇农小组而没有得到参加只吸收了少数新中农参加，大多数新中农不满意，而老中农则又发出“贫雇农包办”的不满情绪。——根据上述的情况，如果在老解放区贫农只占全体农民三分之一，不吸收中农参加领导，则贫农便要陷于孤立，因此，新中农及贫农积极份子，提出了贫农新中农在农会及农民代表会中占三分之二，老中农占三分之一的主张，他们的理由如下：

一、贫农与新中农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一般的新中农都不愿同贫农割离，而贫农又赞成如此做。

二、新中农与贫农在农民中它所占的比例既然是三分之二，因此它们在领导地位上占三分之二，也是适当的。

三、老解放区的贫农积极份子认为：一方面要吸收多数新中农参加；另一方面又认为什么事情都必须经由贫雇农讨论，则贫雇不胜其烦，他们主张农民的事情，一概由农民来讨论，只有在问题发生争执时，再开贫雇会议来加以讨论，从不同中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在老解放区可将贫农团或贫农小组的权力缩小到只负保护贫雇农利益的作用，在实际上是可以的。

四、此种作法，一面可避免贫雇农脱离中农，同时也可避免贫雇农产生“贫农吃不开”的顾虑。关于谁领导谁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农占三分之二，贫农占三分之一的比例是并无冲突的，并且觉得新中农更为妥当，因为新中农能接近老中农，更易团结老中农，同时今天的实际情形是贫雇农劳动力少出来工作较为困难，因此多选新中农积极份

子来参加领导工作，是必要的也是能在群众中通过的。

五、根据我们的研究，老区的土地，经过减租减息，以及经过五四指示以后一年多的土改，不少的地区确已实行了平分土地、在这类地区决定采用绥德黄家川的填补办法来分配，这可以避免动中农土地过多，以致影响生产的弊病。现在亦有部份地区采取平分办法，结果是抽中农地过多，影响中农生产情绪，因此又决定凡是因平分之地超过中农数量三分之一以上户数的土地的地方，即采取调补办法而不采取平分办法。这种办法是否妥当，请来函示知。

覆李井泉同志的信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

毛　泽　东

看到你的报告以后，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在老区凡是已实行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还不十分彻底，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方，即不应再去进行平分土地，而是应该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来满足部份农民土地不足的要求，此种地区如再去平分土地，那是错误的。在这种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来保障贫雇农的利益，在农会委员会中，在农民代表会议及政府中，能使贫雇与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保障他们在农村的领导权，并同时又使老中农能占三分之一的位置，这样做法是很好的。在贫雇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并硬要贫农团去指挥一切，这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路线的，是极端冒险的命令主义。如果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还有这样做的，应立即停止，并将他们调回训练好后再回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起，此事希很好注意。

其次，在老区与新区之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老区，在这种半老区里，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得象老区那样的彻底，但它较之完全没有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又更好些，在这种半老区的工作方针，应同老区有区别，也同新区有分别的，望你们加以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函告我。

对《新区工作问题报告》的批示

毛 泽 东

小平同志的这种负责的自我检讨是很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略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各地负责同志每两月做一次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做出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各地负责同志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中央作报告。

（西北局《党内通讯》合订本第一期）

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

邓　小　平

毛主席：

这几个月的斗争，特别是敌情严重后，使我们深深体验左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最近××区敌人“扫荡中”，有些地主在分了他的浮财后，仍不愿得罪我们，不敢向敌人告密，这些事实证明，我们在策略上完全可以中立一批中小地主和富农。如果我们到大别山后不犯急性病，即使那里经过土地改革，也可能中立他们的，我们的急性病表现如下：

一、我们所提的贫雇路线，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应该是中央所提出的以贫雇农为骨干，巩固的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的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富裕中农，其结果使贫雇农更加孤立，易遭受摧残，甚至影响到贫雇农不敢起来。对阶级划分也犯了与老区同样的错误。

二、不分阶级、不分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富农，一并下手，树敌太多，增加许多障碍，反于农民不利。

三、在工商业政策上，可以说是很紊乱的，虽然中原局曾指示反对开始萌芽的“左”的倾向，但一直未引起注意。大别山我控制区工商业之凋零，虽未作具体调查，但估计主要是我们没有明确的工商业政策，税收过重，纪律不好等原因所造成，敌人摧残确系原因，但非主要的。

四、武装力量分得很散，在游击区一班一排活动，既不能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又无力对付土顽，陷于被动，到处吃亏，失去游击的本能。

五、在工作布置上，对必然到来的严重变化，缺乏预见。不是估计那些区是可以巩固的区，那些是游击区，而有重点的分布力量，规定不同的策略步骤，尤其是未能乘敌之隙打开局面，而是平均的分布力量，普遍的安置县区。

六、一般干部缺乏策略思想的准备，大家是硬着头皮干。×城县委曾注意争取利用伪属及社会关系，打通商会土顽队长关系，可以经常获得确实情报。证明敌人中，有许多的空子可乘，但我们普遍忽视那些问题，我们曾和××区党委共同讨论，规定了下面几点：

甲、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的人。

乙、严禁乱杀乱斗，注意保护工商业政策。

丙、分别可以巩固区与游击区的不同策略步骤，在腹心区集中力量打成一片，而后背朝内面向外发展。在游击区采取武工队的组织形式，武装适当结集，积极主动的打击敌人，特别是消灭土顽。

根据××区党委近日报告，××、××、××等地，我们缩小打击面的界限，在土

顽活动区，采取秘密分果实，组织秘密贫农团，使农民减少顾虑，都很高兴报告土豪埋藏物资，协助打土匪，只要我军与地方干部能照顾群众利益，遵守纪律，群众定能坚决拥护我们，共同对付敌人。

（西北局《党内通讯》合订本第一期）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

根据各地最近数月的报告看来，各解放区，除了去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解放的新区以外，在所有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三类地区，并应根据三类地区的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

（甲）第一类地区，是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其中，大多数地区，是经过了减租减息，清算斗争和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以后的土地改革；一部分地区，经过了清算和土地改革；而陕甘宁的一部分地区则经过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分地及一九四零年的归地。在这些地区，土地已经平分，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不多。阶级情况，除了东北及其他平分不久的地区尚有不同外，地主与旧式富农均比过去大为减少，且有已下降为劳动农民或贫民者，但尚有一小部分地主旧富农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这类地区的工作干部有许多人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这类地区，新富农已经生长，且有多过旧富农者。中农在这类地区已发展为多数，从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上下，其中，新中农占很大数量，有达一半以上者。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一般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约二分之一上下。贫雇农变为少数，从百分之十到四十上下，其中尚有若干未彻底翻身者，亦有由地主旧富农下降为贫农者。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土地已经平分，决无再行平分的必要。留下的问题是在较小的范围内，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使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从地主旧富农尤其是占有超过农民很多的土地财产的干部家庭那里补进土地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需要抽出新富农甚至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取得被抽者的同意，方可抽动。绥德黄家川的典型经验，可以大致应用于这类地区。

（乙）第二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经过了减租减息，清算斗争与五四指示后的土改；另一部分地区，经过了清算和土改，但均由于各种原因，例如领导方针动摇，党内不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战争情况等，致使土地平分尚不彻底，封建制度尚有残余，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较大。阶级情况，地主旧富农较第一类地区为多，大都仍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工作干部中许多人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新富农尚不多。中农占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到四

十上下，其中新中农亦占少数。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因减租清算致土地转移的结果，一般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达一倍上下。贫雇农仍占多数，从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上下，其中多数尚未彻底翻身。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平分已大体实施，但不彻底。因此，一般地也不是再来一次全面的平分，而是实行在较大范围内的调剂。只在某些特殊地方，在多数农民要求并取得中农同意的条件之下，应当重新平分。由于这类地区贫雇农人数最多而土地平均差额又较大，单动地主旧富农及干部的土地财产，一般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势非抽动新富农及一部分中农的土地不可。因此，凡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上下者，在取得本人同意以后，可以抽出中农的一部分土地，但以不超过其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为限度。如此，一方面可使中农波动面不致太大，另一方面仍可保存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但又不致相差太大。如果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以上，并赞成平分时，可以实行平分。在这类地区，绥德黄家川经验中所述土改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亦必须注意采用。

（丙）第三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虽然也经过了清算和土改，但是工作很坏。另一部分地区，则是边沿区或收复区，土改工作尚未进行。所有这些地区，土地并未平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土地关系及阶级情况仅有若干变动，地主旧富农仍占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贫雇农仍然是人多地少。在这类地区，完全适用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方针。平分的重点，应放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及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上面。对于一部分中农的多余土地，必须在取得其同意以后，方能抽出平分。如果某些中农所有土地较一般农民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只超出百分之十以下者，应不变动。边沿区，如尚带游击性质，应作新区看待，适用中央关于新区土改要点的规定，不应列入此类地区。

二

不论是平分土地或调剂土地，不但应注重土地数量的差别，还应注重土地的质量、产量及其位置远近的差别；不但应从农村的一般耕地着眼，还应从公地、荒地、黑地、绝户地等着眼；尤其是非法强占的土地财产，分配不公的土地财产及干部贪污或侵占的果实，更应首先注意解决。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分方针，才能从多方面设法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同时又照顾了中农的利益。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

三

为着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在实行调剂土地时，应首先补足缺地较多的贫雇农。然后，才对于有完全劳动力的青壮年单身汉，补足其两人份的土地，但如土地不足时，亦可补给较两人份为少的土地，或者不补。对于孤老寡妇，因其缺乏劳动力，在土地不足

时，亦可不补给两人份的土地。对家庭人口多的，亦可较家庭人口少的少补。对流氓习气很深一时难望改好者，也可少补，后补，或不补。对于此种流氓，暂时应只给与土地使用权，不给与土地所有权。对于由地主富农下降的贫雇农为时不久者，亦可后补，或不补。总之，要使广大贫雇农群众能合理地补足土地，以利生产，而不应附和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在调剂土地以后，对于孤老寡妇及贫雇农中仍有困难不能解决者，政府另行设法帮助其解决困难。

四

在第一第二两类地区中，在农民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目前应依上述各项规定，于春耕前实行调剂完毕，确定地权，以利生产。在工作尚未做好，估计春耕前已不可能完成土改任务的地方，即应将土改工作推迟至夏季以后进行，并保证今年的土地生产物归耕者所有，而将工作迅速转入生产、整党和建立乡村民主生活上去。在第一第二两类地区中，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在第三类地区中，更应将已着手的土改工作赶快作一结束，推迟至夏季以后重新进行，以便迅速转入生产及一般的宣传组织工作。

五

在老区半老区，应准备以二年到三年时间（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有计划地完成全区域的土改与整党任务，而不应操之过急，致发生许多不应有的毛病。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速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

六

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但是在一切决定发动工作的地方，又要集中力量，按期完成工作计划，不要拖延太久，致使群众情绪减低，既碍生产，又不利于工作的推进。对于一切领导土改与整党工作的领导者及工作团，均必须加以训练，讲明政策，并要适时地检查他们的工作。

七

贫农团无疑是农民群众中坚决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骨干组织。但是在第一类地区平分已经实现、中农已占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也要人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

一切，势必脱离多数，孤立自己。因此，在这些地区，应就原有的农会加以扩充，并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其能领导各项工作。原来无农会者，应成立农会。在农会中，成立贫雇农小组。如果贫农团已经组织起来，则不应马上宣布取消，而应使贫农团逐渐改为农会中的贫雇农小组。在第二类地区，因为平分尚不彻底，贫雇农仍占多数，贫农团的独立领导作用尚未失去，因此应该组织贫农团，并使其在农民中起领导作用，但在组织时，应吸收新中农参加。在贫农团成立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个月）以后，即应就原有农会加以扩充，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其能领导各项工作。原来无农会者，即应成立农会。在土地调剂工作完成以后，贫农团即可改为贫雇农小组。如果在过去土地改革中业已成立有贫雇农及新中农领导的健全的农会，或者有顺利条件能够保证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占三分之二实施土改工作的健全领导的地方，亦可不组织贫农团，而只于农会中组织贫雇农小组。在第三类地区，因为平分尚未实施，贫雇农占多数尚未翻身，中农对土改尚存观望心理，必须首先组织贫农团，发动土改斗争，树立领导威信，一个时期（例如三四个月）以后，再成立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农会应容许新富农入会，但对地主、旧富农及一切投机分子，则应坚决拒绝其入会。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在农会的委员会中，在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委员会中，一般地贫雇农新中农应合占三分之二，旧中农及其他劳动分子应占三分之一。

八

各地整党工作正在开展，并创造了许多方法。其中，以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平山县的典型经验，应为各地所取法。在第一第二类地区，一般的封建势力业已消灭，而农民中的不满常常集中于一批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恶，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身上。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调剂土地的工作，必须与整党工作相结合，有时还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采用上述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毛主席的党通了气；另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此种方法，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工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均应实行。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实行这种方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上级党的领导的健全，一个是本支部要有几个好的党员骨干。如果上级党的领导者的领

导不健全，便须先健全领导。如果某些支部确已为坏分子所统治，甚或全部为坏分子所盘据，没有好的党员骨干，无法进行改造时，就应解散这个支部，上级领导者就应超过该组织，直接动员群众，依靠贫农团、贫雇农小组及农会，领导土改与生产。这样经过一个时期之后，重新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对于原支部的党员，在该支部被宣布解散以后，上级党的领导者得依情况将他们提交贫农团大会或农民大会予以批判或审查，并给以应得的处分。其中，经群众评定认为错误较轻的分子，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证明其确已改正者，仍可个别地恢复党籍。但这是指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支部，总有若干好党员。上级领导者的责任，就在善于发现这些好党员，并依靠他们为骨干，吸收新鲜力量，改造支部，而不要抛弃或不理他们。整党审干，必须采取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应当承认，在战争和土改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批阶级异己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同时又一定会有大批的革命积极分子涌进党来。因此，各地党委在整党工作中，应当分别情况，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罪恶、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应当开除出党。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均应坚决清洗出党。对于那些虽然是从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自愿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们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当作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时候，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并获得党外群众的同意，我们就应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而不要马上开除出党。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都是当时民主中央政府为着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并为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发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曾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以参考文件的方式发给各解放区的各级党委。现在我们决定将这两个文件作为正式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这两个文件中，只有一小部分现时已不适用，现在将这一部分删去；其余全部是在现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的。其中，有些部分现在作了一点修改，或者加上了“中共中央注”的字样。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

（《怎样分析阶级》，见《毛泽东选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见本资料第六册）

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执行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一、关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般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中原全区四千五百万人口，我们业已基本上控制的区域约二千万人口，游击区约一千万人口，还没有到过部队的崭新区约一千五百万人口。而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三千万人口中，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四百万人口，其余的地方，大部只分了浮财。因此，在极大部分的区域，包括没有真正分配土地的控制区及一切游击区和崭新区，都应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地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及酌量调剂种子、吃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及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

二、在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某些干部的抵触，因此，必须使干部从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中来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全部正确性。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

子、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为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为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便利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

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和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丑、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在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而且安徽有反对国民党桂系的力量，河南有反对国民党汤恩伯的力量，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上（即打土豪的政策），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装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以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部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的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冷落和工商停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的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

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今后在补救上最感棘手的问题。

辰、经验证明，杀人过多，不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因此更加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群众的不安和不满，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对土蒋只采取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上的瓦解，一般都是失败的。经验证明，应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在军事上，又应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最反动的部分，中立那些不积极反动的部分。凡是用这种策略的，都获得成功。

巳、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经验证明，在抗战初期，我们实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获得了巩固的后方，即在敌情最严重的区域，也能在大多数人民（包括地富的抗日分子）同情和拥护下安置伤员、建立兵工。而在南下后，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政权在新区人民中，是具有传统的威信，是一个极大的组织力量，而我们却忽略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未能发扬其应有的作用。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于大多数人民要求的，但在新政权毫无准备的时候，我们也失之过于急性，不懂得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府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不成问题的，这些旧政府是不会真心为我们办事的，所以必须尽量地建立新政权，去代替旧政权，但在新政权还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只要旧政府能够办到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混乱，而又能解决一部分军需的作用，对我们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

午、历来的经验，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譬如，我们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开办剧团等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语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

未、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而以军队最为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群众说："共产党军事好、政治不好！"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损失。

申、他如我们许多外来干部作风很坏，对本地干部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精心一意地去发现正派的积极分子，大量地培养他们成为村区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也是我们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

酉、使我们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我们在进入新区之先，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

备，我们一般地对于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进入之后又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无目的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戌、由于无后方作战和在左的错误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难，特别在斗争紧张的地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在滋长。有的人看不见反攻后的辉煌胜利，而迷失了方向；有的人缺乏坚定的战斗意志，而抱着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心理；有的人对政策、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消极应付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我们向中原进军的绝对正确性表示怀疑，或者认为是过早的举动；有的人对敌人的所谓总体战和特务活动丧失警惕；有的部分对群众利益毫不关心，而尽情地耗费人力和物力；有的部分对新区武装的许多严重现象，以及由于收编土蒋、土匪而引起的群众不满，采取优容的态度；有的领导机关对于党内严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曾给我们以不小的损害，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才能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一致，避免工作损失，更有效地获得胜利。上述错误的检讨，目的在于清醒我们的头脑，使今后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对已经弄左了的地方，懂得教育干部，说服群众，研究妥善办法，迅速获得纠正和补救。同时，必须着重指出，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不能掩盖了我们大举进攻后在全中原区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我们业已有了两千万人口的控制区，一千万人口的游击区；大量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我们的军队虽在个别部队有减员，而在整个来说，则有不少的增加；我们对全国新区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就战略形势来说，我们是主动的，在继续歼敌的条件下，我们将更加获得优势，中原全区的解放，为时已经不远，这是在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下，全体同志艰苦奋斗所获得的辉煌胜利。这对错误和缺点来说，恰恰是我们最主要的一面，而且就是这些错误和偏向，及因此而造成的若干混乱现象，也是可以纠正、可以补救的。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业已大体上获得了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着，并且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便是很好的证明。

三、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的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抓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并根据下列的方针和策略步骤，进行和调整各方面的工作。

子、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宣传，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以便在各区党委范围内，制定统一简明的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法令和进行步骤，并据此训练干部，教育群众，准备秋后直到明春，形成一个广泛的双减群众运动。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应区别真分还是假分，是大片地区分了的，还是只在一些孤立据点分了的，问题多的，还是问题较少的，而规定出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般的原则是：真正分了的，一般应该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应该说服群众自愿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而又是环境许可、群众要求的，则领导群众继续完成分地工作；同时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补救缺点。只在孤立据点分了的，则按情况，根据大多数农民意见，不

再变动或说服群众改为减租减息。有问题的，则按问题性质协同群众商量解决办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并且可以吸收在家地富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丑、在游击区，应在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对敌斗争为主的方针下，坚决进行反抓丁、反掠夺、反保甲、特务统治的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及群众要求，适当地实行减租政策，即一般地在地富的同意下，实行双减，或者比控制区减的少一些，或者先从地富自愿的减起，都是可以的。在负担上，政策则应确实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在分配整个负担数目的时候，不可使游击区比控制区还重；而在两面负担的地区，还应酌量减轻。到游击区抓一把的倾向，必须克服与严行制止。在游击区应该采取比较温和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力求各阶层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军及土蒋，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反动特务分子，切不可过于突出，使群众受到可以避免的摧残。凡是敌人控制力较大的地方，还应采取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实行革命两面政策，以反对国民党正在普遍实行的所谓总体战。

寅、在崭新地区，我们进入之后，应该采取更为宽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蒋美和地方上最反动的分子，以便于我们消灭敌人，站稳脚跟。在策略步骤上，切不可操之过急，首先要求不要搞滥，然后根据地区的巩固程度、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状况逐步地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因此在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或联合其较好的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最反动的部分。不要打倒一切，帮助敌人团结，把自己孤立起来。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只对个别业已判处死刑的最反革命分子的本人财产，实行政治的没收，并分给群众。而在执行双减政策时，也应经过宣传组织，政府颁布正式法令等步骤，不可毫无准备地贸然进行。在实行适当调剂种籽、吃粮的政策时，不但不可采取开仓济贫的办法，亦不可强迫地富拿出粮食救济贫民，而应提倡低利或无利借贷的社会互助办法，或者采取由政府从没收或征收的公粮中抽出一部分，举办生产贷款或临时救济的办法。在新区的最大困难，是军队的供应问题，除了在部队进入之前，应作必要的准备之外，可以实行征借粮食和筹款的办法，并尽可能地使之合理，亦即是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在开始时，我们还应懂得利用旧政权机构，但须同时宣布我们的合理负担办法，来筹办军需，避免由我们军队直接去筹，形成混乱。城镇的税收，应该保持，可以暂时利用原有的税收机构，而逐渐地加以改造，暂时采用原有的税收，而逐渐地取消几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凡是能够巩固或占领较久的城市，都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只有对某些较富的又只能占领几天的城市，才可以由区党委、纵委以上领导机关掌握，经过商会，进行一次临时的捐款，其数目不可太大，且应召集商人代表开会，征得同意，千万不得勉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军队在新区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必须认真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医院及一切公共建筑和财产的政策，禁止对任何东西的破坏和浪费，对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和破坏性，作坚决的斗争。

卯、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在控制区，应

配备大批得力干部到政府各部门中去，而首先要加强的是财经部门（包括财、粮、工商、银行、税收），以便保障军需、民生，避免浪费和混乱，及在工作步骤上取得主动。同时注意建立人民法庭，以便接受审理案件，维持社会秩序，避免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的现象。我们的政权性质，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政权性质，抛弃中央的三三制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在区村仍应绝对掌握于农民（包括中农）的手中，但在县以上政府，目前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聘请一些进步的工商业人士，及在地方上比较正派的、有正义感的、有相当声望的、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项基本纲领和政策、而又没有逃跑的开明士绅当参议、咨议，或吸收参加一定的工作。但是聘请参议、咨议时，必须有合格的人选，而且要经过区党委的审查和批准，切不可滥竽充数，流于形式，甚或用人不当，脱离群众。在游击区，则在武工队的统一组织上，采取县区游击政权的形式，在乡村则保留旧的形式，而逐渐加以改造，充实其民主的内容。在不能不应付敌人的地方，可以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在崭新区，除了灵活运用上述原则外，在初期，还应善于利用旧的政府，维持秩序，解决军需。

辰、控制区应当普遍建立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有贫农团者，扩大成为农协，无贫农团者，不再组织贫农团，有贫农团、农协两种组织者，合并为农协一种组织。农协是乡村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必须大部的吸收农民自愿入会，扩大组织基础，防止为少数人垄断自私，使之变成为一个狭隘宗派团体的现象。农协的领导成分，一般适用贫雇三分之二，中农三分之一的原则，并须防止流氓、坏人篡夺领导，要使正派忠诚的劳动农民当权。除乡农协外，在农村还应逐渐建立青年的、工人的、妇女的、儿童的组织，以团结和教育一切群众。在城市，则应首先注意建立工会，和团结知识青年的组织。在游击区和崭新区，则应建立短小精干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和情报组织，名称不必一律，组织不必统一，局面打开之后，再建立工、农、青、妇各种组织。在已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方，即应开始建立精干的党的支部。

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不误农时，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坏。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过去城市、乡村的工厂、作坊、商店和副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政府要用很大力量和组织各种专门机构，吸收工商业主技师和工人参加，研究办法，使之迅速恢复生产。凡是没收错了的私人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如果是军队和政府机关保存的，应无条件地全部退还，如果已分给群众，则应说服群众归还，或政府用其他东西从群众手中换回发还。凡是应该没收的生产资料，亦应经由政府、或租给私人、或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不要废置不用，妨害生产。同时，为了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政府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工商贷款，而集中力量于首先恢复和发展那些对人民生计和军需有密切关系的部分。

午、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向群众作充分的宣传和解释，不要惧怕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应当向群众适当指明过去某些左的办法，特别是乱打人、杀人、破坏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对地富扫地出门、流氓坏人当权等，都是违反了中共中央

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于人民不利的，所以必须纠正。应当说明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因为只有土改，才能使农民获得比较彻底的解放，我们暂时改为双减，是因为土改条件尚不成熟，双减政策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说明当群众组织起来，正派农民当权，当极大多数农民都真正要求分配土地的时候再来分地，方才会办得公道，不出毛病。在处理纠偏问题的时候，必须坚决保护群众已经得到的果实，击退可能发生的地富反攻，应当确定只有对中农被侵犯的财产，才作坚决的适当补偿，对地富的工商部分，也须设法予以退还，至于地富的其他财产，则不应退还，但在分了土地的地方，必须保证地富分得同等的一分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争取地富回家的工作，应当广泛进行，但应采取严肃的立场和态度，表明这是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他们回来后，必须向政府登记，声明遵守政府一切法令，不作任何破坏和帮助国民党的特务行为；同时还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地富特务的反攻和破坏。

未、对地方土蒋、土匪，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采取以政治瓦解为主，配合以积极的军事打击的办法，达到完全消灭的目的。应当动员各种力量，劝说官兵回家，政府对于回家的一律宽大处理，不杀、不辱，只进行一定的登记手续。对火线上的俘虏，应采取对国民党正规军一样的俘虏政策，绝对禁止杀人，并应利用他们去进行瓦解和争取的工作。对于必须处死的首恶分子，应当经过法庭判决，予以枪毙，不得采用乱棍打死等等非法的丧失社会同情的处死办法。

申、各地地方武装已有相当发展，即应有计划地进行整理和巩固，特别注意加强干部，加强阶级教育，建立党的组织，细心地清洗坏分子和特务分子，严格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同时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已有的人民武装中，问题更多，亦应采取有效办法，依靠农协，进行整理和巩固，严防特务、地富掌握。凡是有可靠的农协的村庄，都应将人民武装置于农协的领导之下，并经过农协逐渐地掌握全村的民枪。

酉、强化宣传教育。这无论在军队，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部队的宣传文艺组织，即应恢复和加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宣教工作的领导，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方针和政策，乱写标语，乱做宣传的坏现象，应该制止。

戌、培养本地干部，是联系群众、深入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外来干部的责任。各地必须注意从斗争中选拔大批的正派、劳动的积极分子和贫苦（包括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经过训练，提升为区村干部。党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程度。对于地富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亦应大部吸收，或送华北学习，或送本地军政学校予以改造，或经过教育后分到外县工作。

亥、军队是在新区进行地方工作的重要力量，少奇同志说，如果军队不执行党的政策，就等于党的政策在党的主要部分没有保障。所以军队的党和干部，应该警惕自己责任之重大，加强政策教育，爱惜民力、物力，保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

四、中央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由于反攻后处于比较紧张和分散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工作不能不带着较多的独立性，因此就发展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相当普遍地缺乏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工作的松散、

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因此，应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原的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在完成战胜敌人，保障几十万大军供给等等方面，困难还是很多的，亟需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加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

中共中央中原局减租减息纲领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

（一）为适应新解放区农民目前的需要，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争取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特制定减租减息纲领。

（二）减租：

甲、所有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公田、学田、祠堂、庙宇、教会所租之土地，不论任何租佃形式，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减去二成半。各地政府得根据此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形规定实行办法。

乙、城市工人，贫苦的自由职业者，及贫苦的革命军人家属与鳏、寡、孤、独等，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之少量土地（不超过当地中农占有土地的平均数），可由政府及农会协议酌情少减或不减。

丙、租地之一切副产物，原全归农民者，一律照旧。原业佃分益者，按原成“二五”减。原全归业主者，随粮按成分配。

丁、地租一律于产物收获后交纳，禁止预收地租，尤不得索取其他一切劳力或财物的额外剥削。

戊、陈年欠租一概免交。

己、所有押租押金，一律取消。凡已收之押租押金，应一律退还农民。退还时，应按交纳时之物价折算。

庚、农民与农民间（指贫农中农间，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之租佃关系，本团结互助原则，由双方协议，经过农会处理之。

辛、减租后应确实保障佃权。契约上、习惯上有永佃权者，继续有效。无永佃权者，应奖励业佃双方订立较长期（例如五年以上）的契约，使佃农得安心发展生产。在契约有效期间，地主不得收回土地自耕、转租、出典或出卖。契约期满后，地主招人承租及出典、出卖时，原佃有承租、承典、承买之优先权。如地主及旧式富农为生活计，须收回土地自耕或雇人耕种者，亦应照顾原佃生活，延长佃期或只退佃一部。

壬、减租后，政府与农会可根据自愿原则，适当地调剂佃权，使耕地太少之贫苦农民，增加一部分佃耕地，藉以维生。

癸、减租后应抽旧约，双方另立新约，地主按约减租，佃户按约交租。如因不可抗拒之灾害（战争、水灾、风灾、旱灾、虫灾等）而至歉收者，应酌情减免。

（三）清债减息：

甲、过去农民向地主、旧式富农所借旧债，一律按月利分半计算清偿。其多半年债

款，应照下列原则清理之：利倍本（即借本百元已还息达一百元者）停息还本；利二倍于本（即借本百元已还利息达二百元者）本息停付。旧债清偿后，其抵押债务之土地应即交还农民。但在民主政府成立前，已成立买卖关系者不动。

乙、农民与农民间（指贫农、中农间，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债务，由农民自行处理之。

丙、凡以农产物先行定价之买卖贷款（即放青苗、实质是高利贷），其先定之价无效，应照交货时市价扣算，另行分半补息。

丁、凡货物买卖及工商业往来帐项，由人民自行处理，一概不在清理之列。

戊、今后借贷利息，由双方自由约定，政府不限定利率，使农民能自由借贷济急。

（四）已分配土地地浮财之处理：

甲、地主、旧式富农已被分配之土地，一律不得倒算，违者应受处罚。但应保证地主、旧式富农分得与农民同等之土地，不足者设办补足之。

乙、农民已分得土地后，如农民与原业地主或旧式富农双方确系自愿改为租佃关系者，经双方向政府登记后得改变之。

丙、地主或旧式富农已被分配之浮财，一律不得倒算，违犯应受处罚。

丁、凡农民（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土地、财物被错分者，应劝分得户自动退还。无法偿还时，另外设法弥补之。

戊、凡没收地主、旧式富农及工商业者之工商业，应设法退还或另行设法弥补之。

（五）若干特殊土地问题之处理：

甲、凡地主及旧式富农，利用农民危急之际，贱价强买典当农民之土地，得由农民请求政府查期后，按原价收回。

乙、凡豪绅恶霸恃强霸占农民之土地，经农民告发，农会证明，政府调查属实者，得由农民无代价收回。

丙、凡确系反革命罪犯，由专员公署以上政府机关依法判处，其本人之土地应依法没收者，得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所有。其家属未参加罪恶活动者，应保留各人应得之部分。

丁、凡逃亡地主或旧式富农之土地，得由其亲朋代管。无人承管者，由政府代管。原佃户依法减租后，向政府交租。政府扣除其应交负担外，代管其所余部分。俟地主归来后，连其土地一并发还之。

戊、族地、社地、公地、学田，应由本族、本社、本村、本地区人员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其收入除依法缴负担外，应经公议充作公益事业之用。

已、宗教团体所属土地，均不变动。如无人经营时，可按逃亡地主土地处理办法处理之。

（六）农民协会为办理减租减息事宜的合法机关。农村中一切地租、高利贷债息及调整土地等问题，均由政府会同农民协会处理之。最后决定权属于政府。

（七）本纲领适用于农村，不适用于城市。

对土改、整党典型经验的批示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份，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附〕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

（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

谭　政　文

李政委并分局：

兹将崞县一区与城区最近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区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如下：

大会于一月二十七日开始，共五天，到两个区三十二个行政村代表一百八十四名，其中中农成份四十九名。会议主要解决改正错订成份、平分土地、检查斗争与分配、健全与巩固组织等问题。

第一届会议，是在十一月下旬紧急备战声中召开，会议本身轰轰烈烈，解决了土改与对敌斗争结合问题，及斗地主与分配其它一般果实等重要问题。会后，不仅三天至七天内成立了区游击队及整理了基干和民兵，加强了侦察、情报、岗哨、戒严、除奸等工作，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各村卷入了斗争地主及进行其它一般果实的分配，迄今整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农村面貌一新：地主被打得灰溜溜，并且向农民交出了底财，贫雇农以主人翁姿态在农村中掌权，并且组织了贫农团，以此为骨干团结了中农，在斗争与分配中继续审查了代表，并进一步锻炼坚强和纯洁了农民队伍。除少数几个落后村庄如上申村、上大林、下连狄、任家沟（均自然村）等村外，其余大部分村庄贫雇农已在农村中初步形成核心力量，各村真正群众领袖已从斗争中涌现，一区的黄老二、城区的苏立根（均为雇农）已为两个区的群众所爱戴，均被选为区农代会主席兼代区政府主席。黄老二率领了区代会常驻委员四人到各村巡回检查工作已将一月，六十六岁的老雇工今天比年青人还愉快活泼，到处嚷着："扎碎酱罐子（意指蒋），捣烂盐钵子（意指阎），打倒蒋介石、阎锡山，穷人大翻身！"并且由于走到各处有他穷亲戚、穷朋友，便于了解情况、处理问题，他走到那里便把领导关系带到那里，各村代表与群众远地走来找他解决问题。工作团干部也在此时抽走，两个区共留下七个人，作为巡视员，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及协助代表工作。

现在这一次代表会议，是在各村群众要求立即平分土地准备今年大生产的情况下召开，故时机极为适宜。兹将所解决的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首先解决关于错订成份的问题

一、自接到分局关于改正错订成份及团结中农等指示后，全县作了整个布置，并作坚决彻底改正。此次会议初步检查，一区与城区三十三个村子（自然村），富农错订地主者共四十三户，中农错订富农者一百零六户，中农错订地主者二十六户(下大林村)，中农错订所谓"下降地主"者五户（下大林村），其它错订为破产地主者五十一户（前

报告未将下大林村统计在内，故数字不确，现更正如上）。根据十九个村的检查结果，斗争面一般在百分之十左右（以上是大会的初步检查，除个别特殊严重的村子外，我们估计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太远）。改正办法：领导上首先强调提出，在改正成份中，不仅要在各村真正改正被错订的成份并团结中农，而且要通过改正成份去提高代表与农民的思想觉悟，从改正成份中使农民（特别是中农）对我党的政策更好的了解。先在区代会上搞通代表思想，然后在土地分配中采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配合进行；即采用搞通代表及贫雇农思想，再搞通全体农民思想，然后说服被错订者使其心悦诚服，最后才正式宣布改正。其步骤：大胆、公开、正确解释过去错了的原因，特别是改正以后对咱农民的好处、改正的原则、改正时应注意的事项等，使党的政策真正为群众领会贯通，并由群众自觉自愿的自己起来改正。我曾亲自在就近的一个错订成份最多、最严重村庄作了试验，经过这种步骤与领导方法还较成功，虽然这村比一般村突出严重，但真正群众思想搞通之后，改正无大问题。

二、根据上述精神，此次代表会议关于改正成份问题的讨论是这样进行的：首先，为了与群众在一起学习改正错误，以便更好的了解代表对改正成份的各种思想、态度与看法，故在代表集中后，事先不提什么问题，即在各支点小组会上念《怎样分析阶级》小册子，代表的各种思想、态度、看法，让他们尽情暴露以后（因为代表的思想、态度、看法，反映了农村中群众，特别是贫雇农的思想、态度、看法），再发动争论咯吵（酝酿的意思），领导上逐渐启发引导；主要精神与问题搞明确后，最后领导上集中解决。开始，对参加各支点小组的工作干部，只要求文件正确与代表见面，并将代表的各种反映用原话毫不遗漏地记回来汇报，不强调要他们作更多解释。

三、会议具体发展过程是这样：在把《怎样分析阶级》小册子在各小组普遍念了以后，代表情绪极度紧张，有的睡不着，有的甚至说梦话，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思想、态度与看法。开始，在"错"与"没错"这问题上争论，如有的说："订时咱贫雇农都在场，一家一家都讨论过，一点也没错，扣起的都是地主、富农，就没把咱中农扣起！""戴的帽子正掀（合适的意思），那一样也在格格里！"有的说有错，有的说没错，甚至同一个村的代表也有争论。一个代表说："咱村就有错！"另一代表说："咱村就没错！"争论很激烈。有的表现抗拒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但，普遍一致的是对阶级敌人极为警惕，如说："蒋介石、阎锡山还没打倒，拿出这本本来，地主、富农钻空子，咱这工作不能干了！"有的说："这本本是咱们的，他们就拿不去，看不到！"对这本本（指《怎样分析阶级》小册子）极重视，说："回去可不敢丢了！"有的表现埋怨，如说："前一次代表会叫从羊群里赶狼，这会儿又要叫改正！大闺女背斗子，没背住人家，把自己背上了！""这本本早发两个月还用闹这?!"有的要推卸责任说："这不能怪咱代表的错，也不能怪工作团，上面本本来得迟了！""这是贫雇农眼红，见肥就咬，就订得多了！"有的怕，如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要打烂哩！""这书不敢露，地主富农可会说理，咱们这一伙说不过人家！""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也有不同意："不怕他和咱'恼火'！他要'恼火'，咱一鞭把

他吆喝回去，对他说：‘定你破产不亏情，你总吃过剥削饭！’”有的代表埋首考虑，想的很细，提出说："这本本还得添上几条条！"总的看，在念了文件以后，代表思想表现极混乱：有的说有错，有的说没错，有的埋怨，有的抗拒，有的推责任，有的怕报复。接着就反复咯吵，领导上并加以启发引导，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使农民真正体会改正成份对全体农民的有利，初步搞通代表思想，大家觉得确有订错的，并愿意改正。如说："按实际说，是有订错了的"；"按政策，按公心，应该改过来，将心比心，把自己人订错了，不应该！""把自己人不该送到狼群里去！"但思想里仍有顾虑，不愿直接了当去改正，不愿说"软话"（公开承认错误），想用转弯抹角的办法逐渐改正。如说："错就错了，咱也不要给他们说，成份也马上不给他变；没吃了咱救济他，派差少派些，分地时照顾他，不知不觉就把他变了！"主要原因是：（一）不愿低头，怕丢面子。如说："咱办了几个月工作，还落个错名！?让人家说：‘看那些人，一定是下大林开会，训了一顿，训过来了，给咱改成份呀’！"或说："咱回去，不要张罗这问题！一回去就张罗，太不给代表张脸了！"（二）怕地富钻空子与错订者报复。如说："一说改，这家也要改，那家也要改，你改了这家，不改那家，他还要说你包庇哩!""说是错了，人家要发动咱呀!"（三）但最主要的是怕退东西，特别是东西已经分配的地方，说："粮食吃了，衣服穿了，白洋交贸易局了，怎往回退？""东西已经分了，吃进肚里去不能往回吐啦！""咱们给他说服赔罪，说是穷人冻得不行；地还往出拿咧，衣服还不往出拿！"或说："成份给他一改正，不退东西也就欢喜不尽了！""东西无论如何不能退；不然，穷人还能翻个什么身！？""在以后分配中照顾吧，这遍不要退了；反正他们到现在还是比咱们强！"又经过互相争论咯吵，领导上经过参加各组的工作干部诱导启发，并支持了正确意见，进一步念了分局所发的关于分析阶级的补充草案，并引导代表具体研究分析各村到底订错几家。代表在念文件后，一下摸不清错到甚么地步，经检查后发现问题并不象原来所想的严重，代表们的思想情绪，即有显著变化。如说："前两天可发愁哩，这下弄通了！""一池水，一棒打个窟窿——开啦！"有的说："作事作事、多有不是，人还能怕错哩？作错以后，再学好，才能把工作办好，谁还能没错咧！怎好的人也有一点差错！"代表们特别重视中农问题，也觉得最难办。他们说："富农错订地主的不怕，错订破产的也不怕；为首是把中农错订了富农，把自己人赶到狼群里去，又拿了人家东西，这最难办！""改正成份为首是中农问题，自己人闹了自己人，这得好好去作！"有的说："人家中农有说话权利，这最难办！"有的说："如今有了本本、有了老师傅了，好办！这就是咱们的办法，回去好好研究，有了底底就好办了！""这本本尽说的是劳动，可见毛主席真爱咱劳动人！"在读分局补充草案时，代表说："这越念越好办了！"念到草案第二项第四个问题时（即关于地主转化其它成份，如有底财，须向群众交出，经群众讨论通过，才能承认其所转化的成份），有的代表说："我思谋的那几条也闹上去了。"研究到责任问题时，工作团向大家承认错误，说明过去订成份由于我们思想不明确，所以订错了一些。代表们说："这也不能单怪工作团，咱代表也有责任，贫雇农也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代表们特别强调："错是大家的错，不是几个人的错；改，也要大家改，不能几个人去

改。”更强调在改正中不能追究个人责任，说某某成份是谁提的，让坏人钻空子，“咱们都闹成一块！”大家便接着咯吵改正办法，意见是：代表回去后，配合平分土地，“复查成份”，实际进行改正。先在代表中讨论“机明”，再在贫雇农小组、贫农团研究到底错了几家，大家意见“闹到一块”时，再在农会中讨论，通过后，个别提出，大会宣布。大家又提出了在改正中，第一，要咱们农民更加团结，大家都要负责，不要个人买好，防止坏人钻空子。第二，要改正真正错订了的，不要“该下的不下，不该下的乱下，出了大糊糊！”要作到既不要冤枉人，把成份提高，乱戴帽帽，把羊赶到狼群里去，把自己人当敌人打；又不要把真正的地富降下来，弄得将狼混进羊群里来，咬了我们的羊，使敌人占了便宜，咱群众翻不了身。第三，咱们代表要铁面无私，认真负责，有的村庄订的不彻底，有包庇，遗漏了的地富，这次改正中也要“改”出来；不要惜情顾面，反过来又闹不彻底。

代表们对各种被错订者，又咯吵下了办法：

（一）富农错订为地主的，代表们说：“好好给他强调劳动，劳动是好东西，怎也不要离开劳动。”对他说：“因为你过去劳动，我们看你和地主不同，我们是消灭封建剥削！你有封建剥削，所以要消灭你的封建剥削，这是对的；不过把你订高了些，因为你劳动，我们才给你下成份；以后你要好好劳动，跟上农民走。”大家意见：已经分配了的房子，可另由其他地主住处拨出较好的让他住，贫雇农不必再搬出来。其他，再照顾他够吃就行了。多余的粮食已分配了，不必再退；因今年年景不好，可作为对贫雇农粮食的调剂。（注：应退给口粮种籽，使其能够生产。）

（二）错订破产地主的，代表们说：“强调他过去剥削过人，有的吃过剥削饭，有的踢弄了光景。”对他说：“现在我们农民念计你劳动，改你的成份，以后要好好劳动，和咱们一条心，不要上了真正地主富农的当！”

（三）错订中农为富农的，代表们说：“这就要紧了！要好好向他赔不是。”对他说：“咱们是一家人，这么一件翻天复地的大事，免不了有错；一时疏忽，出了些岔子，自己人好办，大家原谅！”就吸收他参加农会，并退还东西。

以上各种问题，代表们在小组酝酿成熟后，即由领导上集中代表们的意见，把上述他们想出的正确的办法，经过系统化，并予以提高，在大会上向大家作了报告。因为是集中了大家意见，并且主要问题已在小组里搞明确，故代表听了说：“都是照咱小组里咯吵下的谱谱说的。”

（四）错订成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及干部思想不明确。第一，翻三代盘历史，将一些已真正转化为农民的订为地主或破产地主。第二，按铺摊摊，将一些富裕中农订为富农。第三，将一些有商业关系的中农订成富农。第四，个别地方将一些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不得已而出租土地的错订成地主。个别村庄，由于干部思想不纯、“左比右好”、“宁左毋右”，怕说“包庇地主，立场不稳”等情绪，故问题较严重。在一区有两个这样的村子：一是罗夫作的下大林，五百余户的村子，订出地主富农一百来家。此次改正，发现中农错订富农者四十四户，中农错订地主者二十六户，中农错订“下降地主”者五户，贫农订破产地主者八户，富农订地主者十户，共错订九十三

户。一是郭子秀作的定风庄，二百六十户的村庄订地主六十四户（因罗为地主成份，自己怕犯错误。郭为地方干部，在三查中受到批评）。但这样的村庄，在一区仅这两个是特别严重突出的。另外一种较普遍现象是工作干部把定成份标准四条平列起来去作，不去根据具体情况很好分析研究，并对群众意见也倾听不够，因而犯了错误。个别村如下大林代表检讨时说："当时只记住一句话：'不能包庇地主'！有些订的不对的也看出来些，按他个人劳动，也没太剥削过人，光景也不太强；当时，一来是'闹不机明'！二来怕人说包庇地主、富农，所以就不敢吭气！"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左"的情绪中，代表与群众没有勇气提出来；另一方面反映了该村工作干部在订成份中走群众路线与倾听群众意见是不够的。

第二、关于平分土地问题

关于平分土地，由于春耕在即，平川节令早，故群众于斗地主后，急要求分地，以免误生产。原第一期发动的十二个村（七个行政村）于上月先行召开了一个联合代表会议，问题吵出很多，此次会议，即将原十二村的代表，划编到各支点小组中去。讨论前，先读《土地法大纲》、《告农民书》的平分土地的分配原则部分，后读报纸一月二十四日《关于最近分配土地中的几个问题》的社论，然后各组自由咯吵，提出问题，大家解决。吵了两天两夜，事实证明：只要群众真正掌握了党的政策，自己就能够把问题解决的很好。最后领导上集中了各组所提出的及所解决的问题，经过系统提高，向大家作了报告。

大家所提出及所解决的问题如下：

第一类，关于土地分配中的计人口及其他等问题。

一、恶霸地主与恶霸富农的分地问题：大家提出，按《告农民书》规定其本人不能分给土地与财产，但又提出其家属是否应该分地？一般分一份还是分一份赖地？最后大家意见：其本人与其家属还是应该区别。如其家属并未犯罪作恶，可按一般地主富农待遇。至于确定其为"恶霸"，须经全行政村农民大会讨论通过。

至于一般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大家意见是：要使"富农能生产，地主能生活。"

二、一般地主富农的分地问题：原群众普遍意见都是恩赐他一小部分赖地，数量也不足维持生活。他们说："让狗禽的也受受咱农民的苦处，叫他们掏烂沙地去！"读了报纸社论后，给代表们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他们说："对着哩！要够他吃的。不然，他们偷咱们，要的吃，还得剥削咱们。""他要没活法，狗急跳墙，闹得村子里不安，对咱们还是个不利！"

三、地主富农出身，为人民事业牺牲的军人与干部，牺牲者应分得一份地。大家说：他对咱人民事业有功，他家庭的封建剥削和他本人给人民办事应该分开。最后决定按一般烈士待遇分地。

四、二流子问题：大家说："不要随便给人家戴二流子帽子！一戴上，人家败兴了，闹生产就不起劲。"对真正二流子，一定要照《告农民书》上面说的不给地权。但大家说：一定要好好改造，把他组织到劳动中去，强制他戒大烟，提高他成家立业的信

心，慢慢使他走上正路。真正改造以后，再经群众讨论通过，才给地权。

五、去年阎匪侵袭时，被敌强迫抓走的农民，其本人应给分地；自愿投敌的本人不分，其家属仍按一般农民分地。

六、代表们提出：农村中有少数人为了逃避兵役，本人躲藏不见，给不给分地问题，大家说：这是因为"脑筋不开"，要好好给他家里教育，限日期把他本人叫回，才给分地。如万一不回，把他应分之一份地，交农会暂为保管，本人回村后，再正式分给；如确已参加解放军或党、政、民机关，取得证明后，即给予分地。代表们并提出：有些人为躲避兵役，从这村躲藏到那村，应在平分土地中加以整顿，否则，既误生产，又减少抗勤力量。

七、解放军军人，家中已无亲属者，代表们认为，其本人虽在部队，应分得一份地，由农会代为经营管理，每年所得，除应交公粮外，由农会交其本人或代为保管，其本人年老、残废或复员时，可作为成家立业之基础。代表们认为：这样作不仅可以提高其本人更坚决的为人民作战，而且可以直接巩固部队。

八、讨论《土地法大纲》第十条第五项关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分地问题时，代表们提出："阎顽军队中的下级士兵，在平分土地时应动员他家属写信叫回，如在分地时回来，其本人也给分一份地。"代表们说："这是为了'消化'阎锡山军队，比十万兵打他还厉害！"

九、日寇占领期间，因负担繁重，使不少中贫成份农民被迫逃往大同与绥远等处，其主要人或全家均已逃亡在外，大家一致意见：此种情况，应该分得土地，争取他们回家生产，壮大解放区力量（有的已捎信要求回家）。

十、计人口中，提到未娶媳妇、未嫁闺女、已怀孕未生的小孩如何分地等问题，大家意见：分地时媳妇尚未娶过者不分，未嫁的闺女应分，未生的小孩也不分。总之，按分地时实有人口计算。

十一、讨论"鳏、寡、孤、独"问题时，有的代表提出：有的人家，有几个儿子，已分家，留下一个老汉或一个老婆单独生活，是否能按"鳏寡"待遇？大家意见：这样情况，不能称作"鳏寡"，应按普通一口人分地。又有一种"鳏寡"情况，本人年老，并无亲生儿女，但有本家"近门"，大家意见：在分地时，应与其本家"近门"说明：如他负责赡养老人，该老人就不按"鳏寡"待遇分地；老人死后，该一份地即归赡养人所有。如其本家"近门"不愿负责，即按鳏寡待遇分地，老人死后，地归农会。

第二类、土地分配中可能引起的纠纷：

十二、有几种情况可能引起纠纷，大家提出了以下的一些问题：

1.地主富农在其他村买下的土地（如南阳店地主在定风庄置有三四顷土地，南阳店群众要求分配，定风庄群众有意见）。

2.其他村买下本村的地或租种本村的地（如上阳武买了东野庄的地，东野庄租种了下默都的地）。

3.主要是"外册地"问题。所谓"外册地"，是水地村的特殊情况，如东野庄买了后沙城的地，地属东野庄，但仍用后沙城的水；在旧社会一切摊派、纳粮仍属后沙

城，故对东野庄说：这部分土地称为“外册地”，不属“本册地”（或称“外槽地”、“本槽地”）。

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大家的意见是：

1.隔村买地，地在那村即归那村（因两村距离远，探不上）。

2.邻村的“外册地”关系，解决原则有三：（一）地多地肥村，照顾地瘦地少村；（二）地靠那村即归那村，但距离较近的村，如耕种便利时，也可以插花种；（三）地的四边靠那村即归那村（如该地的四周均为石封地，该地即属石封村）。但主要的是第一点，必须以天下农民一家人的精神，以富照顾穷、多照顾少、肥照顾瘦的原则解决。

3.上述可能引起的纠纷，如属同一行政村，即由行政村委员会统一解决；如属不同行政村，可由当事行政村组织临时联合代表会共同解决，或经区代会常委会解决。

第三类、对中农土地的抽补问题：

十三、中农土地不够者补足。土地长余应抽出一部分的中农，大家认为不能抽好地过多，不然，“人家就不和咱们一条路线上站了！”并且应以说服自愿为主，劝他说：“多贪揽不如多作务，你有底垫，作务更细些，收成差不多，负担也减轻了。”有的农民主张抽富裕中农的麦子地，大家不同意。

第四类、联合分配问题：

十四、一定坚持以行政村为单位联合分配。大家说：“要拿起天下农民一家人的精神办事，瘦肥多少大家照顾；代表带头，大公无私，不要尽说自己本村地少、地赖、产量低。”

1.水旱地互相调剂，但水利暂不动，决定“水跟地走”的原则。按：崞县一区有阳武河水利，共灌溉十八村，旧日因争夺水利常肇人命。相传曾由北京朝廷派大员调处规定，各村立有石碑，但极不公。如有些村地少，每月能使水两日，有些地多村反只每月使水一日。此次平分土地，使水吃亏的村庄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况（有的村地少水有余，有的村地多水不足），但因时间紧迫，整个水利问题，一时无法仓卒合理变动，故确定“水跟地走”的办法，如贾陀与上大林为一个行政村，贾陀地多水少，上大林地少水多，两村距离仅三五里，贾陀愿意拨出多余土地，但要求上大林分水；上大林宁愿保持原有水量，不要贾陀的地。大家讨论结果，决定水暂不动，两村水旱地平均分配。如贾陀农民分到上大林水地，水即跟被分的地走。

2.组织行政村丈地，评议、分配委员会，联合统一分配（水地村大多距离三五里相挨。如距离过远，没法调剂时，可移民）。

第五类、丈地与评等级（评产量）：

十五、水地土贵，“寸土必争”，土地产量又悬殊极大，每亩有从一斗至石数之差，故对丈地与评等极为重视，认为是平分土地能否公平合理的关键。现各村已开始丈地(有的已丈二遍。)如大牛堡，连续丈了三次，先用“步弓”，后用“天竿”（竹竿），再用绳索，三次对比，最后确定准数。下默都用绳索丈地，每天检查绳子一次，因第一天是新绳，第二天即长二三寸。绳头挂红布作记号，防止偷换。并规定本人不能用绳子丈自己地，防止紧松作弊。事先并各户登记地亩，在地边插木牌标明数字，以便参考。

评等级：因川地产量悬殊，大家意见按通产分等。有几种情况：少数村庄如阳武等，全为水地，等级易评；大部分村庄水旱夹杂，需分别评等；靠边坡村庄地分几类：水、平、坡、山，评等级时更为复杂。大家意见：平川水地按地亩分配，因地质悬殊感到困难，故主张按产量分配，不按地亩分配。领导上为使丈地确实，互不隐瞒，强调提出复查，责成各丈地小组长及代表对所丈量之一段地负责，规定盖章或按手印，以示负责，并以便复查时发现问题追究责任。

第六类、平分土地必须成为群众运动：

十六、大家讨论认为分地人人关心，要把所有群众发动起来。

1.代表回去，先开代表会，再开贫农团会，再开农民大会，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丈地的丈地，评等的评等，计口的计口；人人参加，分头下手；代表领导组长，组长领导组员，“一级赶一级，越赶越紧！”

2.主要靠思想动员，把大家发动起来：春耕在即，抓紧分配土地，既要分得快，不误春耕；又要分得好，公平合理。“地是命根子”，“分得好坏，万年福害”，只有大家起来丈地、评等、计口，大家讨论分配，才能丈好、评好、计好、最后分好。

3.规定纪律，定好制度。纪律要大家自己定自觉遵守。分配土地期间，为大家服务也即为自己服务。开会要到，有事要请假，各种工作要认真。开会不到、不负责任的人，要受到大家批评。

关于纪律问题，这次代表们极强调，他们说：“现在有少数贫雇农成了爷爷啦！一说开会，中农们倒欢欢来了，他们就不来。批评他，就在背后说：咱是贫雇农，看能把我怎!?”代表们说：“纪律原是为少数‘奸顽’人，但对贫雇农还是要多响雷少下雨。”领导上也指出应主要的加强教育，提高觉悟。

第七类、其它：

十七、已有村庄丈地时将渠、疙塔、地道等除外，平川原有“一亩种八分”之说，应该统一，实事求是，按实际土地面积丈量。

十八、城区代表提出：城关附近之飞机场，去年已经种上，是否可分？后又扯到铁路路基、火车站站基等。大家最后决定：上述飞机场、铁路、火车站等，将来我们还要建设，一律不分。飞机场仍可调剂耕种，但地权归公。

十九、各村土质极劣、产量极低之烂沙荒地，不在平分土地之内。

二十、要求政府制发土地证。此问题，原十二村开代表会时，代表们提出；在平分土地后，应该废除旧“红契”，发给新土地证。但单是废除的地富旧“红契”，抑或连同全体农民的一齐废除？引起争论，最后决定，回去与群众商量。下默都代表回村后，在农民大会上提出，中贫农一致主张全部废除。理由是：一、旧“红契”是老顽固，不是咱们的东西，在旧社会里咱农民为它受过千灾万难，应打倒。二、平分土地后，地与契已不相符合，“不投了”。三、即使地不动，实丈的地数与旧契也将不符，“不准了”。因此大家同意：旧“红契”一律打倒，由政府制发咱们自己的新土地证。

二十一、代表提出：有不少古坟古墓，有占土地十几亩到几十亩的。大家意见：这些古坟，大多属于地主的，在平分土地时，经群众讨论平坟分配。我们提出头年不征公粮。

第三、整顿组织"改造政权"健全与巩固组织问题

代表们用了一天一黑夜时间咯吵了组织问题。从发动群众、普遍选举代表以后，农村中旧的机构已为农民一脚锡开，村政权实际上已为代表会所代替，旧村干部，有的被撤职审查，有的被暂搁一边。一切权力归到了代表会。农民们说："行政村成了空机关哪！"村代表从天亮忙到深夜，代表会、贫农团、农民大会等各种会议不断进行。除领导斗争与分配外，还需处理行政与群众的一切日常事务。自从打倒地主以来，农民中民主空气极高，但却发现一种小偏向：即代表们凡百事都要请示"掌柜"（即群众），有时为一小事开了一个农民大会。虽因平川集中，往往一个行政村即一村，但终究浪费群众精力。代表们说："瞎汉办事可难哩！"要求整顿组织，讨论下几个问题：

一、健全代表会进行分工：自斗争以来，各村代表会均采"一锅粥"办法，遇事大家商量大家作。好处是大家动手，大家负责；坏处是乱，"头绪不清"。这次大家意见是：由代表中产生代表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每村九人至十一人，正副主任一律改为正副主席。代表们说："毛主席领导咱农民是最高主席，咱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小主席！"代表委员会兼村行政委员会，村公所名称一律取消，改为村政府，代表委员会正副主席兼村政府正副主席。

讨论到村主席问题，开始代表们感到"穷人当家"，困难很多：一、"通天瞎棒"，办不了事；二、上怕犯了政策，下怕得罪群众；三、最主要的是家里困难，没柴没水（不少代表一直忙了三四个月，连柴也顾不上打）。经过长时咯吵，搞通了思想，觉悟到"咱穷人翻身，千年难遇！"群众费了多少心事选举了咱，刚上了阵，就泄了气，这是不对的。最后说："只要我一不贪污，二不自私，公心为群众服务，也不怕犯政策，也不怕得罪人！"又说："咱瞎汉管天下，眼睛心不瞎！请上个书记，借用他两只眼。"可见摧毁旧机构，农民当权，有不少困难，但只要坚决撑腰，提高了思想觉悟后，他们会坚强地排除万难自己起来当权的。因为这是农民民主问题，农民要求民主，特别是低层贫雇农，他们在旧社会长期痛苦的经历中，很容易体会到自己当权的重要。他们说："咱们闹了一场，初翻了身，现在不干了，这是为甚呢？"显然，农民觉悟以后，不仅要求获得经济果实，而且要求获得政治果实。

其次，关于米津贴问题。旧制：每行政村规定三人至五人脱离生产，每月津贴米四十五斤，这次讨论有三种意见：一、正副主席、书记三人脱离、或半脱离生产，领米津贴。二、正主席、书记、民兵队长三人领米津贴。三、领三个人的津贴，根据具体情况补助五六个人。但最后确定：因现正平分土地，代表与群众一样都参加运动，人人工作，目前不需领津贴，待土地分配完毕后再研究。

二、更进一步整编队伍，纯洁贫雇农内部，建立及巩固农会，在平分土地中健全与巩固一切组织。各村贫农团已于斗争前后先后建立，并初步在农村中形成骨干力量。贫雇农与农民代表均经一再审查，一般说是纯洁的。个别村子尚不够纯洁（如前述上申村等村）。大家讨论说：在平分土地中，谁好谁赖都要露出来，要巩固扩大贫农团，并且

要团结中农把农会搞好。有些村中农成份代表，在讨论到农会问题时说："这下就对了，以前你们干巴巴就两疙塔骨头；把农会成立起，有骨头也有肉了"。讨论时，北贾支点代表提出：要成立农会，先要作个"帽子"，即先要定出参加条件。咯吵结果，定出四条：一、拥护穷人翻身，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二、要分出里外，不在外面乱"反映"，不能两瓣心。三、忠实可靠，和咱农民一条心。四、要好好劳动，真正二流子不要。又定出纪律四条：一、积极工作；二、开会到会；三、不能说坏话破坏农会；四、不准和地主勾搭。成立办法：先在代表会讨论，把条件、纪律研究后，将全体农民"滤一滤"看谁能参加，打个底底，然后开贫农会，再开农民大会；把成立农会的道理向大家说"机明"，发动大家自动报名，再经贫农团与大会一个个审查，把纪律与条件同时宣布，看他能不能接受，然后才允许正式参加。

大家说："平分土地中，谁的骨头都能看清！"谁公正、谁自私、谁积极热心、谁各管自己，都会显露明白。因此，这又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关键。应该大大发扬大公无私、天下农民一家人的思想，克服自私、村本位等各种有害于平分土地的落后思想。这次会议，领导与代表均强调"公心"问题。代表们说："不管你丈地评等闹得怎撇（合适的意思），短个'公心'提甚毬也不顶！""甚不甚公心为第一！"

在平分土地中，不仅要整顿组织，而且要提高农民思想，要使平分土地与斗地主一样，成为广大群众性的运动；在运动的每一个细节中，工作干部不仅要向农民学习（不学习无法领导农民，并无法使工作前进及胜利完成平分任务），而且要随时随地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阶级觉悟。

第四、会议的领导方法与缺点

这次会议，更明确地采取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自始至终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针，即向群众学习同时又教育提高群众。因而，会议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更体会到只有坚决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无限创造能力；坚决依靠群众自己起来解决自己问题，才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总括的看，这次会议，工作干部的任务只有下列几个：一、忠实正确宣传党的政策。二、善于启发诱导发挥群众创造智慧。三、善于发现及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四、也须善于与群众中部分人某些问题上所表现的落后意识作教育和作适当的斗争，为群众的正确意见撑腰，才能团结与提高群众。五、最后集中群众意见，经系统条理予以提高后，再回到群众中去。

这次会议，便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的。无论关于改正错订成份、平分土地、健全与巩固组织等均如此。比如研究平分土地问题，先由工作干部正确讲解了三个文件，然后分支点咯吵。由各村代表提出问题，大家讨论解决。会议极为活泼自由，每夜支点会议就象一窝蜂房，吵成一屋。一个问题提出后，大家咯吵，直到问题明确。中间定有争论，如"外册地"问题，争论很多，各持一见，其中并引起联合分配问题，牵涉到水利问题，相持不下时，领导上提出"根据天下农民一家人的思想：是地瘦的照顾地肥的呢？还是地肥的照顾地瘦的呢？地多村照顾地少村呢？还是地少村照顾地多村？"提

醒了大家，把问题解决了。最后便将各支点所提出与解决的各种问题集中，向大家作了报告，大家说："这下才闹'机明'了！"

这次会议，现在看起来，主要问题解决较细致明确。缺点是内容过多，又讨论了公粮工作与支援前线等问题，农民记不住，临走时，都要求抄个单单。他们说："一提头，就记起头尾来了。"

以上是此次会议的主要情况。每个村的具体材料，因县大，干部少（现一区与城区只留七人），每个干部负责四、五个行政村，在反映材料上确有困难。干部水准低，总结能力又差，这是个问题。以上作法是否对？希望给以指示！此致

布礼！

〔附〕晋察冀平山县老区土改中整党经验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

晋察冀平山老解放区土改中，创造了整党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范例，兹特扼要介绍其经验供各地研究参考。

平山县是一个包括解放了两年半的半老区和解放了十年以上的老区的地区，在老区经过了抗战中的减租减息，在半老区则经过了抗战胜利后热烈的反奸清算。但不论在老区和半老区，又都经过了土改和复查运动，新的富中农经济已占相当优势，贫雇农的比例已相对减缩，在老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一般的只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真正缺地、特别缺乏好地和近地的农民则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半老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亦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而占有较多和较好土地的地主富农，则差不多全是党员干部的家庭和三三制的党外人士，旧富农虽拥有比斗争过的地主较多的土地，但比新富农甚至比富裕中农还少，不少农村党又混进了地主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把党的支部变为宗派小集团，为非作歹，欺压群众，造成了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因而此次土地改革，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党内问题。在没有适当处理这种问题并找到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前，就发生了以下各种偏向：第一、是群众自动起来斗争坏的党员干部，在不少地区已有一些党员干部被捕、被打，造成一般党员干部中的惊慌。第二、是已受打击的地主富农阴谋乘机报复，煽动群众对党员干部胡乱斗争。第三、是工作团机械的坚持先斗地主再解决干部问题，硬把解决土地问题和民主运动机械分开，或者制止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斗争，或者将群众反对的大批党员干部当作"石头"搬走，造成脱离群众的情况。第四、是工作团利用权力强制群众对斗过的地主再来斗争，企图掀起所谓"高潮"，制造所谓"轰轰烈烈"，结果，必然要犯"左"的错误。

平山把土地改革与整党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创造了老解放区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的宝贵经验，土改同整党结合的主要形式，开初就是公开党的支部，在广大群众援助下

进行整党，把党的会议与群众大会合而为一；其次，就是从乡到县，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赋予一切权力，开始时，支部也是关门查阶级、查作风及消灭宗派，但是开了七八次均无效，后来把门打开，首先吸收非党贫农参加，接着吸收非党中农也参加，参加会议党员二三十人，非党农民七八十人，改变了过去农村支部开会时那种神秘性。最后，打破了坏分子隔离我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使得每个党员的阶级思想、作风、行为在群众对证下受到查清，并由群众提出处理好坏党员的意见，支部当即接受，该奖者立即奖励，该罚者马上处罚，一切坏分子只有改过自新，一切小宗派就会立即瓦解，这种会有时连续进行二十四小时，群众都不愿散会，情绪之热烈可见一斑。群众认为只要党不再包庇自己的党员干部，接受群众的意见、处分、教育，就没有任何顾虑的和党站在一起了。他们说："这下可与毛主席通气了，可成了真毛主席党了。"因此，农村党的公开，并接受群众意见改造教育党员，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由于过去农村党的秘密，使得坏分子把党的领导者与群众联系隔断了，今天在老解放区公开党，是改善我们党与群众关系的重要关键。这种整党的民主运动，有以下几种好处：第一、这是党的支部大会，是讲道理查事实的，被邀参加的非党农民受到党的尊重，有充分讲话、证明、提意见的权利，因此非党农民也就加倍尊重党的领导。在一般群众大会上，某些农民那种出气报复、漫骂乱打的情绪，自然会被治病救人、批评提意见的精神所代替，而由于党在会上及时的批评和处分了他们所反对的坏的党员干部，奖励和提拔了他们所拥护的好的党员干部，使得非党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某些积怨不仅有机会充分申诉，而且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而在党的领导上，又能摆脱一般群众大会上的被动状态，而获得了既能发动群众，又能照顾党员干部的两全其美的主动处理党内问题的可能，这样，党员干部也能诚恳接受批评，自动改正错误，对党员干部以及对广大群众的教育意义都较深刻。第二、这样的支部大会，由于有广大的非党群众参加与充分的批评权利，因此就具有群众大会的压力，使得任何错误都无法隐瞒欺骗和狡赖，再加上强有力的领导，能够了解全盘情况，细密分析问题，并予被批评的干部以发言说理的机会，说明他们的某些错误是要上级负责，上级当时也可替他作证，这样，就可分清责任，使得一切问题都能获得实事求是的解决，避免群众单纯片面的观察党员干部的缺点。第三、用这种党内动员说服与群众民主力量相结合的方式，要地主富农出身的农村党员干部交出土地财产来，也会比一般的把他们交给群众大会去斗争的方式要更适当些。

〔附〕绥德黄家川抽补土地的经验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新　华　社

陕甘宁边区绥德县义合区三乡黄家川村按产量为标准，以抽补原则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并巩固地团结了中农。该村共有七十五户，三百三十三口人，内战时为游击区，土地未被分配，一九四〇年进行过一次"并地"（即由农民主持，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租佃中一半是永佃性质），去年春天进行过一次比较彻底的土改，将地主长余土地按人口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消灭无地户。此次抽补前，全村三户地主，二十四人，每人平均一垧六堆三（按当地一垧为八堆，约合三亩）；三十一户贫雇农，一百三十三口人，每人平均一垧六堆四；五户富裕中农，三十二口人，每人平均二垧半；三十六户中农，一百六十四口人，每人平均两垧又半堆。从数量上看，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所以运动开始时，贫雇农因急欲求得地主的粮食和浮财，曾认为"土地没分头"。工作组也并不清查，只在土地数量上考查了一下，觉得平分发生困难，因三户地主中只能抽一户的土地，而中农却至少要动二十户，贫雇农也要动八户，对满足贫雇农及团结中农发生问题，后经发动群众深入的登记土地和调查，开始以农会的两个委员吸收五个熟悉土地情况的公正农民，组成土地小组，每天召集二三十人逐户登记，登记时先由本人在场报告，众人帮助计算，当场登记及审查通过。会后交全村大会复审，先后经三次反复审议，才发现不仅山地有好坏，川园地也有好坏，并有远地、近地的差别，同时发现了不少的公地、合作社地、绝户地以及去春土改中分配不公的情形，如把典地转为死契地，有两户多得了四倍半土地，经过了这样较精密的计算，发觉各阶层土地产量相差很大，如地主每人平均为九斗八，富裕中农为八斗四，中农为六斗八，贫雇农则只有六斗六；地主的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好地和较好地，贫雇农的土地百分之五十二是坏地，百分之十八是较坏地，有五户完全种着最下地和较下地，有六户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最下地，九户没有园子，九户园子太少，中农中有七户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坏地和较坏地，八户没有园子或园子太少，但一户七口人的地主则拥有一百六十畦园子（约合四堆），有一户富裕中农占有全村六分之一的园子。

这一计算结果大大启发了贫雇农，在开始形成力量时，便勇猛向地主斗争，声势很大，工作组支持了他们，这时中农表面都赞成彻底平分，但当他们都参加了农会把地主斗倒而接近分配的时候，有些长余土地的中农，就表示"彻底平分对是对，就是不好办。"中农黄宪常说："如果抽了咱的地，明年要当二流了。"这些反映，促使工作组仔细研究中农的心思，经挨户走访启发他们说心里话，召集他们单独开会，谈心事，诉苦，慢慢的发现原来完全同意彻底平分的中农，实际上都有着种种顾虑：如（一）怕动了坟地、养老地；（二）怕分了祖业地；（三）怕把土地分成小块；（四）

劳动好、作务好的不愿意再动。针对这种情形，工作组赶紧解释抽补方法调剂土地，不是打乱一切土地平分，并从废除债务、减轻中农负担、巩固边区、以及打垮蒋匪，鼓励他们帮助贫雇农翻身，同时加强对贫雇农宣传团结中农的重要，要他们懂得领导中农，又懂得向中农让步，两方面单独开了谈心会后，后又合在一起开大会，反复解释讨论了土改的两条基本原则：满足贫雇农要求和团结中农。最后共同商量本村土地如何分配，经过双方这样深入的讨论，引起了中农自动"欢迎"土地（即自动拿出之意），如黄登堂在旧社会时，欠了很多债，因革命废除债务而翻了身，近几年又欠了些债，这次又废除债务，他说："我两次靠革命维持了中农，我知道穷人的苦，我愿把多余的园子和山地欢迎出来，帮助穷弟兄翻身。"就这样，有十七户中农欢迎出了三十七垧地，但有长余地的中农黄宪常和黄宪曾却不开口。贫农黄维治有园子有川地又有好山地，还提出要分得园子。工作组便又把毛主席对中农要适当让步的意见向大家解释，启发大家根据本村情形和毛主席的指示去酝酿三天，当时正是冬季生产刚刚开始，从此二三十个人便聚在一起捻毛线拉谈争论，从来不多说话的黄继父也参加了争论，大家批评黄维治"太自私"，"你半斤油瓶还要装一斤，太满得溢出来！"又批评黄宪曾说："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里在拉谈满足问题，那里在谈团结问题，到处在谈论。

另外中农黄明亮欢迎了又后悔，农会允许他撤消，第二天他受了侄子的鼓励，又"欢迎"出来，第三天又撤消，直到最后他想到旧社会所受的苦处，想到他"欢迎"了少量土地，而他的侄子外甥都能得到土地，才又决心欢迎出来。至此，全村进行调剂土地，经群众反复酝酿，按照全村平均产量及人口，并照顾贫苦和老弱残废，实行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先动用地主土地、公地，不足时再动用中农"欢迎"出来的土地。计：（一）从地主土地中抽出十七垧六堆半；（二）拿出公地、合作社地、绝户地十三垧七堆；（三）修正去春分配不公之地五垧七堆；（四）"欢迎"土地的十七户中农动用了七户，共十七垧三堆，其余十户的土地都退回。黄明亮"欢迎"的土地也退了回去，动用的七户中农（其中五户为富裕中农）"欢迎"后，另分配了斗争果实和调剂了园子。从这四方面，共抽出土地五十五垧弱，除补给地主户较下地九垧七堆（另由贫雇换给六垧二堆）外，其余分配给了三十六户（约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共一百三十七人（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四十），满足了二十八户贫雇农、八户中农的土地要求，全村（也即是全乡）基本上达到拉平。地主每人平均产量六斗八升四，富裕中农七斗零三合，中农七斗，贫雇和老弱残废七斗六升。全村每户都有园子，也都有好地。去春分配中有五户地分成小块，现也兑成了大块。自开始至分配完，前后共二十一天。（调查登记九天，群众反复酝酿分配七天，公布复审及修正五天。）对这次分配土地，群众都满意地说："这回才真正彻底了！"贫雇说："这回真满足了！"八户中农分得土地十垧二堆，生产情绪很高，七家合伙买了两头耕牛，大家都在积极筹划种籽，准备生产。至于抽动土地的七户中农，另分配了果实及调剂了园子地，并废除债务，减轻负担，有失有得，并不影响其生活，所以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咱们是真心欢迎出这一点地"。

中共中央关于晋绥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根据分局五月三日及十八日两次来电，证明晋绥党的基层组织中，作风不纯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存在。有极少数支部为地富篡夺或被暗中操纵。区级以上干部中由地富家庭出身者占有不少的比例，其中大部虽努力工作，且已经过长期考验，但有一部分则思想上还存在有毛病，未能完全放弃其原有的阶级立场。下级党员干部中自私自利现象相当严重。这一切说明整理党的组织是十分必要的步骤，而且是收到成绩的。但两次来电同时指出绝大部分支部中的党员成分还是不算坏的，地富成分占党员的最少数。如兴县二区八个支部党员共三百四十八人内，只有四个地富分子，平鲁二区八个支部共二百四十一个党员中，只有一个地主，没有富农。在晋绥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占全区三分之二的地区内被群众选举的三万个区村代表中，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原有的干部党员（即是说有六千到七千人）。而在村级领导骨干中，你们说原有干部党员占三分之一至一半，又在五万个贫农团及农会积极分子中，你们亦说包括有一部分原有党员（估计上述区村代表、村级领导骨干、贫农团农会积极分子中，会有一些是重复的）。还有一批党员被群众通过加入了贫农团和农会。在全晋绥四万三千个农村党员中，仍有如上所举这样多的原有干部和党员为群众所爱戴，或并未为群众所抛弃，这种情形证明整个晋绥地方党的基础并不算太坏。加上几万个新起来的积极分子，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会要加进党来（你们已确定大量发展新党员，增加一倍党员），这是一种新的力量。在这数万个党与非党积极分子的基础之上，的确是可以把晋绥党与政府都改造整理得很好的。这是这次土改整党运动中的重大收获。

（二）但从这种情况也可以得出一种结论，就是假如土改开始时你们即注意把整党工作与土改运动密切结合起来去进行，即是说按中央五月八日所指对三类不同情况的支部，加以分别处理，（对较好的或中间状态支部都采取初步必要的改造，对少数成分太坏被地主富农操纵的支部，则超过或解散，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及干部参加土改或另行建立支部等办法，这样来去掉党内对土改的主要阻力，由工作团协同和领导支部去参加土改运动，在土改运动过程中继续考验干部与党员，并吸收新产生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继续改进和健全支部组织与工作。）有如上所述大批好的和较好的党员及干部作基础，应当承认是可以把党的基层组织初步整理好，使其能有组织地参加土改运动的（初步改造并不需要如郝家坡整党那样多的时间）。其结果也必然会比一般超过支部组织的办法要好些、健全些。你们虽然也说“领导上始终还是肯定党员干部多数可以教育”；这也的确是你们对党员干部的看法。那就应该采取适当的组织政策，来教育和领导他们参加

这次伟大的土改运动，并在运动中考验锻炼他们，就不应当急于要完成土改以便春耕（其实时间并不那样急，你们去秋就开始采取抛开支部的办法）；用“贫农团新农会代表会是实行土改的合法机关”；或用现在要搞土改无暇顾及支部和党员等为理由，来把支部抛在一边。相反，是应当如何运用支部党员力量去加强党对土改的领导。而在当时的确如你们所说：是在一种揭发党内严重不纯的空气下的一种缺乏清醒分析的错误。而这种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据我们看来又与当时错误的“贫雇农路线”，贫农团比党要好些，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是有联系的。因此，晋绥在土改过程中，对整个党的基层组织一般是采取不信任态度，不是主动积极地在土改斗争过程中去改造它的方针，而一般是采取了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采取了对被群众推选出来的积极分子则加以信用（但又限制代表会的代表党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对“中间态度的则含有让这些党员干部在土改中去考验，坏的则让群众清洗”的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现在看来，这种整党的方针是不妥当的有错误的。这就一定要减弱党在土改中的领导力量，也损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而且必定是伤害广大党员及一批干部的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一些困难。你们也承认过去审干整党工作中“确有缺点错误”，除因错订成分被斗争者外，“因在党员和群众中酝酿均不成熟，因而少数处罚过重，使可以争取不死者致死，可以不开除撤职者开除撤职。去冬一时期，有几个县曾一律将干部停职待查，一时期引起一部分好的干部不满，这是左的偏向，是尾巴主义的结果”。这一般抛开支部的错误方针，你们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态度加以适当的指出，才利于团结广大党员和一批好的或基本上还是好的干部。

（三）你们在五月三日的来电中，对于晋绥党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析。对支部的估计，你们认为“少数支部则被地主篡夺，但支部受地主影响，则一般的存在”，这一点，尚希你们作更具体的调查研究。我们必须把支部中某些党员个人与地富有某种关系和支部领导（即整个支部）受地主影响加以区别。支部中有个别党员受地富影响或本身就是地富分子的现象，可能是相当多的。但这些党员如不是在支部的领导机构之内，不一定就成为支部的支配力量（自然也会有个别这类普通党员能影响支部领导的）。而支部“受地主影响”，应当是表现于支部在领导对敌斗争，在过去的减租减息斗争和近年的土改运动，在生产支前等运动中，支部不执行党的正确决议上。如果过去的支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决议，特别在执行减租减息，土改运动，生产支前等政策上是坚决努力的，一般能完成上级给与的任务，只是在作风上有强迫命令或有些党员自私自利的缺点错误，那就不能笼统估计为“支部受地主影响”。比如你们五月二十五日来电中关于说明代县二十一个支部与地富关系的材料，除三个好的支部不说以外，则只能说前两类共八个支部是包庇地富或受地富影响的（在普遍将错订成分者下降之后，是否还有八个支部，尚待证明），而第三类的十个支部中，有“部分或个别党员与地富有联系”就不能笼统说这十个支部都是受地富影响，而必须再加以分析，其中某些是能对支部领导发生影响，某些则只是个人与地富的联系。而且联系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内容，有的属于普通的亲朋故旧的关系，他们与之有些平常的来往，有的则是属于包庇地富的行为或

对地富采取妥协态度。我们承认晋绥党的支部除有一小部分被地富所直接间接控制者外，另外确会有一些支部是受地富影响的，但对你们那“支部受地主影响，则一般的存在”之估计，则有怀疑，望你们再作慎重客观的研究，并将结果告我们。

（四）你们今后整党，拟采取只由经过群众选举担任工作的党员，组织整党委员会或组织临时支委的办法，也还值得考虑。因为这种方式，可能会加深党内已存在的某些隔阂。我们意见还是由区委（如区委组织也已不存在，则须先加以组成，如存在而不健全，则首先加以改造。）和原来工作团（必须去掉其中的非党员，或表现不好，思想意识有重大毛病的分子）负责去直接整理支部。会比另组整党委员会或临时支委要好些。依靠被群众爱戴的原有党员和干部，和已经吸收的新党员作骨干去进行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思想是很好的，在方式上还是一般的以经过原有支部去做为好。即是说首先一般应当宣布恢复原来支部组织的活动（如已另外成立临时支部者，也应合并进去），召集包括全体党员的（一切未经党内正式合法手续决定开除党籍者，均应承认他为党员）支部大会，由区委或工作团向全体党员宣布整党意义与内容，监督支部进行支部委员会和小组长的初步改组，或指定适合的党员，组织监时支委会（原支委会中比较好的委员，尽可能也吸收一二人参加）或任小组长，负责领导支部和小组的日常工作。在支部组织恢复活动，并初步改造支部领导机关之后，就可以吸收一批新积极分子入党，区委或工作团必须善于领导支部开展党内民主，发动批评自我批评运动，检讨过去支部工作和干部党员与群众的关系。区委或工作团并一定要作些自我批评，指出高级领导机关对过去党内不纯及各种缺点所应负的责任，并指出整党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以启发自我批评运动。先召集二三次支部大会，在党员干部中作整党的充分思想准备；教育有错误的干部及党员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如何去向群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同时在农民代表会上或自然村的农民群众大会上，（群众大会不应开得太多，据各地经验，群众对开许多大会误工很多，表示不满厌烦。这点你们必须注意！）宣布整党意义和方法，公布所有党员名单，公开党的组织（边沿区在外），要求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对党员及干部充分提出意见，准备派代表（据太行经验，由农民代表会推出代表比较由群众任意去参加支部大会，更能代表群众的公正意见些）。出席支部大会。经过这种支部内外的思想酝酿和准备步骤，然后召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支部全体大会，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运动，这种会议上，应特别多注意听取群众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少作甚至不作解释和声辩。经过这样有群众代表或群众参加的会议，并且听取群众方面所提出的批评指责意见之后，再召开支部大会，更进一步开展党内自我批评和反省。对于必须惩罚以至不能教育而必须开除者，也作出决定；同时对于过去处罚过重或不适当者，也必须作出修改的决定，然后又召开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支部大会，又进行批评自我批评。这次会，则着重由犯错误的干部或党员，向群众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批评与反省，对群众的误会，也作必要的声辩与解释，宣布对党员的处分和减轻改正处分的决定，并征求群众对这些处分及改正处分的意见。此后如有必要，则犯错误的同志还可到农民代表会或群众大会上进行反省承认错误，表明如何改正错误的决心。经过上述步骤去进行整党，对犯错误者及对群众的教育意义都会很大，不会发生打人乱斗的现象，也便于党内及党与群众的团结。这样的办法

和步骤，特提供你们参考。

（五）你们主张“采取积极教育的态度，争取教育原有党员被群众处分尚能继续革命的分子，及被群众所暂时停职但仍能继续改造或调外工作的分子，以及改造和提高处于中间状态的党员”，认为这是“重大任务之一”。对于开除党员，采取隔级批准制。这些意见和办法都是很好的。

对于“各地发生少数旧有干部党员发牢骚，甚至发展到与地主勾结攻击新起的骨干分子”的情形，值得严重注意。对于这些人，也必须加以分别按具体情况来适当处理。对那些打击过分了的，则应向他们说明当时处理上的缺点与错误，现在改正不恰当的处分，也准许他们自己向党提出申诉，但他们中有错误的则应当承认确属他们的错误，和应得的处分，要他们必须与那些真正是坏的干部和地富分清界限，争取基本上还是好的或还可以教育的干部党员，站在党的方面来，以孤立真正很坏的干部党员。对于那些真正是极坏的已经蜕化了的毫无教育希望而且已经开除党籍的坏分子，经过群众批评斗争，也还不愿改悔的分子，则可由政府宣布法令，明白禁止他们做何项活动，如有违犯，则交由人民法庭审判处罚，以压倒他们的这种活动。但用法庭制裁办法不能用得太广泛，只是对付少数冥顽不改，以至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坏分子，而且事前要取得区或县级的批准。这里必须重复指出，不能对每个过去受了过火处分现在发点牢骚的人都用法庭力量去制裁，也不要把发点牢骚的就都看成为与地富是有勾结，而随意去打击他们，如这样做必会增加将来处理上更多的困难，而且是错误的。那些基本上打击错了或过火了的干部和党员，免不了会有些意见，甚至牢骚，党的领导机关要主动的找他们谈话，解决他们认为存在的问题，这才便于争取他们。同时对一个干部或党员也要全面的历史的去分析，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有过什么功绩；看他现在也要看他的过去。这不仅对一个党员如此，对一个支部组织也应当如此。你们决定即刻开办五个区村干部学校，招收一部分被处罚和当地群众不拥护的干部集中训练改造的办法很好，望能迅速的举办起来。

（六）党内存在着许多严重不纯的情况，因此整党成为巩固党的十分必要的步骤。如果不能整掉党内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以及不能把党的成分弄得更加纯洁一些，而任上述情形继续发展下去，则我们的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一切认为“整党是多余的”一类说法那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党内作风思想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之产生，不能只由下层组织来负责，上级领导机关是有重大责任的。而且主要地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因为农村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恶劣作风还遗留很多，这些农民党员在掌握权力以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及自私自利等，是很容易并是必然要产生的。假若党的领导机关不能规定适当的办法和制度去加以防止，及时检查工作，纠正错误，并且不断的进行教育，则这类不纯的现象就必然更会发展。而过去党的领导机关恰恰没有重视或没有看到这一点，因而就疏于教育与防范，在农村党的建设工作方面就有某些严重的缺点。例如我们党从抗日时期以来没有适当地强调阶级成分，对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党员，没有特别地注意加以教育、培

养和提拔，他们在党的组织内没有若干适当的与必要的优先机会使他们在党的各方面的领导上发生应有的影响，相反，他们在许多组织特别是领导机构内实际是处于被轻视被排挤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于剥削阶级出身的党员应有的与适当的严格性，又有些不够。而这就是造成后来党内成分不纯的主要原因。又例如，我们党对于适当地教育农民党员以及防止各种恶劣作风及自私自利的经常斗争和办法亦是不够的，而这也就是形成后来党内作风不纯的主要原因。再加之以上级分配任务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促、任务繁重，这就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不甚了解下情，检查工作不够，对下面发生的错误未及时指出并帮助其纠正，这就使强迫命令的坏作风，更加容易发展。领导机关平时只知道要党员干部做什么，并未多想办法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程度，很少注意农村环境中容易产生的各种自私自利的倾向及时予以批评，严重者也很少及时予以处分，这就容易形成党内思想不纯的状态。由于领导机关存在有上述这些缺点，因之我们就不能过严的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而且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本身的检查和自我批评，而且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成分作风和思想的纯洁性；否则，今天纯洁的新党员新干部及作风和思想业已改正的老党员和老干部，在他们掌握权力的相当时期以后，其中又会有不少的人要重复过去的错误的。因此，对于过去犯了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而所犯错误又不十分严重者，就一般地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的去处罚他们，如果群众要求处罚他们，也应向群众作适当的与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的保护他们，向群众指出他们过去许多方面的错误是要由领导机关负责的，而他们今天既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不要处罚，特别不要过重地处罚；因为在这时的处罚，就要妨害他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如果他们所犯错误或罪行太大，因而引起某些人们的损失和群众大的愤怒，而必须给以党内和行政上适当的处分，甚至须经法庭判罪才能平息群众愤怒者，则在令他们承认错误及适当地退出由于贪污及其他自私目的所得的果实和赔偿损失而外，给他们以应有的党内及行政上的处分甚至交法庭判罪那也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会使人们觉得没有法纪了。但这种处分亦不要太重。因为他们过去这种罪行也是领导机关要负责任的。对过去犯错误者不宜过多过重处罚，这不仅因为如果过多过重处罚，会妨碍或者断送犯错误者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将在其他方面引起不良的影响。例如，若干新干部由于害怕将来受处分因而不肯放手工作的现象，就是受了这种处分过多过重的不良影响而来的。这一点，群众在当时常常是看不到的，常常激于一时的气愤，要求过多过重地处分一切犯错误及犯罪行的分子；但是领导机关则应该看到这一点，应该向群众解释，说服群众，在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以后，万万不可作过多过重的处分。在这里，领导机关决不可采取“让群众去处理”的放任的政策，更不要受某些群众一时甚为高涨的宗派报复情绪的影响，而动摇自己正确的与坚定的方针，因为，如果这样，就要使我们的整党工作走上错误的道路，或走不必要的弯路。只有对于那些不肯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坚持错误的分子，或者只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以后又重犯同类性质错误的分子，以及钻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和完全蜕化了的分子，才应该无所顾惜地给他们以应得的处分直至开除

出党。因为对这些分子如不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他们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就不能保持我们党和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严肃性。因此你们事前不要肯定作出开除一万党员的决定，而要按个别党员的具体情况去作具体的决定。

在整党过程中，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正确利用自我批评武器，首先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的对待人家的批评。在这次伟大的土改整党运动中，获得有重大的成绩，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但运动过程中错误也是难免的。例如，对某些具体政策缺乏及时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如何划分阶级，对地主工商业如何处理，很长一时期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整党也缺乏详细具体的指示，因此，下面就容易犯或左或右的错误。因此，有些党员和干部可能存有各种意见，要制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甚至有牢骚也让其发泄出来。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与对党反攻加以区别，不应随便加人以反攻帽子来抑制党内的民主。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领导机关或人员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但是，如果有人利用党在一个伟大运动中的某些缺点错误，而宗派主义地及恶意地攻击领导，不是为着弄清是非，巩固团结，而是有意要造成党内纷乱和进行派别活动者，则必须加以防止和反对。否则就只有削弱党的力量，破坏党的团结。

（七）有一个问题值得你们地区也要注意，就是华北某些地方群众表现有动荡不安的情绪，而且呈现一种不很团结的现象，更由于干部的“躺下”，以致迷信及会门团体，随着有些发展。这与战争延长，人力财力负担很重，天灾疾病流行等有很大的关系，与土改斗争过程中一些过左政策也不无关系。群众中产生一种不正常情绪，反革命特务也就借机活动起来。上述现象应随时加以警惕。现在群众要求安定，这除要在实行土改地区迅速确定地权和负担额，尽量节用民力，减少支前动员，组织群众生产等外，同时也要少开群众大会以免他们误工太多，妨碍生产。要真正健全区村人民代表会议及区村政权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不要每一小事都开代表大会或群众大会解决，要实行分工负责制，一切问题能及时迅速解决，去掉存在着的一切混乱、拖延、极端民主化、无政府等状态。土地问题已解决的地区，要强调各劳动阶层间的团结，消除贫农中农间、新老干部间、干部与群众间、这村与那村间、外来与本地干部间某些隔阂现象，并积极地组织被斗过的地富也来积极参加生产。要做到劳动阶层间的坚固团结与安定，首先必须要做到党内新党员老党员间、新老干部间的团结一致。党内团结的方针，应当是不管新老，只论好坏，将新老党员和干部中的优秀部分。团结起来，成为核心，再将稍有毛病的新老党员和干部，又团结在这一核心的周围，加强对他们的帮助与教育，以巩固党内团结。在新老党员干部团结问题上，双方都有责任，但老干部和老党员的责任要更大。同时党在领导上要注意用各种实际有效办法推进群众中的团结合作，使群众能够安定的去进行生产。在生产运动发展中，又更推进群众内部的和睦与团结。

（八）在土改已完成地区要争取在今年冬季内把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也整理完毕。应利用七八两月时间，将区县干部及各工作团干部集合起来用会议、训练班、党校等方式，好好检讨一次土改整党工作。首先要使这些干部对于土改整党问题，有一致而正确的认识。发扬自我批评，揭发他们中存在着的一切不正确的想法和作法，使他们自己真正搞通思想和政策，首先要整掉他们中不纯的思想与作风，才能保障他们下去能够正确领导土改与整党工作，而不致重复已经做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特别要告诉他们，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要他们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去对待一切工作。他们下去按照前述整党方针步骤去进行党的整理工作，最后支部要经过一次民主选举，推选出强有力的支委会和小组长担负支部经常领导。在没有支部地方也建立起党的支部组织，使支部真正成为农村中的领导核心。支部仍应有自己单独的生活，过去采用一揽子会，就完全取消支部本身组织生活，显然是错误的，这样会丧失党的领导作用。一揽子会只能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可以举行，它的好处是能减少一些内容重复的会议，使乡村中的积极分子得以民主而迅速的解决问题，但除此种会议外，平时支部还应有自己的支部大会或小组会议，进行党内教育，吸收新党员，利用自我批评武器，检查工作，定期改选领导机关，和执行党纪等。现在因为有了人民代表会议，一揽子会自然就没有必要了。但是支部大会及小组会也不要开得太多，而且要求得每次会有准备有收获。开会时群众愿意者，可以旁听，发表意见。每年年底或年初，必须有一次支部工作大检查，在充分民主基础上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并改选一次支委会及小组长。领导机关必须经常注意健全支部组织与工作，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使之真正成为先进觉悟分子的组织——阶级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而且能够团结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去正确的实现党的政策。关于支部如何建立经常生活，你们还必须加以研究，这对巩固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政策之贯彻实施，是有极重要意义的。

（九）你们五月三日来电所提整党原则及步骤，除某些问题与上述各问题有抵触者应加以修正和补充外，其余一般都可以适用。对于今年秋后如何进行尚未进行土改整党地区的土改整党工作，望根据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所发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工作指示，及过去所发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指示，以及中央两次（连这次在内）来电原则，和你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按照具体情况去布置进行。

把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新华社社论

目前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正处在胜利的紧张的关头，全国各解放区，必须集中一切努力去争取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时，由于革命战争的进攻形势与不断胜利，使各解放区除接敌区与游击区外都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这种环境，是可以而且必须被利用来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的。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生产，使解放区的生产能够在现有的水平上迅速提高一步，这是争取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因为只有解放区生产的提高，才能长期地更有力地去支援前线的革命战争；只有解放区生产的提高，才能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使人民更加团结，使解放区更加巩固，并因此也就能以充分而切实的事实去说服全中国的人民迅速地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说：一切在后方党政机关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他们虽然因为支援前线、土改、整党及征收公粮等工作，是十分繁忙的，但他们必须至少拿一半以上的时间，即一年中六个月以上的时间，去组织与指导生产事业。又说：一切基本解放区的当前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把生产向上提高一寸。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正是我们各解放区后方工作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又说：目前在解放区提高生产，必须是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并重。这与以前提高生产以农业生产为重心的情况，是有了一些改变的。这是因为解放区日益扩大，人口日益众多，在解放区内部，已经有了很多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并已开始有了大城市，不少近代的工厂、矿山及工业区，已被解放，铁路、公路、河道及火车、汽车、汽船、木船在解放区已经不少，在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城市、工厂、铁路、河道被解放。这些，应该是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最可宝贵的收获。必须很好地利用这些工厂、矿山、铁路、公路、河道及一切机器去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除此以外，在解放区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及农村与城市的家庭副业生产。这些手工业生产，一部分由于解放区民主政府的提倡与扶助，已有广大的发展，在解放区的经济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另有一些手工业生产，则由于战争与国民党的罪恶封锁，受到了破坏及生产降低，在土地改革中，由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若干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也受到一些破坏或暂时的生产降低。恢复与发展解放区广大的手工业生产，亦是极为重要的任务。虽然在解放区的机器生产及手工业生产，都远不如农业生产广大，其数量亦比农业生产小得多，但这些工业生产在解放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必需的地位，却与农业生

产是同等重要的。特别因为工业生产的破坏与缩小，工业产品的缺乏与价格的高昂，就更加显出恢复与发展解放区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因此，除开那些只有农业没有什么工业生产的农村党委，或只有工商业没有什么农业生产的城市及工厂党委，它们应该唯一地或主要地以发展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为自己的生产任务而外，其他所有有农业又有工业生产地区的党委，特别是各中央局、区党委等高级党委，都应该以发展工业生产与发展农业生产摆在并重的地位。只有如此，才能使解放区的经济，走上更加健全更加独立的发展道路。

关于发展解放区工业生产中的各种问题，过去已有将来还有专门的论文来加以讨论。这里只来讨论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农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今年春耕已经过去，夏收已经完毕，解放区各地的农业生产，已经或多或少地获得初步的成绩。今后在一般地区的任务是继续夏锄，作好秋收，在接敌区与游击区要作好护粮斗争，而在某些发生严重灾荒的部分，则要抓紧时机，把抗灾救灾当作唯一的中心任务。但是一般地说，各解放区都应当从现在起，特别是利用今年秋冬两季，对明年的大生产运动，充分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因为一切基本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大部彻底完成，其余一部分地区预计今年秋冬两季亦可能完成。到明年，便可能在全国一切基本解放区内开展一个完全没有封建束缚的、各阶层人民得以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比赛生产致富的普遍的生产运动。

为了提高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为了准备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运动，要做些什么呢？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要针对土地改革后所产生的新情况，解决一些有关农业生产的政策问题。这是开展农业生产运动的前提条件。这些问题是：（一）确定地权。按照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规定，“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与中农所有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允许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样的地区，就应当以户为单位最后确定各阶层（包括土地改革前的地主、旧式富农在内）一切男女老少人口的地权财权，保障其不受侵犯。各解放区最高行政机关应当统一颁发土地执照，依级转由各县、市政府负责填发，交各户主收执，以后遇有土地转移买卖、分家、嫁娶等情形时，准予分领或换取土地执照。二流子一时难望改好者，其土地执照经公议，可由一定组织（如村政府）暂代保存，待其转入劳动后，再行发给。（六月十二日本社转播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颁发土地执照的规定，可供各地参考。）（二）凡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曾经发生而尚未纠正的偏向，必须认真地、适当地、并尽可能迅速地加以纠正。那怕是部分的甚或个别的现象也好，都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不应马虎过去。一切划错了的阶级成份，必须按照中央公布的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与任弼时同志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公开地加以订正。对于因划错成份而没收的土地财物，能退回的应立即退回；不能原物退还的，应当在一面照顾被错斗户的利益，一面照顾翻身贫雇农的情绪与实际困难的原则下，尽一切公私力量，设法予以补偿。对于被错杀者的家属，应由政府设法予以适当的抚恤。对于未曾分给或留给一份土地财物的地

主、富农，应迅速地予以适当安置。务使一切农村人民都能得到一定的生活与生产资料，使之能维持生活并从事生产。如果区村政府对于这些问题不能自己解决，各解放区的最高政府就必须规定确实办法去解决，如拿出一定数量的公粮公款及其他办法去解决。要看到纠偏的积极意义。应当利用纠偏教育干部与群众，使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做到真正孤立敌人，壮大自己；使他们弄清楚什么是我党的正确政策，什么是执行中发生的偏向，并且对偏向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得出纠正的办法，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注意克服我们工作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建立新的民主秩序与民主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扫除生产的障碍，并从而增进农民与农民间、群众与干部间的团结，便利今后一切工作的开展。（三）明令允许雇佣劳动（包括请长工、短工等）的继续存在。雇用条件如何，除劳动法令已有规定者外，应由主雇双方自由约定。在土地改革中把旧式富农对雇工的剥削作为封建剥削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带有封建性，并不是根本禁止雇佣劳动。事实上目前雇工种地的人大部是家中缺少劳动力，这种雇工是应当提倡的，以免荒芜土地，并造成一部分人的生活困难。（四）土改完成地区，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允许特定条件下的租佃关系。即凡因孤寡废疾，或因参加革命军队及其他脱离生产的革命工作，或因进入工厂作工及改营工商业等，因而不能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者，或政府所有公荒须招人投资开垦者，均应允许出租其土地。租额在政府未统一规定前，可由主佃双方自由约定之。（五）明令保护在废除高利贷以后的私人自由借贷，利率在政府未统一规定前得由债主与债户自由议定，此项新的债权，不问其所属阶级如何，一律受到法律的承认。（六）凡经过土地改革地区，应视今天土地分布的状况，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并切实改善战勤制度，使一方面有利于支援战争，另一方面能鼓励农民生产情绪，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有些解放区已宣布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地区，一律废除农业累进税则，改用无累进率的比例税收制，并规定一律按各块土地常年平均产量计征，不按当年实际产量计征，凡因勤劳或改良作务所增加之收入，一律不增加负担，使人民多生产者能多得利。在因荒年或其他不可抗的打击而致歉收的情形下，则得由政府酌予减征或免征。并规定统一村款收支，平衡各地负担，严禁一切额外征收，力求减轻人民负担。这些办法，可供各地参考。过去，由于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地主与旧式富农手里，只有对他们这种依靠封建、半封建剥削得来的财产课以较一般农民为重的税率（累进征收，土地越多的负担越重），才算合理，才能相对地减轻一般农民的负担，现在土地已经平分，封建剥削不再存在，如果仍旧施行农业累进税则，就会妨碍人民的发家致富，因此，必须予以废除，代之以便利人民生产的新的税则。战争勤务，亦当适应阶级情况的变化，做到合理分配，节约使用。在保证战争必需的供应下，求得尽可能少动员差役。要十分爱惜和适当使用民力，严格禁止后方机关假借战勤名义随便支差，加重民力负担。以便使更多的人力畜力集中用于生产。此外，战勤支差制度亦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改良，例如山东已采用有代价的包运制来运输军用物资和伤兵等，即可大大节省民力。所有这些政策，应予明文公布，广为宣传，贯彻执行，以解除人民的顾虑，安定与鼓励其生产情绪。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各地经验证明：由于改良农具，或改良耕作法，或采用好的品种，或变旱地为水地等等，往往使同一土地的产量增加一倍乃至两三倍不等。过去由于封建束缚没有彻底解除，农民很少兴趣也很少可能从事技术改良；现在是有这个兴趣也有这种可能了，因此得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普遍开展改良农业技术的运动。一切农村组织与农村工作者，应将领导与组织这一运动当作重要与经常的任务。应当采取各种有效办法，保护与增殖耕畜，并提倡养羊养猪，积肥沤粪；应当提倡和奖励改良农具，改良耕作法，选择品种，防除虫害，改良土质，兴修水利等，有益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应当物色并组织一切对农业生产具有专门智能与丰富经验的专家或老农，帮助政府指导农业生产；应当开展生产竞赛，在讲求实际不骛虚名的原则下，表扬真正对生产有贡献有创造并有推动带头作用的劳动英雄与模范人物，把他们的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政府每年应当发放必要的和可能的无利或低利农业贷款，并改善贷款方法，反对把贷款混同赈款，采取平均分配，只发不收的单纯救济观点，要以贷给生产资料为主，而不是以贷给生活资料为主，要有计划有重点的分配，防止挪用积压，并简化发放手续，保证全部并及时地发放到真正劳动人民的手里，必须有借有还，以便逐年增加，扩大发放。各解放区必须设立农业生产贷款局，专司其事，以便有计划地、长期地把农贷在企业化基础上切实办好。只有作好这些工作，才能使增产成为可能。在今年秋季，一切解放区，不论已否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均必须指导农村人民种好麦地，在冬季号召一切农村人民多多积肥，修理与添置农具，为一九四九年的大生产运动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为了作好这一切工作，政府的农业部门对于生产工具的制造与分配，牲畜的购买繁殖，大小水利的计划与举办，优良品种的选择与推广等，应该首先作好。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组织农村人民的合作互助。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要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要打破束缚生产力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而在封建关系被打破以后，唯一的任务，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由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相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除了改良农业技术（生产工具）而外，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组织劳动力的问题了。关于组织劳动力，即组织合作互助的重要性，毛主席在《论合作社》、《组织起来》的讲演中，曾作过反复详尽的说明。特别在目前，由于土地改革后，土地、耕畜、农具等相对分散，加上长期战争的消耗与敌人的破坏，造成农村人力、畜力及生产资料之不足，因此更需要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互助，并提倡妇女劳动，才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但是组织劳动力，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善用农民的亲身经验，通过农民的思想觉悟，采取逐步推广、逐步提高的方式。因此要反对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但又不能放弃领导，任其自流。根据过去经验和目前状况，组织合作互助：第一、必须是自愿结合的。由任何方面对于任何人实行强制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合作组织，没有不失败的，因为如果这样就不能发挥劳动积极性。所以在一切生产合作互助组织中必须严禁强迫加入。即是对于地主和二流子，应教导和监督他们学习劳动，也不应采取片面的管制办法。第二、必须是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某些地区在合作互助中，片面强调贫雇农利益，强制地主、富农甚至一部分中农给贫雇农作无偿劳动或不等

价交换，都是破坏生产的错误行为，必须严格纠正。第三、一切劳动人民都可以成为组织合作互助的对象。农民与农民间的合作互助，固应提倡；转向劳动的旧地主参加农民的合作互助，也是允许的；组织中农和贫雇农的互助，尤其重要。某些地区只单独组织贫雇农生产互助，是不好的。因为这样，不但不能推动整个农村的生产运动，也不能解决贫雇农自身的许多困难，如生产经验不足，生产工具不够完备等等。在这些方面，贫雇农都需要取得中农的帮助。第四、合作互助组织本身，必须有领导，有计算，又必须有民主，有监督。第五、由于战争中男劳动力的减少，组织妇女参加生产，有极大的重要性。各解放区妇女过去在战争中，在支前、民主、土改与生产运动中已有不少的贡献和参加劳动的经验。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更广泛地组织她们，成为生产运动中的主力军之一，并从而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

在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要求目前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能有飞速和大量的提高。但是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从现有的水平上提高一步，或者说提高一寸，不但是完全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充分认识：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只要有正确健全的领导，扫除一切不利于农业生产的障碍，采取各种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提倡技术改良，组织合作互助，便可完成任务。象军事战线上的胜利一样，象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一样，我们还必须以同样的努力取得生产战线上的胜利。一切革命，一切社会改革，其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胜利了，在土地改革中胜利了，而不能在生产上继续取得胜利，那我们的革命和土地改革就变为无意义的了，变为无理取闹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军事胜利与土地改革胜利的完全新的基础上，继续取得生产上的胜利，才能使我们的革命和改革成为历史上的重大进步。用生产的胜利，来巩固和扩大土地改革的胜利，来支援和保证军事上的胜利并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新 华 社

问：毛主席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应当批判这种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什么思想？它为什么是反动的？

答：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带有革命的与反动的两重性质。

从农民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这方面来说，这是革命的方面，正确的方面。因为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以封建主义的方法束缚农民，剥削农民，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平分了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就是把封建的土地财产变成农业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土地财产，使广大农民获得改善生产条件的基础，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是一种伟大的最彻底地扫除封建制度遗迹的革命运动。因为农民的反封建的平均主义有这种革命性，所以我们共产党赞成并帮助农民实行了平分地主及封建性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农民的平均主义，仅仅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上，有其革命性，我们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才去赞成并帮助农民们实行这种平均主义。除开这种场合以外，农民的平均主义，我们都是不能赞成和实行的。而且农民这种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其性质，也只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如果把农民平分封建土地财产的革命，误解为是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也是完全错误的和极端有害的。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的反动方面、错误方面，就是它在主观上梦想超越这个反封建主义的界限，不愿限制在平分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财产的范围以内，并且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例如中农和新式富农）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一切平分称为"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因为这样平均的结果，不独

是要破坏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而且要破坏非封建的即自由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就是要平均主义地破坏工商业及一部分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因而也要打击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向上积极性。这样，就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后退。因为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主观地希望把那在工业上和农业上已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这种发展在目前阶段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的社会经济，还原为封建时代那种孤立的小农式的社会经济，把那已发展了的、和正在发展的工业，以及建立在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基础之上的商业，还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所以这种想法和这种做法，乃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

平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财产的土地改革，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因为土地改革只是废除了封建阶级的私有财产，没有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在客观上还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因为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发展，并使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阶级分化，而绝不能永远保持平均的小农经济。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他们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完全相等，尤其不可能保持不变。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又努力生产，善于经营，他们的经济就可能发展，而逐渐地富裕起来，其中有小部分就有可能进行剥削，而成为新的富农。而另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产，或者不善于经营，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击，他们的经济就不能发展，而逐渐地穷困下来，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剥削而变为新的贫农或雇农。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即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只有允许这种竞争，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农业经济广大地发展起来；所以这种私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有其一定的进步性。抱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看不见土地改革后这种可能的社会变化，看不见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以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后，就能够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与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

上述那种竞争和分化，如果是在旧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那可以因为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垄断的无限制的发展，而一直分化下去，以至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利益，化为乌有，例如很久以前法国与美国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民那样。在那里，土地改革是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不是由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所以，在土地改革后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结果，农村和城市都有激烈的无限制的阶级分化，一方面造成了垄断全国财富的少数大富翁；另一方面，把大多数人民变成极端贫困，变成了大资本的奴隶。所以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如果不同时实行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的一系列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并在最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大多数农民的解放还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农民的贫困与破产，还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们中国今天的土地改革，不会走到那种结果，因为中国今天的土地改革是在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的，并且已经实行以后还要系统地实行新民主主义

的经济政策，所以大多数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得的一切，只要自己努力生产与善于经营，就有可能发展起来，就有可能不至重新丧失自己的土地财产而穷困下来。因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内，自由竞争与阶级分化虽是仍然存在，但不是没有限制的，如资本主义各国所已有过的那样。毛泽东同志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还必须容许“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中则须容许新式富农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恢复旧的半封建社会。我们经过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种道路，一方面，要在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政府的领导之下，根据农民自愿（不是强迫命令和矫揉造作）与等价（出劳动多的得多，出劳动少的得少）的两个原则，采取那种为农民群众认为有利与合理、能为群众自然而然地接受的一定步骤与各种可能形式，以发展农村中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变工合作（在变工合作运动中，同样地要发展竞争与竞赛）；另方面，要经过我们新民主主义政府对于广大农民生产给以财政投资及经济和技术的援助，这样就使大多数努力生产的农民在从封建的压迫解放出来之后，可能保持中农的地位，避免因受垄断资本家的压迫而重新陷于破产，并且会使他们的生活步步向上。同时，我们的工业则可以利用农村因发展变工合作及提高技术而过剩出来的广大劳动力，获得广大的工业后备军。这种工业后备军，也就会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因资本压迫、而破产出来或被排挤出来、并更成为资本自由掠夺的对象的工业后备军，有所区别。我们在土地改革后，一定要走上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决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领导，保证我们走这样道路。但是，必须知道：要达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结果，决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斗争的，而是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因为还有不少的资本家和富农要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一定要依靠共产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才可能步步克服旧资本主义的抵抗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

然而，即使如上所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内，土地改革后农民中一定程度的阶级分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农业上绝对平均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与其他人民，经过另一个阶段的历史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农民解放的第二步。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消灭一切的贫困，才可能最后来解放农民，才可能使阶级逐步归于消灭。但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因此将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没有工业的大量发展，没有大量的成千成万的农业机器供给农民使用，并使农民有可能团结于集体农场之中，而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农业，那只能是反动的幻想。带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想在孤立的单个小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来企图实现社会主义，就

正是这样一种反动的幻想。其结果，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农业，而将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与倒退。当然，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使所有的人在生活上的完全划一，也和农业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完全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所能实现的原则，乃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在劳动中生产得更多更好的工人与农民，他们取得的报酬就必定较多，而生产得较差的，所得的报酬就一定较少。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容许不劳而食，也决不容许偷懒的人与积极劳动的人取得同样的报酬与享受同样的待遇。

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高度的发展，并使共产主义的制度得以建立起来之后，就是在建立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制度之后，社会上一切人们生活上的平等，才可能实现。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人民的历史。重复地说，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是从发展生产力这一个基本点出发的，是为的把不事生产的、寄生的、腐朽的、反动的封建阶级所占的生产条件交给直接生产者，是为的彻底破坏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利社会生产力的广大的发展，而绝不是为分配而分配。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一定份量的土地财产的贫农与雇农，此后必须努力生产，改善生产，进行生产的竞赛，即依靠自己以及群众间变工互助的劳动，以提高自己的经济情况，决不能还等待什么分配又分配，或只寄托希望于民主政府的救济又救济。必须知道，如果不努力生产，广大的发展生产力，即使按照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采取冒险办法，而把社会上一切阶级一切阶层的土地财产按绝对平均的方法分配了，那也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长期吃用的。所得的结果，一定仍然是大家的一场贫困。所以，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巩固自己关于发展生产的观点，而在土地改革中的一定场合以及土地改革之后，必须特别对于贫农和雇农，认真地进行发展生产的教育，同时也对于中农及其他人们进行发展生产的教育，并继续实行对于提高生产的必要奖励。特别在土地改革之后，进行提高生产的教育，与进行生产互助组织，以保障大多数农民都能生产发家，都能过富裕生活，乃是共产党员在农村中的根本任务。必须用这些提高生产的教育和发展生产的活动，以扫除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并由此得以顺利地完成其他为当前革命所必需的工作。

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

新华社社论

最近一个时期，在老解放区的大部乡村，在过去两年土地改革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正进行着结束土地改革的工作。很多地方正确地解决了土地改革中所遗留的问题，稳定和提高了农村各阶层人民的生产情绪，获得了成绩。虽然有些地方，对于过去土地改革运动中一度流行的某些左的偏向和错误，纠正得还不够彻底，以致在结束土地改革工作中仍有一些左倾的残余存在，这种现象必须继续加以纠正。但是在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和错误，一般地早已经被停止了，而目前在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和解决在过去犯左倾错误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即在进行停止左偏以后的善后工作中，有些地方，又开始生长着一种右的偏向或错误，例如太岳区的翼城县北丁村、冀鲁豫区的聊阳县王化村和北岳区的易县鱼坨村等地的情形。虽然这种右倾并未发展成为当前普遍的主要的危险，但在个别乡村则已成为当前主要的偏向，如不加以迅速纠正，则仍有成为普遍的主要危险倾向之可能。任何右的偏向或错误，和左的偏向或错误同样，是不能容许的，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成为一股逆流，严重地损害土地改革所已得到的伟大成果。

为了巩固与发展土地改革的成果，正确地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各地在继续反对左的思想和错误的同时，必须十分警觉地防止右的偏向和错误的生长，必须认识目前这种右倾的特点，是向右的方面离开了党中央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依靠贫雇农（包括新中农）、团结中农、没收封建与半封建的土地财产，首先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基本政策，在纠正左倾中只片面地注意补偿中农和安置地富，而不顾贫雇农的困难和意见。翼城县北丁村的工作人员，迫使在全村一百九十三户中占七十户的贫雇农和三十二户中农，将分得的土地财产"不管有无问题，一律全部退还"给十四家被斗户（其中有十一户被斗以后，仍保持着中农生活），以致十七家翻身农民降为赤贫或贫农，一家地主却占有一倍于平均数的土地，九家富农所得土地质量超过贫农半倍，而村中积存的斗争果实，却既未分给贫农，又未用以补偿中农。这就是这种右倾的极端例证之一。此外，有的地方，土地问题并未普遍彻底解决，却已不准备继续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有的地方轻率地把地主又错算成富农，或把旧式富农又错算成新富农或中农，并退还其封建财物；有的地方不愿在照顾中农利益的同时，设法满足贫雇农要求；有的地方，不问具体情况如何，笼统地规定对于"被错斗户"必须"全部退还原物"，强迫一切贫雇农成分的新干部必须"承认错误"。与这些政治上的错误相伴而来的，则有两种形式的组织上的错误：一种是在结束土改工作中放弃领导；一种是超过现有的组织，不依靠党内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

较好分子，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来实行所谓“自觉的由上而下的强迫无条件纠偏”。在实行这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错误政策的地方，基本群众垂头丧气，有的贫农甚至被迫逃跑，而地主、旧富农和某些被清洗、被撤职的坏干部、坏党员，却兴高彩烈。

这种右的错误，是从何而来的呢？犯这种右的错误的，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是自觉的，他们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是具有浓厚地主富农思想的人们，他们实际上反对土地改革，不承认土地改革的必要和土地改革的巨大成绩，处处阻挠土地改革之彻底实行。或者是一些犯过严重自私自利强迫命令脱离群众错误的分子和一些宗派主义分子，他们在土改整党过程中，受过处罚，也许这些处罚有些过分，使他们在土改中受过委屈心怀不满，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就无原则地同情被群众所斗争的对象，而在实际上成为地主、富农和真正不可救药的坏分子的俘虏，在结束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对党的政策的贯彻，也起了阻挠的作用。另一种人是不自觉的，他们或者是思想上有极大的片面性，过去曾经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造成了许多恶果，纠正左倾错误之后现在又偏到右的方面去了，或者是不会按情况办事，而在实际工作中又确实遇到困难，如在所谓“窟窿大，补钉小”的情形下，他们只知道必须完成补偿与安置的任务，就不问青红皂白，强迫群众退出果实。这些人的大部分，还是我们党内的好同志，但是由于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思想上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作风上的命令主义残余也未肃清，因而在执行政策中摇摆不定，发生了偏差。

因此，各级党委在结束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抓紧领导，既应纠左，又应防右。一方面必须继续认真解决由于过去土地改革工作中左的偏向所造成的许多遗留问题，特别是关于改定成分，补偿中农及整党中处分错了的一些干部问题的处理，并克服在结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左倾残余。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和防止右的偏向。在具体工作上说，就是应该依靠乡村中党的支部、贫农团和农会中的积极分子与较好分子的自觉，根据既满足贫雇农要求，又照顾中农利益的原则，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认真走群众路线，真正错定成分者，必须改定，同时要按照党的政策及具体情况与可能的条件，来进行补偿中农和安置地富等工作，即是有领导、有群众、有条件、有步骤地恰当地进行纠偏和结束土改的工作。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按情况办事，如果当地还有未分配的土地及其他果实或公共财产，或查出的黑地，或是可以退出而又不影响分得果实者生产的和生活的必要资料，就应该用这些东西来适当地补偿中农或安置地富。如果本村确无上述各项土地财物，十分困难，那就应该采取分年减征被错斗中农的公粮，或多借一部分农贷给错斗的中农，或由政府拨给粮款来解决补偿和安置的问题，绝对不应该不问情况如何，强迫翻身农民吐出他们所应该分得和已经分得的果实，退还被斗户。总之，我们首先必须在巩固过去土地改革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来纠正偏向，结束土改，而在解决土改所遗留的问题和纠正左的偏向时，我们必须要照顾土地改革中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历史任务，仍然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来组织强大的群众队伍。对于发生了右的偏向的地方，应该予以及时的克服，并且按照错误的性质，分别对于犯错误者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组织上的处置，以达贯彻关于土改和整党的正确政策之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

速而健康地结束或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并巩固土改、整党的成绩，以便在解放生产力之后，确实有效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努力恢复与发展生产，更加有力地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附〕解放区农民对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

（资料辑录）

一、踊跃参军

近三月来，各解放区已有三十万农民为了保卫土地、保卫家乡涌入人民解放军，参加爱国的自卫战争，晋冀鲁豫边区有十万农民参军，苏皖、山东、晋察冀等解放区，参军者亦均在五万以上。

苏皖七分区某地招待所新兵们互相发问：

“谁叫你来参军的？”

大家一致愤慨地回答：

“是蒋介石逼我来参军的！”

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千百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他们风起云涌地参加了部队，是为了保卫自己翻身中获得的利益。晋北宁武、崞县、朔县三城，原平、轩岗两镇，三千余户贫民获得救济粮六十余万斤，土地万余亩，广大的贫苦民众为了保卫获得的粮食、土地、房屋，有四千余名自动报名参加八路军。

（1946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

旬日来冀鲁豫与太行两地区有三万二千青壮年自动报名奔赴前线参加自卫战。郓城自举行反内战大会后，群众即自动掀起参军热潮，仅梁二庄一村即有十一名模范民兵队员集体参军。巨南县一百八十三名复员战士恳切要求再上前线。鱼台县城关区自听到蒋军进犯消息后，半天内即有十二个青年参军，十七个战士归队，全区二千群众结队欢送新战士。卜宪惠的父亲送他儿子上前线时说：“自从共产党来了，咱们才翻身，蒋介石又想来打咱，死也得和他拼！”青年妇女魏玉莲说：“要是需要我们时，我也拿枪上前方！”李堂村周老先生在蒋军开始进攻豫东区第一天，就送他大儿参加了老九团，陇海前线胜利消息传来后又送他二儿子去参加主力军。杨仙廷送他儿子参军时说：“不打垮反动派不要回家。”武安城关在两天内即有四十七名青年农民报名参军。内丘共产党员李黑小、尹仁小二人首先报名带领二百八十人参加了子弟兵。长治两天内即有四百余人报名奔赴前线，现各地参军热潮仍在继续开展中。

（1946年8月22日《解放日报》）

一月来山东、苏北两地十余万翻身农民，在"争取革命彻底胜利"口号下，热烈参加解放军。其中仅鲁中南一地即有三万八千余人自动参军。长江北岸新收复区的南通、通如（新设县，南通、如皋间）、海启（新设县，海门、启东间）、泰兴、靖江等五县有三千二百多人参加解放军。新解放只月余的铜山县，亦有八百余青年农民涌进参军的行列。启发农民诉苦复仇，提高群众政治觉悟，是这次大规模参军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北南通县参军大会上，新建乡农民张长书诉说自己被国民党匪军抓去，上刑昏过去五次，匪军用茅草烧他，用弹片刮他。抢田乡农民王镜清诉说他被匪军用秤钩钩住嘴吊起来毒打。这些惨痛经历的控诉，使到场农民非常激愤，许多人挥泪高呼："报仇雪恨，就在今朝！"当时就有四十个青年报名参军，接着就展开送夫、送子、送弟参军的热潮，总计报名参军的有七百八十多名。

（194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各解放区人民的优秀子弟，正踊跃加入人民解放军，准备向江南进军，解放江南二万万同胞，仅晋冀鲁豫、冀中、苏北盐湖区统计，近月来参军和归队的人数将近四万名。

（1949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吉林省蛟河县有一个杨老太太。她是个寡妇，伪满时代受穷受苦，好容易把五个儿子拉把大了。民主联军进蛟河以后，她们一家子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受了一辈子苦的老太太从心眼缝里感激八路军。她寻思了几天几宿，打定了主意，便对她的大儿子说："怎样报答共产党呢？咱家里地少，你当兵去不要挂念娘。"不久，她的大儿子跟着队伍开走了。老太太又寻思："老蒋势力还不少。咱要扩大力量才保得住地和房子。"便响应扩兵的号召，把二儿子送去打四平。二儿子挂了彩，回来养伤，杨老太太便着了急，即打发她的第三个儿子参军上战场。

头年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的不断胜利鼓舞着东北的人民，杨老太太乐的不知如何是好，她逢人便说："我看老蒋快垮台了。他们没多少日子活了！"

她又寻思了几天几宿，便对第四第五个儿子说："我一生没本事，又是个老太太，只养活你们五个；报国尽忠我是不行了。——这就全靠你们兄弟五个。……我打算把你们两个也送去参军，索性打垮老蒋，大大享享太平日子，怎样？"两个儿子怕老母在家受累，没决心。可是杨老太太坚决去替他们报了名。五子因体弱不及格，便在农会里当民兵。四儿不久也开赴前线了。

（1948年3月8日《东北日报》）

米脂河岔区一乡基干自卫排长马振启，七次到乡政府要求参军，政府允许后，马上就参加了县警卫队。

（1946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

二、组 织 民 兵

	大 小 战 斗 参 战 民 兵 歼 敌 总 数	114,700次 2,284,800人次 204,700人
主要缴获	各种炮 轻重机枪、冲锋枪 长短枪 炮弹、子弹 手榴弹 汽车	400门 1,800挺(支) 54,700支 2,772,300发 59,400个 100辆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民兵参战人次战迹统计表》,
徐元冬:《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

晋察冀边区二百余万民兵遍布各个战场,协助野战军地方武装牵制、围困与歼灭进犯蒋军。

(1946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在解放区内"那里有蒋军,就在那里战斗!"这已成为解放区民兵的行动方针了。在蒋介石军的残暴进攻面前,南至长江,北迄塞外,无处没有带着枪炮刀叉的人民,配合正规军,到处打击蒋军。

(一)无穷的力量

例如苏中泰兴新街区一地有八百人涌入民兵,在泰兴北宣家堡战斗中,该区群众一万二千余人参加担架与运输,占全区人口五分之一。同时妇女也多负起她们的责任,苏皖已涌现二千余女民兵。家住苏中姜堰双堡的农妇高凤英,自动加入武工队,她有一双天然大脚,肩着一支小马枪,走路比男子还快,游水、爬树、放哨、巡逻,到据点附近去侦察敌情,都表现了惊人的勇敢和机智。两月内,她参加了十一次战斗。如皋宋家桥战斗结束后,三个小脚妇女押解二百蒋军俘虏至后方,中途没有一人敢逃跑。晋西解放崞县之役,八个残败阎军拖着一挺机枪三支步枪踉跄逃奔忻口,刚到城郊村边,只听得一声喊"把枪放下!"就这样,三个放哨的儿童团员征服了八条大汉。在战斗中,民兵积小胜为大胜,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九、十两月冀东、晋冀鲁豫、山东的民兵共歼灭蒋军达三万人。九月份内晋冀鲁豫民兵共与蒋阎军作战两千次,平均每次歼敌虽不足三人,但合起来却超过五千人。

(二)破袭交通

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是三位一体的战斗整体,主力在正面大踏步进退打击敌人的头脑,民兵就配合地方武装在侧背截住敌人的手脚。七月廿二日泰兴东北黄桥蒋军三百余,携机枪八挺,押送满载军用品的木船廿余只,南驰靖江,途经宁界市附近,蓦地一声枪响,立即被民兵团团包围,激战四十小时,百余蒋军死亡,六十余名被活捉,十七只船的军用品补充了民兵的装备。八月一日南通蒋军汽车七辆,装运弹药四百箱,疾驰

如皋前线，开到林梓、丁堰地区，民兵出奇制胜，一阵手榴弹打翻首尾二辆汽车，走在中间的来不及煞车，互相猛撞，不劳民兵动刀枪，司机和押车兵多数焦头烂额，百万发弹药奉送到民兵手里。九月卅号晚，八路军出击平汉路北段，二十万民兵数夜内把这条内战动脉熔解了。十月中旬，冀东万余民兵大破北宁路，其中一段十余里路基被彻底平毁，使该路自十月十三日至廿三日整整停驰了十天。

（三）支援前线

主力在前线作战，民兵就有效地担任着各种勤务。徐水一万六千多民兵参加了光辉的漕河歼灭战。他们出动了一千五百多副担架，上面多铺好稭草，放上被褥，自动组成渡河队，彻夜冒着冰冷透骨的河水来回转运伤员。另外赶着五百余辆大车，满载着给养弹药，有秩序地跟着主力兵团前进。最近鲁南前线吃紧，赵镈县（新县，原邳县北部）民兵配合十万群众，不分昼夜将接近战区的六百四十万斤粮食在三天内转运至后方，女民兵成茂荣、魏学真、傅兰英等也都来参加运粮，她们提出口号：“粮食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决不让反动派尝到一粒。”

（四）地雷战

地雷战，成为民兵的主要战术，它有多种多样。在冀东有子母雷、连环雷，冀中有石雷、瓷雷，山东民兵英雄高唐珍更发明了空中雷、水中雷、钢雷。平绥东线蒋军十六军，于八月廿九日进攻营城子阵地，民兵们东一枪西一枪的麻雀战，惹得蒋军指挥官冒了火，集中一连兵力直扑突出的前缘，民兵们佯退诱敌深入，忽然一声轰鸣，七十多颗连环雷一齐爆炸，蒋军一连人顿时变成肉泥。卅日一小队民兵在康庄前线忽隐忽现的打游击，蒋军以为可欺，派了百余人想来活捉，民兵时进时退，逼得蒋军以密集队形冲上来，这时平地一声巨响，六十五颗子母雷爆炸了，百余蒋军悉被炸毙。

（五）能攻能守

民兵在战争锻炼中，日益坚强，他们能攻又能守，战斗力普遍提高了。十月五日，热河围场蒋军收编的惯匪鲍山峰部三百余人，猛攻三区羊草沟村，该村十二个民兵坚守每一个堡垒顽强抵抗，匪军五次以机枪火力掩护冲锋，皆被击退。当最后一个堡垒被匪军火烧时，他们就机动转至郊外，匪军大抢群众财物，民兵又集合群众数路冲击，匪阵大乱不支溃退，被击伤十余名，俘虏二名，所抢财物，大部夺回。创造了以少胜多自卫保家的模范战例。十月廿一日，山西祁县阎匪八百余人借猛烈火力掩护强渡汾河。守卫河防民兵廿余人沉着抵抗，不久，附近民兵也赶来助战。民兵掷弹筒射手王四蚕连发三炮，阎军机枪立即停止吼叫，在激昂的冲锋号中，民兵两挺机枪分向阎军扫射，大家奋勇跃起追击，最后击溃了廿多倍的进犯者，阎军被毙伤十余人，民兵没有一个伤亡。

（六）装备起来

民兵都是朴实的老百姓，当他们开始战斗时，仅是拿着刀叉棍棒等原始武器，但有蒋军作为他们的兵工厂，在无数次胜利战斗的缴获中，民兵就逐渐被现代武器装备起来了，现在部分民兵已具有新式步枪、轻重机枪和小型炮类。名震苏北的通（南通）如（皋）线上的郭海波游击队，就是从民兵生长起来的。他们拥有火箭炮二门、轻机枪十四挺、汤姆式十五挺、卡宾式十六支……成为“美械化”了。山西霍县民兵已缴获山炮一门，新式

机枪十三挺。冀中永定河岸民兵也从蒋军手中夺得美式机枪二挺和步枪六十七支，在蒋军继续进攻面前，民兵们更广泛的继续坚决抵抗，从进犯者手中夺得更多武器，装备自己。

（1946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博山莱芜等地十万人民，自上月廿六日起进行连续七昼夜的大破袭战，将纵横数百里的章丘至莱芜、新泰、博山间所有蒋军后方补给运输线彻底破坏，使蒋军进攻鲁南北线的军事运输遭到极大困难。博山地方武装十日来迫使盘据西石据点蒋军撤走，将其所筑大小七十三座工事全部拆毁，并拆除桥梁一座。

（1947年2月26日《东北日报》）

东台各乡民兵联防队积极挺进边沿区，打击敌人，创一比九十三的光辉战例。两个月来（二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大小战斗五百二十八次，以牺牲六名的代价毙俘蒋军排长及土著蒋伪等五六二名（内生俘四五一名），缴长短枪四十余支，子弹千余发，抢救粮草二百七十余担，破坏公路七一五里，拆毁电线四百六十斤，摧毁碉堡廿座。

（1947年5月5日《东北日报》）

活跃于清（源）太（原）徐（沟）三角地区的人民武工队，在阎贼碉堡汽车路密如蛛网的“百里防线”内，奋战十个月，从坚持小块阵地发展为收复大块解放区，恢复四十二个民主村政权，牵制阎匪两个正规师（六十九师及工兵师）和四个保安大队。在四十一次战斗中，武工队共攻克据点十七处，歼敌五百十五名，俘敌四百五十名，缴获轻炮十门、机枪四挺、步枪二百十三支，救出肉票一百五十张，夺回粮食八万七千余斤。另在政治攻势中瓦解阎伪人员五百二十一名。现在该地局面已完全打开，武装农民团团围困退缩孤立据点的阎军，广大收复区内民主秩序井然，各村正发动土地改革和保田参战运动。

（194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

豫北修武、武陟、焦作等边缘区群众积极要求保秋，民兵自卫队又获得发展。修武边地群众根据过去的体验，认识了敌人抢秋的必然到来，纷纷要求发手榴弹地雷快枪等武器，准备保秋。该地一个月来仅民兵发展一百二十多名，×村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对我区干部说：“只要武装起来，敌人就抢不走咱的秋，保险能吃到嘴里。”不断遭受敌人抢劫的某村，经我宣传教育后，激起群众对敌仇恨，组织了两个爆炸组。武陟某村在打断了个别人和敌人联系，消除了对敌的幻想后，向邻近县借到步枪，亦组织起民兵，向敌展开斗争。二区领导上坚决支持群众的武装要求，各村先后恢复村指挥部，建立起民兵，组织联防，展开了爆炸运动。在修武因合理解决轮战民兵生产及参战勤务等问题，亦大大促进了民兵的发展。

（1948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三、努 力 生 产

在大反攻的浪潮中，翻身农民以无比热情投入秋收种麦，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昆

吾西木楼村在上月庆祝反攻的大会上，就提出：“前方比着杀蒋贼，后方比着搞生产！”在突击秋收种麦时，调剂出牲口犁地，自卫队做重活，儿童妇女帮助割庄稼，并把其他杂活担负起来。贫农木林善，今年六十五岁了，赶车担粪，下雨把衣服都淋透了，别人劝他，他说：“这不算啥，前方踏着泥水打仗，比这要苦多了。”五十三岁的军属老太太黄金枝，拉粪时领着三个妇女装车，卷着衣袖捉着铁锨，顶个壮年小伙子干，她是生产组长，每天不明就催着上垧。老庄稼手木九森，今年九十二岁了，也兴奋得了不得，他说：“我人老心不老，非和年青人比比不可，平时不干没啥，现在反攻了需要老少齐心干。”除了在家喂牲口做些零活外，每天出去割牲口草，能经常供三个牲口吃，别人看他弯着腰背还这样热情的干，都很受感动。

（194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太行各地为战胜灾荒，支援前线，西线各县普遍比去年扩大麦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占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权、榆社、武乡等十县共扩大麦田二十四万亩，较去年七十三万四千亩增加百分之三十三，长治、黎城、潞城不少区村的麦田扩大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潞城常庄村共种麦三千三百二十亩，占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超过去年一倍，左权松树坪比去年麦田扩大了十四倍，去年种麦七亩，今年在“听政府话吃不了亏”的口号下，种了一百亩。长治百头村也由去年三百五十亩扩大到一千亩。

（194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五区曹庄村，开会讨论早交反攻粮，民兵刘文顺说：“军队打胜仗咱们后方也要打胜仗，咱村地还没堡完，人组织起来推吧。”妇女张双连说：“现在地里还有活，你们男人上地吧，我们妇女组织起来推公粮。”全村廿盘碾子坏了五盘，木工段辛福等三人，提出自愿帮助修碾推反攻粮。王松其母亲五十一岁了：“咱们要把米里的石头和高粱要拣的一干二净，总要叫咱们军队吃好米，彻底消灭蒋介石。”现全村形成了白天黑夜赶推公粮的运动，六十三个妇女，一天推米一千九百一十四斤，还不误做饭。

（1947年11月3日《解放日报》）

线细布密寄慰南征军，故城妇女竞赛织军布。四区村干会上，东高才妇会主任孙大喜说：“织军布是妇女应尽的义务，我保证俺村纺的细，织的密，够尺寸，还得都能交上。”随向杨福屯提出挑战，杨福屯妇会干部除应战外，又说：“如俺村的布次于你村时，俺保证打着锣鼓送给你一面光荣旗。”

为了提前把布织好，卢家圈除组与组发起挑战外，妇干又具体分工，领导各小组，督促检查。万小麻妇会首先统计纺织人数，订立计划，首先纺好线的及织好布的分布到各组去领导大家。前孟町、师黄村把会纺的、会织布的分开，组成小组。吴梧茂村八十名妇女自动报名，自愿结合，组成二十个纺织小组。一百零五匹军布，迅速分配下去。前孟町小白奶奶，六十多岁，决心要在这次织军布中争模范。他说：“别看我年纪大，我还得把棉花拣干净。纺细线织密布，还保证四十天内织完两个布。”谨卢营刘张氏说：“上次织军布时正赶我有病，没织，想起来，觉得对不起八路军。这次我自己保证

织两匹，一定得按期交上。”

（1947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翻身妇女觉悟高，各地争献反攻鞋，仅卫河一区，三天内即献出一千三百双。

范县五区前三里营，开群众大会时，谈到献反攻鞋问题，王连义说：

“翻了身，有了房，男女老少换衣裳，我们的日子好过了，战士光脚在前方，我们做双鞋，实在是应当。”她说完大家哈哈笑了，全村共做四十双。筑先城妇女，五天内给华东野战部队做鞋一百五十六双。

（194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四、支援前线

战役 / 数目 / 项目	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民工	160万人	225万人	154万人
挑子		42,400副	
担架	13,800副	73,900副	20,000副
小车		410,900辆	20,000辆
大车	6,750辆	3,070辆	380,000辆
汽车		250辆	
牲畜	30,000头	6,300头	1,000,000头
船只		13,630条	
粮食	7,000万斤	57,000万斤	31,000万斤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支援前线统计表》，
徐元冬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

在数百万民工中，有从胶东跋涉二千余里而来的威海卫民工，有在九天中将一千万斤粮食碾好，并冒着风雪运送来的冀鲁豫军区第五分区民工，有拥有担架万余副和人员十万余的豫皖苏军区第一期民工，有新收复和刚解放的萧县、宿县等地的民工，有来自苏中军区海门、启东地区与江淮军区的民工，以及在此次战役中出力最大、总计不下一百万人的鲁中南军区民工队。他们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穿着各种不同的服装，说着各种不同的口音，但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协助解放军消灭蒋匪军，争取伟大的淮海战役彻底胜利。

“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这

些战斗口号，早成了广大支前民工的热烈行动。

12月下旬，北风括得更紧了，鹅毛般的雪片漫天飞舞，把坎坷的大地填平了，把污秽的泥沟掩没了。陇海南北，迷迷茫茫，大地象盖着一张银白的绒毡。可是，就在无边的白色平原上，一列列望不到头的小车队伍，在急速地前进。民工同志们正不顾风雪寒冷和道路泥泞，把大米运向淮海前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千万人民除了保证前线军需弹药粮草的供应外，还不顾一切艰苦，热情地转运与看护伤员。他们对伤员爱护备至，在接受任务以前，在担架上垫好软草，铺上自己的被子，并且练习轻脚快步，反复作实地试验，千方百计地设法减轻伤员痛苦。山东莒南民工们把节省下来的菜金、津贴费，以及从家里带来的零用钱，买了香烟和糖果，在休息时把烟点着送给伤员吸。

这些，使战士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加热爱人民。

前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部队迅速地向前推进，后方的供给线也很快的随着拉长了，有时物质供给比较困难。民工们经过贫困的新解放区，筹办不到大宗的粮食，有的一天只吃一餐，个别的甚至两天还吃不上一顿，但他们对自己车上所载的面粉油盐，不肯动用丝毫，悉数送达目的地。

（张震：《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役方针——回忆淮海战役》，《红旗飘飘》15集）

山东人民以惊人努力解决数十万野战大军粮食供应运输问题。成千成万的挑子、牲口、小车、大车，有的长途跋涉千里之遥，有的翻山越岭步步艰辛。通过此广大群众艰苦耐劳与支援前线的高度热情，基本上克服了地理条件限制及落后交通工具与近代化的大规模运动战之间的矛盾。具有庞大运输力的北海支队，每次能起运数十万斤粮食。每车载重由八九百斤增至一千二百斤，来回运送一趟亦由五天缩减至四天。储城支队小车平时载重一百五十斤，现在普遍装二百多斤。晚上行军速度亦自四十里增至六十里。大部运输队带有蓑衣、席子，以便遇雨保护粮食，并配备木匠，随时修车。布袋不够用时，民夫们就以自己被单、褥子装粮。孟良崮之战中，许多随军运输队冒敌机扫射威胁，日夜兼程送粮。诸城支队及胶南大队到前方丛山峻岭，小车无法上去，每人把一袋袋粮食扛上山。他们看到自己部队把运去的粮食代替地瓜皮放进锅里，才笑嘻嘻的回去。环海大队民夫说：“粮食要送到战士们嘴下才算送到。”当解放军战士吃得饱饱的勇猛作战之时，正好是孟良崮敌人饿得四肢乏力行将就歼之际。

（194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山东各地人民在解放济南战役中，全力支援前线。鲁中南区首批常备民工十万人参加支前，其中五万七千余人到前线服务，四万余人在后方担任运输。胶东区三十四县人民组成六万余人的强大支前队伍，组织有包括胶皮大车、小车、担架和挑子等的大队，能担负各种任务。渤海区参加支援前线的干部即有八百余人。海阳、牙前（新设县）等五县民兵，组成“胶东参战子弟兵团”，专负护送弹药、押送俘虏任务。在“早缴粮，送前方”口号下，沂中、沂东（均新设县）、蒙山、新泰等县一千余万斤公粮已全部缴

纳完毕。滨海区也完成六百二十余万斤的征缴。兰陵、苍山、赵镈（均新设县）等县妇女大批赶磨面粉，冒雨送往前方。章（丘）、历（城）县新区群众都赶早磨好面粉，劈好木柴，准备迎接解放军。该县接近前线的某村群众，事先偷偷做好担架，准备解放军攻城。到处可以听到妇女儿童欢乐的说着："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194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

冀鲁豫黄河南岸十五万翻身农民，参加陇海路破击战，计有八千副担架，两万挑工，五万破路队员及数万民兵向导。自卫队员，复仇队员，翻身农民们一面英勇支援解放军，一面在解放军掩护下，挥动铁锤、钢缨，积极破路，并叫着"砸断蒋介石狗腿，抽掉蒋介石脚筋"，情绪昂扬，迄十二日解放区军民已将徐州以西三百余里路轨桥梁全部翻身。

（1947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五、拥 军 优 属

阴八月初九日全区各基点召开民事主任会议，进行检查优军工作，首由各村民事主任将该村优军情况介绍后，区干部配合参加会议的民事主任，采用村与村互相检查办法，亲临军属家个别访问，全村齐集一处，座谈优待怎样，究竟应如何优待。经这样检查结果，全区军属达到耕一余二有十三户，耕一余一有五十七户，耕二余一有七十六户，耕三余二有八户，耕三余一有二百二十五户，耕四余一有三户，耕一不余者四十二户（系地主成份者）。

现各村干部向军属提出保证：

一、今后保证给军属收耕播种样样在先，而且还要深耕细作，多上肥；

二、军属土地荒芜减低收成，由代耕户补偿。

最后各村全部干部，具体分工负责，具体照管几家军属。大家决定中秋节给前方将士写信，报告其家庭翻身及优待情况，征求前方将士意见。

（194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本区各地群众，争相为南征军人家属及参战民兵民夫家属秋收秋种。浮山崔庄各种工作计划上，明确的规定："一切先尽军属和参战家属"。在种麦时前三天，就把军属、民兵、民夫一千一百多亩麦地全部种上了。高平泮沟村干部王金保说："误了自已的不能误了他们的，他们在前方流血流汗，是为了咱们，咱们也要为他们。"将参战民兵民夫的三十五亩麦地卧了羊，把粪上的饱饱的，并已种上。阳城吉德村在发现贫苦军属与参战人家属麦种困难时，立刻由合作社借出麦种三石二斗，把地种上了。屯留原村等村亦先给军属与随军南征的民兵民夫种麦，并且每亩要上粪六十担。沁源劳动英雄王三炉，特别优待军属工票一百分，以此先找人种麦。在收秋方面各地普遍采用了男女齐上地的大变工，黄一块收一块，所以不分军属参战人家属群众，黄了就收。垣曲一区上七村硖敌、大坂等村，早谷已收起，二区×堆村教员带领学生，抢先把参战家属二百多亩谷地收起了，从岳北一直到岳南，黄河边上，军属与参战人家属的地，都得到及时的

收割与耕种。

（194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牡丹江兴隆区各村春节热烈慰劳军属，大莫多河村在春节前即由农会和村干部进行调查军属家庭境况，并广泛向群众宣传。春节时优待军属三斤到五斤猪肉，初二请军属吃光荣饭，并由秧歌队向军属拜年。又铁岭区对军人家属亦特别照顾，在这次分配斗争果实中，群众一致通过，按军属等级加倍发给，“等外”军属亦按六等发给，最多每户分得一万二千六百元，全村四等（贫中农）以下军属共廿三户，八十九人共分九万零九百元，平均每人分得一千零二十二元，每户三千九百五十三元，因此军属的年，比一般群众过得更好。旧历廿八日十二时，工作团更召集五十个军属座谈会，征求军属意见、要求及调查年节中的困难。

（1947年2月4日《东北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制的指示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并告中央局分局：

来电悉。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根据晋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先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现中央正在草拟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在中央条例尚未发布前，你们可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将你们经验电告。

中　　央

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关于部队中党委的组织与领导的报告

部队各级党委组织，在前年平汉战役后（十一月），曾经通知各级，应按过去红四军第九次党大会时的精神和原则去建立，实行对军事政治工作一元化的领导，并曾经指定各纵委的委员名单。但大半年来，各纵委旅委都没有建立起党的领导，有什么事情，仍然采取由上级首长找下级首长来谈一下，就分头下去作的办法。团一级党的组织为总支部，去年春季亦宣布取消了，决定改为纵旅两级一样的一元化领导的党委。但由于一般团政委只熟悉政治委员的工作，而且照顾司令部，结果半年来团委亦没有真正建立起领导，而日常党务工作则仍由政治处的组织股掌握。所以自日寇投降到去年六月自卫战争开始这一阶段中，部队中党委的领导，除团一级还保持着些日常发展与教育党的工作外，象红四军九次大会时那样的对军事政治工作实行一元化的领导的有力的党委，一般都没有建立起来；部队很多重要措施，仍然不是经过党委形式的民主的讨论，然后实施，还是采取首先简要会谈的方法。这一阶段中，部队之党委的领导与工作是很弱的，甚至于有的是半停顿的状态。

自卫战争开始以后，军区进一步发现部队中问题很多，存在许多不是健康现象，感到有立即健全各级党委的领导与工作的必要；并一再督促各纵队认真建立各级党委的领导与工作，军区负责同志亦常在高级干部会中指出此点重要，此后各纵委与旅委的领导，才开始建立起来，部队中许多重要的措施，才开始采取党委形式民主讨论。团委组织与领导的建立，亦在十一月团委工作条例草案公布后开始整理。根据半年自卫战争中党委工作情形来看，各级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与工作开始建立后，党的领导作用加强了；部队中重要的军事政治措施，特别是思想问题，先经过党委形式民主讨论。使领导集团的干部能比较充分发表意见，然后推动下去执行，对于发挥全党积极性，统一全党认识与行动，有显著效果。过去那种军政矛盾的现象，也克服了。有时把党委的重要决议，决定或指示，适当公布一下，对整个军事政治工作的推动，都有好处（当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做），例如六纵委在大杨湖与上官村战斗后的工作重点指示，七纵委对于新兵工作，三纵委对于转变战局工作，二纵委对于反本位主义，物质归公的讨论等，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部队是处在频繁的行军作战的环境中，关于纵队的党委名单，目前仍然采取指定的办法，不容易实行民主的选举；团委则部分的准备开始利用战争空隙，实行民主的选举（团委条例中并曾规定团长政委，主任三人必须保证当选，团委书记一般由团政委兼）。各军区军分区除仍然统一于区党委的一元化的领导外，有的还有军政委员会与党务委员会的两种组织的，仅存军政委员会，而党务委员会就取消了。

军队中的民主运动

（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

新华社社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本特点及其胜利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在它的部队中有集中领导之下的民主。这种部队中的民主，是在具有严格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并不废除或削弱军队中所必需有的纪律，相反，它还巩固并加强纪律，它不过使这种纪律建立在人民利益和部队官兵群众共同利益与自觉的基础之上，而成为部队一切人员共同遵守的纪律而已。远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就曾这样指示："中国不但工农群众需要民权主义，军队需要更切。彻底的民权主义之施行于军队，将是破坏中国封建的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因为封建的雇佣军队中的士兵生活，简直不是人能忍受的"。在当时为毛泽东同志所亲自率领的工农红军中，就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并实行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废除繁缛礼节，经济彻底公开，伙食由士兵管理，士兵代表审查决算等。当时虽每日只有五分的伙食钱（米归地方供给），但生活仍过的不错，全体人员均能分得"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分得六七十文，以资零用。这些办法施行之后，士兵非常满意，尤其当时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又加入红军的新兵，感觉昨日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生活与今日在红军中的生活，是显然的两个世界。因此，同一士兵，昨日替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打仗，尚畏缩不前，今日替工农群众打仗，便勇敢加倍。这证明军队中的民主成为中国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之一。

在过去一年中，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实行了"三查""诉苦"等项新式整军运动以后，部队的民主生活又有了不少新的创造。在部队中把这种民主分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三个方面，其要点如下：

一、政治民主：在新式整军之前，许多部队已相当普遍地进行了民主的评功评过，接着又有评伤亡、评技术的创造。经过新式整军后，民主批评在部队中更进一步展开，主要地是评党员和评干部。

评党员包括公开党的支部，邀请非党战士对党员和支部提意见，参加审查和推荐新党员，参加审查候补党员的转党等等。

评干部包括采用民主方法检查领导，建议选拔干部，建议撤销不称职的干部，以及在战评会上民主的评功过，评纪律等等。

这种民主运动，实际上就是军队中一种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而且主要的是士兵对于长官、非党群众对于党员的批评，及干部和党员在群众中公开的自我批评。在这种批评过程中，批评的火力往往偏重于被批评者的缺点方面，因之，在民主运动的后

一阶段，即在批评之后，有的就着重评功，有的开了团结大会，使批评的结果达到了加强团结，巩固领导的目的。

二、在军事民主方面：是由立功运动中的民主评功过，进而评伤亡，与战场爱兵思想相关联，并进而评技术，由此发展为目前普遍实行的战评。另外还有战前的“想办法会”（有的叫“诸葛亮会”），以集中群众智慧，并激励士气，在战场上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有些部队并在战前接受任务后，即开会讨论如何完成任务的办法，在战斗进行中又吸收群众中正确的意见改正缺点。

此外，在战后实行评战的方法上，最近华东和华北有些部队，采用沙盘法，将战争实际情况在沙盘中布置出来，按照战斗进行中每人所采取的指挥、动作等，进行民主检查、评论，既可确定功过，又可研究经验教训。而这样做的本身，也就将练兵和战争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起来了。

三、在经济民主方面：主要地是反贪污浪费，伙食由战士参加管理，账目定期公布。连有经济委员会的组织，已建立士兵委员会者隶属士兵委员会，每排选一经济委员，另外每班选一经济代表（或叫经济员）。

据各地反映，部队在切实而正确地实行了上述三方面民主之后，均呈现出新气象，并且是对部队各种人员的最实际的教育。从经验中证明：部队民主运动，只要是在正确领导之下，为着改善与加强领导和纪律，而不是为着破坏领导和纪律，就能收到很大的成效。这里仍分三个方面来说。

一、在实行了政治民主之后，部队就获得了以下的进步。

在经过了评党员以后，党的威信提高了，许多人要求入党，均以作一个共产党员为光荣。东北某连在评党会上，即有二十三个非党人员要求入党，并有预先自动缴纳党费者。各部队有很多自动写入党请求书者，并提出在战场上考验自己，要求如果在战场上牺牲了，也希望党追认其为共产党员。解放战士初到我们部队时，对我党常有错误认识，经过评党之后，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与在国民党军队时的情况对照之下，认识到共产党真是光明正大，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有曾参加过国民党者，因受感动，便坦白了，并声明退出国民党。华北某部一个解放战士反省说，我初来时，认为党员是监督我们的，现在明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有的说，因为在国民党那边受过国民党员的害，到这边后，看见也有党员，就整天心里害怕，现在知道共产党对党员比对群众严多啦！某团解放战士安国材，见到公布党员名单，称赞说：“共产党真伟大呀，那边（指国民党）党员只是到了戏院才公布——党员半票。”某团解放战士刘中说：“参加部队一年多啦，还不是党员，以后要好好干，争取参加共产党。”有些党员顾虑支部公开后，工作不好做，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因为评党工作做得好的，不惟教育了党员，而且也教育了群众，群众是更加信任党了。国民党在部队中，在社会上，保持组织的秘密，对群众采取秘密监视的特务办法，我们共产党决不应该也完全不需要采用这种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是严重地脱离群众的，是引起群众的怀疑和畏惧的。有些人想学习国民党这种恶劣作风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在经过了评干部以后，战士们一般的反映说：“干部进步了，咱也得进步。”

"意见提出来了，心里也就安了，干工作也有劲。”有些干部最初顾虑，让战士评干部，恐将丧失自己的威信。事实证明，只要干部主动地领导这种批评，虚心听取群众的正确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认真改进自己的工作和领导作风，威信会更加提高，战士对干部也更加爱戴。华东某部民主检查领导后，战士看到干部和大家一起劳动，就说："其实用不着你们参加，只要你们多出主意，好好帮助教育我们就行了”。有些干部顾虑这样兵不好带。但是只要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之下，不是无领导无秩序的极端民主，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西北解放军某部评干会上，战士代表说："不要以为今后干部不好当，不敢大胆领导我们，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问题解决了，还是应当公事公办。”华北某部在临汾战役中开展了民主运动之后，干部普遍反映说："也怪，过去打仗常有毛病，这次的仗打得更残酷，都自动完成任务。部队更好带了。”

政治民主在部队实施后，不论干部、战士及解放战士，都认为对他们的教育作用很大，责任心、积极性都大为提高。中原某部在民主运动的后期，不少的营连干部说："真危险！以前不知犯了多少错误！”旅团干部说："我们官僚主义真害死人，多少严重现象都不知道呢！”西北某部指导员郑锡纯，经过战士民主评论后，在攻运城时说："上次没有完成任务，我应负责，这次我要在前面和战士一起，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由排长撤职当战士的邢泽如，也订出自己改正错误的计划。由班长撤职当战士的杨继辉说："要坚决完成任务献给毛主席，如果巷战，我保证第一个上房。”类此的例子很多。战士经过正确的民主运动后，一般是表现更迫切要求进步，更服从命令，更勇敢作战，更自觉的遵守纪律，原因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干部缺点改正了，纪律也成为他们自己的纪律。

解放战士经过民主运动后，进步更加显著。他们感觉部队实行民主，是他们过去所从没有见过的事。华北某部解放战士说："国民党怕民主，兵见了官，一不对头，就是棒子，军法从事。提意见？评干部？那是做梦！这回评干部，评党员，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见过。”他们根据自己切身经验对比的结果，更增加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仇恨。西北部队的解放战士，有的将国民党的帽子、帽花、美制的用品、暗藏的臂章等，当众撕毁。他们要求不要把他们当俘虏看待，也不要叫他们解放战士。有的自动揭露了许多隐藏的国民党军官、奸细、异己分子、违犯纪律的分子。民主运动的实行，使他们对人民解放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华北某部解放战士焦文道反省说："我初来就听说要打石门，心里想，这不是明碰钉子？不几天，听说石门打下了，心里还想，石门工事强，兵也不少，怎么就解放得这样快呢？前些日子想通了，八路军最好的武器就是部队民主，官兵一致，大伙出主意打仗，为什么不胜利呢？”他们已经体验到，"在国民党那边，当两年兵也当不了班长，这里只要好好干，大家就会选上你。”在若干部队中，解放战士经过民主运动后，已不再从俘虏兵或新兵与老兵的区别上去看问题，而从阶级观点去看问题了。

二、在实行军事民主之后，部队的进步也有很多范例，远如西北的蟠龙战斗，某一部队进攻一个据点，连攻两日不下，后因采纳了下级干部和战士的建议，改变方式攻击，结果一鼓攻克该据点。又如石门战斗中，云盘山阵地的攻占，也因发扬军事民主，从攻

击开始到占领，仅只十分钟，伤亡十余人，造成攻坚战的范例。近如华东潍县攻坚战斗中，七十三团五连攻东城时，采纳了二班意见，而迅速完成了爆破城墙的任务。

军事民主的实行，不但在作战上，练兵上，好处很多，对干部的教育作用也很大。例如中原某部连长许盛堂，过去作战时，只知要战士冲，却从不考虑要怎样冲。最近在民主检查指挥和领导时，开始，他对战士的批评不能接受，很苦恼，后来他将战士给他提的“改进战斗指挥的十四条意见”反复考虑，又经过许昌战斗的实际体验，他才懂得每个战士都有他一定的才能，开始转变他的指挥方法。以后攻克洛阳的战斗，他这一连担任突击第一连的任务。战士们更加积极同他商量意见，全连同心努力，胜利地完成了突破洛阳的艰巨任务。这使他体验到，实行军事民主，战士更好指挥。又如华北部队某团长，开始对群众不相信，经过临汾战斗，实际体验到军事民主对他有帮助，于是他自己也成为军事民主的积极拥护者。

三、在经济民主实行以后，由于伙食的改善，贪污浪费的消除，缴获归公及胜利品的合理分配，战士的情绪立即起了新的变化。例如华东某连，有时饭煮的不够吃，但战士们也没有意见，不要再作二次饭。某部缴获的胜利品，能按功劳与需要，发扬阶级友爱，对新战士和新解放战士多加照顾。战士们满意地说：“象这样就没有意见了，犯纪律干啥呢?”因此，经济民主的开展，也帮助了部队纪律的保持。

可是，民主必须是有组织和有领导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极端民主化，是错误的。在部队中进行民主运动和建立民主生活，更必须是有组织，有秩序，有领导地去进行。部队中的民主，是为了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并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为改善与加强领导和部队中的纪律，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是要削弱部队长官指挥作战，管理部队，解决问题的正当的权力。有些部队开始没有弄清这一点，因而在某些部队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些极端民主化的偏向，及放弃领导的尾巴主义偏向，因而就不能获得民主运动所应有的效果，并松懈了部队的团结。但是，这些偏向在上级指示之下都很快的得到了纠正，没有让其发展。各部队在进行民主运动建立部队民主生活时，必须防止和随时纠正这些偏向。但不可因噎废食。不可因为可能发生这些偏向，便不敢放手领导群众，实行必要的在一定范围内有益无害的民主，要认识部队民主的伟大成绩，敢于实行民主，以便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善领导，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达到部队的更加团结和战力的更加提高。这就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更加负责的一种表现。

东总政治部关于辽东三纵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向军委总政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军委总政：

自政治工作条令决定部队诉苦运动，提高到土地政策学习，在部队中已造成一个轰轰烈烈的普遍运动，有了热烈的争论，及时的总结经验介绍，其他并组织工作队，实际参加土地改革。无地方工作队的地方部队，均在执行此工作，这是我军群运工作的新发展，并获得很大的成绩目前号召部队驻那村，即将那村群众发动起来。对此工作有如下经验：

（一）打通模糊思想，认清土地政策，铲除地主富农的丑恶思想，树立坚定明确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思想，增强保卫土地，保卫人民利益而战的决心。目前在普遍开展阶级教育，土改学习的思想斗争，是异常激烈的。部队中的地主、富农成分的思想，极度波动，表现恐慌不安。地主成分的，则感到无前途，悲观、恐慌、落后甚而走向逃走。原九师一个司务长地主成分，在土地政策学习中，吃大烟自杀！另一个排长逃走，走了两天又返回。富农成分的则感异常关心何时是否分到自己的家属。所以在这个学习中，领导上须慎重的掌握与稳定地主富农成分的思想情绪，使其坏思想彻底消除。

（二）检查糊涂观念，进行坦白，追查阶级，查思想（忘本思想，地主富农思想，狗腿子思想，奴隶思想），查立场，审查与研究成分。我军来东北后，成分相当复杂，穷的富的，工人、农民、学生、地主都有，甚至特务分子，也继之混入部队中来。因此，查思想、查成分是极其重要的。如八师杨副师长的警卫员是特务，数次要害杨未敢，非有这次查思想查成分，他自己不会坦白说出来的。

（三）普遍的开展诉苦运动，增加阶级仇恨心。其方法是：

（1）干部带头诉苦，起模范做典型，启发别人及战士诉苦，作用甚大。如八师的各级干部参加听炮兵营长诉苦时，给下面印象很大，启发了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胸感动的气死了，气死复活，现成傻子。

（2）开展一条心运动，进行挖苦根，吐苦水，未诉苦的连队，要求掀起诉苦。

（3）发挥报纸作用，推动诉苦，启发诉苦，交流经验，八师除将党报（纵队、师、及辽东日报）作为随时教材外，并联系到各团的生活情形，来推动诉苦。目前从诉苦转到练兵进行磨刀杀敌，部队情绪高涨。因之近日来逃亡渐少，进到逃亡的想到自己的苦，又自动归队。

（4）部队诉苦与地方农民诉苦结合起来，通过参加农民诉苦翻身，启发部队诉苦报仇，立功。

（四）组织工作队，实际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搜集经验再教育部队，这是活的教材；如七师二十团的模范党员任继贞在土地改革学习中，亲带工作班参加土地改革，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将西丰县万和村，中原村农民完全发动起来，并彻底帮助农民分地和生产。其重要几个步骤是这样进行的：

（一）进行穷人调查，物色骨干，确定穷人作为骨干，了解农民对分地的态度与各家地主之择定，调查与打破农民的顾虑。

（二）对骨干（穷人）进行教育打通分地思想下的顾虑首先解决糊涂观念中的地权购买提醒穷人为甚么穷，富人为甚么富，然后以自己痛苦，向大家诉苦，启发骨干分地思想，阶级仇恨。

（三）准备分地的工作。通过骨干，组织力量，再以典型的诉苦启发群众的复仇思想，即时组织领导核心，成立农会，找出带头人，再经农会确定分地对象和分地办法。

（四）翻身运动。通过清算斗争，进行报仇，申冤后，开始分果实，先分柴草，容易提高斗争情绪，后分地及房屋，分果实按房、人、最苦、较苦四等，合理平分。将地主封建势力摧毁后，再按地主罪恶轻重，照顾地主生活。

（五）与地主平绝后路，穷人齐心保地保果实，开齐心会，杀鸡盟誓进行分地的教育，反对两边倒的分子，改造二流子，动员支援前线。讲两种军队的性质，密切军民关系，随时发动农民参加保卫已得的果实（现在这些村子已造成参军热潮）。改组村政权，改组农会，组织妇女儿童团等。

东总政治部

东总政治部关于辽东三纵学习土地政策经验(诉苦)介绍之二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过去我们诉苦运动，收到不少的成绩。今后还应继续开展。在内容上过去是多方面的，范围很广。在目前深入阶段，以下几点，希各部注意：

（一）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如苦是由于被民族压迫及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进一步引导到土地政策的学习。

（二）发动干部诉苦。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因为全军干部大多数皆工农成分。而且已证明干部诉苦，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大更能影响群众。

（三）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

（四）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现已有个别控诉自己家庭的黑暗，压迫贫苦人民的罪恶者。这是进步表现，应受表扬，不应歧视。

（五）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为使中央充分明了情况起见，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兹规定：

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做的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向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

中共中央宣传部
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

毛主席最近指示全党干部研究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二章。他说："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存在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我们当前的大革命，极端重要。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已在拥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并在某种程度上联成一片的地区当政；没有疑问，随着革命的继续胜利，我们党行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但是，要保持已得的胜利并继续胜利，和达到全国规模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便具有头等的决定的意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在本书第二章指出："如果我们布尔塞维克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全体工人阶级群众最充分的和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塞维克党，莫说两年半，便是两月半，也不能维持政权。"我们中国的革命在这样一点上也是同样的：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

列宁在本书中所说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的历史区别，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推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在学习列宁这一段著作的时候，应该分别列宁当时所处的情况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但我们必须知道：人类历史上任何真正的人民革命，那个领导革命的政党都必须保持极严格的纪律，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保障人民大众最后战胜原来的压迫阶级或国外的敌人，这种道理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作长期的奋不顾身的斗争的。国际帝国主义经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直接的与间接的、公开的与隐蔽的、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方法，奴役中国已有百年之久，帝国主义是不愿意中国有民族的独立的。日本帝国主义刚被赶走，但美帝国主义就接着进来实行新的奴役了，而且美帝国主义还在扶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准备让它重新进入中国。这是一方面，另方面，中国有长远历史基础的封建势力与近代新起的官僚资本，它们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卖国的本领是一代赛过一代，它们用了一切最血腥的手段压迫中国人民的革命，而在它们的势力已被

推倒的地方，它们仍然千方百计地希望卷土重来，企图利用农村与小生产者的分散与孤立这一个弱点，而重新恢复专制封建主义。所以，把列宁的话放在我们这里来说，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必要的，如果不经过长期的、顽强的、你死我活的战争，要战胜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是不可能的，这一战争要求坚忍、纪律、坚定、不屈不挠和意志底统一。

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与组织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的决议案与1937年“反对自由主义”的提纲，便是毛泽东同志为这种原则而写作的。毛泽东同志在有名的整风报告中，关于党风问题，首先严厉地斥责了党内的闹独立性。为要求党内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和集中领导，1941年党中央还特别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党中央又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党七次大会又通过了新修改的党章以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党同志必须明了，如果我们党不能实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原则，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那末，我们就不能实现对于全国革命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能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动摇，就不能战胜敌人的各种反抗，就不能把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中国团结成为统一的国家。过去由于长期游击战争与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的环境，在各个单位中，又有着不同的敌情、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因此，我们就不能不高度地发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的发展各个独立单位的地方自治权，因而也就高度地发扬了各个单位的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了当时极为复杂的困难，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全国规模的胜利。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方针。但是，正由于这样，也就在我们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种分散主义或地方主义的习惯，造成了党内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则是错误的与有害的。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大地改变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我全党全军在一切政治上、军事上与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而行政制度与行政机构也要求逐渐实行必要的与可能的统一，要适当地缩小各个地方的及各个兵团的自治权，要将全国一切可能统一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而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部分，则须统一于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中央局及前线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和着手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新建设。因此，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权的方针，现在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了；而那些在过去就是错误的在许多同志中存在的地方主义与工作中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就特别表现其对于当前统一斗争的重大危害性，就更加不能容许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事实证明：党内过去存在或现在还没有克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各自为政和各行其是的地方主义与经验主义，已经给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严重损失。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大都是对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细心研究，不认真执行，对于带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粗率地、不细心地擅自处理，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以至在某些行动中和宣传中直接违反党中央和上级的决定，造成错误，而且不能迅速纠正。这种缺乏党性没有纪律的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不能容许的。至于那些有意向党闹独立性的人，故意歪曲中央的指示，改变中央政策的性质，以便在工作中去发挥其个人的或少数人的欲望，其更不能容许，自不待说了。现在重印列宁这一章著作，同志们——特别是一切负责的同志们，必须认真阅读，并参

看前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为消灭现在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必要的与适当的斗争。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展开这样一个斗争，使全党全军达到真正的统一，乃是完全必要的。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纪律，“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底觉悟及其对于革命的忠心，靠它的坚忍、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同无产阶级的群众，同时也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联系，接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现的政治领导底正确，它的政治的战略与策略底正确，而且要使最广大的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信服这种正确。”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历二十七年的革命烈火的锻炼，与世界历史上稀有的复杂而丰富的革命经验，并由许多工作所证明：它是充分具备了这样的三个条件的。毫无疑问：我们全党干部一定能够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迅速地克服现在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或经验主义，而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以便迎接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以便在新民主主义的鲜明旗帜下，团结一切民主阶层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战胜反动力量，统一全中国。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

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特规定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如下，望各级党委并召集宣传部门的同志予以讨论和执行。

（一）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

（二）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

（三）凡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的问题的言论，例如对解放区人民提出政策性的口号，对解放区土地政策、整党政策、城市政策、政权政策提出主张，对于涉及外交事项的声明，对于号召敌军或敌区人民的传单布告等等，凡其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否则，不得发表。其内容虽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但其性质特别重要者，亦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其属于地方性局部性的言论，在由县委、市委起直至中央局分局止的各级党委之间，亦应执行上述同样的原则，即凡新的和特别重要的宣传，均应向上级党委请示。各级党委各负责人在上级政策指示范围内的言论，虽不必次次向上级请示，亦应尽可能取得同级其他负责人的同意，以求统一宣传，集体负责。

（四）凡各地新华社稿件，交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者，新华总社（现已与中央会合由中央直接指导），有斟酌情况予以必要的增删或修改之权。因此，凡要求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不得先在地方发表。

（五）凡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在出版前，应分别种类送交党的有关部门审查。例如普通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宣传部审查；重要的政治性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或上级党委审查；凡关于全国性、全党性问题的著作，其内容不同于中央已经公布的主张，或虽无不同于中央主张之处，而其性质特别重要者，均应送由中央审查或取得中央同意出版。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作，未经中央同意，各

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前将该著作目录，报告中央批准。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校阅或修改。

（六）各级党校和高级干部学校（如大学）中的政治性教材，应由其所属党委审查。

（七）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除每两个月应向中央宣传部作一次政策性的报告外，并应从本年七月分起，每半年作一次系统的情况报告，报告中应简述：

（1）党的与非党的报纸种类、发行数、编辑、记者、通讯员的数目。

（2）党的与非党的书籍杂志出版发行状况，书店工作状况与经济状况。

（3）党的与非党的学校数目与状况，教员与学生的约数。

（4）广播播送与收听情况。如广播电台和收音机的数目、分布与作用等。

（5）文艺活动情况与城乡群众中的宣传情况，如戏剧、墙报、夜校等活动的动向。

（6）主要宣传干部姓名和情况。

这些材料华北、山东、晋绥，用陆上交通送来，其他解放区经新华社台发来。

（八）除报纸和报纸合订本继续送中央外，各地出版的书籍、杂志、教材和重要的传单布告，均应经常送中央宣传部两分。

中共中央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

兹将徐周八月五日关于华北第一兵团在晋中战役后的部队情况及整训计划摘要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一切野战兵团及一切后方军区均有这样内容充实、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自中央发动党内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反对将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和所指挥的军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的危险倾向以来，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兵团首长（各后方军区则从未作过综合报告）对于过去自己所犯的或多或少的上述错误倾向，一般的说来，是有所警觉（虽然并未明确承认），开始遵守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但是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你们一切有价值的足为各兵团、各军区取法的电报，我们均将转发各兵团、各军区。你们收到这些转发的电报后，就可以评判那些兵团或军区的报告是作得好的，是认真的，是有意让中央军委明了全部重要情况的；那些兵团或军区则是没有报告或报告不完备，或报告内容无甚价值的，是敷衍塞责的，是无意让中央军委明了全部重要情况的。陈毅同志提出军队领导干部应当警戒铁托危险一事，我们认为在中国环境之下完全有此必要。各兵团及各军区在执行中央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中，必须联系欧洲情报局及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一起研究和检讨。中央不怀疑现在中共党内有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具有铁托倾向或张国焘倾向，但是决不能放松将这当作一种可能的危险倾向来加以注意和预先警戒。我们责成你们在今年秋冬两季将你们如何在野战兵团中及后方军区机关部队中执行中央关于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倾向，反对将自己所指挥的军队及后方机关部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的危险倾向，将在军队党内展开的讨论和斗争及其结果作出总结电告中央及军委。同样责成各中央局及分局将反对上述同一倾向在党内进行的讨论和斗争，作出总结电告我们。你们是否同意上述指示及如何执行这一指示，望电复。

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八年九月会议通过）

为适应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目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起见，关于各项工作中何者决定权属于中央，何者必须事前请示中央，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付诸实行，何者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特作如下之规定：

（子）总的方面：

（一）决定并公布（在党内或党外）党的总路线与总的政策方针，及在党的总路线与总的政策方针下决定并公布（在党内或党外）全国性的各种具体政策和方针。例如：军队建设、作战及其与外界关系的各项军事政策；减租减息或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解放区的经济政策与工运政策；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政权的建设政策；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教育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严禁多捕滥捕、乱打乱杀及肉刑逼供的司法政策；宽待释放与争取改造俘虏官兵的处俘政策；对国民党政府机关、经济机关、官办企业的处理方针；对国民党统治区学校与文化机关的处理方针；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党派和特务机关之处理方针等。

（二）决定并公布（在党内或党外）全国各解放区（老区或新区）党政军及民运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国民党统治区党与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工作及国际活动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三）各解放区党政军的组织系统的建立事项。

（四）在党政军中有关统一施行的各种重要条例法规的决定，例如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各级政府的组织法规、劳动法规、刑事民事法规、土地法规、征税法规、婚姻条例、政治工作条例、军队的等级制度、士兵委员会条例、党委会工作条例等。

（五）涉及两区或两区以上的事项。

（六）各解放区全年的工作任务、方针和计划，及各项重要工作的单独计划。

（七）召开全区全军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重要的干部会议，及全区人民代表大会所应取的方针。

（八）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的重要设施和全盘工作计划。

以上一至五项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但各地得向中央提出建议。六至八项的决定权仍归地方，但必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批准后，才能公布和执行。

本条各项规定，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各方面工作，一般都是适用的。下面再就各方面的特殊问题，分别规定。

（丑）关于政治方面的：

（一）对于时局及对于全国性问题公布党的态度方针的发言和文告。

（二）我党与全国性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合作，及向他们提出有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的意见及其他交涉事项。

（三）全国性的战争罪犯及反革命罪犯的处理。

（四）对外国的外交通商关系的建立，关于外侨、外商与外人经营的学校、教堂、医院、慈善和救济机关及其他涉外事项的处理方针（具体执行可委托地方办理，但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和外事工作人员之派遣。

（五）国际活动事项的处理及其人员的派遣。

（六）省级以上的人民代表会议及政府组成中我党与他党及非党候选名单的配备。

（七）对具有犯罪行为的少数民族首领、社会名流、大中工商业家及省级以上民主政府中的党外人士的处理。

（八）对国民党省市（中央直属市，下同）政府、省市党部及其他反动党派的省市级以上主要负责人之处理。对国民党军统站长以上，中统省市室主任以上的重要特务分子及重大特务案件的处理。

以上一至五项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但各地得提出建议。六至八项的决定权，仍归地方，但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得到中央批准后，各地始得执行。

（寅）关于军事方面的：

（一）战略方针及战略计划。

（二）野战军或兵团的作战计划。

（三）军区及野战军或兵团的整训计划。

（四）师以上军队的编组，野战军和兵团的组成及一二级军区的划分。

（五）军制的建立，军事教育方针的决定。

（六）地方动员、扩兵、补俘的计划，及后备兵制度的建立。

（七）机要通信制度的统一规定，特种情报机构的建立及调度。

（八）后勤系统的建立，兵工生产计划的确定，重要兵工原料及技术人员的调剂，弹药基数的规定，军械收集和保管制度的确立，各种重要军工器材和弹药的统一分配，整个供给计划的审核、批准和调剂，运输兵站线的建设及各大军区之间的配合、调节和指挥。

（九）一、二级军区的工作计划。

（十）扩兵数目、及后备兵补充计划的批准。

（十一）师（旅）及师（旅）级以上干部的任免。

（十二）作战中对我技术上不能修复的重要桥梁及其交通设备的破坏，重要矿山、工厂的破坏，及重要大工厂的迁移。

（十三）部队在新区作战中筹粮筹款的原则及办法，部队攻占大中城市后军事管制时期的各种设施。

（十四）处俘工作中对敌军将级军官、敌方专员以上官员及其他特殊人物的处理与释放。

（十五）我军归俘的审查、训练及处理。

（十六）全般的与特殊的政治工作计划。

以上一至八项，决定权属于中央军委，但各地，各军区、或野战军得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九至十六项，由各军区或野战军提出建议，请示中央军委批准执行。

（卯）关于经济方面：

（一）全国各解放区通用的经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的制定。

（二）各大解放区之间的财政调剂，货币贸易关系的调整，纸币的发行，白银、白洋等硬币的用途和分配。

（三）对外贸易（包括对外国和对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方针及统一管理。

（四）全国性工矿企业的兴办。

（五）全区脱离生产人员的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例，全年财政预算及供给标准的提高或降低。

（六）货币发行计划（包括发行数量，用途分配和准备情形）。

（七）税收政策，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盐税（包括食盐管理办法）及进出口税的征收条例，对其他解放区货物来往的限制和管理办法。

（八）工资政策，公营企业的、民营企业的和合作社的工资制度和标准，乡村工资制度和标准。

（九）区内铁路及重要工矿的恢复及建设计划，重要公路及河道的修筑疏浚的计划。

以上，一至四项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但各地仍得提出建议。五至九项，由各地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后，决定执行，或由中央征询各地意见后做出决定。

（辰）关于文教宣传方面的：

（一）在党内或党外发表带有全党性质的文章、讲演和谈话。

（二）对民主党派的全国性的报纸杂志之处理。

（三）对国民党和其他反动党派的全国性的报纸、杂志、广播台及其他一切全国性的文化机关事业之处理。

（四）全区文教事业出版计划，对专科以上学校以及著名的文化学术机关和历史文物之处理。

（五）编印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即使是曾经发表过的）及有关党史与红军历史的书籍。

（六）各区直属的党校、大学的教育方针和计划。

（七）各区办理党报的方针和计划。

（八）各区办理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和计划。

（九）关于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事业的管理方针。

以上，除第一项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外；其余各项，由各地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后，决定执行。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至于在对外及对内的宣传中，将任何党员个人与党及党的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造成个人高出于党及党的中央的影响，则更是不允许的。

（巳）关于党务方面的：

（一）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的组成，与委员的任免，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

（二）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地委书记、行署正副主任及其以上的干部之任免和涉及党籍的处分。

（三）区党委或省委委员以上干部，对有关政策和策略性质的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以及对于这些不同意见和争论的处理（地委级以下干部之重要不同意见包括在内）。

（四）整顿地方党组织所采取的一般方针和办法。

（五）有关建党原则制度机构等问题，凡党章上没有原则规定者，或虽有原则规定，但因情况特殊，必须变通办理者。

（六）全区的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运动的方针和计划。

（七）建立青年团的工作计划和步骤。

以上二至七项，必须事先向中央请示，经中央批准后，始得决定执行。

（午）以上各条中，凡属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指示者，各地必须严格遵守，正确执行。在执行中遇有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不同意见时，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修改。中央尚未作出决定指示者，各地有权向中央建议，并得根据本区情况和经验，向中央提出处理的方案，拟出决议或条例的草案，请求中央决定公布，或由中央批准，用地方名义发表。除以上各条所规定应由中央决定及须经过中央批准后方能实行之各事项外，其他各事项，各中央局、分局及军委分会、前委会有自己决定实行之权。如将来在工作中发现其中仍有若干事项须经中央决定或批准者，中央以后再行决定，通告执行。各级党委对中央发布之决定、指示及条例等，得定出在本地执行的具体计划及实施细则等，这些具体计划和实施细则，以及各地决定举办之事项，重要者应将全文或其中要点报告中央备审。

（未）上述各条所列举之各种事项，其已在执行中者，除业已呈报中央者外，一律

须将决议指示或条例命令等，补行呈报中央备审。

（申）除中央业已规定由各中央局分局书记及军区、野战军军首长，每两月分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及军委和其他部委所规定之各种报告制度外，子、丑、寅、卯、辰、巳各条所列各种事项的实施情况，结果及经验，亦必须随时报告中央。关于各地重要工业生产和消耗的情形，应有月终报告。农业生产及消费的情形，应有一年一度或二度的报告。各部委及各大解放区的政府党组书记，人民团体党组书记对工作的专门报告，除别有规定者，照原规定实行外，半年亦不得少于一次。至于解放区内五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各种较重要的设施；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团级干部配备；省（区党委及中央局直辖市）级和大军区级的报纸；党内刊物及有关政策性原则性的决议、指示、命令、条例和重要的党内刊物、宣传品文章和答问等，均应在事后以书面或材料的形式送达中央阅看。地委以下的材料，亦应有系统地有连续性地选摘若干典型材料，一并送来。下级向各中央局分局及军委分会前委会所做的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重要者亦应电报中央（文长者可摘要），以便中央能及时研究这些材料。

此外，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现已实行向中央随时报告请示者，仍照过去一样不变动。但有若干纯粹技术性的不重要的事项可酌量减少，以便更能集中精力于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

（酉）以上各条规定，在巩固区是完全可以执行而必须严格遵守的；遇有特种原因或一时困难，可申明理由，经中央批准后可暂时变通某几项规定，或减免推迟某几种报告。至于在战区，尚未巩固的地区以及在军事行动中，客观上确有困难，或遇有紧急情况，不得不权宜处理者，可变通办理，但事后必须请求中央追认；某些问题中央已有原则决定者，可照中央决定的原则办理，事后呈报中央备审；但如中央对该问题尚无原则决定，而又非迫不及待必须立即解决者，仍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得中央批准后，始得执行，总之，应在客观许可的范围内，力求贯彻上述各条的规定。

（戌）上述各条规定之各种请示报告事项以及需送中央备审之文件材料等，时间紧迫者，由电报拍来，机密性者用内台（文长者可摘告要点和疑难之点），一般可用新华社电台，字数在五六千以上，时间性不很紧迫者，关内各地应尽量用书面送达，为此各地与中央的交通应力求改进，而保证这一制度之顺畅施行。凡用书面送达请求中央批准或答复处理之文件及报告，必须具备正规手续，并送交中央秘书长亲收，以便处理，而不要混在其他一般材料内。

（亥）如何写报告？如何请示？除两月一次的综合性报告，遵照中央及军委子虞电继续执行外，还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无论是各种工作报告，或专门问题的报告，在写法上，均须遵照子虞电所指示的要点，即着重于说明政策之执行及经验之总结，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叙述过程；要能说明工作动态，发现工作中所产生的问题和倾向，及其症结之所在与解决之方法；报告中述及的具体材料，必须是经过证实及分析整理者，而不是把下面繁琐冗长的原料，甚至不确实的数字，简单地加在一起；写报告的态度，必须是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切忌敷衍塞责，使报告流为形式；报告的文字，务求简明扼要，

切忌长篇大论而又不能说明问题。各项工作的报告，各种专门问题的报告，必须是各部委员的负责人亲自起草，并经书记审阅。

（二）提出问题、拟议或决定、计划、条例等草案，向中央请示时，必须说明情况，及发布这种文件的目的（如果有争论或疑难之点尤须说明），以供中央考虑时之依据。关于干部配备，提请中央批准或呈报备审时，必须将该员简历包括年龄、籍贯、性别、家庭出身、工作简历、本人成份，简明扼要的鉴定等项一并报告。过去已经呈报者，不必再报。

最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应根据上述的精神和原则，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和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以便在全党全军克服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团结全国人民，迅速驱逐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日子起，就是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因此，他就能够在自己的二十七年的历史中，不断的克服党内的非马列主义的错误和偏向，率领人民群众向国内外敌人作斗争，渡过许多的困难，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我们党内，由于战争环境，或处在地下状况，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是没有获得很好地发展的。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的党章，规定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后，这种情形，仍然没有改变。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和在政府工作中的民主生活的不足，已使我们党的组织及政府机关产生了某些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另一方面，在展开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后，又常常发生极端民主现象或无政府现象。所有这些情形，就使党内某些错误的主张和不正派的宗派主义的作风和无纪律状态，得以暗中流传和滋长，因而给予党和人民的事业以许多的损失。在过去的时期内，在各个被敌人分割的解放区，处于严重的战争环境，党和政府中的正规的民主生活，不能不有所限制。现在这种形势已有很大的改变，广大的解放区业已联成一片，取得相对安定的后方环境，进行生产建设工作，土地改革已在很大区域内完成，人民解放军不断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前进，并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的党已经发展成为三百多万党员的广大群众性的大党，全国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日益积极地和广大地要求参加民主的政治生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与政府就有可能和必要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了，过去时期党内存在着的民主生活不足的状况，就必须加以改变。关于建立解放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扩大各级人民民主政府的正常的民主生活问题，最近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业已通过许多的法令、条例，望各解放区仿照执行。关于扩大与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中央特作如下的决议：

（一）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或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以后不得用普通的干部会议去代替，而必须按期召开。

各中央局或分局所领导的地区，应召开全区的党的代表会议。某些地区的中央局或分局，如经中央批准改为党委会时，则还应召开全区的党代表大会。

这些党的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职权，适用党章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

在人民解放军方面，根据军区和野战军的不同情况，应当有所分别。各级军区直属的党的组织，除派遣代表参加当地地方同级的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外，还应召开自己直属的机关学校和部队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野战军，因为处在激烈的作战环境，行军迅速频繁，不宜一般的规定召开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只应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之下，经过上级批准，有限制地召开这些会议。

（二）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付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必须保障一切代表在会议上有完全的发言权（即不但有权赞成，而且有权反对与批评党委会及大多数代表所赞成的意见）和完全的表决权（即在投票或举手表决时，不但有权赞成而且有权反对大多数代表所赞成的议案），以便能够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干部与群众。但是，在同时，必须严格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规定，以保持党内的统一和纪律。必须完全实行列宁这一著名的规定：在问题尚未决定以前，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进行辩论；但在问题一经多数决定和上级批准以后，即须完全服从，坚决执行，不得反对。对于不遵守党章，破坏纪律，破坏党内正当秩序的分子，必须给以处罚。在扩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中，必须注意及时纠正可能产生的极端民主现象或无秩序、无纪律、无组织的现象。必须保障党内的民主生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秩序、有纪律地进行，能够增强党的领导机关解决问题、进行工作的能力和信心，而不是削弱这种能力和信心。

（三）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党的上级组织，有权修改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及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有权停止这些决议的全部或部分的执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应有正式的成文的决议（至少县一级以上的会议要有此种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必须是切合实际，简明扼要，能够提出与解决当前工作中最重要的各种问题，切忌制订长篇大论空洞无物的决议。这些决议经过党的上级组织批准后，凡可公开发表者应一律在当地党报上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发表。党的上级组织认为党的下级组织的代表大会、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除停止执行外，得进行公开批评，并得指令党的下级组织重新召集代表大会、委员会和代表会议通过新的决议，去代替旧的决议。

（四）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召开以后，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业已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业已展开以后，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可能增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这些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论是在代表大会或委员会或代表会议上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并须报告中央，以便上级和中央能及时地明了党内的思想动态，给以指示。过去有些党委隐蔽这些争论，不及时地或者不完全真实地向上级向中央报告这些争论，并请求指示，是完全错误的，今后必须坚决改正。有些同志反对将党员干部间不同的意见向上级向中央报告，或者认为这种报告是向上级向中央告状，向报告的人实行攻击或打击，这种意见和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允许的，必须禁止这种行为，并驳斥这些同志的意见。须知党内自我批评的发展，某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只

要能够及时地得到正确的结论并保持这种争论是在正当的秩序之下进行，是最能教育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是有益无害的。但是无原则无限制的争论，长期不能得到正确结果的争论，或者在争论中任意破坏党内正常的秩序和纪律，那就要严重地妨害人民事业和党内的团结。如果在党内发生了这类争论，也必须迅速地真实地报告上级和中央，以便能及时地给以纠正，并获得正确的结论。

(五)各级党委会召集各级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必须预先收集材料，制定切合实际的报告及决议草案，并准备好提交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的各种问题，然后举行开会，才能缩短开会的时间，获得完满的结果。否则，开会的时间势必延长，而且不可能获得完满的结果。

(六)健全党委制是良好地实现全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各级党委，首先是地方地委以上、军队师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问题均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而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必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会议不可开得太频繁，军队首长在情况紧张时有临机处置之权。

中共中央关于首恶者必办的问题和关于集中领导权力的问题给某兵团负责同志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四月）

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一样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你们这样宣布，对敌方，事实上是一个欺骗。因为在事实上，这些罪大恶极分子被捕以后，当地群众将很有理由地要求我军及民主政府加以惩办，而我军及民主政府必须接受群众的要求，否则就要犯错误。你们这样宣布，将使你们在政治上处于软弱和被动的地位。因为在这些罪大恶极分子被捕以后，人民群众要求惩办他们的时候，如果你们仍然坚持既往不咎的政策，你们就将违反群众的正义的要求和意志。你们在宣布这样原则性的政策之前，应向华东局及中央请示。因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但你们并没有事先请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的声明。如果你们的声明尚未公开，必须迅即修改，方能宣布；如果已经公开宣布，则你们已使自己犯了一次错误。虽然目前不要马上宣布取消此项声明，但是总有一天你们要宣布执行“惩办首恶分子”的正确规定。

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是坚决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的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细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加以注意，加以改变，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我

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的要求的。中国新的革命的高潮的到来，我们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道路上，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工作上在几个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工作、政府行政工作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统一领导（据我们所知，各地区、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地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

（一）中央工作委员会于二月十九日将收复石家庄的经验已介绍给各地，此件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加以讨论，并做为党内文件，印发至各级党委学习讨论。

（二）凡以后攻占城市及在占领后的初期中，管理城市的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这一电报所述之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三）多年以来，我们占领很多城市，也有丰富经验，但没有总结，埋没了这些经验，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使好的经验只限于一地，而未能为全党所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尚未做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未将研究出的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反映。（列举未做总结的城市名称，从略）象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我们也是由中工委这一电报中得知的。其中所反映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种重大问题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之发展。

（四）为了使党的注意力不单纯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与组织两方面的准备，中央特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将自己占领的凡有五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三至四个月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
关于收复石家庄经验的介绍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

兹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收复石家庄的情形，略告你们，作为你们现在及将来进行城市工作的参考。

（一）我们及阜平中央局鉴于过去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因部队、民兵、民夫与后方机关乱抓物资，乱搬机器，因而使这些工业受到致命破坏的经验；又鉴于过去收复张家口，领导机关随即迁至城市，因而引起许多干部均往城市跑，在城市乱抓乱买东西、贪污腐化，严重地放松了乡村工作，并引起士兵与乡村干部极大不满的经验；所以在这次进攻石家庄以前，及攻入城市过程中，即训令部队及民兵的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不准自由抓取物资，因此部队进城的秩序是比较好的。但这种训令，只有干部知道，而未向战斗员及其他人员进行教育，故在作战中，仍有不少战斗员照过去经验拿取东西，并鼓动城市贫民去搬取物资。首先，是贫民搬取公用物资，后来，就抢劫私人财物。故有大批煤粮及其他公物被抢，许多公共建筑的门窗什物，亦被破坏或取去，私人被抢者亦不少，很久还不能停止，后来实行戒严、断绝交通、并枪决数人，才停止下来，幸而机器未受破坏，重要仓库保存下来。此外，太行、五台、晋绥各机关派遣人员到石家庄搜集与购买物资者，共约万余人。又四郊农民也准备进城，幸而迅速阻止，并通告四乡地方党政阻止，农民未进城。此时，最有破坏作用者，即各处所来之万余采办与搜集物资人员。他们不顾一切，破坏各种财产，例如运输队人员就拆走好汽车轮子，工厂人员就搬走某些机器或零件，机关商店人员就抢购大批货物。为此，特发布告，禁止任何机关部队搜集、搬走与购买物资，并分设卡子，截留一切人员向外搬移物资。同时，设立统一的物资委员会，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乃将这种现象停止。各处派来搜集物资人员，也慢慢离开了石家庄。后来，并进行了一次归还公物运动，收回了一部分公物。

（二）我们曾向派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石家庄不会再被蒋介石占去，石家庄是人民的石家庄。我们工作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廉洁和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并规定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做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

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首先慰劳攻城部队的人员，然后慰劳乡村后方机关人员，最后才能分配若干给城市工作人员，但亦不能多过其他人员。所以这次全部野战军的战斗员等及其他人员，都得到几件慰劳品，城市工作人员保持了廉洁，战斗员与乡村后方人员对此均表满意，没有听到什么闲话，乡村干部亦不要求或自由向城市跑了。由于进城而瓦解内部团结与战斗意志的现象，例如进入张家口时的情形，就没有了。

（三）阜平中央局城工部在石家庄有四百多秘密党员，但在这次进攻石家庄时，除有个别能剪断电线及带路等作用外，一般没有作用，相反，这四百人中，有很多是极不纯洁的，抢东西及后来乱斗乱捕乱没收东西等现象，许多就是他们带头干的。完全不能依靠他们来管理城市；相反，必须严格审查他们，加以清洗，甚至解散。因此，管理石家庄就不能不完全依靠外面派去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对石家庄情形是不熟悉的，与石家庄群众是毫无联系的，他们并还带了乡村中清算恶霸地主的一套经验进城。

（四）最初，石家庄市政府及市委，对城市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模糊的，对石家庄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又重视不够。石家庄是日本及国民党在华北的最大特务据点之一。有国民党员万余人，在工厂、铁路职工中，国民党员一般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并在很早就布置了我们占领石家庄后的潜伏工作。此外，并有上万逃亡地主流浪在石家庄。同时，我们派到石家庄工作的同志又非常性急，他们没有在群众中去清查国民党与逃亡地主，立即就组织工会与贫民会，登记会员，登记纠察队员，救济失业。每人每天发米三斤至四斤。登记之后，即编组，开会，选举委员会，并进行清算斗争。约一星期上下，工会登记会员上万人，贫民会员数千人，纠察队千余人。他们并笼统地提出了"由工人贫民当家"，"工人武装"及"翻身报仇"等口号，在日报上每日登载这类煽动的文字和消息。但国民党人员及特务与逃亡地主，很多都到工会及贫民会及纠察队登记，并表示积极，不少这种人被选举到工会及贫民会的委员会为委员，在清算汉奸、恶霸及被克扣工资等口号下，清算了一些商店及工厂监工、工头与保长等，并在大会上使用肉刑，打死人，没收了数家商店，扣留了不少要清算的对象，因而在全市引起恐慌。这种情形，如不立即纠正，让其发展下去，是极危险的。这是一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我们的主张和政策，毫无相同之点，而在暗地里则被国民党特务逃亡地主所利用。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形以后，我们便立即加以批评，并无条件地加以制止。这种情形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五）为了停止上述现象，市政府出了布告，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并委派人员组织了人民法院，接受人民控诉，代表人民申冤报仇，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人民法院审判罪犯时，由有关部分人民选举陪审员，参加审判，群众旁听，所有逮捕、没收、赔偿及对罪犯的处分，均经人民法院有秩序地进行。此外，又决定限期登记蒋党党员及一切伪公务人员，一切蒋党党员及伪公务人员在登记审查期间，暂时停止其公民权的行使，即不许加入任何团体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已加入者，亦须停止活动。如此一来，工会与贫民会即不能不停止活动，从新整理。石家庄国民党及其市政府和许多县政府的负责人，已被公安局逮捕数百人，但仍有秘密组织活动，在登记期间，国民党有计划地允许

一部分人登记，但不许交党证、文件及说出内情，另一部分人，则拒绝登记。所以在期满再次延期后，只登记七千余人，尚有一部分人未登记。对未登记而确知其为敌党党员者，乃进行逮捕。已登记者，则进行坦白运动，交出一切证件，说出内情，并自动宣告脱离敌党后，属于普通党员者，即恢复公民权，属于负责人及群众对之有恶感者，则继续考察。如此清理之后，工会改组，贫民会取消，纠察队拨归警备司令部整理。然后才将一切工作纳入正轨。

（六）现在市政府已召集过几次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准备聘请若干工农商学各界参议员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市政府咨询机关，并筹备选举正式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工厂筹备复工或迁移，并拟开办工人学校，训练干部，工资依照国民党时期原来工资加以调整，一般不能增加工资，只保证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并发给大部实物。如此，工人是满意的，并积极收拾工厂和复工。对于逮捕的国民党人及特务，共约千余人，现正进行审讯，因为从石家庄国民党派过不少间谍到解放区，须审查清楚，准备在审讯后，除处分少数罪大恶极者，留用少数有用者外，即向平津及其他城市释放。

（七）东北及其他解放区，均可能在最近收复一些中等的和大的城市，而这些城市收复后，又可能长期归人民所有，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特将石家庄这些不完全的经验介绍给你们，作为参考。在石家庄的许多错误，是应该而且可以避免的。至于某些城市我们进入又可能退出者，只能作短期的或临时的工作，则这些经验，就不能或不完全能适用。

（原编者注：关于登记国民党员及伪公务人员问题，后来改为只登记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党派的各级负责人员，普通党团员则免予登记。又成立临时市参议会，后来改为成立各界代表会。）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我们认为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进行军事管制，时间不能太短，不要以为军事管制的时间愈短愈好，取消得愈早愈好，而必须看我们进行军事管制的各项目的和任务是否达到，来决定军事管制的时期。

（二）我们认为在军事管制期间，应达到以下几项目的：甲、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乙、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丙、恢复并维持经常的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丁、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物品。戊、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己、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庚、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的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辛、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壬、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三）必须在上述各项工作以及其他若干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统治，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其时间，在大城市中约须三个月至六个月，甚至更长，在小城市中约须几个星期或二三个月。时期太短，是不能做好这些事的。

（四）在军事管制时期，一般应实行戒严，但戒严的目的是限制一切反动分子及破坏分子的行动自由、保障一切革命分子及革命群众的行动自由，绝不要因为戒严而妨害一切革命工作的进行。戒严也只在必要时临时断绝交通，或临时在夜间断绝交通，而不要经常断绝交通或进行封锁。

（五）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取消军事管制须先得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我在这些城市的工作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我已掌握了政权，但还没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我派往这些城市的工作干部愈多，就使城市工作机关堆积的干部愈多，也就愈加阻塞我在城市的领导机关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和接触，各领导机关每日所接触的所传达的都是在外面派来的这些干部中打圈子，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又常常主观得很，与人民生活中的实际和群众中的真正舆论相距甚远。有些城市，如石家庄，领导机关一去，也想先将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人民政权的支柱和党的耳目，但执行的时候，却毫无准备而冒失地召开工厂的职工大会，城市贫民大会，马上成立各厂工会和街道的贫民组织。结果被国民党特务钻进来。另一种组织形式，就是在城市刚解放后，我们为建立革命秩序，维持人民治安，需要召开各界或各业座谈会，报告我们的政策并征询大家的意见，但这是临时性质，不能解决经常与群众联系的问题。有的城市，已成立临时参议会，但这一组织形式，容易给人以国民党统治时代召开过的参议会的不良印象，而在成份上，因是聘请作参议，很容易偏重旧社会的上层分子，在职权上，因为是咨议机关，对群众的联系也就不会密切。因此，为纠正上述这些缺点，便于联系群众，特规定成立各界代表会的办法如下：

一、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当城市初解放后，即使党在该城市原来有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但究因是地下党的关系，不可能有广大群众的联系，故不仅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一时不易召开，即成立人民团体，例如工会、学生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也须根据我们原来工作的有无、好坏，分别先后进行，不能一下组织好。而各界代表会，则可根据我们在该城市原有的或可能动员的力量，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临时市政府出面首先邀请若干人为各界代表，组成各界代表会，成为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

二、各界代表会的人数不拘，但每个代表应具有团体的代表性，如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卫戍部队，大者各出一二人，小者共出一二人；各革命团体如秘密的工会、学生会和妇女、青年组织，各民主党派（如在未解放前受反动压迫的各党派），均可出代表一二人，旧有的商会或其他有代表性的团体如非反动者，亦可容许其出一二

人。这些代表，均为聘请，并须在我军入城前后，经过调查研究，方能确定人选，其中应以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占多数，但必须尽可能的多请原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代表，切忌尽请一些从外边派去工作的干部。如查明某人系属反动分子，即使有某一为我承认之合法团体推荐，亦可拒绝，如已聘请，亦得撤销。在某些团体或商店、作坊和贫民的街道组织尚未组成或尚未健全的时候，可以暂缓聘请其中的人为代表。在各人民团体，首先是工会、学生会的组织，已经健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代表可以经过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的群众大会推选，然后加以聘请，以增强其代表性。

三、各界代表会的职权，是由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赋与的。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及一切市政设施，均可向各界代表会征询意见，并经过其讨论和建议，再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作出最后决定，付诸实施。各界代表会并可向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提出各项市政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各界代表须负责向其所代表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街道组织的群众报告和解释这些政策和实施的内容，并向各界代表会反映群众的意见。在必要时，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亦得派代表直接向上述各单位的群众大会做报告。在各界代表会开会时，得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允许，可邀请有代表出席的团体单位派人旁听，以观察其代表是否尽职。

四、各界代表会的开会日期，在城市初解放时，应根据需要酌量多开，在开会时，军管会和市政府须有负责人出席参加领导。

五、各界代表会可选出主席副主席，并组织秘书处以执行日常事务。各界代表会为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约束之权。但我们如能运用得好，则我党的一切决议和主张，均可经过他们的协助，吸收广大人民的意见，取得广大人民拥护，并保持军管会和市临时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我们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探知群众的要求，并取得群众的协助来解决各项困难问题，例如解决煤粮缺乏问题及煤粮配给办法等，均可经各界代表会讨论来获得解决。因此，我在各单位的党的组织和工作人员应力争取得群众信用，使党能经过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聘请我们同志为代表，并从而培养将来当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条件，使党在群众中能树立起坚强的领导作用。

六、各城市解放后，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开，须视军管期间，我党各项政策实施效果及人民群众组织情况而定，但最主要地还要看我们运用各界代表会这一组织形式的成效如何。考验我们能否管理好城市的决定力量是党的政策掌握了群众，也就是说群众拥护了党的政策。要使这一决定力量形成，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代表会则可看做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自然配合这一组织形式联系群众、传达党的政策、反映群众意见的，尚有党所领导的工会、青年团、学生会等人民团体与党的报纸和广播及其在群众中的通讯员等等，但最直接而又最广泛的，还是这一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前身——各界代表会的政权和半政权的组织形式，望各地根据这一规定善为运用，并创造出新的经验，随时电告中央。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平津地下党的组织在解放与接管城市中应如何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现正继续胜利地向前发展，将迅速消灭蒋傅匪军，全部解放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大城市工业区和平绥、北宁等全线，及其周围地区，解放全华北。际此战役即将展开，并将获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前夜，我党在平、津等大城市的地下组织及全体同志，在过去领导城市群众英勇斗争，并不断获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在配合与欢迎我军解放平津等大城市和进一步管理这些大城市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面前，应根据以下各项去布置自己的工作：

（一）我们必须足够地认识平津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因此，必须在各方面有充分的准备，不但要能够完整的接管，而且要能够顺利地发展与建设这些城市或工业区，使之成为全国最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之一。在解放这些城市的战役中，我们虽然只能有限地或者甚至不可能实行军事上的里应外合。但在城市接管工作上的里外配合，则是完全可能实行与必须实行的。我们必须尽可能保证这些重要的城市与工业区完整地归于人民所有。因此，对这些城市和工业区，在其解放前后，我们应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并完成下列三项任务：第一、彻底肃清反革命及其破坏活动，并防止其他任何破坏行为；第二、完整地接收并管理全部公共产业、公共物资财产，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第三、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与生产秩序，组织一切公私力量，供应城市的粮食、燃料及工业原料，沟通城乡的经济联系。这三项任务完成的中心关键，是通过城市内部有组织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外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的配合，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实现对城市的完整接收和管理。

（二）在我军入城之前与入城的过程中，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应根据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用各种各样与群众联系的方法，向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界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解释动员工作。其内容应包括：

一、广泛的宣传我党对城市的政策和建设城市的坚定方针，强调城市一经解放，则城市中的一切都将永久是属于人民自己的，不应该使它遭受任何破坏，但在我军尚未占领城市之前，在敌人已被歼灭，我军尚未入城的时候，很可能有些破坏分子进行破坏，或者是一部分落后群众盲目地进行破坏。在这个时候，必须城市人民自己起来，竭力制止一切可能的破坏，自动地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治安维持会、纠察队等，自觉地维持社会秩序，以待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入城接管。特别是对于城市的工商业家和商会，不但要

使他们了解我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还要使他们在我军尚未入城之时，积极努力设法保护自己的工商业与社会秩序，免遭蒋傅匪徒和流氓分子的破坏与摧残。

二、号召城市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人民与公教人员，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的步骤和方法，保护城市的一切建设，使之完好地归于人民政府接管。

三、要在警察和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职员中进行工作，向他们普遍宣传我党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奖，而对一切下令破坏和执行破坏命令的分子，一律以战犯论罪，使他们积极负责保护一切公共资财及文物卷宗，不使毁损。并对国民党军、政机关及学校、医院、工厂等各部门主管人员提出警告：如果他掌管的部门遭受破坏，他就必须负全部责任。但即便过去做了危害人民的罪行，如非罪大恶极，而又能在紧要关头，为保护公共财物而做了最大努力，确有成绩者，也将被允许将功折罪，或从轻处理。因此，这也是他们为人民效劳，为自己补过，赎罪的最好机会。

四、对于青红帮等流氓头子，可以在适当时机，通过某些私人关系警告他们，不许他们抢劫破坏，如敢故违，我军入城之日，必予查究。

五、对于城市贫民可能的抢掠行为，必须作有效的防止，应向他们指出，解放后的城市，已经是人民自己的城市，只有大家保护城市一切物资，坚决反对抢掠和破坏，我军入城后，才能顺利地、有计划地恢复和组织各界人民的生产，适当解决城市贫民的生活问题，如若抢劫和破坏，就是自己破坏自己今后物质生活的条件。

以上这些宣传解释与动员工作，在适当的时机，我们也可能采取适当的形式，由新华社公开广播。

（三）在准备工作中，更重要的是组织上的准备。必须向城内地下组织作详密的布置，按照城内各学校、各工厂、各部门、各区、各街道的党员与群众的具体情况，在全盘计划之下，分别地分配给每个单位的党员和有组织的群众以一定的具体任务，要他们准备以一部分党员和群众，在适当的时机出面做公开的活动。这一部分准备公开活动的党员和群众，既不要过早暴露，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亦不要太迟出面，以免城市遭受不应有的破坏。大约在作战已基本结束，敌军已根本被歼灭或完全溃败，敌人已完全无力控制城市，秩序即将开始发生混乱的时候，我们准备公开活动的党员和群众，于此时按照所在地区与工厂、机关的具体情况，出面活动为适宜。因此，在出面之前，必须组织秘密情报，注意战事发展的情况，而出面之后，即须按照预先分配的具体任务，勇敢进行。这些任务主要的是：

一、组织以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与学生为骨干的纠察队，或护厂、护校委员会等，保卫各重要机关、工厂、学校、仓库等，禁止破坏（城外的重要产业，如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门头沟煤矿、通州发电厂、双桥转电所及塘沽工厂、开滦五矿等，应由当地县委负责布置保护）。特别应注意控制或掌握电话局及各区电话干线。设置指挥所，利用电话收集情报，互相联络，指挥市内活动。这些被组织的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很好的纪律，如有个别分子，借机发洋财者，则必须立即处理。

二、指派得力人员，以适当名义，携带证件，出面命令与指挥城内旧有的各个部门

的各级主管人员及其所属之行政系统，特别是警察系统，禁止破坏，维持秩序，并立即控制广播电台，向市民广播，号召市民自动维持秩序，镇压破坏，迎接解放军。

三、对战犯匪特及反革命分子加以严密监视，如果他们胆敢乘机破坏，应即加以逮捕，送交或留交主管机关处理。

在执行上述任务及其他一切任务时，为了防止有些坏分子假冒名义及借机营私，并为保证贯彻城市的纪律起见，对于所有公共机关、公共物资及其他一切公共的东西，非得我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令，任何人只有保护与看守之责，而决无接管与处理之权，违者必究。所有在监狱中的犯人，暂时亦不许释放，一律听候我接管人员入城后分别处理。如有革命群众或我们的党员干部被捕在内者，应先由市内党的组织派人去接头，待我军入城后去迎接他们出来。

（四）对于各项任务的执行，还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如果敌人在市外已经被我消灭，则市内工作就可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只要防止特务、流氓、散兵游勇及落后群众的破坏行为，就能够保持城市的秩序，但如果敌人于战事正在进行或溃败撤退时，已经有计划地进行破坏，那末，就必须预先通过我之党员群众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关系，以种种可能的办法，拒绝接受敌人的破坏命令，或采取怠工、欺骗等方法，极力阻挠或减少其破坏。又如果敌人退守城内，要把城市化为战场，而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那末，我们就要动员一切力量，用各种方法去动摇敌人，瓦解其作战布置，或逼使敌人投降。凡此可能的情况变化，市内领导工作同志，都必须预先做出各种估计，甚至还要估计到其他更坏的情况，并根据这些估计，做出几种不同的工作计划与行动的部署，以免临时慌乱。

（五）所有城内公开活动的党员群众及纠察队、护厂、护校委员会等，在我军入城后，应即向我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接收新的任务，如发动与组织城市群众，配合我经济工作部门，运输城外粮食、燃料及一部分工业原料进城，以供应城市人民在生活上及生产上的需要。特别是普遍深入到城市各阶层、各职业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进行解放后公开的群众宣传与组织工作，更需要原在城市的党员干部，协同入城干部，组织工作队，用大力去进行群众工作，组织工人代表会、学生代表会，并准备各界代表会的成立。

（六）上述各项工作，必须抓紧时间，在城内党的各个组织内充分的讨论，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具体分工，一致行动。在我军入城前，城内一切工作服从原有市委领导，而在我军入城后，则应服从军管会的领导，克服一切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

平津两市党的领导机关，应根据上述指示，具体布置各项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

一、关于各地工商业政策上的错误，除朱德同志来信及中工委二月来电所反映者外，又接康生同志自渤海来信称："此间对城市工作与工商业，过去均持毁灭政策。羊角沟的工商业，由于去年六、七月完全用农村斗争方法，全部没收分配，几已全部垮台，盐产大大缩小，羊角沟已成死城，很难恢复。现已下令禁止在一切城市及大镇进行土地改革，并不准没收和分配任何工商业，并派人到沧州、德州、羊角沟等城市调查，研究补救办法，以安定人心，发展生产"等语。我们估计，华北、东北各地类此事件必定不少。晋绥之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是从领导上发生的，现正在纠正中。各地发现此类事件，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去检讨。

二、在领导方针上，没有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富、消灭封建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未将消灭地富之封建剥削与保护地富经营之工商业严格区别，未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与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妨碍工人与人民革命事业持久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区别，更未使这种区别成为党内公认的风气，也未引导工人与政府及私人资本家合作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去节省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尽力以达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反而是引导工人追求片面的眼前利益，盲目的将工人及自己一同引入绝路。还有带有毁灭性的工商业税收政策。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方针而犯了错误。应由中央局会议讨论，明确提出此问题加以分析检讨，然后发出正确方针与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后，中央局、分局必须与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信，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与领导工作的极重要的工具。以便随时掌握运动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以免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帐，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当时羊角沟事件应由景晓村领导之渤海区党委负责（当时华东战争极紧张，华东局正全力应付战争），但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与下面的联系似不够密切。明确划清许做不许做之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的工作做的不够。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对工商业左倾冒险的政策，已至极端危险与不能忍受的程度。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与杀人五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必须全面掌握正确政策，并随时纠正下面的错误，勿等乱子闹大再算总帐。

中工委此次召集的邯郸、五台、华东各局的负责同志会议，除讨论组织问题外，必须讨论政策问题，尤其是工商业政策问题。

五、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及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及正确与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与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和这种或那种政策连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及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与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附〕朱总司令去年十二月给毛主席信的摘录

（上略）工人运动过去走错了路，张家口时代，工人发双薪，工人工资以养活四口人为准，余毒一直留到现在。工资过高，成品又坏，成本又高，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越来越远。河间有一新式面粉厂，工人工资每月六七百斤小米，工人吃小灶，生活富饶，我曾指出现处战时，大家勉强生活，拚命工作，工人是革命领导阶级，而只顾改良自己生活，不顾战争，不顾大家，以致公私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简直是自杀政策。该地工会负责同志声称可以改正。工人也知道最高工资一般不得超过月薪二百斤，工业才能发展，工人才不致失业。石家庄发失业工人救济米，每天每人五斤，当即予以纠正。

毛主席注：（不是公私兼顾，不是劳资两利，而是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就是极大的失败。决不可只看见目前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关于此点，中央早有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向工会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反而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片面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自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自由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三月）

晋冀鲁豫中央局，根据中央关于宣传工作方针的指示，检讨了他们的宣传工作方针，并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这种检讨很好。但他们的检讨中有这样几句话："更主要的是，我们思想上认为开明士绅是中央对全国之宣传口号，地方上可以灵活一些，经中央指出后，才知道是犯了革命性质的原则错误。"毛主席在这句话后边加了按语，说他们这一点说错了，随后中央又专为此问题发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指示，说：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里所说的人民大众，是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应该就是去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所说的工、农、兵、学、商及其他爱国份子。这里所谓学，是指一切受压迫、损害或限制的知识份子；所谓商，是指一切受压迫、损害或限制的自由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谓其他爱国份子，主要是指开明绅士。所有这些人们组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以劳动人民为主体。所谓劳动人民是指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一切体力劳动者，加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革命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不是一般的推翻资本主义，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中国革命性质的内容，这就是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

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现在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反蒋和土改的开明绅士，例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等，是因为在抗日及抗日以后我们处在困难的时期内，这些人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现时我们实行土改，他们又并不妨碍或反对，因此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而应采取团结他们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中央也从来没有这样指出过。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敌人和主要革命者两方面，既然我们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向着这些敌人作斗争的人们的主体，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体力与脑力的劳动人民，这样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是如同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份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左翼份子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

体，都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自由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但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损害或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这个革命或者保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份，但不是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人们，而是因其经济的重要性，因其可以参加反美反蒋或者保守中立，我们有可能与有必要团结他们。在二十几年前，在中国共产党出现并表现自己的能力以前，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曾经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并表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这个阶级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是当时（不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曾经附和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说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当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当保护他们，就说那个时期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而是相反，就在那个时期，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争取和保护他们，以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的反动派）；在抗日时期，是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而主要的依附国民党的抗日的参加者；在现在时期，自由资产阶级的多数，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其左翼依附共产党，其右翼依附国民党，其中间派在两党之间，取观望态度。因此使得我们有可能与有必要争取他们的多数，孤立他们的少数。但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则必须慎重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开明绅士是地主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份子，这些份子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矛盾，与地主富农的整体亦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经济上的重要性（他们的封建性的土地所有权，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而是因为他们在我进行抗日的时期，在现在反美反蒋时期，在政治上可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改时，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土改，对于我们在全国土改影响上也是有益的。对于我们争取全国的知识份子（大部份是地富家庭出身）、争取全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大部份与土地有联系）、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孤立蒋介石，是有益的。因为开明绅士有这样作用，他们也是人们大众中的一份子，也是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份子。因此，团结他们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但不是你们所说的“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在时期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如此，我们就应当团结他们。

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

（一）天津解放后，你们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代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或原来的负责人劣迹昭著，为大多数人所反对，而不能不撤换者，或系破坏分子，十分不可靠的分子，而不能不撤换者，即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除非是无法提拔或我们派去的人完全是该企业的内行，能够无困难地管理该企业时，才任命他们直接负责该企业的管理。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

（二）我们派到各企业中的军事代表（即接收人员），对于大企业除派一个负责的总代表外，并可在各工作部门（十分必要时可在各车间）、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总代表之指挥，并可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这种军事代表的任务应是：甲、保障上级命令的实行：乙、保障生产的进行或恢复；丙、防止破坏或怠工，清查反动分子；丁、防止偷盗、贪污及浪费；戊、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与宣传，从职工中挑选干部；己、协助职工组织工会及消费合作社等；庚、了解企业中的情况，学习管理生产。军事代表为了达到上述各项任务，应有权力监督企业中的一切活动，了解企业中的一切情形，要适当的人员向自己作报告，并在一切命令及指示上签字。生产的进行如有不好或发生破坏怠工等事，即应查明实情，追究责任，将进行破坏或怠工有据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企业中共产党的支部及党员，应受军事代表领导，协助军事代表完善地达到上述各项任务。这就是说：军事代表不直接去管理生产，只监督原来的人员去管理生产，保障生产能照旧进行。这是比较轻而易举的。

（三）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

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这是马克思、列宁多次说过了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照这样来作。有些地方的接收人员彻底打乱了原来的企业机构，是错误的，妨碍生产的，不应再犯这种错误。

临清事件与国营商业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新华社社论

今天我们所发表的关于临清棉价风潮的新闻，对于我们的整个国营贸易工作是一个严重的警号。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但它留给我们的教训却决没有过去。例如最近某些接近前线地区粮价的上涨，就可说是临清事件的某种程度内的重复。我们在临清事件中所应该得到的根本教训，可以用列宁这段话来表示："与资本家比较起来，你是占着优势，因为国家政权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善于运用它们。"（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宁的这段话，正象对准我们今天一切不善于领导市场、掌握物价，不善于领导私人资本的国营经济而发的一样。要检讨临清事件，毫无疑义也应当从列宁指出的这个方向去寻找。

要从临清事件来谈目前的贸易工作，就不能不回溯一下过去的情形。我们知道，抗日战争以来的解放区人民政府的国营贸易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是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各解放区虽然程度不同，但在排除敌伪商品，保护与发展土著生产，争取必需的外来军用物资等工作上，是有重要成绩的。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调剂了解放区内物资的供需，相对地稳定了解放区内的物价。但与这些成绩同时，国营贸易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原则性的缺点。简单的说就是：财政成绩多，经济成绩少，即是说，国营贸易在如何领导与控制私商，如何稳定市场，反对投机；如何保护小生产群众与消费群众的利益；如何协助建立供销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的系统来联系小生产及有计划地分配为工业生产与人民消费所需要的物资等等方面，是做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在这样不甚健全的贸易工作基础上，当然临清事件以及类似临清事件的发生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是由于：第一，我们的有些国营贸易机关相当长期地没有明确认识自己领导市场的重大责任，并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没有深刻了解，市场的剧烈波动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危害性。第二，它们对商业资本的本质特别是它的投机活动的破坏性也认识不足。在临清事件中，它们对私人商业资本的投机活动既未认真防范，也未设法制止，终至推动并帮助它们进行了投机破坏活动。第三，是不少的国营贸易工作人员还很不懂得商业，很不懂得经济活动和市场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临清事件中，许多贸易工作人员所采取的步骤，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盲目的和鲁莽的错误。他们是如此轻率，以至简直没有估计到，由于他们的许多盲目的鲁莽的活动，市场供求和物价将要发生什么严重的变动，以及这个变动对于千百万人民和人民的政府将要产生什么严重的结果。第四，尤其

主要的，这次事件是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各自为政，无集中统一领导，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必然要产生的恶果。如果两区步调完全统一，不要互相抢购，则临清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就告诉了我们：虽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贸易机关，拥有一切必要的条件，如雄厚的资本，便利的国家信贷，优先的交通条件，灵通的商业情报等，但是如果没有或不执行正确的政策，即“不善于运用它们”时，仍然不能达到国营贸易的目的，以至会被私人资本主义打败，并断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前途的。自然，在今天发生临清这类事件，是不能过重地责备我们那些经济工作人员的，他们那样作，可能完全不是从恶意出发。因为我们的党还没有认真地教育他们，使他们明确地懂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人民政府也还没有规定完备的经济法令，使他们有所遵循。他们所犯的错误，大多数还是带盲目性的。所以拿这些事件来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在目前十分重要，否则，我们就将完全不能对付今后的新的情况。

我们必须明白，全国胜利后的新情况，使产生比临清事件危险十百倍的事件的可能性，是大大地增加了。因为，首先，在这些已经解放及即将解放的大城市中，存在着我们从未面对过的庞大的商业资本，它们在国民党统治下曾长期从事于投机活动。那时，扮演破坏国民经济主要角色的，当然不是它们而是国民党官僚资本，但在国民党官僚资本既经打倒之后，情形就变化了。如果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对它们不能加以控制，那么，它们便将成为今后破坏国民经济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我们已经和即将面对着的，是大城市的集中的生活消费、原料消耗、与集中的生产品的分配。这些都必须依靠繁复的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目前及今后国营贸易工作的责任是非常巨大地增加了。

国营贸易工作今后要怎样才能担负起它的巨大而且重要的任务呢？怎样才能不犯或者少犯象临清事件一类的错误呢？

首先，是要一切国营经济工作者树立起对于私人商业资本的正确认识，然后才能谈到对私人商业资本的正确政策。须知，在国营及合作社商业还无力完全来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条件之下，私人商业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少的。但每一次私人商业活动同时不能不是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间剥削，每一个商业资本家不能不在每一小时伺隙投机。而在一当可供投机的空隙扩大，例如，因战争而使物资流通受到阻碍，某些物资特别缺乏，币制的不统一和变动，物价发生波动等等的时候，那时每一个“正当”商人，就都会去进行投机活动。这时候的私人商业资本就变成了国民经济中的破坏因素（国营商业如果也照这样做，也是一样的破坏因素，而且为害更烈）。临清事件中的私人商业资本就表现的非常明显：它们既剥削了生产者，又剥削了消费者，也剥削了国家的国库，并使得两区物价均形上涨。

当然，指出私人商业资本可能的危害性，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了，不是的，我们仍然要坚决的执行下面这些保护与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即：一，保护工商业财产不受非法侵犯，严格保持对封建地主的封建财产与对工商业财产的区分；二，劳资两利的职工运动方针；三，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但是，在坚决执行了这些政策之后，那时候可能发生的主要危险是什么呢？毫无疑义的，那时候可能发生的主要危险便不是“左倾”危险而是右倾危险了。“纠左必须防右”——结束农村土地改革中

的这一句口号，在目前对待工商业的政策中也是完全适用的。因此，我们对于私人商业资本的正确态度，便决不能采取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应当是领导、管理和控制它们，使它们无法进行破坏性的投机活动，并走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道路。

第二，就是要彻底弄清楚并担负起国营贸易的任务。国营贸易的任务，是要和投机性的私人商业资本经过市场关系来作巧妙的斗争（行政命令只能帮助这种斗争），阻遏市场投机的可能性；是要保护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经济的利益，以正确的有利于生产的价格政策来对待它们；是要进行严密的调查、统计工作，有计划地收购与分配社会物资，满足社会公私生产和消费的正确需要；是要把小生产者经过供销合作社的系统组织在自己的周围，以领导小生产等等。简言之，就是要建立、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机关及国营经济系统就必须认真的做到以下的几项重要工作：

甲、国营贸易系统，必须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以便建立统一的收购和售出机关，统一的收购和售出计划，统一的收购和售出的价格政策等等。不许各个国营经济机关以不同价格到市场上去互相竞争，甚至联合私商去竞争。尤其不许到邻区去竞争。当然，这些工作在目前应采取种种必要办法，使其尽速而又是有步骤地作到。首先在各个战略区内部应当而且可能很快建立这种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各个战略区之间，如一时还不能作到，也应随时互相协商，作到步调一致。象此次临清事件中华北、华东两区各自为政地互相竞争，以至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投机资本的重大错误，是无论如何不许继续存在的。只有这样，国营贸易机关，才有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所帮助，才不至在私商的投机狂潮前惊惶失措，才能够在和私人商业资本的投机性、破坏性作斗争时，表现自己的战斗力。

乙、国营贸易系统，应建立起科学的调查统计工作，就是说，应该对于本区和外区市场的供给能力和需要状况，包括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需要状况及公私生产的供给能力与需要状况，逐步地作出周密的调查统计。这是消灭工作中的盲目性的根本问题。只有在掌握了这些最重要的调查统计材料之后，国营贸易机关才有可能定出统一的收购和售出计划，才有可能调剂供求，才有可能有计划地分配物资于各个地区，各个消费者和各个生产部门（当然，这样繁重的工作，不能单靠贸易机关一个部门去作）这样，就不仅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可能的计划性，而且为将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和分配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这是我们必须在长期努力中作到的。

丙、临清事件还告诉我们，国营经济没有可能直接从散漫的小生产者手中购得其需要拿出来进行交换的生产品，同样也没有可能把自己手中的生产品普遍地分配给他们。这就是说，在国营经济与小生产之间还缺乏一种必要的中间桥梁或联系，因此也就不能组织和领导小生产者，而让私人资本主义去和小生产者发生了联系，使小生产者不是经过国营商业而是经过私人资本主义商业才得出售其生产品与获得供给品。这样，就使小生产者不得不受私人资本主义的中间剥削，不得不把自己附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体系内，如果这个情况的发展不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广大范围内所代替，其结果必然是与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这个问题，只有在国营经济与小

生产者之间建立起了供销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的系统，因而也就是说建立起了国营经济与小生产者及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以后才能解决。这种供销合作社与消费合作社是在国家经济的帮助之下，由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供给小生产者以生活上和生产上的必需品，尽可能公道的价格收购小生产者的生产品，使小生产者逐渐不受投机商人的中间剥削；是代国营经济收购物资原料，及推销成品，使小生产者经过供销合作社的媒介而受国营经济的领导。经过这些办法，逐渐地把小生产组织起来，逐渐地克服小生产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散漫性与无政府性；同时也使国家经济得到一个可靠的助手，来进行上述的统计，监督和有计划的分配工作。

第三，临清事件说明，我们一部分同志还没有完全学会或者简直没有学会如何做经济工作，特别是如何做被人目为“市俗的”、“不体面的”的商业工作。而商业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下的国营经济便是这种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或叫竞赛）中，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联共党史在总结苏联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新经济政策初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并存而又进行斗争的时期）的经验时说：“新经济政策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生死的斗争。‘谁战胜谁’——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为要胜利，就必须经过尽量发展城乡间的商品流转而来保证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经济之间的结合。为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学会管理经济，必须学会文明经商。

“在这个时期中，商业是摆在党前面的诸任务的链条中的基本环节。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扩展城乡间的商品流转，就不能巩固工农底经济联盟，就不能提高农业和使工业走出破坏状态。

“当时，苏维埃商业还是很薄弱的，共产党员还没有经商的习惯，还没有熟知敌人——耐普曼（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中的私资企业家、商人、投机贩子——译者注），还没有学会如何和他们斗争。私资商人，耐普曼，曾利用苏维埃商业底弱点，而把布匹以及其他日用商品底贸易，抓到自己手中。关于组织国家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问题，就具有巨大的意义。”（该书第九章第三节）

因此，列宁在当时曾无数次地强调共产党员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经营商业，他说：“以前资本家会办理供给。虽然这件事情他们做得很不正当，用强盗的方式欺负了我们，掠夺了我们。……可是你们——试按照新方法去作吧：你们既无利润可获，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再好不过的，——你们这些神圣人物，简直可以活活地升入天堂里去，——但事情究竟会不会作呢？”列宁说：“请看在经济方面我们必需要作的事吧：现在就是要赛得过平常的店员，普通的资本家，商人……我们要用全力注意到这点，不要以为在国家托拉斯和合股公司中，到处都是负责的优秀共产党员而自安自慰——这没有任何益处，因为他们不善于经营，比较那班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资本主义店员要差一些。这点我们没有觉悟到，这里要用同样美丽的俄文词句说来，就是还存在有‘共产主义的夸大狂’。”列宁说：“我们在这一年来极明显地证明了，我们不会管理业务。这是主要的教训。或者我们在最近这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管理业务，或者是苏维埃政权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最大的危险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点。如果全

体共产党员，负责工作人员，都明白了解到：自己既然不会，就得从头学习，那时我们便会获得胜利——据我的意见，这才是主要的，根本的结论。”（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

当然，中国人民今天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应当采取的政策，如前所说，是与列宁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相同的。但是列宁向俄国共产党员提出的这个“根本的结论”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的劳动人民说来，却有伟大的教育意义。我们要想避免“共产主义的夸大狂”，就得“从头学起”。完全学会做好经济工作。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是完全能够把经济工作做得很好的，只要我们善于学习，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象在军事方面一样伟大的胜利。

〔附〕临清事件经过

（一九四九年一月）

去年十月，华北解放区临清市（位于鲁西北运河与卫河汇合处）发生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国营贸易机关抢购棉绒一百五十万斤，刺激物价上涨，鼓励私商投机，因而造成严重违反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事件。卷入这一漩涡中的，有驻在该市的华北解放区的国营贸易机关华茂公司，及冀中、冀南、冀鲁豫、与华东的渤海、胶东等行政区的贸易机构以及其他机关开设的公营商店等共二十余家。由于抢购，从十月九日到二十六日的十八天内，棉花价格暴涨百分之五十七，并因而引起了一般物价的暴涨。在此期间，上述贸易机关共抢购了一百五十万斤棉绒，他们除自购外，并委托私商代购，把临清市上的存棉买光之后，又到附近城镇与乡村抢购。私商们则买空卖空，搀假使潮，一齐向公家渔利。如冀鲁豫区贸易机构泰兴隆委托五和等两花店代购，五和等两花店又转托恒满等三花店代购，恒满等花店又委托隆泰花店代购，这样，使投机私商得以层层剥削国库和小生产者。由于不顾一切的抢购，又使棉花质量大为降低。冀鲁豫贸易机关德丰裕从私商万聚大花店购入的棉花，打包时竟能压出水来。据最低估计，每百斤棉花中若使潮十斤，则此次抢购中各贸易机关共买入水分十五万斤，依棉价波动前之每斤二〇三五元计算，国库共损失冀南币三万万零五百万余元。

此次事件的经过是：济南解放后，华北、华东两区物资顺利流通，但华东区物价较高，棉、布价格相差更大。如以十月十一日的临清棉价为标准，则济南较高百分之二十二，益都较高百分之五十，潍县较高百分之八十一。加以十月中两区货币等价流通，势必更引起华东区商人云集临清大量采购棉花的现象。但是两区的国营贸易机关，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采取调剂两区物资，稳定物价的必要办法，而且也随私商之后互相争购，各自为政，无计划无领导地大量吸收，便使棉价大涨。华茂公司看见棉价如此大涨，便

停止收买，企图以自己不收买的"姿态"来稳定物价，但其余二十余家国营商店及机关商店，则正纷纷抢购，于是物价继续上涨，私商继续舞弊，市场陷入极度混乱。该地工商局及国营华茂公司见此情形，便于十月十四日召集全市公营贸易机关开会，决定共同停止收购（这个决议也不正确，是让出阵地让私商自由投机），但第二天又以华茂公司为首继续抢购，终至造成上述的棉价及一般物价暴涨和质量降低现象。在此期间，各贸易机关除违反政策外，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也很严重，如冀鲁豫之泰兴隆，并未得该行政区政府购买棉花的任务，仅为了运往济南赚钱而私自买了十七、八万斤。这些公司曾于十月二十日获得华北政府的命令，该命令规定"各区公营商店，不许在临清市直接购买棉花，如有需要，可由当地国营商店代购"，但仍想法设计继续收购，如冀南建华一分公司就于得悉此一命令后购入棉花五十万斤之多，终于造成了市场上的上述险恶现象。

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

新华社社论

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我们已经解放并将继续解放许多大城市。这对于我们，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其复杂的新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的工作是先乡村后城市。这是因为在乡村，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存在和发展的缘故。毛主席规定下了这条正确的路线，因而，在苏维埃运动期间、在抗日战争期间，创造了革命根据地，组织了强大的人民革命的队伍，获得今天历史性的伟大的胜利。但当现在大城市从反革命的堡垒变为革命的堡垒，永远属于人民的时候，过去的做法就需要改变了。毛主席和我党中央又指示我们：必须一反二十年来的做法把先乡村后城市的做法，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做法。如果我们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那就不可能使农村有进一步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而人民革命政权就不会巩固，中国人民就还不可能做到彻底翻身。

怎样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样才能使城市起领导乡村的作用？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居的大城市（象北平），大都是消费的城市。有些，虽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象天津），但仍具有着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它们经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剥削方式，不仅搜刮乡村的农产品来供给它们的需要，而且吮吸乡村农民的脂膏血汗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工业品。它们对于帝国主义，一般地也是被剥削者，而对于乡村（同样，对于城市工人），则是剥削者。因此，造成了乡村和城市的敌对状态。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决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进入大城市的第一天起，就应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样，才能够充分而便宜地供给乡村以必要的工业品，而换取其农产品，使乡村和城市，从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存；这样，才能改善城市的经济地位，从而改善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这样，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不再受其剥削；这样，才能使城市领导乡村，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从城市到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对于我们，无疑地，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但决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数量上是少数，而在质量上，则很坚强，并且大部

集中在城市，只要我们忠诚地去依靠他们，发挥他们的力量，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主观条件是具备了的。其次，现代化的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虽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但大都集中在城市及其周围。其中，最重要的，最大规模的，又都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本家所垄断。我们把它没收过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财产。只要不分散，不破坏，不在经营上，犯农业社会主义及无纪律无计划的错误，则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客观基础也是存在着的。第三，在城市中，私人资本所经营的现代化工业，虽然是脆弱的，但也还存在着相当数量。只要我们坚持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引导他们走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允许它们存在和发展，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将也成为一种有力的因素。最后，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业生产不仅在乡村大量存在着，而且在城市，特别是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城市(如北平)，也相当存在着。只要我们给予它们以适当的扶植，并把他们经过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以至供销的合作等方式，逐步地组织起来，则对于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大有作用的。

可以相信：无论从主观条件或客观基础上看，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都是可能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抓紧这一中心环节，进行这一重要工作（有些城市在我们进入以后，一个月，几个月，还未注意这一问题，是错误的），以及在进行这个工作中，是否能遵循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致发生大的偏向。在我们不断地严厉批判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纠正了消灭私人工商业的错误之后，今天，在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中，可能或已经发生的主要偏向，是：

一、不懂得或者不善于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同致力于建设城市从而建设国家的艰巨事业。有的不依靠工人，而依靠贫民，整日忙于放粮放账施行救济。有的不依靠工人阶级，而依靠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那里能依靠他建设城市呢？这是一种右的偏向。殊不知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如果不忠诚地依靠工人阶级，认真地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则革命力量便会变得脆弱，不仅不能完成建设城市、建设国家的任务，而且连人民民主专政的自身也将不能巩固。但是，另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一脚把资产阶级完全踢开，不和他们团结合作，则是一种左的偏向。这会使革命力量陷于孤立，同样，对于建设城市、建设国家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害的。

二、只重视私营企业，而轻视公营企业；无原则地、无限度地、无区别地扶植一切私人资本主义，而对投机操纵的、野蛮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不加以必要的限制。当然，在今天，是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政策，我们已经确定地定下来了，不能动摇。因此，给予它以过大的不适当的限制，致使不能发展，甚至趋于消灭，也是错误的。但由于我们的经济是以国营为领导成份，而使其他一切经济结构成份均向着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故对于私人资本主义中的投机操纵的、野蛮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分子，必须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各方面，加以恰如其分的必要的适当的限制，引导其发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防止其发生

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

三、只知鼓励生产，而在供销上没有计划，没有办法，致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供给和需要矛盾，生产品推销不出去，势不能不陷生产于停滞的状态中，且给予投机商人以操纵剥削的机会。为了避免这种弊害，必须一方面尽可能地、比较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发展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纽带，也就是沟通乡村和城市的桥梁。它以公道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乡村，而又以公道的价格，收买农产品，供给城市。这不仅可使乡村避免投机商人的中间剥削，城市获得粮食和原料，而且可鼓励农民生产，发展乡村经济。

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我们必须担负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但由于我们长期脱离城市，转入乡村，对城市情况和工作，极其生疏，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必须虚心学习，努力工作！

（原载《人民日报》第272号）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

——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

新华社社论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军阀的罢工运动——京汉铁路（即平汉铁路）大罢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年年纪念二月七日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因为京汉铁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显示了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的先进阶级、最革命的阶级。

二十五年过去了，"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谦等同志所遗下的事业将要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将要在全中国被扫除，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其他爱国分子的民主政权，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中建立起来，并将要在全国建立起来，"二七"烈士的光荣业迹是永垂不朽的。

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我国革命的职工运动历史中，是光荣的一页。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的一部分大城市、铁路、矿山已经解放了，更多的大城市、铁路、矿山将被解放；另一方面，各解放区首先是东北解放区，工业和铁路的建设，已在积极进行，此种建设在今后必须更大规模地进行。因此，解放区职工运动将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职工运动的方针是否正确，对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发展，必然发生较之以往更加巨大的影响。我们愿趁着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的机会，对于解放区职工运动的方针加以说明。

解放区的革命的职工运动与蒋管区的革命的职工运动，有同一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就是争取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民主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但是在同一的总目标之下，革命的职工运动在两个不同地区的具体方针则是不同的，在许多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是因为在这两个不同的地区里，工人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和在企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许多方面是截然相反的。

在蒋管区，工人在社会上是最低微的奴隶，他们的劳动是替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生产利润，他们的生命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看得象蚂蚁一样不值钱，他们没有人权和自由。在这样悲惨的环境中，工人阶级必须为了活命而作救死求生的斗争，并且为了解放自己与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民起见，必须为推翻帝国主义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政

权而斗争，如象“二七”的罢工斗争一样。但是在解放区，工人的政治社会地位是根本改变和截然不同了。工人，与农民、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一样，都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工人阶级被一切人民特别尊敬，因为它是先进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阶级必须拥护自己与人民的民主政府，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起先锋带头的领导作用与模范作用。

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蒋管区，有官僚资本的企业和民族资本的企业。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工人的地位是官僚资本家的奴隶，他们救死求生的斗争，常常与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联结起来。在民族资本的企业中，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同时又与民族资本家一同受到官僚资本、蒋介石匪帮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一方面为了生活，须向资本家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为了反抗官僚资本及统治者的压迫，又应与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在解放区，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解放区的公营企业与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企业的主人是解放了的人民组织起来的政权与合作社，因而在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本身就是企业的主人，这里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没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因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所谓“资方”与“劳方”的对立，所谓“企业主”与“非企业主”的对立。在解放区的私营企业中，工人有两重地位：一是被剥削者的地位，“劳方”的地位；一是社会主人翁的地位，国家政权的领导者的地位。因为是被剥削者，工人在自己的日常利益上与私人资本家有矛盾，但因为又是社会的主人翁，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工人便应该为了自己的长远的利益，忍受一定限度的剥削，使这些私人企业能够进行生产，并适当的发展生产，以繁荣解放区的经济，支援前线的胜利，并使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因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而逐步地有依据地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去。应当知道，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之点，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私人资本的企业在生产中还是不可缺少的成份，破坏这部分企业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及其国家政权是非常不利的。正因为如此，工人应当坚决反对那些进行怠工、进行关厂、进行破坏的私人资本家，同时对于愿意继续生产下去的私人资本家，则应当与之共同工作，发展生产，繁荣解放区的经济，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确实保证工人的适当生活；另一方面保证私人资本家的适当利润。这种劳资关系，与在蒋管区所应进行的劳资斗争，是截然不同的。

从以上的基本分析里就可以看到，在蒋管区与解放区，工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在企业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截然不同。从此就可以明白：解放区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方针，为什么要与蒋管区的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方针截然不同。

在蒋管区职工运动的方针，是用一切方法来保障工人不致于饿死，和用一切方法来推翻反动政府。在解放区革命的职工运动就没有这些任务了，因为在解放区，工人没有饥饿的威胁，反动政府早已推翻。在解放区，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方针，因此应当彻底改变；改变到耐心的说服工人来实行毛主席所说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

应当向工人说明：振兴工业，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最首要的任务，也是建设新民主主

义社会的最首要的任务，而破坏或降低生产，是危害解放区的、危害战争胜利的，危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的，其可怕的程度与蒋介石匪帮的“三光政策”是一样的。

应当向工人说明：解放区的工业生产，不是由别人负责而是由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负责的。解放区的农民，对农业生产，交大量的公粮，服繁重的战争勤务，是尽力负责的，工人应当把工业生产的责任，同样负担起来。公营企业与合作社经营的企业里，工人对于生产要担负完完全全的责任；而且在私营企业里，工人对生产也负了大部分责任。虽然私人资本家也要负责。

应当向工人说明：工人所以受到解放区人民的尊敬，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仅是为了工人阶级在人民中是先进的阶级，最革命的阶级。工人应该以自己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与伟大贡献来做人民的榜样，领导人民前进。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成功，工人应该吃得苦，做得多，应该学习许多模范工人如赵占魁同志等的榜样，在战争的情况下，不是做八小时工作，而是做十小时工作，其他劳动条件亦不可定得太高，不可违背经济情况所许可的限度，不可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

应当领导工人去学习管理生产，在公营企业与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在厂长的领导下，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代表参加，讨论如何减低成本，提高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如何解决与改善由购进原料、制造成品到推销成品过程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种管理方法亦应在私人企业中说服私人资本家试办，在私人企业的管理委员会中，除了讨论上述问题外，并可规定私人资本家一定的利润和工人的一定的待遇，以实现劳资两利。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对于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象我们党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解放区职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职工运动的领导者们，绝对不许可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解放区职工运动的方针，应当严格地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一切与此符合的应该发展，一切与此违背的应当改正过来。

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地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许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在长时期内甚至没有正式讨论与宣传解释过中央的路线，以致于使得工运工作同志，完全不

了解中央的路线，他们竟达到如此麻木不仁的地步，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

——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

第一章　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

第　一　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美国帝国主义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横暴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内战、独裁与卖国的政策，已经把全国人民陷入长期战争的痛苦之中；而中国的工人阶级，除开在解放区者业已得到民主解放以外，其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则又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除开团结一致，坚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消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并从而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而外，就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出路。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尽一切努力去完成现在反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不能使它自己目前所处的悲惨状况有所改善。因此，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乃是改善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主阶级人民目前状况的总前提，乃是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主阶级人民当前的最高利益与最高任务。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应该而且必须站在最前列，并使自己成为各民主阶级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及其紧张的年头，自己完全团结一致，并充分表现了自己的革命能力和自我牺牲的奋斗精神，因而对于这个革命给以决定的贡献，成为人民公认的毫无愧色的领袖时，工人阶级才能保持和巩固在这个革命中所取得的胜利，并在这种胜利的基础上，去希望和准备较远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而社会主义则是能够彻底解放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

第　二　节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英明而正确的领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由于解放区全体人民及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不顾牺牲的努力和奋斗，已经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在两年空前规模和空前激烈的战争中，已经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二百六十余万，连同在抗日时期被解放者在内共解放了一万万六千八百万人民。人民解放军不独是完全打退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向解放区的进攻，而且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了强大的进攻，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走到了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为着保存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着保存现有

的反动军队及地盘，获得喘息时间，休整补充，以利再战，并消灭人民解放军及中国一切民主力量之目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策动和组织一个欺骗中国人民的和平阴谋，策动某些反动的军人、政客以及所谓中间派的右翼分子准备发动虚伪的和平运动，甚至不惜在表面上去掉蒋介石，以表示他们求“和平”的“诚意”。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一切的努力，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坚决的支援人民解放军，尽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人民，统一全中国。当着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发动虚伪的和平阴谋时，必须向人民揭露其欺骗性，击破任何假和平运动，将其转变为争取真和平的运动。本届劳动大会完全相信：经过中国工人阶级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和人民解放军的继续奋战，这一个伟大目标的实现，已经是不很远了。

第　三　节

大会在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代表报告之后，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在目前革命中所采取的总路线和各种政策。这就是说：中国目前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团结自己，并团结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建立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所有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应在适当时机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革命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揭破敌人和平阴谋，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全国人民的真正的永久的和平。这就是说：在农村中实行土地改革，平分地主阶级与封建性富农的土地，在城市中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并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大会号召全国一切职工及职工团体积极参加共产党所提议的这些革命活动、革命组织、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并遵照上述路线和主张去进行工作。

第二章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任务

第　一　节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运动，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善于联系群众，聚积力量，扩大队伍，以便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同时，应尽一切可能，谨慎地支持和参加国民党统治区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对蒋介石的军火制造与军事运输，给以可能的阻碍。

第　二　节

国民党统治区职工们的生活状况及其所受压迫，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和黑

暗，这就逼得职工们不能不经常进行救死求生的斗争。应该有更加坚固和更加广泛的团结，并在策略上有高度的灵活性，才能使这种斗争获得更多的效果，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更多一点出路。这是国民党统治区一切革命职工组织所必须讲求的。国民党统治区职工们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必须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官僚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因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大多数也是处于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的压迫、损害或限制的情况之下，职工们首先应该主动地去联合这些受压迫、损害或限制的民族资本家，使他们和工人阶级一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保护这些民族工商业。然后，要求这些资本家适当地改善职工生活待遇，以达到劳资两利的目的。而在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资本的企业中，则不应采取这种态度，因为官僚资本与美帝国主义资本，就是美帝及国民党赖以侵略中国和实行独裁内战政策的重要工具。职工们在这些企业中为改善自己生活的斗争常常和反抗统治者压迫的斗争联系起来。

第 三 节

由于解放区的工商业正在发展和扩大中，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们和革命的职工团体应该派遣适当的熟练人员到解放区来参加新式工商业的建设。同时，国民党统治区职工们和革命职工团体应该十分注意保护一切公私企业的机器和设备，反对破坏、迁移和分散这些机器与设备，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都要转入人民手中，而原属民族工商业家所有者，则将继续为他们所有。特别在人民解放军到来时，职工们应当尽力保护一切公私企业及其工厂、机器和物资不受破坏和损毁，并应联合各界人民，监视反革命分子，维持社会秩序，以待新的秩序之建立。

第 四 节

国民党统治区职工们在进行上述各种活动时，应十分注意方式和方法的适当，注意保护自己的团体和领袖，适当处理职工内部的关系，严防敌人的挑拨与离间。

第三章　关于解放区职工运动的任务

第 一 节

在解放区的职工运动，则是在一种完全新的条件之下进行。在这里，工人阶级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解放，并已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在这里，已经没有官僚资本，但有新的国家企业与合作社企业的资本，这些企业是属于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所有，也是属于工人阶级所有；在这些企业中，没有劳资对抗，只有公私关系，职工们已经是企业的主人。在这里，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是直接加强人民革命战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首先是改善职工生活的物质基础。在这里，私人企业中仍然有劳资对抗，职工们仍然处于被剥削地位，但职工们既是在政治上、社会上和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的主人的地位，就保障了职工们可以不致受到压迫和过分剥削，而一切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生产事业的存在和发展，就加强了整个

解放区的经济，因而也就有益于工人阶级。由于解放区这一切新的条件，所以解放区的职工运动，就应该在完全新的方针和政策之下来进行。

第二节

首先，解放区的职工们必须很好地组织起来，并很好地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完全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及解放区上述一切新的条件，以便很有组织地很自觉地去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军队、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并选派自己优秀的代表到国家的各种领导机关去，在这些机关中和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联合一致进行工作，并坚持无产阶级的、代表全体人民长远利益的方针和政策，反对各种自私自利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节

发展解放区工业生产的任务，已被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这是解放区职工们特别重要的任务。必须发展解放区的工业，才能保证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才能满足土地改革后农民的要求，特别是农业技术改进的要求；才能逐渐改善职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解放区工业，亦即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为这里有被解放了的广大的劳动力，有通力合作的人民大众，有解放了的商品市场，有丰富的资源，而人民解放军又将要解放更多的城市、工厂和机器，并逐步地将各解放区联成一片。这些发展工业的重要条件，都在逐日增多和增强。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正指引着我们的工业日益走上健全和广大发展的道路。由于解放区的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社会上居于主人地位，而且在国家政权中，首先在国家企业中，是居于领导地位，因此，解放区职工们就应当以领导阶级地位担负起发展工业的责任，就应当以主人翁的新的劳动态度对待自己所参加的劳动。在国营和公营企业中，职工既有权利参加工厂的管理，便有责任积极劳动，完成以至超过国家所要求于他们的生产任务。合作社企业中的职工地位和责任，也大体与这相同。在私人企业中的职工亦有责任完成资方的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所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但同时有权利要求资方履行劳资两利原则，督促资方执行政府法令。这就是解放区的职工们在发展工业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态度。

第四节

为使解放区的工业能够健全的发展，以下各项问题必须系统地加以解决：

第一项：关于工业的计划性，这是今天需要提出并且可能解决的问题。首先从基本解放区做起；从国营、公营企业做起，经过调查研究，通盘筹划，使军火工业、重工业、轻工业之间的比重，机器调剂、厂址选择、动力分配、技术提高之间的关系，原料来源、成品推销、资金周转之间的结合，工业、农业、金融、贸易、交通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各工厂、企业之间的配合，都应有适当的计划，同时照顾到对合营、私营企业的调剂作用与领导作用。这种地方性和局部性的计划经济，在今天，能够发展社会生产

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适应战争需要；对将来，则能够为逐步实现的全国性和全面性的计划经济取得经验和创造若干前提条件。必须肃清公营企业中某些缺乏计划、缺乏领导的无政府状态，使一切公营企业都能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生产，然后才能对私营与合营的企业实行有计划的领导与调剂。

第二项：国营、公营企业必须切实改善经营和管理工作，方能达到原料足、成本低、质量好、数量多、销路广的目的。这个任务的解决，主要在于贯彻企业化原则和实行管理民主化。为了贯彻企业化原则，就要制定周密的生产计划，实行从原料、生产到推销的全过程中的经济核算制度；就要以经营能力、劳动技术及尽忠职责为用人标准，推行考工制度，保证合理的劳动条件，做到机构合理，职工精干，各称其职；就要实行严格的个人负责制度，劳动纪律与赏罚制度，实行劳动检查与成品检验，做到人尽其责，功过分明，赏罚适当。为了实行管理民主化，需要在各企业各工厂中建立统一领导的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由经理或厂长、工程师及生产中其他负责人和工会在工人职员大会上所选出的代表（相当于其他委员的数量）组成之。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在上级国家企业机关领导之下为工厂或企业中的统一领导机关，由经理或厂长任主席，讨论并决定有关工厂或企业管理和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在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如经理或厂长认为与该厂或该企业利益抵触或与上级指示不合时，经理或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并报告上级，请求指示；如工厂管理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经理或厂长的这种措施不适合或对其报告有异议时，亦可将自己的意见同时报告上级，一并请求指示，但在未得上级指示前，应执行经理或厂长的决定；如工厂管理委员会少数委员对多数通过的决议有不同意见时，亦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在有紧急问题不及等待管理委员会开会时，经理或厂长有权处理之，但事后须将经过报告管理委员会，请求追认。此外在五百人以上的大工厂还可由各部门职工（包括学徒）代表组成工厂代表会议，在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之下，传达和讨论工厂决定、生产计划与经验的总结，以便更多地吸收群众建议与批评。现在业已在许多工厂中通行的生产小组会议，亦应发挥其应有作用。只有经过这些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形式和民主方法，才能培养职工管理能力，发扬厂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提高职工的责任心、劳动积极性与纪律自觉性，并发展正确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

在私人企业和工厂中，实行管理的民主化，实行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制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制，对于保证劳资协力提高生产，保证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及保证国家工商业政策和法令的执行，都有极大好处，应说服资本家并在资本家同意之下采用这种制度。私人企业和工厂中如组织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厂长或经理有最后决定权。如职工代表认为该厂厂长或经理的决定与国民生计或劳资两利的方针有抵触时，职工代表得将不同的意见提交政府机关与劳动局请求仲裁。

第三项：目前在工业中的技术干部很不够，管理干部更感缺乏，对于这个工业骨干问题必须有切实的解决办法。应从现任干部中提拔优秀分子逐步升级，帮助一切现任干部提高其智能。在工厂较多的地方，则开办职工学校。在工业以外的许多工作岗位上，有不少职工出身、或受过工业专门教育、或有过工业管理经历的干部，应征调一批来参

加工业管理工作。对新解放企业中愿意继续服务的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除查有证据的破坏分子外，必须尽量任用，必须很好地团结他们并帮助他们改变旧的劳动态度和管理方法，尤其是对待工人的态度。对自动来解放区服务的工业人材，应一律欢迎，使他们参加适当工作。此外，还须征调有相当文化水平的普遍知识分子到工厂中学习管理工作。在学生、师资和设备等条件相当具备的地方，开办工业专门学校，以训练新的工业干部，也是很必要的。

第四项：由于目前空前规模的战争环境，解放区农民们大量地出兵、出粮、出战勤，公教人员则坚持辛勤不懈的工作，解放区职工们更应当吃得苦，做得多。对于工时、工资、劳动保护和福利事业等，应当自觉地避免超过战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过高的要求。关于劳动时间，我们主张工厂工人一般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制度。对特殊企业或特殊情况，经当地政府批准，得延长或缩短之。但除战争紧急需要外，每日劳动时间连加工在内，最高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加工连续不得超过四天，全月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农业工人、手艺工人及店员的劳动时间，可以按照习惯办理。

第五项：关于工资的规定，必须保障任何普通职工的最低生活水准，即职工最低工资，连本人在内要够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同时，又必须保障职工的劳动热情及技术的进步，而采取等级工资制及计时、计件工资制。但战时物价不可避免地会有波动，为保障职工最低生活水准，最低工资不能不因物价高涨而增加，而等级工资则因战时经济条件所限制却不能照此比例增加；因此，在规定战时工资时，不能不照顾这两者间的关联，并相当缩小等级工资各级间的距离。本此原则，我们主张依下列规定来调整职工的工资：

第一点：工厂工人的工资，应采取交叉累进的等级制度。在此制度内，依据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技术程度，规定等级，等数不限于三等，级数宜多，同级工资仍保留若干差别。评议工资时，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依其职责能力及学识经验；对工匠，依其技术；对熟练工人，依其熟练程度；对单纯体力劳动者，依其劳动程度；同时，照顾他们的工龄。应由各解放区地方政府，在工会同意之下给同种企业规定相当统一的工资标准，但不可对不同企业规定同一工资标准。再由各工厂根据政府颁布的工资标准，评议每个职工的具体工资（可在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之下组织工资评议委员会）。学徒待遇，不应列入工资系统，学徒亦不应参加工资评议。合理工资制度实行之后，个别有特殊技能的职工，需要给予特别优待者，须经高级管理机关批准。现时工资制度中存在着的过高或过低的偏向，本质上是一种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发生，是受了供给制度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平均主义的实质，则在于不了解上述工资原则和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或多或少地将被养人口，生活好坏，家庭出身，政治积极性，工人高于职员，学徒当作普通工人，不熟练工人当作学徒等等，作为评定工资的根据，并将各种工资等级排成非交叉、非累进、等级少、最高最低相距甚近的单一梯形，甚至对各种不同企业规定同一工资标准。这种平均主义，严重地妨害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努力提高技术的积极性，必须迅速纠正之。

第二点：工资形式，计时或计件及其运用，应依劳动具体情况决定。计件制有刺激

生产作用，应当推行；但在成品标准和成品检验方面还没有确切把握时，不可冒昧采用，同时还要防止原料浪费，工具损坏及损坏健康的过度劳动。

第三点：在物价波动太大而工资调整发生困难的地方，还可采用职工生活补贴的办法，来调剂这种困难。生活补贴虽也应分为若干等级，但其差额不宜太大。

第四点：工资计算应以几种必需品实物为工资计算基础（例如华北之“饫”，东北之“分”）。采用货币和实物混合的支付形式。为了进一步保证职工的实际工资，应采用新的实物配给制度。这可在国营、公营工厂中试行，取得经验后，再加以推广。

第五点：农业工人、手艺工人及店员的工资制度，得从其习惯，但要以必需品实物为计算基础，并在支付时保证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一致。

第六点：国营、公营工厂，除工资外，还可采用定时奖金办法，由政府规定或批准之。作坊、商店、私人企业中的分红、馈赠及其他奖赏习惯，凡对提高职工劳动积极性及技术进步有益者，均须予以保存，并须普及于全体职工。

第六项：关于女工、青工、童工、学徒，应实行下列各点规定：

第一点：男、女、青、童工，同工同酬。

第二点：女工产前产后共休息四十五天；小产在三个月以内，共休息十五天；三个月以外，共休息三十天，均照给工资。

第三点：禁用童工、女工的产业，及禁止女工、童工作夜工的劳动，由各解放区地方政府以法律定之。妨害身体发育的劳动，不得使用未满十四岁的童工。

第四点：学徒最高学习期限，不得超过三年。学徒待遇，依其进度，逐步增加，最低够吃，最高除够吃够穿外给予相当津贴。师徒关系，应严守尊师爱徒原则；学徒必须尽心学习、努力生产，师傅不得虐待徒弟，尤须尽心传授技术。

第七项：关于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事业，因在中国从无基础，又处在战争时期，我们要来办理全国有系统的社会保险，还有困难，暂时依下列各点办理：

第一点：尽可能改善工厂健康设备和安全设备，政府定期派人检查。

第二点：伤害、疾病、老残等等的医疗、津贴、抚恤，暂由工厂负责办理，或由工厂和工会共同负责办理，其办法由政府规定或批准，并监督实行。在工厂集中的城市或条件具备的地方，可以创办劳动的社会保险。

第三点：职工福利事业（文教、合作及贫困的救济等），由工厂和工会共同负责或分别负责办理。

第四点：以上办法适用于工厂职工，其他非工厂职工劳动保护和福利事业，由工会参照固有习惯与业主协定之。

第五点：失业救济，主要为帮助就业，组织生产，由政府负责办理。

第八项：国营公营企业中的劳动竞赛和劳动英雄运动，对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今后仍要提倡这种运动，并给以正确领导，使之成为以减低成本、提高生产质量、增加生产数量为目标的功利主义，成为互相学习、帮助少数、带动多数的集体英雄主义；而对那种粗制滥造的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个人锦标主义的倾向，则须加以坚决的纠正。在采用了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的私人工厂和工业中，劳动竞赛劳

动英雄运动，也可以推行。

第九项：劳动契约与劳动争议，应依下列各点办理：

第一点：劳动须有契约，并尽可能采用集体的契约形式，以便双方履行。集体契约包括劳动条件、职工之任用、解雇与奖罚、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厂规要点等内容。

第二点：劳动争议的处理方法，为协商、调解及仲裁，仲裁为最后程序，仲裁不服得向法院上诉。

第三点：各解放区地方政府，须颁布集体契约条例及劳动争议处理办法，并须设立掌管有关劳动问题的部门。

第 五 节

在解放区工会工作的任务，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在国营、公营、合营企业中，发挥管理能力；在私营企业中，实现监督作用；在个体劳动中，促进技术改良和生产合作。高级的工会机关，有责任协助政府的劳动立法，并采取具体办法，以保证前节各项规定的合理实施。一切依法取得职工成分的男女职工，均有加入工会的权利；但会员征收，必须本自愿原则。工会不仅为会员服务，而且同样要为非会员服务，吸收他们参加活动，方能实际上代表全体职工，争取所有职工加入工会。工会内部须有充分的真正能集中群众意见的民主生活，须有切实的真正能够解决群众需要的经常工作，并须彻底整顿现在工会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形式主义作风，做到工会名符其实地成为职工自己的组织。

第四章　关于恢复全国总工会

为了保障这个决议的实行，保障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大革命中能够到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先锋队的作用，必须成立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全国组织，以便在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中能够经常指导各地职工群众的行动。为此，大会决定恢复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训令全国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全国总工会的革命传统，在当前新的时期和新的条件之下，迅速组织全国的职工群众，并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联合一致，为迅速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转自《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

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应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处理新收复区大中学校
方针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三日）

收复城市后，对于原有大学的方针应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现在我们所到之处，大学还很少，中学很多，据中原消息，该地原有中学都停办了，这是一个损失，其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明确方针。现在必须宣布，我们对原有大学、中学的方针，就是维持原校，加以改良。维持原校的好处是，学校可以很快办起来，不致过久中断，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安心，便于争取。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财富之一。再则，我们自己办教育的力量还不够，与其采用急进而冒险的政策，不如采取稳打稳扎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改良的办法很多，但必须是必要的与可能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在我军执行城市政策、保护工商业、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宽待国民党人员与俘虏等项问题的宣传上，各地新闻稿件，时常流露某些偏向。特提出以下几点引起你们注意：

（一）宣传我党我军入城受到各社会阶层（包括工商业资本家）欢迎庆祝，是对的，但要着重宣传工人、职员、学生和中下层市民方面。在对解放区内部宣传时，尤应注意此点，而不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商人、大商人、大工厂主和绅士，是站在欢迎我们的最前列，这种实事即使有，也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

（二）宣传我党我军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资本家的合法营业，及他们在此项政策下恢复与发展有益国民生计的营业，是对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一般工商业资本家也是革命动力（自由资产阶级中的个别急进的政治代表可以参加反蒋的革命斗争；但一般地在这个斗争中保持中立），似乎他们的恢复与发展营业，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徵，似乎我们有义务一般地帮助他们的恢复与发展营业（对某些有益国民生计的营业在必要时予以适当帮助是对的；但一般的帮助特别像对制造奢侈品迷信品工业与私营商店、银行、钱庄的帮助，则是错误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的宣传，无论何时不要超过了对于工人和某些技术人员的宣传。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革命作用的宣传，无论何时不要超过对于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

（三）宣传保护宗教自由与外侨安全，是对的，这在国际宣传上有其重要性；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几个传教师和外国人在解放区和全中国有着了不起的重要性；似乎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对他们负了债，必须用大的代价来伺候他们。

（四）宣传宽待一般国民党员和一般俘虏，是对的，利用他们来进行瓦解敌军工作，是必要的；但不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一放下武器，就没有罪过了，所有罪过都已经被我们一笔勾销了，就可以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觉悟立功了，似乎他们简直就是起义将领，革命军人。此外，对起义部队的宣传也要有适当分寸，不要夸大他们的作用和觉悟性，似乎他们比人民解放军还有功劳，还要革命。

（五）总之，在上述各项宣传或报道上，必须防止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向，必须指出此种偏向宣传工作人员中，在全党中，已经时常发现，必须注意纠正。

（六）本指示经中央批准，各地收到后应作为教材，进行教育，首先在宣传部、政治部、通讯社中进行教育。

（七）各地右倾偏向及克服此种偏向的教育等项情况，望告。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了八天，业已完满结束。全会到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缺席者二十人。毛泽东主席向全会做了工作报告。全会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并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执行了这个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采取这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全会指出：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时，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第一是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我党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党和人民就将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

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共同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鉴于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不久就要到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根据。

（新华社1949年3月23日石家庄）

贯彻二中全会的路线，贯彻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李富春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干部纪念会上的演说——

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今年的“七一”，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打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胜利形势下来到的。中国人民自己的武装——人民解放军，在经历三年的英勇革命战争，消灭了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六十九万人之后，现在正向南方和西北，执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最后肃清残余的敌人，已经为期不远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消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已经接近于完全胜利。这个胜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二十八年，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帮助之下，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这个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

全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我们全党将面临一个更伟大更光荣的任务，在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我们不要把这一任务看得容易，我们取得全国胜利还只是整个人民解放事业的第一幕，要想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把落后的农业中国变成先进的工业中国，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更复杂、更艰苦、更长期的斗争。这个任务之所以更复杂、更艰苦，是因为全国的工业还不很发达，工业在全部的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十，而农业手工业却占百分之九十。“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另外还要看到即在此百分之九十的农业手工业中，经过土地改革的还只有包括一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地区，还有三万万二千余万人口的地区，农村土地基本上还是封建制度，这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解决。

这个任务之所以更复杂、更艰苦，我们还必须特别认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阻力，主要是帝国主义。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不仅在人民革命中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即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毛主席最近着重地警惕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因

此，我们必须懂得在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中，要警惕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谋、任何干涉，这是一个主要的斗争任务。特别全东北的人民，与全党干部决不要以为全东北解放了，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无所作为了，因而麻痹、松懈，甚至太平享乐，这种忘记了敌人的思想，或者以为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动派残余势力已经不是主要敌人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东北党内右倾偏向主要危险的根源。在东北各地，无论城市与乡村，进行捣乱、破坏与翻把的，正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结合起来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早已指示我们：拿枪的敌人消灭了，不拿枪的敌人还存在，还用尽一切方法来进行拼死的挣扎，全党必须警惕，而且必须领导城市与乡村的人民坚决的肃清反动派的残余势力，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个任务之所以更复杂更艰苦，是由于我们对管理国家与建设国家还缺乏知识与经验，我们必须虚心学习，必须对新的业务新的工作钻进去，熟悉他，掌握他。必须向懂的人去学习，团结各方面的非党干部，一方面向他们虚心学，一方面帮助他们的进步。我们更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胜利的先进的经验。

东北党要完成建设东北的任务，就必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二中全会的路线，二中全会指示我们：党必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结成一个坚强巩固的统一战线，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共同建设新中国。二中全会更指示我们：在目前全国胜利形势下，全党的工作应该有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由城市来领导乡村，城乡兼顾，工业与农业密切结合，工人与农民要结成巩固的联盟。党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我们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即是毛主席所说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我们要以毛主席的“四面八方”的方针，检讨与改进我们的工作，深刻认识“四面八方”中忽视了一方面，我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东北工业中公营工业的比重比私人工业大，我们第一是应当恢复与发展公营工业，我们必须努力把公营企业搞得很好，使其真正能够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前进；但决不应因为私人工业比公营工业的比重小而忽视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业的保护与可能的发展。由于东北也还只是一个半工业化半农业化的地区，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与全国又是结成一体的，而全国工业水平较东北尤低，为了有步骤地使东北达到工业化，并从而推进全国工业化的进程起见，我们除以最大的努力搞好公营工业之外，同时我们必须引导与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的积极性，但对于投机倒把的不正当的奸商及一切从经济上捣乱国家建设的行为，则应采取有效办法，予以限制与取缔，以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到各个方面去，贯彻到劳动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及工业政策上去。

我们要想正确地贯彻执行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犯错误，除了坚决而正确的贯彻党的政策外，还必须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因此我特别讲讲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时常说的，不要拿农村的不合时宜的一套旧作风来搞城市工作与工业建设，而要求建立适合于新情况新任务的新作风。那么，到底什么是过时的农村作风，甚么又是适合于全国规模

与城市工作、工业建设的新作风呢，概括起来有四点：

第一、过去是农村分散，相对自主，今天则是国家规模，集中统一。

过去我们长期在农村中间工作与生活，地区是分散的，而且由于战争的缘故，是被分割的，所以每个地区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但是现在环境变了，东北已经完全解放，同时全国即将全部解放，城市与乡村，此地与彼地，已经和正在结成一个整体，我们的任务已是要管理一个统一的国家，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完全需要集中，再那样分散自主就不行了，决不可从一地一时的局部出发仅仅从本地打算了，如果这样就是把全国分割，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了。比方在组织形式上，城市一切是集中的，城市的工作应集中于市，但是我们还依照农村的办法建立区街政权，把工作层层分散，这就等于把整个集中统一的城市分为无数块。

要管理好与建设好一个统一的人民国家，就必须贯彻集中统一的原则，严格作到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严格的讲求劳动效率，与负责精神，因此就必须有尝罚分明的，保护统一的严格遵行的法令、制度与纪律，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与整体观念，认真克服小生产者的个人主义思想与本位主义观点，在这问题上，党内有些干部认识仍是不深刻的，对加强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偏向的斗争还没有贯彻和认真深入到各方面去，最近东北所发生的一些干部渎职，贪污腐化，浪费国家财产等等事件，我们对这些事件还没有采取更严肃的态度，没有严格执行党纪与政府法令，还存在不适当的迁就干部的观点，结果是变成纵容和姑息，这样不但不能使我们的队伍整齐起来步调一致，集中力量克服困难，而且对人民国家的建设事业危害甚大。

第二、过去是环境单纯，要“一揽子”，现在则是情况复杂，要“弹钢琴”。

东北现在有乡村有城市，有农业也有工业，有毛驴也有铁路，有内地商业也有对外贸易，在阶级关系上朋友多了，内部、外部的情况复杂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多样性了。总之，情况复杂了，故不仅政策随之复杂，如经济政策要照顾四面八方，缺一不可，工作也随之复杂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不能象在农村那样，“一揽子”，一把抓，一个时期只搞一件事，其他可以放松，现在必须是要有重点的全面配合，象弹钢琴那样，十个指头轻重缓急协同动作，而不是一个指头弹。象一架复杂的机器一样，螺丝钉都要发挥其作用，这即是说，党政军民要认真建立各级委员会制，贯彻民主而又集中的组织原则，工作要求分工负责，有计划性，准确性，有坚强的组织，依靠组织去推动工作，解决问题，各尽职责，而不是依靠个人。要求有工作制度工作秩序，严格遵守，而不是终日忙碌毫无头绪。在这点上我们转变得还相当的差的。还是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因此，工作效率不能提高，计划性不够，准确性更谈不到，这就阻碍了我们工作应有的进展。

第三、过去的工作可以大刀阔斧，面的推广，现在的工作要求精雕细刻，钻研业务。

过去在农村中，环境简单，加以又是频繁的战争时期，情况变化快，因此我们的工作习惯于大刀阔斧，面的推广。这种大刀阔斧的作风，容易养成我们同志粗枝大叶的“差不多”的观点。今天的情况复杂了，任务繁重了，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工业建设工作，决不能满足于大概的估计与一般的领导，而需要钻研业务，需要有准确的计划，有

具体的领导，有细密的组织工作。当政策、计划确定之后，要保证它的实现与超过，就要靠严密地组织每一个执行过程，具体钻研执行当中所发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的总结经验推进工作。满足于差不多的一点点效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要提倡深思熟虑，深入具体的工作作风。要提倡自我批评与批评去深入研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反对自满自足、停顿不前的保守思想。

第四、过去习惯于供给制度不打算盘，现在要经济建设经济核算。

过去在农村与战争环境，生活与生产上习惯于供给制度不打算盘，做工作只求完成任务不讲花钱多少，现在要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必须实行经济核算。拿供给制度不打算盘的习惯去从事工业建设，便不去计算劳动力，不计算原材料使用，不算成本，结果生产上浪费很大，国家财产损失惊人。因此，一定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定额制。完成了生产任务，但浪费了劳动力浪费了国家的资本及原材料，那不算完成了任务。即拿个人生活来说，也要克服供给制产生的平均主义观点，坚持实行“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以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克服那种“干不干，一斤半”的观点。我们今天必须逐渐由供给制改变为工薪制。今天工薪制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来源还是以供给制的观点来处理工薪制，是从保证能养活几口人出发，而不是从“按劳取酬”发展生产的原则出发，这是错误的。

以上四点是我们在工作作风上要改变的主要方面。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与新的任务，不仅工作作风要改变，组织形式也要改变的，今天我们正准备重新确定编制，重新确定工作与生活制度，这不是从过去在农村中的精兵简政的观点出发的，也不是简单地照原有组织机构减少几个人，也不是单纯从节省财政开支出去。而最主要的是情况任务变化了，组织形式要与其适应，要随之改变。因此我们今天改变组织形式的整编原则，是根据下面两点出发：

一、工作重点由乡村转到城市，要求集中统一，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考虑组织形式，有的我们必须充实加强，有的我们必须改变，如现行城市组织机构就必须改变。如天津市将区街政府都取消了，而加强公安局、分局、派出所的工作，这一改变很值得供我们研究参考与学习，如工厂学校等仍然是机关化、军队化，而不是适合工厂与学校需要，均需改变。另外我们的任何组织机构决不要庞大，不要层次太多，不要人浮于事，以至变成官僚主义的机构与作风而不自觉。

二、今后由战争环境转入建设，现行组织形式及人员配备还是过去长期战争中形成并遗留下来的，是适合于战争要求而不适合于今天建设的要求，如农村区乡组织人员配备和分工，都是适合当时战争情况，现在，就应适合生产的要求及文化卫生建设的要求，重新加以适当的配备与分工。又如军队的机关组织形式，也是适合当时紧张战争需要而建设的，因此有庞大的后勤机关，现在是驻军环境，任务以训练为主，其次为警戒，便不需要有那样大的后勤机关。其他司政机关都要根据这一变化而作适当的改变。如过去战时常要行军作战，又处在交通不便的农村环境，因此勤杂人员配备很多，警卫员制度一天天发展，每个工厂机关学校均要警卫部队，现在情况变了，警卫人员就不需

要了，勤杂人员该大大减少了。许多警卫可以撤销而加强防奸工作以代之。诸如此类问题很多。过去的分散的农村的战时的组织形式及人员配备，已不适合于今日东北的情况要求。这不仅是减少闲杂人员，节省财政开支，而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必须改变。

东北党今后的任务是重大的，光荣的，又是艰苦的。恢复与发展东北的工业，是走向全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担负这一新的任务，但是我们还缺乏必要的经验与知识，因此我们要虚心学习，要进行思想上作风上的彻底转变，不能有任何骄傲自满或苟且偷安的情绪。要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我们的党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克服了各种严重的困难，学会了各种斗争形式，终于战胜了敌人，获得今日的辉煌胜利。我们相信，我们今后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虚心学习，真正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及二中全会的路线，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在经济建设中所遭逢到的任何困难，取得未来更大的胜利的。让我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中国万岁！

（原载1949年7月19日、20日《人民日报》）

总动员与总崩溃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四日）

新华社社论

七月四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丝毫没有令人惊异。蒋介石早已决心与全国人民为敌到底，背叛政协路线到底，把内战打到底，把任何和平妥协之门关到底，所有这些人民都早已知道了。所以美联社说：“这个命令的实际意义没有象征的意义那样多。”它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大的压迫。蒋介石既然正式宣布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为“共匪”，正式宣布任何和平运动为“法外之滋扰”，那么一切要求民主的人，要求和平的人，包括国民党内日见增多的倾向和平的人，就都可以公开的逮捕残杀了。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重的征兵、征粮、征税、派款、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破产和饥饿的灾难。蒋介石把这些灾难叫做“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因此说如果今日削弱了“国军”，就是动摇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它象征蒋介石将要进一步卖国，以获得美国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援助，蒋介石的发言人已经暗示南京将要接受“与希腊相同的财政、政治和军事的监督”。但是最重要的，它是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他却偏要大讲特讲，他企图用这个象征的总动员来挽救那个实际的总崩溃。但是让我们看吧，他究竟能不能够达到目的？

先看军事：蒋介石的军队在日本投降以后，在前年双十节国共协议和平以后，就已经开始总动员了。蒋介石十月十三日下了著名的“剿匪”密令，调动了一百多个旅（当时叫师）大举进攻解放区。去年一月停战协定以后，蒋介石一面违约在东北等地继续大打，一面违约继续调动了一百多个旅完成了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因此蒋介石在六月谈判中就提出五项荒谬要求，故意使谈判破裂，并在六月底七月初开始全面大打。他的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已经陆续增加到二百二十六个旅，这还不算总动员吗？但是结果如何？蒋介石曾经幻想用这个总动员在四个月内消灭解放军，但是在四个月以后，即在八月占承德、九月占淮阴、菏泽、十月占张家口、安东以后，不但他的幻想没有实现，而且他的攻势反因其兵力大量损失与不敷分配而开始衰落。他为了挽救颓势，改变战略，集中兵力于鲁南、陕北两点，今年二月占临沂，三月占延安，企图由东西两面首先驱逐解放军于黄河以北以东，以便逐步解决。但是他的目的仍旧达不到，不但在其他战场，而且在这两个战场蒋军也是连遭痛击，进退两难，从此以后军事的主动就转入解放军之手。解放军五、六两月在北线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攻，七月又在南

线开始了同样大规模的反攻，最后惊醒了蒋介石的一场春梦。蒋介石现在还能组织什么新的总动员？！从去年七月中旬的泰兴战役算到今年七月初旬的费县，郓城、定陶战役，一年之间，解放军已经歼灭蒋介石的正规军整营以上的兵力一百个旅（其中包括五十个整旅）。在今后的一年中，解放军一定能够继续歼灭蒋军一百个旅并争取超过。蒋军在过去一年，虽然抓了近一百万新兵，这次总动员令后又计划再抓一百万新兵；但是不断征收新兵的结果，不但促成了蒋管区的民变和游击战争，而且使蒋军愈战愈弱，愈易被解放军所大量俘虏并大量加入解放军。蒋介石还计划再从后方抽调一些正规军和地方军，但是这在实际上也只是便利了蒋管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对于广大的解放区战场却是无济于事的。这样，蒋介石还有什么办法避免总崩溃呢？

再看经济：随着军事的总动员，蒋介石的经济也早已总动员了。这就是总动员保甲长一年四季勒索农民的粮食，总动员印刷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印钞票。大家知道日本投降时曾经是蒋介石财政的黄金时代，那时他接连得了美国大量的装备运输剩余物资、救济物资和信用贷款，得了大量的敌伪物资，大量的新税收，此外他还积有历年投机所得的大量现金。但是就在那时蒋介石还是要继续征粮、继续通货膨胀，而且比抗战时期征得更急，膨胀得更快。到了今年，蒋介石的横财大部消耗了，战争却更加激烈，因此蒋介石的经济危机，就空前严重地爆发起来。今年二月初旬上海物价和金价突涨一倍，蒋介石二月十六日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冻结黄金、美钞；又在四月一日发行四亿美元债券，企图集中外汇，弥补预算；但是危机却继续严重化。四、五月间物价又连涨三倍。六月下旬物价再涨，上海白米每担突破五十万元，美钞突破五万元，加上败报频传外援不继，水灾、旱灾纷至沓来，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正在这时，蒋介石却在一片瓦砾场上宣布新的总动员，就是说要使米价、一般物价和通货数字象断线风筝似的飞入云霄，而使高攀不上的饥饿人民跌死在地上。以抗战前夜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一千八百倍，而这次总动员前夜的物价则约为六万倍。蒋介石的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夜是十四亿，日本投降前夜是五千亿，这次总动员前夜据最低估计已在十六万亿以上。那么所谓总动员，人民固然遭殃，就是对蒋介石说，除了造成蒋币的总崩溃以及蒋介石财政的总崩溃以外，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再看政治：蒋介石的真正的政治总动员，也是开始于日本投降以后。在前年的重庆谈判中，蒋介石就坚持不承认解放军和解放区，表示了破裂的决心，还在那时，蒋介石就称共产党为“匪”，就命令他的党徒狂呼“戡乱”，并为此制造了昆明血案。去年一月蒋介石勉强伪装承认政协决议，到了政协会后，反动的阴谋和暴行就仍然接踵而来。而去年三月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更使这个反动的形态达到完备。蒋介石在那个会上团结了反动派的力量，制定了一系列的推翻政协决议的计划，其中心则是伪造所谓国民大会和宪法，借以欺骗群众。依照四个月的军事计划，蒋介石在七月三日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并在占领张家口的十月十一日发出召集令，但是蒋介石的这个最大的赌博是失败了。他的所谓国大、所谓宪法、所谓多党政府，只是引起了群众的哄笑和厌恶。蒋介石的最后欺骗是所谓“政治解决”。多年以来，无论内战打得多凶，他总是不放弃宣传他的“政治解决”。直到一个多月以前的六月二日蒋介石的参政会，尽管通过了无数

的“剿匪”决议，还是全体一致请政府再度申明继续贯彻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之方针。但是，这个赌博又失败了，而且失败得最彻底！蒋介石对于他自己的参政会竟然不表示任何态度，就在七月四日来了一既响而且脆的大耳光，叫做“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显然地蒋介石这个所谓总动员，在政治上说来不是别的，乃是蒋介石的总破产，以及那些由政治解决起家而今成为内战舐血者的孙科、张群、青年党、民社党之流的总破产。蒋介石在他在总动员提案中，在他的极端冗长的七月六日演说中，都搜集了一切可能有的坏话来骂共产党，但是却不能说一句话来责备共产党破坏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停战协定和同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政协决议，也不能说一句话来吹嘘自己遵守了这个停战协定和这个政协决议，他只好根本不提这些事，好象这些东西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蒋介石政治上的这个总破产，当然使他在人民中间更加孤立。蒋介石亲自出来总动员，在四海之内竟动员不出几条汉子来附和，可怜！可怜！蒋、宋、孔、陈这些金融寡头在财富上是多么庞大的家族，但在政治上却是多么渺小的家族！问题是蒋介石为什么一定要放弃政治解决的最后欺骗，宁可自己孤立自己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统治已经太软弱了！去年三月国民党二中全会以来，反动派的团结和信心已因军事失败、经济困难、政治孤立而瓦解了。时移势易，政治解决这样的残脂剩粉，一方面已经骗不了几个普通老百姓；另一方面反而妨碍蒋介石在他的孤立而混乱的队伍中“集中意志”了。还在今年三月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就敲起警钟说：国民党必须一致信任他的领导，来对付该党生死存亡的关头。此后他虽然再三重复他的哀号，但是直到七月六日，据他看来，“我们的社会人士”却还是“是非不分，利害不辨”，“甚至对于自身祸福与永久利害亦茫然无知”，“正如古语所说：‘燕雀巢于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实际上复巢之下决无完卵”。所以他决心不顾一切而宣布总动员以求统一内部。一切依赖蒋介石的人们：注意呀！蒋介石的巢，是悬在危幕之下，随时都会总崩溃摔成一堆粪土呀！蒋介石巢中的卵随时都会总崩溃摔成一个稀烂呀！但是蒋介石把他同幕同巢的燕雀们召集起来以后，究竟怎样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卵呢？一哄而散吗？自投罗网吗？聚火自焚吗？他却没有答复，也不能够答复。然而蒋介石的总动员其实质正在于此。蒋介石说：他是巢于危幕之下，这确是一个不小的发现，虽然发现得太晚。因为他的幕后是站着美帝国主义，所以他向来都把他的危幕当着铁幕，倒行逆施有所恃而不恐。日本投降以来，蒋介石的每一次重要的反动，都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息息相关的。前年年底的内战是跟随着美国的所谓援助受降遣俘；去年上半年的内战是跟随着军调部美国代表对东北停战的怠工和马歇尔的援华建议；去年下半年的全面内战和召开国大是跟随着美国国务院的延长对华租借法案和继续军事援华法案以及让售太平洋剩余物资；今年上半年的驱逐中共代表和进占延安是跟随着马歇尔的撤退执行部和鼓励南京组织无共产党的所谓“联合政府”；最近的通缉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下令总动员是跟随着马歇尔的宣布供给一亿三千万发子弹解禁军火，考虑新的贷款和新的援华计划。但是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并不足以挽救蒋介石的崩溃。当蒋介石过去有力量实行真正的军事经济政治总动员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曾经给了他四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蒋介石的进攻仍然被击退。今天蒋介石快要总崩溃了，他只能实行象征的总动员了，那么即使美帝国主义再援助他几

十亿美元，又能有什么结果呢？！何况美国舆论已经在反对这种罪恶滔天的和证明无效的援助，而美帝国主义本身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总而言之，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这个公式连蒋介石集团也无法否认。七月七日上海的记者们问孙科："动员令下后，内战是否提前结束"？孙答："无法估计，除非上帝谁也不晓得。"真的，他们现在是只有依靠上帝了。蒋介石对于他自己所捏造的四平"大捷"，不也说是"上帝保佑"吗？让这一小群人民公敌快快儿见他们的上帝去吧！与他们相反，人民是完全有信心的，人民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这个方针见于共产党中央的七七时局口号，这个方针就是团结一切受压迫的人们成为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的一切进犯军，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民主的联合政府将给穷凶极恶的第一号杀人犯蒋介石以应得的处分，给人民一个无限光明的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全国总动员方案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

为拯救灾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出励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

政府自抗战胜利后，即积极进行复员，以期从事建设，与民苏息，虽一切措施未能尽如所期，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之行动，则始终秉持政治解决之方针，不惜委曲求全，多方容息，以求其实现。

乃共党自去年十月以来，始则拒绝政府颁布之停战令，继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又复拒绝政府派员赴延安商洽和平之建议，最近复由其宣传机关，对国民参政会之和平建议，断然予以拒绝。

政府方力谋整军，而共党则胁迫民众，大量扩充其叛国之武力。政府方力谋复员建设，而共匪则到处阻碍复员之进行，到处破坏我交通工矿之建设。政府方励图实现民建政治，准备行宪工作；而共匪则一面宣传民主，一面残虐人民，无所不用其极。

最近数月，共匪复在华北东北对我国军发动大规模之攻势，妨碍政府对领土主权之完全接收。其必须欲以武力颠复国家，已极彰著；而其煽动各地社会，扰乱治安秩序之盗匪暴行，亦日益明显。

共匪既公然揭开其武装全面之叛乱，实已自绝于国人，且早已以武装叛乱集团自居，而自外于政党之林，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其怙恶不悛，执迷不悟，一至于此，则政府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

尤其我北方受共匪蹂躏区域及接近匪区之同胞，水深火热，日甚一日。政府不能长

此贻误，坐视不救。而我全国同胞欲求得安居乐业之生活，亦非以全力铲除此复兴建国之最大障碍，实不足以捍卫国家基础，安定社会秩序，而策我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之安全。

况政府有巩固国家统一，保障民族生存之责任；若非从速戡平叛乱，则不仅宪政与民主无由实现，即国家之统一与安全亦已失其保障。故政府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必须全国军民集中意志，动员全国力量，一面加紧戡乱，一面积极建设，方能扫除民主宪政之障碍，达成和平建国之目的。

本此意旨，拟请国务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经济建设，刷新地方政治，发动人力物力，改善粮政役政，保持社会安全，救恤人民疾苦，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厉行消费节约，增进农工生产，提高官兵待遇等项，均交各主管机关妥拟方案，制颁法令，一体依法进行。至实施时，应如何防止法外之滋扰，并饬主管机关严切注意。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版）

〔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

第一条　本纲要依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如期实现宪政案及国家总动员法之规定，制定之。

第二条　实施宪政及各项有关宪政之选举，均应依照规定积极进行。

第三条　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第四条　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信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

第五条　各业劳资双方，应密切合作，如有争议，并应依法调解及仲裁，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第六条　为安定民生，政府对于日用品之交易价格、各业薪俸工资及物资流通、资金运用，金融业务，均得加以限制或管理。

第七条　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

第八条　对于收复匪区，应由各主管机关巩固治安，维持秩序，必要时施行贷款停征赋税，并办理各项社会救济及医药救护工作。

第九条　对于由匪区来归之人民，应由各主管机关妥为救助与安置。

第十条　对于粮食、燃料、纺织、冶炼及有特别需要之工矿制造事业，各主管机关均应特别指导辅助，其所需资金，如有短缺，应由国家银行予以贷款，使能积极推进，以裕供应，必要时得由政府对其成品加以管理。

第十一条　凡未被匪乱之区域，均应刷新地方政治，确保社会安宁，并就目前急需之生产运输及农田水利工程，择要建设以利民生。

第十二条　增加合理的税收，控制非必要之支出以适应戡乱之迫切需要。

第十三条　制定节约消费及增进效率办法，政府各机关与人民一致遵行。

第十四条　人民基本权利，均应切实尊重，妥为保障，除因动员戡乱所必需之各种法令，必须切实施行者外，任何法外侵扰行为，均应严行防制。

第十五条　关于本纲要之实施，有须另定详细规条者，由行政院各主管部会厘定办法，送由行政院核定，分别以命令公布施行。

第十六条　违反本纲要第三条至第七条，或依据各该条所定办法，应行制裁或限制之行为者，依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罚之。

公务人员于执行本纲要赋与之职权时，如有违法或失职之行为者，应依法严行惩处。

第十七条　除本纲要已有规定者外。为达成戡乱之目的，行政院得依国家总动员法之规定，随时发布必要之命令。

第十八条　本纲要经国务会议通过公布施行。

〔附〕美国妄图扭转蒋军颓势，派魏德迈来华的几个有关文件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

（一）杜鲁门给魏德迈的指令

（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

你应勿加耽搁即赴中国，目的为对中国目前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计。在你调察工作中，要与当地的美国外交和军事官员保持联系。在你和中国官员及负责领袖讨论中，要说明你的任务在调查事实；只有在中国政府对中国复兴之有效措施提出使人满意的证据后而且任何援助都要受美国政府代表监督的条件下，美国政府才能考虑对于复兴计划的援助。

在作估计时，希望你能摒去任何感觉以为有支持或推进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国官

方计划的现存义务。在提出你代表团的报告时，应尽可能简明叙述你对你所建议的援助的性质范围及会有什么后果的估计，和不给予援助时会有什么的后果。

当你在中国的任务完成后，要到朝鲜作一短行以便对该处情况作一估计，特别注意在朝鲜的经济援助计划及其与该国一般政治经济状况的关系。在去朝鲜之前，要和麦克阿瑟将军联络，看他是否希望你取道东京。

你可随带你认为对你任务的效率有必要的专家、顾问和助理。

（二）魏德迈在蒋中央政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税　收

近于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民是劳苦农民，他们的收获是有目可睹的，政府官吏不难估计农民所能纳与政府的数量，贪官污吏们往往向农民索取超过他们所能缴纳的数量，此终使农民离开土地，形成匪群。

与向农民征税相形比较之下，中国的商人与富户却以不正当及诡诈的方法逃避应向政府缴纳的正当捐税。普遍都知道中国各业行店都保有两套账簿，一套记明业务的真实情况，另一套记明捏造的账目，因而他们不缴纳所应当缴纳那样多的捐税。

军　事

我以为在战后的第一年中，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除尽或至少减至最低限度是可能的。这个可能性是根据这种假定而断定的，即中央政府将其军事力量调度得足以确保各工业地区，粮食产区，重要城市以及交通线的控制权，同时又假定中央政府能任命有高度效率、异常诚实的官吏为省主席、县长、市长以及政治经济各机构中的官员。假使能这样实行，就可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稳定，人民就不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与侵入，实际上还要坚强反抗共产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扩张得如此之快并获得在如此广大地区中差不多没有问题的控制权。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能用武力击败。今日中国正遭受一种外来思想的侵略，而非强大军事力量的侵略。我以为惟一可以战胜这种思想的方法是以另一种更符合人民意志获得人民支持的思想与之斗争。这就是说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及经济上要肃清贪污无能，以求得公正和平等，并保障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个人自由。要而言之，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的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忠心的、热烈的、至诚的拥护。据我看来，中央政府在共产党猛攻之下能否屹立或倒台，将决定于这种政治与经济状况改进的效率与时机。

在战争期间当我做蒋委员长的参谋长时，曾努力使所有中国军官认清重建军官与士兵间的良好关系之重要。我说明无论在战时或平时，军官必须对士兵的福利表示真挚的关心。受伤士兵应自战场撤回，由医院或救护站加以照顾。军官应在可能范围内到医院慰问。军官应当与士兵作篮球足球一类的游戏。低级军官应当知道其所领导的单位中每

个士兵的名字；他们应当与士兵交谈并鼓励士兵讨论他们的问题；向士兵讲解为什么他们要作战。讲解政府的目标并鼓励公开讨论。这样就造成军官与士兵间才能发生一种互敬挚爱的情感。通过畏惧执行纪律，不如通过感情与互敬来的有效。中国士兵是朴实的、和善的和勇敢的，若是领导和照顾得宜，他们将乐于受苦和冒险，中国军官极易获得他们的尊敬与崇仰。

征　兵

我已接获许多报告谓兵役的征募并未诚实而有效地施行。又如捐税一样，要农民担负最重，首当其冲。虽然在城市中有成千成万的壮丁按照兵役法规应当服役而不被征募。富人的儿子都出钱以逃避兵役；在国家危急之时很多富人的儿子正被送到外国留学，而不留在国内协助自己的国家。

军民之间的关系

我要强调在军民之间建立及维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陆空军的军官士兵们在与民众接触之时，都应该有礼貌的、友好的、合作与诚实的。我由许多材料知道中央政府军队初到满洲都被人民视作日本压迫的解放者而受到热烈的欢迎。今天，满洲人民与中央政府军队相处几个月之后，因为军官士兵的骄横粗暴，人民已有憎恨与不信任之感。他们任意偷窃掠夺；他们普遍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人民。在台湾亦有同样的情形，使台湾人民与中央政府离异。所有这些都是纪律问题。假如军官本身是欺诈的和无礼的，士兵自然不能独异。中央政府如果希望对抗共产党的战争获得胜利，则军民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起初，共产党军队虽也是残暴、破坏，同样招使人民痛恨，但在过去几个星期，他们采用一个完全新的作风，要求军官士兵在与民间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注意。诸位由此可以明了立刻进行改善军民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重要。

军事人员的升擢，应以功绩为唯一标准。年纪较大的军官或无能的军官应令其退休解职。退休的军官应认清他们必须为年轻的军官空出职位，他们应当爱国地、贤明地接受退休。在中国军队中，将官太多，其中大多数未受良好教育且对现代战斗不够熟悉。绝不宜用将官充任负有责任的文职例如省主席、市长和县长，国防部长或许是例外。军人不得属于一个特定的政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宪法生效后，应准许他们投票，换言之，即允许他们行使选举权，但任何军人不得担任政府职位或为一个政党的积极活动的党员。

政 府 组 织

我已详细地研究了政府的现行组织。我以为政府各部门的职权，自国民政府委员会以至中央各部内的各单位，亟需明确的划分。目前责任与职权迭床架屋，因而发生磨擦与无效能。在政府各部各局之内也需要一个彻底的调整计划。各处所用人员实在过多。调整计划可收节省人力及财力之效，同时我深信一定可提高行政效率。在研究你们政府组织时，我无法确定国民大会与立法院在制定法律上确切的权能，这是一例。政府各部各局的组织必须调整，职责必须明晰的规定。去年四月我发现军事委员会内有六十多个

部门其职能重复，权力互相抵触。在各单位或各部门之间没有协调配合。其实在军事委员会中有些单位所处理的事务全与国防事务无关。今天在国防部中我们已将六十多个部门集合于六个总部门之下，并减少约百分之五十的人员。实际有七万五千人以上已被淘汰。

贪　污

由各方听到关于政府中大小官吏以及普遍于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贪污行为的报告。由于螺旋式的通货膨胀，政府中文武官员的薪金全然不敷应用。我深信，那些现在施用不诚实方法的人，若不是因为他们所得的稀微报酬不足以应付最低生活，就决不会想出此下策。其中很多人并不是想发大财，只不过想有与他们地位相称的生活水准而已。在另一方面，某些豪富家族，他们之中有些亲戚在政府中占有高的地位，却是大量地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引用私人甚为普遍。根据我的调查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吏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假如诸君对各种大银行组织及其他新设的商业组织作一调查以确定这些组织已经赚了多少钱，这些钱已付给何人或何种人的集团，那是很有趣而且足以暴露真相的。减少贪污，必须建立一套生活水准的指数，文武官员的薪金必须随物价上升而增高。我要强调我确知很多爱国忘私的中国人在艰苦的情况下维持最低生活，他们是使中国增光的人，然而，他们若知道许多既已积成巨富的人仍利用中国目前不幸的局面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必大感沮丧。

国家财产及资源

我刚完成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旅行。我对那些地区的情形作了一番考察，也象刚在中国完成的一样。欧洲人民正患饥馑。他们以极有限的燃料保持温暖、维持电力一类的公用事业并供给用水。他们每日很难得到一千五百卡的热量，那是仅足维持一个健康人的活动的热量。在中国这里却有无限的资源、粮食、原料以及人力。组织与诚实有效的行政将大有助于你们问题的解决，这应当是很明显的。

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约近一千万人。当此危急之时，这些中国人许多都能在财政上帮助他们的祖国。在中国国内又有许多人在海外投有巨资。应该要求他们将所有的证券和资财作一全部的报告。据在美国的不过高的估计，他们可由这种财源中至少筹出一亿美元。从财政的意义上或从原料资源方面看，中国离破产阶段甚远。中国实际上是精神资源破了产。中国人民若真爱他们的国家并欲其强盛统一，他们就应当奋起，作任何牺牲，必要时生命也在牺牲之列。我应再一次的强调：作伟大牺牲的主要的是贫苦的人民和农民，而不起来拯救他们的国家主要的是富有阶级。

刑罚与秘密警察

我曾接到报告提到许多对政治犯或其他犯人错加或滥用刑罚的事实。在台湾有许多所谓政治犯，他们仍在狱中。并无任何控告或判决。有些只出笔巨款并依命签画犯了违反政府罪的供述就被释放了。事实上在他们心意之中他们并不感到犯了这种罪名。秘密警察遍地横行，正象在今日苏联和昔日德国一样。人民失踪，学生被捕入狱，没有审讯

也没有判决。这种性质的行动不能使政府获得人民支援，只得到相反的。人人在一种恐惧心情中生活着，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

中国经济的恢复振兴

国有制度应予停止发展。在台湾满洲及其他中国地区的日本公私财产已经由中央政府接收。这是非常正当的手续，但政府应当尽速将这些财产加以处理，交给私人或团体经营，借以鼓励自由企业。政府中的文武在职人员不得参与投机事业、银行业及商业，这应为长久规则。

结　论

政府不应对于批评感到烦恼。我想建设性的批评应当加以鼓励。这样可使人民感到他们是参与政府，成为政府中的一分子。我在前面提到了英国现有的可怕的经济情况。英国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在街头的聚会，在报章，及在无线电中都可自由地表示。我以为这是一种健全的情形。政府应该指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有缺陷，能做错事，然政府应当强调错误一经指出，必将采取有效的步骤来补救。政府应将有关支出及税收的消息，坦白发表，让全国人民知道，每个人，尤其是富户及大商业公司现在交付多少所得税。任何官吏或个人违法犯罪要公开宣布，并指出所定的处罚。政府个别活动的成绩或良好工作亦要依同一方式公开宣布。所有这些事情，将有助于人民方面对政府的信任。人民需要知道，也有权利知道现在进行什么。政府方面公开的正式公告也能阻止反政府者的恶意揣测和反宣传。

我知道我所讲的许多意见不合于中国的传统。但我细心地研究了孔子的哲学，我深信所有这些意见与孔子所讲述的品行的要义完全一致。我对大部分中国人民的贤明的判断和合礼的言行怀有信心。我诚恳地希望诸位能以我适才批评的同样精神来接受我的评论，就是同为着中国的利益的精神。任何事情凡有助于中国成为一个强盛快乐与繁荣的国家，我若能做到，我皆高兴去做。任何事情凡能维护中国的主权并保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一席受人尊重的地位，我若可做到，我皆高兴去做。

追 加 要 点

一、中国官场一般败坏的征象。

二、委员长干涉到政府各阶层。

三、微弱的行政院。

四、促进与蒋委员长的密切关系，俾使他能鼓励与接受批评。

（三）魏德迈关于蒋军军事情势及军事援助问题向杜鲁门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九月）

军 事 情 势

自从马歇尔将军离华后，中国国民政府的全面军事情势已见恶化。一九四 七 年 三

月，当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之后和政府开始全力攻击共产党时，国民党军参谋总长曾声称三个月内即可摧毁共军主力部队。正象以前类似性质的判断，他所说的从未实现。国共之间的战斗继续未断，主要的在满洲、河北和山东。

共军在满洲的作战，实际上已使该区国民党军在军事上陷于无能，而且必须采取迅速行动以阻止满洲变为一个苏联的仆从。共军作战继续地胜利可能使整个国民党军在满洲的地位难以保持，国民党军在满洲，现仅控有一狭条指形地带。现在，雨季已过去，中共似乎要向这条国民党军凸出地带的两侧展开攻势，同时，在别的省分里如河北、山东和热河，共军的游击活动和袭击也要加强，以便牵制国民党军其余的兵力，阻止国民党军在河北、山东诸省的游击活动，袭击与增兵，并截断国民党军重要的交通线。国民政府很少根据这种发展努力改进其地位。蒋委员长已指派一个能干的司令官陈诚将军统帅满洲的军队，但鉴于补给及能干的部属缺乏的严重继续下去，他能否整顿成一支强有力的统一的军队，是可怀疑的。

国民党军总数约有一百五十万战斗部队加上一百万后勤部队对抗不到百万的共军战斗部队及民军，支援他们的后勤部队数目不详。可惜对共军兵力比以往知道得更少，因为现时没有适当的外籍观察家同他们一起，中国方面关于共军的补给、装备、伤亡和兵力的情报，是完全不可靠和不确实的。

共军成功的基本军事理由是他保持了主动，以优越的兵力，攻击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地点，主要的任务就是破坏。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以防守为任务，被迫到只等于对零散区域和绵长的交通线作周边防御，如此分散的防御实难有侧翼策应和互相支援的机会，因此本可以用作攻势的兵力，反不能移动，共军的追击，很少遇到有力的抵抗，国民党军的退却总是过早的，所谓“战略的撤退”一语已完全失去意义。

蒋委员长从未放弃他是为国家的独立而与武装叛乱的军队作战的主张。他徒恃武力克服共产党的努力，虽已告失败，但仍然没有完全使他相信中国的共产党问题，能以武力以外的方法来解决。很不幸的，目前的方针，成了对共产主义逐渐扩张的一种鼓动。

蒋委员长修改他的现行方针是必要的，因为特别就所涉及的广大区域而言，仅凭使用国民政府所能预计用于战场和支援的兵力，甚至连同将来的外援在内而要将共产党全部平定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国民党区域内的人民愉快与满足，因而忠诚于国民政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应与改善目前军事情势的办法同时进行。

总之，中国的军事形势似已主要的由共产党支配着，他们在满洲、山东及河北获到军事上基本的成功，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打了就走的游击式部队轻捷与有效力，由于他们专以破坏为任务，而采用与国民党军专以防守为任务的相反的战略，由于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当局的措置失当与无能，由于国民党交通线的缩短，由于国民党陆空军装备和补给的普遍折耗及空竭，由于来自南方的军队与战区的行政当局的磨擦日益增加，并由于声名狼籍的国民党军与当地居民脱节，致使共产党获得胜利。

战略的重要性

任何苏联的势力范围与力量的更进一步地扩张，都有害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在战时

要是存在着一个不友好的中国，将使我们不能得到重要空军基地作为轰炸前站之用和不能沿亚洲海岸得有重要海军基地。中国如为苏联所控制，或者成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则将使许多不冻港和空军基地供作敌用。我们自己在日本、琉球与菲律宾的海空基地将受到比较短程足以消减实力的空中轰击。而且，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的工业与军事的发展可能使满洲全区多少能够自给自足。

反之，一个与美国友好或同盟的统一的中国，不但可供给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从它的幅员与人力来看，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虽然它的不良的交通和现代工业的缺乏，会使它的贡献不能立刻奏效。

在分析满洲和华北的战略重要性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两个地区在新生工业的形成上所起的任务，这种工业新生足以补充西伯利亚或中国的经济，在此经济中该二区的在制造武器与军火上，开发煤铁的资源上，以及开设兵工厂与机器工具厂都具有潜在力。从积极意义上，其重要在于中国需要这些地区，以补充它的经济，在消极意义上，其重要在于，这二地区不能为苏联所得。

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固然可以使苏联借扩大一个倾向并同情于苏联的政权而满足苏联的利益。但长期内战使政治与经济的混乱加深，而这种混乱的继续，也会产生一般相同的结果。这似乎很适合于苏联所采取牺牲中国而逐段向前扩张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产生苏联并吞唐努乌良海与外蒙古的结果。

中国的军事问题是与心理的、道德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因素错综相缠。在使国民政府得到军事的成功上来说，美国对于国民政府道义上的援助，其重要不下于物资的援助。但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时厉行改革。美国支持中国向联合国请求立刻采取行动，以促成战争的停止，可以作为一种先驱的步骤，进一步的阻止共产党在满洲建立政府。

军事的支援和协助

为了改进当前严重的军事情势，国民党军首先需要稳定前线，然后再取得主动。政府既以约占全国预算百分之七十的经费来支持内战，故又应设法缩小军事机关而使其更精锐与更有效率。

过去曾有一些不甚有效的重整指挥机构的措施，其他将来彻底的改革亦在计划之中，但欲求中国军队精锐尚需一个完善的装备计划和后勤补助的改良。中国现有的工业能力尚不足有效的支持现代军队，因此军火的外援（最迫切的是弹药）和技术的帮助在执行任何有成功希望的作战计划之前都是必要的。

美国对华有条件的军事援助的目的应为促成国民党的军队的改组，重行获得群众对军队的信任，确保国民党军能有效的抵抗共军的继续向国民党中国的进攻，并帮助中国建立稳定的局面。这种援助当适合于促成一个政权的出现，而该政权当沿着美国认为满意的方向发展，同时担任阻止黩武的共产主义逐渐伸张的作用。这样的一个对华军事援助计划必须是我们对特定国家军事援助的世界政策中整个的一部分。

在美国对国民政府作军事援助后，苏联对中共可能或明或暗地予以类似的援助——后一方法似乎更有可能。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可能增加，甚至和现在在欧洲和中东

区域一样。

对华军事的支援和协助主要的通过三种方式，或三种的方式同时采用：即物资的援助，顾问的援助或由美国人员直接参加作战，最后一种因有背于美国现行政策故不能采取。中国无论何种方式，中国应首先请求美国援助，并应将所采步骤通知联合国。

我们已考虑过中国人为改进军需物资情形，本身所能做的事。咸信他们无法自助，因为他们工业的能力根本不足，然而他们可以以受监督的物资援助为基础来完成一项详细预备的后勤计划来帮助自己，他们更可用以下的方法来自助：表明达到稳定军事线的真诚愿望，改良指挥，整编军队，将军队总数缩减到一个国民政府以可得到的外援所能支持的数目，并完成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拟议的物资援助计划包括：

完成白崇禧将军汽车零件计划

增购军需装备

弹药的补给

完成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计划和扩充军用航空运输

中国制图计划

船舶的让与

汽车零件供给计划——一万六千辆汽车，大部分是卡车，现因缺少零件而不能开动。如议定办法使中国人能依尽可能的有利条件购买这些零件，则完成此项计划可以大有利于中国的军队及运输制度。由于国民政府与美国外援物资清理委员会所订的合同，美国政府在道义上实有完成这一计划的义务。该合同应由剩余物资存货中供给所需要的零件。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单方面的废止这个合同，因为所需要的剩余物资存货无法得到，也没有供给该项物资的合法途径。

增购军需装备——将近二年前，三十九个师的装备计划完成以来，很少有过补给。因此在军备上匮乏之处很多，其影响不利于国民党的军事工作。应当为中国成立信用借款以便中国购买必需的军备，实行陆空军的受监督的重整计划。没有这种帮助，在战时和战后所买的美国装备因为缺乏补给零件，不能继续使用，现在或将很快的变成毫无价值的。

在许多情形下，依靠炮兵已经有一种困难了。炮兵常是最消耗后勤补给的，在流动情况下活动受到限制，并使国民党军过分的小心怕大炮被敌人俘获，可是，在少数场合中，大炮是很有用的，即当共军向国军阵地拚命作大规模的攻击或当他们力图守住阵地以抗国军的攻击时。在目前的运动战中、追击炮、自动武器与步枪对于两方都是最有价值的武器。

弹药的补给——在七月间，美国海军在青岛遗弃的三百三十五吨弹药，已为国民党军所获得。然而国民党军队继续抱怨缺乏各种型式和各种口径的弹药。倘不由外国补充，在最近将来缺乏的情形当更形严重。美国有帮助中国政府得到弹药的道义上的义务。

完成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计划和扩充军用航空运输——中国空军中现存的主要缺点为缺乏适合的后勤补助制度，缺乏适当的保养或供给制度，缺乏一个缴还的制度，

和缺乏供给及保养的设备。这一切的缺点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危急情形加上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计划的尚未完成的事实所形成。为补救这些缺点，中国空军需要为其第一、第二级队得到供应物资，各式飞机得到保养，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计划的得以全部完成，该计划内有勤务单位的配备，整个训练计划的配备（包括飞机的零件和训练的帮助），并对两个外加的空运大队（C—46）的初步运输装备。国民政府解决其军队的主要的后勤问题所作的任何切合实际的努力一定要充分的利用空运。因为许多区域中，空运是仅有的唯一的交通工具。

中国制图计划——由于在中国缺少可用的美国材料，所以这个依特别协定而进行的计划已将范围缩小，仅绘制台湾的地图，这样的一个计划在乎供给已经或可能卷入冲突的区域的最新式的战后地图。故对美国实有战略上的价值。这也可供给中国自己领土的最新地图，并因此对中国有军事上的帮助。现在的计划应当扩大包括其他战略上极重要的区域。

船舶的让与——海军部计划无代价的让与供给中国约一三七艘船舶及浮坞等，连同组织并保持一个海军所必需的计划、蓝图、文件和其他有关这些船舶的材料以及其他有关技术的材料。这些船只所用的修理、装备等费和任何物资的让与皆将由中华民国以现金偿还。这些船舶中的九十三只现在已依租借法案交予中国，并将依照海军租借协定规章（Naval Lease Agreement Charter）的规定予以收回，然后依第五一二号公法重行让予，该法授权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将九十七艘同型的船舶让与中国海关使用。但在海关计划中尚有几只船有待移交。依第五一二号公共法案的船只移交可作为援华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完成。

对日占领——中美之间有一协定，特定中国担负中国的占领军的后勤补给，但也承认中国需要美国予以一些外加的支援。直到今日，中国从未依这协定采取任何行动，将来似亦无意采取行动。这个协定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到期。

对中国军队的军事建议

国民党陆海空军现可通过参谋总部由美国陆海军军事顾问团获得参谋方面的军事建议。蒋委员长一再向本代表团团长表示，他深愿此种建议和监督的范围能扩大到包括野战部队、训练所、特别是后勤机构中去。

军事顾问团在现行的训令之下，除了帮助开办学校和对于处理船舶和飞机作有限的技术方面的顾问外，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级的组织中，他们是不准直接的协助行将参加内战的军队的实际训练工作的。

在美国“袖手旁观”政策已成为过去的基本假定下，关于我们现在军事顾问的任务仅留有两个选择或行动方向，即继续现有规模在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提建议，或者扩大这种建议的范围。如果采取后者，则有数种行动途径可资实行。

一个数目很大的从事战斗的军队，由于人员和配备的丧失和士气消沉已经失去他们的效能，现有很多个师应该撤退下来，重新整编和训练。顾问任务的范围尚可予以扩张，以便对于这种训练加以援助。

如果美国以任何方式牵入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战斗，它将受到严重的责难。虽然，上面所指的建议虽然对于战斗部队间接的提供意见，但这种建议应在作战区域以外进行之，以免受到批评，谓美国人员实际参与内战。

关于在美国和在中国训练技术专门人才的顾问仍应继续。此外不但美军顾问团，而且中国的实业家，对维持已受训练和正在受训练的专门人才的核心的保存也应加以考虑。

现在有两点应由美国的顾问人员加以考虑：第一、征兵应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富家或权势之门以及贫人的儿子都应在应征之内。现在的情形不是这样；第二、应当发展官兵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使其互相尊敬而成为同志。

结　　论

中国的军事情势是严重的，共军在满洲和华北操有战术上的主动。

国军在满洲的地位是艰危的，在山东和河北等省的地位很成问题。这种情势的继续恶化，可能在满洲成立一个苏联的仆从政府，最后并会产生一个共产党统治而有害于美国利益的中国政府。

在中国这种互相残杀的斗争的扩大，威胁着世界和平，应当采取积极步骤以立即制止战争。

苏联在远东的目的是反对与危害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逐渐扩张苏联的控制与势力范围。他们在中国的目的的实现足以威胁美国在战略上的安全，时间对苏联是有利的。

苏联达成它的目的的工作，正由中国共产党积极的予以协助，由中共的行动和宣传证明它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

唯一的重振中国人抵抗苏联的目的的有效基础是通过中国现有的贪污、反动和无效能的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无力支援它在战场上现有的这样大的军队。

为了防止国民政府为共军所击败，必须于特定的军事部门中，在美国顾问监督之下对国民政府予以充分和迅速的军事援助。

美国对华的军事援助应为道义的、物质的和意见方面的。这种援助应为我们对其他某些国家军事援助的世界政策的完整的一部分。中国应首先请求美国供给这种援助。

美国对中国陆海空军的军事援助，如有适当的监督，可对逐渐使远东稳定、减少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可能性有所贡献。

建　　议

兹建议于下：

为要防止满洲变为一个苏联的仆从，激励对共产党扩张的反抗，并对中国的稳定逐渐实现有所贡献，美国应尽早对中国予以道义的、意见的和物质的援助。

劝告中国请求联合国立即设法促使满洲战争停止，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如或不成，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置于托管制度之下。

劝告中国设法减缩全国预算中的军事费用，同时并增进军事部门的精干与效率。

中国应继续证明，迫切需要的军事改革正在进行。

中国依美国的建议和支援，提出并实行完善的装备计划和改进的后勤补给。

订立使中国能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和补给（特别是汽车的主要零件）的办法。

对中国获得弹药的努力立即予以协助。

迅速完成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计划，并考虑中国空运的扩展。

将中国制图计划的范围扩大到可行的范围。

船舶让与中国计划，应随着中国使用船舶之能力以同样速度来完成。

取消对日占领的计划但须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同意。

军事顾问和监督的范围加以扩大包括野战部队、训练所，尤其是后勤机构。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版）

〔附〕蒋介石杜鲁门往来信件两封

（一九四八年十月至十一月）

（一）蒋介石致杜鲁门的信

接奉阁下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复函，深以为感。

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距沪宁甚近之地区。如果我们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便将失去民主。我因此不得不向阁下再作直接与迫切之呼吁。

中国军事局势之一般恶化可以归因于若干因素，但其最基本原因是苏联政府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故。阁下无疑当能忆及中国政府系由于美国政府之善意劝告而签订该约。我几乎不必在此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如无苏联之继续援助，则不能占领满洲而成为如此之威胁。

我以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袭与侵入之民主共同防卫者之资格要求你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当此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

阁下如能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本政府当无任欣快之至。

目下局势有赖阁下之充分同情与迅速决定，倘承早日赐复，无任感荷。

蒋　介　石

（二）杜鲁门给蒋介石的信

蒋总统阁下：

接奉贵国大使顾维钧博士于十一月九日转来白宫惠函。

一如我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去信所称者，美国正尽一切可能以加速依援华计划采购在本国可以获得之武器与弹药，运往中国。我正再向主管人员强调阁下需要之迫切以及迅速行动之必要。关于此事，我刚得到报告，说有一船武器与弹药于十一月四日自关岛起运，其他一船则于十一月七日自日本起运赴华。我又得报告称，另一船弹药于十一月九日自美国西岸起程，约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中国。

国务卿十一月九日致司徒大使之文中有马歇尔国务卿对中国外交部部长要求军事援助与派遣高级美国军官赴华事之答复，该文似与阁下来信相左。国务卿授权司徒大使告知外交部部长，美国"全国军事机构"正尽力加速运输依援华法在本国所采购之军事物资。国务卿又授权司徒大使指出新任外国官员企图向中国政府就目前穷境所应采之行动路线提出意见实有若干本质上之困难，纵令该员通晓目前局势之各种复杂情形，亦是如此；至不熟悉中国情况之外国官员，其困难则更大。

但，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洞悉目前局势，可常备咨询。

阁下当已注意到，我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之公开声明，我在该声明中谓美国与中国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并力求援助被承认之中国政府维持和平。我又谓我不希望中国政府中有共产党参加。马歇尔国务卿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公开声明，共产党现在公开反叛中国政府，容纳共产党于政府内是一件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之问题，不应由美国政府命令。我相信这些声明与美国政府根据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援助中国政府之行动，已明白表示美国政府之态度。

阁下当了解美国政府在全世界支持和平民主运动之愿望。此种愿望使美国政府对许多国家促进健全经济与稳定之情况的努力给予援助，如无此种健全经济与稳定情况，则世界人民不能期望和平，而民主原则亦不能滋长。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为各种形式之援助实具有这种希望。我对中国政府与人民此时所面临之困难最表同情，并愿向阁下保证美国政府将继续尽力以实现援助中国之计划，此计划业经国会通过并得我之批准。

哈利·S·杜鲁门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版）

中共中央发言人斥杜鲁门援蒋咨文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今日痛斥杜鲁门十八日向美国国会要求批准以五亿七千万美元援助蒋介石匪帮的特别咨文，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是为了延长中国的内战，是美国帝国主义奴役东方人民、奴役世界人民、破坏世界和平的冒险的侵略计划的一部分。发言人说：美国的狼现在还要披上羊皮说什么“中国经济之继续衰落，美国实极关怀”，可是谁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大战以后给予蒋介石匪帮的任何一笔债款、物资、军火，包括这次杜鲁门所提出的五亿七千万美元在内，都是用来帮助蒋介石匪帮打内战的。熟悉中国情形的人都知道，只要蒋介石匪帮存在一天，它迟早总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帝国主义的撑腰与援助，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的日子会迟一些，其因内战失败而灭亡的日子亦会早一些。

发言人说：美国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匪帮的每一次援助，都是以蒋介石匪帮对中国的主权出卖为代价的，中国的神圣主权，在美国帝国主义者“援华”声中，一次又一次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攫取去了。此次五亿七千万美元的代价，已由蒋介石匪帮的大买办孔祥熙、俞大维、贝祖贻等与美国帝国主义者秘密商定，其中包括向美国开放中国的内河航行权，美国对华南的监督权和给美国商人以种种便利等。蒋介石匪帮如此无耻的把国家主权送给美国帝国主义，因为美国帝国主义给与蒋介石匪帮的所谓“经济援助”，所谓“剩余物资”，所谓“救济物资”等，实际上没有一件不是军事援助；美国帝国主义的所谓“经济援助”与“救济物资”，不仅使蒋介石匪帮能从美国方面得到飞机、大炮、各种武器、弹药与军用器材，并且可以用来向别国购买军火，例如去年蒋匪就曾向比利时购买弹药一百六十吨，其中一百十吨已于十月底由所谓“救济机关”的行总运到香港。美国军事人员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已经不限于台湾一地，而且在南京、沈阳、北平、徐州、西安、汉口、成都、重庆、韶关以至新疆；所有训练军队的机关，都有美国人员参加，训练蒋介石匪军使用新式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发言人进一步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野心，还不止于奴役中国人民，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匪帮正在狼狈为奸，拖延对日和约，恢复日本军事工业，扶植日、韩法西斯势力，以便从新扶起日本帮助美国帝国主义，并奴役东方十万万人民，并在美国帝国主义者于遥远的将来发动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轿夫。所有这些，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杜鲁门的所谓“建立全世界公正持久之和平环境”的真实内容。为要实现此种帝国主义的狂妄

计划，华尔街的独占资本家们残酷地剥削美国人民，拿美国人民的血汗来作新的冒险的投资。发言人说：虽然如此，可是人们不要误认杜鲁门、蒋介石及东方一切美国傀儡们的互相合作，多少亿元的援蒋计划，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这些合作与援助当然有一点作用，这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现在世界形势已变到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时间之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业已混乱不堪，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四十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一百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四百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那么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发言人说：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作垂死挣扎的，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方能最后战胜他们。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发言人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与全中国人民，肃清自己队伍里任何惧怕美国帝国主义的懦弱无能的思想，加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一切其他爱国分子的团结，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继续向蒋介石匪帮展开革命的进攻，把蒋介石匪帮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

〔附〕美帝援蒋初步统计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

美帝一九四八年援蒋方案提出之后，美国务院为了证明美国对于蒋介石反人民内战的“军事援助较一般所了解的多得多”（马歇尔语），又连续公布了两笔实行已久的对蒋家匪帮的秘密军事援助，即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八日美政府所批准的“八又三分之一队空军计划”和对日战争结束后至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秘密“防务援助”七亿七千七百六十三万余美元。这两笔秘密援助，恰恰是马歇尔在华“调处”期中开始和继续进行的。马歇尔现在已经供认他在华的真正工作，就是帮助蒋介石准备发动屠杀中国人民的大内

战。他除接二连三地帮助蒋介石以大批军需武器之外，并“曾不断向中国（蒋匪）政府提供意见，如何改善其内战兵力”。这就彻底揭穿了他去年一月“离华声明”所谈“本人在华谈判以便促进中国和平与民主”的无耻谎言。

自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帝为鼓励卖国贼蒋介石进行屠杀中国人民的内战和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所给予蒋家匪帮的贷款及物资援助，据现有材料统计，已达四十六亿四千零四十九万八千二百廿三美元。抗战期中援助则为十五亿六千七百八十万美元；此项援助，事实上绝大部份亦被蒋匪保留作抗战后发动内战的资本。两项合计则为六十二亿零八百廿九万八千二百廿三美元。详细项目如下：

抗战中：

甲、贷款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桐油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

（二）一九四零年三月七日滇锡贷款二千万美元。

（三）一九四零年九月廿五日钨砂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

（四）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一日信用贷款五千万美元。

（五）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一日平准基金贷款五千万美元。

（六）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财政贷款五亿美元。

（以上六项系据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美国务院“援华报告书”。）

（七）一九三九年三月信用贷款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

（八）一九三九年三月飞机公司贷款一千五百万美元。

（后两项系据一九四一年“财政评论”五卷四期贾士毅文载，材料来源系国民党财政部。）

以上八项贷款，合计六亿九千七百八十万美元，其中（一）、（二）、（三）及（七）、（八）五项，据知至一九四×年底，蒋匪政府已以中国战略物资锡、钨、锑等偿清。一九四零年之信用贷款五千万美元，据上月廿日蒋匪驻美大使馆宣布，亦已以上项战略物资偿清。

乙、物资

租借物资一项计八亿七千万美元（据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

此系一九四二年六月“中（蒋）美互助协定”所规定，原数为十五亿六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八亿七千万美元系抗战结束前商定，有一部份实际至抗战后始交蒋政府，而其余部份则完全系抗战后交蒋政府者，故应算入抗战后美援部份内。

以上贷款及物资，合计共为十五亿六千七百八十万美元。

马歇尔二月廿日在美国会关于一九四八年援蒋方案报告中，将抗战中援蒋数字列为十四亿六千九百四十万美元，系不包括一九四七年底前已偿付之五项贷款九千七百八十万元在内，如把该部份除去，即为十四亿七千万元，与马歇尔数字大致相合。

以上援蒋项目中，第一、抗战结束时及结束后交付之租借物资，绝大部份系被留作抗战后内战中使用；第二、财政贷款五亿美元中，一亿五千五百万美元是抗战后动用的（据本年一月二十五日美联社引证美官方材料披露）；第三、财政贷款中，已动用部份

及平准基金贷款等，系被当作外汇基金，保留抗战后继续使用。因此，抗战中美援蒋贷款及物资绝大部份皆成为蒋匪抗战后发动内战的资本。

抗战结束后：

甲、贷款

（一）历次棉花贷款共六千七百万美元。

（二）一九四六年五月改进海港贷款一千五百万美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柯克在青岛记者招待会上披露——美联社）。

（三）一九四七年四月船只贷款一千六百五十万美元（美航务委员会上月廿四日宣布）。

（四）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七日蒋美"救济协定"规定，给蒋救济贷款二千七百七十万美元。

（五）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会通过"临时援助"一千八百万美元。

以上五项合计一亿四千四百廿万美元。

乙、物资

（一）租借物资六亿九千四百万美元（据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美商务部"国外商务周刊"载，即一九四二年租借物资总额抗战中未商定部份）。

（二）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让售太平洋剩余物资成本八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售价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同上美商务部数字）。

（三）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八日"八又三分之一队空军计划"飞机装备成本及训练费用，共计三亿零七百七十五万美元（美国务院上月二十七日宣露）。

（四）抗战结束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秘密"防务援助"七亿七千七百六十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二美元（上月廿八日美国务院公布——×日中央社华盛顿英文电讯）。

（五）赠予海军舰只二百七十一艘，及美军在华剩余军火出售，合计价约八亿美元（上月廿五日美国务院公布之估计数字——美联社该日华府讯）。

（六）美军在华固定设备转让八千四百万美元（据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美国务院"公报"）。

（七）印缅战场剩余物资五亿美元（据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七日纽约时报载，该报称：当时包括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和七百架飞机已交蒋政府完讫）。

（八）一九四七年六月廿七日一亿三千万发子弹减价五百九十万九千九百三十一美元（原价六，五六六，五八九美元，售价六五六，六五八美元）。

（九）联总救济物资美国部份四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全部救济物资为六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美商务部数字）。

（十）联总结束后，赠予蒋匪善后救济经费五百万美元（其中绝大部份为美国赠款）。

以上十项合计，四十四亿九千六百二十九万八千二百廿三美元。

（附注）（一）太平洋剩余物资，杜鲁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对华政策声明中说明，系用以抵偿战时美军在华费用债务者，其中且有二千万美元移作美国对华教育基金。

（二）美军顾问团训练蒋匪援助尚未计算在内。

以上战后贷款及物资两项，合计为四十六亿四千零四十九万八千二百廿三美元。

马歇尔上月二十日在美国会报告中将战后援蒋数字列为十四亿零九百万美元，该数字系未将印缅剩余物资、太平洋剩余物资、二七一艘舰只、联总赠予战后经费五百万美元四项及美国务院最近始宣露之空军援助及防务援助两项秘密援助包括在内；救济物资项则只算美国部份，如此，则合计为 十 四 亿一千三百一十万九千九百三十一美元，与马歇尔数字接近。

按以上抗战中及抗战结束后各项数字合计，则自抗战以来，美援蒋总数即为六十二亿零八百二十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

美帝在其战后扩张侵略总计划下，对世界各国反动派所作援助总额，据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美商务部公布：共为二百亿美元左右（包括贷款、赠予、私人捐款、美捐助世界银行及货币基金等）；据当时美联社华盛顿讯："且其中很大一部份（如货币基金等）尚未动作。"因此，美帝对蒋内战援助，至少占其总数五分之一以上。例如美帝以联总名义援助外国反动派的二十七亿美元中，蒋匪即获得四亿八千五百万，占六分之一以上；战后租借物资贷款总数十二亿五千万中，蒋匪即占六亿九千四百万，达 一 半 以上。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已使用了最大的力量，但其结果，却仍然只是美国走狗蒋介石反革命内战计划的全部破产，并使蒋家匪帮日益接近最后死亡。

（新华社陕北1948年3月15日电）

〔附〕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军事援蒋举要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军事援符的类目和总值

（单位：百万美元）

军事援助	赠与	信贷	售卖美国政府剩余物资 原购价	美国收回款额 初次付款	美国收回款额 最终付款
（1）租借(六亿九千四百五十万美元)	五一三·七	一八一			
（2）根据中美合作所协定的军事援助	一七·七				
（3）售卖华西美军剩余物资		二〇	①	②	二〇
（4）华北美海军陆战队放弃及移让的军火（六千五百余吨）	③				
（5）移让美海军船只（根据第五一二号公法）	一四一·三	④			
（6）售卖剩余军事装备（装运总数）			一〇二	六·七	六·七
（7）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案的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赠与	一二五				
军事援助总值	七九七·七	二〇一	一〇二	六·七	二六·七

①原购价无从稽考。
②首次付款并入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整卖协定中计算。
③价值未曾估计。
④按原购价计算。

租　　借

租借法案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系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满期，但为继续援助国民政府起见，对于中国的租借，又经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军事援助协定在偿还基础上予以延长。

截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为止，据美国政府各有关机构向财政部报告，自对日战争胜利以来，根据租借法案移让的物资总值计达七亿八千一百万美元。其中，根据租借“油管”协定第三节第三项信贷条件运华的物资，计五千零三十万元，原先租借中国嗣后根据第五一二号公法移让该国的美国海军船只，约值三千六百万元（另见下文）。上述七亿八千一百万元总数，除此两项外，尚有六亿九千四百七十万元，其中一亿八千一

百万元需要偿还，关于此款的清理，双方仍在商谈中。

对日战争胜利以后对华租借援助的主要类目如下：

类目	金额
兵器和工兵物资	一一七，八六九，〇七六.九四元
飞机及航空物资	四三，六八三，六〇四.六三元
坦克及其他车辆	九六，〇〇九，六一〇.〇八元
船只和其他水上交通工具	四九，九四〇，六四二.五七元
多种军用装备	九九，七六二，六一一·七一元
各种便利和装备	三六，一九八·七四元
农业、工业和其他商品	三七，九一八，九二八·二一元
国防用具检验修理费	二，三三八·八八元
各种服务和垫支费用	三三五，八一七，九一〇·五六元
总　　计	七八一，〇四〇，九二二·三二元

上述物资就吨数而言，足以完成装备中国三十九个师的战时方案——在对日作战胜利时约已完成50%——并且包括为装备中国空军八又三分之一大队所需飞机九百三十六架，及其他装备的绝大部分。

此外，根据租借法案移让的物资中，尚有数以千计的军用汽车，这批车辆对于政府军队的机动性具有重大的作用。在对日战争胜利时，国民政府在拥有作战装备的军队数量上，对共产党已占压倒的优势，据保守的估计，双方在这方面的力量约为五与一之比。而且，中国境内一切的重要武器，实际上都在政府军队的掌握中。国民政府当时在人数和武器上所占的优势，足以说明美国援助输送军队到华北地区并供给运输器材的重要性。这种援助如加适当利用，足使国民政府发挥其优势兵力。

中美合作所协定

依照中美合作所协定（简称SACO）移让的军用物资，主要是美国海军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起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止所给中国的军火。这种移让系根据战时的协定，即美军以装备交换中国政府所供给的某些服务。移让物资的详细分类见附件一第一部分。

售卖华西美军物资

美军撤离华西时，曾将种类繁多的军事物资售予中国政府，作价美金二千五百万元，另加华币五十一亿六千万元。首次付款华币五十一亿六千万元及美金五百万元，以美国所欠中国的债务抵销。（首次付款中的美金五百万元并入美国依照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售卖剩余物资协定所收回的价款合计）尚余美金二千万元，双方同意在一定时期内分还，偿还条件仍待商定。

美国海军陆战队放弃的军火

一九四七年四月至九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华北时，放弃或移让中国政府的弹

药，共约六千五百吨。其中，包括各种步兵枪弹、炮弹、掷弹、地雷、炸弹和其他爆发物。附件一第二部分②对于此次移让物资的总值未作估计，只有关于同时移让而归入“租借”账的若干海军军火的数字。

美国海军船只的移让

第七十九届国会通过的第五一二号公法，授权总统按他决定的条件，将二百七十一艘海军船只移让中国政府。关于这一法案的实施，中美两国政府曾经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签定协定，全文已由国务院公布（见条约及其他国际法规汇编第一六九一号）。截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为止，根据第五一二号公法，在赠与基础上移让中国海军的船只，共一百三十一艘，其原购价计一亿四千一百三十万美元。其中，约三千万美元代表在根据上述公法移让以前原已租借中国的船只之价值。

移让的海军船只包括护航驱逐舰、巡逻舰、登陆艇及其他许多类型的舰艇，事前经过中美海军人员开会选择，以求适合中国海军的需要。根据第五一二号公法移让的一百三十一艘船只中，九十一艘原经租借各国，均有完整的战斗装备。其余若干船只亦有战斗装备。这些船只所需弹药，从美军于一九四七年夏间在华北移让的六千五百吨弹药中已获接济，又于一九四八年秋间，在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赠与项下，继续供给。移让船只清册③和第五一二号公法以及施行该公法的行政命令全文，均见附件一第三部分。

售卖剩余军事装备

租借法案满期后，美国仍用移让剩余物资方式，继续以军事装备接济中国政府，所索价款仅及原价的一小部分。以下为装运中国剩余军事物资的简表。

物　资　及　物　资　来　源	原　购　价	售　卖　价
（1）七点九二弹药一亿三千万发（依照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订立合同由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经售）	6,564,992.58元	656,499.27元
（2）C四六飞机一五〇架（依照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订立合同由战时资产管理总署经售）	34,800,000.00元	750,000.00元
（3）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继续经售：		
三〇——一五五口径榴弹炮炮弹	21,707,536.10元	569,701.80元
空军物资及装备，包括飞机一七八架和引擎六八三具	36,637,064.31元	4,454,105.06元
兵工、通讯及其他军事装备（九千余吨）	2,263,897.17元	282,987.17元
总　　计	101,973,490.16元	6,712,663.30元

② 同上书（二）。
③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附件一七一号。

装运中国的军用剩余物资中，一部分代价已经中国政府在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案批准的一亿二千五百万元赠与项下拨还。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自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所经售物资的详细分类，见附件一第四部分。①

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赠与

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案第四〇四节第二项（即援外法案第四章）授权拨给总统以不超过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之数，用赠与方式作为对华额外援助，其赠与条件由总统决定。

从国会关于上述援华法案第四〇四节第二项的辩论记录中，我们可明白看出此项赠与应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用途，虽然当时亦能料想中国政府将以之购买军用装备。同样明显，此款既由中国政府选择用途，其责任亦应由中国政府自己担负。依照总统决定的条件，中国政府于购买物品或取得服务时，须向国务院申请拨款支付，并随附证明文件。此项条件并且规定“国务院对于中国政府所提出单据将予审核，以确定所请数额并未超过账单或其他证明文件的总数，然后授权财政部对中国政府作适当的支付”。关于此款用途，其主动完全操诸中国政府，除了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外，美国政府不作任何支付。

国务院虽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将总统决定的条件转知中国大使（照会日期系六月二十八日），并准该大使七月一日复称中国方面同意接受，但直到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政府才提出第一次拨款请求。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从此项赠与中动用约一千万元，支付同年春末夏初所购买的军用物资。

为协助中国政府购买所需物资起见，国务院并采取主动，拟定一种程序，授权美国政府各部门或机关，从其库存物资中供给中国各种装备，或代中国政府采购，在对华赠与项下支付。此项程序，在关于对华赠与的法案中，并无明文规定，系经总统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颁发指示，付诸实行。②

对华赠与大部分已经华方用为购买军用性质的物资。截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为止，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拨款已经财政部全部支出，或直接支付中国政府，或支付该国政府所委托采购的下列美国政府机构。

采购机关	项　目	支付款项（美元）
陆军部	兵器、弹药、医药用品、汽车零件等	64,595,178.25
海军部	海军船只、装修船只、弹药	6,892,020.00
空军部	各种空军装备和航空汽油	7,750,000.00
联邦供应局	石油产品、兵工原料	13,765,522.12
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	剩余飞机、飞机零件、弹药等	2,690,910.88③

① 见“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附件一七一号。

② 一九四八年援华法案第四〇四节第二项全文，以及关于此项赠与总统发给政府各机关的指示，各机关间的来往文件，暨国务院与中国使馆所交换牒文等抄件，均见“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附件一七一号第四节。

③ 在此数类以外，中国政府曾经直接付给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一，〇四五，六九三·八〇美元。此款系从财政部支付中国政府的二九，三〇六，三六八·七五美元中拨付。

中华民国政府	直接自厂商采购的各种器材	29,306,368.75
合　计		125,000,000.00

由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赠与项下支付的首批运华重要军用物资，系重约一万吨的步兵枪弹和炮弹，分装两船，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和十六日由檀香山分别起运。经售机关系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只按原购价的一小部分售予中国政府。另有五十一架全副作战装备的战斗机，亦由同一机构售予中国政府，并在上述赠与项下支付，于一九四八年九月间完成交货。此外，尚有航空汽油、飞机零件及通讯器材等，亦于上述时期运往中国。

在上述赠与之下，华方最重要的购置，系委托陆军部办理，所购物资足供七个军和三个师的装备。国务院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收到华方拨款请求，并于同年十月一日授权财政部支付。在步兵轻火器和步兵枪弹供应方面，中国政府的请求，曾被列在美国陆军本身需要之先。中国此次购运的第一批军用物资已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抵达中国。嗣后继续装运的大批物资，亦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在这一天中共有两批）先后抵达中国口岸。此外，另有这次征购的和随后补充的物资，亦由陆军部供给，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运抵中国。先后计有海军船只四艘，满载物资免费运华。以下为中国请求物资数量，以及按照最近统计的交货实数。

项　目	请求数量	交货实数
三〇口径美式步枪	124,383枝	132,851枝
三〇口径卜郎宁自动步枪	8,104枝	8,793枝
三〇口径重机枪	1,566枝	1,707枝
四五口径轻机枪	8,920枝	12,975枝
火箭发射器	1,134个	1,196个
掷弹筒	5,592个	5,758个
三〇口径弹药	291,104,500发	231,221,082发
四五口径弹药	26,760,000发	26,577,498发
火箭弹药	90,720发	66,380发
掷　弹	559,200个	280,560个

如上所载，某些项目的供给实数，超过原先请求的数量，这是因为在中美军事人员的会商中，中国代表又将数量增加。中国政府请求供给迫击炮、迫击炮弹和其他炮弹，大部分均未获实现，因拨给陆军部的项款不足购买此项军火。关于使用赠款的决定权，完全操诸中国政府。假使中国政府认为必要，尽可暂停购买其他较少直接军用价值的物资，如兵工厂所需原料等，将款项转拨陆军部，为装备七军三师计划而继续购置。此外，并须说明，一九四八年从太平洋各处运华的剩余弹药中，已有大量的迫击炮炮弹和其他炮弹。

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实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方案时，所采用的作价方式，亦同样适用于中国在一亿二千五百万元赠与项下的一切购置。但中国请求的大多数物资，并非剩余物资，而于供给中国后陆军部仍须补充。因此，系按补充价格售予中国。

上述第一批军火运抵中国之际，驻在上海美军并将价值约五千万美元的步兵轻火器及弹药放弃由中国政府无代价接收。

附件第一七一号第十五节载有下列各项简表：

（1）拨款用途简表（中国大使馆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

（2）对华赠与项下逐月购运报告（一九四九年的月报系由中国大使馆编制）；

（3）美国政府机关及中国采购机关关于装运大批物资的报告；

（4）陆军部关于援华方案的报告。

由于华北华中军事情况的急剧恶化，装运中国本部的物资有落入共产党手中之虞。因此，中国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请求将对华赠与项下所购物资改运台湾。根据这一请求，是后所有运华物资一概改运台湾。一九四九年二月底，中国代理总统请求在行政院改组以前暂停运输。嗣后，又照中国代理总统的请求，于三月下旬恢复装运。

（二）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移让和售予蒋政权的弹药与物资

同日（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国务院通知中国代表，同意从剩余物资中，售给中国七·九二步枪子弹一亿三千万发，并同意批准出口申请书，准许若干运输机和一切装备零件运往中国。这些装备零件的种类包括以前为了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方案所移让的作战装备在内。

随后，中国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以美金六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九元二角七分之代价，即原购价十分之一，购得上述步枪子弹一亿三千万发，于同年七月十四日和八月十一日，先后由西雅图装运出口。

一九四七年七月间，中国方面表示希望购买C—47飞机四十三架，并欲将此项购买作为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方案的一部分。但因这一方案中的C—47飞机的定额，美国已经全部供给，所以答复中国方面，关于运输机的供给可按通常购买剩余物资途径办理。中国政府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与战时资产管理总署签订合同，购买C—46飞机一百五十架，每架五千美元，原购价则系二十三万二千美元。

中美两方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签订合同，将太平洋区域内的民用性质的剩余物资售让中国，以应八又三分之一大队方案的需要。每值一元的物资仅作一角二分半计算。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政府又与厂商签订合同订购五〇口径弹药六百五十万发。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美方通知中国政府尚有剩余弹药、爆发物及战斗物资等（包括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方案所需的战斗机）可供售让。一九四八年三、四两月间陆军部曾将夏威夷和太平洋区域内的剩余弹药数量及种类通知国务院，转告中国政府。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与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进行商谈，并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签订合同，以名义上的代价购买马利亚纳群岛上一切剩余弹药，每值一元仅作一分计算。随后，中国政府又经过商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另订合同购买美国境内（包括夏威夷在

内）一切适合于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方案的剩余物资（战斗机除外），每值一元作价一角七分半。关于战斗机的售让另案办理（上述合同曾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加以修正）。

关于上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合同，双方又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增订合同，将太平洋区域内适合于八又三分之一空军大队方案的剩余战斗装备售给中国。弹药部分以名义上的代价出售，每值一元，只作一分计算。

中美两方又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及六月十一日，先后签订合同，将夏威夷岛上的剩余弹药售给中国。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双方续订合同，又将太平洋各处的剩余弹药而未经包括在以前所签订的合同范围内者，售予中国。此次合同所涉及的剩余弹药大部分储藏在大琉球岛上。

（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

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

（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三日）

新华社社论

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一年所追逐的最后一出戏，已经演过了。从三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一日，他在南京召集了一群喽罗和傀儡开了所谓“国民大会”，由这个大会“选举”了他当“总统”。但是这出戏是演得这样难堪，以致人们不知他们是在作喜事，还是在出丧。所有蒋管区一切中外报纸刊物和通讯社，包括国民党各派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在内，毫无例外地每日不停地宣扬和嘲笑着“国大”的各种丑闻。“国大”的内部充满了分崩离析，充满了混乱和绝望，甚至蒋介石也责备他的“国大代表”不堪为“宪政模范”，而“国大代表”也反责蒋介石的报告隐瞒了战争的真相。他们互相辱骂殴打，同时又一致地反对人民，作出这种或那种反对人民的决议。但这正如一个外国记者所说：“代表们发出壮言豪语，犹如受惊吓的孩童走过坟场时吹口哨一样。”他们在人民民主革命高潮面前，是如此惊慌和绝望地来使蒋介石粉墨登场的。难道不是吗，连蒋介石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者，不也在盘算着使蒋介石当选为大总统后，在某种时机就下野出洋吗？

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开所谓“国大”，当所谓“总统”，完全不加注意。人民所注意的，只是怎样迅速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区的人民，正在积极发展着胜利的人民解放战争，仅仅在“国大”期间，就解放了延安、洛阳、潍县等五十多座城市。蒋管区的人民，正在继续着反饥饿、反压迫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从“国大”开幕时起，就以北平为起点，开始了新的高涨，而到了蒋介石被“选”为“总统”以后的五月四日，上海的学生就以当众焚毁美国侵略者和中国独裁者的画象作为“庆祝”。可以肯定地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就要把这个“行宪政府”及其制造者送进他们自己掘好的坟墓中去的。

蒋介石为什么落到这种下场呢？这就是因为蒋介石是中国最腐败反动的封建买办集团的代表，这个集团坚决地执行着卖国、内战和独裁的反对人民的政策，坚决地执行着反对人民先锋队——共产党的政策。早在三年以前，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就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提出了警告说：“任何政府，如果把共产党排斥到门外，那是一件好事也做不成的，这就是中国进到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八年抗战，虽然国民党政府直到今天，因为有一个日本侵略者站在面前，还没有向共产党公开宣布全面战争，还只用局部战争、特务镇压、封锁、诬蔑、准备内战及不许组织联合政府等方法排斥共产党，但是它已经给自己造成了这样的形势：越排斥共产党，就越走

下坡路。如果今后还要排斥下去，那就是准备将下坡路走到底。”蒋介石集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由于人民和共产党的督促，曾经召开和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并因此而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引起中国人民对它的最后一次希望。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了这只是一场欺骗，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了分裂的独裁的伪“国大”。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幻想美国的援助可以使他为所欲为，但是任何数目的美元和飞机大炮，终于没有能够改变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的预言——越排斥共产党，就越走下坡路。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排斥共产党，单独发出“国大”召集令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人民中把自己孤立起来，而走了下坡路。然而他当时还迷惑于暂时的军事进展，还幻想着他前面的良辰美景。但仅仅隔了一月，当他实行召开所谓“制宪国大”的时候，他的短促的好梦就完全破碎了。到了这一次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当所谓“大总统”，宣布他所统治的中国为“行宪国家”的时候，就已经是他的统治走向灭亡的时候。蒋介石就是这样把下坡路走到底的。这就是这次南京丑戏中一切混乱和绝望的总根源。

反动的统治阶级，当着自己的统治受到人民反对并发生危机时，常常撤换他们已经丧失威信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而用反动面貌尚未完全暴露的或在人民中尚保有某些幻想的代表人物去代替，以便缓和人民的反对，麻痹人民的警惕性，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蒋介石所代表的统治阶级今天眼看着自己的统治已走向灭亡，他们也极想这样办，企图找一个“适当的”人物去代替那人人痛恨的蒋介石进行统治。这就是胡适曾经被提出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和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的原因。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国内某些反动报纸竭力吹嘘胡适和李宗仁的原因。就反动统治阶级来说，今天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反动面貌尚未完全暴露或在人民中尚保有某些幻想的人物，去代替蒋介石进行统治，那确是一种较为狡猾的对反动统治阶级较为有利的做法，但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竟是腐败和绝望到这种地步，他们硬是找不到一个比较“适当的”人物去代替蒋介石，结果还是不能不拿出这个人人痛恨的蒋介石当“总统”，并倚靠他来维持他们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反动派现在所能增加的花样，仅仅是用所谓“反蒋”的李宗仁来做“副总统”。据说中美反动派是准备在适当时机以李宗仁去代替蒋介石的。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在李宗仁统治人民的记录中，在人民对于李宗仁的认识中，李宗仁不但是与蒋介石同样的反革命，而且是蒋介石的长期反革命合作者。李宗仁的所谓“反蒋”与人民的反蒋毫无共同之点，人民对于他没有抱着任何幻想。因此，中美反动派即使真的用李宗仁来代替蒋介石，也完全骗不了中国人民。

当然中美反动派的阴谋是不会这样就停止的。在李宗仁也不能够维护他们的统治的时候，他们还会找到胡适或其他的人物。政学系大公报最近所挂出的“自由主义”招牌，和宋子文的部下钱昌照之流在“第三条道路”的口号下所发动组织的社会经济研究会，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还会在那种情况下招摇过市，蒙蔽群众，用新的姿态来保存反动派统治的实质。特别在蒋介石已经倒台，蒋军主力已经消灭和溃散的时候，反动派还会采取某种隐蔽政策，甚至找到今天反蒋阵营中的某些不坚定的人物作为他们的护身符，来隐蔽和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待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一到，就使反动派的势力卷土

重来。因为在那样的时候，人人痛恨的蒋介石已经下台，反动派又采取了隐蔽政策，一部分人民的警惕性就有松懈的可能。因此，我们今天就应该预先告诉人民，就应该不断揭露反动派的各种阴谋，以便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只是要彻底推翻蒋介石个人的统治，而且要彻底推翻蒋介石统治的基础，即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及中国的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制度，使任何蒋介石式的统治永远不能复活，永远不能借尸还魂。

为着向全国人民指出正确的奋斗方针，正当伪“国大”闭幕的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时局的口号，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号召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口号，配合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前进，十分明朗地画出了中国人民的道路。毫无疑问的，中国人民必须将革命战争坚决进行到底，因为发动战争的敌人还没有解除武装。毫无疑问的，中国人民必须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因为这是人民得以自由和平生活的前提。同样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人民和人民敌人的生死斗争中间，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存在，中国现在只存在着两条道路：或者是继续保存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这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卖国内战独裁路线；或者是消灭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这就是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路线。凡以保存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为实质的运动，无论是从那个角落来的，也无论是打着什么旗号，都不是什么“第三条路线”，而只是反革命路线在日暮途穷时的化形。一切主张消灭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的人们，只有一条区别于反革命路线的共同道路，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道路，这就是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道路。中国历史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能参加中国民主的行列，决定了这个行列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从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失败以来，两年间的历史，虽然只是短短两年的历史，却把这个真理证明得如此生动，如此丰富！中国人民现在普遍地由自己的经验认识这个真理了，这就保证了反动派的旧中国不能不灭亡，人民的新中国不能不胜利。

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在香港

（香港通讯）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胡　光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内战前线上国军碰到失利的时候，国内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活动。理论方面有“中间路线”和“自由主义”的提出，活动方面则有“新第三方面”的酝酿和北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成立，此外还起过一阵“和谈”的谣风。这些消息在国内也许并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不，注意是注意的，但也许只看做各自孤立，彼此无关联的东西；然而消息一传到政治警觉性特别敏锐的香港，其反响可就不同了。

从最初起，这里的各反政府党派以及左翼文化界就对这些理论与活动展开了猛烈的批评，给与迎头痛击。批判和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提出“中间路线”的人物，提出“自由主义”的“大公报”，与“新第三方面”有关的民社党“革新派”，屡次向中国“自由分子”呼吁团结的司徒雷登以及最近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特别重要的是他们都把所有这些理论和活动联系起来看，认为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和一个大的“阴谋”。关于这一个重要的问题，香港的左翼报纸和刊物几个月以来先后已经发表过很多的文章，蔚然成为一个“追击中间路线”（借用某一篇文章的标题）和打击所谓“自由主义者”的运动，而最近由几位政治和文化界领袖举行的座谈会更把这个运动作了一个结论。

这一个座谈会是本月3日在《华商报》的主持之下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侯外庐、邵荃麟和李章达等八个人。讨论的题目是“‘和谈’阴谋与‘自由主义’运动。”

第一个发言的是作家邵荃麟，他从美国的对华政策说起。他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一贯的，但其表现是两面的，一面是帮助政府进行内战，一面耍手段欺骗中国人民，而后者是作为前者的一种掩护或者是作为缓和政府军政危机的一种手段。不久之前“和谈阴谋”正是这种“欺骗政策”的继续发展，所谓“自由主义运动”也就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这是由美国国务院“设计”，司徒雷登、魏德迈等“导演”，宋子文、邵力子、钱昌照等“帮助导演”的，而“演员”则是从胡适到“大公报”的一般大大小小的“自由主义者”。于是他举出许多的例子。他回溯到1946年双十节司徒雷登的一篇号召自由主义者起来在“蒋主席领导下”进行一种“革命”的演讲，说这是美国对“自由主

义运动”的第一次倡导；马歇尔离华的声明也是要求“自由主义者在蒋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这是第二次；1947年魏德迈来华，特地到北平去找寻一些“自由主义”的教授名流谈话，这是第三次；不久以前司徒雷登的“告中国人民书”又提出同样的说法，这是第四次。他又指出了中国方面的反应：第一次司徒雷登双十演讲以后就有一群文人发表什么十人书来响应，《大公报》的副刊《时代青年》也展开讨论；魏德迈来华前后，《观察》杂志上有人大谈其“自由分子结合运动”，又有人提出“民主国际”的计划，要美国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作经济上的援助；而这一次当政府处境危急，美国进一步策划“和平”的时候，上海《大公报》又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胡适也公开的发出反苏的论调。同时，以邵力子等为主干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也在北平成立了，还有国民党吴某出钱，雷海宗主编，在北平创办刊物《周论》，以及由钱昌照出钱，肖乾主编，创办刊物《新路》，同以高稿费向北方各方“自由主义”教授拉稿。在上海，潘某也力促“自由主义者的团结”。说到这里，邵氏问道：“……前前后后对照起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勾当，难道还不清楚吗？这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拿的是谁的钱？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按：上海《大公报》曾经有一篇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论提到什么“填土工作”）难道还不明白吗？”因此，他认为今天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并不是什么思想运动，也不该看做一种思想运动，它的实质只是一种“政治阴谋”——今天“和谈阴谋计划”中的一部分。既然是一种“阴谋”，他以为就应当“揭破”，应当把“自由”、“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和目前的“自由主义运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自由’是属于人民的”，他说，“自由思想是我们所不反对的，自由主义乃是一种落伍思想，这种思想是应该批评的，至于目前这种所谓“自由主义运动”，则根本是美帝和××××的尾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第二个发言的是邓初民。他对邵氏的报告和许多意见都表示同意，但是他觉得如果只在名词上来解释什么是“自由”、“自由思想”，“自由主义”是解释不了的，应该在实质上、精神上弄清楚。他说现在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其实也就是“中间路线”的问题或“第三方面”的问题，翻来翻去依旧是一个东西。这固然是一种“政治阴谋”，但它的活动是有其阶级背景和阶级基础的。他认为所谓“中间路线”就是中间阶级的路线，中间阶级不一定反革命，可是“中间路线”却是“中小资产阶级右倾的幻想”。在目前国内双方力量的消长非常分明的时候，所谓“自由主义者”搞的“中间路线”实在是希望封建势力不要“连根拔起”。他又提出现在国际上也要搞这一套，这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第三方面”的活动是“一脉相通”的。至于“和谈”的“阴谋”呢，他以为和“自由主义运动”也是同一个东西。邵荃麟氏说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现是“两面”的，而他更说它是“多面”的。不用说，他也把这些活动看做是和美国人有关的。

接着发言的是郭沫若。他也认为“和谈”是一个“阴谋”，一个“和平攻势”，而“自由主义”是这个攻势的“武器”。他说：司徒雷登本已知道“和谈”不可能，唯其知道不可能，所以想替政府“粉饰”，同时企图替政府争取一些所谓“自由主义分子”来点缀。明知不可能而偏要提出，就是一个试探。可是结果却搞糟了，因为“和谈”的

提出恰巧在鞍山失守的时候，所以接着就传出了种种“否认”的消息。至于“自由主义”，他说：“归根到底，无论他们如何伪装，今天所谓‘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反苏反共’，既然‘反苏反共’就一定‘亲美拥国’！”因此，他主张要“正面打击它”。

第四个发言的是沈钧儒。沈氏把“自由”和“自由主义者”两个名词研究了一下。他说“自由”本来不是绝对的，第一它是有范围的，比方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西斯党徒和法西斯思想就不应当有自由，自由应该属于人民大众。第二是有限制的，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而妨害了人民大众的自由的时候，这种自由就不容许其存在。第三是有方向的，就是必须要面向真理。谈到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反抗黑暗的精神，也就是革命的精神；其次他是独立无背景的。因此在目前的局势之下，自由主义者除非消极的不参与政治，如果参与政治只有走向民主阵线的一边；有人想一方面在压迫势力下提出抗议，一方面又对它存幻想，则不但此路不通，可能反为反动的压迫者所利用，前途危险得很，至于甘作工具或别有背景的那更不用说了。他这一番话虽然抽象，但意义却是很明显的。

沈钧儒以后是谭平山。他同意以前几个人的看法，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向民主阵营进攻”。他指责《大公报》，说《大公报》“不配谈自由”。他又提出“新自由主义”，向“旧自由主义”作斗争。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呢？他的意思和沈钧儒差不多，就是：不抹煞个人的自由，但更着重集体自由的权利，不是单纯的争取个人自由，而是更着重争取集体自由。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然后个人的自由才有保证。“这就是我们和那些‘伪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不同的看法。”他说。

马叙伦说得不多。他只说，关于“自由主义”运动其实就是“和谈阴谋”的本身。这种看法，他以为很对。他认为在揭露并打击“自由主义”运动和“和谈阴谋”的工作中，争取中层工商界也是重要的事。

李章达（同盟会的老会员，现在是农工民主党领袖之一）说：“和谈阴谋”虽然是一种“攻势”，但只能称为“可怜的攻势”。他说：“策动这些所谓‘自由分子’出来标榜‘自由主义’，对人民是一种欺骗，对那些‘自由分子’同样是一种欺骗！即使有一些‘自由分子’自己企图以‘自由主义’的活动来停止战争，也不过是一个幻想。”接着他抨击了胡适：“另外有些是戴起‘自由’的面具，来作统治者的马前卒的‘自由分子’，他们以胡适为代表。和胡适同在北平的也有不少这样的‘自由分子’，所以目前北平能成为‘自由主义’活动的中心。胡适企图保持一双‘自由的手’，来搞一套‘自由主义’，将搞得出什么东西呢？我要请问胡适：你的手干净吗？实在太不干净了！……”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社会史学家侯外庐。他指出了为什么现在有人要把“自由主义”的招牌掮出来的缘故。他说，由于二次大战的时候“自由主义”曾经是反法西斯的武器，大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的势力还有一点余波，所以反动派就抓住这个东西。他们把“极权”的帽子硬套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而自称“自由主义”。其次，战后

许多政权从地主资产阶级的手里转移到人民大众的手里，这使反动派大为震惊，于是拚命去找所谓“自由主义”的力量，在英法等国都找到了工党社会党的“自由主义”者了，在中国也想找寻这东西。他说：“美国反动派就是希图团结全世界反动势力在它的周围，构成国际反动派的联盟。我们决不要以为他们搞这套‘自由主义’是出于糊涂，其实他们并不糊涂，而是‘聪明’地摆起‘迷魂阵’来……”所以他主张对“参差复杂的中层分子”要多多鼓励，从思想上给与影响和照顾，使那些认识模糊的中层分子“觉悟起来，走向革命”。

这次的座谈会到这里宣告结束。但因为新近在北平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是一个最值得注意，影响可能相当大的团体，所以在3月15、16两天的《华商报》上又由马叙伦、郭沫若、茅盾、翦伯赞、曾昭伦（科学家）、侯外庐和邓初民等七位文化界人士在“‘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批判”这一个题目之下，针对着这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每人发表了一篇书面意见。综合他们的意见，有几点差不多是大家一致的：

一、这个团体和所谓“新第三方面”，所谓“中间路线”，都是一条线上来的。二、这个团体的出现不前不后，恰巧在政府军事上失利的时候以及司徒雷登向中国的“自由分子”呼吁和鼓励之后，所以它的作用是很清楚的。三、它的发起人里面有邵力子、朱光潜、段锡朋、童冠贤、孙越琦、钱昌照等政府和国民党的人物，虽然整个的说起来以大学教授的成份较多，但是官方党方或接近官方党方的又占得较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团体的背景。四、它的经济来源是“某豪门”和资源委员会各厂所拨助，更加证明了这个团体将为什么人服务。五、“三十二主张”不过是个幌子，为了便于“吸引”和“欺骗”自由主义者乃至一般知识分子。六、对少数真正自由主义的学者教授的参加表示惋惜，认为他们如不是“一时被蒙蔽”，就是被“拉”进去的，所以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早点退出。

× × ×

一个关于“自由主义”运动和“和谈”谣风的座谈会，一次是对“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批判，足可以代表香港的左翼党派和左翼文化界对国内这一运动的看法了。这也就是“新第三方面”或“中间路线”或“自由主义运动”在香港所遭遇到的重大的打击。自然，这种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响应的声音，如民社党“革新派”办的《人道》周刊（伍宪子主编）就一直在宣传所谓“第三路线”与“中间路线”，不过，这种呼声在声势浩大的左翼力量打击之下是显得非常微弱无力的。

最后应当提一提的是《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大公报》这张以“自由主义”相标榜的报纸今年似乎特别起劲，接连在上海发表了好几篇关于“自由主义”的社论和论文，俨然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一面大旗。因此，这种的左翼文化界就特别不放松它，它成了理论方面被打击的主要对象。对于它的香港版的复刊活动，胡政之的亲自来港布置一切，一般都认为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一致给与密切的注意；同时，几乎所有左翼文化界人士都不约而同的对它实行“抵制”，一律拒绝为它写稿，弄得该报的副刊编辑因为无处拉稿而团团转。3月15日，香港版终于复刊了，日出两大张。但内容除新闻以外大半的稿子都是从上海版转载的，稿件的缺乏可见一班，也足见香港文化界的“抵

制”政策已经获得初步的效果；至于言论方面，除了它一贯的那一套论调以外，关于“自由主义”之类还没有正面的提出过，也许是因为目前的形势对自己不利，需要慎重将事的缘故吧。

香港方面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运动可算暂时告一段落，但显然并没有结束。随着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活动的展开，《大公报》香港版的不甘长久沉默，相信剧烈的理论斗争还在后面。

〔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摘录）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

《大公报》社评

自从上月8日，本报那篇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的社评刊出后，全国由平津以至京沪港粤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种种反响。……单就驳责我们的文章看，来路大约不出三个方向，论调可概括为五。所谓三个方向，即是代表集团的左与右，及代表个人的“中间”。在左右阵垒里，又各有“迎”与“拒”两种论调。右方面“迎”我们的，说你们主张“三民齐重”，岂不刚好志同道合？“拒”我们的则很少正面驳斥。有的比我们作黄老墨家，有的责备该文未以堪乱作结论，因而还不免“民族失败主义”的嫌疑。左方面“迎”的方面说：“自由主义不应当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因而即不应当反对苏联，尤其不可反对共产党。”“拒”的方面论点也不一。其中责备我们最严苛的是“此非时也”。因而怪自由主义者“早不喊，迟不喊，却在此时喊了自由平等。”比较令我们佩服的，倒是关心国事而不代表固定集团的许多朋友们，他们的质疑引导我们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切的思索。

……

一个政党的确需要“信徒”，聚徒众而形成“组织”。铁的组织，钢的纪律，愈坚固紧严，其取得政权或维持政权的机会愈大。为求组织纪律的钢铁化，只有牺牲个人自由，一切由党魁或少数头脑指挥。换言之，一个主义一旦组织化了，势必就得寡头化。一个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者，为达到政治目的，也许受得住木棍的指挥；但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受不住严苛的纪律，就可能站在政党之外，保持其独立的立场，保持其个人发言权。这要单看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气质与立场了。需要集体行动的“政党”，本质上并不适合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口味。去年英国工党少壮议员的叛变，就是明例。一个国家里有反对派在议会拍案痛骂，甚而游行示威，这个国家一定是生气蓬勃的；一个政党内的少壮派因看不惯现状维持份子的苟安而叛变，也证明这政党的青春有力。这现

象却为自由主义国家所独有。

………………

政治集团今天的争执，似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盖起怎样一所房子，同时，也就争执到谁来盖，谁经管的问题。极明显的是最好双方合盖，不但建筑工作不必延搁，露宿中的人民也可以尽早安居，而且可以兼容两大工程师的长处。无奈工程师的关切不尽在露宿中的人民，争执的焦点始终是谁做主任工程师，谁做助手。自由主义者本身不愿露宿，也不忍见流民露宿，所以谁做主任工程师，只要房子能盖起来，他们能卖力气处，都义不容辞。事实上双方都带有自己的木瓦匠，双方都不需要他人参加。自由主义者不招兵买马，也即是没有自己的木瓦匠，在现状下，他不能也不屑为收渔人之利的第三位工程师。但他们却甚关切露宿的流民，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流民之一员。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在甲乙工程师中有所抉择，他是在嚷，不论谁盖也好，你们别忘记留出透空气引阳光的窗户（民权），可也别忘记盖个容量充足的饭厅（民生），因为饮食空气阳光是健康的基础。这么一嚷，竞争者一定认为有所偏向；其实在建筑开始前，窗户饭厅都还不存在。有些露宿流民也一定看我们为迂腐，认为问题纯然是谁盖而已。殊不知无论谁盖，这原则还是基本而又基本的。既然双方争夺工程师地位，自由主义者或在内地清苦教书，或在拉锯战地带从事朝不保夕的生产工作，都在埋首做着局部的填土打地基的工作。这工作当然没有参加争夺战的木瓦匠激昂爽快，也很有些填土者或不甘淡泊或因遭际而受了刺激，参加了任何一方的木瓦匠行列，但我们也愿慰问各地无声无嗅的填土者，你们的贡献绝不比斗争更浪费！你们有人记挂，有人尊敬！因为中国如欲现代化，填土打地基的工作的需要是千真万确的。

最后谨再声明一点：大公报是一个报人论政的机构，大公报同人向来是论政而不从政。大公报同人信守司马迁“戴盆何能望天”的作风，既许身言论，就不旁骛，尤其相戒不兼任公职，也不做实际的政治活动。因为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却不是一般所谓的“中立”。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大公报同人信奉自由主义，我们无大野心，却有极大热诚，愿为国家建设做些填土的工作。

〔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

（甲）政治方面

（一）我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

（二）法治必须代替人治，因制择人，而不因人设制，执法与制法并重，宪政尤重

于宪法。

（三）公务机关，其于法定职权内，应有其独立地位，并对人民负法律责任。

（四）文官制度必须确立，除政务官外公务机关人员不得作政治活动。

（五）军队属于国家，以防卫国家为职务，军人不得干涉政治。军人从政，应先放弃军人身份。

（六）民主制度必基于政党组织之运用。国内应有并立的政党，互相批评与监督，并各致力争取民意的支持。政党不得假借任何口实，施用暴力压迫异己，民意的最后表现为选举，政权的转移，应视选举的结果而定。

（七）选举应以区域为单位，人民所选举的代表，负责行使政权。

（八）地方自治之基本原则，应由宪法加以保障。凡地方自治事项，中央仅能在法定范围内行使中央监督权。

（九）民主政治，不应只重形式，并应注重行政对于大众所发生的实惠。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应保障人民基本自由与权利，务使免于恐惧，免于匮乏，免于压迫，免于剥削。

（乙）外交方面

（十）我们主张以内政的协调，谋外交的协调。

（十一）积极推行睦邻政策，建树独立的对外国策。

（十二）反对种族歧视，支援弱小民族，尊重其独立意识。

（十三）反对以战争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国际纠纷，应依据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们赞成裁减军备，并树立国际管制制度，同时拥护健全的国际组织，使其成为真正解决国际冲突的机构。

（十四）赞成国际经济文化合作，及国际经济文化机构的树立。

（十五）反对任何政府或集团操纵言论，从而造成国际间宣传攻势，妨碍国际和平。

（丙）经济方面

（十六）我们主张国家应筹划妥善方法，负责发展国家资源，实现全民就业，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准。

（十七）国家应运用各种合理的政策，积极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与工业化。

（十八）全国土地，以全部收归国有为最终目标。第一步应即规定私人农地的最高限度，超过此限度者，应立即收归国有。对于原来地主，给以长期债券，以为补偿，收归国有的农地，或租与自耕农，或集体经营，视情形而定。市地应立即收归国有，并酌予补偿。

（十九）农业之生产经营及农民生活，应运用国家力量辅助其改进。

（二十）凡独占性及关键性之工矿交通事业，原则上应由国家经营。

（二十一）金融事业，应由国家经营。第一步应将国家银行之私人股本立即收回，

并简化及统一其机构。

（二十二）国营事业，应以资源之充分与合理运用及谋全民之最大福利，为其经营方针。

（二十三）国家赋税政策，应以平均私人财富，创造国家资本，促进资源开发，维持经济繁荣，及达成社会安全为目标。

（二十四）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应配合国内经济及其他生活方面之需要。

（二十五）欢迎不带政治作用而能配合我国经济政策的国外投资，在互惠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经济建设。

（丁）社会及其他方面

（二十六）充实教育经费，扩大教育机会，并限期完成普遍的国民义务教育，使人民在发展才能的机会上趋于平等。

（二十七）教育应着重个性的自由发展，健全人格的培植，独立判断能力与正义感的养成，及服务精神的提倡，青年学生从事自动而公开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应予以赞助。

（二十八）我们反对一切歧视男女的办法，在法律前，及受教育就业等机会上，男女应绝对平等。

（二十九）国家应即制定现代化的攸关劳工福利之立法。参照我国经济情形，规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并对劳作环境的安全予以保障。

（三十）推行社会安全各种制度，使人民在疾病、失业、老年、残废等状况下，不受贫困的威胁。

（三十一）扩充医药卫生设备，并逐渐推行义务医药制度，使人民在保健的机会上趋于平等。

（三十二）在推广医药卫生设备，以减低人口死亡率政策之下，国家应同时使医药卫生人员，负责传播节育知识，在不使品质下降之条件下，减少生育，俾中国人口压力，不致加增。国家并应进而谋人口数量与就业机会的调整，使生活水准，可以逐渐提高。

（转自《新路周刊》1卷1期，1948年5月15日出版）

〔附〕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的两个报告

（一）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报告

无论国民大会最近的会议及第一次按照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的最后结果如何，就我看来有两个现象已经明显：第一，蒋委员长拒绝为总统候选人这是巧妙的政治策略，

但我相信这至少也是有一些诚意的。他虽然在那场斗争中伤了些脑筋，但终于被选为总统，取得了确认的权利。他成功地确立了他在目前时期的不可少性，虽然他的政策已被反对，他又证明了他，并且只有他，能够维持现有的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是以多少带有独立性的将军和他们的私人军队的支持为根据的。他们当然虽是为了私利不宣布完全地域性的自治，但也大半是为了对蒋委员长的忠诚方才如此。假若他在这时下台，我相信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回复到国民军北伐以前的割据局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崩溃的情形。

第二，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者，或者是随你称呼的那些人——他们希望对于一个慢慢而确实地进行自杀的政府给以新的生命，很快地感到绝望——他们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围，已能够表现并施展他们的力量。不管李宗仁合格与否，他已经以伟大的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并且不顾有效率的CC派的政党机构，不顾那忿怒专横和不能适当应付的蒋委员长所支持的ＣＣ派，他们还是选举李宗仁为副总统。在选举中同意实行秘密投票的顽固的反动派现在自然要悔不当初了。我听说当李宗仁的力量表现出来的时候，蒋委员长招见陈立夫，厉言谴责他为什么不能如他所答应过的操纵选举。可能陈立夫和从前一样的，现在要再度表示他想到美国去考察“民主制度”了！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注意力自然大部集中于国民大会的会议上。国民大会的活动占着报纸的主要地位，并成为各方谈话的题目。就是贪财的店主也是一耳听收音机，一耳照顾生意。在南京街头上凡有扩音器的地方，都有一堆堆的人在听着会议的结果。

让我们稍许回叙一下。我们的情报表示出在国民大会和新的立法院的选举中，以及国民大会起先的一些会议中，国民党的大亨们都显然认为立宪政府的建立是党派政治的一种运用。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利用党的机构和蒋委员长的威望，象控制以前的政府一样，来控制新的政府。并且准备采取各种手段以完成此目的。当蒋委员长不与支持他的人预先商酌，即宣布不拟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极为惊愕。这个决定是旧历新年他在牯岭时所作的。他的决定久为人所期待，虽然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他所作的决定的性质。对国民党的机构说来，蒋委员长是不可缺少的。他协助创立了那个机构并保护了它，而且因为他通过它来进行统治，它对他也是不可缺少的。黄埔和保定的将领，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将领（包括西北回教将领），虽然都不关心国民政府，但主张假若他不管国事了，那他们也要不管了。这种情势不是蒋委员长所不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认为他之拒绝竞选是一种巧妙的政治策略，虽然我们并不怀疑他的此举之诚意。如果我们的假定是正确的话，说服他说他对国家的不可或缺是不困难的。他过去的情况追使他再度把他的国民党的机构全力带进新政府，排除他的政敌，修改宪法使新政府和以往的政府一样易于为他个人所控制。通过宪法的修改，他取得了维持他个人统治所需要的全权，他也通过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使国民党的机构得以继续其控制权力。各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机构也在设法使孙科能继续为立法院的选任院长。

国民党机构操纵了国民大会的选举；这样保持了一批可以严格控制而可靠的代表，其中有政治上有经验的人物；可以鼓动国民大会并操纵它的讨论。它也有一批经过训练的政治工作人员，善于干贿赂和恫吓等小伎俩。它有在其控制之下的报纸，得以确保不会暴露它违反民主程序的大的劣迹。它还有特务听它使用，至少大多数代表们认为如

此。最后，它通过与黄埔系将领的联系，把大部分军事最高指挥部的人员都拉来跟它在一道。那种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那些将领们实际上也成为那机构的一部分了。

这样，国民党的机构是一个很不小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但是它是用来支持反动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是为国民党的党员和国民党中国中的独立的个人和团体所默然反对，即令这种反对是不公开的和不明显的，这些反动的原则主要地涉及蒋委员长个人及其亲信的专制统治的延续永生问题。

国民党内反对那种反动领导的人士以往没有，而且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他们中间现有的结合只是基于对政府无具体成就的共同不满，基于他们对现在所组成的政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进展而感到很有理由的恐惧，和基于他们对民主和立宪政治的信念。开明的专制虽已不开明，但仍专制。反对国民党机构的人的利益和看法的共同性，在普通情况下，尚不够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但国民党的机构的悍然干涉选择，以及它和蒋委员长的显然干涉国民大会的讨论和大会的选举副总统，却使大多数代表考虑保证他们所代表的选民和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办法。

结果，反对国民党的团结的反叛发展了。在选举副总统时冲突便表现出来了。当国民党机构在国民大会会议中成功地阻止了关于政府缺点的自由辩论的时候，独立的代表表示不满。而当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机构公开阻止选举李宗仁时，他们再感沮丧。（我们根据可靠消息，知道蒋委员长曾召见李宗仁要他退出竞选。有一个时候他还对第三竞选人程潜提出假若程潜肯为帮助孙科而退出竞选，他愿意偿付他全部的竞选费。）独立的代表和不满意的国民党代表的沮丧，使得他们结合起来支持号召改革而竞选的李宗仁。

国民党机构震于不满日增和有组织的反对的事实，遂倾其全力于斗争，诽谤李氏并恫吓他的支持者。这种策略引起愤怒。李氏施出他巧妙的一着，宣布退出竞选，借以揭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受的攻击的性质和来源。他的退出和程潜的退出，显然是步调一致的。一切不出所料，李宗仁此举，加上程潜的退出，获得了群众以及不在国民党严格控制下的国大代表的同情。对这种情势的责难日益落在蒋委员长身上。因为程潜是仅有的其他非国民党的机构的候选人，他既为同情李氏而退出，蒋委员长被迫只好也命令孙科退出竞选。他为了要劝李氏程氏再参加选举，被迫作了私下的和公开的绝对保证，保证此后副总统的选举是自由的，不受国民党的胁迫，国民大会每一个代表都可凭良心投票。大会代表为了要确使蒋委员长不致食言，采取了严密的防范使投票不但秘密，计票也要精确。这些事情的结果是如你所知，李宗仁以一百四十三票的多数当选为副总统（一四三八票对一二九五票），或者换句话说，不外是照象时的最后的一幕而已。

李宗仁以所谓革新派领袖出现能否确立，尚有待来日。支持他的人意见分歧。虽然他表示出有希望，但是关于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品质，我们所知不多。我们只能希望在副总统选举中表现得那末明显的民主的波澜，会发展而为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合法而有效的反对派。我们以为过去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机构的反对力量，在本质上是一种改革的要求，它还不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虽然有蒋委员长所支持的CC派的极端努力，革新派还是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表现了充分的力量。他们现在有一个发言人，假他们所选的领袖手段运用得好的话，他的话是会有力量的。但是蒋委员长与国民党机

构控制了政府中的主要位置，他们如何对改革的压力让步这还要等将来再看。我们只能希望这样表现的自由主义分子，将能在政府中和在国内对改革能发展力量足以使人有共产党现在席卷之势的扩张还有被遏止和扭转的希望。

同时，我们认为军事上的沉寂，并不可信为政府在目前有能力阻挠共产党战略所定的任何军事行动。蒋委员长在新年宣布，在六个月以内共产党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当无军事上的重要性。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并没看到达成这个目的之行动的表现。山东的潍县，是第一个受有重炮辅助的正面攻击而失去的城墙的城市。这是国民党领导方面无发动攻势的能力另一个实例。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象在其他地方一样，依城而守，等待共产党来收拾他们。目前迹象显示共产党军队可能绕过沈阳，直攻秦皇岛。但是我们看不到对抗这一行动的真正活动。在北平的傅作义，象在山东的王耀武一样，益表现独立的倾向，我们很难相信他在这被共产党严重威胁的地区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密切注意这种情势，希望在我们确信傅作义不拟作战而拟向察哈尔和绥远撤退的时候，我们能对在该区的美国人予以充分事先的警告。王耀武已经警告在山东的美国人，要他们找安全区域。华中局势也很不好。我们听到了可信的谣言，说共产党人已经渗入江南，我们以后将会听到共产党军队新的集结的消息。除非找到恢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的方法（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者——只是或者——可能作到这一点），对于共产党随意随时的继续扩张似乎很少有有效的抵抗的希望。

我们对于苏联前驻南京武官，现在被任为苏联驻华大使的罗申未能回到南京一事，颇为注意。目前我们听到他已在请求签证，将于5月初抵此。我们觉得他定在这个时候回来是有相当意义的，不过我们尚不能为可靠的揣测。

李宗仁竞选中有一因素使我们感到忧虑，即他可能和共产党谋妥协。最近有证据，他可能和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过接触，而且可能还保持着此种接触。因此，罗申在这时候回来，在某种程度上和国民大会的发展有关，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二）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的报告

我谨报告，在七月十六日晨，我晋谒蒋介石总统，向他提出我认为是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稍有希望的唯一忠告一事。他曾问我可有任何消息，我答称：我认为最重要的消息是共产党大会将于下月召开，这次大会议程中有组织联合政府的意图，还有大使馆从香港所收到的消息称，李济深打算在最近的将来成立一西南地方政府，意欲建议与共产党相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广播谴责铁托和其他的人，公开地把他们自己投在克里姆林宫专政下的世界共产主义中。将上述发展与广播相联系起来，构成我拟提出的建议的背景。这建议就是由他来召集几个受到一般人尊敬的领袖，促使他们为了中国目前真正遇到的危机，放弃所有个人与政治异见，这个危机就是共产党得胜后，中国将丧失其国家独立。这已不再单纯地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党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民主与自由与受着莫斯科所控制的少数人专政两者间基本原则之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都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而战，但是这种独立现在却又处于危险中。在这危机中，

他和所有其他的人，应该把国家置于其他不重要的问题之上。我提出了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的名字。关于李济深，我以为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假使他不服从这原则，他应被责为选择了俄国共产主义而放弃了国家的独立而受到谴责。我希望这样可以产生一个联合宣言，吁请所有需要自由国家的人来面对现实并支持这项事业。财政危机和经济困难也确是很真实的，但它们比起基本的问题来还是较次要的。我们应首先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他应以巧妙准备好的宣传逼使其他的人就范。他说原则上他同意，他将再详细地考虑一番，他说他曾计划一个改组国民党的会议，我说我深知此事，但是我所更关心的只是这些特出的领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且这一定要尽可能地使它非常动人以便使群众信服。

他随即问我美国方面的意见，我就告诉他杜威州长关于增加援华的声明已引起甚多之不利的社评和其他评论。我当时带有关于这问题的最近的美国新闻处新闻稿，当即交给他的秘书以供参考。我又说，虽然如此，但如能有我所主张的运动能表现活力，它一定会有助于缓和美国的感觉，以为这个政府已脆弱至不能对它做任何有用之援助。我告诉他美国所能给予的最大帮助，既不是钱也不是军事上的意见，而是我们的理想的活的力量，许多中国人已有了这种理想，但它却被苏联的理想所迷误和代替。

他说美国人对李济深的重要性，有估计太高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说：对他本人和他的左右不必过于重视。但是全国都是非常渴望和平，在这种一般的心情之下，任何运动表现有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取和平的希望者，可能获到比他预料中更热烈的拥护。所以，就我看来，无论他做什么应该尽快去做。他又说他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

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形，最显著的印象还是徒然白费。我非常怀疑蒋总统是否有那种伟大的品质，可使他召集那些不完全顺从他的领袖，待他们如同志一般，请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求一致的意见和集体的决议。二十年来的习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即使他有与这种人合作的企图，他大概也不会十分宽大诚恳，而做到开诚布公来交换意见。惟只有开诚布公交换意见方可得到他们的信任，同时也可予群众以印象。任何联合发出的宣言都反映这些限制而不能使人信服。他还想拉拢那些他所信任的人，但这样将使结果更糟。除了如此一个表现得非常诚恳和迫切的联合呼吁以外，别无他事可以动员已趋消极与绝望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政府最上层发生了新的和感人的事态。除我已做的以外，再进一步的催促就只有暗示给他较可能更多的美援，或是说服他放弃他自己的见解。但这两种情形都是违背他的本性的，所以其结果差不多可以确定地说是不幸的。因此似乎是应当许他自行其是而能在相当范围之内采纳旁人的建议，否则迟早总要有一运动，迫使他放弃他现有的地位。他似乎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不安的极端形式，不是军事力量和慈悲相结合起来的他所认为是从中国历史教训上所得出的方法所能扑灭的。倔强不移的决心和持久的勇气在以前抗日时期，很能适合于将普遍抗日意志付之具体实施，但是很可悲的，到现在它们却在某种真正意义上是变成了解决问题而所需要迥然不同的精神的障碍。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版）

中共中央为国民党政府要求美军保护事发表声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就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军事保护一事发表重要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和整个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现正力图把他们的垂死的统治放在希望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为此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由蒋介石出名致函美国杜鲁门总统。同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连日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及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先后举行会议，据悉曾讨论由美国保护上海的计划。另据悉，国民党政府拟即请青岛美国武装部队接管青岛市政等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任何此类的叛国行为，并坚决地否认此类叛国行为的任何法律效力。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已声明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外交无效。国民党政府现已即将复亡，任何外国政府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援助，及其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任何协定，既不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亦不能保护该外国政府的利益。此项援助及协定之唯一前途，即为随国民党政府同归于尽。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政府及其它国家政府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军事的与经济的援助，乃是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敌意行为，应当立即禁止。美国政府如果派出其军事力量对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无论是全面的或局部的保护，均为对于中国神圣的领土主权之武装侵略，其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中国共产党、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平等的友好的关系，并保护一切外国在华侨民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正当利益，但是必须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凡与此种庄严立场相违反者，我们将坚决地彻底地反对到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蒋介石政府正在覆没

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蒋介石政府，正在像一只破船一样地从历史上沉没。蒋介石虽已完全绝望，仍然决定要打到底。蒋介石所谓要打到底就是他不愿投降，宁愿将他现在还剩下的二百几十万军队打光。就令如此，人民解放军消灭全部反动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战争第三年的头四个月，国民党已经丧失一百万军队，其中约有五十万是在十月份丧失的。约有四十万丧失于东北。十一月份的灾难不会比十月份轻。徐州战场的崩溃，数十万军队的覆没，现正等待着国民党。而更重要的，则是丧失徐州等于丧失整个长江以北，等于丧失国民党军队的最后脊骨，因此，国民党正在努力挣扎。当蒋介石假装慷慨地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把武汉和徐州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的时候，他是看到长江以北已经完了，打算把自己的嫡系撤退到长江以南去。但是他的计划已经来不及实现。南线和北线，蒋介石都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了。北线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诸点早已互相不能联结了。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点的联结亦时被破坏。南线也是如此，徐州、汉口、西安三大中心已经不成一条什么战线。这只是三个据点及在这三个据点附近摆了三堆军队，当然不成什么战线了。长江以南，国民党的战线还没有建立，并且是建立不起来的了。对于这种形势，不但蒋介石的左右，而且连蒋介石自己在内，无不极度悲观。十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刊物“新闻天地”称：蒋介石由沈回平，闻锦州失守，极度悲痛，召开军事会议，谋求“死里求生”。其他消息称：辽西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后，蒋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又连续吐血。蒋介石回南京以后，一方面是面对着徐州的危急情况，另一方面是面对着金圆券和限价崩溃后经济战线特别是粮食的危急情况。上海的米价一周内由每石八十金元涨到一千八百金元，南京的米荒使十日一天内一百家米店被抢。南京行政院长一职自翁文灏辞职后至今无人敢就。南京的要人们纷纷准备向两广及台湾逃难，并谈论着迁都广州的问题。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之流正在活动着逼迫蒋介石“下野”。为了准备下一步，为了夺取“反蒋”的领导权，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分子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被称为官方反对派的特务分子“立法委员”刘不同，公开著文主张蒋介石出国并“恢复和平”。他们的目的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替反动派保留下一些力量，因此他们的活动，与人民反对反革命内战的斗争所遭遇者相反，并未受过禁止。但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接受他们的建议。蒋介石在八日发表演说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这就是说，你们要我下台，我是不想下台的。蒋介石安慰他的部下说：“这次东北军事虽然失败，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这只是在说谎。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根本上已在崩溃，他的什么“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新华社陕北1948年11月14日电）

东北我军秋季攻势经过

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本日公布秋季攻势战役经过称：

东北人民解放军全歼东北国民党匪军，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秋季攻势，自九月十二日开始，至十一月二日，已告全部胜利完成。此一战役，历时五十二日，战线北起长春，南至北宁线上之昌黎、滦县段，绵延达一千五百余里，全歼敌军四十余万，包括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剿总”锦州指挥所，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司令部，十一个军部，三十三个整师（旅），四个守备总队（每总队三个团），与所有直属部队，特种部队及地方部队。此为我军空前巨大规模的一次攻势，其经过概述如下：

（一）我军经过夏季军政大整训后，军力空前充实，战力空前提高。乃于九月十二日，由长春附近、四平、开原等地出动，经过长途行军，在北宁线上展开秋季攻势。我军一部首先突然奔袭北宁路锦（州）榆（关）段，截断与分别包围兴城、沙后所、绥中等地之敌，另部则破袭昌（黎）滦（县）段，迟滞华北敌军东援。同时，我军再以一部由沟帮子、台安之线，进至锦州、义县间，截断义县敌军退路，并将该敌包围。随后，九月廿八、廿九日，我军相继攻克绥中、兴城，歼敌六千余，截断锦西兴城间敌之联系，从而钳制了锦西，葫芦岛敌之五十四军，并吸引了敌暂六十二师由锦州增援锦西。我另部则歼灭由锦州向北伸出动之敌两个多团，占领锦州城东北及以北之主要外围阵地，并以炮火封锁锦州西郊机场。同时，又以一支部队从锦西以南插至高桥、塔山之线，攻占塔山及西海口，截断锦州、锦西间联系。十月一日，我军攻克义县，歼敌一个整师。于是，东北敌之主要补给基地锦州，乃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当敌感到锦州危急时，即由沈阳空运其四十九军增援，但仅运到七十九师之两个团，机场即不能继续使用。蒋贼介石深感锦州战局关系东北整个匪军的命运，乃急忙飞平飞沈，亲自指挥。蒋介石计划从两个方面来救援锦州。一个方面从华北抽调其六十二军全部，华北“剿总”直辖之独九十五师与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及胶东烟台之三十九军两个师，陆续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其原驻锦西葫芦岛之五十四军三个师，附暂六十二师共四个师，总计十一个师兵力，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另一个方面是将主力之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各两个师另一个团，新三军全部，七十一军两个师，四十九军之一零五师及一个团，原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与三个骑兵旅，组织所谓“廖耀湘西进兵团”，由沈阳倾巢出动，占我彰武，企图以截断我后方补给线，威胁我攻锦部队，并策应长春孤城之敌向南突围。而我军则以强大阻击兵团，采取阵地坚守与运动防御，抗击南北两路增援之敌，并歼敌一万二千余名。尤以我锦南阻击部队，左凭渤海，右以虹螺岘为倚托，在塔山，虹螺岘之线，对敌进行为时七昼夜之英勇阻击，抗拒以海空支援来犯之敌六个师，阵地屹立不动，使敌无法寸进，始终拒敌于离锦州仅三四十里之塔山附近

地区，保证了我攻锦部署就绪与充分完成了准备工作，对我攻占锦州起了决定的作用。十月九日至十三日我攻锦部队以五昼夜的英勇战斗尽扫锦州外围据点，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敌人，直逼锦州城下。最后我军于十四日十一时，对锦州十万守敌发起总攻，迅速完成突破，并以大胆勇猛之渗透战术，插入敌之纵深，完全打烂敌之部署，分割敌人，各个围歼敌之强固据点。经三十一小时激战，即将守敌全部歼灭，敌范汉杰、卢浚泉以下十万之众，无一漏网。从此，东北余敌乃全局动摇。

（二）锦州大捷后，蒋匪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乃有长春守军六十军之起义，与新七军之全部投降。被我久围长春孤城之九万敌军，士气异常沮丧，自六月以来，在各次战斗中被我歼灭四千余众，同时，由于我军之强大政治攻势，并争取其一万八千余官兵逃出苦海，向我投诚。当我秋季攻势发动后，我围城部队仍严密布防，连营数百里，将敌重重围困。我军攻锦州时，敌曾作试探突围之举，均为我军击退，不能越雷池一步。最后，蒋贼介石乃严令该敌突围南逃。又因我军锦州大捷，云南部队之九十三军全部被歼，卢浚泉亦遭生俘，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云南部队之六十军，乃在曾泽生将军之领导下，毅然起义，受到我军民热烈欢迎，全部开入解放区。因而敌新七军及各杂色部队四万余人，更形混乱，其下级官兵则争先恐后向我投诚，终于逼使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及新七军军长李鸿等，不得不于十九日率部集体放下武器，长春乃告解放，是为我军采取久困重围、不战而取得大城市之第一次。

（三）此时，徘徊于彰武与新立屯之敌廖耀湘兵团，既未解锦州之围，又未达策应长春守敌南逃之目的，高级匪首间会议以该兵团退守新民、沈阳，或转向营口逃窜；但蒋贼介石却妄以为我军经过锦州大攻坚战后，不能迅速继续作战，并错误估计我军乘胜南下，于是，在其再度飞沈盲目指挥之下，命令廖兵团续沿北宁线西进，并令杜聿明设指挥所于葫芦岛，妄图重占锦州，以与锦葫之敌会师。敌廖兵团全部，及其再由新民增调前来之整二零七师第三旅（师）并附以重炮及装甲车部队，乃在空军支援下，于二十四、五两日，集中全力，向我黑山、打虎山以北阵地猛犯，但遭我军坚强阻击，两日未获寸进，其实，我攻锦得胜之师，已迅速东移，到达集结位置，该敌遂于二十五日黄昏后，企图取道台安、盘山，改向营口逃窜，复经我军拦截其先头部队，蒋介石见事不好，即又仓皇飞沈亲自指挥，令廖兵团向东突围，不意我北面主力部队如飞将军从天而降，以一日两夜二百余里之急行军，于二十五日四时及二十六日九时，先后将敌退往新民、沈阳之铁路、公路线切断，于是，敌军遂陷于走头无路之绝境。我军乃于二十六日晨起，在遍布水泊之饶阳河、柳河地区，开始巨大规模之围歼战，各部指战员神勇无敌，不顾疲劳，迅速分割敌人，团团围住敌人，以三猛战术，于两昼一夜之战斗中，即将全部美械化之廖耀湘兵团干脆歼灭，生擒匪首廖耀湘以下八万余人。

（四）廖兵团全军覆没后，沈阳敌巢更形裸露，匪东北"剿总"之少数高级官员自卫立煌起，于十月十八日即开始乘飞机逃跑，我军则以不停止的追击，向沈阳、营口飞速进军。当廖兵团企图沿北宁线西进之时，敌即于二十四日以其五十二军占我营口，图取得由海上逃走之路，其二〇七师之第一旅、第二旅，亦已逃抵辽阳、鞍山；以后为了掩护空运，乃又将其调回沈阳，与五十三军之三个师，由台安逃回之暂五十三师，并

“剿总”直辖之各特种部队与三个骑兵旅，四个守备总队等部统归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指挥，由各外围卫星据点逃向沈阳。我军则自辽西打虎山战场及长春以南，毫不休停的，一口气连续急行军数百里，横截及猛追逃敌，至二十九、三十两日，即相继收复新民、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等城追歼逃敌五十三军一师一团及两个守备总队等部，于是，大军直抵沈阳，逼攻营口。二十九日占领沈阳东陵飞机场，三十一日四时，在铁西区开始突破，守敌自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以下纷纷请降，仅其党化部队之整二〇七师仍作垂死挣扎，至十一月二日下午四时，为我全部解决，沈阳战斗历时仅二日，全歼守敌十万。至此，被敌侵占两年七个月零二十天之东北最大工业城市，拥有人口一百八十万之沈阳城，乃告完全解放。而我逼攻营口之部队，亦以炮火歼灭登轮图逃之敌三千余，并于二日十一时，全歼市区之敌五十二军第二师，及廿五师之一个团，与该军直属之人力输送团等部解放要港营口。其徘徊于锦西、葫芦岛狭窄滩头及承德孤城之敌，则于九日晚及十二日正午仓皇逃遁。至此东北敌军全部歼灭，东北十省均获解放，我东北战场历时三年之伟大人民解放战争，获得全部、彻底的胜利。

（新华社沈阳1948年11月27日电）

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谈天津战役特点

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谈天津战役的特点称：

第一、这次天津战役我军以雄厚的兵力首先截断和包围了天津、塘沽两地的守敌十八万余人，在这一水网地区打烂了敌津塘守备区的防御体系，随即在扫除天津外围和完成周密的准备工作后，于一月十四、十五两日，以二十九小时的激战，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华北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全歼守敌十三万余，逼使塘沽、大沽五万守敌狼狈而逃，迫使困守北平孤城的蒋傅军慑于我军强大威力，不得不接受我提出的和平条件，撤出城外听候按照民主原则进行改编。天津守敌有装备优良的部队十三万余名，匪首陈长捷在年余以来，征调大批的人力、物力，大肆增修城防。他在城内和外围修筑了三百八十座巨大碉堡，构成很多的堡垒群。挖成了一道宽三丈、深一丈的护城河，放进运河水源和海河潮水，水深没顶。护城河以外则架设数道铁丝网和鹿砦，周围埋设数以万计的地雷。同时匪军并将城周数里以内的村庄一律焚毁，造成一片无人区。护城河两岸则筑有土墙，每三十米间隔即有碉堡一个，墙上也密布铁丝网和电网。垣后是纵深的地堡群，直达核心区，这就是陈匪长捷自夸的“大天津堡垒化”，企图恃此进行负隅顽抗。可是，在我军有准备有组织地强大攻击下，仅历二十九小时激战，即一举攻占天津，全部歼灭守敌，战斗过程如此之短，实为这次战役的最大特点。

第二、这次战役的特点，又表现在我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更加熟练，这说明我军正规化作战的战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次作战，我军投入了大量的新式兵种，各兵种都在准备充分、士气旺盛的条件下，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高度表现了各该兵种的效能。拿炮兵来说：他们射击准确动作熟练，两点钟的作战任务，在四十分钟以内就全部完成；我们的重炮，使得敌人整个纵深的指挥、观测联络和炮兵阵地，迅速陷于麻痹混乱状态；我们的高射炮，则在敌机刚一出现时就接连打下两架，使得敌机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不敢飞临战场。拿坦克来说：他们掩护步兵完成突破任务后，就在工兵的协助下，克服了护城河的障碍，迅速投入纵深，将敌人不少的中心堡垒碾成粉碎，并在炮火协助下，掩护步兵轮番攻击，使纵深战斗的发展大为迅速。拿工兵来说：他们大批的直接参加突破战斗，这次还是第一遭。他们在严寒的三九天，在敌人的火网下，迅速完成了敌前架桥和扫雷的艰巨任务，保证了步兵的突破和炮兵坦克迅速进入纵深。而我们的步兵，则在炮兵、坦克和工兵的配合下，以勇猛的尖刀战术，迅速突破敌阵，打退敌人多次的反冲锋，又以熟练的穿插战术，分散并腰斩敌人，火速席卷全城，将守敌全部干净歼灭于城垣以内，无一漏网。这种熟练地、合拍地协同动作，和无比的英勇气概相结合，构成了这次战役中最精巧的场面。

第三、人民群众热烈地支援前线和华北、东北两支兄弟野战军胜利会师配合作战，

是这次战役迅速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次作战中，冀中、北岳、冀热察和东北等地的人民，都以极大的人力物力支援平津前线，无数的农民、粮草、骡马、大车和满载军需供应、慰劳物品的车皮和卡车，像潮水一般地涌向前方，兴奋了前线的指战员们，给战争以强有力的支援。举例来说：前线需要芦苇架桥，一个晚上，就送来了五百多捆，保证了攻坚的器材充分使用。天津近郊的人民，遭受国民党匪军焚村拆房的灾害，纷纷请求我军救民除害，更加激励了我军战士杀敌复仇的决心。天津的工人们则当市区巷战还在进行时，就自动给我军带路，市民们也拥集在我军的后面，拍掌欢呼，学生们则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集合起几千人游行劳军，这种热烈的场面，实为前此所未曾多见。而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胜利会师，更加鼓舞了我军的士气，使战士们斗志高昂、气壮山河。

第四、这次战役的另一特点，表现在我军的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群众纪律。在工人学生和市民们的协助下，很好地保护了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于我军的炮火准确，和步兵熟练的穿插战术，在战斗中，除了中纺三厂由于敌军顽抗被毁，略有损失外，其余的工厂学校，大部都在我军预定的作战计划下，保持了完整无损。而我军指战员的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切实做到一切原封不动，更足以作为楷模。因此，当我军攻占天津后，在工人和职员们的积极工作下，不到几小时，水电便照常供应，秩序迅速恢复，市面热闹倍于往时。

（新华社北平1949年2月14日电）

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解放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军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北平的人民久已像亲人一样地渴望着人民解放军。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军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的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廿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从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北平的和平谈判曾经进行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从去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的一天就已经开始接触，但是直至天津解放的前夜，傅作义将军还不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因而使谈判未获结果。开始时期傅作义还梦想着作绝望的抵抗，随后又梦想着率部逃跑到绥远，或太原，或青岛、上海，并与蒋介石信使往还不绝，对于与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采取敷衍的态度。傅作义直系主力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被歼，以及国民党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处于绝望境地，动摇了他的原定计划。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十五日天津迅速解放，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这些事变，促使傅作义将军决心接受解放军的提议，谈判才得到进展。双方的谈判决定：为了便于移交和接管，在过渡期间成立七人的临时联合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方面四人，傅作义将军方面三人，以叶剑英将军为主任。这个委员会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双方协议：开出城外的傅作义将军所部全军在大约一个月后开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又协议在过渡期间，北平市内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业机关、银行、仓库、邮电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北平的解放基本上结束了华北的战争。中国北部的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及河南一部，现在只有太原、大同、归绥、包头、五原、临河、青岛、安阳、新乡等少数地方尚未解放，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果不愿意跟随北平的榜样，就只有跟随天津的榜样。天津是在二十九小时内经过战斗解放的，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全部解决，其高级将领全部被俘，其中拒绝和平解决、坚持抵抗到底并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首要分子，将被审讯判罪。北平的解放

对于长江以南及其他地方的解放也指出了一个榜样。全国人民要求由战争罪犯们统率的所有执行“戡乱剿匪”伪令、屠杀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动军队，都能像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样地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这将证明他们确有诚意实现真正的和平。傅作义将军在过去两年半中是积极执行“戡乱剿匪”伪令的一人，因此成为战争罪犯之一。但是人们相信，既然他现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条件，率部出城听候改编，那么，只要他今后继续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走去，他就有希望取得人民的谅解，允许他将功折罪。

（新华社陕北1949年1月31日电）

毛泽东主席复傅作义将军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傅作义将军：

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迎欢的。

毛　泽　东

〔附〕傅作义将军通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一月二十二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的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

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的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是正确的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疑，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 作 义

淮海前线司令部发言人谈
淮海战役彻底胜利

本社记者曾于十一日往访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司令部发言人，他对永城东北地区大歼灭战的巨大胜利发表谈话说："被我军包围在永城东北的约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已经于十日被完全歼灭了！头号战争罪犯杜聿明已经被我军活捉。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胜利结束。至此，我军在徐州战场上，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作战，共歼灭（包括起义）国民党五个兵团全部，一个兵团大部，两个兵团各一部，二十二个整军，五十五个整师以及其他部队共约六十万人，赢得了全战役的彻底胜利。"发言人接着说："在永城东北地区被歼灭的敌军共有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十个军、二十五个师以及许多特种部队和非正规军，共约三十万人。这些敌军系由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所指挥，于去年十二月一日自徐州向西南逃窜，十二月四日被我军完全包围。其中孙元良兵团两个军，四个师及为我在碾庄全部歼灭而重建之四十四师，是在战役第二阶段中被我军歼灭的。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八个军，二十个师，及其他一切部队，则是在战役第三阶段中被我军彻底歼灭的。"发言人分析："永城东北地区的歼灭战的大捷，是在战役第一、第二两阶段已得胜利的基础上获得的，是连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特别是全歼了黄维兵团，对保证此次大歼灭战的全胜，更是有决定的意义。在战役第一阶段中，敌军最多时，徐州战场上的敌军曾有邱清泉、李弥、黄伯韬、黄维、孙元良、冯治安、刘汝明、李延年等八个兵团。而到了战役第二阶段结束，黄维兵团被全歼以后，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逃回蚌埠，随后并继续南逃，徐州"剿总"也从蚌埠搬到滁县，这样就使得被包围的杜聿明匪部邱、李两兵团和孙元良兵团残部完全孤立无援。自十二月十六日起，我军休息了二十天，仅用一部兵力围困敌军，并对杜、邱、李及所属军、师、团长发出数次劝告和警告，令其缴械投降。恰逢连日雨雪纷飞，天寒地冻，敌人空投不易，饿死冻死的很多。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下，敌军纷纷投降，到一月五日为止，敌官兵向我投降者即达万余人。六日下午三时，我军继续发动攻势，当夜即突破敌人外层坚强阵地，七日夜间攻占李弥兵团内部阵地。八日继续紧缩包围圈。九日夜间，我军乘胜继续以坚决的猛打、猛冲、猛攻的动作，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及其中心阵地，使敌人来不及从新调整部署，大批敌人被俘的被俘，逃命的逃命，把敌人完全混乱。十日下午二时，打下杜聿明指挥所与邱、李两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陈庄、黄庄、陈官庄及数十个据点。激战到十日上午十时，我军摧毁了敌人成千成万个地堡、散兵坑及蛛网式的壕沟，攻克九十多个村镇据点。敌人全部被歼灭了。全淮海战役遂告胜利结束。"

发言人谈到六日开始的总攻说："这次大歼灭战，从攻击开始到最后解决战斗，只经过四昼夜，残敌十几万人就全部覆没，平均每天消灭敌人四五万人。这么多的敌人，被歼灭得这样快，正好比一个雪球，掉在沸滚的水里一样。我军坚决、迅速、干脆、彻底、全部歼灭了大量敌人，是这次歼灭战最显著的特点。在杜聿明部被歼灭的前后共三十万敌军中，包括蒋介石嫡系精锐兵团邱清泉的第二兵团，蒋匪在黄维兵团十八军被歼后仅存的一支所谓"王牌军"——第五军（按新一军、新六军、七十四军、第五军、十八军被称为蒋匪军之五大主力），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指挥下仅存的战车团。这许多部队，都是美械装备，经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训练，由美帝国主义者所宠爱的和蒋介石所亲信的干部、国民党著名的高级将领杜聿明亲自指挥，是在国民党匪帮的南线主要战场——徐州战场上进行决战。决战的结果，这些部队都覆没了，连杜聿明本人也被我军活捉了。杜聿明的失败，连同黄伯韬、黄维的失败，连同北线锦州、长春、辽西、沈阳、张家口、天津的失败，这就等于蒋介石已经输光了内战最主要的本钱。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真理，连国民党军的不少高级将领和许许多多的官兵们也看到了，他们不愿意跟国民党统治集团一起走进坟墓，因此在淮海战役第一、第二两个阶段中，有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率部起义，有孙良诚、黄子华、赵壁光率部放下武器，而在战役第三阶段最后四天的大歼灭战中，蒋介石嫡系部队邱、李两兵团，更是成营、成团、成师地向本军放下武器。据已知道的，即有五军四十五师师长率两个团官兵，八军十二师副师长和参谋长率三个团官兵，九军军部率第三师残部，七十二军军部率一个团，七十军三十二师师部率一个野炮营（带十二门野炮、三门美式山炮）及一个辎重营，以及十二军一一二师三五五团团长率全团官兵，都向本军放下武器。这是敌人内部的新变化，是此次大歼灭战之又一个特点。"

发言人接着说："现今我们向一切尚未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队敲起警钟——他们应该从永城东北地区大歼灭战中取得三个悲惨的教训：第一，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而国民党的兵力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象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这样的三个兵团及许多特种部队共计三十万人在一起，结果都被歼灭了，则国民党的其他军队，更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第二，不论是国民党那一个军队，只要被人民解放军一旦包围了，便再也不能突围逃跑，再也没有一个援兵来增援了，唯一的生路是迅速缴枪投降。如果不迅速投降，结果不是饿死冻死，就是被彻底歼灭。第三，绝对不能违反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公布的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如果违反了，一定要受到严办。既然已经成了战争罪犯的人，如果能幡然悔改，带罪立功，尚可将功折罪；譬如被包围时，下令停止抵抗，有秩序地缴枪投降等等。反之，如果杀害俘虏，施放毒气，破坏武器等，则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坚决将他拿住严办。黄维被活捉了，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头等战犯杜聿明被活捉了，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们曾经几次向我军放毒气，但证明放毒气丝毫不能挽救他们。"

发言人谈到人民解放军作战表现时，他说："在全淮海战役中，我军连续作战两个多月，自始至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战役第一、第二两阶段中，我军曾以一夜一百二十里到一百四十里的急行军追击逃敌，渡河涉水，忍饥耐寒，不顾疲劳，不怕艰苦。而

在战役第三阶段中，我军在冰天雪地里，进行敌前学习，开展政治攻势，艰苦地进行近迫作业，冒极寒奋战，均表现了高度的顽强坚忍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我军在政策纪律、战斗与军事技术、作战指挥、战时的政治工作、参谋工作与后勤工作等方面，也都有很多的进步。在作战方面无论是阻击或攻坚，我军已能够进行近代化的正规作战。伟大的淮海战役，已经严重地和光荣地考验了我军。在这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决战中，由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中共华东局与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华北地方军并肩作战，各战场兄弟部队协同配合，华北、华东、中原三大解放区千百万人民全力支援，我军终于获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淮海前线1949年1月20日电）

淮海战役经过

（一）碾庄大歼灭战经过

前线记者报导敌黄伯韬兵团覆没的经过称：淮海战役开始后，我华东野战军各部即以疾风暴雨之势，横扫陇海路北侧三百里宽广地区的敌军阵地，由北向南猛进，截击并包围由运河东岸逃向徐州的黄伯韬兵团。东路我军首于八日攻克山东南部之郯城，全歼伪山东保安旅王洪九匪部五千余人。中路：沿津浦线南下之我军于八日争取敌三绥区两个军起义后，即由临、枣、峄、台穿过该部防地，直插徐州东侧。当我大军全线进逼陇海路时，驻新（浦）海（州）之敌第九绥区司令部率四十四军于六日弃城西逃。原驻陇海路徐（州）海（州）段妄图阻我南下之黄伯韬兵团四个军及李弥兵团两个军，至此亦不敢应战，汇合四十四军，分由新安镇及曹八集地区狼狈西逃。我各路大军跟踪急追，将慌逃之敌打得稀乱，三天中间即追歼各部逃敌近两万人。九日，黄伯韬亲率之二十五军，四十四军，六十四军，一百军逃过运河西岸，惊魂甫定，却不料被由台枣地区迅速南下以及由宿迁向西北插上的我军迎头堵击，将其与徐州的联络截断。我追击部队此时亦迅速渡过运河。黄伯韬走头无路，折回碾庄至曹八集地区，被我团团包围。其由新安镇地区西逃担任侧翼警戒的六十三军，九日晚到达窑湾，来不及渡过运河，亦即陷入重围。十一日围歼战正式开始，我首在曹八集及大院庄歼其一百军之四十四师全部，及李弥部第九军第三师一个团。接着又将被孤立包围于窑湾之六十三军全部解决，俘敌万余人。十二日以后，我逐渐紧缩碾庄地区之包围圈，将敌压缩于东西不及十里，南北不及六里之狭长地带。我军于完成合围后，便从四面八方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敌则踞守地堡工事，逐村顽抗。在战斗中敌曾数次向我施放毒气，但终未能挽救其被歼的命运。十二日晚我军即攻占碾庄外围前板桥、老初庄、王家集，火烧房子等村，歼灭四十四军大部，一百军六十三师大部，二十五军及六十四军各一部。十四日晚攻入碾庄西六里的彭庄，守敌一百军军部，六十三师师部及其两个团向碾庄逃窜，十五日晨在碾庄西三里的黄滩被我捕捉，大部就歼，该军副军长杨诗云及参谋长崔广森均被生俘。十八日续克黄滩，全歼敌四十四军军部，一六二师师部，一五〇师及四个团的残部共五千余人，军长王泽浚被俘，一五〇师师长赵璧光率残部二千余人自动投降。十九日晚我军对敌兵团部所在地的碾庄发起攻击，至二十日晨全部攻占，敌兵团部及二十五军军部被全部歼灭。战斗至二十二日黄昏，最后困守碾庄以东的大院上、三里庄、沙墩、尤家湖等村的残敌六十四军、二十五军各一部亦全被扑灭，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生俘。至此，黄伯韬兵团的四个军及其指挥下的四十四军共十个师，约近十万人，即全部覆没，人民解放军赢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当我军在碾庄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时，匪

首蒋介石曾慌忙由徐州以西将其所谓王牌军邱清泉兵团全部东调，加上李弥兵团共十二个师，由徐州沿陇海路南北两侧地区向东增援。邱、李以其五个主力师为前导，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向我猛烈进犯。我强大阻援部队在大许家以西陇海路南北两侧地区英勇抗击来犯之敌，经十昼夜激战，共毙伤俘敌万余人，击毁坦克三十余辆，敌平均每日进展不及两里。迄二十二日犹被阻止于大许单集以西之薛家湖、鼓山、狼山、林佟山、潘塘、柳集一线，眼看着黄兵团的全部被歼而无可如何。

（新华社淮海前线1948年11月30日电）

（二）歼灭杜聿明集团作战经过

杜聿明匪部的全军覆没，已经胜利地结束了人民解放战争中空前大规模的歼灭战——淮海战役。

当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还正在进行中的时候，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就开始了对杜聿明匪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的更大的围歼战。十二月一日，南逃被阻的杜聿明匪部三个兵团及特种部队、非正规军和后方机关等共约三十万人，抛弃徐州西逃。他们以一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奔跑着，但是只跑了一天，追捕的解放军就扭住了他们，至四日就将他们全部包围在永城东北李石林、青龙集、陈官庄一带纵横不过二十里的地区。在逃跑中，争先恐后的三十万敌人混作了一团，辎重大炮和汽车遗弃满途，官兵除纷纷逃亡外，被解放军毙伤俘二万余人。六日，孙元良兵团向西突围，但大部立即被歼，少数逃出包围圈的也在途中被追歼。此后，自八日至十五日，敌人又曾数次试图突围，但都遭到解放军的痛击而完全失败。

饥饿和严寒使被围困的敌人陷入极大的混乱和绝望中。敌人在逃跑中丢掉了棉衣棉被，没有粮食，没有燃料，连马皮也吃光，连作工事的木板也烧光，在大风雪中大批冻死饿死。为了给敌人以最后一条生路，从十二月十六日起，解放军停止攻击，命令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立即率部投降，同时开始了普遍的火线劝降工作。成排、成连、成营不愿为杜匪等送死的国民党军官兵，不顾严密的封锁和残苦的镇压，逃过火线向解放军投降，至本月五日止，这样在解放军劝告下投降的就共有一万四千余人。但是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匪首，不但拒绝投降，并且不顾解放军的警告，向解放军连续放射毒气弹。

六日下午三时，解放军对不愿投降的敌人开始了最后的总攻击。英勇无畏的解放军迅速击破了敌人的抵抗。十日上午十时，解放军就全部解决了敌人。从六日下午三时发起攻击起，不到四天，这一拥有约三十万人的杜聿明匪部就此全部覆灭了。

围灭杜聿明匪部是淮海战役中最后的也是胜利最大的一个阶段。据初步计算，解放军共歼灭敌人一个“剿总”副总司令指挥部，三个兵团司令部，十个军部，二十五个整师，连同特种部队，非正规军及后方机关等共三十万人。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是十一月七日在徐州以东碾庄地区围歼黄伯韬兵团。在这一阶段中共歼敌一个绥署指挥部，一个兵团部，八个军部，十八个整师，连同其它非正规军，等共十七万八千人。自十一月廿

四日至十二月五日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歼灭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解放军在双堆集地区共歼敌正规军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十一个整师共约十一万人。

整个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至本月十日止，前后共历时二个月零五天，解放军一气歼灭了一个"剿总"副总司令指挥部、一个绥署指挥部、五个兵团司令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五个整师（内四个半师起义）等共约六十万人。在淮海战役发动时集中在淮海战场上的所有国民党匪军，即徐州的杜聿明指挥部及李弥兵团，徐州以东的黄伯韬兵团，徐州以西邱清泉兵团及刘汝明兵团，徐州以北的冯治安部两个军，徐州以南睢宁、宿县、灵壁的一个军另二个师，以上共四十九个师，除冯治安部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兵团在被歼一个师后其余五个师负创侥幸脱逃外，其余全部被歼，另外还多歼灭了一个在淮海战役开始后由豫南调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十一个师。由于解放军解放了淮河以北的全部地区，和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经过淮海战役，整个南线的国民党匪军已遭受了无法挽救的致命打击。国民党的主力部队现在已丧失殆尽了，而整个南线的兵力也所余无几了。据统计：现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津浦路两侧地区只有十一个军廿五个师，加上汉口信阳地区和鄂西地区的国民党军，也不过十九个军卅五师，比淮海战役被歼部队还少二十二个师。

（新华社淮海前线1949年2月19日电）

〔附〕淮海战役期间蒋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

郭 汝 瑰

一、何应钦提出统一指挥中原作战的建议和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十月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完全丧失，反动政权有摇摇欲坠之势。十月下旬，蒋介石亲自在北平指挥辽沈战役。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见形势不利，而蒋介石对全国性的战略未作决策，为了妄图保持半壁河山，乃于二十二日召集刘斐、萧毅肃、郭汝瑰等研究中原作战的计划。何、顾认为辽沈战役失败已成定局，从全国形势看，应诱导华北"剿总"以主力保持于津沽地区进行持久战，以牵制东北野战军，使解放军不能增兵黄河以南，以便徐图改变其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徐州"剿总"刘峙及华中"剿总"白崇禧分别掌握，相互协作很差。刘峙是有名的"福将"（这是反动军队中讥讽刘昏庸糊涂的代名词），不堪担当重任。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蒋介石撤销其"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时，内部即

有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各军之议。后因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不放心白崇禧，所以另设徐州"剿总"，任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之兵权。当时反动派内部议论纷纷地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我那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把这笑话谈给顾祝同听。顾说："徐州剿总的人选，我们考虑过两个人：刘经扶和蒋铭三（即蒋鼎文）。蒋铭三日嫖夜赌，不理事；比较起来还是刘经扶好些。"这样刘峙终于在徐州作了半年的总司令。

现在，何应钦觉得不妥当了，他又重新提出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之议。（本来何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但蒋介石疑忌何应钦而信任陈诚，因此何又与白崇禧拉拢。）并且根据中原野战军主力向禹县移动的情报，判断中原野战军即将进攻郑州，也可能协同华东野战军向徐州"剿总"的辖区进攻；因此主张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以第十二兵团所辖第二、第十、第十五及第十八等四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之作战。当日即作成方案令我于二十三日送往北平向蒋介石请示。临行顾祝同还再三向我说："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我到北平见蒋，蒋于当午作出如下决定：

（一）徐州方面应取攻势防御，可放弃郑州、开封、兰封等城市。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应固守商丘，第四十军李振清部可由郑州退黄河北岸，准备以后打游击（按二十二日国防部令李振清机动作战，李部当日即已退出郑州，并被歼灭，蒋介石此时尚不知道）。

（二）华中、徐州两总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

（三）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可归入第十二兵团序列，华中"剿总"必要时可以放弃南阳，以便第十二兵团进出周家口。

（四）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我遵照顾祝同的叮嘱，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蒋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这当然是蒋介石敷衍白崇禧，表示对他很放心的一种姿态。

二十四日，何应钦电白崇禧，告以关于统一指挥的决定，并以蒋介石名义下达作战指示如下：（按：即蒋介石酉敬防挥电）

徐州方面：（主要几点）

（一）应对陈毅部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共军，……并巩固徐州附近地区而确保之。

（二）第七兵团（黄伯韬）第十三兵团（李弥）两兵团分别控制于阿湖、新安镇、八义集各地附近机动，截击南窜之共军，应援东海方面之战斗……。

（三）第二兵团（邱清泉）应机动控制于砀山附近，依情况协同黄维兵团夹击进出于黄泛区之刘伯承部。

（四）第十六兵团（孙元良）于刘伯承部主力向黄泛区窜犯时，向宿县蒙城各地附近转移，尔后控制于蚌埠机动……（按：该兵团此时在柳河附近）。

…………

（六）第三绥区（冯治安部）应以主力控制于运河以西地区台枣支线，担任守备

……。

（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应以主力守备商丘，一部掩护陇海铁路东段之交通。

…………

（十）徐州"剿总"应加强徐州、蚌埠、淮阴防御工事，务期坚固守备，以形成机动兵团之核心，并预作因陈毅部之南窜可能引起各种应战之准备。

华中方面：

…………

（二）第十二兵团（黄维）并指挥第二军、第十五军，应索刘、陈（赓）等主力"进剿"，如刘伯承主力越平汉路东窜，即先机推进周家口附近，适时联系邱清泉兵团夹击而歼灭之。

……………

十月二十九日，何应钦于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但对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二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解放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找解放军决战。为了配合徐州方面的作战，华中"剿总"必须以黄维兵团向周家口进出。第二种意见是：退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研究结果，认为退守淮河，则尔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解放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蒋军更为不利。因此，会议采纳了第一种主张，并于当日电徐州"剿总"于必要时可令刘汝明部放弃商丘。

二、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和顾祝同企图改变分离态势的失败

十月三十日，白崇禧由汉口到南京。当日下午五时，国防部开会讨论中原作战问题，白满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并自动提议以第三兵团（该兵团辖第七、第四十八军，均广西部队）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但三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开会时，白突然变更主张，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并且以为第二军及第十五军在形势和距离上不便归第十二兵团序列，而只同意以第十四军、第八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即是第十二兵团指挥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等四个军进出周家口附近机动。华中"剿总"并于当日下午十一时下达如下命令：

（一）以徐州为中心之陇海会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二）黄维兵团即东移确山，轻装开太和、阜阳地区集中，十一月十日集中完毕。

（三）第八十五军主力俟第三兵团先头到达随县后，即开广水，车运确山归还第十二兵团建制。

………………

（六）第十四军即由南阳东移确山归还建制。

白崇禧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改变统一指挥的原议呢？当时国防部的人们推测，这是白崇禧怕蒋介石作成圈套，准备于会战失败时委过于他。以后事态发展，才知道这与美帝国主义支持李宗仁，逼蒋介石下野有关，他是安心拆蒋介石的台。

由于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而刘峙又十分糊涂，无能指挥即将爆发的陇海会战，蒋介石（十月三十一日由北平回南京）乃决定于十一月四日亲往徐州，后因事临时改由顾祝同去代他调整徐州的部署。顾祝同偕我等于四日到徐州。五日上午顾祝同召集徐州"剿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与邱清泉、黄伯韬、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司令及可能离防到徐州的军长等，研究徐州方面的作战部署。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说，华东野战军的三、八、十、十一及两广纵队在鲁西，先头已到曹县、城武。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则说在郯城以北地区发现解放军强大部队，可能要向该兵团进攻。会议结果，认为无论华东野战军主力何在，其徐州"剿总"各兵团在陇海路上一线排列，态势不利，必须调整。于是根据"守江必守淮"的方针，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以巩固长江而保卫京沪；并决定于必要时以徐州"剿总"移蚌埠指挥，徐州以一、二个军坚工固守。当晚顾祝同返南京，六日补发正式命令如下：

（一）徐州守备部队应切实加强工事坚固守备。

（二）第七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绥区、第三绥区密切联系，并在运河以西地区"清剿"。

（三）第二兵团以永城、砀山为中心集结，并在附近"清剿"。

（四）第十三兵团应集结于灵壁、泗县地区机动并在附近"清剿"。

（五）第十六兵团即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铁路之安全。

（六）第四绥区移驻临淮关，以原第八绥区为该绥区的辖区，原第八绥靖区着即撤销。

（七）淮阴守备应由第四军担任。……

（八）东海方面应行机动作战。

顾祝同发出上述命令后，又认为在东海的第九绥区及第四十四军由海上撤退，有许多困难，乃令各该部兼程经新安镇向徐州撤退。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后，受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指挥，一同退过运河。第九绥区人员到徐州待命。

顾祝同的如意算盘，以为用少数兵力固守徐州，可以使解放军不能有效利用陇海铁路东西调动军队。且主力控制于徐州、蚌埠之间，则当解放军向徐州进攻，或沿平汉铁路或经苏北地区南下时，均可集中五个兵团寻求决战，在解放军未能击破其主力以前，便可保持淮北，因此也守住了长江。但是他改变态势的企图未能实现，由于第九绥区及四十四军撤退的影响，黄伯韬在新安镇迟两天才开始撤退。八日解放军发起进攻，黄伯韬兵团退到运河，由于只有一座铁路桥，不能迅速过河，而蒋军第三绥区部队又在这一天起义，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路，使解放军山东兵团得以迅速南下。当日徐州"剿总"的刘峙惊慌失措，将在曹八集附近集中的第十三兵团向徐州收缩，以确保徐州而置第七兵团于不顾。虽然这一天国防部曾令刘峙集中其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各兵团

向东进攻以援助第七兵团，刘峙也下令第十六兵团开往徐州，但是并不援助其第七兵团而只巩固徐州。十日黄伯韬兵团便被解放军合围于碾庄附近地区。反动派想收回挨打的架势，却被解放军抓住了一只胳膊。

三、杜聿明的上中下三策和黄伯韬的三不解

黄伯韬被围后，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半在南京伪总统官邸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徐州方面的作战。这时他理解到刘峙不能担任徐州方面的指挥，才决定命杜聿明以副总司令的名义全权负责指挥徐州方面的作战，并以戌蒸防挥督电对徐州"剿总"下达如下的指示：

（一）应本内线作战的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而歼灭之。力求决定性的胜利，宜尽百般手段，迟滞阻止由西东窜之共军三、八、十纵队越过津浦南段参加其主力军之作战。（在徐州以西实际上是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邱清泉谎报为三、八、十纵队。）

（二）黄伯韬兵团之第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

（三）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之作战。

（四）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

（五）徐州守备部队应坚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共军之攻击，形成战场之坚固支撑点，以利决战。

（六）孙元良兵团应即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阻击共军三、八、十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

（七）刘汝明部即集结于固镇、宿县维护铁路交通，并"清剿"铁路两侧共军。

但是当天徐州"剿总"的意图，与国防部的作战方针相违背，其主要企图是巩固徐州。下午十时刘峙电蒋介石称："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伯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蒋介石于十一日午复电予以批驳说："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戌蒸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第七兵团先被击破。"

十一日晚，杜聿明决定以第十三兵团之第八军、第二兵团之第五、第七十等三个军向东进攻，以第七十四军梯次配备掩护右翼侧。十二日开始进攻，遭到解放军坚强阻击，进展很微。十五日，顾祝同和我又飞往徐州促杜聿明东进，以解其黄伯韬兵团之围。杜聿明对我说："目前徐州方面的作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保住徐州并救出第七兵团；中策是牺牲第七兵团，保住徐州；下策是第七兵团救不出来，徐州也保不住。"他的意思是说向东进攻解救黄伯韬兵团是下策；他的所谓上策，实际上并没有，不过是提出来做陪衬，以反对向东进攻而已。

十七日，在徐州以东阻援之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故意稍向东撤退。徐州“剿总”十八日就宣传共军全面退却，并下令向运河线追击。当日午其第二兵团及第十三兵团进至大许家南北之线，遭坚强抵抗，才知解放军并未退却，第七兵团仍在被围歼中。二十日上午十时，我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奉蒋介石的指示同去徐州与刘峙、杜聿明等商量突破解放军大许家阵地的战法，商决先集中空军轰炸狭窄地区，然后陆军以炮火及战车支援步兵以多梯队向纵深方向突击，并向两侧卷击。如本日能有五公里的进展，以后即继续突破。如本日突破不可能，则集中主力击破二陈集、潘塘镇方面的共军，然后由右包围，以解决战局。刘峙则对我说：“（一）请总统亲临指挥；（二）速空运两个军增加；（三）请总统下决心以全力东进，对徐州安全可置不问。”不知他是想推脱责任故意说漂亮话吗，还是想借此让杜聿明上前去指挥，他好离开徐州去到蚌埠以求自身安全。延至二十二日，第七兵团完全被歼。黄伯韬与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于二十二日由碾庄东北之小费庄向西突围，至一独立家屋草堆下，黄举枪自杀。黄临死时对杨廷宴说：“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四十四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黄死后杨见解放军一个战士走来，他就诡称死者是他的哥哥，只有兄弟二人，他是奉母命来探视哥哥的，不料哥哥被打死了，言罢伤心痛哭。那个解放军战士说也只有一个母亲，似乎很同情他，他乘机把黄伯韬的手枪交给这个解放军战士，请协同他埋葬。埋后他记下了地点，树立标志，逃回南京向顾祝同报告上述情况。顾派人按所说地点将黄伯韬尸体运回南京。

四、蒋介石企图三路会师宿县恢复徐蚌间交通和杜聿明放弃徐州走向溃灭

在黄伯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围歼的过程中，中原野战军于十一月十五日围攻宿县。蒋介石当时曾令其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由固镇北进解围。十六日宿县解放。十九日黄维兵团到达蒙城，蒋介石令其向宿县前进。至二十二日黄伯韬兵团被歼灭时，李延年兵团仍徘徊于任桥集以北地区，黄维兵团已进至宿县西之赵集附近，并继续向宿县前进中。二十四日，蒋介石召集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军事会议，决定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以便南北夹击，打通徐蚌间津浦路的交通。他定下这个决心之时，其第十二兵团正在向南平集进攻，当晚即被中原野战军合围于双堆集附近。蒋介石得知第十二兵团被围后，认为黄维尚有力量打破包围，至少有力量持久，以待徐州各兵团前往解围。到二十八日才察觉黄维兵团赖其本身的力量不可能脱出包围，于是令其扩大防守地区，固守待援。当日并召杜聿明到南京，研究徐州方面以主力南下援救第十二兵团的办法。参加会议的还有何应钦、顾祝同、刘斐、我及几个参谋。

杜聿明在会议中说：“徐州各兵团沿铁路正面进攻，进展甚微。且共军已完成了几道预备阵地，如继续正面进攻，徒增多伤亡，结果还是不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

的。”有人提出由左翼或右翼包围，杜聿明也反对，认为还是攻不动。蒋介石问他究竟怎么办，他说最好以主力由双沟经泗阳直趋五河，然后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北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问他在港汊纵横的地区运动，在遭受解放军侧击时怎么办，他笑而不答，然后他请蒋介石进入会议室旁的房间，二人密议。这时刘斐很不高兴地说："还有什么办法，无非是由徐州西边逃跑嘛。”何应钦、顾祝同等也转不过面子来。正在难为情之际，听了这话，也都勉强笑了起来。一会儿蒋介石和杜聿明出来了，蒋介石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出席人员都不说话，蒋介石就宣布散会。杜聿明当日返回徐州。

十二月一日，空军向蒋介石报告，徐州的国民党部队已安全撤出徐州。二日又得知徐州各兵团的先头已抵瓦子口附近；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的解放军已大部向北移动。蒋介石认为情况可以乐观，乃以第五十四军加入第六兵团序列，令第六兵团向罗集方向推进，以解第十二兵团之围。当日并令经南京去上海就医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乘小飞机进入双堆集协助黄维指挥，固守待援。同时又顾虑杜聿明所率各兵团一意向西南逃走，消极避战。乃于十二时以亲笔信空投给杜聿明，令杜聿明趁解放军分离，各个击破。晚又亲电杜聿明云："应速决心于两日内立即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敌部（不足四万）此为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之敌必于三日后麇集弟部周围，又处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切勿再作避战迂回之图。弟南下十五万众，皆聚集在吴集周围地区，此最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敌出击。否则臃肿滞延又将坐待被围矣。如欲占领永城牵制敌主力，可派有力部队进占，切不可全部进取。据报马庄敌之先头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则我军又落后一着。若再用主力攻城，是最不上算。此时应决心觅敌之主力而歼灭之为唯一急务。”尽管蒋介石主观上对杜聿明有所奢望，但二日，杜聿明因"部队零散，无法应战，故停止整顿一晚，三日继续攻击前进，则四面皆敌，且战且退，极为迟缓"（此系杜聿明四日十时复蒋电用语）。结果在陈官庄、青龙集、洪河集附近被围。

杜部被围后，蒋介石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只希望杜部各兵团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以与黄维兵团会师。一面仍催促李延年兵团由新桥曹老集向双堆集方向进攻。但是遭解放军坚强阻击，杜聿明和李延年两方面都无进展。蒋介石此时唯有从其华中"剿总"方面抽调兵力以增强李延年兵团向西北进攻。但白崇禧与蒋发生矛盾，五日奉命东调的第二十军部队在汉口上船完毕，白崇禧曾一度阻止其开船。八日蒋介石又下令调第二军由襄阳至沙市船运南京，白崇禧又坚决反对。

当日蒋介石还令向双堆集大量空投粮弹，并授意空军投糜烂性毒气弹。交通部长俞大维向蒋介石说："糜烂性毒气弹，国际公法禁止使用。”蒋介石才叫改投催泪弹，还说："这不是毒弹，可以使用。”十五日黄维下令突围，结果当晚全部被歼灭。蒋介石于十六日决心部署江防，令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退守淮河南岸，以掩护江防部队构筑工事。此时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建议蒋介石交出军政大权以作和谈的准备，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任总司令负责军事，李宗仁代理总统负责政治。这虽然是反革命两手中的另一套手法，但蒋介石仍垂死挣扎，二十日下令以第九十九军、九十六军、五十五军、六十八军守备淮河，以第二十八军于浦口占领桥头堡，第五十四军、三十九军均开江南，归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并令第二军由汉口船运芜湖集结。二十一

日白崇禧表示如果蒋介石必定要调走第二军，则呈请辞职。蒋介石为了防白崇禧阻挠第二军的运输，令我电第二军由沙市经常德徒步至长沙经浙赣路车运南京。顾祝同与林蔚怕弄成僵局，与蒋介石商量，允白留第二军的一个师在宜城、荆门，该军其余部队仍调芜湖。二十四日白崇禧，程潜发出请蒋介石下野的电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杜聿明部全被歼灭。蒋介石于二十日溜往原籍——溪口。

〔附〕战略决战期间反映美蒋对其前途悲观、恐慌状况的若干资料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一）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

近来东北战事失利，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而变相的物价高涨，更是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词所能粉饰的了。

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那里呢？希望又在那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作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在戡乱过程中，许多人只知注意装备和对付共产党的方法——总之，只知注重有形的物质条件。毫不注重精神条件，特别是政治改革。“军事是政治底延长”，这是人人应该明了的常识。没有健全的政治，怎会有健全的军事？没有有生命有内容的政治，军事又怎能满意呢？国事发展到现在，应该可以使人痛切觉悟，欲求戡平共党祸乱，挽回目前军事上不利的形势，固然不可不从注重加强军队之有形的装备着手，而更重要的则是由军事力量所从出的政治改革着手。这是什么意思？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共产党在德国具有相当的势力。德国怎样应付这种局面呢？孙

中山先生已经说过，德国首相俾斯麦毅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而将共产党借以猖狂的题目从共党手中夺过来，结果共产党在德国不复能有所作为。这证明了俾斯麦不愧为一手腕灵活的政治家。今日中国正遭逢太平天国之变以后最大的变乱。固然这一变乱有国际阴谋为之助长扩张，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归根究底还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毛病太多。共产党的主要目的虽是夺取政权，但是在表面却利用这些社会毛病来号召人民。这就说明为什么戡平共产党是这么艰巨的事业。若是我们要戡平赤祸，我们必须效法俾斯麦对付德国共产党的办法；把题目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目前少数人这样享有一切特权，他们的生活骄奢淫逸，一文钱也不肯出，没有一个人去当兵，却完全要穷苦的老百姓抽丁纳粮。这如何能使人心平气服？如何不令反对者有所借口？

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的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只有这样作才能将这个局势扭转过来。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我们走少数派的路线，那末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如果我们走多数派的路线，甚至口里不标榜革命，老百姓还是知道我们是革命的。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那末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之而大振。区区共党匪徒，不足平也。

退一百步说，长江以南地区尚足可抵欧洲十余国，人口有二亿以上，出海便利，物资丰饶，交通发达，较之北伐时代的凭借，其优厚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要悲观？根本毛病就在自身。如果吾人能确实掌握并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那末消灭共产党实绰有余力，而确实动员这一广大地区底人力物力，最根本的关键是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绝对不能靠一纸公文命令。必须政府负责者先作几件大快人心之事，振奋沉闷已久之人心，以事实来证明大公无私和剿匪并非保卫特权阶级的利益，而确系为保卫领土之完整，为保卫人民之自由与民主，为保卫我们的历史与文化。若是吾人能作到此点，形势必会为之一变。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二）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

我们召集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高级人员和各兵种武官开会。在讨论军事情况之后，他们一致认为，鉴于局势的再形恶化，如果不实际使用美国军队的话，那么无论多大的军事援助都挽救不了目前的局势。大家同意使用美国军队既是不可能的，因之得到这样的结论，认为中国或是美国都不能得到采取军事措施的充分时间以挽救军事局势。大家同意，傅作义不能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而陈毅对付徐州地区那些劣等的国民党部队，能在两星期内到达南京附近的长江沿岸。

因此，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了。确言政府是否将由一共产党政府或一共产党控制的联合政府来代替，为时尚属过早。然因在此任一种情况之中，我们还是必得设法使之从恶劣局势中得到最好的，并且能保留多少是多少。

大使馆将留在南京，除非局势发展指出离开南京是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希望国务院有所指示。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版）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甲 目前的形势

（一）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歼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八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六十几个整师。上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二百一十个师以上，内有一百七十三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可能动员五十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我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末，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二）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三）到南方去作战的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以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大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七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到南方去作战的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我党在那里的组

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将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这些都是不利条件。以上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我们均必须看到，并且必须明白地讲给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听，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

（四）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五）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六）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的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地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说是"偏向已经纠正了"，并不等于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偏向，或者将来也不会再发生偏向。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

乙　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二）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

还是相当严重的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须的基础之上更具有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

（六）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信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八）一九四九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九）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信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亦是如此。

（十一）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十三）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十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

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分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

（十五）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十六）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十七）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

中共发言人对和谈问题发表谈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二十二日报导，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ＣＣ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新华社陕北1949年1月25日电）

〔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我们现在已经先后进入解放区来了。回忆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建议召开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加速推翻南京卖国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一致认定，这一解决国是的主张，正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用特率先通电响应，并先后进入解放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进入解放区后，我们首先获得的印象，便使我们充分欣慰。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支援前线。中共党员，尤能以身作则，发扬超度自我牺牲之英勇，为民前锋，不辞劳瘁。而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大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威力，发动迭次攻势，三阅月之间，先后歼灭了蒋军百余万，解放了整个的东北，和接近整个的华北与华中。军事的矛头，已经指向大江南岸了。毫无疑问，在一九四九年之内，中国是要得到全面解放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南京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确是快要土崩瓦解了。军事挣扎既已绝望，乃改变花样，企图以政治阴谋苟延残喘。早在北线蒋军开始溃败时，美帝国主义即已发动其阴谋活动，采取着双管齐下的破坏中国革命之毒计。一面，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酝酿反对派组织，希望阻止或缓和革命的步骤；一面，则嗾使南京反动集团，发动和平攻势，以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们今天要明白表示我们的信念。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辛亥以来，历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是障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敌人，倘若不加以彻底廓清，则名实相符的真正和平，绝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而在我们人民民主阵线内，更必须提高我们的警惕，整肃我们的阵容，齐一我们的步伐，巩固我们的团结，以防止反革命势力之侵入。人民民主专政应容纳最广泛阶层人民之代表，而不能容纳反革命细菌；应使最大多数人民有充分之自由，而不能使少数反动分子有反人民之自由。由此，我们确信，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

线之存在。反动政权在摇摇欲坠的当前，和平攻势是愈来愈离奇了。中国的第一号战犯蒋介石的元旦广播，便公开了第一次求和的哀鸣。然而，那完全是出于欺骗。他把他祸国殃民、昭昭在人耳目的历史罪状，完全推卸了，厚颜无耻地竟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条件："只要和议无损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的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有了这些条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蒋朝政权尽可万世一系，还要"他求"什么呢？故他最后强调，他要与中共"周旋到底"，而呼吁着"军民一体，举国一致，团结奋斗。"这就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

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最后考验。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我们相信，决不会再受蒋美反动阴谋的欺骗。但在少数人的气质中，也尽有这样的弱点存在，以协调为上德，以姑息为宽仁，在苟且偷安的本质之上披复着悲天悯人的外衣。这就是敌人施行和平攻势的最后心理根据，也就是敌人的最大的奥援。我们为了摧毁残敌，这最后的奥援也是应该连根铲去的。

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决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但我们很愉快而且很兴奋，我们毕竟看到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最近所发表的对时局声明。为了贯彻革命到底，为了粉碎和平攻势，他明快、坚决、周密、严正地揭穿了蒋美集团的阴谋，而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个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这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

今天是我们人民翻身改造历史的时代了，我们要创造一个人民做主人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尽可能地高度的生活水准，而不是如蒋介石所要求于我们的"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最低的生活水准"。蒋介石要我们始终做四大家族和美帝国主义的奴隶，而我们则是要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真正的主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毛先生所提出的八项条件，正缺一不可。不妨让我们换一个语调来重述一遍，便是：战争罪犯必须惩办；伪宪法和伪法统必须废除；一切反动军队必须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官僚资本必须没收；土地制度必须改革；卖国条约必须废除；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而将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将要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必须拒绝反动分子的参加。一句话归总，便是人民革命必须进行到底。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天，便是真正的和平到来的一天，解放全面到来的一天。解放了的人民，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请看我们的友邦苏联吧，建国仅仅三十二年，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坚强的和平堡垒了。我们中国人民多过苏

联两倍以上，更加以地理上的优越条件，我们敢于相信，把反动政权摧毁以后，我们能以较短的期间建设成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光明的远景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一致努力。

李济琛、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萬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冯裕芳、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

（转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四集）

南京反动政府以假和平对抗真和平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已经如此无可争辩地成为全国的唯一国是，以致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从二十二日起也不得不假装奉为谈判的标准。南京反动政府的工作现在集中在两方面：第一，尽力保存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势力，使之安然渡过目前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以便在适当时机卷土重来。他们希望取得三个月喘息时间，整编及新编几十个师，以利再战，此项密令已由战犯顾祝同发出。第二，歪曲八项条件的内容，使之由真和平的条件变为假和平的条件，并在这种假和平的基础上团结各种不坚定的和伪装的“民主”分子，来形成一个对抗真和平运动的壁垒。南京反动政府关于保存蒋介石反动集团势力的计划，首先表现于第一号战争罪犯蒋介石的“离职”行动。蒋介石“离职”的真相甚至美国资产阶级也并不加以隐瞒。早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预告说：“残酷的事实显示：共产党的胜利已接近完成，蒋介石对国家的唯一价值是使他个人的地位在退隐中仍保持对国家的效劳。”现在蒋介石正是这样地保持着他“对国家的效劳”。美联社南京本月二十二日电称：“李宗仁本人以及政府其他人物都不认为李已是蒋介石的确定继承者，而认为他不过是蒋离职期间的代理者而已。”该电讯暗示：“蒋介石可能在嗣后宣布李宗仁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为无效”。该电讯指出李宗仁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政府机关和资财的继续南迁，而且不能指挥蒋介石的军队。路透社上海二十四日电称：十五万至二十万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军队正在开往浙江、江西、广东与福建，这是“四日来政治戏剧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国民党的一切实际力量都在继续准备作战。完全可以相信：蒋介石对于这些南迁的武装力量和文装力量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指挥权。事实上美国政府已使蒋介石与李宗仁实行了这样的分工：蒋介石离开了不安全的南京，继续以“总统”的身份实际上指挥作战的力量在江南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台湾各地布防，而令留在南京的李宗仁利用他的“总统府”作为舞台，演出种种“和平”的戏剧以掩护作战力量的部署。因为用“和平”来建设“长江防线”现在是比军事的防线似乎较为有用些了。为此目的，中国第二名战争罪犯美国傀儡李宗仁和南京其他伪装主和的人们现在在口头上声明承认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一切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及全国人民所一致支持的八项条件。但是他们的声明是真的吗？人们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李宗仁所指定的和谈代表邵力子张治中正在散布对于八项条件的荒谬曲解。例如据法新社南京二十三日电称：邵张竟试图把“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曲解为依据从未生效并早已作废的一九四六年二月马歇尔方案来改编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最可注意的是邵、张关于第一项条件

即惩办战争罪犯的表示。他们说："蒋介石既已去职，政府刻正等待共方表明对于载在他们的战犯名单上的其他四十二名战犯的意图。"这里划出了真假和平的分界线。假和平的阴谋家们以为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离开南京就算是惩办战争罪犯。人们要问：这是惩办战争罪犯吗？这不过是窝藏或放纵战争罪犯罢了。紧接在蒋介石之后，南京其他首要战争罪犯陈立夫、谷正纲等均已相继逃逸，宋子文则已逃往香港。路透社南京二十三日电称："名列战犯名单的国民党领袖们今日正在南京摒挡行装，以备随蒋介石做可能的逃亡。对中共不寄任何希望的大多数战犯业已离此他去。"现在南京李宗仁政府及其合作者有一个方法证明他们有无和平的诚意，这就是把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桢国、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劢、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一大批首要战犯立即加以扣留，并将国外的战犯缉拿归案。此间观察家认为：南京伪代总统李宗仁和伪行政院长孙科本人都是重要的战争罪犯，张治中和邵力子都是过去与共产党签订过种种协定、后来撕毁这些协定时他们一声不响、并参加伪国民大会拥护蒋介石做伪总统的可爱的人物，李宗仁政府的先生们如果想要依靠玩弄花样来取信于人民，那是徒然的；只有他们实实在在地执行了八项条件的第一条的第一步，即将战争罪犯们加以扣留交给人民政府审判，他们才有因将功折罪而获得人民宽恕的可能。

〔附〕蒋介石的新年文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及宪政政府成立一周年纪念，我深觉建国事业陷于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愧万分。

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之主要目的乃在于为和平建设奠定坚固之基础，以期减轻人民痛苦。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东北，以期保持我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但不幸我们未能做到这些。

另一方面，济南已沦于共党，郑州、长春与沈阳亦相继陷入彼等之手。一九三一年之沈阳悲剧现已重演。华北、华东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胁。

处此国家危机，我惟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负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家族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来决定。

政府应付这一局势的政策，成为我同胞每一个人异常关怀的问题。我们相信所有爱国公民均不能忍受共党之“清算”、“斗争”，他们绝不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处此危急之际无所行动。

但我们也深知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大家也都希望战争及早结束。中正受全民的付托，负国家的重责，对于当前的局势自应有详切的检讨，而对于人民的希望更不能不作深长的考虑。

国父说：“中华民国之建国，其目的在和平”。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

所以抗日战争再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

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

最后共党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与民族生存之道。

战争结束后不久举行之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所以我们同胞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问明共党对和平之意向究竟如何。

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反之，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别无他途。尤其京沪地区为政治中心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战争转变的枢机亦在于此。

我同胞须知今日惟有军民一致，坚持自卫战争，而在决战之中获得胜利，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更惟有忍受一时的痛苦牺牲，才能获致光荣的胜利。中正个人自参加国民革命以来，迄今凡四十年，我在每一长期战役之中，都是备历艰辛，饱经挫折，受尽诬蔑，无论失败到什么程度，我始终持有必胜之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遇。

要知道我们在斗争中所倚恃者为民族精神、人类正义与世界公理。共党匪军的暴力能劫取我东北，却不能征服我们的民族精神；能侵入我们的腹地，却不能侮辱我民族的人格。

正义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要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而且必须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

同胞们：当此民族危机之际，更觉中正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希望我爱国同胞与余共勉，团结一致，为保持宪法之庄严，中国领土及主权之完整，人民之自由，以及文物之延续而奋斗。国父说："最后成功归于最后努力者"，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附〕揭露蒋介石以和平为掩护加紧战争准备的几个有关材料

（一）蒋介石死党准备卷土重来又一铁证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论委员会三月卅一日发出的宣传指示，最确切地刻划了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今天的政治面目。该指示全文如下："各党报社鉴：投降主义者责备本党不肯承认失败，此种论调含有严重之误谬与毒素，必须明白分析。（一）吾人承认政治、军事、经济三方面之缺点与错误，招致今日之失败。吾人必须深切反省，痛加改革。（二）吾人不能承认今日之失败为中国反共斗争之最后失败。中国之反共斗争为世界反共斗争之一部分，一环节，今日世界民主国家反侵略阵线正在结成，苏俄之扩张政策如不停止，必将促成世界大战。苏俄如在大战中失败，则中共纵能控制中国之全部，仍属徒劳。因此，中共今日之胜利在世界大战上并无决定的意义；而吾人今日之失败，亦不是决定的，更不是最后的。（三）吾人今日必须继续奋斗，以阻止中共发展及情势恶劣，挽救中国，不使其重作大战战场。吾人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之奋斗一日不停，则中国即一日不灭亡。中共必欲灭亡中国，其结果只有提早世界大战，使中国问题在世界问题之总解决中得到解决，因此，吾人今日之失败，不过是世界民主与极权全面斗争过程中之一道波纹。（四）只有吾人自甘暴弃，向中共投降，而停止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之奋斗，始为吾人最后之失败，亦即为中国之彻底灭亡。社委会三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颠倒黑白，把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主义主人称为"民主"，"反侵略"，"挽救中国不使其重作大战战场"，"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而"奋斗"，而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加以种种污蔑，是不值一驳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不承认自己的最后失败，甚至在中国之全部都已经解放以后，他们仍然要"一日不停"地"奋斗"，以待世界第三次大战中卷土重来。国民党反动集团所最恐慌的，就是国民党内已经有许多人承认失败，决定停止反革命的"奋斗"而向中国人民投降，因为这将帮助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最后失败和彻底灭亡。人们由此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的教训：

第一、国民党中一切愿意脱离这个至死不悟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的人们，应当勇敢地反抗蒋介石死党的意志而向人民靠拢，这是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道路，即被反动派骂为投降派，也不要害怕。第二、中国人民在今天，以及在全中国解放以后，必须继续向坚持反革命到底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必须知道，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对于革命人民反抗，将因其被人民推翻的缘故而更加紧张起来，因此对于这种敌人的警惕性也必须加强起来。

（新华社北平1949年4月5日电）

（二）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和谈掩护扩军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和平谈判的幕后，正加紧编练军队，准备继续反革命战争，并待机向人民反扑。伪国防部已设置了十四个编练司令部，负责编练国民党匪军，妄想把在三年反人民内战中被歼灭的部队全部恢复起来，使目前已经削弱到只剩一百多万人的国民党正规军从新扩充为三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据已有材料，目前已经建立番号正在进行补充和编练的反革命部队，共有三十七个军和两个师，不久以前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的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等所属各军，亦在恢复之列。这十四个编练司令部的司令人员、驻地及其负责编练部队的番号如下：

第一编练司令部：司令王敬久，驻福建龙溪，辖第五军、二十五军、一二一军。

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胡琏，驻江西上饶，辖第十军、十八军、六十七军。

第三编练司令部：司令沈发藻，驻江西赣州，辖七十军、二十三军。

第四编练司令部：司令殴震，驻广东广州，辖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零九军。

第五编练司令部：司令黄杰，驻湖南衡阳，辖一百军、一零二军。

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何绍周，驻云南昆明，辖二十六军、四十九军、八十九军。

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罗广文，驻四川重庆，辖四十四军、一零八军、一一零军。

第八编练司令部：司令陈铁，驻四川成都，辖七十二军、一一二军。

第九编练司令部：司令张雪中，驻浙江衢州，辖十二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八十五军。

第十编练司令部：司令孙元良，驻四川万县，辖四十一军、四十七军。

第十一编练司令部：司令钟纪，驻广西南宁，辖三二九师、三三零师。

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司令胡宗南，驻陕西汉中，辖七十六军、一一三军、一一四军。

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驻福建长汀，辖第八军、第九军、三十九军。

第十四编练司令部：司令宋希濂，驻湖北恩施，辖十四军、一一八军、一二二军。

上述各军、师兵额极不充实，有许多还只有一个空头番号。伪国防部拟征丁二百万，并命令各该编练司令部就地募兵，迅速补充。但由于人民解放军即将南渡长江，以及广大民众极端反对反革命内战，拒绝替反动派当炮灰，故无论采取征发或招募办法，

都绝对无法实现其狂妄的梦想。国民党反动派派出代表进行和谈，并大肆叫嚣“无条件就地停战”，即在企图借以阻止或延缓人民解放军向江南的进军，以便争取时间，完成这一庞大的编练反革命武装的计划。由此可见国民党反动派是何等阴险奸诈，何等包藏祸心。虽然他们已经肯定地失败了，而且他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已经不能不表示承认以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已派了六个和谈代表来到北平；但是反动派不但不向人民低头，交出反动军队听候人民解放军按照民主原则改编，而且正在大规模地扩编反革命武装，继续充当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鹰犬，即所谓以“世界反共斗争之一部分”的资格，准备卷土重来，屠杀中国人民。这就最有效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只有迅速地渡江南进，进行犁庭扫穴工作，把包藏祸心的反革命渊薮一块块扫除，把已有的和正在编练中的土匪武装一股股消灭，把那些至死不悟的战犯死党野心分子一个个活捉，全中国才完全解放，中国人民方能真正过太平日子。

（新华社北平1949年4月6日电）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

新华社时评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的活动。去年十二月间，当国民党卖国反动政府在军事上遭受决定性的惨败的时候，美国的合众社就传出了美国准备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该通讯社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必须以一切代价在台湾和海南岛建设防务"。自此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特务等各种形式更加加紧地进行。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台湾的侵略计划已经扩大，美国记者且已传出美国不久就要把台湾经济"合并"于日本经济的消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于本月初曾到达台湾，"巡视"高雄、基隆等海空军侵华基地。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最近经过台湾省汉奸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发出了所谓要求"台湾独立"的狂吠，并正酝酿将所谓台湾"独立"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首先是打算准许廖文毅以所谓台人代表的资格出席远东委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麦克阿瑟且已公然发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美国帝国主义这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妄图吞并台湾。美国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台湾省伪主席陈诚在蒋匪"引退"后且曾表示，在必要时将宣布台湾"独立"，就是说，将使台湾在实际上合并于美国殖民帝国主义。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样来强占台湾，不过是在做梦。今日的中国，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湾人民了。就在从前，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也曾举行过几十次武装反抗。而自从台湾重回祖国版图以后，台湾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志，更和美国奴才廖文毅和美国的其他走狗要把台湾省从中国分立出去并合并于美国的叫喊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曾进行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奴役统治的伟大英勇斗争。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万余学生曾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为了反对美国傀儡国民党的暴政，两年以前台湾省人民曾进行了"二·二八"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湾的武装起义。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因此，所谓“台湾独立运动”，乃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绝端侮辱。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中共中央宣布
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谈决定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

（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

（二）谈判地点：北平。

（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新华社陕北1949年3月26日电）

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新华社社论

四月一日十时半，南京反动卖国政府的所谓和平谈判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三小时后，南京反动卖国政府指使其军警特务向给这个代表团送行的要求真和平的南京六千爱国学生行凶。据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迄至二日黄昏止，查明学生中已死一人，重伤十一人，轻伤八十八人。另据法新社二日报道，该市大学方面人士调查，学生已有两名身死，十二名濒于死亡，五十五名受重伤，五十余人失踪，并有“数名学生被捆起来投入河中”。匪徒们复追踪打入国立剧专，“抢去该校学生的一切东西”，“在抢掠之后，八十名学生中仅有三十名无恙，余均送往医院或失踪”。这个惨案，充分表明了南京反动卖国政府的战争罪犯和杀人匪徒们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是什么。

我们早就指出，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口中的所谓和平是虚伪的欺骗的，其目的在保存反动势力，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在适当时机再来扑杀人民的革命。国民党反动派这匹野兽虽然在战争中受了伤，并没有忘记吃人。南京的惨案表明，在南京反动卖国政府中，有的只是一群毫不悔改的战争罪犯，以及用和平的幌子替这些战争罪犯们保镖的“主和派”。从李宗仁一月二十一日上台以后的两月余中，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没有呢？做了一件什么已经确实有利于和平谈判的事情没有呢？没有，一件也没有。在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等人的统治下，一个战争罪犯的毫毛也没有损伤过，但是逮捕和屠杀争取真正和平的人民的事情，却仍然在全国民党统治区层出不穷，南京惨案达到了这一时期公开残杀人民的顶点。南京惨案再一次告诉了中国人民，希望国民党战争罪犯集团放下屠刀，乃是不可能的事情。南京惨案也再一次告诉了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战争罪犯集团的任何保留和庇护就是意味着中国的和平不能实现。南京惨案也再一次告诉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要争生存，争自由，争和平，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扫荡这一群吃人的野兽。南京惨案也再一次告诉了中国人民，对付这一群吃人的野兽的有效方法，不是希望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去“排挤”这群野兽，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战争罪犯，犯犯相护，他们是至今也不想与蒋介石等穷凶极恶的战争罪犯们决裂的。有效地消灭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方法不是别的，而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一个一个地去把他们活捉起来。

南京惨案表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全部八项条件，首先是其中惩办战争罪犯的第一条，决不容许任何的修改。南京惨案表明，对于南京反动卖国政府的战争罪犯们采取怜悯和庇护的态度的人，就是南京杀人犯集团的同伙或自觉的帮

凶，就是被南京杀人犯集团残杀了的爱国同胞的仇敌。每一个要想退出这一刽子手集团的人，每一个要想表明自己确是赞成和平而不是借贩卖和平招摇撞骗的人，必须对战争罪犯问题表明态度。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及其张治中代表团对于战争罪犯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就是他们有无和平诚意的一块试金石。

南京惨案在此时彼地发生，使我们不能不质问南京的和平谈判代表团：你们的政府，和在那里？平在那里？你们的团长张治中为什么在来北平之前要到溪口去两天向第一号人民公敌蒋介石请示？为什么在你们的飞机刚在故都着陆的时候，南京的大屠杀就开始了？如果中国人民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共产党为什么同这样的代表团谈判时，我们将怎样回答呢？事实是：你们所属的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极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前提条件，已经用革命青年的鲜血和尸体来堵塞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你们担保下的和平，能有几千万分之一的代表性呢？人民如何能够信任呢？

我们有责任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真心为真正的永久的和平而奋斗的，但中国共产党决不会上刽子手们的当。我们也有责任提醒全中国人民，多少次痛苦的流血的经验（今天又加上南京惨案的经验）证明刽子手不会有悔祸的心，人民的鲜血在南京杀人犯统治集团的屠刀之下是流得太多了。古人告诫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今天是再不能上当了。

自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提出实现真正的永久的和平的八项条件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容忍了两个半月之久，但事实证明，这种容忍，并没有丝毫改变南京反动卖国政府的意向，并没有使他们放下屠刀。现在南京的杀人犯集团已经用南京的血案来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全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准备南渡长江，扫荡一切杀人犯。南京以及其它惨案中牺牲的爱国人民报仇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江南以及全中国人民解放的时间也已经不远了。刽子手们对人民的疯狂残杀，只能使他们加速度地走到最后的灭亡。

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

（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

新华社社论

毛泽东主席答复傅作义将军的电文中说："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党政军系统中的一切军事、政治、党务、经济、文化等项工作人员，都应当对于这个号召好生做一番研究。

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对于日本投降以来的反革命内战是要负全部责任的。这个政府的一切重要负责的党政军人员，也都要按照各人情节轻重分别担负一定的责任。这个政府的一切重要负责党政军人员，在多年以来向人民犯了罪过，如果他们想在最后的时机要求人民的宽恕，那么他们就必须"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这样就叫做"立功自赎"。如果不能做到这些，那么，人民就绝对不能宽恕他们的铁案如山、斑斑可考的罪行，他们就绝对不能逃脱人民的审判和惩办。

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中有许多人现在已经开始采取立功自赎的老实态度。前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在他的四月一日通电中所表示的，就是这种老实态度。但是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许多首要军政人员至今还没有打算这样做。他们也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反对所谓投降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这种荒谬议论的反革命实质，在今天本社所发表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中，已经暴露无遗。这个指示证明那些反对所谓投降的好汉们，"不能承认今日之失败为中国反共斗争之最后失败"，而认为它只是世界反共斗争中的"一道波纹"，只有"向中共投降""始为吾人最后之失败"。他们为什么要求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呢？因为他们拒绝对反革命内战负责，他们拒绝把战争罪犯交给人民惩办，拒绝把反动军队交给人民改编，拒绝把反动政府交给人民接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平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他们甚至要求恢复一九四六年一月旧政治协商会议时代的地位，要求就地无条件停战，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要到长江以南去解放二万万以上被压迫的同胞。总之，他们装得好象他们并不是一伙反动卖国的战争罪犯，装得好

象他们并没有“最后失败”，而狂妄地要求与为独立民主和平而奋斗的中国革命人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这是一种极端荒谬极端狂妄极端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自赎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

反动卖国的战争罪犯与革命人民之间根本不允许讲什么平等。如果允许讲这种平等，就是背叛人民，就是抹煞是非，抹煞战争责任，就是鼓励反革命战争罪犯从新发动战争，就是使被战争罪犯们所屠杀的同胞和为自卫和解放而流血的先烈死不瞑目。在日本投降以来四十四月中，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之下，无数次地拒绝人民的和平要求，无数次地撕毁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签定的协定，悍然发动内战，连今天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伪代总统李宗仁也说是“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的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应对这一笔血债负责的刽子手国民党反动派，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现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居然允许其在八项条件下立功自赎，这是何等的皇恩浩荡？如果对于这样的恩人还不知报答，阴谋在平等的名下保存反革命实力，以便在他们所期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恩将仇报，这又是何等的穷凶极恶？

战争罪犯同样也不能向革命的人民要求什么光荣，因为他们过去的罪恶是卑鄙的，黑暗的，瘟臭的。如果说他们可以有什么光荣的行动，这就是向人民投降。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党政军人员们必须明了：如果你们不愿意自动自觉的从政治立场上向人民投降，向人民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恶，向人民缴出自己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革命武装，而继续保留自己的反人民的立场，保留自己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革命武装，那么你们和人民之间就没有什么真和平，那么你们至多也就是把危险的杀机隐藏起来，而不是加以消灭。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一种和平，这就是反革命分子从根本立场上向人民革命力量投降的和平。有了这种自觉，才叫做“认清是非，翻然悔悟”，才能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这是接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的政治前提，决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苟且。国民党中宣部的话，稍微改动几个字对于国民党党军政人员就是完全正确的了：“只有吾人放下屠刀，向中国人民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实行投降，而停止妨害国家独立反对人民自由之挣扎，始为人民最后之胜利，亦即为中国反革命恶势力之彻底灭亡。”这种投降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的，是可以希望人民和祖国的宽恕的，比之拒绝向人民投降，继续无谓的挣扎，因而一个个被活捉，被审判，被惩办，当然要光荣得多。

愿意向人民和祖国立功自赎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们！最后的时机到了，赶快与那些反对向人民投降的反革命阴谋家分清界限吧！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跳出反革命立场，投降到人民方面来吧！这是实现真和平的道路，这是立功自赎的道路。

〔附〕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

——李宗仁、何应钦致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电——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北平六国饭店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均鉴：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进行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一一。今日国家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于战乱不已所致，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宗列祖，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蒋总统之毅然引退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之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全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

乃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名，窃恐由于此种狭隘与　压作风之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良以此种协定果一旦订立，则给予人民者将非真正之和平，而为更残酷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迫切渴望和平之人民，亦必决不愿政府接受此一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驯致全国人民重罹浩劫，岂徒显背谋和之初衷，抑必造成仇仇相报永远砍杀之悲惨局面，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

即以条文内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原则，而该项协定规定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编为“人民解放军”，政府一切军事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亦应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独占之制度，关于整编程序规定为集中整理与分区改编两阶段，所谓集中整理，即是由共方所控制之整编委员会命令国军将防区与仓库物资等先行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再开赴共军认为适当之地点集中，以便分区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如此改编工作完成之日，即国军全被消灭之时。

在政治方面：1、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际上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共军“办理各地的接受和移交事项”，中共不

但要接收政府的军队和全国政权，而且要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之恐怖统治形式，以“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关于决定国家人民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依照协定条文第二十三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质言之，政府参加政协须俟中共考察政府执行“和平协定”之成绩认为满意，始允负责提议以待“批准”。又照协定，政府即获“批准参加”政协，而能否参加联合政府仍须待共党之提议，而且政府参加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数及人选，均从听命决定。上述云云，不过略举数项，以为例证。

实则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决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之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也将因中共军队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如此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若中共部队向各地开进，中共人员向各地渗透，其必然遭遇军民抗拒，殆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结果战火与屠杀即将遍及全国之每一城市与乡村，人民之痛苦愈益加深，国家之损失愈益增重，势所必然，无待深论，事果演变不幸至此，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而扩展战祸，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所忍出此？

总之：吾人今日如真能体认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同具有谋和之诚意，则必须泯除一切敌对与报复之心理，根据事实，适应环境，共策合理有效之方法，以达到彻底消弭战争获致真正永久和平之目的，因之政府除对中共此次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表示上述原则之意见外，仍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至于自今年元旦以来，政府军队每遇共军进攻，均尽可能极力退让，事实具在，有目共睹，然中共方面不但未能停止进攻，且自四月一日政府和谈代表抵达北平以后，若干地区之攻势，较前愈趋猛烈，殊堪遗憾。

兹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中央日报》）

我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新华社长江前线1949年4月22日电）

中共中央贺南京解放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两大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其他各野战军地方军及南方各游击部队全体同志们，全国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们：

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当此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纠合一切黑暗势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血腥的统治，业已二十二年。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起而反抗者，先后不绝。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前进。不意人民解放军渡江三日，南京反革命中心即告复亡，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诸名城，相继光复，国民党军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五十一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八军，第九十九军全部，第二十一军大部，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六军各一部，被我聚歼于长江以南，常熟、苏州、长兴、广德、泾县、彭泽之线以北地区，并占领上述地区各县。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进攻，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贺上海解放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和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全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同胞们，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爱国同胞们！

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已于二十七日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在此次作战中俘敌十余万众，纪律良好。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并与反动势力的残余作继续斗争而取得胜利。我们相信，有长久革命传统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上海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援助之下，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新上海万岁！

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万岁！

为上海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概述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现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底止，已整整三年了。我们在这三年中，共消灭了敌军兵力五百六十九万人，解放了全国三十六个省中人口最稠密物产最丰富的十七个省的全部，三个省的大部，七个省的一部；全国已获解放的地区面积二百九十六万余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全国已获解放的人口为二亿七千九百余万人，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五十八以上；解放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及省会县城共五百九十七座，解放区现共有县以上城市一千零六十一座，占全国二千零九座县以上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解放区现有铁路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公里，占全国铁路二万六千九百二十二公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截至现时为止，敌人所剩的残余部队，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空军、海军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等在内，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而其中正规部队，则只有八十余万人。这八十余万人，除少数外，大都是一些残破部队，不但建制不充实，装备不齐全，斗志更是异常颓丧。敌人现在退守的地方，虽然还有台湾、华南、西南、西北的几个省，并还计划在美国侵略者指挥之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根据地，藉以负隅挣扎，苟延残喘，等待他们所鼓吹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时积极勾结美国、日本、南朝鲜、菲律宾等国的反动派，企图组织武装干涉，作卷土重来之梦；但是，敌人的这些妄想和阴谋，决然挽救不了他们的最后灭亡。其残余部队的全部被歼和全国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整整三年英勇战斗后，现在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不久即将取得全国胜利。

这一次战争，自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励和援助之下，发动起来以后，到现在整整三年中，经过了两个战略阶段。即一九四六年七月起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止，敌人的战略进攻，我军的战略防御阶段；一九四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阶段。后一个阶段，现在还没有最后结束。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正在继续发展中。

当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力量，确是暂时强过我们的。当时敌军兵力包括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部队、海军、空军、后方军事机关学校总计约有四百三十万人；同时拥有三万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国所有大城市及绝大部份的铁路交通线；敌人还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投降的全部装备。尤其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总计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美国为国民党训练了部队及军事人员十五万人，装备国民党军四十五个师（截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共装备了国民党军一百零六个师）；美国用

军舰、飞机运送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四十一个师和八个交通警察总队，五十四万余人，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上；美国政府并以九万人的海军陆战队曾登陆中国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这些美军，在华北为国民党筑路、护路，并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时间内，单独或协助国民党军侵犯解放区达三十次之多；日本投降前后，美政府给予国民党反动政府从事反革命内战的贷款、物资及服务援助达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正因为这样，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才胆敢发动这次内战，并满以为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内，即可以解决问题。当时人民解放军方面，全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敌人比我军多二倍半，而敌军装备又较我军强得多；解放区的人口，为一万万三千多万人，国民党反动统治区方面比解放区方面多一倍半强；而解放区内部，还有许多反动的封建势力没有肃清，土地改革运动尚在开始展开，解放军的后方，是不十分巩固的。这一切就决定了解放战争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我们不能不实行防御作战。但是尽管敌人有许多暂时的优越条件，它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的战争是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它的军心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都是厌战的；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互相间有严重的矛盾，军队中官兵之间亦有着尖锐的对立。我们尽管有许多暂时不如敌人的条件，但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正义的革命战争，人民是拥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另一个决定性的优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战略指导方针的完全正确，正是依靠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人民对于我军的拥护才能发挥充分的作用。加上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英勇善战，这就确定了敌人必败，我们必胜的基础。

敌人开始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使用它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企图一下子即把解放军打得一蹶不振。

当时敌人的兵力部署是：用于进攻华东解放区者，五十八个旅，约四十六万三千人，内苏北解放区三十一个旅，二十七万二千人，山东解放区津浦路以东，二十七个旅，十九万一千人；用于进攻中原解放区者，二十五个旅，约二十一万七千人；用于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者，二十八个旅，约二十四万九千人；用于进攻晋察冀解放区者，十八个旅，约十六万二千人；用于进攻东北解放区者，十六个旅，十六万一千人；用于进攻晋绥解放区者，二十个旅，九万七千人；用于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者，十九个旅，十五万五千人；用于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者，共九个旅，七万五千人。

敌人在关内的正式进攻，开始于六月底围攻我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郑位三两将军所部，然后便接踵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实行分区的全面进攻。

我们对付敌人的全面进攻，采取了积极的防御作战方针，即在正面作运动防御，主动的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份，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以便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争取改变力量对比的悬殊情况，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

当我中原解放军牵制了敌人强大兵力于一九四六年七月胜利突围转入豫鄂陕地区

后，我华东解放军苏北部队即于七月十三日坚决地迎击敌人向苏北的进攻，至八月二十七日止，在长江以北，运河以东之仙女庙、泰县、海安至小洋口一线以南地区，连续打了七仗，均获得胜利。歼灭敌人整编四十九师三个旅、整编六十五师、六十九师、二十一师、八十三师各一个旅，共七个旅又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六千三百人。这个七战七捷，严重地挫败了敌人进攻的锐气，增加了我军的胜利信心。此后我苏北部队，向北逐步转移，又在淮阴、淮安、涟水、睢宁等地区，进行了胜利的运动防御作战。

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为了配合我中原、华东两解放军的作战，于八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了向开封至徐州段的陇海线出击战，歼灭了敌人整编五十五师一个旅、一个团又五个营等部，共一万六千余人。此役打断了敌人徐州至开封的联系，并调动了进攻我中原解放军的敌人，减轻了中原解放军的负担。接着又将敌人吸引至鲁西南的定陶地区，经九月三日至七日五天激战，将敌整编第三师及所属两个旅全部共一万七千二百人完全消灭，活捉该师师长赵锡田。随后于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以远距离的奔袭战，全歼敌整编六十八师所属一百一十九旅于鄄城。

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部队，于七月三日至十七日，八月九日至二十九日及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先后在闻喜地区，洪洞、赵城地区及浮山与临汾之间，迎击敌人的进攻，歼敌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及整编二十七师等部五个团，暂编四十四师、暂编三十九师、六十九师各一部，共一万八千六百人。给了胡宗南、阎锡山部以严重打击，使胡、阎两敌之间的联系，迟滞着不能迅速打通。同时我晋绥解放军，于七月四日至八月十一日，配合晋南作战，连续攻克朔县、崞县两城，并完全控制忻州以北至大同以南之同蒲路北段，歼阎敌暂编三十八师、六十八师等部八千一百人。

我山东解放军，于八月下旬至十月三日，在胶济线周村以西连续反击敌人，歼其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等部七千三百人。同时在胶济东段胶县、高密等地，给敌五十四军等部以重大杀伤。使敌人企图半个月内打通胶济线的阴谋，完全破产。

我晋察冀解放军，于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一日，抗击敌人东西两路向张家口的进犯，并在平汉线北段发动破击战，配合保卫张家口，先后歼敌十六军、九十四军各一部及其他部队两万二千余人后，乃主动的撤出张家口。

我东北解放军，于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辽南宽甸西北之新开岭地区，歼灭了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千三百人。给深入辽南之敌以迎头痛击。

这样经过了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大小八十余次的作战，共歼敌二十九万八千五百余人后，敌人的全面攻势，就受到严重打击而开始下降了。这时敌人虽占领了承德、张家口、安东、淮阴、菏泽等一百零五座城市，但是他在第一线的攻击兵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七十二个旅，增加到一百一十七个旅（全部进攻兵力为一百九十三个旅），此后便一直下降。

但是，敌人被这种暂时的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占领张家口后，即下令召开伪国大；军事上则仍继续向我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进攻，而主要战场，则在华东的苏北和山东地区。

解放军在各地区，根据头四个月的胜利经验，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我华东解放军，

于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苏北之宿迁以北地区，一举歼敌整编六十九师、二十六师、五十七师各一个旅及其他等部，共二万四千人，击毙敌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开解放军一次歼敌三个整旅的创例；并击败了敌人调集二十九个旅，企图于徐州东南与我军进行会战的计划。此后我华东解放军复转战于鲁南，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日，在枣庄、峄县地区，又将敌整编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共五个旅全部及其他等部，共约五万人一举歼灭，活捉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整编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以下三万九千余人。敌人遭受这次惨痛的打击后，复集中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共三十一万余人的重兵，分由陇海线徐州至海州段，津浦线徐州至济南段，及胶济线中段三面，向鲁南进犯；其主力十八个整编师、三十九个旅，置于徐州及其以东地区，陈诚并亲自飞徐州指挥，声言要在鲁南与我"决战"；并称："国民党胜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语。我军一部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五日，在临沂以南实行阻击作战，歼伪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一、二两师全部，并生擒了郝鹏举。于是敌人误为我军必在临沂与其决战，乃一方面集中大部兵力，谨慎地向临沂推进，以吸引我军；另方面，在北路的李仙洲集团，却大胆地沿淄博线向鲁中伸入，我为掌握歼灭李仙洲部的战机，乃决然放弃临沂，挥戈北向，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鲁中莱芜地区，将敌李仙洲集团所属整编四十六师、七十三军全部及十二军所属一个师，共七个整旅六万余人一举歼灭，生俘敌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以下四万九千人，创解放战争一次歼敌七个整旅的光辉胜利。华东敌人在这次惨败后，三月份整个一月，均不敢出战。

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于鄄城得胜后，复转战于豫北，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滑县地区，全歼整编四十一师一百零四旅，及河北保安十二纵队全部，整编四十七师一部共一万一千八百人。十二月复回师鲁西南地区，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巨野、嘉祥、金乡、鱼台、单县、城武、定陶、曹县等地，连歼敌整编七十师、八十八师、六十八师、五十五师各一部，及伪四纵队张岚峰全部，共二万六千四百人。紧接着于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九日，为了配合华东解放军在鲁南的作战，便向豫东及皖西北出击，在亳县及杞县、太康、睢县、宁陵等地，连歼敌整编七十五师十六旅大部，及四个保安团等部，共约九千人；并破毁了陇海线民权、商邱段，阻敌东调。

我晋绥解放军及晋冀鲁豫解放军之太岳部队，为粉碎胡宗南匪军由晋西南偷渡黄河，进袭陕甘宁解放区的阴谋，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月二十八日，发起晋西南战役，先后攻克中阳、隰县、蒲县、大宁、孝义等城，歼敌整编三十师六十七旅全部及阎军六十一军等部，二万二千一百人。使晋西北与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迫使胡宗南部偷渡黄河以西之整编一师、二十七师、九十师，调回晋西南地区。

我晋察冀解放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向平汉线保定以南出击，连克定县、望都、新乐三城，控制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之平汉路百余公里，歼灭伪五纵队侯如墉部四个团及第三军一部共九千六百人。

我东北解放军，北满部队，为了配合辽南保卫战，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至三月十日，三次出击松花江以南，在吉林长春以北地区，全歼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全部及新一军、新六军各一部，共一万五千余人。同时辽南部队，于二月五日至四月三日止，在辽

东之临江、通化地区，进行了四次胜利保卫战，歼敌十三军之八十九师全部及五十二军、六十军各一部，共一万九千八百余人。于是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并从此结束了敌人在东北的进攻，扭转了东北战局。

这样又经过了四个月（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大小八十余次的作战，歼灭敌人四十一万四千九百余人；我放弃了八十七座城市；同时又收复和解放了八十七座城市。连前四个月，即前后共经八个月的作战，共消灭了敌人七十一万人以后，便停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敌人在这八个月中，只是占领了我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这就相当于敌人每占一座城市，即须付出近七千兵力的代价。这时（一九四七年二月）敌人在第一线攻击的兵力，便从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一百一十七个旅的最高点，下降为八十五个旅，而用于进攻我解放区的总兵力，却从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九十三个旅，增至二百一十九个旅。这就是说，敌人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陷于被动，加上我地方游击部队的积极活动，便不能不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来守备后方供应线，和巩卫夺自我手的一百余座城市。至此敌军已经深入我解放区，与我解放区的全体人民直接作战了。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敌人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并将进攻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以顾祝同指挥的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人，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以胡宗南指挥的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加上宁夏、青海、榆林等敌军部队，共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余人，向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在其他几个战场上的敌人，均已被迫转为守势。

此时，我解放军除一面在山东和陕甘宁两解放区，继续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外，同时在东北、河北、山西、豫北等地区，则均已陆续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收复失地，和在反攻中大量消灭敌人。

敌人向山东的重点进攻，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首先以汤恩伯、王敬久（该敌系由津浦路西调来路东）、欧震等三个兵团，共十三个整编师、三十四个旅，约二十五万五千人，沿临沂至泰安线，并肩向北进犯，重心在鲁中的新泰、蒙阴地区，企图聚歼我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我为打破敌人这一阴谋，以一部于正面节节阻击，主力则分向敌人阵线之两端反击，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一举攻克泰安城，歼敌整编七十二师全部，共二万四千余人，继即乘胜插入敌人后方，于四月二十九日，收复津浦路以西之宁阳，歼吴化文部一个团；同时四月二十九日，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向临沂、蒙阴公路沿线之敌攻击，敌人一触即退，故我仅于五月一日在临沂西北之青驼寺地区，歼敌整编八十三师一个半团，此役即告结束。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敌人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犯，企图压迫我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我乃集中全部主力，选择敌人中路之汤恩伯集团中最突出于蒙阴以东的整编七十四师，加以猛烈的围攻，从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将其全歼于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共毙伤俘敌三万二千余人，该师师长张灵甫被我击毙，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嫡系军队五大主力之一（其他四个为：第五军、整编十一师，此时均在山东，另两个为在东北之新一军、新六军），当其正被我围攻之时，蒋介石曾亲自屡次勒令其他各路部队增援，可是，均被我军钳制不得往援。七十四师被歼后，进犯鲁中之敌即全线

溃退。敌人经过四十天的重新整理后，又再次以三十二个旅，二十四万人，于六月二十五日，向我沂蒙山区进攻，采取“密集平推”的战术，在莱芜至蒙阴约百里的战线上，集中十八个旅，齐头并进，至七月九日共十五天功夫，仅前进不足百里。我华东解放军乃以主力一部于南麻、临朐地区正面抗击敌人，予敌整编十一师、整编第八师等部，以严重打击；此外大部主力，则分两路选择敌人间隙较大的莱芜、博山地区，及临沂、蒙阴地区，向敌人后方出击，左路于七月六日收复费县，歼敌整编五十九师之三十八旅全部、另一个团。九日更乘胜收复枣庄、峄县、出击津浦路徐州至滋阳段；右路于七月八日，再克泰安，十三日克大汶口，并横扫津浦路西，连克宁阳、肥城、东阿、平阴等城，迫敌于七月十一日开始由鲁中分路西撤（到七月底敌由鲁中抽出十二个旅于鲁西南），于是敌人在山东之重点进攻，便基本上被我打破了。

敌人在西北向我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开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首由胡宗南部十五个旅，分两路向延安推进。当时我西北解放军，兵力甚少，敌人全部兵力十倍于我，故我西北解放军在延安以南，将进攻之敌杀伤五千余人后，乃主动撤出延安，诱敌深入，以便各个歼灭之。三月十九日敌人占领延安，我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五个旅进至安塞，而我主力则集结于延安东北之青化砭地区。当敌右翼部队，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进时，我西北解放军于三月二十五日，一举歼其旅部及一个团，共三千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次胜利振奋了我西北全体军民。敌人发现我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后，于三月二十五日，便由安塞地区转头东进，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乃沿延榆公路进至清涧，再折至瓦窑堡。四月八日回抵延安东北之永坪、蟠龙地区，前后费时十二天，兜了个大圈，走了四百余里，可是并没有找到我军主力所在，我则隐蔽休息了半个多月。待至四月十四日，敌整编十五师一百三十五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中，我将其全部四千七百余人，歼灭于瓦窑堡以南之羊马河，生俘该旅代旅长麦宗禹。又给胡军以严重打击。羊马河一战之后，敌人又以为我主力已转至绥德地区，乃集中九个旅，约五万人之众，由蟠龙、青化砭地区向绥德急进，企图将我主力逐至黄河以东。五月二日敌占领绥德，我则乘敌主力北进之时，突向驻守蟠龙之敌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攻击，由五月二日至四日全歼该敌共六千七百余人，生俘其旅长李昆岗。敌在绥德扑空，又发现我主力攻击其蟠龙补给站，乃仓惶于五月五日，放弃绥德南援，当敌主力回到蟠龙时，我军又已在安塞地区，休整了七天。胡部连续遭我严重打击后，陷在陕北进退维谷。我西北解放军遂挥师西向陇东，突然出击，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十日，收复合水，环县两县城，及广大地区，歼灭宁夏马鸿逵部整编八十一师主力及新编骑兵第八旅各一部，共四千四百人。复乘胜北上，收复三边失地，再折而向东攻击榆林。从八月六日至十一日，将榆林外围守敌五千二百余人歼灭，榆林虽未攻下，但调动了胡军主力向北增援。此时，胡敌竟以九个半旅，由鄜县及延安地区，分两路增援榆林。一路由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两个旅另一个团，经吴旗、志丹、横山长途行军后，于八月十三日抵榆林；一路以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七个旅由延安出发，八月十五日进抵绥德，继占吴堡、葭县，企图夹击我西北解放军于绥德、米脂地区。我则待其整编三十六师，进至米脂东北之沙家店地区时，于八月二十日，一举围而歼之，共毙伤俘敌六千余人。于是刘戡所

部乃落荒南逃，复被我追击于岔口，给以严重杀伤。我西北解放军经过以上七次作战，歼灭敌人三万一千余人后，便将敌人在西北的重点进攻也完全打退了。

当敌人在山东、陕北实行重点进攻时，我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各区解放军，便同时向防守之敌，发动反攻。

在东北，我军于打败敌人四次进攻临江之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即向敌人发动了攻击。至六月三十日止，第一次大规模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共歼敌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九十一师、六十一军之一百八十四师、暂编二十一师等四个师（旅）全部及非正规部队共八万三千二百人，收复城市四十二座。使长春、吉林敌军陷入孤立，迫使东北敌军主力局限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一筹莫展。

我晋察冀解放军，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至五月八日，向石家庄外围及正太线出击，歼敌保安五师全部，第三军、三十三军各一部等共三万五千四百人，孤立了石家庄，控制了正太线西起赵村东至头泉一百八十公里，打断了敌人太原与石家庄之联系；并使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六月十二日，又向津浦线北段出击，至十五日止，歼敌军九千五百余人，解放青县、沧县，控制砖河以北至陈官屯段铁路七十四公里。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又出击保定以北之平汉线，歼敌十六军、九十四军各一部共七千二百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解放军及晋冀鲁豫解放军的行动。

在晋西南，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部队，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起，向敌人出击，至五月四日止，歼敌二百零六师一部，及其他部队共一万四千七百余人；解放和收复浮山、翼城、临晋、虞乡、芮城、永济、闻喜、河津、荣河、万泉、曲沃、猗氏、稷山、解县、新绛、绛县、赵城、霍县等十八座县城；控制同蒲南段赵曲镇至风陵渡二百二十余公里；将晋西南残余胡军，压缩于运城、安邑、夏县几个孤点内。以后又向吕梁区出击，歼阎锡山部三千余人，解放乡宁、汾城、蒲县、大宁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开辟了晋西南广大的新解放区，这一行动，不但策应了黄河西岸我西北解放军打败胡宗南部重点进攻的作战，而且也奠定了我太岳部队向黄河以南进攻的基础。

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攻击平汉路东黄河以北豫北地区之敌，全歼敌第二快速纵队，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部等，共四万一千余人；解放封邱、延津、原武、阳武、濮阳、淇县、浚县、汤阴等九座县城及广大地区；并控制丰乐车站以南之平汉铁路百余公里；迫使整个豫北敌人退守新乡、郑州、开封、菏泽几个主要据点内不敢出战。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则取得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准备大规模的进攻。

这样前后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除上述陕北沙家店胜利应算入第二年战绩外，共消灭敌人正规军四十六个整旅，连消灭整营整团的部队，共折合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消灭敌人非正规军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一十二万人。从此，即将敌人的战略进攻粉碎了，同时使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攻阶段。这时敌人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其正规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其旅的番号，则仍保持二百四十八

个，但在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则已降到只有四十个旅了（在整个战场上的总兵力，则为二百二十七个旅）。敌军由于第一年的屡战屡败，士气更加低落，军心更加动摇，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中，充满着失败的情绪；而其后方则异常空虚，十三个省中，仅有二十一个旅，在湘、桂、黔、闽、浙、赣等六个省，当时几乎无一个正规军。因此，敌人完全没有甚么第二线部队；敌人统治区的人民，则由于蒋介石所制造出来的经济崩溃，与战争灾难，因而民变蜂起，人民游击战争到处发展，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极力反对蒋介石的内战。这时人民解放军，兵力虽还比敌人少，但与敌人愈战愈弱愈小的情形相反，发展到了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则发展到一百万人以上；由于我军后方日益巩固，不须分兵守备后方供应线和巩卫城市，因此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就优于敌人；部队装备，则由于第一年的巨量缴获，亦比战争开始时大为加强；部队的士气，由于不断胜利，亦异常高涨，充满着胜利的信心；解放区人民，由于土地改革继续普遍进行，因此更加积极拥护和支援解放战争。总之，这时敌人兵力削弱，士气低落，后方空虚，人民反对；我们则愈战愈强愈大，士气旺盛，人民拥护，无后顾之忧。这样便改变了战争开始时的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军便转入了战略进攻；敌人便被迫转入了战略防御。

我军的战略进攻，首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所部），于七月初由黄河北岸挺进鲁西南地区，揭开了序幕。接着于八月中旬，该野战军继向敌人的后方大别山地区，作长距离的挺进；八月下旬，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之太岳兵团（即陈赓、谢富治两将军所部），又从黄河北岸挺进豫西地区；我西北解放军（即彭德怀、贺龙、张宗逊三将军所部），亦于八月下旬沙家店战役后，进入内线反攻；九月初，我华东野战军（即陈毅、粟裕两将军所部），从鲁中转入鲁西南地区向敌进攻；再加上我晋察冀解放军（即聂荣臻将军所部），九月初向冀中大清河北发动攻势，及我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罗荣桓两将军所部），于六月胜利结束夏季攻势后，又继续于九月中发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这样便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全面性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并从此便将战争的主要战场转移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区进行。

解放军转入进攻后，不论外线内线的作战原则，仍然是依照毛主席所规定的军事原则，以集中优势兵力，不失战机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对于敌占的城市，则采取分别情况对待的方针，即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及城市，则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所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然后夺取之。在解放区内部，则加紧肃清敌军残余力量，收复一切失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更进一步地巩固解放战争的后方——人民解放区。

向外线进攻的我刘邓野战军，首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渡黄河，向鲁西南的菏泽、郓城、金乡、巨野、定陶、曹县等地之敌发动进攻，一个月中连续歼灭了敌整编五十五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七十师、六十三师等部共九个半旅，五万六千余人，俘敌整编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七十师师长陈颐鼎、五十五师副师长理明亚等以下近四万人。这一伟大胜利，不但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我华东解放军打退敌人的重点进攻，彻底粉碎了

敌人企图使“黄河归故”隔断我解放军的阴谋，并且打开了我向中原地区进攻的门径。就在这时，美国政府派来了臭名昭著的反动份子魏特迈为首的访华使团，密授蒋介石挽救危局的“锦囊妙计”；并决定将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参加蒋介石的国防部各方面工作，直接控制与指挥蒋军作战，并还决定派遣大批顾问和专家，以监督蒋政府各个部门。但是，就是这样，也并没有阻止了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挽救了蒋介石的危局。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我刘邓野战军，胜利的越过陇海路后，复连续跨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河流，击破敌人沿途的防堵，于八月二十七日到达了大别山地区，立即横扫敌人的保安团队，开辟新解放区。至九月底即歼灭了敌人各县保安团队及正规军一部，共八千五百余人；十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安徽霍山东北之张家店一战，歼灭了敌人整编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全部；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又在湖北广济西北之高山铺，歼灭了敌整编四十师，五十二师各一个旅另一个团，共一万二千六百余人。艰苦的经过了三个月（即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的作战，和紧张的地方工作，便打开了大别山的新局面，建立了金家寨、潜山、太湖、朱屋庙、望江、宿松、黄梅、广济、浠水等三十三个民主县政权。从此，我解放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区——武汉至南京之间，插进了一把利刀。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之陈赓、谢富治兵团，由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向敌人进攻。至十月十三日，在陇海线潼关至洛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连续歼灭整编十五师两个旅，整编七十六师一个旅及其他部队，共三万一千人，解放了广大地区，打断了敌人洛阳至潼关的联系。十一月一日至二十六日，又在豫西之郏县、宝丰、禹县、临汝等地区，歼灭了敌整编十五师残部，及大量的县保安团，共一万二千人，生俘十五师师长武庭麟。共经三个月（即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的作战，解放了豫西、及豫陕边共三十六座县城，解放人口九百万，建立了四十多个新的民主县政权，完全孤立了敌人豫西重镇的洛阳，并威逼潼关。

我陈、粟野战军，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八月即挺进鲁西南地区，向敌人进攻，九月七日至九日，在菏泽之沙土集，全歼敌整编五十七师师部及其两个旅，共九千五百余人。随即展开于豫皖苏地区，于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六日，先后在夏邑、鹿邑、阜阳、蒙城、永城等地，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地方保安团队及正规军一部共万余人。十一月九日至十八日，复破击陇海路徐州至兰封段，歼敌暂编二十四师一个旅，及其他等部共一万一千人。前后两个多月，共解放和收复豫皖苏地区二十余座县城，恢复并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至此，我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都打出了外线，展开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于海的大中原的原野上，向敌人实行大规模的进攻。

敌人为了阻止我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曾由白崇禧指挥着三十三个旅，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间，进行一次“清剿”，企图摧毁我新解放区。我刘邓野战军，一面予白匪以迎头痛击，歼其一万一千人；一面以主力一部越平汉路西进，开辟了桐柏、江汉两新解放区。同时我陈粟野战军及陈谢兵团联合向陇海线民权至砀山段，及平汉线新郑至确山段，发动大规模的破击战，以配合刘邓野战军作战。在十二月一个月中，共歼灭敌整编

第三师、暂编二十四师及骑兵第五旅共四个旅，及其他部队四万五千余人，吸引了白崇禧部分兵北援。于十二月底我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胜利地会师于平汉线遂平、西平地区，并攻占许昌、漯河等敌军补给站。从此中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不但使鄂豫皖、豫皖苏及豫西三个新解放区打成一片，而且我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亦从此由各自作战转为直接的密切配合作战。

总计从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中，我在中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共歼敌军十九万五千余人，解放县城整一百座，创立了新的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的中原解放区。

敌人当我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开始向外线进攻的时候，曾错误地估计为“立足不定，被迫流窜”的举动，所以他们当时，还在作集中一百个旅，向山东发动“九月攻势”的梦。当我南征大军已经完成战略展开，并严重威胁其战略要地之开封、郑州、洛阳、信阳、武汉、襄樊、合肥、安庆等重要城市的时候，敌人更表现了十分的惊慌失措和手忙脚乱。

我内线作战各军，在我南征大军向外线进攻同时，亦加紧向敌人攻击。

我西北彭德怀、张宗逊野战军，于九月一日至十七日，在绥德以南至延川以北地区进行追击作战后，于十月一日至十一日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三座县城，歼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旅部及其他部队共八千二百人，并生俘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日，复于榆林外围，歼敌二十二军及宁夏马家援军共二千四百余人，此后经过了两个月的冬季整训，亦转至外线进攻。

我华东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当华东解放军主力转至外线作战后，从九月十日至十二月底，亦连续收复了胶东之莱阳、平度、掖县、海阳、栖霞、黄县、蓬莱、牟平、高密、胶县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共歼敌整编四十五师、第八师、第九师、六十四师、五十四师等部六万二千人，从此改变了整个山东局面，并逐渐收复了全部失地。

我华东解放军苏北兵团，于八月六日至十二日攻击叶挺（盐城）、东台地区之敌，全歼伪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及保安部队八千七百余人。十二月十日在如皋东北之李堡、栟茶地区，歼敌整编二十一师一个团及其他部队九千人，十二月二十九日又在叶挺城南，歼敌整编第四师两个团及其他部队七千人。半年中收复了苏北解放区广大失地。

我晋察冀野战部队，于九月二日至二十四日，向大清河北霸县、雄县地区发动攻势，歼敌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五千二百余人，亦收复了大块失地。十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复向平汉线保定南北攻击，将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军部及第七师，吸引向北增援，当其进至望都定县间的清风店地区，我骤然将其包围而歼灭之，是役共毙伤俘敌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全部及其他部队，共一万七千二百余人，生俘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以下一万一千余人。此役大大削弱了石家庄敌人的守备力量。于是我军于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即一举将石家庄攻克，全歼敌第三军之三十二师，及其他部队共二万四千二百余人，使我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华北局面为之一新。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我晋冀鲁豫所属太岳解放军及西北野战军一部，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一百余人，晋西南之敌，于是最后被我完全肃清。

我东北林、罗野战军，于九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三日，举行了一个五十天的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及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歼敌五十三军，四十九军，九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共六万九千七百余人。收复城市十五座，并将中长路农安至铁岭段，北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完全破毁，使长春、吉林之敌完全孤立，并迫使东北敌军主力，龟缩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狭小地区内，坐以待歼。

我军经过外线内线的配合作战，共约半年（即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十二月）的时间，消灭敌人七十五万余人以后，迫使敌人采取了分区防御的方针。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至七月，国民党统帅部在美帝顾问团指挥之下，将作战地区分为二十个绥靖区分区防御，每个绥区，辖三至五个旅的兵力，绥区司令官，掌握辖区内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加强所谓“组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的工作，以弥补其正规部队的不足，其兵力部署，则主要集中于各战略要点及交通线上，特别加强中原地区的防守力量，以阻止我军向南发展，并将一些被孤立而有被歼危险的城市，实行撤退，集中兵力于更重要的点线上。敌人将这种防御方针，称为“总体战”的“新战略”。可是这个“新战略”，亦仅仅实行了七个月（即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七月），被我攻克其战略要点的开封、襄樊、宝鸡、潍县、兖州、临汾、四平等城后，即告失败了。

在这七个月中，解放军之进攻，越来越大，愈攻愈猛。

我在外线进攻之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为粉碎敌人在中原之防御体系，经过一个时期的整训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至十四日，我陈粟野战军主力一部及陈谢兵团，一举攻克豫西重镇——洛阳，全歼守敌青年军二百零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及保安第四旅等部共一万九千九百人。随后，我刘邓野战军及陈谢兵团又于五月二日至十七日发动宛西战役，在淅川、邓县、镇平等地，歼敌整编第九师、四十七师共五个团及独二十一旅，五个县保安团全部，十三个县保安团大部，合计二万一千七百人，解放豫西南广大地区。接着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三日，复发动宛东战役，歼敌整编五十八师、九师、十师、十一师等部一万二千二百人。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我陈粟野战军一部，乘敌集中兵力于鲁西南，防我在黄河北岸休整之陈粟野战军主力，再次南渡黄河时，一举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全歼守敌整编六十六师师部，及一个旅另两个团，保安部队两个旅另三个团，共三万九千六百余人。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完全击破了蒋介石在四月伪国大会上所作的“保证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之共军”的呓语。河南伪国大代表们，闯进伪总统府吵闹不休；蒋介石被迫亲赴前线指挥，调集三个兵团，分路驰援开封。我陈粟野战军主力则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挥师于豫东，将敌增援开封之区寿年兵团四个整旅及其他部队，共五万四千二百余人，全部歼灭于睢县、杞县地区，生俘其兵团司令区寿年以下三万余人。当敌正集中兵力于豫东作战时，我刘邓野战军一部，则向鄂西襄樊地区发动攻势，于七月二日至十六日，全歼襄樊守敌十五绥区司令部，及三个整旅，另三个保安团，共二万零五百人，生擒其绥区司令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于是敌人在中原之防御体系，就被打破。

我西北彭张野战军，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亦转入外线作战，首向黄龙山区之敌进攻，围攻宜川城，吸引敌整编二十九军来援，并于宜川西南的瓦子街地区，一举

将其围歼，至三月十日攻克宜川城，共计歼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各两个旅及其他部队二万九千五百人，并击毙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创西北战场空前大捷。由于这一胜利的影响，迫使敌人于四月二十一日放弃延安南逃，二十五日又放弃洛川，黄龙山区完全被我解放。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七日，我彭张野战军，复向西府地区进攻，十天之内，连克陕西之栒邑、永寿、邠县、麟游、长武、扶风、凤翔、岐山、汧阳及胡宗南军的供应区——宝鸡与甘肃之灵台、崇信等十二座县城。我军于达成捣毁敌人西北重要供应基地宝鸡之任务后，挥师陇东，转战泾（河）北。是役共歼敌整编七十六师、九十师、三十八师等部，二万一千九百余人，并击毙敌新任七十六师师长徐保。摇撼了西北敌人胡宗南匪部的根基。

我内线作战各军，亦猛烈进攻敌人，首先我东北林罗野战军，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路沿线，及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攻势，连续九十天的作战，歼灭了敌人新五军军部及所属三个师、四十九军两个师、五十二军两个师、新六军一个师、七十一军一个师，共九个师及其他部队合计十五万余人，俘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等高级军官以下十万零五千人；并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收复营口及其他城市共十八座；扩大解放区十万九千余平方公里；解放人民六百一十余万，使敌军在东北的占领区，缩小到东北面积的百分之一，东北敌军的巢穴沈阳，成了孤立的死城；吉林之敌，乃于三月九日逃至长春，至此，便奠定了东北全境解放的基础。

我华北解放军杨德志、罗瑞卿兵团，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发动了察南、绥东攻势，歼敌暂编第四军等部一万八千四百余人，收复察南广大失地。五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复向冀热察地区出击，在古北线及北宁线的唐山、昌黎段，轮番进攻，打得敌人东奔西跑，手忙脚乱，前后共歼敌十三军、六十二军所部及大量的交通警察和保安部队二万四千三百余人。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我华北解放军之杨成武兵团向保定以北，徐水、定兴地区攻击，歼敌新二军之暂编三十一师及非正规部队共一万余人，解放了涞水、定兴、徐水、新城等四座县城，打烂了敌人平保线之防御体系。

我华北解放军之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攻克了晋南重镇的临汾，歼敌六十一军之六十六师等部二万五千人，晋南完全解放，吕梁与太岳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复向晋中平川太原、灵石地区，发动强大攻势，一个多月中，连续歼敌阎锡山部之赵承绶集团四个军，八个师，另两个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万余人，俘太原绥署副主任赵承绶以下八万余人，解放了晋中十四座县城，完全孤立并包围了太原城。

我华东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于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胶济线西段，发动攻势，收复了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大块地区，歼敌整编卅二师师部及两个旅全部，与其他部队，共三万九千四百余人。四月二日至五月八日，复向潍县、坊子地区进攻，全歼守敌整编九十六军军部兼整编四十五师师部并一个旅，保安部队三个旅等部，共四万五千六百余人，生俘整编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解放了潍县等地。于是渤海、胶东、鲁中南三解放区，完全联系起来。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八日，再向津浦线上之兖

州及济宁进攻，全歼敌十绥区司令部，整编十二师师部及一个旅，整编八十四师一个旅，另五个团，保安部队一个旅，另两个团等部，六万三千六百人。于是山东解放区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外，全部收复。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二年，在外线内线各战场作战消灭敌人正规军五十个整旅，连消灭整营整团的部队，共折合九十四个旅，连消灭敌非正规军共计一百五十二万余人，解放土地面积十五万五千方公里，解放人口三千七百万，解放城市一百六十四座，因此，敌人又不得不再三地修改其防御计划为重点防御，乃于一九四八年的八月四日，南京军事会议决定：裁并绥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将每个兵团的兵力，配备五、六个旅以至十二、十三个旅之多；并加强各战略重要城市的兵力和防御工事，企图使解放军"吃不掉"和"啃不烂"。但是，这时的情形，已起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此时在数量上已壮大到二百八十万人，且已熟练的掌握了炮兵、工兵的技术，并从石家庄、运城、洛阳、开封、潍县、四平诸战役中，锻炼出相当完整的一套攻坚战术和经验，武器增强，弹药可自造补充大部，部队的士气和政治质量，则比前更加提高；解放区的面积人口，比前更加扩大和增多，解放区亦更加巩固。总之，战争的条件，我们日益优于敌人。敌人方面：兵力虽还有三百六十余万人，但除去其后方守备兵力外，能集中于前线的部队，则仅约一百七十万人了；士气和战斗力，则比前差得多了；其内部的派系矛盾，则由于它的败局已定，比前更加严重了；其后方的人民革命运动，日趋发展；蒋介石一切政治欺骗均已破产无遗。总之，敌人的战争条件更加劣于我们。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呈摇摇欲坠之势。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华东解放军，便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举行了济南战役。这个有十余万人的兵力守备、并经过日寇占领时期以至国民党军队连年加修的近代化工事、地形又利守不利攻、人口有七十万的战略重要城市，却仅仅经过解放军八天的连续攻击，即完全解放了。守敌第二绥区司令部及所属三个整编师，九个旅全部，无一漏网，绥区司令王耀武以下六万一千八百人被俘。吴化文将军率整编九十六军军部，及整编八十四师全部三个旅，二万人光荣起义。这样就充分证明了敌人任何防御计划，均不能挽救它的垂死命运。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卅一日，我华北解放军杨德志、罗瑞卿兵团和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发动了绥察战役，于十月廿三日，我解放绥东广大地区后，直攻抵绥远之包头；在察北则先后解放崇礼、尚义、沽源、商都四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一个半月中共歼灭敌十六军、暂编第五军等各一部及其他部队，共二万一千人，并控制了平绥路的大部，给敌军在平绥线上防御以严重打击。

我西北野战军，于八月八日至十三日，十月五日至十八日及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先后在陕东之澄城、合阳、蒲城地区，发动三次攻势，歼敌卅六军、卅八军、七十六军等部五万九千余人，打破了胡宗南的所谓"机动防御"计划，开辟了向西北敌军的心腹地区——渭河流域进军的基地。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我东北野战军，举行了五十二天的巨大规模的辽沈战役。攻势首先由北宁路榆锦段开始，至十月一日攻克义县后，便将东北敌人与

关内联系的咽喉锦州完全孤立，从十月九日至十五日，完全解放锦州。守敌第六兵团，所属两个军八个师等部共十万余人，无一漏网，东北敌军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三十六名高级军官以下八万余人被俘。这个重大胜利，完全封闭了东北境内敌人陆上的退路，这就决定了东北敌人全部被歼的命运。十月十七日困守长春的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将军率领下，全部二万六千人起义，接着十九日东北敌军另一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并兼第一兵团司令的郑洞国，率新七军等部三万九千余人投降，另一万八千一百人在被围困中即已分批自动放下武器。于是蒋介石飞到北平亲自指挥沈阳地区之敌廖耀湘第九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十万一千余人，向辽西方向逃跑，但刚到彰武、黑山地区，即被我大军截堵，又立即掉头向营口方向逃跑，复遭我堵住，于是在十月二十八日最后全部被我歼灭于打虎山，及黑山北镇地区。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八万七千余人被生俘。紧接着我大军扫荡沈阳、营口两地之残敌，至十一月二日，解放上述两城。东北之敌，便全部最后彻底肃清，东北全境解放，成为人民解放战争中一个有决定性的伟大胜利。此役总计消灭敌人三十三个正规师，十个非正规师，共四十七万二千人。

至此，全国的敌我形势，即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比敌人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亦转为优势了。这时敌人的总兵力，从其防御开始时的三百七十三万人，降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了；而解放军则从进攻开始时的一百九十五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了。这就决定了解放战争的加速胜利。也就在这时（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军实行了统一整编，将原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分别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个野战军。野战军以下辖兵团，兵团辖军，军辖师，华北三个兵团则直隶于解放军总部。这个整编，使我军向正规化方面，更加提高一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我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联合发动了伟大的淮海战役，战役的第二天，敌第三绥区所属两个军三个整师，另一个多团，共二万三千人，在绥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领下全部起义，至二十二日在徐州以东之碾庄地区，全歼敌第七兵团黄伯韬所属五个军十个师，及在商邱、宿县、睢宁等地歼灭一个军部另四个师一个多团。以上共计十八个师，十七万八千人，并击毙敌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接着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复围歼由华中地区赶来增援之十二兵团黄维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十二万五千人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活捉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八十五军一百一十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并于灵壁歼敌二百三十八师。在徐州之敌，杜聿明所部第二兵团、十三兵团、十六兵团等三个兵团共十个军、二十五个师，当三绥区部队起义，黄伯韬兵团被歼，黄维兵团被围攻之际，便于十二月一日放弃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但旋即被我截住，并加以包围，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止，全歼于永城东北之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华东敌军副总司令杜聿明被生擒。总计前后经两个月零五天的作战，共歼敌徐州"剿总"所部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五十五万五千余人，战役胜利结束。由于这个人民解放战争中另一有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华东及中原地区长江以北之残敌，均纷纷向江南溃退，华东解放区除山东省之青岛，及长江北岸极少数敌人据点外，全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首脑地区南京、上海，便暴露于我军面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我第四野战军及华北两个兵团，发动了巨大的平津张战役，至十二月二十一日止，我军即在塘沽至张家口的八百里战线上，将敌人分割包围于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家口五个孤立据点，并歼灭了敌人一百零四军及十六军所属五个师及两个师的大部。二十二日围歼了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军部及两个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攻克了张家口，全歼守敌第十一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四千余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军在天津守敌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接受我之和平解放天津的提议后，即向天津发起总攻，仅仅二十九个小时战斗，即完全解放了拥有二百万人口为华北第一大商埠及工业都市的天津，守敌六十二军、八十六军两个军共十个师及其他部队，十三万余人无一漏网。北平守敌，华北"剿总"所属第四兵团、第九兵团共八个军，二十六个师，乃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我之和平改编；一月三十一日，古都北平乃宣告和平解放。总计五十六天中，敌原华北"剿总"所部，被歼与接受改编者共三个兵团，十四个军，五十个师，五十二万一千人。这一伟大胜利，即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在辽沈、淮海、平津张诸战役后，敌人所有精锐部队，均丧失净尽，敌人在军事上并且也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已面临绝境。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基本胜利。内战祸首蒋介石就在此时宣告下台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犯李宗仁、何应钦拒绝签定和平协定后，举行了历史上空前的百万大军的渡江作战。截至五月廿七日淞沪作战结束为止，先后共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九江、武汉等一百二十余座城市；歼敌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四十三个整师及其他部队，共三十八万六千余人。同时华北我军，亦于四月廿四日、五月一日、五月六日、五月七日先后肃清了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敌人残余据点，歼敌太原"绥靖公署"及安、新守军共二十一个师等部，十六万八千九百余人，最后解放华北全境。西北我军亦于五月廿日，解放了西安，及渭河流域广大地区，歼敌五十七军等部二万七千三百余人。山东则于六月二日解放青岛。

截止一九四九年六年底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三年中，共歼敌军三百零五万人，内正规军二百四十个整师，连同歼敌整营整团部队，折合三百零三个半师，共二百四十三万四千六百人；非正规军三百零七个团又一个营，共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人，解放国土面积六十万七千六百方公里，解放人口一亿四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人，解放特别市、省会、县城共四百八十二座。

经过三年的作战，国民党反动统治基本上灭亡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在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北、西南前进，以扫灭国民党的残余兵力。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独立解放的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几千年从黑暗落后的封建制度下，自求解放的翻天覆地的胜利。从此以后，几千年束缚中国人民的封建制度，百余年来侵略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势力，和近二十多年祸国殃民的官僚资本制度，都被中国人民推翻。中国成为人民民主的中国了；新中国的光辉，将从此照耀于世界。

肃清蒋匪残余统一全中国诸战役概述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的辉煌胜利，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中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

一九四九年七月，渡过长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已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皖南、苏南的全部及浙江省之大部，江西、福建两省各一部。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的大部（包括西安市在内）和宁夏、甘肃两省各一部。人民解放军已由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前夜的一百二十万人，壮大成为拥有四百万人的无坚不摧无战不胜的强大力量。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开始发动全国性内战时拥有四百三十万兵力的国民党匪军，这时仅残余一百四十九万人，而且成了逃窜的股匪，在整个战场上已没有一条完整的战线。蒋匪帮政府成了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逃窜。

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首将最后挣扎的希望，寄托于盘据西北的胡宗南匪部和退缩于湘桂一线的白崇禧匪部，妄想窃据西北和西南地区，苟延残喘，以等待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敌人这些梦想很快就被粉碎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表现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了。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人民解放军遂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各个战场上继续追歼残敌。

人民解放军在胜利追歼残敌的战斗中，为了不使敌人漏网，迅速解放全部国土，几乎是马不停蹄人不卸甲地连续战斗着。同时，在各个较大战役中各大野战军部队互相紧密配合，在统一指挥下共同作战，终于扫清了中国大陆所有残余匪军，解放了除西藏和台湾外的全部国土。一九五一年五月，西藏宣告和平解放。至此，中国全部领土除台湾外均告解放。

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一年作战，可分为西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南等几个方面来叙述：

西北方面：第一野战军继胜利解放西安之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在华北人民解放军一部的配合下，开始了解放西北各省的作战。攻势的第一天，即在陇海路西段扶风、郿县地区将胡宗南匪部十八兵团之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九十军及王治岐匪部一一九军共四万三千余人包围歼灭，迫使胡宗南匪军残部向陕南逃窜，取得了西北战场大会战的第一个回合的完全胜利。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随即指向马步芳、马鸿逵匪部巢穴

（甘肃）前进，迅速突破固关、平凉及六盘山三道防线，连克平凉、天水等城市，解放了陇东、陇南广大地区。八月二十六日，一举攻克西北枢纽兰州，歼灭马步芳匪军主力四万二千余人。

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即分兵向宁夏、青海及甘肃西部走廊进攻。向青海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于九月五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市，并全部歼灭马步芳匪军。九月十日再由西宁出发，配合由兰州出动的另一路人民解放军，向甘肃西部走廊进攻。九月二十二日两路大军胜利会师于张掖，并继续长驱并进，直达甘肃西部走廊顶点安西。至此，甘肃省全境获得解放，残留于甘肃境内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其所辖残部三万三千余人全部就歼。与向甘肃西部走廊进军同时，人民解放军分兵三路向宁夏省大举进军。九月二十六日，将宁夏马鸿逵匪部主力一二八军围歼于金积县城。一二八军被歼后，宁夏马鸿逵匪军残部纷纷投诚。人民解放军遂于九月二十三日进驻宁夏省会银川市，随后分途进驻银川以北及贺兰山以西各城镇，宁夏全省宣告解放。

由于人民解放军在西北的攻势迅速胜利的结果，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陶峙岳部及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在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先后通电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条件，新疆省乃告和平解放。接着第一野战军王震兵团即和平进入新疆，十月二十日进驻新疆省会“迪化”（现改称乌鲁木齐市）。

十二月初，第一野战军一部，扫清陕西、甘肃南部残敌。至此，西北五省获得全部解放。

华北方面：最后残留于绥远省西部的国民党军董其武部八万余人，于九月十九日通电起义，华北全区遂告解放。

中南方面：人民解放军于取得解放华中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及席卷湖北省中部、北部、江西省北部诸地的伟大胜利之后，七月十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在西起宜昌、沙市，东至赣江沿岸数百里战线上，发起了肃清中南残匪的强大攻势。大军分为三路进军：西路大军自湖北省西部的宜昌、沙市地区渡过长江，随即向湖北省南部、湖南省西北部疾进，迂回至长沙西北，二十九日解放湘西重镇常德。东路大军在江西省境内分向西、向南两路并进，西进部队西渡赣江沿浙赣铁路南昌、萍乡段向西南推进，迂回至长沙东南，二十三日攻占萍乡；南下部队沿赣江向南推进，肃清两岸国民党残余匪军，先后解放吉安、泰和等地。中路大军则由湖北省南部攻入湖南省北部，沿粤汉铁路正面向长沙进攻，二十日解放岳阳。

由于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迅速向长沙合围，白崇禧所部桂系国民党匪军，即自长沙地区向南撤逃。八月四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省会长沙遂获和平解放。

八月八日，人民解放军东路大军的南进部队，在江西省境内，发动了赣南战役。人民解放军沿赣江两岸以钳形攻势向南挺进，十四日一举攻克赣南重镇赣州。至二十三日，收复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首都瑞金，并解放江西省南部广大地区。赣南战役的胜利结束，为进军广东、直捣国民党匪帮巢穴广州，铺好了一条胜利大道。

中南前线人民解放军在夏季作战后，经月余休整，复发动强大秋季攻势。东路大军

在解放江西省南部地区后，九月下旬挺进广东，连克南雄、始兴等县城，十月七日晨解放粤北门户曲江，随即分路猛扑广州。西路大军于九月十五日自湖南省西部之常德、桃源一线出动，向南大举进军。十八日占沅陵，复乘胜南进，连克溆浦、泸溪等县城。十月二日，攻克湘、桂、黔三省门户，匪军重要空军基地芷江，再克会同、靖县等城，截断了蒋介石、白崇禧残匪赖以西逃的湘黔公路。中路大军于十月三日分两线向白崇禧匪军巢穴衡阳举行巨大钳形攻势。白崇禧匪部犹妄图以华中战略基地衡阳作为负隅挣扎的中心，东依湘江、涞水、永乐江，西凭资水，布置两条防御线，集中其主力部队于湘、资两江间之衡阳、宝庆（邵阳）一线，妄想阻止人民解放军大军前进。人民解放军中路大军之西线部队，经两昼夜强行军，奔袭并歼灭永丰、新桥、白果市一线匪军，并击退匪军反攻，直追衡宝线敌军。中路东线人民解放军亦迅速突破衡宝地区的右侧防线，五日占领永兴，截断粤汉铁路。七日，中路东西两线大军发起总攻，一举突破衡宝线，八日解放湘南重镇衡阳，匪军立即全线混乱，狼狈溃逃。人民解放军当即发起全线追击，并将白匪主力四个师围歼于祁阳以北五峰山地区。是役共歼敌四万七千余人。

进入广东之人民解放军东路大军，于解放曲江后，在华南人民武装积极配合下，十月八日分沿粤汉铁路、北江、东江两岸直扑广州，沿途粉碎敌匪抵抗，十四日下午即解放中国南部最大城市广州。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在广东西南部阳江地区将逃敌四个军之大部包围歼灭。至此，中南人民解放军之秋季战役历时一月零十三天，胜利告一段落，共歼灭匪军十万九千余人。

十一月六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动了解放广西的战役。大军由湖南省西南部分三路进入广西，二十二日解放广西省会桂林，二十五日解放柳州、梧州，十二月四日解放广西南部重镇南宁。桂系残匪在人民解放军猛烈追击下，南逃至广东、广西边境，妄图夺路雷州半岛越海逃往海南岛。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及时赶到，乃将残匪分别包围于广东、广西边境，加以歼灭。广西作战至十二月十一日占领“镇南关”（现改称睦南关）止，除少数残匪逃入越南外，白崇禧桂系匪军全部及其所指挥的蒋匪军一部共十七万二千余人，悉数就歼。至此，中南大陆作战胜利结束，中南区只剩下了一个海南岛尚待解放。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第四野战军一部以强大主力部队渡过琼州海峡，开始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在此以前，人民解放军曾在三月五日至三十一日，强行渡过四批先锋部队，与坚持海南岛革命游击战争二十余年的琼崖纵队胜利会师，为主力部队大规模渡海作战准备了有利条件。四月十七日，人民解放军强大主力部队，一举突破残匪大吹大擂的所谓立体防线，摧毁匪军海、陆、空立体防御的层层火网，胜利完成敌前登陆，随即大举进军向纵深发展。在琼崖纵队配合作战下，仅半个月时间，即将海南岛全部解放，歼敌三万余人，至此，中南全区宣告解放。

华东方面：第三野战军之一部，奉命由上海挺进福建，接换已进入闽中地区的第二野战军部队，并担负扫清残存祖国东南边境的国民党匪军的光荣任务。八月十三日该部发动福州战役，迅速拔除福州外围据点，十七日攻入福州市，至二十二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匪军三万五千余人。九月十六日，人民解放军攻占福建沿海第一大

岛平潭岛，全歼守敌。与解放平潭岛同时，另一路人民解放军沿福厦公路向厦门疾进，沿途迅速解放闽西南之漳州等城镇三十余处，歼灭守敌共二万余人，完全肃清闽西南内陆残匪据点，厦门即暴露于人民解放军铁拳之下。十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之下渡过海面，强行登上厦门岛。十七日，闽东南沿海战略要地厦门即告解放，守敌汤恩伯匪部二万七千余人全部就歼。至此，除金门岛外，福建全省均告解放。

华东区沿海另一群岛屿，浙江省之舟山群岛，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获得解放。守敌在人民解放军登陆后，遗弃大批物资向台湾逃窜。至此，华东区除台湾、金门岛尚待解放外全区均告解放。

西南方面：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三大野战军部队，开始向西南各省大进军。第二、第四两野战军部队首先在湖南、湖北、四川三省边境，一举歼灭匪军宋希濂部主力，乘胜猛追入川，沿途粉碎蒋匪抵抗直追重庆。另一路人民解放军，则由湖南省西部之芷江地区进入贵州，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复乘胜追歼残敌，迅速将贵州省大部分地区解放。并分由贵州省北部之遵义、西北部之毕节，两路向四川直进。各路人民解放军乃于十一月三十日一举解放西南首府重庆。此时，蒋介石匪首一面以宋希濂、罗广文两兵团残部及"川鄂绥靖公署"孙震匪部在正面抵抗我军向成都推进，一面仓皇将胡宗南匪部主力由秦岭山区及甘肃东南调集成都附近，企图抵抗我军，并向西康、云南突围逃窜，以保全其大陆上最后一支基干力量。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大军沿成渝公路向成都猛追残匪，迅即进至隆昌、内江、资中，十二月十五日解放成都东南要地简阳。与此同时，由贵州西北毕节挺进四川之人民解放军，到十二月三日即先后解放长江上游国民党匪军南北据点叙永、泸州，并沿泸乐公路分两路向犍为、乐山前进，于二十日前连克自贡、荣县、乐山、峨嵋、彭山，并解放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等城，截断胡宗南匪部退入西康逃路。该路人民解放军与沿成渝公路西进人民解放军大军形成了对成都胡宗南匪部钳击的形势。

此时，第一野战军一部从陕西省南部及甘肃省南部分头南下，连克广元、剑阁、绵阳，迅速到达成都外围广汉及其东西一线。至此由陕西、甘肃、重庆等地退集成都周围的四十余万敌军，被我完全包围。被围歼敌西临邛崃山脉之崇山峻岭，毫无逃路。在企图突围南逃之李文兵团被歼后，其余各部即宣布起义。全西南主要作战，在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四三大野战军协同努力之下，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宣告结束。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六十一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个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介石、胡宗南残余部队约七十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二十余万人，起义四十余万人，解放了四川、贵州两省全部，和湖北省西部、湖南省西部、陕西省南部、甘肃省南部最后的几十个县。

在这次战役进行间，由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和在西南的迅速胜利，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将军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使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云南解放后，曾发生原已被迫宣布起义之李弥、余程万两部匪军的叛变。我云南人民武装及第二野战军一部曾协同云南的起义部队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旋以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各一部由广西赶赴云南南部截击叛军，叛军终在我军协同追截下，于一

九五〇年一月全部就歼。胡匪宗南于成都失败后，逃往西昌，企图收集残部保持西南最后据点，并企图组织和指挥所谓西南游击战争。西南军区主力一部乃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旬分南北两路渡过金沙江及大渡河，二十七日解放西昌，截至四月七日止，此役胜利结束。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已获全部解放。

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人民解放军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开始了解放西藏的大进军，十七日解放西康西部重镇昌都。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十月二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欢迎下，进驻拉萨。

自一九四九年七月起，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底止，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兰州、福州、广州、贵阳、桂林、重庆、成都等县以上城市九百七十座和广大地区；并用和平的办法解放了湖南、绥远、新疆、西康、云南等地，面积共达五百五十三万二千七百方公里、人口一亿八千二百八十一万八千。歼灭了连同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首所依为在中国大陆作最后挣扎的两支基干力量——白崇禧、胡宗南匪部在内的国民党残匪共三百三十七万九千九百五十人。连同以前三年，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匪军八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一人。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底止，全国已解放国土面积八百四十九万五千五百方公里、人口四亿八千二百五十三万二千、县以上城市二千零三十一座。一九五一年五月，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全部领土除台湾尚待解放外已完全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使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正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事伟大的国防、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以便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逐步地过渡到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进入了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正规化的国防军的新历史时期。

（转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附〕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历次重要战役一览表*

战役名称	性质	时间	作战地区	我参战部队	战役经过	消灭敌军番号	消灭敌军人数
中原突围	突围	1946. 6.29—7.30	豫鄂陕边及鄂豫皖边区	中原区李先念部	蒋匪决心破坏国内和平，以二十六个整旅约三十万人将我中原部队重重包围，企图“围歼”中原我军于宣化店地区，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发动对我攻击。我为粉碎敌人阴谋，转入外线作战，即于二十九日黄昏开始突围，至七月一日我军主力在武汉信阳之间柳林、花园之线突破敌人严密封锁，胜利越过平汉路西，其他各路亦相继突出重围，或就地分散游击。蒋匪复纠集三十八个整旅及地方团队共约四十万余人，对我向西突围主力施行追击、截击、堵击。七月底我军主力分别到达豫西、陕南、鄂北、淮南等预定转移地区。	正规部队：歼灭整编一师、整编三师、整编三六师、整编四一师、整编四七师、整编六六师、整编七二师、整编七五师、整编七六师、整编九〇师等各一部。	俘虏 1,500 毙伤 3,590 合计 5,090
胶济东段保卫战	野战	1946. 6.21—7.28	山东胶济铁路东段之胶县、高密地区	华东区山东野战部队	敌五四军之一九八师等部，于六月二十一日起由青岛沿胶济路向西进攻，此系敌在山东地区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开端，至二十八日先后占我胶济路东段之即墨、南泉等地，沿途遭我有力抗击，损失惨重，遂被我阻止于胶县地区。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一个团及一个师之一部（九六军暂编一二师、五四军一个团及一九八师一部）。	俘虏 1,880 毙伤 3,500 合计 5,380

* 此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一九五〇年七月编制。

同蒲路南段阳击战	野战及攻坚	1946。7.3—9.1	同蒲铁路灵石至闻喜地区	晋冀鲁豫所属太岳野战部队	正当中原我军突围后第五天，胡匪纠集七个旅，于七月三日开始向我晋南进攻，先后占我闻喜、茅津渡等城镇数处，经我奋勇反击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歼敌三一旅等部六千余人，余敌狼狈窜回固守。八月十四日我军复向临汾以北之同蒲沿线发动攻势，两周内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等城，控制铁路二七〇里，歼灭阎匪暂编三九师等部八千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三个团及三个师各一部（三一旅、四七旅二个团、一六七旅一个团及暂编三九师、暂编四四师、六九师各一部）。	俘虏 8,400 毙伤 6,800 合计 15,200
晋北战役	攻坚	1946。7.4—8.15	山西山阴、朔县、代县、繁峙、宁武地区	晋绥及晋察冀野战部队	我军为切断大同与太原敌之联系，于同蒲北段发动攻势，一路先后攻歼朔县、宁武、崞县等地之敌；另路则攻克繁峙、代县等城，至七月初两路会师于忻县城周，并于忻县以南地区歼灭太原北援之敌六八师两个团。至此晋北由大同南之怀仁至太原北之大盂镇间地区，除忻县一个孤立据点外，全为我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六个团（暂编三八师二个团、暂编三九师一个团、暂编四〇师一个团、六八师二个团）。	俘虏 2,900 毙伤 5,200 合计 8,100
胶济西段反击战	攻坚及野战	1946。7.5—10.3	山东胶济铁路西段周村、邹平、济阳地区	华东区山东野战部队	济南敌于七月五日开始沿胶济线东犯，先后占我济阳、邹平、周村等地，于十月十日与青岛西进之敌会合。在济南敌东进的两个月中屡遭我军的阻击及反击，如济阳城反覆争夺三次之多，邹平城亦有两次，给了进犯之敌多次严重之打击，并歼其一部。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七三军一个团、暂编十五师一个团、新编三六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营及伪军李连祥部。	俘虏 5,100 毙伤 2,200 合计 7,300

苏北七战七捷	野战	1946. 7.13—8.27	江苏长江以北运河以东沿海泰公路以南地区	华东区苏北野战部队	苏中蒋匪企图向我如皋、海安进攻，我为打乱敌之进攻部署，首于七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晚，全歼泰兴及其以北宣家堡两个团；复于十七日晚至十九日于如皋以南地区全歼进犯如皋之敌四九师师部及一个旅；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我军又给进犯之敌以严重杀伤后，主动撤出海安。继于八月十日晚至十一日晚在海安东北之李堡地区，歼其新七旅及一〇五旅一部；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我军在丁埝、林梓地区歼敌清剿部队交警五个大队等部；又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在如（皋）黄（桥）路歼沿运河进犯邵伯之敌九九旅；并于二十七日包围如皋以西加力市之敌一八七旅，在敌突围中将敌全歼。战役历时四十五天，连续七战皆捷。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七个旅、一个团（整编四九师师部、十九旅、二六旅、七九旅、九九旅、一〇五旅、一八七旅、新编七〇八旅、一〇八旅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五个营。	虏俘 29,300 毙伤 22,000 合计 51,300
大同、集宁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6. 7.20—9.15	山西大同及绥东集宁地区	绥晋、晋察冀野战部队	我军为拔除大同据点，于七月二十日开始肃清外围及城周各据点，九月二日城北我军即控制北关及车站，城南进至南大庙，东西亦抵城垣。“归绥”（现改称呼和浩特）之敌乃仓皇东援，于九月四日进至卓资山，我为打击援敌，乃结集主力北上，一部继续监视大同。九月十日我军于集宁城郊与援敌接触，先后歼敌暂十一师大部及暂十七师一部后，于九月十五日我军主动撤出战斗。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及一个师大部（暂编十七师一个团、暂编三八师一个团、骑兵五师一个团及暂编十一师大部）。	俘虏 3,400 毙伤 5,470 合计 8,870

朝阳集战役	野战	1946. 7.24—7.27	江苏徐州东南之朝阳集	华东区山东野战部队	敌整六九师之九二旅及六〇旅等部，于二十四日由徐州东南之双沟、时村、右相一线向我进攻，当日占我渔沟、朝阳集等村，并企图继续东进占领睢宁县城，我军于二十六日开始向该地反击，至二十七日下午将九二旅全部及六〇旅一部歼灭，粉碎了敌进攻睢宁的企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九二旅）。	俘虏 毙伤 合计	2,600 1,200 3,800
出击陇海路战役	攻坚	1946. 8.10—8.22	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我军于八月十日晚分两路向陇海路出击、至十三日先后攻克砀山、兰封及黄口、李庄、杨集等车站十余处，控制铁路三百余里，，并争取虞城敌蒋嘉宾部起义。我军一部并乘胜南下，于十四日攻克杞县，十六日继克通许，同时并于商邱、柳河间歼敌一八一旅主力，至二十二日我主动撤出兰封，战役遂告结束。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五个营及一个旅一部（二九旅一个团、一八一旅二个团、五个营及一八旅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五个保安团、二个营，另蒋嘉宾部起义。	俘虏 毙伤 起义 合计	6,000 5,000 5,000 16,000
定陶战役	野战	1946. 9.3—9.7	山东定陶曹县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陇海路战役结束后，蒋贼介石乘我疲惫之时，即调其徐州之五军两个师经丰县、沛县向城武前进；调郑州之四、五两"绥靖"区共五个整编师及张岚峰部经考城、长垣、民权等地向东明、曹县、定陶前进，妄图在菏泽地区将我主力夹击消灭。我军稍事休整，即以一部阻击由徐州进犯之敌，集中主力迎击郑州来犯之敌，九月三日黄昏首将五"绥靖"区之整三师全部包围于菏泽西南大杨湖地区，至五日将该敌全部歼灭，我主力旋即向南疾进，歼敌整四七师大部于定陶附近，复于考城以北追歼敌整四一师一部，粉碎了徐州、郑州敌对我钳击攻势。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二个旅及三个整编师各一部、（整编三师师部、三旅、二〇旅及整编四一师、整编四七师、整编五五师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12,200 5,000 17,200

两淮保卫战	野战	1946. 9.10-10.30	江苏淮阴、淮安及涟水地区	华东区苏北野战部队	敌李延年指挥三个整编师，由宿迁等地沿运河两岸南下向我两淮进攻，经我军节节抗击，予敌以重大损失，歼敌一万四千余，于十九、二十一两日先后主动撤出淮阴、淮安等地。	正规部队：歼灭五个团（五一旅一个团、五七旅一个团、五八旅一个团、一七一旅一个团、一九二旅一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6,000 8,400 14,400
临浮战役	野战	1946. 9.22—9.24	山西临汾、浮山之间地区	晋冀鲁豫太岳野战部队	我军于九月二十三日包围进犯浮山之敌一师一六七旅后，该军即派其第一旅增援，该敌进至临汾东三十五里之上阳、官雀、陈堰一带时，即为我军包围，经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激战，全部就歼。进入浮山之敌乘机向南逃窜，并为我截歼一部，浮山当为我收复。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一旅）	俘虏 毙伤 合计	2,500 2,000 4,500
巨野战役	野战	1946. 9.29—10.7	山东巨野西南张凤集、龙堌集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敌占菏泽后，以五军及整十一师分由菏泽、定陶向巨野进攻，企图打通菏（泽）济（宁）公路。我军即以一部于菏巨公路上之龙堌集一带抗击五军，经九天激战，予敌以惨重杀伤，敌被迫南撤。我主力于三日开始于张家凤集地区向整十一师进击，歼敌一部，余敌逃窜。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二个营（十一旅一个团、四五师一个团、二个营）。	俘虏 毙伤 合计	2,300 3,000 5,300
张家口保卫战	野战	1946. 9.29-10.20	察哈尔之张家口至怀来地区	晋察冀野战部队	敌在全国发动内战后，分东西两路向我张家口大举进攻，东路敌军九月二十九日进至怀来地区与我军接触，至十月十二日我军共歼敌达七千余人。西路敌于占领集宁后，袭击张家口，我军主力撤出张垣。另部我军与此同时为配合张家口保卫战，出击平汉北段配合作战，收复望都。徐水等十余城镇，歼敌一部，并控制铁路二百五十里。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部、五个团（一〇九师师部及二个团、四三师一个团、一二一师一个团、一个独立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暂编三总队二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13,150 9,400 22,550

新开岭战役	野战	1946.10.26-11.2	辽宁宽甸西北之新开岭地区	东北野战部队	自十月起，东北蒋军大举向我辽东地区进攻，先后占我西丰、清原、金川、辉南、新宾等城，二十日敌复集结新六军、五二军及一八四师等部共五个师，分由大石桥、海城、本溪、营盘等地向我安东地区进犯。我军为寻机歼敌，除以一部兵力于安（东）沈（阳）线及大石桥、海城之正面阻滞敌军外，主力集结于新开岭以北地区。由本溪进犯之敌二五师于三十、三十一两日被我诱至新开岭地区后，为我一举包围歼灭。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二五师）	俘虏 毙伤 合计	5,800 3,150 8,950
鄄城战役	野战	1949.10.28-10.31	山东鄄城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敌一一九旅全部八一旅一个团及炮兵部队等部向我鄄城进犯，于十月二十九日黄昏进至鄄城以南之南苏屯、石庄地区。我军除以一部阻击钳制五军整十一师及一四三旅的增援外，主力由鄄城东南及西南方向，向敌后迂回，于二十九日晚将敌包围于苏屯、迈庄、蜂窝、富春、任庄等村，战至三十一该敌为我全歼。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二个团、一个营(一一九旅、八一旅一个团、整编五五师一个团、一个炮兵营)。	俘虏 毙伤 合计	5,500 3,600 9,100
平度、安邱战役	攻坚	1946.10.30—11.12	山东平度、安邱地区	华东区山东野战部队	敌五四军及整编六四师等部，于十月三十日向我胶东北部地区进攻，企图切断我山东与东北之海上联系，先后占我平度、掖县等地。我军反击，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并一度收复平度、安邱、掖县等地。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一五九旅二个团、一九八旅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及一个旅大部（保安三旅一个团及警备一旅大部）。	俘虏 伤毙 合计	9,500 5,500 15,000
易、满战役	野战	1946.11.3—12.23	河北易县、满城、涞水地区	晋察冀野战部队	我为粉碎敌人进攻易县、满城之计划，于十一月三日至十九日在易县之门墩山二十里铺一线歼灭进犯之敌一二一师之三六一团等部约二千余人；又于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满城以东地区歼灭进犯之敌一三〇师之三八九团等部约二千余人，将敌击退。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一个营(一二一师二个团、五三军一个团、一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3,800 4,100 7,900

晋西南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6.11.27—11.30	山西隰县、永和、蒲县、大宁地区	晋绥及太岳野战部队	十月初胡匪整一师、二七师、九十师等部由晋南偷渡黄河以西，阴谋袭击延安。吕梁、太岳我军为配合保卫延安，于十一月中旬向汾河以西发动攻势，至三十日止连续解放永和、大宁、隰县、蒲县等城，歼敌万余。胡匪被迫撤返黄河以东。至此北起中阳、南至吉县、西起黄河、东抵同蒲，长达四百余里，宽约三百华里的宽大地区，获得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部、二个团、五个营（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暂编四五师一个团、五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八个保安团。	俘虏 7,500 毙伤 3,210 合计 10,710
盐城保卫战	野战	1946.11.27—12.16	江苏盐城地区	华东区苏北野战部队	敌整八三师、整六五师各两个旅、整二五师一个旅共五个旅，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由东台、兴化、临泽镇四路进犯盐城，被我军阻击于盐城以南之下仓、伍佑地区，经十五天之激战，击退敌之进攻，并歼敌六千。	正规部队：歼灭整编二五师、整编六五师、整编八三师各一部。	俘虏 2,000 毙伤 4,000 合计 6,000
宿北战役	野战	1946.12.13—12.19	江苏宿迁以北地区	华东野战部队	敌薛岳部于十二月初集中了二十八个旅，分由鲁南、苏北及两淮地区，同时并进，企图打通陇海路，进占临沂等地区。我军以一部钳制鲁南、两淮进犯之敌，以主力于十五日开始向宿迁北犯嶂山地区之敌攻击，当晚攻克峄山，并于十六日粉碎敌两个旅的进攻，同日下午三时向敌出击，当即进占嶂山镇，歼灭了逃至晓店之预三旅旅部及一个团。至此，敌人通宿迁、曹家集两条归路为我截断，被迫分村固守，我军便于十七日黄昏分别围攻人和圩、苗庄、刘圩、罗庄等地之敌，战至十九日除逃脱四百余人外，余被全歼。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旅、一个团(四一旅六〇旅、预备三旅、整编十一师一个团）。	俘虏 17,500 毙伤 6,500 合计 24,000

滑县战役	野　战	1946. 11.18—11.22	河南滑县长垣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我军于十一月十五日由濮阳县附近及鄄城以北地区西进，十八日到达滑县以东地区，是夜即开始对孙震集团秘密接近，分头将敌割断，由敌之接合部穿入一〇四旅及一二五旅驻地宋楼、韩村、小渠等地，于十九日拂晓前出敌不意的向敌攻击，至黄昏河北保安十二纵队即为我全歼；继于二十日攻克邵耳砦、上官村，并歼敌一〇四旅全部并于野战中歼灭了留固集突围之敌一二五旅大部；二十一日夜续予老岸镇之敌以打击后，于二十二日结束战斗。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一个旅部、一个团（一〇四旅、一二五旅旅部及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保安十二纵队二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8,800 3,000 11,800
巨、金、鱼、城战役	野　战	1947. 1.1—1.16	山东巨野、金乡、鱼台、城武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我军于一九四七年元旦收复巨野、嘉祥及占领金乡四关后，即集中力量于四日向金乡城垣攻击，敌方先觉、刘汝明、张岚峰等部分别由鱼台、菏泽、定陶增援，我军除以一部继续围攻金乡外，集中主力于八日切断敌方先觉部之退路，九日将其一个半旅全歼，十日又将敌张岚峰部包围于金乡以西大田集东南地区，歼其大部。此时刘汝珍部闻风西逃，我即跟踪追击于西台集，歼其三个团全部，并收复城武县城。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五个团、六个营及二个团大部（一四〇旅、整编五五师二个团、整编六八师二个团、整编八八师一个团、六个营及二个团大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保安团、二个营及七个县府武装。	俘虏 毙伤 合计	10,900 5,500 16,400
峄枣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7. 1.2—1.20	山东峄县、枣庄地区	华东野战部队	宿北战役后，我军即北上打击由峄县、枣庄占领向城、卞庄地区之敌整二六师等部。于一月二日开始，由东西两面逼近敌人，并在南面切断了整二六师与三三军的联系，战至三日拂晓我即将敌整二六师紧缩包围，至四日攻克夏家庄、马家庄、陈家桥等地，歼敌整二六师大部。敌第二快速纵队及整二六师残部即行全线拚命突围，于运动中亦被全歼。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整编师部、四个旅、一个快速纵队（整编二六师师部、整编五一师师部、四四旅、一一三旅、一一四旅、一六九旅、快速第一纵队——内包括八〇旅全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39,030 13,400 52,430

三下江南战役	野战	1947. 1.7—3.10	吉林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地区	东北野战部队	一至四月间东北之敌复集结兵力，连续四次向我辽南之临江地区进犯。我为粉碎敌军进攻，配合四保临江作战，主力冒酷冷天气进军松花江南，向敌进击。第一次于一月间突然越过松花江，进击九台东北其塔木之敌，歼敌新一军主力新三八师一个团；二月间我军再次下江南，于九台东北之城子街歼敌新一军新三〇师一个团又一个连及一个保安团，威胁吉（林）长（春）铁路；三月间我军第三次下江南，以更大规模进攻长春以北之敌靠山屯据点，歼增援之敌八八师全部，有力地配合了四保临江作战。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二个团、三个营（八八师、新编三〇师一个团、新编三八师一个团、三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10,350 4,900 15,250
汾孝战役	野战	1947. 1.18—1.28	山西汾阳、孝义地区	晋绥及太岳部队	继晋西南胜利之后，为打击配合胡匪向我进攻之阎匪，我军乃挥师北上，攻打汾、孝，一月十七日夜开始攻击孝义，次日拂晓即解决战斗。阎匪三路增援，均被击退。二十一日南路敌军复攻我西盘粮，依然被我击退，并歼其两团。二十四日北、中两路敌军亦分向平遥、张兰方向逃窜，我即猛追，至二十八日止，战役即告结束，歼敌一万一千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四个团、八个营(六九师二个团、七二师一个团、暂编四、师一个团、八个营）。六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营。	俘虏 毙伤 合计	6,390 5,000 11,390
保南战役	攻坚	1947. 1.21—1.28	河北保定以南望都、定县、新乐地区	晋察冀野战部队	我军为粉碎敌打通北京至石家庄铁路交通之企图，遂于一月二十一日向保定至石家庄间发起攻势，首克望都，继克王京、寨西店等地，并于寨西店以南歼敌两个团后，乘胜进占新乐、长寿、定县等地，敌狼狈向北逃窜，复遭我追歼，至二十八日战役胜利结束。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六个团（五纵队四个团、一个保安团、一个还乡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6,600 3,000 9,600
					为了有力地配合山东我军之作战，我军于一月二十五日由金乡附近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			

出击豫皖边战役	野战	1947. 1.25—2.9	安徽亳县及河南太康、睢县、宁陵与陇海路商邱至民权段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边地区，至二月二日连克柘城、鹿邑、亳县等城。此时敌王敬久即由商邱派精干部队三千五百余人南援，四日在亳县西北之丁大集、齐夏等村被歼大部，续克杞县、太康、宁陵、睢县等城；并击破了陇海路商邱至民权段五十余里。至此我苏豫皖军区之三个分区连成一片。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十六旅二个团、十旅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六个团（四纵队二个团、四个保安团）。	俘虏 7,500 毙伤 1,500 合计 9,000
白塔埠战役	野战	1947. 1.28—2.15	山东临沂东南地区	华东野战部队	敌军正在大举进攻临沂之际，叛逆郝鹏举部，于二月十五日叛变人民投降蒋匪，配合敌人于一月二十八日向我临沂进攻，我军当即将该匪包围，歼灭于临沂东南之白塔埠地区，并将郝匪鹏举生擒。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集团军司令部、二个师（四二集团军司令部及所属之一师、二师）。	俘虏 3,460 毙伤 1,500 合计 4,960
四保临江战役	野战	1946. 12.17—1947.4.3	辽东临江、通化地区	东北野战部队	进占安东、通化、沈（阳）、吉（林）路等地区之敌，为达其先南后北战略目的，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间先后四次纠集兵力向我临江地区进犯，妄图压迫我军退至长白山。我军为保卫临江，粉碎敌之企图，在松花江北我军三下江南主动出击配合下，展开四保临江的英勇战斗。敌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的第一次进攻时，其一九五师约一个团被歼；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敌军第二次向临江进攻时，其暂二一师六三团全部被歼；二月后半月的第三次进攻，敌九一师二七二团另二个营被我全部歼灭；三月底四月初第四次进攻，敌八九师及五四师一个团被我全歼。并收复辉南、金川、柳河、桓仁、辑安等五城，改变了整个辽南的形势。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四个团、八个营（八九师、五四师一个团、九一师一个团、一九五师一个团、暂编二一师一个团、八个营）。	俘虏 16,090 毙伤 3,760 合计 19,850

莱芜战役	野战	1947． 2．19—2．23	山东莱芜地区	华东野战部队	一月三十一日南线蒋匪以八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同时北线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由淄川、博山、明水等地南下新泰、莱芜策应，企图与我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我军以一部阻击南线之敌，主力北上莱芜歼击李仙洲集团，战斗自二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三日下午结束，全歼该敌。我继续扩张战果，迫使胶济线敌人退缩青岛、济南、昌邑、潍县固守，收复城市十三座。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二个军部、七个师（二绥靖区指挥所、四六军军部、七三军军部、一五师、七七师、一七五师、一八八师、一九三师、新编一九师、新编三六师）。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营。	俘虏 毙伤 合计	49,000 11,800 60,800
延安保卫战	野战	1947． 3．13—3．19	陕北延安以南地区	西北野战部队	蒋军发动内战后，屡遭歼灭，士气低落，为振奋其士气，乃发动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进攻，三月十三日胡宗南匪部以十五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向我延安进攻。西北我军在延安以南之抗击战中杀伤敌军五千余人之后，十九日主动撤出延安，以诱敌深入，寻机歼敌。	正规部队：歼灭整编一师、整编一七师、整编二七师、整编三六师、整编七六师、整编九〇师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1,220 4,000 5,220
豫北攻势	野战及攻坚	1947． 3．23—5．28	河南新乡、汲县、安阳、浚县、滑县地区	晋冀鲁豫野战部队	我军于三月二十三日起连克延津、阳武、原武、濮阳、封邱、淇县等六城，并肃清了汲县、汤阴、安阳等外围据点，吸引了新乡之敌王仲廉部北上增援后，于四月十四日将其先头之第二快速纵队全歼。后续之敌整六六师闻风向东逃窜，我军一部跟踪追击，歼敌一部，先后收复浚、滑二县。五月一日继克汤阴，全歼敌孙殿英之暂编三纵队。继此胜利，即向东扩张战果，至二十八日止先后收复冀鲁豫区之东阿、平阴、郓城、鄄城、汶上、嘉祥、巨野等城。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快速纵队、三个团、二个营及三个旅各一部（第二快速纵队——内包括四九旅全部、整编四七师一个团、一〇六旅一个团、一九九旅一个团、二个营及三九旅、七六旅、一二二旅各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九个团（暂编三纵队四个团、五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26,100 14,850 40,950

青化砭羊马河战役	野战	1947. 3.25—4.14	延安东北青化砭、羊马河地区	西北野战部队	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敌军继续向北伸进，我军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安塞，而以主力则荫蔽集结青化砭地区，布置伏击阵地，待机歼敌。敌整二七师之三一旅率一个团于二十五日进入我军预伏圈内，约经一时许战斗，将敌全部歼灭。我军复于四月十四日于羊马河地区伏击自瓦窑堡南下之敌一三五旅，将其一举歼灭。是役的胜利，振奋了我西北全体军民，予胡宗南以严重打击。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一个旅部、一个团（一三五旅、三一旅旅部及一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5,390 2,300 7,690
淮沭及李堡战役	野战	1947. 4.4—4.30	江苏北部之沭阳及中部之如皋地区	苏中军区部队	为了粉碎蒋敌对我苏中之分割封锁，我军乃于四月四日向如皋海安东侧之李堡、栟茶敌封锁线发动攻势，至四月七日攻克李堡、栟茶等据点，歼敌七九旅之二三七团另二个营，另一部于四月八日攻克敌蒋坝、淮阴公路间之高良涧，俘敌百余，后于十八日北上至三十日先后占领淮阴、沭阴公路间之胡集、汤涧、马屯等重要村镇七十余处，歼敌整六五师、整八五师及地方团队各一部，敌之淮阴、沭阳公路之封锁遂被粉碎。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二个营（七九旅一个团、二个营）。	俘虏 毙伤 合计	7,500 2,900 10,400
晋西南攻势	野战	1947. 4.4—5.4	山西西南三角地区	晋冀鲁豫太岳野战部队	为配合陕北我军之作战，我军乘虚于四月四日向晋西南三角地带发起攻势，至五月四日仅一个月时间，连克浮山、翼城、临晋、虞乡、永济、闻喜、河津、荣河、万泉、曲沃、猗氏、稷山、解县、新绛、绛县、芮城、赵城、霍县等十八座县城，及黄河渡口之禹门口、风陵渡要点，控制同蒲路南段四百华里，守敌大部被歼，余部闻风溃逃。至此，晋南除运城、安邑、临汾三据点外，全获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四个营及一个整编师一部（二旅一个团、一七旅一个团、四个营及整编二七师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保安团、十八个县地方武装。	俘虏 毙伤 合计	10,300 4,500 14,800

正太战役	野战	1947. 4.8—5.8	河北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东段	晋察冀野战部队	我军为歼灭正太路之阎匪主力，于四月八日以一部于滹沱河左岸，阻击由平汉路南援之敌，并向石家庄及其周围佯攻，以主力集中于正太线上，向阎锡山最精锐之赵承绶部主力及阎锡山豢养的日军保安第五大队等部进攻，先后攻占井陉、盂县、定襄、平定、寿阳、正定、栾城等七座县城，歼灭敌三万余人。至五月八日止，控制了正太铁路三百多里，车站二十二座，我太行、冀晋两区遂连成一片。	正规部队：歼灭五个团（七师一个团、七一师二个团、暂编四六师二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五个团（保安五师三个团、暂编十总队二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24,500 10,900 35,400
泰蒙战役	攻坚	1947. 4.10—5.1	山东泰山、蒙阴地区	华东野战部队	敌集中汤恩伯、欧震、王敬久等部三十四个旅，四月上旬开始分向我蒙阴、新泰等地进犯，我军于七日上午在新泰西南五十里之观山头，歼敌整十一师之侦察营全部，继于二十二日向进驻泰安之敌整七二师反击，经四昼夜激战，至二十六日晨胜利结束，全歼其七二师师部及其所辖三个旅，并击退了进攻蒙阴、新泰敌整十一师等部。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三个旅（整编七二师师部、三四旅、新编十三旅、新编十五旅）。	俘虏 毙伤 合计	14,000 10,000 24,000
蟠龙战役	攻坚	1947. 5.2—5.5	延安东北之蟠龙镇	西北野战部队	西北我军乘敌主力北进绥德，后方空虚之际，于五月二日黄昏发起蟠龙战役，首先向外围攻击，四日晚即行总攻蟠龙，战至午夜时止，守敌六千余人全部就歼，缴获资财甚多。	正规部队：歼敌一个旅部、一个团（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陕西自卫三总队一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5,450 1,300 6,750

孟良崮战役	野战	1947. 5.6—5.16	山东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	华东野战部队	华东敌企图用“东压北挤”之战术，迫我主力在鲁南作战，以整二五师、七五师等部占我莱芜，图续犯淄、博，其一兵团攻蒙阴东北之坦埠，并图续犯沂水、莒县等地。我军为粉碎敌之进攻，乃于十三日开始在蒙阴东北五二里之坦埠南山区向敌一兵团之主力整七四师张灵甫部进行反击，敌不支逃窜，我紧跟追击，至十四日晨将其全部包围于蒙阴东南六十里之孟良崮山中，激战至十六日午，全歼该敌；并击溃其他五个整编师的增援。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三个旅、一个团及二个整编师各一部（整编七四师师部、五一旅、五七旅、五八旅、整编八三师一个团及整编二五师、整编四八师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19,680 13,000 32,680
东北夏季攻势	野战及攻坚	1947. 5.13—6.30	东北之东、西、南部及热河、冀东地区	东北野战部队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我军为歼灭分散守敌、收复广大失地，打通我南北之联系，遂向敌进行全线攻势。南线我军首于五月十三日出击沈（阳）吉（林）线，攻克黑山头、草市等据点，歼灭一部，击溃新六军主力新二二师等部六个团之增援；继克梅河口，歼敌一八四师，据守海龙、朝阳镇之敌暂二一师闻风逃窜，被我追歼于双阳东南地区，至此沈吉线两侧广大地区遂为我军收复。西线我军于五月十六日奔袭中长路西侧怀德城，包围敌新一军一部，敌新一军、七一军共四个师分由长春、公主岭两路驰援，其七一军进至大黑林子（怀德东南）后，被我包围歼灭，敌新一军亦被我击溃于新开河地区。同时怀德之敌两个团亦被我歼灭，收复中长路沈长段两侧之广大地区。东线我军于五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出击拉（法）吉（林）线之敌，尽扫江密峰、乌拉街、棋盘街等据点，歼敌新一军主力、新三八	正规部队：歼灭四个师、五个团、四个营（八八师、九一师、一八四师、暂编二一师、新编一军三个团、八七师二个团、四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六个团（暂编三师一个团、青年军二师一个团、独立九师一个团、三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60,000 23,200 83,200

					师等部三千余人，除龙潭山至小丰满狭小地带外，松花江以东地区，全获解放。西安、西丰、通化、安东、赤峰等地之敌，在我军胜利震撼下，均弃城逃窜。在五十天之攻势中，歼敌八万余人，收复县城四十余座，将敌完全压缩于中长及北宁路之少数据点上。		
乡宁战役	攻坚	1947. 5.18—5.25	山西乡宁地区	晋冀鲁豫所属太岳野战部队	我军于十八日发起攻击阎锡山匪军坚强设防的乡宁县城，于二十五日全部占领，守敌六八师一个团及专署保安部队全部为我歼灭。蒲县、大宁之敌逃向吉县，该两城遂亦为我收复。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六八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保安团。	俘虏 3,400 毙伤 300 合计 3,700
青沧战役	攻坚	1947. 6.12—6.15	河北津浦北段青县、沧县地区	晋察冀野战部队	华北我军为配合东北我军之夏季攻势，钳制华北敌军不能增援东北，遂于六月十二日在天津以南地区发起了青沧战役，至十五日止，先后攻克沧县、青县及铁路沿线之兴济、唐官屯、陈官屯、马厂等车站及据点，歼敌地方保安团队约九千余人，控制了铁路百余里，并使我冀中区与山东渤海区连成一片。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河北保安总队三个团）。	俘虏 1,200 毙伤 8,330 合计 9,530
保北战役	攻坚	1947. 6.25—6.28	河北保定以北之徐水地区	晋察冀野战部队	青沧战役后，敌十六军主力由平汉路东援津浦线，平汉线之敌仅留守备部队，我军遂于六月二十五日在保北地区发起攻势，至二十八日止，先后攻克徐水及固城、漕河、蓟塘铺、刘洋店、田村铺等据点，歼敌七千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三个营（一〇九师一个团、一二一师一个团、三个营）。	俘虏 2,800 毙伤 4,470 合计 7,270
鲁西南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7. 6.30—7.30	山东西南部菏泽、郓城、金乡、巨野、定陶、曹县地区	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所部野战军	我刘邓大军于六月三十日晚，在鲁西南董口至临濮集一线三百里宽正面上，击破河防守敌，渡过了天险黄河，开始了全国的总反攻。当即于七月一日将郓城敌曹福林之整编五五师包围，于八日将该敌全	正规部队：歼灭四个整编师部、九个旅、一个旅部、二个团（整编三二师师部、整编五五师师部、整编六六师师部、整编七〇师师部、一三	俘虏 39,140 毙伤 16,900 合计 56,040

战役名称	类型	时间	地点	部队	经过	歼敌	项目	数量
					部歼灭。敌为阻挡我军南进，确保其龙海路的安全，乃以四个整编师组成东路集团，以一个整编师及一个旅组成西路集团，向我反扑。我军于十日一举歼灭了定陶之敌一个旅；同时主力突然将敌东路集团之整编三二师、整编七〇师包围于巨野以南六营集、独山集地区，至十四日将其全歼。同时敌东路集团之整编六六师亦被我包围于金乡北之羊山集地区；金乡守敌于二十日向羊山集之敌北援，途中被我歼其一个旅；敌遭此惨重歼灭打击后，急从山东战场抽调四个整编师，分由鲁南、鲁中西援，但在援敌未到前，我军复于二十八日将羊山集之敌全歼。	旅、二九旅、七四旅、一三九旅、一四一旅、一四九旅、一五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一四〇旅旅部及二个团）。		
南麻、临胸战役	野战	1947. 7.17—7.30	山东南麻、临胸地区	华东野战军	华东我军于七月十七日进击位于东里店至南麻线（鲁中山区）之敌，歼其一部，继即挥兵东向，打击占领临胸之敌，歼敌一部，后因天雨山洪暴发，战役遂告结束。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三个整编师各一部（一〇三旅二个团及整编二五师、整编十一师、整编六四师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6,000 10,000 16,000
第一次攻榆林	攻坚	1947. 8.6—8.11	陕北之榆林	西北野战军	为相机夺取榆林，歼灭守敌，达到调动胡匪主力北上，以配合陈谢大军南渡黄河出击陇海西段之作战，我军于八月六日开始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至十一日在连续作战中共歼敌五千余人。胡宗南匪部主力即北上驰援，我于达成调动敌人兵力后，即自行撤围。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八六师一个团、新编一一旅一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3,200 2,000 5,200
盐城东台战役	攻坚及野战	1947. 8.6—8.12	江苏盐城、东台地区	苏中军区部队	苏中敌后我军为歼灭孤立据点敌人，于八月六日向苏北交通干线通（南通）榆（赣榆）公路盐城、东台段发动攻势，先后攻克沿阜宁经盐城至刘庄公路上及其两侧之重要城镇十九处，全歼敌四二集团军之一师及一个保安团，控制该段公路二百余里，收复土地八百平方里。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一个团（四二集团军一师及江苏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8,220 500 8,720

进军大别山	野战	1947. 8.7—9.30	湖北、河南、安徽边境之大别山地区	中原野战军	为实行战略进攻，把解放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我刘邓大军继鲁西大捷之后，稍加休整，继于八月七日挥师南征，十一日横跨陇海铁路，涉越黄汎区域，强渡涡河、沙河、颍河、洪河、汝河、淮河，行程千余华里，粉碎敌人沿途阻击，于八月二十七日胜利到达大别山区。继以席卷之势，迄九月底先后解放了鄂豫皖边区大部县城及其广大地区，直抵长江北岸，胜利完成了向蒋匪心脏千里跃进的任务。并调动了蒋匪大批兵力南移，这对我军在山东、陕北最后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正规部队：歼灭整编四六师、整编五二师、整编五六师、整编五八师、整编八五师各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光山、麻城、立煌（现改称金寨）、六安、霍山、桐城、经扶、岳西等县保安团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4,400 4,100 8,500
沙家店战役	野战	1947. 8.18—8.20	陕北米脂东北沙家店地区	西北野战军	西北我军围攻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增援，以求在运动中歼敌。于八月十八日向进至沙家店地区之敌整编三六师展开歼灭战，至二十日止，将敌之主力整三六师全部歼灭。是役的胜利标志着陕北军事形势的改观，我由防御转为进攻，敌由进攻转为防御地位。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一个旅、二个团（整编三六师师部、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4,000 2,000 6,000
进军豫西	野战	1947. 8.23-10.13	陇海路潼关至洛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	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	刘邓大军胜利南征挺进大别山之时，我陈谢兵团为作有力配合，乃进军豫西。战役发起于八月二十三日，由晋南平陆、豫北孟县之间强渡黄河，首先猛扑陇海西段。截至九月二十七日止，先后攻占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灵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旅、一个旅部、三个团、五个营及一个旅一部（一三五旅、新编一旅、六四旅旅部及其一个团又三个营、整编二〇六师二个团二个营及一六五	俘虏 毙伤	20,000 11,000

					宝、陕县、阌乡等城，歼敌二万五千余人；复于十月一日至十三日发起洛阳外围作战，歼敌六千余人。	旅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十三个县保安团。	合计	31,000
岔口追击战	野战	1947. 9.1—9.16	陕西延川县西之岔口地区	西北野战军	西北我军在沙家店歼敌整编三六师及我陈谢大军南渡黄河进军豫西后，直接威胁了胡匪巢穴关中，胡匪急图将深陷绥德以北地区之敌七个半旅撤回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我军为阻敌军南撤，配合陈谢兵团作战，于九月一日在绥德以南之九里山截歼敌一部，该敌交互南撤，于十四日全部集中岔口（延川县以西）地区，先敌进至该地之我军主力，于十四、十六两日阻击战中，将敌整编第一、二九两军击溃，歼敌四千人，余敌狼狈南逃。	正规部队：击溃整编一军及整编二九军。	俘虏 毙伤 合计	700 3,300 4,000
大清河北战役	野战	1947. 9.2—9.24	河北霸县、雄县地区	华北区杨德志、罗瑞卿野战兵团	敌图确保平津保地区，以十六军、九四军各一部进扰我大清河北区。我为歼击该敌，首以一部于九月六日向涞水县城佯攻，吸引了进扰大清河北之敌大部西援，我集中主力乘机于九日向大清河北地区之敌九四师三个团及王凤岗等部进击，至十四日止歼敌五千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五师、九四师、一〇九师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2,760 2,510 5,270

沙土集战役	野战	1947. 9.7—9.9	山东西南菏泽以东地区	华东野战军	继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南渡豫西之后，陈粟大军复于九月七日突然出现于鲁西南地区，敌即仓皇集结其第五、五七、六八、八四等四个整编师，分三路向鄄城进犯，企图阻击我陈粟大军南下。其中一路为整编五七师遭我迎击，三日未获进展；当敌发现我军主力后，当即回窜集结于沙土集(菏泽东）及大王庄、徐庄一线。我军于七日将其包围，至八日晨将徐庄及沙土集外围之敌扫清，八日九时发起总攻，至九日晨五时结束战斗，敌整编五七师及其两个旅全部遭歼。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二个旅（整编五七师师部、一一七旅、预备四旅）。	俘虏 毙伤 合计	7,560 2,000 9,560
胶东战役	野战	1947. 9.10-12.30	山东莱阳、平度、掖县地区	华东区山东野战部队	九月初敌集中四个整编师分由昌邑、高密、胶县之线齐头进犯我胶东，所谓“重点进攻”。我为粉碎敌此一攻势，除以一部于内线与敌周旋外，主力转至外线，寻敌弱点作战，当即攻占岞山站及其附近二十余据点，歼敌一部，切断胶济路，断其后方补给线，敌乃仓皇回窜。自十月初起，我军于外线、内线同时向敌军夹击，先后于掖县、三户山（昌邑属）、夏格庄（即墨北）等地歼敌共达八个团，并于潍县以东之饮马地区歼敌一个旅，收复掖县、威海卫、昌邑、平度、诸城、招远等城市，并粉碎敌清剿莱阳、栖霞边及艾崮山区（蓬莱、栖霞、招远间），至此敌所谓“重点进攻”，亦遂告破产。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八个团（二一一旅、三六旅一个团、五七旅一个团、七六旅一个团、一五九旅三个团、一六六旅一个团、荣誉一师一个团及整编二五师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26,300 36,420 62,720

东北秋季攻势	野战	1947.9.15—11.3	长春、吉林及四平东西地区、北宁路锦西至义县地区	东北野战军	东北夏季攻势后，据守中长及北宁两路之敌，采取“重点防御”。我军为继续分割歼灭敌军，遂于中长、北宁沿线发动秋季攻势。 我军首攻锦西以西之杨仗子敌据点，歼增援之敌三个师大部，并同时切断山海关至锦州段北宁路。自十月一日起，我军主力即沿中长路全线向敌进击。东线部队于郜家店（西丰西）地区歼灭敌一一六师后，继即收复西丰、伊通、公主岭等；西线我军于收复梨树、八面城歼援敌新一军一个团后，九月三十日以一百六十里急行军奔袭法库，全歼守敌一个师，继即西进收复彰武、新立屯、黑山、阜新等城，歼敌一部；热河我军则收复朝阳，并于义县西歼敌一个师大部；南线我军则收复海城、大石桥，进逼营口，并击毁敌舰一艘；北线我军完全扫清吉林、长春外围据点，控制吉长路，收复九台、农安、德惠等城，并歼敌一部；至此中长、北宁沿线广大地区为我收复，敌军已被我完全孤立于长春、吉林、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点线及其附近地区。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师、三个师部、九个团（七九师、一一六师、二一师师部及二个团、一〇五师师部及二个团、暂编二二师师部及二个团、二五师一个团、五〇师一个团、一三〇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师、一个师部、一〇个团、三个营（暂编五七师、暂编一七七师、暂编五一师师部及一个团、暂编五〇师一个团、暂编五三师一个团、暂编一七四师二个团、五个保安团、三个营）。	俘虏 毙伤 合计	49,900 19,900 69,800

黄龙战役	攻坚	1947. 9.25-10.21	陕西省韩城、宜川、白水地区	西北野战军	为扫清黄龙山内及其周围之敌据点，使关中与华北连成一片，奠下我军主力南进的有利阵地。我军于九月二十五日攻占白水县城，十月四日续占石堡（黄龙设治局），反动武装全部肃清。十一日攻克韩城，继而北进，二十一日克宜川，全歼两城守敌。（按：十月二十五日因董钊率敌三个整编师增援，我即主动撤离，宜川城复为敌占）。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一个营（五三旅一个团、六一旅一个团、一个营）。 非正规部队：四个保安警备队。	俘虏 6,300 毙伤 1,000 合计 7,300
进军豫皖苏	野战及攻坚	1947. 9.26-10.26	豫皖苏边区之夏邑、鹿邑、阜阳、蒙城、永城地区	华东野战军	进至鲁西南地区之我陈粟大军，于九月二十四日起，复分五路于徐州、开封间，横越陇海路，挥戈南下，进军豫皖苏地区，在一个月的进军作战中，我军除歼敌一一九旅一个团外，并歼伪河南省之四个保安团、十五个县保安队，共攻克城二十四座，解放人口千余万，恢复鲁西南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豫皖苏解放区。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及一个旅一部（一一九旅一个团及骑兵一旅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四个保安团及十五个县保安队。	俘虏 9,550 毙伤 1,200 合计 10,750
延清战役	攻坚	1947. 10.1-10.11	陕西延长、延川、清涧地区	西北野战军	西北我军为乘敌主力南窜，以消灭延长、清涧地区之孤立敌军，于十月一日先占领延川、延长两城，将守敌两营歼灭后，于五日续向清涧挺进，六日开始外围作战，迄十日上午将其外围据点全部肃清，二十一时发起攻城战斗，经过激烈的巷战，至十一日晨守敌全部被歼。由于清涧的胜利，胡匪被迫将延安以北的孤立据点放弃南逃。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一个旅部、六个营（整编七六师师部、二四旅旅部、六个营）。	俘虏 6,620 毙伤 1,460 合计 8,080

张家店战役	野战	1947.10.9-10.11	安徽霍山东北之张家店地区	中原野战军	我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完成战略展开，立稳脚根之后，便集中兵力，寻机歼敌。东路我军于十月九日将敌八八师之六二旅包围于霍山东北之张家店地区，当晚发起攻击，十日晨即将该敌全部歼灭。十一日乘胜再克舒城，歼敌一部；西路我军亦相继横扫鄂东地区之敌。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六二旅）	俘虏 毙伤 合计	4,700 900 5,600
清风店战役	野战	1947.10.11—10.22	河北保定以南之清风店地区	华北区杨得志、罗瑞卿野战兵团	华北我军乘敌由关内调三个师赴关外作战之时机，于十月十一日开始破击徐水、固城段铁路，至十二日该段已全为我控制，并一度攻入徐水。敌十六军、九四军各一部分路南援，并以敌三军一部由石家庄北援，企图夹击我于保定地区。我即以一部坚决阻击北来援敌于徐水以东以西地区；主力迅速南下，迎击由石家庄远道北来增援之敌三军七师及二二师一个团，该敌十九日进至清风店及其以东地区，二十日拂晓我军向敌发起攻击，至二十二日十一时半，该敌为我全歼。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军部、一个师、一个团及一个军一部（三军军部、七师、二二师一个团及四军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11,100 6,150 17,250

高山铺战役	野战	1947. 10.26—10.27	湖北广济西北之高山铺	中原野战军	在我刘邓大军进击长江北岸，占领团风后，敌整编四〇师匆忙南下驰援，经浠水转向广济进犯，我为全歼该敌，遂于广济以西之高山铺地区预设伏击阵地，十月二十六日黄昏犯敌陷入我军重围，是夜敌曾数度反击，企图突围未逞，翌晨九时我军全线发动总攻，经八小时的激烈战斗，将敌全部歼灭。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二个旅、一个团（整编四〇师师部、八二旅、一〇六旅、三九旅一个团）。	俘虏 9,560 毙伤 3,100 合计 12,660
第二次攻榆林	攻坚	1947. 10.26—11.10	陕北之榆林	西北野战军	西北我军为歼灭榆林守敌，于十月二十七日发起外围攻击，截至十一月一日止，将其外围据点全部肃清。在进行攻城作战时，因敌驰援，我即于十日晚主动撤围。	正规部队：歼灭八六师一部。	俘虏 480 毙伤 2,000 合计 2,480
伏牛山东麓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7. 11.1-11.26	河南郏县、宝丰、禹县、临汝等地区	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	我陈谢兵团继豫西战役之后，复于十一月一日开始对伏牛山东麓发动攻势，相继收复豫西广大地区，连克临汝、郏县、登封、宝丰、鲁山、南召、方城、镇平等城；西线我军沿伏牛山和秦岭脊峰南下，横渡丹江，解放山阳、镇安；东线我军越过洛河、白河、唐河到达桐柏山麓，攻克泌阳、桐柏两城。是役截至二十六日止，胜利结束，歼敌一万二千余人。至此，豫鄂陕解放区已扩展到南临汉水，北至陇海，西越丹江，东至平汉广大地区。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一个旅残部（整编一五师师部及六四旅残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五个县保安团。	俘虏 10,000 毙伤 2,000 合计 12,000

解放石家庄	攻坚	1947.11.6—11.12	河北石家庄	华北区杨德志、罗瑞卿野战兵团	我军于清风店歼敌三军后，石家庄守敌益形孤立，我军为拔除这一交通要点，遂以一部于定县、新乐之间地区构筑四道防线，准备阻击保定可能南援之敌；主力于十一月六日开始向石家庄之敌攻击，七日攻克飞机场，八日全部扫清了外市沟以外之敌据点，十日先后突破内外两道市沟进入市区，战至十二日十一时半胜利结束，全歼守敌，石家庄即告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一个团（三二师、暂编三二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保安团。	俘虏 21,130 毙伤 3,150 合计 24,280
破击陇海路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7.11.9—11.18	陇海路徐州至兰封段	华东野战军	我进军豫皖苏后，为分割敌人破击敌之交通大动脉，继于十一月九日至十八日，对陇海路徐州以西之郝寨至兰封以东之圈头段，津浦路徐州至固镇段，彻底破击，并控制铁路四百余里，收复县城九座，歼敌万余人。豫皖苏敌军经此打击后，更陷于孤立被动。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一个团（七旅、六旅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一个保安团、一个宪兵团）。	俘虏 7,700 毙伤 3,300 合计 11,000
李堡、栟茶战役	攻坚	1947.11.30—12.10	苏中如皋东北地区	苏中军区部队	我军扫清苏北解放区内部敌据点后，即于十一、十二月间回师南下，再克李堡、栟茶要点（海安东），解放该线一百五十里内据点七十余处，粉碎了苏中敌军之防御体系。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及二个整编师各一部（一四六旅一个团及整编四一师、整编五一师各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十个保安中队。	俘虏 8,100 毙伤 900 合计 9,000
大别山反"清剿"	野战	1947.12.1—12.31	湖北、河南安徽边境之大别山地区	中原野战军	我刘邓大军挺进到大别山区后，严重的威胁着蒋匪心脏地区。蒋匪为作垂死挣扎，急将他在陇海、胶东的六个整编师赶调大别山，并纠合其原在大别山的十一个整编师，共达三十三个旅，于十二月一日开始对我大别山区进行"重点清剿"。我为粉碎这一"清剿"作战，即以两支部队分向江汉、桐柏两区展开攻势，威胁川湘；主力	正规部队：歼灭六个整编师各一部（整编一〇师、整编一一师、整编二〇师、整编二五师、整编四六师、整编七四师各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六个县保安队及皖保安四纵队一部。	俘虏 9,750 毙伤 1,970 合计 11,720

					坚持大别山区与敌周旋，使敌疲于奔命，到处扑空，顾此失彼。同时对陈粟、陈谢两路大军破击平汉、陇海的胜利，作了有力的配合，经过一个月的内线反击与外线配合作战，胜利的粉碎了蒋匪对我大别山的“重点清剿”			
平汉、陇海破击战	野　战	1947.12.1—12.31	平汉铁路新郑、确山段，陇海铁路民权、砀山段	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	我陈粟、陈谢两支大军，为配合大别山区我刘邓大军反敌“重点清剿”作战，先后于十二月一日开始对平汉南段与陇海东段发动强大破击战，截至三十一日止，即将平汉南段郑州、信阳间及陇海东段开封、郑州间铁路八百四十华里全部破坏，连克县城、重镇、车站等五十余座，歼灭蒋匪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等部四万五千余人。进行了胜利的配合，并打乱了蒋匪中原战场之作战计划和作战体系。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兵团部、一个整编师部、二个、一个旅部、六个团、二个营（五兵团部、整编三师师部、五旅、二〇旅、三旅旅部及二个团、骑兵一旅一个团及二个营、三九旅一个团、一一九旅一个团、独立二六旅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六个县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33,050 12,050 45,100
东北冬季攻势	野　战及攻坚	1947.12.15-1948.3.15	四平至大石桥的中长路东西两侧、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	东北野战军	东北夏、秋攻势后，敌四十九个师困守于沈阳、锦州、四平、吉林、长春等二十四座城市。我军为不使敌军取得喘息机会，予敌更大的歼灭打击，遂冒零下三〇度酷冷天气，进军沈阳外围地区作战。 首先我军突然奔袭包围沈阳外围要点法库、彰武等城，并于法库以东以南地区歼敌二个团。敌乃急自长春、四平、锦州等地调集七个师兵力增援巩固沈阳，我军乃以一部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并攻歼沈阳以西万金台之敌一个团。敌遭此打击后，遂集结二十余师兵力，分三路由沈阳、新民等地，向法库前进，图合击新民、法库间之我军，我除在公主屯歼敌左翼新五军二个师，其余两路敌军亦被我阻击	正规部队：共一个军部、九个师、五个团。计：歼灭：一个军部、八个师、五个团、四个营（新编五军军部、二五师、二六师、四三师、七九师、八八师、一九五师、暂编五四师、暂编六二师、五个团、四个营）。 起义：一个师（暂编五八师）。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旅、六个团、一个营（交警三总队〔十二、十三日两次被歼〕一相当于旅、一个骑兵团、三个保安团、二个路警总队、一个营。）	俘虏 毙伤 起义 合计	105,000 43,150 8,320 156,470

					于公主屯以东及辽河东岸地区。新五军被歼后，该敌即向沈阳回缩。我军则继续扩张战果，将沈阳外围之新立屯、辽阳、鞍山、法库等敌强固据点逐一包围攻克，歼灭敌军共达四个整师；营口之敌暂五八师，在我军胜利影响和政治争取下，宣告起义；吉林守敌惧我围歼，亦弃城向长春逃窜。我军此一攻势，持续达三个月，于大量歼灭敌军后，最后始回师攻克四平，歼敌一万九千余人，战役遂告胜利结束。至此，东北敌军则分别被压缩包围于沈阳、长春、锦州地区。			
盐南战役	野战	1947.12.26—12.29	江苏盐城以南地区	苏中军区部队	苏中我军展开反攻后，敌整四师九〇旅及整五一师一部共五个团急向苏中救援，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沿通(南通)榆（赣榆）公路北犯，大部遭我围歼于盐城以南之伍佑地区。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旅部、二个团及一个团大部（九〇旅旅部、一一三旅旅部及二个团、另一个团大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3,000 4,000 7,000
解放运城	攻坚	1947.12.27—12.28	山西南部之运城	西北野战军及太岳纵队	我军为歼运城守敌，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间进行了充分准备，在完成坑道作业之后，于二十七日黄昏总攻，在炮火、爆破的协同下，突破北门，迅速向纵深发展，守敌一部被歼，大部突围，该敌于二十八日窜至平陆附近，复被我打援部队全部截歼。至此战役胜利结束，晋南全获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整编十七师一个团、整编三六师一个团、整编九〇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保安团，及十六个流亡县政府武装。	俘虏 毙伤 合计	9,800 3,300 13,100
邓县战役	攻坚	1948.1.9—1.16	河南省邓县城	桐柏军区部队	我军刚入桐柏地区部队，于一月九日开始围攻宛西敌重要据点邓县城，十日攻入外城之后，经四天的坑道作业，于十五日黄昏对内城发起总攻，十六日晨全部解放该城，将守敌反动地方武装十一个保安团全部歼灭。	非正规军：歼灭十一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5,620 1,000 6,620

宜川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8.2.24—3.10	陕西宜川及其西南瓦子街地区	西北野战军	西北我军为围城打援，于二月二十四日将宜川城包围，二十六日敌以刘戡率部由洛川东援，当时我除以小部继续围攻宜川城外，集中主力于瓦子街以东高地设伏打援，二十九日援敌进入我军设伏地带，被我包围，三月一日发起猛攻，经五小时的恶战，援敌二万三千余人全部聚歼。宜川城守敌亦于三日全部肃清。五日我军乘胜南下，截至十日连克石堡、白水、宜君、中部等城；并包围洛川。以造成我军南进的有利条件。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军部、二个整编师部、四个旅、一个旅部、一个团（整编二九军军部、整编二七师师部、整编九〇师师部、二四旅、四七旅、五三旅、六一旅、三一旅旅部及一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21,960 7,520 29,480
解放临汾	攻坚	1948.3.7—5.17	山西临汾	华北区徐向前野战兵团	我军于三月八日发起攻击晋南孤立据点临汾，首先集中兵力攻击临汾东关之敌六六师等部，至四月十一日攻占东关。敌六六师大部被歼；我军继于五月十日向临汾城垣展开攻击，并配合以大规模的坑道爆破，至五月十七日十九时突入城内，至当日二十四时将守敌全歼，临汾即告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一个旅部、二个团（六六师、三〇旅旅部及其二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八个团（二个补训团、六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22,860 2,140 25,000
洛阳战役	攻坚	1948.3.8—3.14	河南洛阳及外围地区	华东野战军陈士渠、唐亮兵团及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	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各一部于三月八日发起攻取洛阳作战，当日扫清外围，九日黄昏攻占城关，十一日晚总攻城垣，十三日突入城内，激战至十四日，守敌全部就歼，无一漏网，该城遂告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二个旅（整编二〇六师师部、一旅、二旅） 非正规部队：歼灭洛阳保安团队全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15,000 4,900 19,900
胶济西段战役	攻坚	1948.3.11—3.22	山东周村、张店、淄川、博山地区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军区部队	山东我军为粉碎敌“点线防御”体系，大量歼灭敌军，遂向胶济西段展开大规模进攻。我军一部，首于三月十一日包围张店，守敌突围西窜，被我截歼于张店以西地区；另部我军包围周村之敌，于十二日四时发起攻击，经二十二小时战斗，全歼守敌一万五千余人，并相继解放淄川及小清河以南地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二个旅（整编三二师师部、一四一旅、新编三六旅）。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五个团（一个警备旅、一个交警总队、四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32,540 6,920 39,460

					区。至此渤海、胶东、鲁中广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蒋匪退集于津浦沿线及青岛、烟台地区。		
益林战役	野　战	1948. 3.17—3.19	苏北淮安以东之益林地区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苏北我军一部，于三月十九日晨攻克阜宁西南之益林镇，歼守敌二个团；另部我军于策应攻益林作战中克安徽泗县之青阳、上塘集等敌据点，全歼守敌。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一一三旅）。	俘虏 3,000 毙伤 1,000 合计 4,000
察南、绥东战役	野　战	1948. 3.21—4.8	察哈尔南部绥远东部	华北区杨德志、罗瑞卿野战兵团及晋绥军区部队	战役于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我军左翼一部于大同、张家口间发起战斗，至二十四日攻占天镇、阳高及周士庄等据点，控制铁路百余里；另部收复怀仁、左云、右玉等地，同时右翼主力部队，于察南攻克广灵、阳原、蔚县等城，歼敌一部。为便于我主力右翼部队歼敌，遂以左翼部队于四月一日向丰镇以西运动，至三日先后攻克天成、新堂等地，调动敌三五军、骑四师等部西援；此时我右翼部队即隐蔽北上，于八、九两日攻克了天镇车站、滹沱店、怀安等据点，歼二一〇师及骑十一旅各一部，于五月二十四日结束了战役行动。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及一个旅大部（暂编一一师一个团、二一〇师二个团及骑兵一旅大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师、一个团（补训一七师、补训三一师、一个总队）。	俘虏 15,480 毙伤 2,980 合计 18,460
潍县战役	攻　坚	1948. 4.2—5.8	山东潍县昌乐、坊子、安邱地区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军区部队	我为拔除潍县敌孤立据点歼灭守敌，遂于四月二日发起潍县战役，至十八日扫清潍县外围，二十三日发起总攻，先集中兵力火力突破西城，至二十七日全部解决战斗，攻克该城，全歼守敌。潍县攻克后，安邱、昌乐等据点之敌，当即弃城逃窜，均被我截歼。潍坊地区全告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一个旅一个团及四个师各一部（整编九六军军部兼整编四五师师部、二一一旅、二一四旅一个团及整编六四师、七三师、七五师、八四师各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四个旅、一个团（保安三师、六旅、八旅、自卫总队一相当于旅、一个保安团）	俘虏 26,500 毙伤 19,170 合计 45,670

西府陇东战役	野战	1948.4.12—5.12	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地区	西北野战军	为挺进敌后，威胁西安、攻取宝鸡、调退延安、洛川守敌，以巩固我后方和黄龙新区，西北我军主力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向胡宗南之远后方西府、陇东进军，十八日强渡泾河，占领永寿，斩断西兰公路，二十一日继克武功、麟游、切断西宝铁路，二十六日攻占宝鸡重镇，缴获甚伙。此时胡、马匪军集中主力驰援宝鸡，妄图合击我军，我即于二十八日主动撤离宝鸡，继续北进，至五月十二日，胡马匪部联合反击，为我粉碎。在我主力进入西府，威胁西安、宝鸡之际，迫使孤悬延安、洛川之敌弃城南逃，该两城亦为我胜利光复。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三个团、二个营及一个旅一部（整编七六师师部、一旅一个团、六一旅一个团、一四四旅一个团、二个营及一七旅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9,940 12,000 21,940
宋河战役	攻坚	1948.4.15—4.16	湖北京山东北之宋河、三阳店	中原江汉军区部队	乘敌八五军调平汉南端，企图北援豫中之时，我江汉军区部队突于四月十五、十六两日先后将驻守京山东北宋河、三阳店之敌新十七旅全部包围歼灭，追敌八五军折回西援。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新编十七旅）。	俘虏 毙伤 合计	2,750 400 3,150
宛西战役	攻坚	1948.5.2—5.17	河南西南之内乡、镇平淅川、邓县地区	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各一部及桐柏军区部队	我中原、华东野战军各一部，为消灭宛西之敌，展开伏牛山麓的工作，于五月二日发动宛西攻势，截至十七日止，先后攻克内乡、镇平、淅川、邓县、光化、老河口、西峡口、荆紫关等重要城镇十余处，彻底摧毁了豫西匪巢；与此同时北线我军亦相继收复许昌、荥阳、密县、登封等城，共歼敌正规军及地方反动武装二万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五个团（七六旅一个团、一〇四旅一个团、一二七旅一个团、一六三旅一个团、暂编二六旅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五个团及十三个团大部（独立二一旅、五个县保安团及十三个县保安团大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12,000 9,700 21,700

出击冀热察战役	野战	1948. 5.12—6.25	冀热察边及平古线、北宁线唐山、山海关段	华北区杨德志、罗瑞卿野战兵团及冀察热辽部队	为钳制北宁路之敌，配合东北之作战，我军在热河地区发起攻势，于五月十二日歼由平泉至承德之敌两个团各一部，复于二十五日攻克隆化，歼敌两营；继即平泉、丰宁、滦平等城之守敌先后逃往承德。至此热河除承德孤城外，全获解放。此后我复挥戈南下，于六月十四日攻克丰润、榛子镇，歼敌七千余，并威逼唐山，敌即以八个师由平古线东援，此时，我军另部复于十八日乘隙攻克石匣、小营等据点，歼敌千余人，吸引东援之敌大部回窜，保证了冀东我军于二十五日顺利的攻克昌黎，歼敌六千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六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师、三个团（交警五总队、交警八总队——均相当于师、三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17,350 7,040 24,390
宛东战役	野战	1948. 5.29—6.3	河南南阳以东地区	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各一部	我中原、华东野战军各一部继宛西胜利后，为围城打援，复以一部于五月二十七日包围确山，二十八日敌第五“绥靖”区所部即由南阳东进增援。我军主力秘密尾敌两翼东进，二十九日即向进至赊旗（南阳东）以南埠口地区之敌，展开突然出击，该敌负创甚重，惧怕被歼，遂于三十一日拂晓回头西逃，我军跟踪猛追，于五月三日将敌五八师师部及其一个旅大部围歼于埠口以西马刘营地区，余敌逃回南阳。另在白河以南担任阻援之我军亦相继歼敌一部。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一个旅部、二个团及三个整编师各一部（整编五八师师部、一八三旅旅部、二个团及整编九师、整编十师、整编十一师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5,300 6,000 11,300
兖州战役	攻坚	1948. 5.29—7.18	山东兖州及济南至临城等地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及军区部队	我军于五月二十九日首以一部围攻泰安，另部进击泰安南北地区之敌，守敌闻风逃窜，我军先后收复泰安、新泰、大汶口等地，并于大汶口以西歼敌两个团，切断了济南兖州敌之联系，然后以一部向济南	正规部队：歼灭一部“绥靖”区司令部、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二个旅，五个团（第十“绥靖”区司令部、整	俘虏	44,720

					以东以南逼近，而以主力向兖州逼近，连克邹县、曲阜、济宁等据点后，继即围攻兖州，于七月十三日攻克兖州全歼守敌。	编十二军军部兼整编十二师师部、一一一旅、一六一旅、一一二旅一个团、一五五旅一个团、独立旅二个团、整编八四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部、二个团及十一个保安队（保安三旅旅部、二个保安团及十一个保安队）。	毙伤 合计	18,900 63,620
开封战役	攻坚	1948. 6.17—6.22	河南省会开封	华东野战军	我军于六月十七日十七时发起攻击开封之敌，至十八日十三时占领南关，是日夜续向城垣攻击，当晚即突破小南门，十九日晨我军大部攻入城内，分头将“绥靖公署”及省府、吹古台、鼓楼、地方法院、中国中学等守敌包围，战至二十日九时将以上各据点守敌全歼，最后于二十一日晚攻克古龙亭核心阵地，全歼守敌。开封遂全获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一个旅、二个团（整编六六师师部、一三旅、一一九旅一个团、一个辎汽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旅、三个团（保安一旅、二旅、三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23,560 16,120 39,680
晋中战役	野战	1948. 6.17—7.21	山西灵石至太原平川地区	华北十八兵团及军区部队	解放临汾后，我为歼灭阎匪主力直捣敌巢，遂于六月十七日发起晋中战役。首以一部于汾（阳）孝（义）地区佯动，吸引了敌五个主力师的增援进攻，我主力乘虚突然出现于平（遥）介（休）间地区，敌发觉我主力将切断其退路后，即星夜夺路回窜，二十三日途经平、介以西地区，为我军主力伏击，大部歼灭。六月二十八日太原敌以两个军南援，企图与我军在祁（县）平（遥）间决战；我军即迅速插入敌之侧背，于七月七日攻克祁县，并控制了榆次、太谷间广大地区，切断了该敌后路，敌拚命向北突围，被我全歼于大常镇地区。我军继扩	正规部队：歼灭四个军部、八个师、一个师部、五个团（一九军军部、三三军军部、三四军军部、四三军军部、暂编三七师、暂编三九师、暂编四四师、暂编四六师、七〇师、七一师、七二师、七三师、暂编四〇师师部及二个团、暂编四五师一个团、二个炮兵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师、四个团（九总队、十总队—均相当于师、四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55,070 19,600 74,670

					张战果，连克十三座县城，残敌狼狈向太原逃窜，并截歼其一部，直追至太原城下，至此晋中除太原孤城外全获解放。			
涟水战役	攻坚	1948. 6.20—7.15	江苏北部涟水、泗阳、东海地区	第三野战军苏北兵团及军区部队	我苏北兵团，乘苏北敌空虚之际，配合地方部队于六月二十日向东海、灌云、沭阳间地区展开扫荡战，至二十六日将该地区全部据点肃清。乘胜于七月一日向南挺进，至十一日先后收复涟水、泗阳两城及淮（阴）泗（阳）公路运河线上之敌据点十余处，歼敌一部。盘据宿迁之敌孙良诚部惧歼于七月十五日弃城逃窜，该城为我收复。至此战役结束。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及二个师各一部（一二旅一个团及一三旅、三八师各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7,300 2,940 10,240
睢杞战役	野战	1948. 6.27—7.6	河南睢县、杞县地区	第三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	我军攻占开封后，即向东迎击增援开封之敌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首以一部阻隔邱兵团于杞县附近，主力于六月二十七日包围区兵团于杞、睢以北之龙王店地区，至七月二日全歼其兵团部及整七五师后，即留一部继续包围监视区寿年之整七二师，主力复向东迎击由津浦路西援之敌黄伯韬兵团，于帝邱店地区歼其四个团，敌之援军续有猬集，我乃撤回，战役即告结束。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兵团部、一个整编师部、三个旅、四个团及五个整编师各一部（七兵团部、整编七五师师部、六旅、一六旅、新编二一旅、整编二五师三个团、快速三纵队一个团及整编三师、整编十师、整编一一师、整编二八师、整编八五师各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30,050 24,240 54,290

襄樊战役	攻坚	1948. 7.2—7.16	湖北襄阳、樊城地区	第二野战军一部及中原桐柏军区部队	当睢杞战役正在围歼区寿年兵团时，白匪主力企图北援，我为牵制该敌，配合睢杞作战，即以有力部队，于七月二日发起襄樊战役。连续攻占汉水两岸之老河口、谷城、光化等城；四日续沿汉水南下，七日黄昏包围襄、樊，九日攻克樊城，十日扫清襄阳外围除虎头山以外的全部敌军阵地，复于十五日黄昏时对襄阳本城发起总攻，至十六日晨结束战斗。此役生擒蒋匪特务头子康泽及歼敌二万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整旅、一个旅部、三个团（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一〇四旅、一六四旅旅部及一个团、一六三旅二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17,000 3,500 20,500
辽沈战役	攻坚与野战	1948. 9.12—11.2	辽西及沈阳、长春和营口地区	第四野战军及东北军区部队	自一九四七年东北夏、秋、冬三次攻势之后，东北境内敌军共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被分割围困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为全歼该敌于东北境内，遂于九月十二日发起辽沈战役。主力分由长春附近及四平地区向锦州兼程疾进，首先包围义县，继而切断两锦（锦州、锦西）联系，完成对锦州包围。经十月九日至十三日的五天战斗，全部肃清外围据点。并将由锦西北援敌军九个师阻击于锦州以南之塔山地区。另路我军亦将由沈南援之廖耀湘兵团阻击于新立屯以北地区。十四日十一时我即对锦州城发起总攻，次日十八时结束战斗，歼敌十万，解放该城。锦州的解放，完全切断了沈阳敌军陆上南逃之路。此时深陷重围逃跑绝望的长春守敌，在我争取下，曾泽生首先	正规部队：共一个"剿总"司令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三个师、十六个团、一个营。计：歼灭：一个"剿总"司令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三个兵团部、九个军部、二六个师、十六个团一个营（东北"剿总"司令部、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六兵团部、八兵团部、九兵团部、新编一军军部、新编三军军部、新编六军军部、新编八军军部、四九军军部、五三军军部、七一军军部、九三军军部、整编二〇七师师部、二师、一四师、五〇师、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合计	306,200 56,800 26,000 83,000 472,000

率领六〇军于十七日起义；十九日敌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投诚，我遂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蒋匪介石为挽救其东北惨局，不惜孤注一掷，以沈阳之廖耀湘兵团配合锦西敌军倾巢南北对进，企图重占锦州，打开其关内关外之通路；二十六日我军复将进至大虎山地区之廖兵团分割包围经两日激战，迄二十八日止全部歼灭。此后我军续向沈、营之线急进，三十日扫清沈阳外围，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营口两城。该线残敌除少部由营口乘舰逃窜外，余均被歼或投降。锦西、葫芦岛之敌继于三日开始逃往华北。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五四师、七九师、八七师、八八师、九一师、一〇五师、一一六师、一三〇师、一六九师、一八四师、一九五师、新编二二师、新编三〇师、暂编一八师、暂编二〇师、暂编二二师、暂编三〇师、暂编五四师、暂编五五师、暂编五九师、青年军之一旅、二旅、三旅、东北“剿总”三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二个通讯兵团、一个装甲兵团、二个特务团、二五师一个团、暂编五〇师一个团、暂编六〇师一个团、暂编六二师一个团、五二军输送团、五四军直属团一个营）。

起义：一个军部、三个师（六〇军军部、一八二师、暂编二一师、暂编五二师）。投诚：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四个师（一兵团军部、新编七军军部、新编三八师、暂编五三师、暂编五六师、暂编六一师）。

非正规部队：共二个警备司令部、三个省保安司令部、一个骑兵司令部、十三个师、五个团、二个营。计：歼灭：一个警备司令部、

						三个省保安司令部、一个骑兵司令部、十个师、五个团、二个营（沈阳警备司令部、辽宁省保安司令部、辽北省保安司令部、安东省保安司令部、东北“剿总”所辖之骑兵司令部及骑兵一旅、二旅、三旅、辽宁保安旅、东北守备一总队、二总队、沈阳守备一总队、二总队、冀热辽骑兵一支队、热东独立挺进支队——均相当于师、辽西志愿兵三个团、一个骑兵团、一个宪兵团、二个营）。 投诚：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师（长春警备司令部、骑兵保安一旅、二旅、吉林保安旅）。	
保北战役	野战	1948 7.15—7.20	河北保定以北徐水、定兴地区	华北二〇兵团	我某兵团为策应冀东方面作战，于七月十六日在保定以北铁路沿线展开攻势，第一天攻克新城、涞水两城，次晨将涿县至徐水间敌据点分别包围，并即大举破击该段铁路，十七日下午开始向被围之敌攻击，至二十一日止，先后攻克定兴、固城、高碑店、北河店、徐水等据点。守敌全部就歼。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暂编三一师）。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县警备队及守护八团大部。	俘虏 8,480 毙伤 2,290 合计 10,770

澄郃战役	野战	1948 8.8—8.13	陕西澄城、郃阳地区	第一野战军	胡匪于七月间以四个师、十个旅的兵力分三路向我黄龙地区进犯，均于月底进至同官、冯原、澄城、郃阳、韩城一线，我为粉碎该敌进犯，巩固黄龙地区，乃以主力部队对进至冯原的中路敌军整编三六师（三个旅）实行包围，八月八日晨开始攻击，至十日结束战斗，歼敌九千余人。余敌闻风南逃，我即乘胜追击，于十二、十三两日相继收复澄郃两城。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整编师部、一个旅部、三个团及一个旅一部（暂编三六师师部，一六五旅旅部及二个团、二八旅一个团及一二三旅一部）。	俘虏 毙伤 合计	6,080 3,000 9,080
察绥战役	野战	1948 9.14-10.31	察东至绥远、包头地区	华北一九兵团二〇兵团	为解放绥远广大地区，我军首以一部于平北积极活动，吸引敌人，九月十四日敌两个军深入察北山地二百余里。我某兵团即于九月二十四日开始进击绥东，至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丰镇、集宁、凉城等地，直逼“归绥”。平绥东段之敌两个军四个骑兵旅（师）慌忙西援；三十日到达集宁地区。我军另部当即又于二十八日开始在平、张段发动攻势，先后攻克赵川堡、崇礼等地，威逼张家口。十月五日西援之敌复全部东返，以解张家口之危，至十二日到达柴沟堡以东至怀来线；我军又于怀来东西铁路线上展开破击战，拖住敌人。在绥西之我主力于十日开始西进，至三十一日止，先后收复陶林、武川、包头、固阳及包头以西二百九十里之长雅镇等。至此，绥远除绥西之五原、临河等地区及“归绥”孤城外，全部为我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四个营（暂编第五军二个团、十六军四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二个守护团、一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12,280 8,780 21,060

济南战役	攻坚	1948. 9.16—9.24	山东 济南地区	第三野战军及山东军区部队	九月十六日二十四时，我军向济南之敌十四个旅十一万余人发起攻击，至十九日即控制了外围地区，争取了吴化文部起义，二十二日十二时占领商埠后，遂即组织攻城，至二十三日中午，我即将外城全部占领。至二十四日下午六时续歼内城守敌。城外马鞍山、四里山之敌投诚，并歼灭了城外千佛山之残敌。至二十六日止济南市全部为我解放。	正规部队：共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整编军部、二个整编师部、十个旅、一个团。计：歼灭：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二个整编师部、七个旅、一个团（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整编二师师部、整编七三师师部、十五旅、十九旅、五七旅、七七旅、二一一旅、二一三旅、第二“绥靖”区特务旅、整编七四师一个团）。起义：一个整编军军部、三个旅（整编九六军军部兼整编八四师师部及所属之特务旅、一五五旅：一六一旅）。 非正规部队：歼灭四个师、四个团（保安六旅、保安八旅、青年教导总队、济南人民先锋总队——均相当于师、三个保安团、一个特务团）。	俘虏 毙伤 起义 合计	61,870 23,420 20,000 104,290

荔北战役	野战	1948. 10.5-10.18	陕西大荔以北地区	第一野战军	为配合中原、太原两地作战，西北我军主力，于十月六日拂晓开始对澄城以南地区之胡宗南匪军发动攻击，截至十八日止，歼敌精锐主力之整编六五师等部二万五千余人。在此战役期间，敌为挽救颓势，曾先后集中十个旅的兵力向我连续反扑，均被我军击退。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部、六个团及三个旅各一部（四八旅旅部及二个团、一一七旅二个团、一八七旅一个团、二旅一个团、七旅一个团及六一旅、一三五旅及骑兵二旅各一部）。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11,050 13,200 1,110 25,360
太原战役	攻坚	第一阶段 1948. 10.5—12.4 第二阶段 1949. 4.20—4.24	山西太原地区	华北十八兵团、十九兵团、二〇兵团及西北、华北军区部队	晋中战役后，太原被我包围，十月五日我军乘敌六个师南犯抢粮之际，于小店镇歼敌两个师后，我为围困该敌，十月十八日我军又展开了夺取太原东山的战斗，至十一月十二日止，城东四要点及其以西阵地，全部为我攻占，并紧缩了太原城周的包围圈。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止将城周据点全部肃清，继于二十四日五时半开始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四面同时总攻，至六时半突破城垣，战至十时守敌全歼，太原获得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绥靖公署”；二个兵团部、六个军部、十七个师、四个团（“太原绥靖公署”、十兵团部、十五兵团部、十九军军部、三〇军军部、三三军军部、三四军军部、四三军军部、六一军军部、二七师、六六师、六八师、六九师、七〇师、七一师、七二师、七三师、八三师、暂编三九师、暂编四〇师、暂编四四师、暂编四五师、暂编四六师、暂编四九师、炮兵师、工兵师、三〇师之一个团、二个炮兵团、一个暂编骑兵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师、四个团（坚贞师、铁血师、神勇师、四个总队）。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94,960 28,530 1,300 124,790

郑州战役	野战	1948.10.20—10.24	河南郑州及以北地区	第二野战军一部	济南战后，淮海战役未开始前，郑州之敌慑于被歼，图弃城东逃，我原拟十月二十三日攻郑歼灭该敌，后因守敌二十二日弃城北逃，故战役提前发起，当日进占该城，并追击北逃之敌，于二十三日在郑州、黄河铁桥之间全部截歼该敌。二十四日开封守敌亦弃城东逃，我即收复该城。从此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获解放，平汉、陇海两大铁路枢纽为我掌握。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一个师部、一个团、二个营（二六八师、一〇六师师部及一个团、二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二个警备司令部、四个团（四个总队）。	俘虏 9,850 毙伤 1,420 合计 11,270
解放应城	攻坚	1948.10.24—10.25	湖北应城	第二野战军一部及江汉军区部队	为全歼应城守敌，吸引敌黄维兵团南进，以配合豫中地区我军作战，我有力一部于十月二十四日夜对应城发起攻击，于二十五日黄昏结束战斗，守敌三千余人全部歼灭。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军部、一个团（二八军军部、四九师一个团）。	俘虏 3,200 毙伤 300 合计 3,500
淮海战役	野战	1948.11.7-1949.1.10	以徐州宿县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地区	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及华东、中原、华北军区部队各一部	济南解放后，华东分散之敌畏我大军南下遭歼，即收缩据点，集中兵力于徐州及徐州东西陇海路一线，并企图阻止华东我大军南下。 我为歼灭该线敌军，遂于十一月七日开始发起淮海战役。我第三野战军分三路南下，首先向徐州以东地区之敌黄伯韬兵团攻击，该兵团发觉我大军南下后即率部向徐州西逃，在我堵击、追击下，于十二日将该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之碾庄圩地区，战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全歼该敌。并击退由徐州向东救援之敌	正规部队：共五个兵团部、二二个军部、五六个师。计：歼灭：五个兵团部、十九个军部、五〇个师（二兵团部、七兵团部、十二兵团部、十三兵团部、十六兵团部、五军军部、八军军部、九军军部、十军军部、十二军军部、十四军军部、十八军军部、二五军军部、四一军军部、四四军军部、	俘虏 327,070 毙伤 171,400 起义 28,500

				两个兵团，争取了张克侠、何基沣两部的起义。 我第二野战军同时于津浦铁路徐蚌间展开攻势，配合我第三野战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行动后，继于十一月十八日在蒙城开始逐段阻击由汉口向徐州增援之敌黄维兵团，至二十五日将该敌全部诱入蒙城东北之双堆集地区全部包围，经我连续二十天的围攻，至十二月十五日为我全歼。 徐州敌酋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等部约三十万人，在数次南援黄维兵团受阻后，于十二月一日弃徐州向西南逃窜，我第三野战军即跟踪猛进，至十二月四日为我全部包围于永城东北之陈官庄地区，经连续围困攻击，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向该敌总攻，至十日全部歼灭。 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此后将敌主要精锐部队全歼于江北地区。奠定了我军以后进军江南，迅速解放大陆的基础。	四七军军部、六三军军部、六四军军部、七〇军军部、七二军军部、七四军军部、八五军军部、一〇〇军军部、新编一一五军军部、三师、十师、十一师、十八师、二三师、三二师、三四师、三九师、四〇师、四二师、四四师、四五师、四六师、四九师、五一师、五八师、七五师、六三师、八五师、九六师、一〇八师、一一二师、一一四师、一一八师、一二二师、一二二师（被歼后重建）、一二四师、一二五师、一二七师、一三九师、一四八师、一五〇师、一五二师、一五六师、一五九师、一六二师、一六六师、一七〇师、一八〇师、一八一师、一八六师、二〇〇师、二一六师、二三三师、二三八师、二五三师、二六一师、二三七师、二兵团直辖四四师、骑兵一旅）。起义：二个军部、五个师（五九军军部、七七军军部、三七师、三八师、一一〇师、一三二师、一八〇师）。投诚：一个军部、一个师（一〇七军军部、二六〇师）。	投诚	28,600
						合计	555,570

						非正规部队：共二个师、七个团。计： 歼灭：二个师、七个团（保安一旅、交警十六总队——相当于师、七个保安团）。		
西北冬季战役	野战	1948.11.15—11.28	陕西郃阳、澄城、铜川、蒲城等地区	第一野战军	西北我军于十一月十五日发动冬季战役，造成敌人弱点，寻机歼敌，首先我军一部于郃阳以东歼敌一四四师大部；主力随即向蒲城、同官之间地区进击，二十二日于蒲城以西将敌十七师大部歼灭，直逼同官。胡匪即以洛东七六军仓皇西援，行至澄城西南永丰地区为我洛河东西两岸主力部队分割包围，经二十七、二十八两日（五小时）总攻后，即将该敌全部歼灭。此役打破了胡匪的所谓“机动防御”和抽兵入晋及增援中原之企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军部、二个师、一个师部、三个团（七六军军部、二〇师、二四师、十七师师部及一个团、一四四师二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县保安队。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17,730 6,930 300 24,960
平津张战役	攻坚及野战	1948.12.5—1949.1.31	沿北宁、平绥两线，唐山至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地区	第四野战军及华北十九兵团，二〇兵团并华北军区部队	华北守敌，在我辽沈战役声威下，收缩兵力于平津张之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并相机企图南逃或西窜，我为抓住敌人，歼敌于平津张地区，遂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至二十一日，以迅速突然动作，完成分割包围全部敌军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五孤点，并在行动中歼敌五个师。 自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各个歼灭”敌军。十二月二十二日攻克新保安，歼敌主力三十五军；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克张家口歼敌七个	正规部队：共一个“剿总”司令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〇个师。计： 歼灭：一个警备司令部、一个兵团部、五个军部、二四个师（天津警备司令部、十一兵团部、三五军军部、六二军军部、八六军军部、一〇四军军部、一〇五军军部、二二师、二六	俘虏 毙伤 投诚	232,510 29,790 8,700

师；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至十五日，经二十九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解放天津。塘沽守敌被我围歼，其三千余仓皇由海上逃窜。至此，北平守敌在我大军严密包围下陷于绝境，在我争取下接受和平改编。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由北平开出城外，三十一日下午我军入城接防，北平遂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亦告胜利结束。	师、四三师、六七师、一〇一师、一〇九师、一五一师、一八四师、二一〇师、二五〇师、二五一师、二五八师、二五九师、二六七师、二六九师、二七一师、二八四师、二九三师、三〇五师、三一〇师、三二六师、三三三师、骑兵五旅、骑兵十一旅）。 改编：一个“剿总”司令部、二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六个师（华北“剿总”司令部、四兵团部、九兵团部、十三军军部、十六军军部、三一军军部、三五军军部、九二军军部、九四军军部、一〇一军军部、一〇四军军部、四师、五师、二一师、二二师、五六师、八九师、九四师、一〇一师、一〇九师、一二一师、一四二师、一五五师、一五七师、二〇五师、二五〇师、二六二师、二六七师、二六九师、二七一师、二七二师、二七三师、二九七师、二九九师、三〇九师、三一一师、新编骑兵四师）。 非正规部队：歼灭四个师（天津警备旅、津南一支	改编	250,000
		合计	521,000

						队、津南二支队、交警十总队——均相当于师）。	
樊城战役	攻坚	1948. 12.20—12.22	湖北樊城地区	中原桐柏军区部队	十二月二十日我桐柏军区部队主力奔袭樊城以西竹筱铺，歼敌十三“绥靖”区之暂一师师部及其一个团，继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攻克樊城，将敌十三“绥靖”区独立旅全部及二四三师之两个团大部等三千余人，全部歼灭。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一个师部、一个团及二个团大部（十三“绥靖”区之独立旅、暂编一师师部及一个团、又二个团大部）。	俘虏 3,900 毙伤 300 合计 4,200
荆门战役	攻坚及战野	1949. 2.2—2.7	湖北荆门当阳地区	中原江汉军区部队	我江汉军区部队于一月二十一日收复汉水西岸宜城后，宋匪希濂即令七九军于二十五日起自荆门北向宜城、南漳以南地区施行“扫荡”，我军乃挥师南下，于二月二日将该军军部及其一个团又两个营等四千余人全部包围于荆门城内，四日黄昏攻占荆门，全歼守敌。于五、六、七三日内复乘胜向荆门、当阳地区展开攻击，歼敌四千余人。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军部、一个团、二个营及四个团各大部（七九军军部、九八师一个团、二个营及四个团各大部）。	俘虏 7,610 毙伤 1,010 合计 8,620
西北春季战役	野战	1949. 2.20—3.24	陕中渭北及泾河、洛河之间	第一野战军	西北我军于二月二十日向陕中渭（河）北及泾（河）、洛（河）之间地区发动攻势。先后解放同官、蒲城、大荔、平民、朝邑、耀县、富平、淳化等城，歼敌七千余人，胡匪惧怕被歼，纷纷后撤。三月五日胡匪复集中残部七个军及青海马匪一部向我反击，曾一度占我蒲城、朝邑、淳化、耀县、同官诸城，截至二十四日止，予敌重大杀伤，并击退敌之多次反扑，战役遂告结束。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一个团、一个营（二〇师、一四师一个团、一个营）。 非正规部队：共一个师部、六个团。计： 歼灭：一个师部、四个团（保安四旅旅部、四个保安团）。 起义：二个自卫团。	俘虏 4,920 毙伤 1,600 起义 810 合计 7,330

安新战役	攻坚	1949 4.17—5.7	豫北安阳新乡	第四野战军一部及华北军区部队	豫北新乡、安阳两孤点，在长江以北普获解放后，犹图作绝望的拖延顽抗，我第四野战军一部南下，途中为拔除前进道上的障碍，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肃清了安阳外围三十余据点后，于五月六日五时半开始攻城，至七时守敌全歼。在此声威下，新乡敌四〇军，亦于五月六日全部投降。	正规部队：共一个军部、三个师。计： 歼灭：一个师(四三师) 改编：一个军部、二个师（四〇军军部、一〇六师、二六四师）。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部。	俘虏 毙伤 改编 合计	13,630 2,580 17,120 33,330
渡江作战	野战及攻坚	1949 4.20—6.1	长江下游九江至江阴段及京沪杭三角地带和皖南、赣东北、闽北浙江广大地区	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及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各一部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我为夺取南京，割歼宁、沪、杭地区之敌，四月二十日子夜我军即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作战。仅仅两天两夜的时间，即彻底粉碎了敌人所谓不可超越的“长江防线”，第三天即夺取了敌之反革命中心南京，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继而追歼逃敌大部二十五万余人，全部控制浙赣铁路，完全破击了残敌依托闽浙赣边山区建立第二防线的企图。当我胜利渡过长江，夺取南京之后，蒋匪又收拾残兵败将共二十万余人，妄图在淞沪地区作垂死挣扎。我为歼灭该敌，夺取上海，续于五月十二日发起攻击，迄二十七日上午，守敌除一部乘舰海逃外，余敌十五万余人悉数被歼或投诚，上海即告解放。六月一日乘胜解放崇明岛。	正规部队：共十个军部、四二个师、三个师部、一四个团。计： 歼灭：九个军部、三二个师、三个师部、八个团及五个师各大部（四军军部、二〇军军部、二八军军部、三七军军部、四五军军部、五一军军部、五一军军部(被歼后重建)、六六军军部、一〇六军军部、十三师、四一师、四一师(被歼后重建)、五二师、五九师、八〇师、九〇师、九二师、九七师、一〇二师、一一三师、一一三师(被歼后重建)、一三二师、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一四一师、一四三师、一四九师、一七四师、一八五师、一九二师、二〇二师、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合计	301,360 21,750 14,500 64,290 401,900

二〇三师、二〇四师、二〇九师、二八二师、三一三师三一八师、暂编三师、暂编四师、暂编七师、暂编八师、一一九师师部、二六八师师部、二八一师师部及八个团及六师、十六师、九五师、三二四师、三五三师各大部）。

起义：一个师、三个团、（二八二师、三个团。

投诚：一个军部、九个师、三个团、（六八军军部、八一师、一一〇师、一四五师、一四六师、一八二师、二三〇师、三〇八师、三三四师、暂编二师、三个团）。

非正规部队：共十个师、一个师部、四三个团。

计：

歼灭：十个师、一个师部、二四个团（江苏保安一旅、二旅、交警二总队、五总队、六总队、七总队、八总队、九总队、十一总队、十八总队——均相当于师、安徽保安三旅旅部、一个要塞守备总队、十二个保安团、八个补充团、二个警卫团、一个荣誉团、一个教导团）。

起义：四个团（一个要

						塞守备总队、二个自卫总队、一个保安团）。 投诚：六个团（一个自卫总队、五个保安团）。		
解放大同	投诚	1949.5.1	山西大同	华北军区部队	在我军攻克太原的声威下，大同守敌指挥部于镇河、孟祥祉及二七五师师长田尚志于五月一日向我投诚。	正规部队：投诚一个师、一个营（二七五师、一个营）。 非正规部队：投诚五个保安团。	投诚 合计	10,800 10,800
汉浔间渡江之战	野战	1949. 5.11—5.31	湖北武汉至江西九江间地区	第四野战军	我解放南京及江南广大地区后，华中白崇禧匪部六个军积极布防长江中游南岸，妄图凭借长江，阻我前进。我军为粉碎敌防线，抢渡长江，遂于五月十五日以一部于武汉以东之黄石港段突破敌军防线，渡过长江，进占鄂城、大冶、阳新等城镇，分路迂回武汉，敌仓皇总撤退。另路我军于十六、十七两日相继解放武汉三镇，至此敌之“长江中段防线”遂告崩溃。 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张轸率部二万人于十五日在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正规部队：共一个军部、四个师、二个团、三个营。计： 歼灭：一个团、一个营（三〇四师一个团、一个营）。计： 起义：一个军部、四个师、一个团、二个营（一二八军军部、三一二师、三一三师、三一四师、三〇九师、三〇五师一个团、二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七个保安团、二个营（六个保安团、一个总队、二个营）。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合计	13,170 560 20,330 2,880 36,940
进军陕中战役	野战	1949. 5.11—6.5	陕关中西平原地区	第一野战军	太原解放后，陕中之敌惧被歼灭，乃于四月二十八日开始纷纷西撤。五月十一日西北我军向敌猛追，二十日解放西安。迄六月五日止渭河以南、秦岭以北、潼关以西、虢镇以东的陕中广大地区，为我全部解放。共计歼敌二万七千余人。从此西北战局已起基本变化。	正规部队：共一个军部、三个师、三个团、四个营。计： 歼灭：一个军部、三个师、三个团、二个营（五七军军部、三〇师、二一四师、二一五师、二二军一个团、五三师二个团、二个营）。	俘虏 毙伤	21,740 2,250

						起义：两个营。 非正规部队：共一个警备司令部、八个团、二个营。计： 歼灭：一个警备司令部、五个团、（汧山警备司令部、五个自卫团）。 起义：二个团、二个营。（二个自卫团二个营）。 投诚：一个团、(一个自卫团）。	起义 投诚 合计	1,320 2,070 27,380
解放榆林	和平改编	1949.6.1	陕北榆林	西北军区部队	榆林孤点守敌，在太原、西安相继解放之后，发生动摇，在我争取下，该城守敌于六月一日接受我军和平改编，榆林遂获和平解放。	正规部队：一个军部、一个师（二二军军部、八六师）。	改编 合计	4,000 4,000
粉碎胡、马联合反扑战役	阻击	1949.6.10—6.25	陕西郿县东南地区	第一野战军	逃至宝鸡地区之胡、马匪部，乘我主力尚未集中就绪之际，纠集约十七万余人，于六月十日开始由西而东分路向我咸阳地区联合反扑，企图重占西安。经十日至十八日的九天阻击战中，予进犯敌重大杀伤，并歼敌一个整师，敌反扑未成，于二十五日西窜。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及一个军一部（一六五师及八二军一部）。	俘虏 毙伤 起义 合计	3,410 9,770 360 13,540

湘赣战役及解放长沙	野战及起义	1949.6.30—8.1	江西之奉新、上高、吉安及湖南省会长沙及其附近地区	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	白匪崇禧弃守武汉后，率主力七个军图据守湘赣边山区及汨罗江之线阻我前进。我军为粉碎敌人此一企图，遂发动攻势。经十余日作战，解放了湘、赣边广大地区；待我大军进占平江、浏阳后，并与八月四日争取长沙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率部通电起义，长沙乃和平解放。	正规部队：共一个“绥靖公署”。一个兵团部、三个师、一个师部、七个团。计： 歼灭：二个团（一七六师一个团、三一五师一个团）。 起义：一个“绥靖公署”、一个兵团部、三个师、一个师部、五个团（“长沙绥靖公署”、一兵团部、六三师、二三二师、三〇七师、一九七师师部及二个团、一九师一个团、一〇〇军输送团、“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 非正规部队：共三个师、二个团、二个营。计： 起义：三个师、一个团、二个营（湖南保安一旅、二旅、三旅——均相当于师、一个补充团、二个营）。 投诚：一个团（宜丰保安团）。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合计	3,450 820 77,180 340 81,790

宜沙战役	野战	1949. 7.4—7.18	湖北之宜昌、沙市地区	第四野战军一部及中南军区部队	我四野一部为配合湘赣方面作战，抢渡长江，决首歼盘据于宜昌、沙市地区之敌宋希濂部一部，遂于七月四日分三路自南漳、宜城、钟祥之线向敌进击，经十天作战，歼敌一部，胜利渡越长江。	正规部队：歼灭四个团（九师一个团、六〇师一个团、六四师一个团、一六四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旅、二个团（湖北保安十旅、湖北自卫军二个团）。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2,400 2,980 960 15,340
扶郿战役	野战	1949. 7.11—7.14	陕西扶风、郿县地区	第一野战军	继粉碎胡、马匪军企图重占西安的联合反扑之后，一野主力继于七月十一日晚，对扶、郿地区的胡宗南匪军发动攻势，当即迅速将敌包围，经十二日晨至下午八时约十六个小时的激战后，歼敌四万余人；并乘胜于十四日晨收复宝鸡重镇。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兵团部、三个军部、八个师、一个师部、三个团（十八兵团部、三八军军部、六五军军部、一一九军军部、二四师、五五师、一六〇师、一七七师、一八七师、一九一师、二四四师、二四七师、十二师师部及一个团、六一师二个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31,060 13,000 44,060

兰州战役	野战及攻坚	1949.7.24—9.5	甘肃兰州地区	第一野战军	西北我军为首歼青海马匪主力，夺取兰州，扫清解放甘肃西部，新疆西进道路，于七月二十四日开始向兰州推进，沿途粉碎马匪数道防线，八月二十日我即兵临兰州城下，断敌退路，经二十五日整天激战后，二十六日晨攻克兰州。歼敌青海马匪精锐部队之八二军等部四万余人；另路我军并于九月六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城。至此西北残敌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等部，均陷分割孤立地位。	正规部队：共四个师、五个团、六个营。计：歼灭：四个师、四个团、四个营（一七三师、一九〇师、二四八师、三五七师、一〇〇师二个团、一七七师一个团。工兵七团、四个营）。 起义：一个营。 投诚：一个团、一个营（二四七师骑兵团、一个营）。 非正规部队：共一个师部、一个团、十一个营。计： 歼灭：一个师部、一个团（甘肃保安旅旅部及八团）。 起义：七个营。 投诚：四个营。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合计	24,630 13,480 1,250 3,000 42,360
赣西南战役	野战	1949.7.26—8.29	江西赣州至龙南地区	第四野战军一部	伪江西省主席方天，率两个军位于赣州及其附近；我军为追歼该敌，解放赣南创造进军广东有利条件，遂以一部兵力由南昌一带分两路沿赣江向赣南挺进，在我军连续二十天追击中，歼敌一部，并解放赣南广大地区。	正规部队：歼灭二个团（九六师一个团、二一三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一部。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9,120 2,510 5,530 17,160

长山列岛战役	两栖作战	1949.8.11—8.20	山东长山列岛	第三野战军一部及山东军区部队	华北解放后，国民党残敌即据守渤海海峡之长山列岛，妄图据此封锁我华北基地，我三野一部于八月十一日晚向该敌发起攻击，经七点钟的航海，至十二日晚即占领南北长山岛，大小黑山岛等七个岛，守敌仅小部乘舰逃逸，余全部就歼。十九日续向北之候鸡岛、鼍矶岛等攻击，守敌逃遁，二十日收复该岛。至此长山列岛乃全部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海军陆战二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1,290 200 1,490
福州战役	野战	1949.8.13—8.22	福建省会福州及其附近地区	第三野战军一部	我第三野战军一部，于淞沪战后，经短期休整，于七月二日开始向福建进军，至八月五日全部进抵预定位置。于八月十三日发起了对逃至福州地区之敌六兵团五个军十三个师六万人之进攻。至十七日拂晓，扫清了外围，从东、北、西三面直逼福州城下，继于十七日上午攻入福州城内，敌惧歼越闽江南逃，被我堵截于乌龙江以南，永泰、福清以北地区，分别进行围歼，至二十二日止，除敌七三军军部及七四军军部各带一个师逃平潭岛外，全部就歼。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绥靖公署"、一个兵团部、二个军部、九个师、二个团、一个营（"福州绥靖公署"、六兵团部、二五军军部、九六军军部、四〇师、一〇八师、二〇一师、二一二师、二一六师、二一八师、三一八师、独立三七师、独立五〇师、福州"绥靖公署"特务团、五一军一个团、一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福州宪兵团）。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30,106 2,050 3,190 35,400

解放舟山外围诸岛作战	两栖作战	1949.8.18—11.6	浙江舟山群岛之金塘、大榭、六横等岛	第三野战军一部	我军解放浙江大陆后，为歼灭舟山群岛残敌，打破敌人海上封锁，于八月十九日开始分三路向舟山群岛外围进击，至十一月六日止各路先后攻占金塘岛、大榭岛、梅山岛、六横岛、虾峙岛、桃花岛，夺取了攻击定海本岛之前进基地。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大部、二个团（一〇二师大部、六师一个团、十六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交警九总队）。	俘虏 毙伤 合计	5,210 3,640 8,850
宁夏战役	野战	1949.9.6—9.23	宁夏金积、银川地区	第一野战军一部	为全歼宁夏马匪敌军，解放宁夏，我军有力一部，即于九月六日开始自兰州进军宁夏，相继解放县城多座，歼敌数千，敌八一军于十九日接受我军改编，骑一旅向我投诚，并击溃妄图凭险顽抗之宁夏马匪三个军，使之丧失战力，遂于二十二日分别向我投诚。次日我即进驻宁夏省会银川城。此役将敌马鸿逵部四万余人全部解决，宁夏全境宣告解放。	正规部队：共四个军部、九个师、一个团。计：歼灭：三个军部、六个师、一个团（贺兰军军部、十一军军部、一二八军军部、一六八师、二五六师、二五七师、三五六师、宁夏马匪骑兵一旅、骑兵二旅、一八六师一个团）。 投诚：一个师（"川陕甘绥靖公署"新编骑兵一旅）。 改编：一个军部、二个师（八一军军部、三五师、二九四师）。 非正规部队：歼灭四个师（宁夏保安一师、二师、三师、四师）。	俘虏 毙伤 投诚 改编 合计	20,600 780 10,600 10,000 41,980

甘肃河西战役及解放新疆	野战及起义	1949.9.10—9.26	甘肃之武威、张掖及新疆等地区	第一野战军主力	兰州、西宁解放后，青海马匪残部纷向甘肃西部之大通、张掖地区溃退，我为捕歼该敌，解放甘西进军新疆，于九月十日我军有力部队，即向甘西急进，截至二十日止，青海马匪溃逃甘西残部四万余人，全部消灭。继此，陶峙岳、鲍尔汉两将军率领新疆军政人员于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先后发表通电，脱离广州的国民党匪帮，宣布起义。至此，西北诸省除陕南、甘南共十余座县城外，全部解放。	正规部队：共一个长官公署、二个警备总部、八个军部、十八个师、一个师部、五个团、二个营。计：歼灭：五个军部、八个师、一个师部、一个团（骑兵六军军部、八二军军部、九一军军部、一二〇军军部、一二九军军部、一九一师、二四五师、二四六师、青海马匪新编骑兵一师、骑兵一旅、新编骑兵二旅、骑兵八旅、骑兵十五旅、一〇〇师师部及一个团）。起义：一个警备总部、三个军部、九个师、四个团（新疆警备总部、整编四二师师部、整编七八师师部、整编骑兵一师师部——以上三个整编师师部均相当于军部、六五旅、一二八旅、一七八旅、一七九旅、二二七旅、新疆骑兵四旅、骑兵六旅、骑兵七旅、骑兵九旅——均相当于师、四个独立骑兵团）。投诚：一个长官公署、一个警备总部、一个师、二个营（西北长官公署、甘肃河西警备总部、二三一师、二个营）。 非正规部队：共十八个团、十七个营。计：起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合计	17,430 700 92,200 16,000 126,330

						义：四个团、十五个营（甘肃二个保安团、师管区二个团、十五个营）。 投诚：十四个团、二个营（三个通讯团、三个汽车团、汽车保养团、骆驼团、宪兵十六团、二个警卫团、甘肃三个保安团、二个营）。		
湘西及衡宝战役	野战	1949.9.13-10.17	湖南大庸、芷江、衡阳、宝庆地区	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	我军为捕歼白崇禧匪部主力，断其退入广西道路，遂于九月十三日在湘西迄衡（阳）宝（庆）地区发动攻势。 西线我军于九月十三日分路自常德地区经沅陵攻克芷江要点，歼一〇〇军等一部；继即迅速向祁（阳）宝（庆）间前进，迂回衡（阳）宝（庆）地区之敌。东线我军于十月三日，由湘乡迄安仁地区向衡、宝间及其以南地区猛烈攻击，切断敌一兵团与白匪主力联系，并与西线我军形成东西夹击桂敌之形势。敌被迫全线向西南撤退，我军立即猛追，终将敌桂系精锐第七军、四八军所部共三个师又二个团围歼于祁阳以北地区。 湘鄂边石门慈利地区我军，于配合衡、宝战役主动出击中，攻克大庸歼敌一二二军大部。	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军部、六个师、二个师部、七个团（七军军部、一〇〇军军部、一二二军军部、六二师、一七一师、一七二师、一七六师、二一七师、三四五师、一九师师部及一个团、六三师师部及二个团、十师一个团、一三八师二个团、二四三师一个团）。 非正规部队：共一个师、四个团。计：歼灭：四个团。（新八军二师二个团暂编三师一个团、一个突击队）。 投诚：一个师（新八军一师）。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38,290 7,010 2,190 47,490

漳厦战役	野战及两栖作战	1949.9.16-10.24	福建漳州、厦门地区	第三野战军一部及闽粤边部队	我三野一部，继福州战后，一部于九月十六日解放平潭岛；主力于九月十九日开始向南进击，至二十五日先后解放同安、长泰、南靖、漳州等城。继于十月十五日晚发动对厦门岛之敌四万人的渡海攻击，是夜二十一时登陆，十七日拂晓攻占厦门市，十一时全岛解放。守敌除汤恩伯等率少部乘舰先逃外，悉数就歼。并攻占鼓浪屿及大小登岛。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兵团部、一个要塞司令部、二个军部、七个师、三个团、二个营（八兵团部、厦门要塞司令部、五五军军部、六八军军部、二九师、五一师、七四师、八一师、一四三师、一八一师、二三八师、四〇师二个团、一个输送团、二个营）。非正规部队：歼灭三个团（福建三个保安团）。	俘虏 毙伤 合计	45,470 5,530 51,000
解放绥西	起义	1949.9.19	绥远“归绥”包头地区		自北平和平解放后，即开始了绥远的和平谈判，直至西北甘、宁、青解放以后，在我耐心争取下，经由傅作义将军进一步的谈判后，于九月十九日宣布起义，至此绥远全境解放。	正规部队：起义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十三个师（九兵团部、一一一军军部、七师、八六师、二二八师、二五八师、三一〇师、三一九师、三二〇师、三二六师、独立骑兵三旅、骑兵五旅、骑兵十一旅、骑兵十二旅、骑兵十三旅）。非正规部队：起义三个师（绥远保安二旅、骑兵四旅、骑兵六旅）。	起义 合计	65,000 65,000

广东战役	野战	1949. 10.1-10.29	广东曲江至广州铁路沿线及阳江、阳春地区	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中南军区部队各一部	我二、四野各以有力一部，于十月一日发起广东战役，主力自信丰、南雄、桂东地区沿粤汉路急进；一部由和平、龙川地区沿东江向广州前进。敌闻风先逃，我军歼敌一部后，于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敌军一部乘船逃跑，主力均沿西江逃窜；我军经十昼夜的追击，終于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将粤敌主力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	正规部队：共一个兵团部、三个军部、七个师、一个团、四个营。计： 歼灭：一个兵团部、二个军部、五个师、二个营（二一兵团部、三九军军部、五〇军军部、三六师、九一师、一〇七师、一四七师、二七〇师、二个营）。 起义：一个军部、一个团、二个营（六二军军部及警卫团、二个营）。 投诚：一个师（三九军之一〇三师）。 改编：一个师（一〇九军之一五四师）。 非正规部队：共二个师、三个团、四个营。计： 歼灭：二个师、三个团（广东保安二师、暂编二纵队——相当于师、税警团、保安总队、护路总队）。 起义：一个营。 投诚：三个营。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改编 合计	41,060 10,600 4,790 2,490 3,440 62,380

西南战役	野战	1949.11.1-12.31	川、康、滇、黔、及陕南之广大地区	第二野战军主力、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西北军区、中南军区部队各一部	为实现全国彻底解放，击破蒋敌凭籍四川天险负隅顽抗之企图，我二野主力及一、四野各有力一部，于十一月一日起，分路进军西南，以消灭大陆上最后一支敌军——胡宗南部和其他国民党残余部队，十五日解放贵阳，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在我胜利进军下，十二月九日卢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将军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得到和平解放。至十二日三十一日胜利结束。在这六一天作战中，共消灭西南国民党军七十万人，解放川、康、滇、黔四省全部和湘、鄂、陕、甘等省最后的五十余座县城。至此，西南诸省区除西藏外，已全获解放。中国大陆解放战争基本上胜利结束。	正规部队：共一个长官公署、五个"绥靖公署"、八个兵团部、三四个军部、一〇二个师、十四个团、二个营。计：歼灭：一个长官公署、三个"绥靖公署"、二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四七个师、三个团（西南长官公署、"川陕甘绥靖公署"、"川湘鄂绥靖公署"、"贵州绥靖公署"、五兵团部、十四兵团部、一军军部、三军军部、十七军军部、二一军军部、二七军军部、三六军军部、四四军军部、五七军军部、六五军军部、六九军军部、七六军军部、九〇军军部、一一四军军部、一师、九师、十七师、二〇师、二四师、二六师、二八师、三一师、三五师、四七师、五三师、五四师、六〇师、国防部直辖六〇师、六四师、七八师、九八师、一〇四师、一一一师、一二三师、一三四师、一三五师、一四五师、一六〇师、一六二师、一六四师、一六五师、一六七师、一六九师、一九九师、二一四师、二一五师、二二三师、二四一师、二四七师、二四九	俘虏 毙伤 起义 投诚 合计	196,100 8,830 401,660 95,640 702,230

师、二五四师、独立二六三师、二九五师、三三一师、三三二师、三三八师、三四九师、独立三六一师、三六四师、独立三六七师、七六军独立师、“川陕甘绥靖公署”之警卫团、辎重团、工兵一团）。

起义：二个“绥靖公署”、六个兵团部、二〇个军部、四九个师、十一个团、二个营（“云南绥靖公署”、“川鄂绥靖公署”、七兵团部、十五兵团部、十六兵团部、十八兵团部、十九兵团部、二〇兵团部、二军军部、十五军军部、二四军军部、三〇军军部、四一军军部、四七军军部、四九军军部、七二军军部、七九军军部、八九军军部、九三军军部、九五军军部、九八军军部、一〇一军军部、一〇八军军部、一一〇军军部、一一八军军部、一一九军军部、一二四军军部、一二七军军部、十二师、二七师、三〇师、三四师、四八师、五五师、六一师、七六师、七九师、一一七师、一二二师、一二四师、一二五师、一二六师、一二七师、一三六师、一

三七师、一四〇师、一四四师、一五八师、一八七师、一九四师、二二五师、二三三师、独立二三五师、二三九师、二四二师、二四三师、二四四师、二七一师、二七二师、二七五师、二七七师、二七八师、二七九师、二九八师、三〇一师、三〇二师、三〇九师、三一〇师、三一一师、三一二师、三二七师、三二八师、三四三师、独立三六六师、二〇军独立师、七二军教导师、骑兵二旅、炮兵十一团、二个工兵团、二个挽马团、四个辎汽团、通讯四团、“川鄂绥靖公署”警卫团、二个营）。

投城：一个军部、六个师（三八军军部、八四师、一三三师、一五〇师、一七七师、三三五师、三三六师）。

非正规部队：共十个军：二〇个师、二九个团。计：

歼灭：三个军、十一个师、十八个团（四川新编六军、新编七军、新编八军、新编十旅、新编十六师、新编十七师、湖北保安一师、二师、四师、暂编二七师、湖南保安十五师、贵州保安四师、陇海交

						警师、国防部突击三纵队——相当于师、四川九个保安团、忠县自卫团、六编练司令部三个保安团、三个警卫团、西安保安团、宁陕别动总队。） 起义：七个军、七个师、五个团(四川新编一军、新编三军、新编四军、新编九军、新编十二军、暂编八军、暂编九军、保安一旅、三旅、二纵队、三纵队、九纵队、十九纵队、“川鄂绥靖公署”独立纵队——以上五个纵队均相当于师、五个宪兵团）。 投城：二个师、六个团（四川保安八纵队、湖北保安三旅——均相当于师、四个自卫团、黔北保安团、西康卢山总队）。	
广西战役	野战	1949. 10.31—12.14	广西全境及粤桂边境之博白、廉江、钦县地区	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一部	桂粤之敌共约二十万人，有经雷州半岛逃跑企图；我军为捕歼该敌，不使逃逸，遂集结强大兵力，发动解放广西战役。 第一阶段：我军于廉江地区歼敌二三军主力后，自十一月六日开始，由湘、桂、黔地区分三路向广西前进。西路指向柳州、百色；中路直趋梧州，并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另我南路军控制信宜、茂名地区待机歼敌。在我强大攻势下，敌纷纷向雷州半岛逃窜。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将敌主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长官公署、三个兵团部、十二个军部、三一个师、十五个团（华中长官公署、三兵团部、十兵团部、十一兵团部、七军军部、二三军军部、四六军军部、四八军军部、五六军军部、五八军军部、六三军军部、七一军军部、九七军军部、一〇三军军部、一二五军军部、一二六军	俘虏 156,960 毙伤 7,750 起义 2,000 投城 6,280 合计 172,990

力抓住围歼于博白、陆川地区。 第二阶段：白匪主力被歼后，残敌由南宁及粤、桂边地区窜向钦县，图由海上逃窜。自十二月三日至八日，经我军追击，分别将敌歼灭于桂境及粤、桂边地区。 第三阶段：自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另部我军越过十万大山追歼残敌，除敌一兵团、十七兵团等部二万余人逃入越南外，余均被歼。广西全境解放。	军部、六二师、八七师、八八师、一三八师、一五二师、一七一师、一七二师、一七四师、一七五师、一七六师、一八三师、一八六师、一八八师、二一一师、二一三师、二二四师、二二六师、二二九师、二三四师、二三六师、二六五师、三〇四师、三〇五师、三二一四、三二九师、三三〇师、三四七师、三六二师、新一师、新二师、暂一师、十四军三个团、九七军三个团、华中长官公署三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二个汽车团、警卫团、补充团）。 非正规部队：共一个军、二个师、二个团。计： 歼灭：二个师、二个团（粤桂边纵队、桂北纵队——均相当于师、一个保安团、一个新兵团）。 起义：一个军（湖南新编第七军）。				

滇南战役	野战	1949.12.30—1950.1.25	云南蒙自、元江地区	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及滇桂黔边纵队	卢汉起义后，敌第八、二十六两军，妄图由沾益、开远地区进窥昆明，经贵州我军驰援打击后，即负创南逃，并企图沿滇越铁路逃入越南。我为截歼该敌，即以有力一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自桂西地区开始向西疾驰，经插滇南之河口、蒙自、建水、元江一线，截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止，除少数残敌溃散逃入越南外，全部歼灭或投诚。	正规部队：共二个军部、八个师。计： 歼灭：二个军部、七个师（八军军部、二六军军部、四二师、九三师、一六一师、一七〇师、一九三师、二三七师、三六八师）。 投诚：一个师(三师)。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20,000 4,630 3,000 27,630
海南岛战役	两栖作战	1950.3.5—4.30	广东海南岛	第四野战军一部	我为歼灭负隅海南岛之十万敌军，经过航海训练及船只准备后，遂于三月五日至三十一日以小部队分批潜渡及强渡该岛，在岛上人民武装配合下均胜利登陆。 四月十六日，在岛上我军配合下，我主力部队于琼北大举登陆，并即粉碎敌军防御体系，经过连续追击作战，歼敌一部，一部逃往台湾，至四月三十日全部解放海南岛。	正规部队：歼灭五个师、一个师部、三个团、十一个营（一五一师、一五三师、一五六师、一六三师、二八六师、二五二师师部及二个团、一五九师一个团、十一个营）。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部、三个团、三个营（暂编十三师师部及二个团、保安一师一个团、三个营）。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24,890 6,680 1,580 33,150

平而关战役	野战	1950. 2.1—2.6	广西边境平而关、水口关地区	第四野战军一部	逃入越南之残匪十七兵团残部，在法帝庇护下，于二月一日回窜我广西边防要地平而关、水口关地区；我边防部队于诱敌深入后即予包围，经五、六两日激战，全歼匪十七兵团一〇〇军十九师及一九七师等残部。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二个师（十七兵团部、一〇〇军军部、十九师、一九七师）。	俘虏 毙伤 合计	6,140 570 6,710
西昌战役	野战	1950. 3.12—4.7	西康西昌地区	西南军区部队一部	为彻底肃清西南境内残存之国民党军，我西南军区部队有力一部，于三月中旬自云南、四川两地向盘据于西昌地区之胡宗南、贺国光残部发动攻势，沿途冲过数道江河天险，二十七日解放西昌城，迄四月七日止，除胡、贺匪首先期乘机飞逃外，余匪全部歼灭或投诚。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长官司令部、二个军部、三个师、一个团（西南长官司令部、二军军部、六九军军部、三一〇师、三三五师、胡宗南直辖一师、伪国防部警卫团）。 非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团（西昌警备司令部之警备团、另葛绍吾等部向我投诚）。	俘虏 毙伤 投诚 合计	7,500 390 2,400 10,290
解放东山岛	两栖作战	1950. 5.11—5.12	闽南之东山岛	第三野战军一部	我军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二十一时开始向东山岛之敌独立五八师及五一师一部共二千余人发起攻击，二十二时登陆成功，至十二日晨四时全歼守敌，东山岛全告解放。	正规部队：歼灭一个师（独立五八师）。	俘虏 毙伤 合计	1,042 2 1,04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战绩总结公报

（一）消灭敌军兵力：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三个军政长官公署、八个“绥靖公署”、二个警备总部、一个长官司令部、三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三十五个兵团部、四个整编军部（内三个兼整编师部）、一百八十三个军部、五百七十二个整师、二十八个师部、四百一十一个整团、五百二十六个整营。以上除军以上指挥机关另行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七百六十二个师另二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五百五十四万二千四百七十人。非正规军——一百零三个整师、九个师部、五百零八个整团、四百二十个整营。以上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九百三十一个团。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人。总计消灭敌军八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人，内被俘者四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五十人，毙伤者一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六十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人，起义者八十四万六千九百五十人，接受我军改编者二十九万三千零三十人。

（二）向我投诚及被我俘虏与击毙之敌高级军官一千六百六十八名：计投诚者二百七十三名，内正规军一百六十六名，非正规军一百零七名；被俘虏者一千三百一十名，内正规军九百四十一名，非正规军三百六十九名；被击毙者八十五名，内正规军五十五名，非正规军三十名。

（三）缴获：大小炮五万四千四百三十门，各种机枪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挺、长短枪三百一十六万一千九百一十二支、掷弹筒二万一千四百六十二个、枪榴筒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一个、火焰喷射器二百二十八具、飞机一百八十九架、舰艇二百艘、坦克六百二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八十九辆、机车一千零一十六辆、汽车二万二千零一十二辆、骡马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五匹、各种子弹五亿零七百九十八万四千七百发、各种炮弹五百五十二万七千四百发、手榴弹三百六十三万五千八百枚、炸药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八百斤。另击落敌飞机一百九十架，击毁敌坦克一百五十六辆，击毁敌军舰九艘。

（四）截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为止，全国已解放国土面积八百四十九万五千五百方公里，已解放人口四亿八千二百五十三万二千（按：根据原解放区及人民解放战争三年中解放地区最近初步调查的人口数字为二亿九千九百七十一万四千人，较三年总结战绩公报中统计的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七万四千人增加了二千零四十四万人，加上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解放地区中人口一亿八千二百八十一万八千人，故全国人口总数已超过过去公布的全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之数字，特此说明），已解放县以上城市二千

零三十一座（解放后我新设县以上城市一百零五座未计算在内）。另现尚为残敌盘踞之台湾、西藏两省区约面积一百一十万二千方公里、人口约一千万、县以上城市二十二座。

（五）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我军共负伤一百零四万八千九百人，阵亡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人，伤亡共计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七百人，被俘一万三千七百人，失踪十九万六千一百人，总计我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五十二万二千五百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共毙伤敌军一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人，我军伤亡一百三十一万二千七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三比一；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共俘虏敌军四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五十人，我军被俘一万三千七百人，敌我俘虏相较为三百三十四点八比一；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一百七十七万三千四百九十人。总计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敌军共损失八百零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人，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五十二万二千五百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较为五点三比一。

（转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战绩公报

第一号公报

全年主要战绩统计：

（一）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以敌整编后的编制为准，未整编的军、师作为整编的师、旅计算，包括炮兵团、工兵团等特种部队在内）共九个师部、四十六个整旅、两个旅部、一百十一个整团、一百六十六个整营。除师部不计外，以四个营或一个旅部折合一个团，以三个团折合一个旅，则上述兵力等于九十七个半旅或二百九十二个半团。连营以下被消灭的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四十六万三千人，毙伤其三十一万二千人，争取其起义一个整营及营以下部队共五千人，合计消灭敌正规军七十八万人。

（二）歼灭敌营以上非正规军（一个大队作为一营计算，包括交通警察、伪军、地方保安部队等）一百十四个团、五十四个营、一个日军大队。以四个营折合一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一百二十七个团又三个营。连营或大队以下被消灭的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二十一万四千人，毙伤其十一万四千人，争取其起义五个整团又二个整营共一万二千人，合计消灭敌非正规军三十四万人。

（三）上述两项合计，除九个师部外，共歼灭营以上敌军四百二十六个团。连营以下被消灭的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六十七万七千人，毙伤敌四十二万六千人，争取其起

义一万七千人，合计消灭敌军一百十二万人。

（四）俘敌正规军上将一名、中将七名、少将九十七名。非正规军上将二名、中将十四名、少将五十五名。合计一百七十六名。毙敌正规军中将二名、少将十四名。非正规军中将三名、少将七名。合计二十六名。共俘毙敌将官二百〇二名。

（五）缴获长短枪三十八万九千支、各种机枪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七挺、各种炮六千一百六十六门、掷弹筒四千一百八十一个、枪榴弹筒六百三十一个、各种炮弹四十三万一千发、其他各种弹药五千七百六十七万一千发（计子弹五千七百四十八万九千四百九十发，手榴弹十八万一千五百一十发）、坦克八十七辆、火车头四十个、汽车一千二百八十一辆、电台四百五十九部、战马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五匹、粮食三千七百七十七万三千六百斤。缴获和击毁各种飞机六十架（内缴获三架，击毁五十七架），舰艇十九艘，击毁坦克三十六辆。

第二号公报

全年各解放区野战军地方军歼敌分区统计：

（1）华东：歼灭敌顾祝同（或前薛岳）指挥系统正规军八个师（四十九师、六十九师、二十六师、五十一师、七十三军、四十六师、七十二师、七十四师）的师部、三十个整旅（十九旅、二十六旅、九十二旅、暂十二师、七十九旅、九十九旅、一百零五旅、一百八十七旅、新七旅、四十一旅、六十旅、预三旅、四十四旅、八十旅、一百六十九旅、一百一十三旅、一百一十四旅、新三十六师、十五师、七十七师、一百九十三师、一百七十五旅、一百八十八旅、新十九旅、新十三旅、新十五旅、三十四旅、五十一旅、五十七旅、五十八旅）、二十八个整团、三十一个整营；非正规军二十三个整团，七个整营（包括交通警察第七总队、十一总队、十五总队的八个大队、保安一师张天佐全部、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大部）。消灭敌顾祝同系统总兵力正规军三十七万四千人、非正规军六万人，共四十三万四千人。

（二）晋冀鲁豫：歼敌正规军顾祝同（或前刘峙或前薛岳）指挥系统一个师（三师）的师部、六个整旅（三旅、二十旅、一百一十九旅、一百零四旅、一百四十旅、四十九旅）、二十二个整团、三十四个整营，胡宗南指挥系统两个整旅（三一旅、一旅）、六个整团、十二个整营，阎锡山指挥系统六个整团、两个整营。歼灭敌上述各指挥系统非正规军三十六个整团、十六个整营（包括暂四纵队张岚峰大部，暂三纵队孙殿英全部）。消灭敌上述各指挥系统总兵力正规军十五万四千人、非正规军十三万三千人，共二十八万七千人。

（三）东北：歼灭敌杜聿明指挥系统正规军七个整旅（二十五师、八十八师、八十九师、重新组成的八十八师、九十一师、一百八十四师、暂二十一师）、十九个整团、四十四个整营，非正规军二十一个整团、十二个整营（包括一集团军李华堂部、五集团军谢文东部、“热河人民自卫军”李守信部）。消灭敌杜聿明指挥系统总兵力正规军十三万人、非正规军四万五千人，共十七万五千人。

（四）晋察冀：歼灭敌正规军孙连仲指挥系统十个整团、十八个整营，傅作义指挥系统一个整团，阎锡山指挥系统三个整团、一个整营。歼灭敌上述各指挥系统非正规军

二十八个整团、十一个整营（包括暂五纵队侯如墉全部、日军保安第五大队藤田信雄部）。消灭敌上述各指挥系统总兵力正规军六万人、非正规军八万四千人，共十四万四千人。

（五）陕甘宁、晋绥、歼敌正规军胡宗南指挥系统（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榆林邓宝珊、左世允在内）一个整旅（一百三十五旅）两个旅（重新组成的三十一旅、一百六十七旅）的旅部、六个整团、八个整营，阎锡山指挥系统七个整团、十三个整营，傅作义指挥系统三个整团、三个整营。歼灭敌上述各指挥系统非正规军六个整团、八个整营。消灭敌上述各指挥系统总兵力正规军五万九千人、非正规军一万五千人，共七万四千人。

（六）中原：歼灭敌程潜（“武汉行辕”）指挥系统非正规军一个整营。消灭敌程潜、胡宗南两指挥系统总兵力正规军三千人、非正规军三千人，共六千人。

（七）合计各区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折合九十七个半旅（内四十六个整旅、外九个师部），营以上非正规军折合一百二十七个团又三个营，消灭敌总兵力一百十二万人。敌各指挥系统营以上正规军被歼总数为：顾祝同指挥系统九个师部、三十六个整旅、五十个整团、六十五个整营，杜聿明指挥系统七个整旅、十九个整团、四十四个整营，胡宗南指挥系统三个整旅、二个旅部、十二个整团、二十个整营，阎锡山指挥系统十六个整团、十六个整营，孙连仲指挥系统十个整团、十八个整营，傅作义指挥系统四个整团、三个整营。

第三号公报

全年歼敌分期统计：

（一）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为敌军全面攻势高潮。敌进攻兵力逐月增加。敌全部正规军为八十六个师二百四十八个旅，七月投入战争者为六十八个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用于攻击者二十六个师七十二个旅。至十月投入战争者增至七十三个师二百零九个旅，其用于攻击者增至四十三个师一百十七个旅，为敌全年攻击力量的最高数字。我四个月共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折合三十二个旅（内十四个整旅、外两个师部）、营以上非正规军折二十四个团又一个营。消灭敌总兵力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二十九万八千余人。

（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敌军攻势受挫。敌投入战争的正规军，虽仍由十一月的七十三个师二百十二个旅，略增为十二月至二月的七十六个师二百十九个旅，但因守备侵占区的兵力增加，被我歼灭或击溃的军队需要补充整理及若干战线开始转入被动，其攻击力量则较前减少，并由十一月的三十六个师九十八个旅，续减为二月的三十二个师八十五个旅。我四个月共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折合三十四个旅（内十八个整旅、外五个师部）、营以上非正规军四十三个团又一个营。消灭敌总兵力正规军三十万九千人、非正规军十万五千人，共四十一万四千人。内俘虏、起义共占二十七万一千人，毙伤占十四万三千人，前者比后者激增至二比一弱。

（三）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敌军攻势局限于鲁中、陕北两线，我军在晋南、正太、豫北、东北、热河、冀东、津浦北段、平汉北段各线先后举行反攻。敌投入战争的正规军，续由三月的七十八个师二百二十四个旅，略增为六月的七十八个师二百二十七个旅，其攻击力量则续由三月的三十二个师八十六个旅激减为五、六两月的十五个师四十个旅。我四个月共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折合三十一个半旅（内十四个整旅、外两个师部），营以上非正规军折合六十个团又一个营。消灭敌总兵力正规军二十三万六千人、非正规军十七万一千人，共四十万七千人；内俘虏、起义共占二十七万五千人，毙伤十三万二千人，前者比后者续增至二比一强。

（四）合计全年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折合九十七个半旅（内四十六个整旅、外九个师部），营以上非正规军折合一百二十七个团又三个营，消灭敌总兵力一百十二万人。平均每月份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八个旅以上（内约四个整旅）、非正规军十个团以上，总兵力九万三千人以上。全年的歼敌统计表现两个高峰：其一是一九四七年一、二两月，共歼灭敌营以上正规军折合二十二个旅（内十三个整旅、外四个师部）、营以上非正规军折合三十一个半团，消灭敌总兵力二十七万三千人；其二是一九四七年四、五两月，共歼敌营以上正规军折合二十二个旅（内十二个整旅、外两个师部）、营以上非正规军折合四十三个团，消灭敌总兵力二十八万一千人。这四个月的战绩约当于全年战绩的一半。

第四号公报

（甲）全年城市得失分期统计：

（一）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敌侵占城市一百五十三座，我收复和解放四十八座，得失相较我失一百零五座。失去城市中包括八月所失的热河省会承德、九月所失的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冀鲁豫边区首府菏泽、十月所失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安东省会安东。十月敌占我城市六十三座，我收复和解放九座，为全年最高数字。

（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敌侵占我城市八十七座，我收复和解放八十七座，得失相抵。失去城市中包括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三）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敌占城市九十五座，我收复和解放一百五十三座，得失相较我得五十八座。失去城市中包括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收复城市中包括安东省会安东。

（乙）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生效时起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止解放面积、人口、城市得失变化：

（一）解放区原有面积二百三十九万一千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四分之一），被敌侵占二十四万七千方公里，我新解放（被敌重占者除外）五万六千方公里，解放区现有二百二十万方公里。

（二）解放区原有人口一万万四千九百万（约占全国人口四万万五千万的三分之一），被敌侵占三千零四十万，我新解放（被敌重占者除外，）一千二百四十万，解放区现有

人口一万万三千一百万。

(三)解放区原有城市（以旧有县城为准，不包括解放区新设县治的市镇，但包括较一般县城更重要的海口烟台、威海卫、龙口三市与交通重镇公主岭、梅河口两市）五百零六座，被敌侵占一百四十一座，我新解放（被敌侵占者除外）五十七座，解放区现有城市四百二十二座。

第五号公报

全年敌我损失比较：

(一)全年我军阵亡六万九千人，负伤二十六万七千人（内伤愈归队者二十万人），共三十三万六千人，失踪（包括被俘和失散）二万二千人，合计损失三十五万八千人。

(二)全年毙伤敌军四十二万六千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二六比一，全年消灭敌军一百十二万人，敌我损失相较为三点一三比一。

(三)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月我军损失十二万二千人，消灭敌军二十九万九千人，敌军损失为我军损失之二点四五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军损失十二万人，消灭敌军四十一万四千人，敌军损失增至我军损失之三点四五倍。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我军损失十一万六千人，消灭敌军四十万七千人，敌军损失增至我军损失之三点五倍。

（转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战绩公报

第一号公报

全年战绩：

(一)歼敌营以上正规军（北线未整编的军、师照南线已整编的师、旅计算）共三个军部（包括一个兵团部）、二十个师部、四十九个整旅、十一个旅部、七十七个整团、一百七十个整营。除军部、师部外，以四个营或一个旅部折合一个团，以三个团折合一个旅，则上述兵力等于九十二个半旅或二百七十七个半团。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五十五万九千八百五十人；毙伤其三十六万四千二百七十人；另争取其起义一个整旅（暂编五十八师）又两个整团及营以下部队共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人，合计九十三万六千零五十人。

(二)歼敌营以上非正规军（包括保安团队、交通警察、宪兵、补训师及地方骑兵部队等）共十七个整旅、一个旅部、一百二十八个整团、一百六十九个整营。以一个旅折

合三个团，以四个营或一个旅部折合一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二百二十二个团又一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三千一百五十人，毙伤其十七万五千九百三十人，另争取其起义一个整团及营以下部队共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人，合计五十八万五千三百五十人。

(三)以上两项合计：共歼营以上敌军三个军部、二十个师部、六十六个整旅、十二个旅部、二百零五个整团、三百三十九个整营。除军部、师部外，共折合四百九十九个团又三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军九十五万三千人，毙伤其五十四万零二百人；另争取其起义一个整旅、三个整团及营以下部队共二万八千二百人，总计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人。此总数中包括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后，在黄河以南之外线消灭的二百一十六个折合团又一个营及营以下部队共四十八万五千五百一十人。

(四)俘敌将级军官一百五十名。内正规军一百零五名。计中将十六名、少将八十九名；非正规军四十五名，计中将五名、少将四十名。毙敌将级军官二十四名。内正规军十五名，计中将四名、少将十一名；非正规军九名，计少将九名。合计俘毙敌将级军官一百七十四名。此外俘敌旅级上校军官三十九名，内正规军二十五名，非正规军十四名；毙敌旅级上校军官三名，内正规军一名，非正规军二名；合计四十二名。

(五)缴获：各种枪枝五十四万三千三百一十枝，计步、马枪五十一万八千零八十六枝、短枪二万五千一百一十六枝、战防枪一百零八枝；各种机枪四万八千六百六十四挺，计轻机枪二万八千四百八十八挺、重机枪四千七百六十六挺、手提冲锋机枪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九挺、高射机枪二十一挺；各种口径炮八千九百二十门，计小炮一千八百八十二门、六零炮三千一百八十八门、火箭筒二百五十二门、机关炮五十九门、迫击炮二千零七十一门、战防炮一百三十九门、平射炮一十九门、步兵炮一百一十八门、高射炮十三门、山炮四百四十三门、野炮一百门、重迫击炮六十一门、榴弹炮三十六门、其他炮五百三十九门；掷弹筒及枪榴弹筒五千四百二十五个、火焰喷射器二十七个；各种炮弹八十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二发、各种子弹八千二百九十九万八千八百一十五发，手榴弹六十八万八千七百一十六枚、另各种弹药一百吨；各式飞机十架；坦克三十一辆；火车头一百五十九个；小型军舰七艘、汽艇八艘；汽车二千零六十八辆；马匹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匹；降落伞一万三千二百具；电台九百九十部、报话机一百九十八部、电话机七千七百七十一部；汽油五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加仑；军粮九千一百八十三万八千零二十斤。击落及击毁飞机八十一架，另击毁坦克四十一辆。

(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年（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综合战绩：

歼敌营以上正规军三个军部、二十九个师部、九十五个整旅、十三个旅部、一百八十八个整团、三百三十六个整营，除军部、师部外，共折合一百九十个旅。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一百零二万二千八百五十人，毙伤其六十七万六千二百七十人，另争取其起义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一个整营及营以下部队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人，合计一百七十一万六千零五十人。

歼敌营以上非正规军十七个整旅、一个旅部、二百四十二个整团、二百二十四个整

营，共折合三百五十个团。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六十万零七千一百五十人，毙伤其二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人，另争取其起义六个整团两个整营及营以下部队共二万八千二百七十人，合计九十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人。

以上两项合计，共歼敌三个军部、二十九个师部、一百一十二个整旅、十四个旅部、四百三十个整团、五百六十个整营，除军部、师部外，共折合九百二十个团。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毙伤其九十六万六千二百人，另争取其起义一个整旅又八个整团三个整营及营以下部队四万五千二百人，总计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四百人。

俘敌将级军官三百二十六名。内正规军二百一十名，计上将一名、中将二十三名、少将一百八十六名；非正规军一百一十六名，计上将二名、中将十九名、少将九十五名。毙敌将级军官五十名。内正规军三十一名，计中将六名、少将二十五名；非正规军十九名，计中将三名、少将十六名。合计俘毙敌将级军官三百七十六名。此外俘毙敌旅级上校军官四十二名。

主要缴获：各种枪枝九十三万二千三百一十枝、各种机枪八万八千三百二十一挺、各种口径炮一万五千零八十六门、掷弹筒及枪榴弹筒一万零二百三十七个、各种炮弹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发、各种子弹一万万四千零四十八万八千三百零五发、手榴弹八十七万零二百二十六枚，坦克一百一十八辆、飞机十三架、火车头一百九十九个、汽车三千三百四十九辆、小型军舰七艘、汽艇二十七艘。

(七)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绩与第一年战绩比较：

歼敌正规军，第一年歼敌九个师部、四十六个整旅、两个旅部、一百十一个整团、一百六十六个整营，共折合九十七个半旅，或二百九十二个半团。第二年与第一年相较，多三个军部、十一个师部、三个整旅、九个旅部；惟折合旅数少五个，折合团数少十五个。但实际团数应多于第一年。因第一年歼敌四十六个整旅多为两团制，连同旅部计为三个团；第二年歼敌四十九个整旅多为三团制，连同旅部应计为四个团，而折合团数时仍只计为三个团。消灭敌正规军兵力，第一年共七十八万人，计俘敌正规军四十六万三千人，毙伤三十一万二千人，争取其起义五千人。第二年与第一年相较，多消灭十五万六千零五十人，计俘敌军多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人，毙伤敌军多五万二千二百七十人，争取起义者多六千九百三十人。第一年平均每月歼敌正规军八个旅，兵力六万五千人，第二年则平均每月歼敌正规军七点七个旅，兵力七万八千零四人。

歼敌非正规军，第一年一百十四个整团、五十五个整营，共折合一百二十七个团又三个营；第二年与第一年相较多六十六个整团、一百一十四个整营，共折合九十四个团又两个营。消灭敌非正规军兵力第一年共三十四万人，计俘敌非正规军二十一万四千人，毙伤其十一万四千人，争取其起义一万二千人。第二年与第一年相较，多消灭二十四万五千三百五十人，计俘敌非正规军多十七万九千一百五十人，毙伤敌非正规军多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人，争取起义者多四千二百七十人。第一年平均每月歼敌非正规军十个半团，兵力二万八千三百三十三人；第二年则平均每月歼敌非正规军十八个半团，兵力四万八千七百七十九人。这说明敌人在第二年内，妄想以加强地方团队来延续其垂死的命

运的办法，已遭受了惨败。

以上两项合计，第二年较第一年多歼三个军部、十一个师部、七十九个半团，多消灭四十万一千四百人，计俘虏多二十七万六千人，毙伤多十一万四千二百人，争取起义者多一万一千二百人。第一年平均每月歼敌三十五个团，总兵力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人；第二年则平均每月歼敌四十一点六个团，总兵力十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三人。

俘敌将级军官，第一年共一百七十六名，第二年较第一年少二十六名，计非正规军少二十六名；毙敌将级军官第一年共二十六名，第二年较第一年少毙敌军将级军官二名，计正规军少一名，非正规军少一名；俘毙共少二十八名。但第二年俘毙敌旅级上校军官则较第一年多四十二名，计正规军二十六名，非正规军十六名。故俘毙敌军官以旅级上校军官计算，仍较第一年多十四名，其所以第二年俘毙敌将级军官（主要是非正规军）较第一年略少、而旅级上校军官则较多者，是因为敌之将级军官在第一年内被我人民解放军大量俘毙后，其所填补的多为资历较浅的军官；同时由于在第一年内我已将敌人于日寇投降后所收编的大股伪军，如孙殿英、张岚峰、郝鹏举、侯如墉、姜鹏飞等部基本上歼灭了，故在第二年内敌人的非正规军将级军官便较少了。

缴获主要武器，第一年各种枪枝三十八万九千枝、各种机枪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七挺、各种口径炮六千一百六十六门。第二年与第一年相较，各种枪枝增多十五万四千三百一十枝，各种机枪增多九千零七挺。各种口径炮增多二千七百五十四门，仅六零炮即增多七百四十四门。缴获弹药，第一年缴获各种炮弹四十三万一千发、子弹五千七百余万发、第二年与第一年相较，则各种炮弹增多四十余万发，子弹增多二千五百余万发。

第二号公报

解放区面积、人口、城市发展统计：

(一)第二年全年收复和解放面积十五万五千方公里，解放战争第一年度末解放区原有面积二百二十万方公里，现在解放区面积为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方公里。计东北解放区（包括冀察热辽区）为一百四十八万九千五百方公里，华北解放区为二十三万方公里，西北解放区为二十二万六千七百方公里，中原解放区为二十三万七千四百方公里，华东解放区为十七万一千四百方公里。

解放区现有面积，与解放军所活动的二十二个省（即东北九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长江以南游击区未计入）的总面积共三百七十五万九千方公里相较，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六。

解放区现有面积，与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相较，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五。

(二)第二年全年解放人口三千七百万，解放战争第一年度末解放区原有人口一亿三千一百万，现在解放区人口为一亿六千八百万。计东北解放区（包括冀察热辽区）四千二百七十五万、华北解放区四千四百万、西北解放区六百九十二万、中原解放区三千

万、华东解放区四千四百三十三万。

解放区现有人口，与人民解放军所活动的二十二个省的人口（共二亿六千五百万）相较，解放区人口占百分之六十三。

解放区现有人口，与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相较，解放区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七。

（三）第二年全年收复与解放城市一百六十四座，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度末解放区原有城市四百二十二座，现在解放区城市为五百八十六座。计东北解放区（包括冀察热辽区）一百八十六座、华北解放区一百七十六座、西北解放区七十七座、中原解放区七十二座、华东解放区七十五座。

解放区五百八十六座城市中，计特别市、省会、省辖市、县城（以旧有县城为准，不包括解放区新设县治的市镇）共五百七十九座（包括东北哈尔滨特别市，东北之北安、呼伦、牡丹江、吉林、齐齐哈尔、佳木斯、安东、四平街八个省会及辽宁之鞍山、营口，河北之石门市，山东之威海卫市、潍县，河南之洛阳等）及辽北之梅河口，热河之北票，山东之龙口、周村、张店，山西之运城，河南之漯河等重要市镇七座。

解放区现有县城以上城市（五百七十九座），与人民解放军所活动的二十二个省的城市（一千零七十一座）相较，解放区城市占百分之五十四强。

解放区现有县城以上城市（五百七十九座），与全国县城以上城市（二千零九座）相较，解放区城市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

(四)解放区现有面积、人口、城市，与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时相较，则面积比停战时的二百三十九万一千方公里尚少三万六千方公里，因为在察、绥等省所失面积，尚未全部恢复；人口则比停战时的一亿四千九百万增加一千九百万，因为在第二年内所发展的豫、鄂、皖等省的人口，较尚未恢复地区的人口大为稠密；城市比停战时的五百零六座则增加八十座。

第 三 号 公 报

敌我兵力损失比较：

(一)我军全年负伤三十二万五千三百人，阵亡八万二千三百人，伤亡共计四十万零七千六百人，被俘五千三百人，失踪四万人。总计我军损失兵力四十五万二千九百人。但负伤数中约四分之三伤愈归队，故损失数应减去约二十四万人，实际损失只约二十一万二千九百人。

(二)我军全年毙伤敌军五十四万零二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三二比一；全年俘虏敌军九十五万三千人，敌我被俘相较为一七九点八比一；全年共消灭敌军一百五十二万一千四百人，敌我兵力损失相较为三点三五比一。但实际比率当超过此数，因敌军受伤后治疗既差，逃亡又重，伤愈归队者占极少数，而我军伤愈归队可达伤员四分之三，两相比较，比率当大过三点三五比一。

(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伤亡共三十三万六千人，被俘二千五百人，失踪一万九千五百人，合计三十五万八千人，内伤愈归队者约二十万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两年中，我军伤亡共七十四万三千六百人，被俘共七千八百人，失踪共五万九千五百人，合计八十一万零九百人，内伤愈归队者约四十四万人。

（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年中，我共毙伤敌军九十六万六千二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二九比一；两年我共俘敌军一百六十三万人，敌我被俘相较为二零八比一；两年我共消灭敌军兵力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四百人，敌我兵力损失相较为三点二五比一。若除去双方伤愈归队人数，则敌我损失比率，当大过此数。

（五）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两年中，我军伤亡为我军兵力总损失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被俘为总损失的百分之零点九六，失踪为总损失的百分之七点三四。两年敌军伤亡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被俘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七，起义者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一点七。敌军损失中的大部分为被俘，而被俘敌军的大部分（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又已加入我军，此外并有起义加入我军的部分，我军得此补充，即足以抵消全部损失而有余。

（转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六月战绩公报

第一号公报

消灭敌军兵力及缴获：

（甲）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战绩：

（一）歼敌营以上部队，正规军：一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三个兵团部、三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六十个军部、一百七十八个整师、九个师部、一百三十三个整团、一百一十九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万一千三百六十人，毙伤其四十七万六千三百五十人，合计一百九十一万七千七百一十人。非正规军：三十五个整师、四个师部、一百一十五个整团、一百零二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人，毙伤其九万五千二百六十人，合计四十八万七千九百一十人。

（二）敌军投诚部队，正规军：一个兵团部、四个军部、十七个整师、十个整团、八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十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人。非正规军：三个整师、二十八个整团、十九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八万一千四百一十

人。另敌海军反正之舰艇三十二艘。

（三）敌军起义部队，正规军：一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三个军部、十六个整师、五个整团、十一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人。非正规军：一个师部、十四个整团、四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一万六千零八十人。另起义飞机十九架，舰艇二十九艘。

（四）接受我军改编之敌军部队，正规军：一个战区总部、二个兵团部、十个军部、二十九个整师。共二十四万一千人。非正规军：三万人。

（五）以上四项合计，敌军共损失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六个兵团部、三个“绥靖”区司令部、二个整编军部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七十七个军部、二百四十个整师、九个师部、一百四十八个整团、一百三十八个整营。以上除军以上指挥部独立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三百零三个师又二个团二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二百四十三万四千六百人。非正规军：三十八个整师、五个师部、一百五十七个整团、一百二十五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三百零七个团又一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六十一万五千四百人。总计敌军损失三百零五万人，内被我俘虏一百八十三万四千零一十人、被我毙伤五十七万一千六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人、起义者十三万零六百人、接受改编者二十七万一千人。

（六）向我投诚及被俘毙敌高级军官七百一十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四名，内正规军一百零六名，非正规军二十八名；被俘虏五百六十二名，内正规军四百九十三名，非正规军六十九名；被击毙十四名，内正规军十三名，非正规军一名。

（七）缴获：大小炮二万九千五百六十二门，计榴弹炮四百一十九门、野炮四百零七门、山炮一千一百五十八门、加农炮二十七门、高射炮一百五十五门、平射炮七十三门、战防炮七百七十七门、步兵炮二百四十五门、机关炮一百四十二门、重迫击炮六百三十四门、轻迫击炮五千三百九十六门、六零炮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五门、五零小炮四千八百三十六门、火箭筒一千二百零一个、其他炮一百零七门；掷弹筒八千六百零四个、枪榴筒七千七百五十五个、火焰喷射器一百五十三具；各种机枪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挺，计重机枪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四挺、轻机枪七万六千二百九十七挺、手提冲锋机枪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五挺、高射机枪一百零九挺；各种枪枝一百零七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枝，计步、马枪一百零一万九千七百九十四枝、短枪五万三千一百三十三枝，战防枪三百九十枝；飞机一百二十一架（包括起义的十九架在内）；舰艇八十九艘（包括起义、反正之六十一艘在内）；坦克四百六十四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汽车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八辆、机车八百一十四辆；马匹六万六千一百三十八匹；电台二千零十二部、报话机三百五十二部、电话机一万四千六百零五部；各种子弹二亿三千八百九十二万零一百发、各种炮弹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发、手榴弹二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二十枚、炸药一百一十万零二千二百七十斤。另击毁飞机三十一架、坦克七十九辆。

（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

（一）消灭敌营以上正规军：二个战区总部、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一个“绥靖公署”、十七个兵团部、三个“绥靖”区司令部、四个整编军部（内三个兼整编师部）、一个边区司令部、一百零六个军部、三百三十六个整师、二十二个师部、三百三十八个整团、四百七十五个整营。除军以上指挥部独立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四百九十五个半师。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四百一十五万零六百五十人。非正规军：五十五个整师、六个师部、四百零五个整团、三百五十一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六百六十三个团又三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一百五十四万零七百五十人。总计共消灭敌军五百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人，内俘虏三百四十六万四千零一十人，毙伤其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人，向我投诚者二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人，起义者十七万五千八百人，接受改编者二十七万一千人。

（二）向我投诚及被俘毙敌高级军官一千一百二十八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四名，内正规军一百零六名，非正规军二十八名；俘虏九百二十七名，内正规军七百二十八名，非正规军一百九十九名；击毙六十七名，内正规军四十五名，非正规军二十二名。

（三）缴获：大小炮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八门、掷弹筒一万六千零八十三个、枪榴筒一万零五百一十三个、火焰喷射器一百九十七具、各种机枪二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六挺、各种枪枝二百万零五千六百二十七枝、飞机一百三十四架、舰艇一百二十三艘、坦克五百八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汽车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辆、机车一千零一十三辆、各种子弹三亿七千九百四十万零八千四百发、各种炮弹三百一十一万零一百二十发、手榴弹三百零四万四千七百四十枚、炸药一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斤。另击毁飞机一百六十九架、坦克一百五十六辆。

第二号公报

解放国土面积、人口、城市、铁路统计：

（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解放国土面积六十万零七千六百方公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国土面积六十七万七千方公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面积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八百方公里。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九十六万二千八百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点八七。

全国三十六个行省（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前旧区划为准，包括西藏地方在内）中，全省解放者有黑龙江、嫩江、合江、松江、兴安、吉林、辽北、安东、辽宁、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十七省，大部解放者有陕西、湖北、浙江等三省，一部解放者有绥远、宁夏、甘肃、江西、福建、广东、云南等七省。

（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解放人口一亿一千一百一十六万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人口一亿四千三百二十万零七千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人口一亿三千六百零六万七千人。解放区现有人口二亿七千九百二十七万四千人，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七八。

（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解放县以上城市（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前敌人原有的为准，以下同）四百八十二座、重要港口及市镇七座；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县以上城市五百九十七座、重要港口及市镇十一座。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县以上城市四百六十四座、重要港口及市镇三座。解放区现有县以上城市一千零六十一座、重要港口及市镇十四座；解放区现有县以上城市，占全国县以上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八一。

解放区现有一千零六十一座县以上城市中，内特别市九座（即北平、上海、青岛、南京、汉口、西安——兼省会——、天津、沈阳——兼省会——、哈尔滨），占全国原有十一座特别市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八；省会二十一座（即北安、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海拉尔、吉林、四平街、安东、沈阳——特别市兼——、承德、张家口、保定、济南、太原、西安——特别市兼——、开封、合肥、镇江、杭州、南昌、武昌），占全国原有三十六座省会（包括一个地方首府——拉萨）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三；重要海港十二座（即安东、营口、葫芦岛、秦皇岛、塘沽、烟台、威海卫、青岛、连云港、吴淞、宁波、温州），占全国原有二十五座重要海港的百分之四十八。

（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解放铁路八千八百三十五公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共解放铁路一万一千五百零三公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解放区原有铁路一万零一百七十九公里。解放区现有铁路二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公里，占全国铁路二万六千九百二十二公里的百分之八十点五三。解放区现已通车铁路为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五公里，占全解放区现有铁路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六。

第 三 号 公 报

敌我兵力消长及损失比较：

（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敌军全部兵力为四百三十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一百二十万人，敌我相较为三点五八比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度末，敌军全部兵力为三百七十三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一百九十五万人，敌我相较为一点九比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二年度末，敌军全部兵力为三百六十五万人，我军全部兵力为二百八十万人，敌我相较为一点三比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末，我军全部兵力为四百万人，敌军全部残余兵力为一百四十九万人，我与敌军相较为二点六八比一。

（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我军负伤三十九万七千四百人，阵亡九万二千六百人，伤亡共计四十九万人；被俘二千六百人，失踪十二万九千四百人。总计全年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六十二万二千人。

（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共毙伤敌军五十七万一千六百一十人，我军伤亡四十九万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一六比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共俘虏敌军一百八十三万四千零一十人，我军被俘二千六百人，敌我俘虏相较为七百零五点三八比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六十四万四千三百八十人，我军无此项损失。总计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敌军共损失三百零五万人，我

军共损失六十二万二千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较为四点九比一。

（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我军共负伤九十八万九千七百人，阵亡二十四万三千九百人，伤亡共计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人。被俘一万零四百人，失踪十八万八千九百人。总计三年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人。

（五）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共毙伤敌军一百五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人，我军伤亡一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人，敌我伤亡相较为一点二四比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共俘虏敌军三百四十六万四千零一十人，我军被俘一万零四百人，敌我俘虏相较为三百三十三点零七比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敌军投诚、起义及接受改编者，共六十八万九千五百八十人，我军无此项损失。总计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中，敌军共损失五百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人，我军在作战中共损失兵力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人，敌我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相较为三点九七比一。

（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我军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内，伤亡占百分之八十六点零九，被俘占百分之零点七三，失踪占百分之十三点一八；敌军在作战中兵力总损失内，伤亡占百分之二十七点零二，被俘占百分之六十点八六，向我投诚、起义及接受我改编者，共占百分之十二点一二。

（转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战绩公报

（一）歼灭敌军营以上部队：正规军——二个军政长官公署、四个“绥靖公署”、一个长官司令部、十个兵团部、五十个军部、一百四十九个整师、五个师部、五十个整团、四十二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正规军七十二万九千七百四十人，毙伤者九万八千五百二十人，合计八十二万八千二百六十人。非正规军——二十七个整师、三个师部、六十个整团、十四个整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俘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三千人，毙伤者七万四千七百八十人，合计四十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人。

（二）敌军投诚部队：正规军——一个军政长官公署、一个警备总部、一个军部、十个整师、二个整团、四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十一万四千三百人。非正规军——八个整师、三十一个整团、二十一个整营。连营以下投诚部队计算在内，共二十七万六千四百三十人。另敌海军舰艇向我投诚六艘。

（三）敌军起义部队：正规军——三个“绥靖公署”、一个警备总部、八个兵团部、二十五个军部、七十四个整师、一个师部、二十一个整团、五个整营。连营以下起

义部队计算在内，共四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人。非正规军——十三个整师、十一个整团、三十二个整营。连营以下起义部队计算在内，共二十三万四千八百九十人。另起义飞机五架、舰艇十八艘。

（四）接受我军改编之敌军部队：正规军——一个军部、三个整师、共一万三千人。非正规军——一个整团又二个整营，共九千零三十人。

（五）以上四项合计，敌军共损失正规军：三个军政长官公署、七个"绥靖公署"、二个警备总部、一个长官司令部、十八个兵团部、七十七个军部、二百三十六个整师、六个师部、七十三个整团、五十一个整营。除军以上指挥机关另行计算外，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三个团折合一个师，则上述兵力等于二百六十六个师、一个团又三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一百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二十人。非正规军：四十八个整师、三个师部、一百零三个整团、六十九个整营。以四个营或一个师部折合一个团、一个整师折合三个团，则上述兵力等于二百六十七个团又一个营。连消灭营以下兵力计算在内，共九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人。总计敌军损失二百三十七万九千九百五十人，内被我俘虏者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人，被我毙伤者十七万三千三百人，向我投诚者三十九万零七百三十人，起义者六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人，接受改编者二万二千零三十人。

（六）向我投诚及被我俘虏与击毙之敌高级军官五百四十名：计投诚者一百三十九名，内正规军六十名，非正规军七十九名；被俘虏者三百八十三名，内正规军二百一十三名，非正规军一百七十名；被击毙者十八名，内正规军十名，非正规军八名。

（七）缴获：大小炮九千七百八十二门，计榴弹炮五十九门、野炮一百零二门、山炮二百三十四门、步兵炮六十八门、平射炮二十二门、高射炮五十二门、战防炮一百九十一门、机关炮四十九门、轻迫击炮二千六百八十三门、重迫击炮七十六门、六零炮五千四百三十四门、五零炮五十四门、火箭筒四百二十二个、其他炮三百三十六门；各种机枪六万六千零八十二挺，计重机枪七千四百三十二挺、轻机枪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三挺、冲锋机枪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四挺、高射机枪一百零三挺；各种枪枝一百一十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五枝，计步马枪一百零七万七千七百零一枝、短枪七万八千三百零三枝、战防枪二百八十一枝；掷弹筒五千三百七十九个、枪榴筒四千六百七十八个、火焰喷射器三十一具；飞机五十五架（内包括起义的五架）；舰艇七十七艘（内包括起义的十八艘投诚的六艘）；坦克四十辆、装甲车二十八辆；机车三辆；汽车七千一百六十五辆；骡马六万三千七百三十六匹；各种子弹一亿二千八百五十七万六千二百九十发、各种炮弹二百四十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发、手榴弹五十九万一千零五十发、炸药二十一万三千零十斤；电台一千一百八十二部、报话机四百九十二部、电话机九千二百四十二部。另被我击落敌飞机二十一架，击毁敌军舰九艘。

（八）共解放国土面积五百五十三万二千七百方公里，人口一亿八千二百八十一万八千，县以上城市九百七十座。

（九）我军在作战中负伤者五万九千二百人，阵亡者一万九千九百人，被俘者三千三百人，失踪者七千二百人，共计八万九千六百人。敌军损失兵力二百三十七万九千九

百五十人。敌我损失兵力相较为二十六点五六比一。

（转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无可奈何的供状

——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新华社社论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五日发表的名为“中美关系”的冗长的白皮书和其他有关的资料，其主要内容现在已经为中国人民所知。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

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的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根据这种希特勒主义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究竟是“为了什么显见的理由”呢？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反动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较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的援助，等于这个反动政府的“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美国政府究竟是为着什么奥妙的“友谊的”目的，“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一个反动的而且本身已经“丧失了斗志”的军队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给了它的“军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战争的方法（记着：这在美国政府就叫做“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力求避免内战的发生”！）“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结论：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看来毫无理由地援助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动政府及其反动军队，来进攻中国的拒绝支持反动统治的广大人民，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专横地干涉中国内政，以便用军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诺式的卖国傀儡政府。难道除此以外，还有任何别的解释吗？

白皮书徒然地伪善地说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谊。这种友谊确是存在的，而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因为美国人民没有侵略中国的动机

和必要，并且曾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民作了令人永志不忘的互相援助。至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艾奇逊也不能不承认这是美国人民所“显然不会允许”的。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美国今天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干涉，则“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多奇怪！如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确是抱着友好态度，为什么扩大这种友谊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如果美国政府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国人民反对的恶政府），就会引起这种友谊的一方的愤慨和他方的谴责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谊，而只是令人愤慨和必须谴责的侵略野心吗？既然如此，难道规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日本侵略者不占领延安和重庆而停止在黄河东岸和贵州南部），就会叫人们停止愤慨和谴责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们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结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们自己。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又是怎样规定自己的侵略的范围和广度的呢？帝国主义者按照独占资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扩张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么止境，决不是因为畏惧人们的愤慨和谴责，愤慨和谴责的记录难道不是已经堆积得比白皮书还要厚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关于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得到什么结果，艾奇逊写道：“我们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们抵抗。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果也没有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亦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看吧！这就是美国的贪得无厌的，但是终于失败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状！只有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将帝国主义彻底地打败和打倒，帝国主义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后，帝国主义这个厌物就被消灭了。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国是就此干休了吗？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野心仍然是没有止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帝国主义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利用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兵一卒或一个特务分子存在，美国政府就决不会中止加以利用。同一个艾奇逊在一个月以前，在七月六日还声明：“美国正向国民党中国输送它现在确能办到的一切经济援助。”但是即令对于国民党的心是死了，美国政府对于继续干涉和侵略中国，继续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心，却是不会死的。艾奇逊已经明目张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内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经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艾奇逊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发表专门声明，提出他的所谓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些原则不用骗术而用科学加以解释，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径，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与自由，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经济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反对任何一个不服役于美国独占资本利益之政权。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以平等友好态度援助中国。（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其他殖民于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参照有关各国在整个远东之局势，咨商将有助于各该国在远东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特权之办法。（五）美国将强迫

联合国达成上述目标，特别是有关维持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为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视中国人民到底。

中国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从没有派一个兵或一个顾问，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干涉该国“内部势力”的发展，去支持该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然而美国帝国主义却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干涉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强迫中国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服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因此，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因此，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美国白皮书在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布了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荒谬的恶毒污蔑，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国内和平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与此同时，则竭力冲淡国民党的罪恶，并将美国侵略者在白日梦中所描绘的比国民党有用些的某种新工具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这些奇谈简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驳。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相，就已经被许多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包括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物，报告给美国人民了。艾奇逊断言，“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艾奇逊在这里的头脑，似乎还有些清醒之处。但是他接着断言，世界忽然大变了，这些严肃的抵抗者们自己忽然“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了；过一会儿（大概是一分钟），中国人民又忽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而是“显然地认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国家性”了；倒是美国政府所努力帮助其恢复“主权”的国民党，被公认为“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国人民老实不客气地指明这个外国帝国主义，首先就是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国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这就是苏联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艾奇逊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中国内战双方

的“军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供给的。那末，关于谁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问题，究竟是因失败而昏迷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看得清楚些呢？还是有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立场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些？毫无疑问，艾奇逊尽管自己欣尝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却决不能使世界信服，决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对于客观真理的坚定信念于万一。

美国白皮书也攻击了国民党，其目的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美国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观态度。但是白皮书是为什么而攻击国民党呢？这是侵略者对于他的走狗的攻击，犹如日本侵略者对于汪精卫的攻击。正如艾奇逊说，攻击了国民党的魏得迈的报告，仍然是“对国民政府的各项问题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满，因为国民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国主义援助归于无效，致使帝国主义利益归于灭亡。严格地说，美国侵略者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一，国民党的反动无一不因美国政府“援助与鼓励”而加深，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与鼓励”，国民党是不敢惹出这样滔天大祸的；第二，国民党的腐败是随着它的反动而来的，并且这种腐败至少因美国的榜样而加深。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在本月十日说得对：“美政府指责中国（国民党）官员贪污舞弊，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但美国派来中国之人员，其贪污程度比诸中国官僚亦无不及。如战后之‘善后救济’事宜及近年之‘经济合作’等工作过程中，美籍人员之贪污舞弊事实诚不可胜数。”螃蟹责备它的儿子横行，沙士比亚喜剧中的丑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镜子里的尊容难看，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意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艾奇逊说：国民党的“貌似强大的力量是弱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确。可是必须补充，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以及任何国家的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们的暂时的猖獗的基础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准确些说，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国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因此，美国政府仍然要在中国国内外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人民的庄严美丽的祖国，来捣乱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来捣乱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国事变中真正得到了教训的首先是中国人民自己。我们相信我们的曾经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强的，因为我们的力量生根在中国人民中间，同时也生根在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中间。我们既然战胜了为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能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

（1949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附〕艾奇逊为编纂《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

为遵照你的愿望，我已编纂好我们对华关系的纪录，尤其着重过去的五年。这个纪录已予公布，且因此将到达美国国会与美国人民手中。

这个编纂品虽然篇幅浩瀚，但它只能包括中美关系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美关系曾牵涉到政府许多部门和组织。那段时期内的整个历史纪录的编纂工作，并不能说已经完成，由于目前一般人之密切注意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等到根据国家军事部门，财政部、租借总署、白宫的档案和其他官方纪录，作一完全之分析后，才发表这个纪录。然而我已指示那些负责编纂这个文件的人，提出一个纪录，这纪录将表明在这个期间决定我们对华政策和反映执行这个政策的显著的事实。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时期中，极端复杂的问题的坦白纪录，而对于这个大国，美国早就有着最亲密友谊的联系。（编纂这纪录时）没有一个可用的项目，因为其中含有批评我们的政策的语句，或可能成为将来遭受批评的基础而把它省略掉。我们制度固有的力量，是政府对于有识见又好批评的舆论之感应性，正是此种有识见又好批评的舆论是极权政府，不论右派或共党，所不能忍受且不宽容的。

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尽管距离及背景上的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但结合中美两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联系，常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加强。这种友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的种种事实予以证明的。诸如利用庚子赔款供中国学生的教育费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的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及战后的广泛对华援助等。这个纪录证明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种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在编纂此种纪录时，为尊重事实真相计，以致必须公布种种事实，因而揭露该国不幸的局面，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然而我并不认为由于这种原因便可以中止公布。

阅读这个纪录时，应该注意到各项事件发生时的环境。例如我们必须记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过程内，在打击德国和意大利的努力中，我们是和苏联结成同盟的，并且我们当日的政策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在战争之进行具有真正价值的时候，使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在这时期，对军事的考虑，自然要超过对所有其他问题的考虑的。我们在远东最急切的目的，便是击败共同的敌人，并保全我们将士以及我们战友的生命，中国人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循依任何其他的途径，则我们当已不能履践我们明示的责任。

对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中，正如同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年一样，我们最恳切的愿望，在于协助中国人民获致和平、繁荣与内政上的安定，军事考虑则在其次。为促进这些目的，我们政府所采取的决定与行动，不得不以当时所能获得的情报为根据。在这段可悲的

整个期间，我们充分地理解到美国的物质援助，军事与技术援助，以及善意不论如何丰富，她们本身却不能使中国站立起来，究极言之，只有中国本身才能够使她自己自力更生。

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党曾企图用制定许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以谋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律中有的失败了，另外则遭忽视。国民政府今日所面临之难境，大部分正为了它不能以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民食，中共宣传的大部分，就是由他们将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所组织成。

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西方以及西方观念给予中国的影响。三千余年来，中国人发展他们自己的高度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势力的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制压镇服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在十九世纪中叶，这座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为以前的外国侵入者所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因为这些性质，一部分因为满清统治的衰微，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骚乱和社会变革方面占了一种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纪初，人口过剩和新观念的联合力量，发动了那一连串的可以称为中国革命的事件，这是在有纪录的历史中最震骇的革命之一。它的结果和后果，现在还仍有待于预测。从这个革命的漩涡中出现了国民党，最初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后来以蒋委员长中正为领袖，负指导革命之责。国民党的领导权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二十年代初期在苏联革命的观念形态的影响下组织的。我们应当记得，苏维埃之理论与实际，对于孙中山先生之思想与原则，尤其是经济方面与党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应当记得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那年，第三国际要求在政府和军队里占据一种优越位置。是这个要求，促成了国共分家。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间的历史中，大部分的史实，是国民党与中共间的争权，而后者显然居于下风，进行一种无希望获胜的战斗。在这一期间，国民党在努力统一国家，并在建立国家财政经济实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九年）这十年的某一段期间，国民党失掉了当初创立该党的动力和革命热情，而在中共方面，这种热情成为了一种狂热。

也许主要因为中国（建设），获有进步，日本选择了一九三七年为征服中国本部的出发点，而驱逐一个残忍的可恨的侵入者，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目标。战争初期，中国人民之抵抗日本，博得全世界爱好自由人士，对中国人民表示无限的钦佩。中国的抗战，一直到一九四〇年，并未得到大量的外力援助。这些年战争中，至可悲痛的一件事，在于物力与人力受到重大的破坏，以至毁灭了一大部分的、正在抬头的中等阶级，而这个阶级在历史上曾为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骨干与中心。

对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中共领袖间之利害不同，与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是背道

而驰的。至四十年代初期，事实趋于显明，政府领袖和共党领袖一样，仍然专心于内部之争权，正如他们之专心于对日战争一样。自从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深信日本终将被击败，并看出有一个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以和中共作最后决斗。共产党方面，在中国的混乱中，似乎看到一个机会，去控制全中国，而这种机会，是抗日战争前他们所不能获得的。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之部分瘫痪，大部分是由于这种争权。

正在此点上，美国对华政策上两个基本原则——不干涉中国内政，以及支持中国之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其中之一，也与盟国对日战争之基本利害冲突。一九四三年与一九四四年间估量，除非中国人能把比较大的统一的对日抗战的利害关系，放在他们的内争的利害关系之上，中国的抵抗，或将成为完全无效。日本可能于对日战争的结果还不能分明之前，在中国夺去盟国的宝贵基地、作战据点和人力资源。在此种情形之下，并鉴于作战上的最高需要，而此时中国的利害和我们的利害，同样悬于此次大战的结果，因此传统的对华政策的原则，不得不改变，以适应一个新的前所未遇的局势。

珍珠港事件后，我们扩充了早在一九四一年在租借法案下所创始的军事经济援助计划，租借法案援助计划，详见本书附件第一章里的援助计划项下。它的量远较我们所希望的为小，因为在这世界规模的战争中，各战场对美国都有巨大的要求。又因为对中国运输困难，当时中国的港口已悉数被敌人占领，虽然如此，租借法案计划下运华物资的数量，还是相当大的。

我国政府派往中国援助推行战争的代表，军事的与非军事的，不久就发现了正如前面所述的，在这个长期斗争中，已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经济上削弱了中国政府，而且在政治上和士气都受了影响。从美国军事和外交官员的报告中透露出来，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间，使人愈来愈深信，政府与国民党显然已失掉在抗战初期使他们赢得人民忠诚的宛如十字军的热诚精神。据许多观察家的意见，他们已经日趋堕落腐败，沉醉于夺取地位、权利。日渐趋于依赖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和保留他们在国内的优越地位。当然，中国政府一向是一党政府，而不是在西方意义下之民主政府。战争的压力与紧张，现在已迅速地削弱了它所已有的自由分子，而增强与过去军阀无法区别的反动分子的权柄。中国民众对于政府的信心，也就逐渐在消失之中了。

在我们看来，显然只有一个新生而进步的中国政府，才能重新获得人民热诚的拥护，才能有效地和日本作战。美国官员曾屡次把他们对这种情势的关切，提供给蒋委员长注意，他也屡次向他们保证，将予以纠正。可是他很少或者并未作有效的努力去纠正，并渐渐闭门不纳那些向他作逆耳忠告的中国官员。若干美国观察家（本书附呈的纪录中也引用了他们的报告）除了关切中国中央政府这种颓废对作战必有的影响而外，他们还关切国民党的这种每况愈下势必影响到它最后与中共政治或军事的斗争。他们在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便担心国民政府设若如此自绝于国人，自己脱离人民，则在战后竞争权力时，恐即无力维持其权力。尽管如此，我们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倾全力援助国民政府。

当然，这是联合从事对纳粹德国之战，美苏间虽产生某种程度之合作的时期，罗斯

福总统决计尽力把这种在战火中锤炼出的合作延续到战后。举世人民既厌倦于战争的暴行恐怖和堕落，也有此愿望。一直到战后数年中，才证明世界同盟中一大盟友，即使过去确曾为（合作努力）的，现在似已不再追求这个目标了。

一九四四年赫尔利少将被罗斯福总统派赴重庆时，他发现国民政府和中共双方都具有他所认为的一种意愿，愿撇开他们之间的歧见，共同合作努力，为此，他们也曾不断作过零星的尝试。

前此及后此，斯大林元帅都曾向赫尔利将军保证，除了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而外，苏联无意承认任何在华的政府。可以注意的是，大战最后数年及其后一个时期中，斯大林元帅曾向美国官员重申这意见。他和莫洛托夫曾表示，中国应视美国为其援助的主要可能来源。斯大林所表示的这种情绪，大部分包入于一九四五年的中苏条约中。

由于与苏联的战时合作及代价高昂的对日战争，遂产生了雅尔达协定。美国政府与人民都以异常焦灼的心情，等待对日本本岛的攻击，这场攻击恐怕得以死伤达一百万美国兵员的代价，才可把日本征服。那时原子弹还未成事实，若不作此攻击，远东战事，似无结束可能。因此，如何使苏联能早日及时参加对日之战，便成了美国政府当务之急了。因为这样才可使满洲日军，不致在战争的严重关头，调回日本本国。美国政府不仅认为苏联参战，在所必须，并且必须在我们进攻前加入。我们已决定一九四五年秋天发动攻势了。

斯大林元帅在雅尔达不仅同意在欧战胜利日后二三月内进攻日本，并且将其关于满洲的“价钱”，实质上只限于一九〇四年以前俄国在那里所占有的地位。在我们这方面，为了取得这一许诺，使战争得以结束，以拯救美国、中国及其他盟邦人民的生命，准备而且已经付出了这笔必要的代价。可是在这方面，有二个事实不可忽略。第一、在苏联最后果真参加对日之战时，则在任何情形下，不管我们的态度如何，她都可能占据谈到的一切领土，以至更多的领土；第二、苏联方面，由雅尔达协议而缔结的中苏条约中，同意予国民政府以道义的及物资的支援，且正式以条约的方式，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后来虽因日本抵抗的崩溃，出人意外地早，使雅尔达协定中若干条款，看来并无必要。但就当时所预测的战争过程看，则这些条款不仅合理，而且显然是对我们有利的。雅尔达协定及随之而来的中苏条约，虽出于军事必需而缔结，但事实上是对苏联在任何情况下所能采取的行动，加以限制了。

为了军事安全的理由，也仅是为了这些理由，美国政府当时认为，若与国民党政府咨商雅尔达协定事宜，或立刻把协定条款通知重庆，都太危险。那时我们正进行太平洋战争，觉得若在这时把秘密情报拍往国民政府首都，有几乎立即被日本人得到的严重危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理由去招惹与安全有关的危险。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授权赫尔利将军，把这个协定通知蒋介石。

一九四五年七月，中苏两国遵照雅尔达会议上苏联同意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的协议，开始在莫斯科谈判。谈判过程中，美国觉得须提醒双方缔结该约的目的，是实行雅尔达协定——不多也不少——以及苏联的若干提议，已超过协定条

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订，国民党中国和美国都普遍表示满意，认为苏联接受了对其在华活动的确切限制，并承诺一切援助不给予中共。可是是年九月十日，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却警告我们，不要过份相信苏联会遵守该约的精神或字面。苏联政府以后在东北的举动，充分证明这个警告具有理由。

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一妥协，以避免内战。

第一种抉择，无异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努力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与我们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我相信当时美国的民意也有如此的感觉。第二种抉择，在理论上可能迎合人心，但是事实上是不能实行的。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党。大战后，如前所述，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不得民心，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过去任何时期为强大，且已控有华北的大部分。由于国民党部队的无效能，这点后来已表现出来，令人慨叹不已，也许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能逐走共党。美国人民显然不会认可我们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后肩负如此巨大的义务的。我们因此只有走上第三种抉择，在这政策下，面对现实，企图协助拟定一个暂时性的协定，以避免内战，并保持甚至增加国民政府的势力。

一如纪录所示，在赫尔利将军使华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即已经采取步骤，希望和共产党成立协议。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蒋委员长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词时便说："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共产党问题是一个纯粹政治问题，而应该循政治的途径，以谋解决。"其后他曾迭次重申这一观点。国共代表之间商讨军事合作与民政问题的综合性谈判，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便在西安开始。后来从一九四四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赫尔利大使是应两方面的邀请，参加协助其事的。谈判继续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终没有获得最后的结论。而在赫尔利大使离华以后，马歇尔元帅来华以前，即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获得了一串对于原则上的综合性协议。惟同时双方部队的冲突，有增无已，并危害协议的执行。除非谈判很快的达到成功的结论，普遍内战的危险是十分急迫的。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马歇尔元帅于一九四五年底首途使华。

诚如本书第五、第六两章中关于马歇尔使华及其以后几年的事实叙述所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针对着两个目的而进行的。一个目的是在使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而前进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它的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中共拒不接受凡足以削减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的各种条件，即拒绝接受防碍中国赤化自由的条件；国民党方面，则迷恋一个错觉，不顾及美国军事代表迭次所作的相反建议，意味用武力可以摧毁共产党。

至于第二个目的，援助国民政府，是我们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所力予推行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友邦已经获得承认的政府，我们的友谊以及我们根据国际法的权利，都要我们以援助给予政府，而不给予企图倾复与推翻此一政府的共产党。我们援助

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的程度，详见本书附录中的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章，固勿须在此赘述。从一九四五年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备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始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一大部分，直到马歇尔将军于一九四七年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表面上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一般的基础之上的。

危机发展于满洲的四周，该处是俄国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的传统上竞争的焦点。斯大林元帅曾在多次场合确切表示，他期望国民政府来接收满洲的统治权。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的停战协定内，中共同意为了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由政府的部队开入满洲。按照这一谅解，美国运送了相当庞大的政府部队到满洲进口处的各港口。在此以前，苏军曾表示将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内撤出满洲。可是后来又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多留了两三个月。当苏军真正开始撤退的时候，国民政府发现自己有着漫长的交通线，有限的火车车辆和不够充分的部队，这些部队实不足以及时接收撤退下来的地区。以阻止已经占领着乡村的中共部队的进入。当共产党进入之时，他们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大量物资，这些东西，是苏军方便地加以放弃的。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国民政府发动了一连串军事行动，将其所驻有的界线推进到松花江。在这些军事行动将告结束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华北境内也开始了战事行动，终于把共产党占领的区域予以缩紧。

一九四六年春，马歇尔元帅企图恢复和平，这种努力历时几个月之久。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一连串好似永无底止的建议案和反建议案相继提出。这些建议并未中止军事行动，同时也没有获致政治的解决。在这些谈判当中，马歇尔元帅显示出他无限的忍耐力和机智。为了达到协议，不惜一而再，再而三，作尝试，以期达到协议，然而他逐渐深信，两党间继续绵延的内战达二十年之久，而其领袖人物始终一样，已造成个人间深刻的偏激，与水火不相容的岐异，致使达成协议成为不可能。猜忌和缺乏信任已经无法补救，马氏于是相信双方仅是为了争取时间，为了争取军事地位而施用计谋，以暂时迎合他们所认为的美国人的愿望。马歇尔元帅最后获得结论，他赴华的目的没有实现的希望。

虽然在实际上马歇尔元帅在一九四六年秋撤回了他协助和平解决内战的努力，但他仍然在中国，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政府和共产党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曾是为了召开国民大会，替中国制订一部新宪法，并结束训政时期和一党专政时期的问题。共产党坚持军事问题必须先行解决，否则他们就不参加国民大会。蒋委员长则决定国民大会应予召开，计划应予实施。在一九四六年的最后几个月当中，马歇尔元帅希望，他留在中国，将鼓励中国非共产党区域的自由分子，较过去更有力地发扬他们的力量，并对反动分子和黩武分子所实施的专制，发生一种感化的发酵的作用。马歇尔元帅留在中国，直到国民大会完成了它的工作。虽然拟议中的政府新体制似乎还差强人意的，惟事实昭然，在力量的对比上，甚少改变。

马歇尔元帅在告别的声明中，宣布他终止协助中国恢复国内和平的努力。他认为国

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间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是求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他明白表示，拯救中国的机会是操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新制定的宪法，虽为一个民主的中国确定了它的体制，但双方在实际上所采取的实施办法，将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考验。他呼吁朝野的自由分子出面领导，他认为这样才能走向团结与和平之路。当发表了这一最后声明之后，他便回到美京华府，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就任国务卿新职。

总统（杜鲁门）鉴于急迫灾祸的迹象，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份，依照国务卿的建议，训令魏德迈中将前往考察中国的局势，并提出建议。魏德迈将军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提出的报告中，他建议继续并扩大其援助国民党中国之政策。但应基于下列几个条件：

一、中国将其要求援助的请求，告知联合国；

二、中国要求联合国促成满洲的停战，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的监护或托管之下；

三、中国应利用其本国的资源，改革其财政，改革其行政与军队，并于经济及军事方面，延用美国顾问人员。

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统治全部中国的危险。并对国民政府的各项问题表示同情。不过他列举了一大串的改革建议，在他看来，如果国民政府要复兴它自己，那么这些改革都是必要的。

我们决定，在那时候公布一个主张，把中国的一部分从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分割出来，并将那一部分置于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机构之下的建议，是没有什么裨益的。在本书所附的纪录内，关于魏德迈将军讨论中国局势的报告那一部分的全文，已收录于本书内，列为第六章附件。

中国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在所附纪录文件中，有相当详尽的叙述，这些失败都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我们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本书无法将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年头内的全部历史和发展，作同样详尽的叙述。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和国民政府有着正常的外交关系，有从我们驻在他们的领域内的各个代表获得大量报告的方便；但我们和共产党之间的直接接触，则主要只限于赫尔利将军和马歇尔元帅的调处努力。

我们政府充分察及中共各领袖在理想上是和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鉴于中国当日所存在的势均力敌的局面，我们的政府认为只有在完成某些条件时，和平方能建立起来。国民党必须把内部加以整顿，双方必须让步，以使中国政府能够名符其实地成为全中国的政府。并因而使各党派可在立宪的政府体制之内从事活动。国内的和平和宪政的

发展，都需要这个面临进行武装叛乱中的强大反对党的一党政府，迅速进步为一个有各党各派包括温和的非共党分子参加的真正全国性的政府体制。

这种条件都没有实现，国共双方虽然有着临时性的停战，以及进行显然很有希望的谈判，但国共双方的领袖们互不信任，成见太深，甚至无法获得最后的协议。此外，国民党曾于一九四六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中，最后更将摧毁掉国民政府。马歇尔元帅指出，国民党军队虽然能够在一个时期内，攻占共产党占领下的城市，但他们决不能摧毁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国民党部队的每一推进，都将使他们的交通线暴露于共产党游击队的攻击之下，并被迫撤退，或者连同美国所供给的军火投降。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量，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

美国无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对中国人民都维持着友谊与援助的传统政策。自从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以赠予和借贷的方式给予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援助总数约达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价值上等于中国政府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就国民政府的预算而言，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在比例上，较战后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除这些赠予和借贷外，美国政府曾以大量的军用与民用的战时剩余物资卖给中国政府，其采买原价总值在十亿美元以上，而通过协议，美国政府仅取得二亿三千二百万美元。然而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由于国民党领袖们在军事上之愚昧，他们的叛变投降和他们部队之丧失斗志，美国供给中国军队的军需品之大部分，已落入中共手中。

有人吁请再拿比较少数的援助——军事的与经济的——给予国民政府，能使国民政府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美国政府所获得的最可信赖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报告，并不证实此种见解的得当。

根据现实的情况，估量未来的中国，所得的一种结论，即美国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条路，是为一个已经失掉了它的人民的信心的政府，进行全面干涉。此种干涉需要化费更多的金钱，甚至比迄今为止无效果地用去的钱还要多，需要由美国军官指挥国民政府的军队，并可能由美国武装部队——陆、海、空——参加，因而发生战事。惟如此大规模的干涉，而且完全违反我们的传统政策，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必须坦白承认，美国的援助中国人民抵制受任何外国或者若干外国控制的政策，现在已面临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腹地，已在共产党人手中，共产党领袖已舍弃他们中国的遗产，而且已公开宣布他们附从于一个强国——苏联。这个强国在过去五十年来，在沙皇统治下，或在共党统治下，都一样的十分勤谨的努力于扩充它在远东的控制权。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的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艰厉的而于最后终获成功的抵抗。他们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们抗战，但是在这一次，外国之控制，遮掩在一个广大的热烈运动的外表后面，这个运动显然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是完全本地的和民族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援助一直无效。

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

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过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没有做的种种措施，也不会影响和改变内战的结果，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品，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即这个定局，只是因为未尽职责的结果。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应当面对一个事实上已存在的局势。如果把我们的政策建基于所愿望的想法，我们将不能帮助中国或我们自己。我们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中国庞大人口中的一主要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一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 一 切 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

然而在最近之将来，我们在执行我们对华友谊的传统政策方面，必将深切地受到目前发展的影响。中国人民认清共党政权并不为中国利益，而为苏联利益服役的程度，以及在辨明事实之后，对这种外来统治所生的反应，都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政策。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假若共党政权服膺于苏联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企图从事侵略中国的邻邦，则我们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势必遭遇一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面。

同时，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以我们自己之真诚，尊重宪章，我们之对华友谊，我们之传统支持门户开放，及中国独立领土主权完整为基础。

此致

总统

迪安·艾奇逊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于华盛顿国务院

（转自《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版）

中国人民怎样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反动派

（一九五一年七月）

朱　德

正当现在我们来纪念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三十周年的时候，中国革命已经获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中国人民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联合的反动统治，已被最后地推翻。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已经巩固地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是中国全部历史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继十月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改变整个东方与世界面貌的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大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并且震撼了整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阵营。

现在，来回忆一下中国人民怎样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最后取得了全国胜利的经过情形，是有意义的。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以伟大的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之后，独立地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十年的国内战争，创造了一支人民革命的力量及适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情况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又经过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年的抗日战争，进一步地发展并壮大了这一支人民革命的力量，并创造了约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与一百万的人民解放军，以及二百二十万的民兵。所有这些，就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美帝国主义所武装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人民迫切地要求维护和平，受过长期战争痛苦并为新的国内战争所威胁的中国人民，尤其迫切地要求实现和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地位的美帝国主义，却疯狂地进行着奴役世界的计划，以战争威胁着世界人民，并且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直接制造了战争。美帝国主义虽然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上同意了不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希望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但是在实际上，却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派遣了陆海空军与军事使团来到中国，盘据了全国多数战略要地，以大批的军事装备与战争物资供给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并以各种方法帮助在抗日战争中躲在远后方的蒋介石把他的大军开到沿海大城市和反人民内战的前线，以便经过蒋介石夺取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策动之下，全力奉行着卖国和独裁的反动政策。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反动集团，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们实现其反动计划的基本障碍，不消灭人

民解放军就不能实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独裁，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求国内和平的行为是软弱可欺的表现，认为数量较小、装备较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堪一击，而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援助的数百万的国民党军队则可以横行全国。因此，他们就决定在中国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仅仅为了取得时间准备这一内战，他们才暂时假装同意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地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以极大的努力领导着中国人民寻求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动员全党和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人民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在蒋介石坚决破坏和平时有准备地打败他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连续地发出了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多次号召；毛泽东同志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迫使蒋介石发布了停战令；召开了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有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并举手通过的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决议。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完全符合于广大人民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要求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场剧烈的斗争中采取了坚定的大公无私的正义立场，由于蒋介石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面前再三地暴露了他们的背信弃义，暴露了他们一手“调处”内战冲突，一手积极布置内战的阴谋诡计，所以广大人民得以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消除了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派的幻想。因此，当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觉得他们已经完成反人民、反革命大规模的内战准备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也就孤立起来，失掉全国人民的同情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初，蒋介石在美国大力援助之下，不顾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向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面的大内战。这个内战的初期的形势，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是严重的。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帝国主义竭力支持着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集团。蒋介石卖国集团当时有总兵力四百三十万，有由美帝国主义供应的价值六十亿美元左右的飞机、大炮、坦克等等近代装备与物资，有三亿数千万以上人口的统治区，有大城市和丰富资源，有近代工业与近代交通条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当时的兵力还不及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装备与资源更居劣势，解放区也还只有不及蒋介石统治区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素质及与人民的联系优于蒋介石之外，其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处于劣势。因此，蒋介石敢于在战争一开始就动用正规军一百八十万的兵力，声势汹汹，向东北、中原、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全面地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消灭人民解放军。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国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充分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一科学的分析与论断，一方面紧紧地团

结解放区的广大人民以及全国的广大人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来支援这个规模巨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另一方面，又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亲自规定的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指导路线，同时在军队中充分地实行了团结人民群众、团结官兵与瓦解敌军、改造俘虏等项革命的政治工作，所以我们就能从人民解放战争中不断地削弱国民党军而壮大自己，夺取国民党军的武装而武装自己。在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侵入我各解放区的战争初期，我们虽然丧失了很多城市和广大的乡村，但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军约为八个旅的有生力量。经过八个月，由于蒋介石兵力有很大削弱，就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全面进攻，而只能在战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举行所谓“重点进攻”。蒋介石用以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兵力约为其进攻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即六十个旅，而进攻陕北解放区的敌军则相当于当地人民解放军的十倍。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在每次作战时实行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的战略方针，而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迅速地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而且在此时期就在东北和华北战场上对蒋介石举行了局部的反攻。

到战争的第一年度结束，人民解放军已歼灭了敌人九十七个半旅，一百一十二万人，而使自己的正规军由一百二、三十万发展成为二百万。战争形势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丧失了巨大的有生力量的蒋介石卖国集团，不得不从战略的进攻转为战略的防御了。

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即由战略的防御转为战略的进攻。这是一个有关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全局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当时曾经宣告：“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在向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中，人民解放军大军南渡黄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打入了国民党的统治区，把战线伸展到长江一带。这就破坏了蒋介石以反人民内战毁灭中国人民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把革命的火焰引向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根据地，从而在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进了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同时，各线的人民解放军又于连续地歼灭国民党军之后，收复了东北、山东、陕北和华北等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并开始了对有十余万以至数十万人口的国民党强大设防城市举行胜利的攻坚战，每役歼灭数万以至十数万的国民党军。人民解放军在对国民党歼灭战中，不断地缴获了大量的近代化武器以增强自己的装备，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这就使人民解放军在以后的攻坚战和巨大的歼灭战中，能够以强大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体系，迅速完成战斗任务。在兵员补充上，人民解放军主要地依靠俘虏和投降过来的大批国民党军的士兵。他们出身于劳动阶级，经过教育改造，就可以迅速转变为人民解放军忠勇的战士。因为经过以上的种种斗争和努力，所以人民解放军虽然从战争一开始就处在连续的激烈的战斗中，但是不仅没有象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期望的那样因此丧失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恰恰相反，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却迅速地增长和壮大起来了。

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即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战争之后将近两年半的时候，战争形势发生了另一个根本变化：我人民解放军经过近百次的对国民党军的歼灭

战役之后，在东北辽宁省西部的战役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举扫清了中国东北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歼灭了美帝国主义亲自装备训练的蒋介石精锐部队的大部。经过这次战役，国民党军就从长期兵力上的优势变为劣势，而人民解放军则从兵力上的劣势转成优势。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已降为二百九十万人，人民解放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从此以后，全国战局即急转直下。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徐州附近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对于南线国民党军主力的决战，歼灭了大部分由美械装备的蒋介石精锐部队七个兵团，并使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统治中心——南京直接暴露在我进攻大军的面前。在同一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战场又占领了张家口、天津等城市，并胜利地争取了北平的和平解放，肃清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这样，经过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国人民革命的全国性的胜利局面，就已经确定了。

在这个时候，长江以南的残余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蒋介石暂时退到后台、李宗仁代而登台向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的缓兵之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以遂其苟延残喘、卷土重来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同意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是中国共产党与南京的谈判代表经过谈判所共同起草的和平协定的草案，却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因此，美帝国主义的假"和平"的诡计就被揭穿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以解放全中国。仅仅经过三天的战斗，就解放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后，从四月下旬到十二月底，太原、杭州、武汉、西安、上海、兰州、广州、重庆、成都、贵阳等中心城市也相继解放。湖南、绥远、新疆、西康、云南等地则以和平办法获得了解放。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反动统治完全灭亡了，它的残余象老鼠一样地逃到了在美国武装保护下的台湾岛。

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并向西藏开始了胜利的进军。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现在，除了台湾一处还受着美帝国主义霸占以外，全中国都已经解放了。

在将近四年的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八百零七万多人，争取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改编共有一百七十七万多人，击毙和俘虏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一千六百六十八人，缴获各种炮五万多门，机枪三十多万挺，坦克与装甲车一千多辆，汽车二万多辆，以及其他所有的武器和装备。

很明显，这个结果，对于美帝国主义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如此迅速的和悲惨的覆亡，不是偶然的，这是忽视人民意志、忽视人民力量的反动派的必然的结局，这是只看见自己在武力上暂时的表面的强大，而看不见自己在政治上的孤立，因而实行反对人民的冒险家的必然的结局。这是蒋介石在中国二十二年血腥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百多年血腥反动统治所早已应当作出的历史的裁判。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如上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台

湾省还没有解放。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国侵略者在发起了对于朝鲜的横暴的武装干涉同时，宣布以武力控制我国的台湾。这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夺取我国东北同类的野蛮无耻的侵略。毫无疑问，英勇的中国人民一定要从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台湾，使台湾的六百七十万同胞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

事实上美帝国主义对于台湾的侵略还只是美国以武力侵略我国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侵略朝鲜的真正目的，就在经过朝鲜来威胁我国的东北，只要有可能，美国侵略军就会从那里侵入我国，象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所作过的一样。一九五〇年十月，美国侵略朝鲜的军队就曾经向我国边境汹涌前进，直到鸭绿江边和图们江的附近。美国飞机轰炸扫射我国东北边境，使我国同胞遭受生命财产的损失。在这种严重威胁下，我国人民不得不组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向美国侵略者作战。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反侵略前线表现了极大的英勇。不顾美国侵略者在飞机、坦克、大炮等方面占绝对的优势，不顾美国空军残酷轰炸所造成的困难，我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并肩作战以来，却已经在五次战役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那时到今年六月三日为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歼灭了敌军十九万三千多人，包括美国侵略军八万九千多人。美国侵略者占领朝鲜北部并侵入我国东北的最初的疯狂计划被粉碎了，美国在东方最著名的侵略罪魁麦克阿瑟在这个失败中被撤职了。美国侵略军除开从朝鲜撤退以外，是找不到旁的出路的。毫无疑问，英勇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协助朝鲜人民击退侵略，以保卫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而我们也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民正在用一切力量巩固自己的国防，不让帝国主义侵略者再象过去一百多年中那样地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中国人民一定要使外国政府尊重我们的领土主权和正当利益，而一定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和朝鲜的侵略，以及对于日本的单独媾和、长期占领和重新武装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特别应当温习一下它所武装和指挥的蒋介石怎样被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彻底击败的历史。美帝国主义既然还没有学到应得的教训，那么，中国人民就一定要使学着蒋介石榜样的任何冒险家遭受与蒋介石同样可耻的悲惨的结局。

（《新华月报》1951年7月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11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468
SS号=10273513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目录

目录